



许良英纪念文集

良知英肇书屋



许良英纪念文集

良知英鉴书屋

目 录

许良英照片选	IV
编者的话	XXVI
第一辑 悼念许良英	. 1
1. 浙大学子的悼念	
从忠诚的共产党员到坚强的民主斗士	范岱年 . 3
许良英同志精神永存	吴 湜 . 8
凤凰涅槃 英魂永存	吴洵高 . 10
沉痛悼念我的良师益友许良英同志	高亮之 . 12
追思许良英和王来棣	姚庆栋 . 13
永不停步的“求是”人	陈 纲 . 14
我和许良英先生的一次交往	蔡恒胜 . 16
缅怀许先生二三事	刘 明 . 16
我眼里的圣者	徐水良 . 21
浙大骄子许良英	钱永红 . 24
“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国 利 . 29
2. 学生的悼念	
铮铮铁骨惊千古，涓涓睿思醒万代	李醒民 . 33
呼唤民主自由的科学史家	仲维光 . 42
哭许良英先生	仲维光 . 47
桃李无言报春暖	屈傲诚 . 58
真正的仁者只有傲骨没有傲气	陈恒六 . 63
许良英与《爱因斯坦文集》的命运	刘 兵 . 68
不死的老兵：痛悼严师许良英先生	熊 伟 . 70
科学史研究的良心——忆许良英先生言传身教二十余载	胡大年 . 73
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一生：怀念许良英老师	王作跃 . 84
卓越的科学思想家和当代民主先锋	周义澄 . 92
悼念许良英先生	李彤宇 . 98
3. 同仁的悼念	
怀念许良英先生	谈庆明 100
明时不作弥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吴水清 103
科学不是生产力	杜钧福 106
一件小事	史晓雷 108
国运沧桑扬科学民主 岁月蹉跎守纯粹人生	孙 烈 110
范岱年和许良英——浙大“求是”精神的传承者	熊卫民 112
4. 稔友的悼念	
痛悼老友许良英	于浩成 114
当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盛禹九 116
拨开历史的迷雾——读许良英和友人学术交流信件	盛禹九 123

天蒙蒙雾重重 良师诤友已去矣	丁子霖 蒋培坤 129
风雨如晦，许良英远行	王凌云 王宪曾 137
许良英先生，我的忘年之交	江棋生 139
从自我启蒙做起	齐晋生 141
许良英的五大贡献	王德禄 146
许良英：中国“世纪老人”的世界意义	王德禄 148
许良英生命的最后岁月	王德禄 149
宁折不屈——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许良英	杨思梁 150
纪念许良英先生	谢泳 157
许良英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影响	武文生 159
现在轮到我为你流泪了	王丹 166
自由之友 真理志士	范亚峰 167
旅美民主人士在纽约举行“许良英追思会”	文德 169

5. 朋友的悼念

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	铁流 171
以科学精神 追求自由民主——送别许良英纪实	俞梅荪 173
我认识的许良英伯伯	李亢美 177
许良英先生的几点政治遗产	姜福祯 178
记忆许良英	蒙木 183
追求真理 终生不渝	费良勇 185
纪念许良英先生	郭少坤 187
理性尊严德行	沈洪 188
深切怀念民主导师许良英先生	王德邦 190
我和许良英先生的渊源及几次交往	王金波 192
中国当代启蒙思想家许良英言论摘抄	吴汝徵 195
纪念许良英先生	张博树 200
一个大写的人	朱长超 202
许良英，为真理奋斗的爱因斯坦传人	DENNIS OVERBYE 204
中国科学家、民主人士许良英去世	储百亮(CHRIS BUCKLEY). 209

6. 同乡的悼念

许良英：鼓舞我在逆境中奋发向上的精神偶像	吴高兴 211
没有写完的民主思想	傅国涌 216
“谢谢火炬给你光明”——回望许良英先生的心路历程	傅国涌 220
泪别许良英先生	傅国涌 225
追忆许良英	张轩中 230
记忆许良英先生	顾以忠 231
一世坎坷求知求真	鹤矾 233
追思许良英：大雪无痕觅仙踪	年大六 235
真诚、耿直、无畏的典范	邓煥武 237

7. 家人的悼念

自由精神的启蒙者	许成钢 许平 239
----------	------------

做人——做学问，人生观——世界观	许成钢	241
《民主的历史》出版说明	许成钢	253
科学、哲学和自由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引力波到方先生	许成钢	264
愿爷爷的精神与世长存	许蒙	270
浩然正气越千载	许从平	274
做一个正直的人	许晓光	278
第二辑 悼念王来棣		280
校友王来棣：温州走出的史家	金辉	283
北望云天黯无语——追念王来棣先生	傅国涌	286
右派妻子的苦与痛——纪念王来棣先生	熊卫民	291
悼念王来棣师母	仲维光	293
我所知道的许良英和王来棣——我的怀念	吴大信	294
历史真相的寻找者：纪念王来棣	许成钢 许平	296
第三辑 许良英王来棣追思会		299
武文生：开场白		301
范岱年：我同良英同志的交往		301
梁存秀：许良英同志二三事		304
林京耀：许良英对中国现代科学史的贡献		305
李德齐：由追思许良英、王来棣想到中国应如何走向未来		306
王德禄：许良英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312
许成钢：许良英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的一生		315
刘明：怀念许良英、黄万里、刘辽三先生		324
伍晓鹰：诗人江婴：寄语民主，追思良英		327
程宏：许良英晚年对我的励志鞭策		330
杜光：为科学民主理性而奋斗的许良英		332
许从平：启蒙之花必将在中华大地上遍地绽放		333
董光璧：我与许良英先生		335
陈恒六：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深切怀念许良英先生		336
王作跃：怀念许良英老师		339
李醒民：感恩许先生的思想和人格		339
周良霄：民族的脊梁——怀念许良英		341
许平：许良英书信、日记一瞥		342
许蒙：像爷爷一样乐观、积极，对未来充满希望		346
王肃端：于细微处见精神——记许良英先生无私奉献的点点滴滴		347
武文生：结束语		348
附录一：许良英部分编、著、译作目录（1942-2012）		349
附录二：许良英大事记		361
编后记		386

许良英照片选



许良英 1920.5.3.~2013.1.28.
(2004.2.2 侯艺兵摄)



图 1 1931.1.1.
在临海海门(今
台州椒江区)

图 2 1935 年
在海门东山中
学初中毕业

图 3 1947 年
在杭州



← 抗战时期的
张家渡高台
门“风翻书楼”
——《爱因斯
坦文集》的诞
生地(许良其
摄)。

→ 1947.4.
许氏四兄弟在
杭州。左起：
良其、良舜、
良英、良容



↑ 1936 年在浙大
高工读书时，在
浙江图书馆阅览室



→ 1949.1.
浙大物理系
全体教职员
欢迎王淦昌
先生(2排右2)
访美归来。舜水
馆是物理实
验室，左面的
窗子是许良
英(后排左4)
的办公室。它
们都是浙大
地下党的主
要活动场所。



1963.4.与许成钢（左）、
许平在天安门广场
英雄纪念碑前



1975.8.13. 与许成钢（右）、
车宏生于杭州。这是1963年
别后父子俩首次见面。

↓ 1976.10.9. 与吕东明
（中）、赵中立（左）、许成
钢、许平等冒雨泛舟昆明
湖，吕东明向大家披露“四
人帮”被捕的内部消息。当
日，许感冒，咳嗽不止，拖
到12月7日，口吐鲜血，
10分钟后，在商务印书馆
看到《爱因斯坦文集》第一
卷的样书。他“抚摸着这部
经历了14个寒暑、三赴北
京、两去上海、多灾多难的
书稿”感叹道，它“真是个
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的
产物！”



↑ 在浙江农村老家劳改时穿的衣服

↓ 1979.11.1. 与周邦立
在杭州大华饭店参加费巩纪念会



↑ 1979.10. 去成都参加“全国自然辩证法理论讨
论会”，会后（10.24.）去遵义旧地重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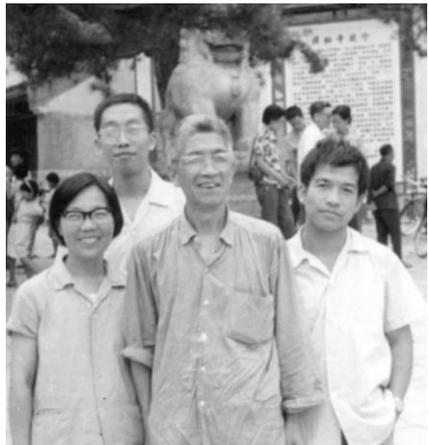




1980.7.24.中南海。为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钱三强（中）主讲。
右：李佩珊，X，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左：X，许良英，X，X，谷牧，陈慕华。



← 1980.8.21 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代表 Pierre M. Perrolle 博士于北京饭店。



→ 1980.8.24. 于北京潭柘寺。这是 1957 年以后第一张“全家福”。

1982.4.4.，与浙大地下党同志在一起。左起：周志成、李景先、许良英、田万钟、吴大信、李德容、X



➔ 1982.5.1.
许成钢、吕
匡辉婚宴



⬇
1983.11.17.
科学史所近
现代史室同
仁。左起：
潘承湘、刘
生余、王敏
慧、张钟静、
许良英、吴
熙敬、李佩
珊、屈傲诚、
X、闫康年、
王肃端。



1983.11.在哈佛大学访问。

⬆ 在哈佛科学中心
.➤ 许良英（右 1）、李佩珊（右 3）
与美国科学史家 E.Hiebert（右 5）、
G.Holton（右 6）。



➔ 1984.4.22~26. 在洛阳参加“全国
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讨论会”。
右起：方励之、许良英、李醒民、方
福康、郝柏林



1984.8. 在贵州遵义参加“浙大在遵湄时期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座谈会”。左起：朱语今、李晨、庞曾漱、吕东明、许良英、黄宗甄、X、陈耀寰。



1984.10.21-25. 杭州，“于子三运动”党史座谈会。左起，
前排：谷超豪、周志成、许良英、钟沛璋、洪德铭、陈向明、吴大信；
后排：张申、陈业荣、田万钟、钟伯熙、吴洵高、崔兆芳、王来棣、徐永义、陈永时



1985年与科学史所同事宴请美国科学史家Erwin Hiebert。右起：潘承湘、许良英、翁士达、Hiebert、李佩珊。



图 1 1985.5.17. 与研究生王作跃(左 1)、陈恒六(右 1) 等陪同 Erwin Hiebert 拜访王淦昌先生(右 2)。



图 2 1986.5.28. 与研究生仲维光(左 2 起)、王作跃、陈恒六、刘兵一起开第 17 次物理学史 Seminar。



图 3 1986.11.14. 与李淑娴、方励之、刘宾雁商讨在 1987 年初举办反右运动 30 周年学术讨论会(陈罕立摄)。



图 4 1987.9.5. 美国物理学史家, 洛克菲勒大学教授 Abraham Pais 演讲结束后。
左起：
范岱年、方励之、许良英、A.Pais、李佩珊、X、刘辽。



1987.9.16. 中央党校。20 世纪中国科技史讨论会。前排左 2 起：李佩珊、钱临照、方励之、许良英、范岱年；后排：仲维光（左 1）、熊伟（左 3）、屈傲诚（右 1）。



↖ 1987.5. 祝贺王淦昌先生 80 寿辰
 ← 1987.11.8. 许良英（戴鸭舌帽者）与浙大学生
 ↑ 1987.11.30. 在浙大竺可桢像前。左起：张功耀、许良英、汪容、姚德昌



←
1988.1.26
王来棣、
许良英、
李景先拜
访老师苏
步青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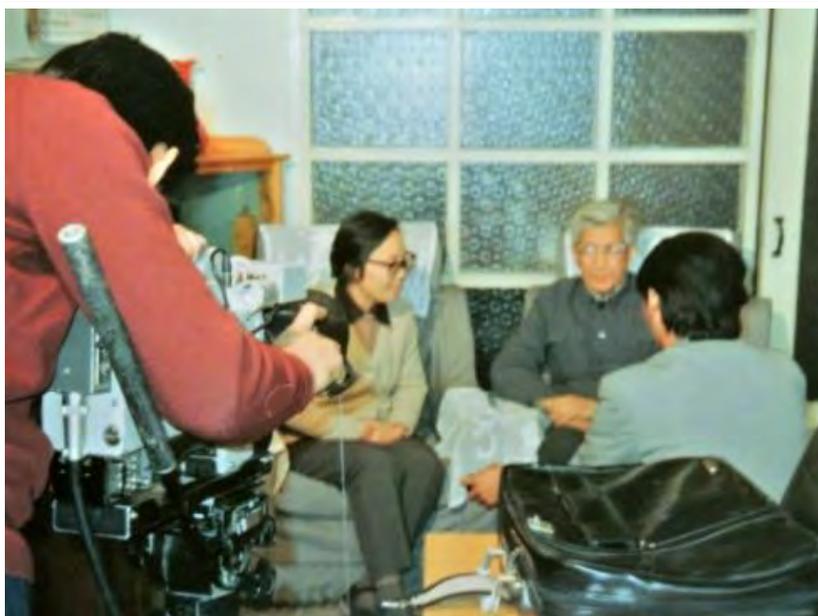
→
1988.3.30
与陆铿



1988.6.16. 右起：许良英、王来棣、马歇尔·古德曼（哈佛俄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茉莉·古德曼（哈佛费正清中心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范岱年、方励之、李淑娴、许平、许蒙、陈罕立（小古德曼摄）。



1988 年在范岱年家。与范岱年、方励之、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教授 Robert S. Cohen 夫妇。



◀ 1988年春，CCTV拟拍摄反映建国后知识分子情况的多集专题片《中国科学40年》，在1989年建国40周年时播放。编导张海潮征求许的意见，许认为，反映建国后知识分子情况必须要提到反右运动。张同意，并提出反右运动部分以许为典型。

这是10月19日张采访时王来棣谈到，1958年许被迫回乡劳改，她伤心过度导致即将出生的女儿胎死腹中的情景（许平摄）。

由于6.4事件，播出时片名改为《共和国之恋》，“反右”“文革”等内容被全部删除。



◀ 1988.5.12.
在李佩珊家。右起：许良英、方励之、美国物理史学家Lawrence Badash，范岱年（李佩珊摄）。



◀ 1988.12.30.
在方励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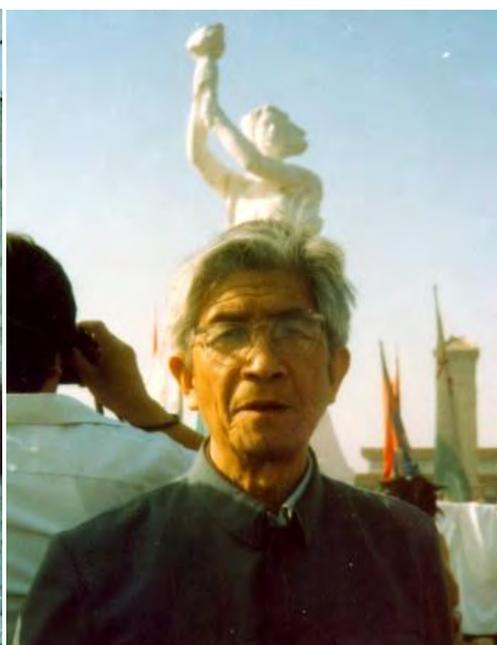
← 1989.2.4. 与方励之、王丹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与中科院企业家协会主办的“名家名人迎春联谊会”。

↓ 1989.3.18.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就 42 人联名信之事在统战部约见有关人员后合影。左起：

吕东明、王来棣、许良英、阎明复、施雅风、李晨。



1989.3.21. 拜访徐铸成先生



1989.6.1. 在天安门广场“自由女神”像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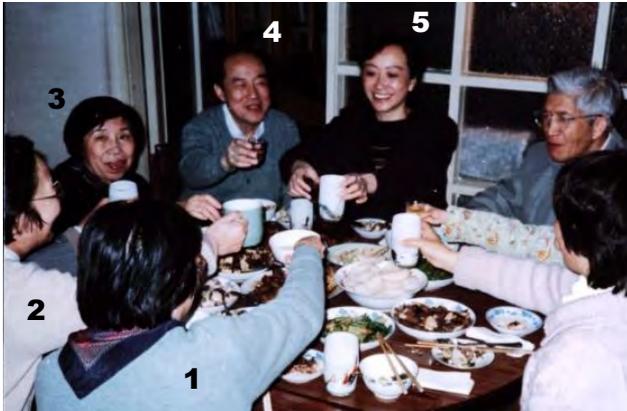
←
1990.2.13.
与黄宗甄、
林巧巧拜访
袁翰青先生



→
1990.6.16.
与何成钧
(中)、陈恒
六在颐和园



1990.3.16. 北京孚
郡王府 (“九爷
府”, 科学史所旧
址)。左起:
张柏春、许良英、
吴晓峰、钱临照、
范林、戈革、刘辽、
董光壁



← 1990.12.3. 宴请王来棣 (2)、林巧巧 (1) 的中学老师、台湾著名作家潘希珍 (3), 并请诗人邵燕祥 (4)、作家张抗抗 (5) 作陪。

↓ 1992.7.5. 原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的同事祝贺于光远先生 77 岁生日。左起: 范岱年、赵中立、许良英、于光远、龚育之、傅懋和、胡文耕、梁存秀、孙焕林。





← 1992.11.15.
与诗人邵燕祥
(右2)、作家
戴厚英(右3)。



→ 1993.5.27.
与丁子霖(右)、
王丹(左)。



↖ 1993.7.19., 右起:
许蒙、许良英、赵中立、
张宣三、王来棣、许成钢。



↑ 1993.9.26. 与魏京生。

← 1993.7.28. 唯一一次全家
一起包饺子。左起: 许成钢、
许良英、许平、陈罕立、许蒙



1993.11.27.与施雅风



1994.4.5. 与叶笃正在颐和园。



1994.2.1. 在纪念竺可桢逝世 20 周年座谈会上，批评路甬祥任浙大校长后把竺可桢创立的浙大校训“求是”改为“求是创新”。
左起：许良英、黄宗甄、路甬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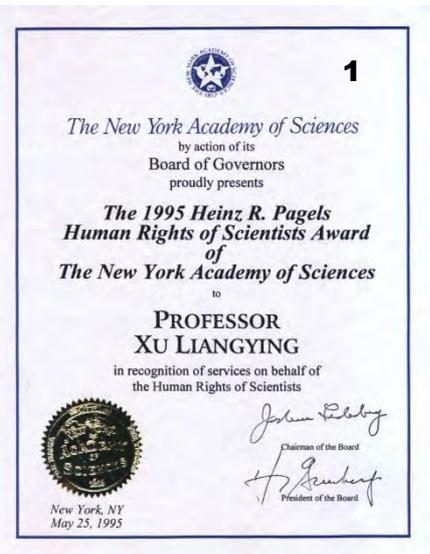


图 1 1995.5.25. 纽约科学院授予许良英“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

图 2 受警方阻挠，直到 1997.7.18. 许良英才收到由密西根大学曾敏儿教授送来的证书。

↓ 1995.6.10 于京郊百花山





1995.9. 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许良英、王来棣在许成钢(左2)、吕匡辉(右2)和科学史所王肃端(右1)陪同下被迫到烟台、威海等地旅游。这是8日在从蓬莱到长岛的船上。



← 1996.9.6. 接受美国物理史学家 L. Badash 教授(王作跃的博士导师)赠送的爱因斯坦 T 恤衫(王作跃摄)。

→ 1998 年夏, 与侄儿许从平(后左)、侄孙许晓光(后右)。



1997.2.18 与胡济民(1)、周志成(3)、汪容(4)给老师王淦昌先生(2)拜年。

➔ 1999.12.7.在李慎之家

↓ 2000.4.14. 朋友们在友谊宾馆友谊厅庆贺许良英 80 寿辰。左起，
前排：黄宗甄、林巧巧、过兴先、许良英、王来棣、叶笃正、周志成；
后排：武文生、陈养惠、范岱年、薛禹谷、李佩珊、王德禄



← 2001.9.19. 与华贻芳(右1)、王光(右2)夫妇在北京密云水库。

↙ 2003.2.2. 与过兴先(左1)、薛禹谷(左2)、黄宗甄(右1)拜访百岁老人贝时璋先生(左3)。

↓ 2003.7.21. 杭州。委托四弟许良容(右)向陈立先生(左)送花篮，祝贺他的 101 岁大寿。





2005.7.25-26. 清华大学。纪念爱因斯坦奇迹年 100 周年讨论会。

前排右起：刘兵、X、X、江晓原、X、X、许良英、席泽宗、J. van Dongen（《爱因斯坦全集》编辑助理），D. Kennefick（《爱因斯坦全集》编辑），Peter Galison（哈佛），Don Howard（Notre Dame 大学）、X、X、曾国屏、胡化凯、张钟静；第 4 排左 1 为胡大年。



↑ 2006.1.1. “三合一”家宴：庆祝王来棣 80 大寿（1 月 2 日）、许成钢 55 岁生日（12 月 31 日）及元旦。后排右起：郭迪、许成钢、许平、陈罕立。



➤ 2004.12.16.与熊卫民（右 2）、谢泳（张藜摄）。



➔ 2006.1.26.与姚监复（左）、李三达（右，李慎之三子）。



2006年，与丁子霖（右1）、蒋培坤（左1）伉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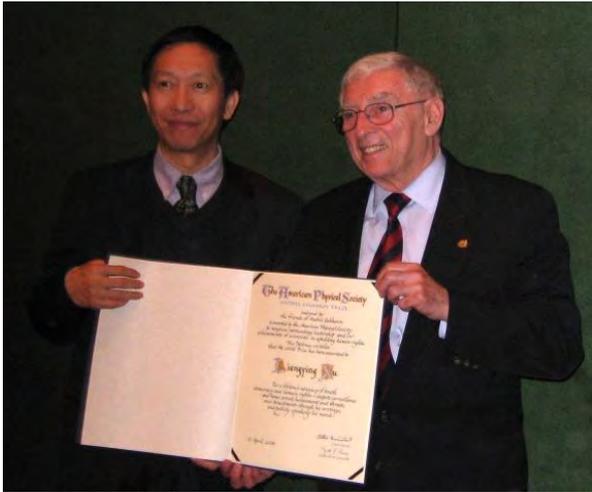
➤ 2006.11.22.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 C. Davis 来访。Davis 是左派，1971 年曾在河内从事反战活动。看了《纽约时报》关于许良英的报道后非常激动，要结识许。



➤ 2007.5.9.
在胡绩伟家。
与胡绩伟、狄沙
夫妇

↑ 2007.5.24.
在卢沟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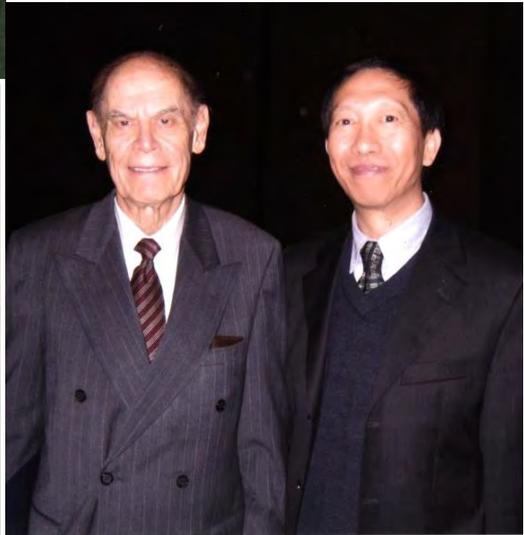
← 2007.8.21.
拜访李锐



2008.4.13. 美国圣路易斯，美国物理学会（APS）年会。

许成钢代表许良英从 APS 主席 A. Bienenstock 手中接过“萨哈罗夫人权奖”证书（←），并向 APS 回赠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

↓ 许成钢与获“Pais 物理学史奖”的哈佛大学教授 G. Holton。



在 APS 为许良英颁发萨哈罗夫人权奖而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左起：
王作跃，Noemi Mirkin，许成钢，Edward Gerjuoy，Noemie Koller，曾敏儿，胡大年
（带下划线者是 APS 人权委员会成员）。



2008.9.9.
在友谊宾馆参加王德禄发起的“普世价值”讨论会。
左起：
朱厚泽、许良英、郑仲兵、王来棣。



← 2009.1.11.
钱永红（钱宝琮之孙）送来他编的《一代学人钱宝琮》。

↙ ↓ 2010.7.17.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馆。
与武文生参观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与瑞士驻华大使馆合办的爱因斯坦展览（许平摄）。





图1 2010.8.2. 左起：
武文生、胡大年、王德禄、
王作跃、陈恒六、刘兵
祝贺许良英90大寿。

图2 2011.12.25. 左起：
郭迪、王来棣、许良英、
许成钢（齐晋生摄）。

图3 2012.6.11. 王德禄
请客，在北京金融街台州
饭店吃家乡菜。左起：
陈罕立、许平、王德禄、
许良英、王来棣、许成钢、
刘志光、武文生（程宏摄）。



2



3



↑ 2012.9.18.与傅国涌。

↖ 2012.8.9. 与刘小雁（刘宾雁之女）在刘宾雁墓前。

← 2012.8.9. 在林昭（右）和张志新塑像前。
左起：**前排：** 燕遁复、许良英、王书瑶、钱理群；
中排： 刘小雁、朱毅；
后排： X、X、X、严正学、X、纪增善、胡佳、俞梅荪、滕彪。



2012.10.12. 王作跃向许良英、王来棣展示刚出版的《呼唤民主与人权——贺许良英先生九十寿辰》（熊卫民摄）。

编者的话

家父许良英先生于2013年1月28日去世后，家人收到许多家父生前友好寄来、发来的悼念文章和唁电。家父的忘年交王德禄先生提出动议：收集、挑选一些悼念文章，汇编起来，编辑成书。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此书基本形成雏形。由于不合时势，仅在小圈子内交流。如今，在纪念家父逝世三周年之际，在他和家母的遗著《民主的历史》出版发行半年之时，在2016年1月15日在北京成功召开了许良英、王来棣先生追思会之后，大家觉得，是时候让文集面世了。

文集分为三辑并两个附录：

第一辑“悼念许良英”为家父去世后，认识或不认识的诸友好发表的悼文。这部分文章很多，为方便读者查找，我们将作者分为七类：1.浙大学子（包括他们的后人），2.学生（包括学生的学生），3.同仁（自然科学界、科学史界），4.稔友（与家父相熟），5.朋友（与家父不很熟悉甚至未曾谋面），6.浙江同乡，7.家人。凡是可归入其他类的均不入“稔友”或“朋友”。除“家人”外，各类均以作者大致年龄排序，大致年龄未知的按汉语拼音排序。

第二辑为悼念家母王来棣女士的文章。

第三辑“许良英王来棣追思会”为追思会上诸友好的发言。

附录一为家父自编的《许良英编、著、译作目录》，编好此目录后几个月他就去世了。

附录二是许良英大事记，由姜福祯拟出初稿，又参考了许从平编的“许良英生平年表”（许从平《忆民主先行者许良英》，2015年5月），我根据家父的手稿与文章（包括两本自传手稿[1920~1958，成稿于1993年]、[1920~1968，写于1968-70年]、若干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及1968年以后的日记）作了修改与增补，许从平做了多处更正。在编辑本文集过程中，发现许多悼文中的记述与史实不符，我对少数错误做了注解，更多的错误无法一一处理，因此整理出这份大事记，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在文集的策划、编辑过程中，王德禄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发挥了关键作用；姜福祯负责文稿的收集、筛选、整理，并拟出文集和大事记的初稿；程宏参与了文集的编辑、排版设计；武文生、刘志光和我的堂兄许从平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家兄嫂许成钢、郭迪给予了许多指导性意见。我负责后期的文稿收集以及筛选、编辑工作，更正了文中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在文字（包括部分与事实有出入的文字）中加了一些注释，并完成了大事记。

范岱年、许从平、王作跃、胡大年、钱永红、程宏以及科学史所杜石然、董光璧、王冰、熊卫民、李林等对辨识照片中的人物及背景给予了很多帮助。

王德禄、武文生、程宏等为追思会的策划、筹备与召开做了大量工作，速记员小姐给出了详尽的速记记录，程宏和我据此整理出初稿，最后，各位与会者对其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与增补，终成正果。

感谢所有的作者和与会者，他们感情饱满而又富有理性的文章和发言，使得家父的形象得以较完整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本人才疏学浅、水平有限，凡修改有误、注释不当、大事记中与事实不符之处，及任何编辑上的意见与建议，敬请作者、读者不吝赐教。

许平 2016年6月

第一辑
悼念许良英



下面几张照片大致反映了许良英一生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参见附录二：许良英大事记）：
“两次思想转折”：1940年与1974年；
“三世人生”：1920~1949~1969~2013；
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



图 1
1939 年底
在广西宜山：
要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浙大新生

图 2
1949.8.1.在杭州：
忠诚的共产党员



图 3
1957.5.12.
在天安门：
自投“阳谋”罗网前的
浑然不觉

图 4
1972.6.14.
在湖南韶山：
五次进入毛故居顶
礼膜拜的朝圣者



图 5
1978 年 5 月底回故
乡迁户口，在张家渡
永安溪畔：
恢复工作后的踌躇
满志

图 6
2011.12.25.
在北京：
民主思想的启蒙者

从忠诚的共产党员到坚强的民主斗士

——沉痛悼念许良英同志

范岱年

一、

许良英同志，1920年生于浙江临海县张家渡。晚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离休。2012年上半年，他身体还很好，说要争取活到100岁。10月25日，他摔了一跤，摔破了头，到医院缝了四针。第二天我去看他，他说在医院做过CT检查，脑子内部没有问题。其实，他脑子中的微血管还是破裂了，慢慢地在流血。到12月中旬，淤血压迫神经，不能走路，才去海淀医院住院。15日，我去医院看他，他已做过微创手术，抽出了脑中的淤血。那天他头脑还清醒，能认识人。以后又去看过两次，他因肺部感染、高烧不退，一直昏迷不醒。12月31日，他夫人王来棣在海淀医院病逝，他本人因病重迁入重症监护室，我去看他，他仍昏迷不醒，吸着氧气。1月3日，我又去看望他，医生仍说他肺部感染。为了防止交叉感染，他的儿子希望大家不要去医院看他，可在网上看他的病情通告。以后，我就每天看他的病情通告，知道他又得了肺炎、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还是很关心他的病情，请协和医院等名医来会诊，试用了各种药物救治。但终于因年老体弱，救治无效，于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海淀医院逝世，享年93岁。1月30日，在北大医学部遗体捐赠中心，大家瞻仰了他的遗体，向他的遗体告别，原来只通知了少数亲友和学生，结果却来了几百人。

我认识许良英同志，已经67年了。他是我的老师、老领导、老战友。他是我的引路人。他的指引，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早在1946年，他在贵州湄潭浙大物理系指导过我们的热学实验。1948年我在杭州浙大加入地下党时，他是我的第一位领导人，我是在他的监督下，宣誓入党的。在他领导下，我发展了几名地下党员，有一位是杭州地下党第一名工人党员章正明。入党不久，许良英就介绍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科学时代社，成员都是进步的青年助教或讲师。在该社的一次集会上，许良英介绍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自然辩证法这个名词，想不到我以后却在这个领域工作了数十年。1948年12月31日晚，许良英组织科学时代社的近20名成员（大多数是浙大地下党员）一起在物理实验室听解放区电台广播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我们好几个人一起速记，然后对照整理出全文，大家分段写成大字报，半夜里就贴在学校的大字报栏上。第二天元旦，大字报前阅读者络绎不绝，不仅有校内的师生员工，还有校外来的许多群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解放区的广播，而且是这样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1949年1月26日，浙大同学欢迎5位同学出狱，举行了示威游行。我奉许良英之命，写了报道“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在香港刊物《群众》上发表。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几天后，我就追随许良英，到杭州市军管会青委组织部党工科工作，他是科长，我是干事。我们积极参加了杭州市解放初的民主改革运动和杭州学校系统的建党、建团工作。

1952年6月，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9月，由许良英提名，我被调到编辑室任编辑。1955年，许良英要我协助他编写《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本小册子。这本书在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也是我参加写作的第一本书。这本书在1982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

1956年，许良英到哲学研究所工作，在光远的领导下，制定了《自然辩证法12年研究规划草案》，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我们一起被打为右派。许良英失去公职，到农村当农民，1961年摘帽。我于1962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摘帽；1963年调到哲学研究所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专职编辑，内部控制使用，实际上继承了许良英开创的工作。1973年，由于许良英的要求，我参加了《爱因斯坦文集》第1、2两卷的翻译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我从许良英那里又学到很多。而这部文集也是我翻译的20多部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1978年底，我们的右派问题，都得到了改正，恢复了党籍。这时，我们都已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我们都感到，中国需要启蒙，需要民主。此后，我们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他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我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协作。我们七人（许良英、赵中立、何成钧、汪容、方励之、刘辽、范岱年）还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起带研究生。我也参加了许良英编校的美国科学史家霍尔顿的《科学思想史论集》（199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译校工作。我们还一同担任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自然科学史学会的常务理事。1987年，为了庆祝我们的老师王淦昌八十寿辰，他、胡济民、汪容和我一起编了《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表示我们对王老师的敬意。那一年，正好是反右运动30周年，他和两位好友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那时，我有一个弱智的孩子需要照顾，他就没有让我参加发起，因为他估计到会有些风险。结果，他的两位朋友都因此被开除了党籍。

自那之后，他全身心投入中国的民主运动，而我只是支持和追随者。他曾多次发表呼吁书，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呼唤民主自由，呼唤人权，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从1988年开始，他和夫人王来棣全力研究民主政治的历史和理论，一直工作到最后躺倒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为止。

二、

许良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总是热情地投身于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业。1939年考进浙大物理系时，他立志做一个物理学权威，曾写出“科学至上，物理第一”的对联。1942年大学毕业后，他已接受马克思主义，决心参加革命，多方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直到1946年9月，才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加入了党。回到杭州后，在中共上海学委领导下，历任浙大地下党支部委员、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杭州市工委委员。据说吴学谦同志曾

以上海学委身份领导过杭州市工委，钟沛璋曾任杭州市工委委员。1949年2月，杭州地下党的两个系统（上海学委系统和杭州城工部系统）打通，成立杭州地下市委，由林枫同志任书记。许良英任青委委员兼大学区委书记，直至解放（青委书记是陈向明同志）。许良英通过党组织，在杭州大学和中学中，发展了大批党员，把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输送到解放区，大力推动杭州的学生运动，特别是1948年10月以后的于子三运动，在全国有很大影响。1949年3月以后，杭州地下青委通过各校的党组织，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动员师生安心留校，推动学校成立应变会，储粮储水，保护学校，迎接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时，仅浙大一校，就有地下党员约60人（已离校的不计在内），解放不久，有三分之二以上被调到军管会工作，有三位贵州籍的，被调到南京，随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留在学校的不到三分之一。解放初，杭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林枫同志曾说，杭州地下党，许良英立了第一功。

从1949年5月到1952年上半年，许良英历任中共杭州市青委组织部党工科科长、市团委学生部部长，为发展学校中的党团组织，为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如解放初的反银奸运动、动员杭州市青年干部学校百名学员参加土改工作团、抗美援朝时期动员青年学生参军运动、三反运动等）积极工作。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作为兼任的杭州市学校党委委员，在党委会上，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力保浙大教授束星北，得到书记余铭璜、委员莫朴、乔石、刘容等一致同意，否定了市公安局文教保卫科原定逮捕束星北教授的方案（参见《束星北档案》，50-54页）。

1952年6月，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为加强科学战线党的力量，他推荐了一批原浙大地下党员（如周志成、朱兆祥、过兴先、任知恕、范岱年、吴洵高、王来棣等），到科学院、科普、科协工作，成为中层骨干（其中1957年有6位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或开除出党）。他工作尽心尽职。有一天上午，上班不久，家中来了电话，他新生的孩子随保姆睡觉，保姆不小心，孩子因煤气中毒而死。他赶忙回去处理。但到下午，他又回到编辑室，专心工作。他那时还兼任过科学院团委书记，学术秘书处机关支部书记。学术秘书长钱三强就是在这一届支部入党的。他作为支部书记，十分坚持原则，对个别领导同志的不良作风，毫不顾情面地提出严厉批评。因此，也可能得罪了一些人。1955年，因为曾（1950年）是胡风朋友方然的入党介绍人，他在肃反运动中被重点审查，停职反省。（其实，许良英并不认识方然。只是因为青委书记周力行认识方然，要介绍他入党，缺一个介绍人，作为党工科科长的许，才被拉去做介绍人的。）肃反运动后，他就要求到哲学研究所研究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组成立后，他、赵中立、何成钧、陈步是高级研究人员（他们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他们当时很有雄心壮志，下决心要好好读几年书，要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做出贡献，超过苏联。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1957年，他更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我们理解为这是要发扬民主。哪知在6月初就开始了反右斗争。许良英思想不通，以为是党内保守分子抵制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于是在哲学研究所公然表示反对，因而成为了科学院第一个党内右派。在北大一个会议室召开大会批判，我们来自浙大的地下党

员，都被要求做揭发批判许良英的发言，要求和他划清界线。1958年许良英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回浙江老家农村当农民。我因为和许良英关系密切，没有和他划清界线，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到农村后，许良英还是想努力改造自己，在劳动之余，通读《马恩全集》和部分《列宁全集》。1961年，他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1962年，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在光远、龚育之的领导下，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制定了一个翻译西方大科学家的哲学著作的计划，让一批摘帽右派担任翻译。许良英接受了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任务，十分积极认真，仍想为党的理论工作做出贡献。他在编译工作的基础上，写出了《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一文，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5年第4期用笔名发表，受到了陆定一的表扬。以他为主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1-3卷，几经周折，终于在1976年到1979年间陆续出版。文集第一卷，1977年曾受到胡耀邦同志的表扬。在最初的版本中，许良英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注释中，对爱因斯坦的某些观点进行了不恰当的批判。直到2007年出增订版时，才做了改正。这表明，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他仍是一个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三、

1978年6月，许良英恢复了公职，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研究，1979年1月，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党籍也恢复了。他反思了解放后30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曲折道路，认为根本问题是没有铲除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根。1980年，他为钱三强起草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概况》讲稿，写上了“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两大柱石，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次年，他在我负责主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在和李佩珊主编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结束语中，也阐述了这一思想。

1986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他又在该年《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期上发表“‘双百’方针带来的喜悦和悲哀给我们的启示”一文，进一步阐明政治民主、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1987年，反右运动30周年，他和两位朋友发起举行“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意义。结果是，会议未开成，两位发起人被开除党籍，胡耀邦也因为反对自由化不力而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这大大挫伤了他对改革所抱有的一丝希望。

1989年，我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做访问教授。该年2月，他和浙大老同学组织42位知识分子发表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由钱临照、王淦昌领衔。3月6日公布。信中建议：“尽力使政治体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条件，是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不再因思想定罪。”此信曾受到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的肯定。我在波士顿看到了这封联名信，发现有一半以上签名者是我熟识的老师和朋

友，有十多位来自浙大，所以我很快就写了一篇介绍这些签名者的文章，并表示如果我在国内，也会参加签名。这篇文章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后又被香港《九十年代》杂志转载。据说后来这篇文章被作为“海外自由化言论”在动乱展览会展览。

在1989年4、5月间。许良英很关心学生运动，但他坚决反对学生绝食，反对学生无限期罢课，可惜他的建议未被学生所采纳。六四以后，传闻他上了黑名单，亲友们劝他躲避一下，被他谢绝。他说，他愿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一个谭嗣同，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大概是两三年以后，因为他坚持自己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又一次失去了党籍。记得1948年我入党时，许良英曾教导我说，党籍意味着政治生命，一个党员，宁可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不能放弃自己的政治生命。但这时，党对于他已不是那么神圣，他也就淡然处之。他更在意的是“要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

我于1991年中回国。1992年，我的两位青年朋友帮中国科协的《未来与发展》做编辑工作。他们要我出面，约请北京的李锐、胡绩伟、于光远、吴象、冯兰瑞等二、三十位知识分子笔谈“今后十年中国改革的前景与问题”，在该刊1992年第4、5两期发表。许良英的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刊载在第5期上。文章提到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并再次强调，“既要改革，就得顺应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认真开展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就因为这篇文章，这期刊物被封禁，编辑受整肃。

1994年3月11日，许良英、王来棣夫妇、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和邵燕祥、刘辽、张抗抗7位知识分子在《纽约时报》联名发表“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一文，文中写道，“我们呼吁当局果敢地结束我国几千年来因思想、言论、文字治罪的历史，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问题被关押的人员。”3月12日，他开始遭到软禁。那天上午，科学院的一位领导要我去许良英家看看，见到他沉着冷静。我出来时遭到门前警察的扣留盘问。他们打电话请示后，才把我放行。

1995年5月，许良英又组织45位知识分子发表“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由王淦昌先生领衔，这次我也参加了（其中仍有十多位来自浙大）。呼吁书提出了三点希望：（1）以宽容精神对待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各种见解，不再把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当作“敌对分子”，加以压制打击、监视、软禁，甚至拘捕。（2）本着实事求是精神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并释放尚在狱中的关押人员。（3）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果敢地结束我国自古以来文字狱这一不光彩的传统。呼吁书发表后，王淦昌先生受到很大的压力，他所在单位的干部要他声明撤回签名，被王先生所拒绝，但写了一个“事先没有仔细看呼吁书内容”的条子。后来，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给王先生写了一封信，说“先生的签字被利用来制造不利于中国十二亿人民的事”。王先生受到这个威胁，就写了一封回信，说是“受人愚弄了”。7月11日，杨振宁把王先生的回信和他给王先生的第二封信在香港《联合报》发表。此后，科学院党组织曾把这两封信作为文件下发，要我们这些签名者看后表态。我们都表示我们的签名是自觉自愿的，没有被愚弄的问题。王先生的这封回

信，对许良英是很大的打击。他曾找王先生谈这件事，王先生也感到难以解释。以前，每年春节，许良英都带我去木樨地王先生家向王老师拜年。1996年春节，许良英就没有去，是我一个人去的。那次，王先生一再亲切地问起“我的那位老朋友”，表示“不要彼此疏远了”。我回来后立即把王先生的话转告许良英，许良英感到他应该马上去看望王老师。他们很快又恢复了过去那样亲切的师生情谊。1997年8月，王先生在散步时被骑车人撞倒骨折住院，我们又一起去看望他。1998年王先生因病再次住院，10月9日，许良英约我一起去看望王先生。那次见面时，王先生夸许良英的文章写得好，希望许良英以后多写写他。临别时，王先生又重复说了一遍。这是他对许良英这个学生的信任和嘱托。12月10日，王先生就逝世了。1999年3月2日，许良英写出了“痛悼恩师王淦昌先生”一文，表达了他对恩师的无限深情。

许良英在组织起草这三份呼吁书以后，曾经又想组织过一次，但最后因故取消了。以后他没有再发表呼吁书，而与他的夫人王来棣全力撰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历时二十多年。他不顾视力极差、记忆力衰退，坚持不懈，已完成大部分书稿。其中第一编是“民主在西方的历程”，从希腊雅典民主制、到荷兰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英国的两次民主革命和议会制民主，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美国民主制的创立和发展，都已写成，只缺“多变的法国民主革命”等两章，第二编“民主在中国的传播”，谈到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孙中山和陈独秀的民主观等。最近几年，他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几篇有关民主政治和普世价值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许良英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转变成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成为一位探索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思想家，思想认识是有所变化的，但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现代化、为了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为了全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的初衷没有改变。他认识到要在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一定是一条曲折、漫长、艰辛的道路。不过，他仍满怀信心。一是因为民主化是历史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是因为他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智慧的中国人民必将做出抉择，走上民主的康庄大道。

良英同志走了。他连遗体也没有留下，捐献给北大医学部了。但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不朽的。良英同志，安息吧！

许良英同志精神永存

吴淦（浙大校友，48化学）

接到许良英同志病逝消息，深为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为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理想，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杰出学长而感到痛惜。想到他以93岁高龄、视力也极度衰弱情况下，仍不顾疲倦地著述，向社会进行启蒙教育，以至积劳成疾。并且他与老伴王来棣校友生前均已留言，将遗体捐献供教学与科研之用。这种将全部身心献给国家与人民的无私精神，使我由衷敬佩！

许良英同志 1942 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后为助教。在浙大迁回杭州后，1947-49 年他是浙大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我在 1947 年学运中入党，是新党员，与许不可能有接触，对他既不认识也不了解。解放后虽曾在一个单位（省、市团委）工作过，但还是了解很少。其后他调去中国科学院，只知他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直到八十年代，看到一本记载解放前活跃在遵湄时期浙大学生运动的书《黔北风云》，里面提到许良英，有两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学生中的进步活动加紧镇压，白色恐怖加剧。此时许良英与一些进步同学商量，考虑原来比较暴露的进步社团难以活动了。为了适应浙大以理工为主的特点，并且便于隐蔽，在 1941 年 4 月成立了一个自然科学社团“质与能自然科学社”，以公开合法形式开展活动，组织过“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讨论会”，也组织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系列讨论。这样团结了很多要求进步的同学，并利用课余时间个别深入谈心，交谈中国革命和人生观等问题。1942 年浙大“倒孔运动”后，反动派在遵义和湄潭逮捕了几位同学。许良英曾和周志成说：“目前情况下搞运动要讲究策略。”

我觉得许良英由于在当时浙大的进步社团“黑白文艺社”收藏的进步书籍看了很多，并善于思考，这时在对敌斗争中已比较理性，能冷静地观察和分析问题，指导行动。回杭州后，在反饥饿反迫害的五月运动和于子三运动中，浙大的地下党支部在上海学委的领导下，运用各种方式团结教育发动广大群众，并争取竺校长、教授及教职员工的积极支持，尽可能减少牺牲，扩大影响，最终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这与当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许良英能与支委们一道，驾驭当时险恶复杂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二是许良英在遵义时，看到大批被国民党抓来的壮丁被绳子绑着押送，衣着单薄破烂。看到骨瘦如柴、蓬头垢面、背着沉重背篓的煤炭工人以及一些赤贫的老百姓，促使他考虑到在国民党这样的反动统治下，如何能救国家于危亡？如何能使科学得到发展？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才有希望。虽然他物理学得很好，是王淦昌老师器重的学生，但他毕业后竟然放弃任助教，跑到桂林、重庆去找共产党。（后在重庆解决了组织问题）。

我觉得，是人民的疾苦、民族的灾难与科学的发展促使他深刻考虑国家的前途。也说明他当时对共产党在解放区施行的政策是信赖和拥护的。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也表现了他革命意志的坚强。

在反右斗争中，许良英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责令到黑龙江某农场劳动改造，每月发生活费 29 元。许以腿部有关节炎，经受不了北方的酷寒为由，坚持要求回原籍农村参加劳动，宁愿放弃生活费，自己谋生（这一抉择是很明智的）。回乡后，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翻译《爱因斯坦文集》。靠劳动挣得的工分，养活自己和母亲。后来因得到一笔他过去写书的稿费，用这笔钱买工分，换得翻译的时间。当然条件还是很艰苦的。若没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追求真理的决心，是很难坚持的。由于长期的艰苦劳动，健康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回京后曾一度咯血，检查患了肺结核（几十年后确诊为支气管扩张——编者注）。他晚年视力很差，我想也是由于长年累月在昏暗的灯光下过度使用造成的。

在本世纪初，许多解放前在杭州参加学运的战友，希望将这时期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情况，追忆收集，整理成册，留作纪念。于是在很多战友写回忆稿的基础上，又收集了一些现成史料，包括《于子三运动》一书，编成《黎明前的求是儿女》，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良英同志很多关照与指导。他首先要我们注意收集来的材料的真实性。并介绍与老学长施平同志联系，最后又给书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他曾提到群众运动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他说：“由于党有丰富的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有了党组织，在斗争策略的掌握和力量的整合等方面自然会大为改观。而这种作用如果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优良的学校氛围，也就无从显现。”我认为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也是符合浙大当时情况的。浙大地下党支部正是在团结教育广大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扩大积极分子队伍等方面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才取得斗争胜利的。

最近看到很多许的朋友对许的介绍，知道许良英同志一直是非常辛劳地著书立说，内容主要是宣传科学、民主、人权和自由。实际是秉承他一贯的以先知促后知，在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做艰苦细致的启蒙工作。他深深地热爱着国家和人民，认为这是坚持真理，追求理想，促进国强民富应走的道路。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综观许良英同志一生，使我深受教益。谨以几行短句，聊表敬佩之忱：

铮铮铁骨浓浓深情国运民生时刻忧心
博览深思渐渡迷津科学民主指路明灯
纯真刚正是非分明死亡何惧自由弥珍
爱因斯坦人生典型勤译文集备尝艰辛
名利荣辱视若敝屣孜孜以求唯扬真理
奋笔呐喊志在启蒙耄耋之年著述不止
叹染沉痾患难伴侣回天乏力赍志而逝
敬告学长精神永存继承遗志必有后人

2013-3-1（求是儿女网）

凤凰涅槃 英魂永存

——悼许良英、王来棣同志

吴洵高

“悲莫悲兮生别离”，许良英、王来棣夫妇于年末年初相继与世长逝，我永远失去了两位良师益友，他俩音容笑貌不时在我眼前徜徉，使我倍加悲伤。

我与他俩相识已六七十年了，1949年前我们一起参加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地下斗争，经历了白色恐怖；1949年后，又亲历了毛泽东以整人为纲的赤色恐怖，许王夫妇更是备受磨难：反右时，许老划为极右，“三开”迁返回乡劳动管制；夫人王来棣开除党籍，沦为二等公民备受歧视，携二幼子，度日艰难。

凤凰浴火更光彩夺目；他俩并没有在厄运前低头。许老在农村沉重劳动艰难谋生的恶劣条件下，竟编译了三巨卷《爱因斯坦文集》。爱因斯坦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也是无畏的反法西斯的民主斗士。当年上海写作班子及其主子在他头上大泼脏水，许老无所畏惧，挺身而出捍卫爱因斯坦及其学说。当毛老过世，灵堂拜鬼招魂烟雾弥漫，来棣著文揭批毛一贯与知识分子为敌，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把知识分子列为敌对阶级。民主对立面是专制独裁，当那位总设计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许老即对其要坚持专政作了批判，后来他还大胆提出马克思最大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认为这是逆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就这样，一个曾冒着生命危险、信奉大半生，即使在蒙冤受屈，仍执迷不悟的信仰扬弃了，该要多大勇气。

我与许老、来棣最后一次会面是 2000 年秋。当年分散在南方的部分地下党员、民青战友相约到北京紫竹院与在京的浙大战友欢聚，许王俩人也兴致勃勃来了。当时许老应该是 80 多岁了，除头发花白外，脸庞清矍有神，嘴角仍挂着带有自信自矜的微笑。许王俩也跟着大家高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等当年学运流行歌曲。联谊会结束，主持人宣布大家自由结伴分散在园中漫步叙旧。许老腰骨硬朗，不用拐杖、不用搀扶和大家一起游园。

在园中许老邂逅相遇另一游园老头，两人萍水相逢互报家门，原来那位曾供职水电部。他不“不看僧面看佛面”当面大批曾任水电部长现贵为总理的李鹏来了。于是两人当场面红耳赤争吵起来。看来那一位理屈词穷，就破口大骂许老是“民运分子”！“民运分子”“六四”后是要通缉捉拿的，是专政对象。许老也毫不示弱，“我就是，怎么样！”民主运动，民主有罪，恐怕只有北洋军阀、蒋介石才这样干，想不到当年反对蒋介石的当局，竟重拾起这双破履。两人相争，众人相劝。最后田万钟、吴湜陪送许老俩口回中关村寓所休息消气，许老仍悻悻不平，他提到 1949 年前提着脑袋参加革命；在农村批斗大会上，他曾当场喝“滴滴畏”抗争，死有什么可怕的！他支持“六四”民主学生运动，甚至曾作好被捕入狱的准备。他为争民主，已无所畏惧了。

这就是许良英，许老先生！亲亲仇仇，“敢想、敢说、敢作、敢当”（鲁迅）无畏无惧。

这是我与许王俩位最后一次见面，至今相隔已十三四年了，然仍历历在目。与他俩分别的头几年还不时有书信来往，他还不时寄给我他的近作，以及与李慎之等友人来往书信的复印件，以启迪我的思想。日转星移，时间一长，就慢慢疏远了，信件来往越来越少，一年难得有两三封。

去年十月底，老友范岱年从京来宁探亲，顺道到寒舍叙旧。我俩从 1957 年“反右”起五十多年未有来往，音信全无，老友相逢甚为欣喜。他提到许王俩近况，云来棣重症缠身十分虚弱消瘦；许老仍腰骨硬朗，每天下楼锻炼，然后伏案笔耕不已，现正重新写《自传》，反思自己的一生。岱年回京，我托他带了点保健品之类送许王。岱年回京后说，许老听了他对我的介绍，十分欣喜。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年底年初，终于传来来棣不祥许老病重病危的消息，不久许王两人相继永离我们而去，痛哉！

沉痛悼念我的良师益友许良英同志

高亮之（浙大校友，50 病虫害）

良英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1947年7月我在上海参加地下党。在上海是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刘茂森与我接头。到杭州后，浙大地下党新任支部书记许良英来到华家池，与我接上暗号。他与我两人在华家池边的农村小路上深谈2个多小时。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国内形势，以及浙大师生中左中右的力量情况。他的诚挚的态度与冷静的理智给予我极深刻的印象。他比我年长9岁，当年，他27岁，我18岁。他真是似同我的老师与兄长。此情此景，我终身难忘。

良英是47-49年间，浙大地下党主要领导人。47年间，他对于于子三运动的领导坚定而有智谋，使运动取得巨大的成功，成为建国之前，影响重大的最后一次全国性的学生运动。

48年间，他领导宁沪杭学生大联欢活动，这次活动壮大了在这中国的核心地区中大专科学校中的进步力量。

48-49年，他领导浙大师生迎接解放；并有序地安排几十位地下党战友撤退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了骨干力量。

1946-48年间，我在浙大学运中，担任一些职务，发挥一些作用，如担任华家池党小组长、华家池的YF支部委员、学生自治会副常务理事；发展于子三参加YF，发展了6个地下党员等等。现在回想，都是在良英同志的领导与安排之下事。48年10月，由于我的身份比较暴露，在他的决定下，我撤退到皖西解放区；参加了淮海战役后期的安庆之战与渡江之战。因解放后的南京对党员中农业科技干部的需要，而留在南京。从此决定了我的一生。

因此，良英同志是影响我一生的人。

良英同志深得竺可桢校长的器重，建国后，他被调去北京，协助竺校长在中科院的工作；负责编辑指导科学院工作的《科学通报》。

使他的浙大战友们没有想到的是：良英在后来的人生中，有着非常艰辛、困顿与感人的经历。

良英为人的最大特点是：为了坚持真理与正义，绝不妥协与动摇。从来只讲是非，不计利害；他认准的道路，一定要走到底。

1957年，他在中科院率先地、公开地、明确地反对反右运动。结果成为中科院影响最大的右派；在全国性报纸上受到公开批评。

20年中，他被开除公职，回到家乡靠劳动谋生。夫妻被迫离异。他在深重的苦难中坚贞不屈，潜心研究爱因斯坦。终于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王淦昌先生非常重视他的才华与人格，长期给予生活帮助。

改革开放以来，他成为我国推动民主进步的重要带头人之一。他是建国以来，我国几个主要的呼吁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文件的主要发起人。因此获得了国际与国内的尊敬与声誉。

与此同时，他热情地关注他在浙大时的老战友们，对于完整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大学运的《黎明前的求是儿女》一书的编写给予积极支持，为该书写了序言。

我为该书写的几篇文章，如《缅怀浙大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浙大的学生自治会》等，都寄给他审阅，得到他的认真的改正。例如他给我详细介绍王淦昌先生在 40 年代以及在他蒙难之后，对他的热情的关心与帮助。

他到晚年，与爱妻来棣一起，专心写作《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从理论上推动中国的进步。

在上世纪 50 年代与 80 年代之后，我多次去北京他家中拜访他。我写的哲学书，都请他指正。他总是认真地指出一些不够正确的地方（例如对于爱因斯坦的学说），使我受益非浅。

良英同志是浙大校友的骄傲，是我们共同的学习榜样。良英同志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求是儿女网）（2013-1-29）

追思许良英和王来棣

姚庆栋（浙大校友，51 电机）

许良英和王来棣同志走了，在解放前地下党时期良英同志是浙大党的领导，来棣同志是系级支部书记。那时地下党是单线联系和小组活动，吴洵高同志直接领导我们，他们是上面领导和横线关系是不联系也不认识。直到杭州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解放，党内部公开后，才见了面认识他们。现在回忆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后期的护校迎接解放，良英同志在贯彻党的学运组织领导指示做了大量工作，浙江大学在全国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浙江大学能够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虽是整个地下组织做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怀念到许良英同志和当时战友王来棣同志的战斗和作用。

对于他们其他工作我没有接触，我只从底层群众和一个党员回顾。当时，良英同志领导浙大地下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好，做的很成熟，地下组织通过学生运动和地下革命教育工作，教育了浙大师生，保护了学校，把浙大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

地下党通过学生运动来教育同学，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我作为学运中的小弟弟深有体会。我在学运中受到教育开始进步，离不开老大哥帮助，一步一步认识必须推翻国

民党的统治，中国才有希望。党非常爱护学生，一方面提高学生的觉悟，培养他们，那时虽在地下时期，就已经注意培养人才，培养他们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骨干。1948年夏天，组织一批积极同学撤退到解放区，现在知道是良英同志组织的，许多同志在祖国的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

到1949年春天全国解放形势十分明朗，地下党一方面做了工作把关在狱内五位同学救出。记得国民党镇压南京学生，浙大有些积极同学想要上街支援，党组织要我们劝阻，要保存力量免于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当时还出了一份像小说红岩中的挺进报的每日新闻，在市内分销，在组织检查下认为过于冒险和暴露，决定停办。所以在保存力量上浙大组织是做得很好的，浙大虽然在全国学运工作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了只有于子三烈士牺牲，损失是最小的。

浙大组织提出护校应变，把整个浙大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当时国民党曾经有把浙大迁离杭州的打算，地下组织做了竺可桢校长和许多教授的工作，消除他们的顾虑留下来一起护校。组织师生保护图书、仪器，也包括在生活上储粮、储水应对意外。到解放浙大师生顺利恢复教学，许多调出浙大师生到其他学校、科学院所、工、农、医、军工、文化等部门都发挥了不少作用，都和当时地下组织这段工作分不开的。

让我们缅怀追思两位，安息吧！

（求是儿女网）

永不停步的“求是”人

——悼念老许夫妇

陈纲（浙大校友，56化学）

1948年5月9日早晨8点钟左右，在杭州松木场一个僻静的小竹林里，我第一次见到许良英。当时，他是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学区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浙江大学物理系助教，但只告诉我们他叫“金宇星”，是代表上级党组织来宣布批准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地下党支部成立的。支委会由三人组成，书记包钟锐（高二学生，杭高Y.F.组织负责人，1948年下半年到解放区，改名包文俊，1999年在天津去世）、组织委员王维澄（高三学生，全国人大离休，现在北京）、宣传委员陈纲（高三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浙大离休，现在杭州）。与会的就是四人，许穿了一件灰布长衫，急促的语调，威严的仪态，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久，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我在谈到对党认识的变化时说：“以前对党总有神圣不可触摸的感觉，通过这段时间和陈（陈永时，当时浙大学生，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改

名陈衡，城市规划专家，在合肥去世）和老金的接触，觉得党还是很有人情味的-----”，老许没有听我说完，就打断我的话说：“党怎么不神圣？党就是神圣的！”他当时严肃的口气，简直将我吓了一跳，所以记忆深刻。30多年后的1980年暮春，华岗冤案得以平反，华的长子华贻芳（杭高地下党员，全国科协离休，民办事业推手，2005年去世）做东，在北京全聚德邀请有关老同志欢庆。席间，我谈起这件挨批的小事时，老许坦承根据他当年的思想和直率的性格，是会这么说的。

上世纪80年代，我因工作关系经常赴京开会、办事。公余，中关村老许家是我常到之处，每次，他总是放下手头的事，倾心和我交谈。话题，除了询问杭州老同志们的情况外，主要是对国家前途、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关切。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真相逐渐披露，老许与时俱进，严于解剖自己，把思想演变过程赤裸裸地公之于众。只要他认识到的事，就一定坚持到底，除非你能说服他。由于他视野深广、心怀坦荡、知识渊博，对我们后生既严格又热情，我一直视他为严师益友，从谈话中得到思想和人品等多方面的教益。因中关村远离城区，故常留在他家里吃便饭。有一次周末，经我一再敦促，邀请了王维澄（他当时在中宣部工作）一起去看望老许，这是老王唯一一次到老许的家，老许热情地向他反映了许多社科院的情况，而老王只是听老许讲，并不说话。最后，老许夫妇送我俩到电梯门口，老许忍不住问道：“我跟你说了半个多小时，你难道一句话也没有？”老王终于说了一句：“前所未闻。”

在老许的心目中，一切事物只求是非曲直，决不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有段时间，我从关心他的健康和处境出发，婉转地劝他适当注意一点，他立即斩钢截铁地说：“我已做好准备，为了我国的民主事业，绝不退缩。该写的文章要写，该说的话要说，不能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安全而禁声封笔。我愿意成为当代的谭嗣同！”他是林则徐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践行者，而不是挂在嘴上，确有台州先贤方孝孺的风范！

我认识王来棣是在1947年5月23日下午，浙大“南京五二〇惨案真相”宣传队来杭高时，比认识老许早。后来在杭高校园里也见到过她几次，但未曾深入交谈。下半年她通过堂弟王孙奂在杭高组织读书会，所有的图书都来自她处，偶尔曾参加我们的小组讨论会，听得多说的少，说的都能给我们以启发，虽然接触不多，但在我们这批弟妹们的心目中，她是一位理智、平和、可信、可敬的大姐，她是我们的启蒙人。后来经过学运的考验，在读书会成员中秘密发展Y.F.，建立了杭高组织。

许良英和王来棣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妻是我一直来所敬仰的，在我的心目中，他俩是中国知识分子昭昭天日、挺立不倒的良心和脊梁。

中华文明的理智、骨气，西方文明的科学、民主，台州和温州的崇学、力行传统，和本人的天资、勤奋、永不停息地追求真理，融会贯通，铸就了他俩的性格、人品和业绩。

老许夫妇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2013/2/7 于杭州（求是儿女网）

我和许良英先生的一次交往

蔡恒胜

从网上看到，今日许良英先生去世，作为浙大后人，悼念先生一路走好！

我知道许良英这个人来源于父亲。七十年代末，他当时是北京浙大校友会的负责人，有些浙大的事，他来找过父亲，如纪念于子三等事宜。听父亲讲过他曾是王淦昌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于湄潭时浙大的物理系，后来又是浙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在 1949 年杭州解放时，家父曾被推举为竺可桢校长离校后担任的临时校务委员会主席，浙大档案称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6 月 6 日，浙江军管会派出林乎加等军代表二人，由严仁赓、陈立、许良英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监督浙大临时校务委员会的工作。父亲调到中国科学院后，他也前后调到科学院负责出版物把关及院刊编辑和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研究。想不到反右时他居然成为科学院第一个全院批判的右派，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回老家当了 20 年农民。后来听说在生活来源全无时，他在农村坚持搞《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处于极机密的国防科研领导岗位的王淦昌得知后，曾以“王京”的名字，按月寄给他 30 元钱。我在《中关村回忆》中以《王淦昌伯伯的正直人品》一文中提到此事。在该书校对出版前，为了准确核实此事，我在 2008 年回北京专门拜访了许良英先生。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和许先生的交往。他和夫人王来棣热情接待了我，他纠正了我文中几点不确之处，我基本按照他的意见改了，只是他建议删除“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一句，我保留改成了“据他自己说曾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当时斩钉截铁地说，这是错的，他查了资料，束星北绝对没有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我感觉他是搞科学史的，是个非常谨严的人。临行前，他送我二篇他写的文章：一篇是“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另一篇是“痛悼恩师王淦昌先生”。前一篇文章包括他详细考证到束星北先生 1943 年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既然直到 1943 年束星北先生都没见过爱因斯坦，那就无从再谈他怎么会在 1928 年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呢？

（新浪博客 2013-01-29）

缅怀许先生二三事

刘明

从 1980 年代中期与许良英先生相识，至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作为一个理论物理专业本科毕业，后来在科学史科学哲学这样的交叉学科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业者；作为文革后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的晚辈；作为家庭同样遭遇过“反右”运动这一灭顶之灾的过来人，我与长我 24 岁、一样属猴的许良英先生有太多的交集。无论从学识、阅历，还是从

人品、贡献而论，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尊奉许良英先生为师长，一旦有机会便向他求教。而他不畏强权的勇士精神，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忠贞不渝的民主追求，对我具有永远的激励和示范价值。

许先生位于黄庄中科院宿舍大院的陋室是我京城最为熟悉的宅邸之一；我多次品尝过许王二先生的标准中餐——前一天的剩余菜蔬掺兑馄饨或者饺子或者汤圆一锅煮的乱炖；许王二先生多次送我他们在境内外发表的中英文论著和囿于种种原因尚未面世的文稿（它们往往比前者具有更高的思想或学术价值）；更不要说我们或者面对面或者借助信件坦诚地交流关于时局人物关于思想理论的信息和见解……不大上网的许王二先生，信息之灵通，思维之敏捷，见解之独到，批评之锐利，总能让我这个后生感触良深，回味无穷。

如今二老已经仙逝，而我也过了古稀之年。回想从1970年代初至今的40多年，我得以逐步抛弃曾被灌输的成王败寇的功利史观而转向人类自由解放的文明史观；抛弃独断的一元论而转向怀疑的多元论；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转向宽宏的普世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像林昭、顾准、王若水、李慎之、许良英、……、德热拉斯、萨哈罗夫、哈维尔、……这些先知先觉的中外勇者的探索和启蒙。

由于与许先生交流的时空学理范围极其广阔，涉及到政治、哲学、科学领域的诸多人物事件，基于眼下环境条件的限制，囿于手头的书信资料，我选择了三件人事来述说许先生的做事治学与为人风格。

一、编辑《爱因斯坦文录》

浙江文艺出版社在1997年策划出版一套《大科学家文丛》，我被聘为编委之一。1999年推出了第一辑，包括《李正道文录》、《竺可桢文录》和《怀特海文录》三种，受到读书界的欢迎。2001年，该社新任社长兼总编辑叶晓芳女士提议将《文丛》继续出下去，在两三年后推出第二辑。于是我上报了编辑《爱因斯坦文录》的计划，叶女士表现赞同并委托我操办此事。

众所周知，许良英是国内第一号爱因斯坦专家并以主持翻译《爱因斯坦文集》享誉海内外，我就想请许先生主编此书稿，以保证《文录》的质量和权威性。当我面请许先生出山时，他当即应允下来并要求我来做他的助手。他当时的想法是，《爱因斯坦文集》出版于20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期，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对爱因斯坦尤其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有许多不当的甚至是错误的评价。《文录》的出版恰好为纠正这些失误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契机。再者，《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的部头较大，不方便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人阅读。《文录》可以选取《文集》中科学哲学方面较通俗的内容及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作为一种袖珍本，满足大众的读书要求，更有力地传播爱氏的理念和精神。

《文录》的编选阶段，通常是我提出初步的文献选用目录和分组方案，然后交许先生过目定夺。译文全部取自《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和第三卷，以社会政治方面的言论为主，也收入了少量的通俗科学文字。许先生的认真之处在于，他对所有译文重新做了校订，尤其是对一些文章的标题和全部注释进行了精心的修改，消除了《文集》1970年代初版时，在“以阶段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主导下，由于编译者对爱因

斯坦的无知和偏见所留下的错误印迹。

为了表达进入新世纪后对爱因斯坦的重新认识，许先生特意为《文录》撰写了12000字的后记“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文中评价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他是过去的一千年间（公元1001—2000年）对人类影响最深远的历史人物。他是20世纪初科学革命的先驱，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创建者，量子论的奠基者之一，现代宇宙学的开创者，激光技术的理论先驱；同时，他又是一位富有探索精神的哲学家和坚持独立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终生为和平、民主、自由、人权而斗争的世界公民。按照诺贝尔奖的评奖标准，他一生的科学贡献应该至少可以得到七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还可以得到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可是，他一向鄙视追逐名利和安逸享乐，而始终向往着真、善、美的生活理想。”

《文录》的全部文稿于2002年秋编辑完成后交给了出版社。2003年3月，社里将排好的校样寄送给许先生和我，我们抓紧时间，再次逐字逐句校对一遍寄返给出版社。出版社很有把握地说，“编审大功告成，今年六七月份就可以见书了。”

好事多磨。直到八月下旬，也没有《文录》出版的音信，许先生有些急了。他先是写信给出版社，未见出版社回音；只好写信给我：“请你就近去了解一下情况，并给我个电话。”其实此前一个月，我已经从出版社得知，《文录》的全部书稿都被非上级的有关部门调去审阅，要待他们查看，判定没有问题，才能出书。事情复杂化了。出于担心许先生认真上火，我不便直接向他挑明真相，只好敷衍他说：“书稿被出版社上级调走了，他们要为思想内容把关。不久就会送还回来的，无非再等几天，不必性急。”

十月上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北京举行全国年会，我在会上见到了范岱年先生，向他明说了《文录》所遭遇的麻烦，并拜托他暂时不要告诉许先生。到12月初，我再次收到许先生来信。信中，说他已经知道了《文录》现在受阻在哪里，先是“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与此**部门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会引起**部门的兴趣？”后来经姚监复介绍，看过《南方周末》上关于孙大午案的长篇报道、翻阅了《怀念李慎之》文集，再联系到他自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的文章中曾经提到《爱因斯坦文录》，“方才恍然大悟”，**部门“自然会对此感兴趣。”许先生在信中还预见说，“现在孙大午案既已了结，《爱因斯坦文录》的出版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他还嘱托我向出版社说明此事之原委，他们可以主动向**部门索还书稿以尽快重启《文录》的原定出版进程。

后来的事态正如许先生所预见，《文录》越过了意外的挫折又重新启动了。他在12月中旬的信中，对“一个月内可以见书，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赞誉出版社“敢于负责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文录》所经历的波折说明了什么？在我们之间也交流了看法。许先生在此信中写道：“你信中说，通过《爱因斯坦文录》恢复出版这件事，社会也确实有所进步。我也有同感。但社会进步了，并不等于当官的也进步了，而有些官僚反而在开倒车……听说要求批判‘新自由主义’……据说首要靶子内定是李慎之。我倒很想看看他们究竟怎样批！……望你注意这一动向。”

一番起落之后，《爱因斯坦文录》终于在2004年1月面世。成为接续《爱因斯坦文

集》，反映 1980 年代以来经历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洗礼，中国学术界以普适价值观如实评介这位科学文化巨匠的一部新译著。

《文录》出版之后，《科学时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读书时报》、《湘声报》、《社会科学论坛》等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评介文章。而“钟沛璋那篇书评被《人民日报》删改得面目全非，已无多少价值”（许良英语）。我们都希望“《文录》能像当年《爱因斯坦文集》那样普及”，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结果却不如人愿，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使然吧？！

二、关注李慎之杭州讲学

2002 年 5 月，李慎之先生应中国美术学院的邀请来杭访问讲学。获知这一消息，我的朋友圈格外兴奋。王立嘉、周明和我积极参与了迎送和接待李先生夫妻，一起游览了西湖、千岛湖，参观了胡庆余堂，我们还通知同道到演讲会场听讲助兴……。此时的李先生动作自如，精神矍铄，兴致昂然。相聚的时间里，大家一边观光浏览，一边就文化历史等方面的问题向李先生请教并讨论。

中国美术学院邀请李先生来访演讲的缘由，系出于院方要求各系科扩大社会联系，强化文化氛围，提升学院影响。李慎之正是作为当代公认的文化名人被邀，邀请方对他的著作和思想并没有足够的认知。大概是后来有人向上报告了某些情况，致使到访的李先生并未受到礼遇的接待和安排。首场演讲安排在工作日的晚上，我们组织了几十人共乘一辆大巴到会。礼堂很大，坐了大约一半的人，院领导却未见出面。他在美院演讲了两场，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内容很好，会场气氛则平和肃静。

我们联系了浙江大学，一些院系领导取回避态度。历史系的系主任郭世佑教授很积极，他提前两天贴出了海报：李慎之先生演讲《全球化和全球价值》。演讲当天是周六，浙大师生和校外灵通人士络绎赶来，原定的教室里外拥塞不堪，只好临时改换一个能容纳三百多人的大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之外，过道和门外还站满了听众。如此气氛，令李先生兴致很高，有声有色地演讲了两个小时。接下来的互动时间，听众踊跃提问，李先生清晰作答。中午已过，郭世佑只好抱歉地宣布演讲结束。散场时，许多人围聚在李先生身边，向他问好，请求他签名留念。如此胜景，为 1989 年夏季以来所仅见。

我和其他一些亲历者向许良英先生介绍了李慎之到杭演讲的过程和情景，许先生像听到喜讯一样，也感到振奋。他后来致信李慎之说：“你 5 月在杭州美院和浙大的演讲，听说反应非常热烈，令人高兴，不禁回忆起 1985 年 3 月方励之在浙大的那次演讲，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谈论政治问题，当时我也在场。（本来我也准备作一次关于民主概念的演讲的，由于突然视网膜脱落，不得不回北京做手术。）”

许良英和李慎之这对诤友，多年交往中共同经营着一道精神大餐：相互批评砥砺，抗拒强权打压。许在读过《全球化和全球价值》之后，回信给李：“觉得内容确实很好，对官方意识形态有很大冲击力。”但他又直率地指出：“有几处似乎考虑欠周”。一是认为李说“F.Bacon ‘以一身而开民主与科学两大价值系统，更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不祧之祖。’显然拔得太高了。”二是认为李说：“Adam Smith ‘开启了近二百年的市场经济’，似乎也欠妥。”三是提出讲稿中讲到美国制定宪法时，全国‘半数人口是黑人奴隶’，这个数

字不知出于何处？四是认为讲稿中提到“二十世纪以来民主还有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之分”，许说他没有听说过，“估计这大概是‘新左’或‘新马’之流的创造”……直到2003年4月李先生辞世之前，他们还在这些识见上交换意见。分歧是难免的，二老毕生求索的精神难能可贵。

三、关于陈立教授降级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的科研业绩评估工作中，量化评价的机制受到上方的青睐，因而量化评价的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感到，几十年来，我国一直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创造不出一流的成果，学术评价的标准违反学术规律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进入21世纪以后，我着力研究了这一问题，发表了《现行学术评价量化取向的九大弊端》等一系列文章，出版了一部著作《学术评价制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我也不时将论文寄送给许先生请他评阅，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励。无意中，他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即著名心理学家陈立被从一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

陈立，1902年生，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3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英国工业心理研究所、德国柏林大学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1935年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处任职。1939年起，任浙江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是我国工业心理学的开拓者。

1950年代以后，曾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杭州大学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术委员兼研究员，并担任众多社会职务。

许良英1939年考入浙大，至1949年调离浙大，在浙大学习和工作十年，与陈立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直到2004年陈立去世，他们保持了多年的通信交往。

2000年11月，陈立先生写信给许，发牢骚说：“因为年老体衰，珠黄不值钱。我现在的待遇由教授一级落到四级，横直我还够过活的，也就无所谓。但人总有些感到不太愉快！子曰：‘汝爱其羊，我爱其礼’。自己也知道，现在我不胜一级教授的功，按功论赏，这是正道，但孔老夫子也为自己设想，虽不在乎争一只羊，但于礼不妥。”

2004年春节期间，我去拜访许先生，他向我提到这一情况。并推测其背后的原因是，在1996、1997年酝酿四校合并组建新浙大期间，上级部门向陈立征求对于新校长人选的意见，陈立表示不同意XXX出任校长，而后来XXX还是出任了新浙大校长。出于对陈上述表态的不满，要给陈一点难堪，于是把他从一级降为四级。

在后来通信中，许先生又寄给我上信的复印件，并愤懑道：“陈立先生解放初是浙大接管小组成员，浙大文学院院长，又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理事长，他是一级教授是理所当然的。想不到50年后降为四级，实在荒唐。”

就这一情况，我向知情的朋友了解了一下，然后回信给许先生：“据我所知，陈立先生之所以工作到103岁直至去世，是因为浙江大学给予他相当于院士的礼遇。这本来是件值得肯定好事，体现了对于有突出贡献的老一代学者的尊重。但后来又仅聘他为‘四级教授’，您的理解……，事情背后的潜台词可能如此。但浙大校方的正式理由恐怕还是出自他们制定的量化指标定级办法。照此办法，要求一个百岁老人（又不愿搞捉刀

代笔一类低级动作)，每两三年拿出多少多少论文、著作，岂不荒唐？”

我还向许先生表示，如果能以陈立先生七十多年的职称、职务、职级变动为典型案例，联系中外学术机构评价评定学者的制度和实践，借此剖析 20 世纪中国教育、学术变迁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应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许良英先生，你的思想和精神，将激励一代一代后来者，向着科学、民主、理性，奋斗，前进！

2015 年 11 月 30 日

我眼里的圣者——悼许良英先生

徐水良

早上起来，看到许良英先生去世的消息，悲伤异常。真像许多朋友碰到类似情况时那样，头脑里是一片空白。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许先生是我最尊敬父执辈人物。他和林牧老先生，是我内心中最尊敬的父执辈人物中两个最尊敬的老师级人物。

说来话长。许先生虽然在浙大校史上相当有名，后来在浙大也有相当高的威望，但我在浙大读书时，却并不知道许先生的名字。直到我临毕业前不久，才偶尔听说老浙大地下党负责人被抓到浙大关起来了。本来，我是校革委会常委、政工组负责人，此事应该让我知道。但我们当时实际上毫无权力，没有人来通知我这类事情。当时，连我一个很要好的同学被他们抓起来，其他同学赶来告诉我，我才知道他被抓。我气极，跑到政工组，责问他们凭什么抓这个同学？凭什么这种事瞒着我不让我知道？政工组只好拿出他的一个同班同学的揭发给我看，就是一句话，说我这个同学说了“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我说这句话有什么错？周恩来也说过这个说法没错！你们竟然凭这句话抓人？政工组只好把责任推给工宣队军宣队。我很生气地跑到工宣队，工宣队大队长跟我谈。我说：“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这句话没错，你们凭什么抓人？要求他们放人。但他们就是坚持不放人，连我要求与这个同学见面，也不答应。其实，他们当时正想突破我们这些同学所谓的反毛泽东罪行，当时他们通过关押电机系一个同学，知道了一点我们这些同学曾经议论批评毛泽东的事情。

（顺便解释一下，“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这句话，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是“恶毒攻击”的大罪。及到 70 年代，我在南京制药厂说这句话时，制药厂一把手军代表还在全厂大会批判我，说我思想反动透顶。）

后来我的这个同学就和许良英先生关在一起，关了很长时间。期间我那个同学常常与许先生谈起我。许先生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我。两年后，这个同学解除隔离审查出来，到南京见我，借给我一些书，如黑格尔《小逻辑》，康德的书等等，也是许先生的。

他也对我谈起许先生。这时，我才开始对许先生有所了解。

后来，我在南京街头张贴《反对特权》等大字报，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在其他，在于制度；主张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实行民主制度。江苏省委派出 70 多人的工作队，进驻我厂，发动各大专院校，组织对我的批判。不久将我关进监狱。许先生知道我被关，就开始营救我。据我那个同学说，许先生他们正好路过南京，在南京街头看到我的大字报。后来许先生就跑到浙大，要浙大设法营救我。浙大老师同学和校友帮我募捐，又多次派人到江苏，要给我平反。南京市公安局的承办人员，几次到浙江调查，回来后说你徐水良欺骗性不小，我们到浙江，一路上听到的都是讲你的好话的。1978 年底，主持浙大工作的党委书记黄固，还派浙大团委书记，我的一个生死之交的同学，到南京营救我。浙大这类行动中间，当时我还素未谋过面的许良英先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79 年我平反出狱，后来到北京，就去看望许良英先生。那时科学院为许先生他们在一个宾馆，即西苑旅社租了一个房间，既做办公室，又作住宿。星期六星期天许先生回家，我就常常住在那里。从此以后，我对许先生逐步有了深入的了解，深深敬佩许先生的为人。

许先生的纯真和正直，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个性，一开始，甚至让我感到吃惊。有一次，有两个人，看起来是有相当地位的领导和学者，郑重其事地跑到西苑旅社来找许先生，帮一个批判爱因斯坦的人讲情，要许先生别写文章批评那个人，或者笔下留情。许先生一听就火了，坚决不答应。使那两个人几乎下不来台。我当时就想，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许先生那样纯真和直爽，直言不讳。别人来讲情，我们往往不得不给别人面子，不得不作些妥协，很难做到许先生那样，完全坚持自己的原则。后来他对刘晓波和许多人的态度，尤其是许多人去拜望他，他把别人热情迎进家门，却把刘晓波一个人堵在门外，不让刘进自己的家门，就是典型地表现了他的这种性格。

1981 年 5 月，我第二次入狱，许先生就一直进行大力营救，通过各种渠道给胡耀邦等领导人送材料。胡耀邦亲自过问，要求放人。还派人到江苏，到监狱了解情况。可惜最后被邓小平王震及其在江苏的保守势力否决了。1989 年初，许先生约老同学施雅风等发起 42 人签名的联名信，许先生自己写的一个解释性附件，介绍异议人士情况时，大部分篇幅也是写我的情况。许先生还把我的材料送给阎明复，阎明复答应一定送给最高领导人。不久以后，89 民运爆发，赵紫阳下台，阎明复被解除书记处书记职务后，阎还以统战部名义发文江苏省，要求解决我的问题。当时，南京等盛传我即将被加刑。所以，当省高法的人来找我，说统战部文件下来了时，我就说，不必费劲了，解决不了的。我内心里估计我这次如能逃过加刑，就是大吉大利了，因为我是最早上书的。1988 年 12 月写了一个《建议书》，提出恢复胡耀邦职务，赵紫阳辞职、邓小平退休，释放政治犯、平反自由化，解除党禁、报禁，组织民族团结和解及复兴振兴委员会，领导全国政治改革等七条共十余款建议，带出监狱，请许先生等一些上送中央，估计许先生送阎明复的材料中有这篇上书。不久以后，我看到报纸报道，赵紫阳说有反革命分子进行攻击；而胡耀邦则对过去一直想要重用我的原浙大党委书记张黎群说，想不到群众这么通情达理。我当时估计很可能与我这个上书有关。64 时，电视上公布的几个反革命集团抄家材料中，也有我署名的文件文章。许先生把我的这种“反革命”文件上送，就已经承担了

很大风险。

在我第二次坐牢十年中，许先生不仅一直坚持不懈地营救我，而且每年都给我家寄钱，补贴我家生活。我在监狱读的书，往往是许先生辗转寄给我的，包括介绍西方理论学术的各种著作。许先生的书，使我能够跟上外界思想的步伐。

89 民运发生，许先生担心我的安危，五月初，就赶紧请我妻子马上转告我，说中共将会镇压，要我在监狱里千万慎言谨行。我看到当时报纸报道的运动情况，看到学生运动的幼稚和邓小平李鹏们的坚决，也估计运动将会失败，我当然听从许先生意见，特别谨慎。也许这也是后来逃过加刑命运的一个因素。

海外的朋友往往不大了解许先生。但在大陆的民运人士中，许先生却特别德高望重，不仅因为他是对大陆民主运动有突出贡献的老前辈，而且因为他的特别纯真和正直，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他和林牧老先生，往往承担了大陆民运领军人物的角色。尤其是 64 以后好多年，两位老先生都是国内民运的领头人。每年平反六四的呼吁，往往由两位老人发起和起草。许先生还多次动员他的老师参与，把中国和浙大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等老科学家请出来，参与签名。

但对许先生，大家往往也都有点怕他。因为他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不讲面子。其实，这个情况，只是许先生的一面，许先生还有追求真理，善于纠正自己错误的一面；以及当面批评毫不留情，内心里却对人热情如火的一面。

许先生是我的长辈，也是忘年之交。在杭州和北京，都有朋友对我说，许先生最看重你和王丹两个人。但其实，我与许先生也有激烈争论。记得 90 年代初，有一次，我说，民主虽然是民主运动民主革命的目的，但对于自由和人权，却只是手段；自由和人权，才是民主的目的。当时正流行顾准先生的民主目的说，大家都在批判老毛的民主手段说，所以许先生听了我的话，特别生气。当场就非常严厉地批评我，说我是造反派思想，毛泽东流毒。我当时反批评许先生说，你主张民主，但实际上非常专制，听不得不同意见；你批评柳叔，其实你和柳叔是一样的。他当时正和柳叔憋气，很急，就说，我怎么会专制？我怎么会和他一样？当时师母王来棣在旁边，笑了说，你就是和他一样的。许先生想了一想，也笑了。柳叔是许先生小学中学最要好的同学，一辈子的好同学好朋友。许先生到杭州，每次必见柳叔。柳叔名叫柳柴，他是长辈，所以我称他柳叔。我到杭州，也总是住柳叔家，有时一住一个月。他们两个的脾气一个样，就是理想主义，单纯正直，脾气特别倔的那一种。这一次憋气，是因为柳叔回忆小学时许先生曾打过他一个耳光，许先生就说，我怎么会打你耳光？不可能。两个人争论起来，为了这个小事憋气，好几个月不来往。但又相互特别挂念，两个人每次见到我，都非常关切地询问对方情况。

回南京后，我把我自己论述自由民主目的手段的相关文章寄给许先生。多年后，我看到许先生和李慎之先生的争论，许先生的观点完全变过来了。许先生就是这样，他认为真理的东西，他就固执坚持；但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马上改正。他一辈子都在不断纠正错误，不断追求真理。

许先生确实如美国之音所说，是一个非凡的理想主义者。在许先生介绍下，我和他的许多同学朋友熟悉。所谓人以群分，他们都是一批刚正、正直的理想主义者。许先生

和他们，确确实实，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媒体把许先生称为是中国的良心和傲骨，完全符合事实。

在我的眼里，许先生是一个完全的圣者。

（来源：网路文摘—（6400期）2013.1.28—2.2）

浙大骄子许良英

钱永红

许良英（1920-2013），著名自然科学史家，“中国的爱因斯坦传人”，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安德烈·萨哈洛夫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1920年生于浙江临海，1934年考入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是著名学者王淦昌和束星北的学生。在浙大求学和担任助教期间，许良英积极参与或发起学校的科学与民主活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奉调北京，却仍旧心系浙大，与浙大人保持着密切往来。八十年代以后，他亲临浙大学术演讲、重访浙大西迁旧址、组织编撰浙大校史书籍、发表缅怀师长、校友的往事忆文。如今，93岁的许良英匆匆地走了，来不及与母校道别，留给浙大人的是悲痛，是敬佩，是骄傲。求是儿女网准备出一期许良英专刊，要我写一篇悼念忆文。我已在“怀旧频道”博客上公布了一组悼念许良英、王来棣夫妇的照片[1]，现将自己的零星记忆整理成篇，谈谈许先生数十年对我的关怀和提携，说说他的爱因斯坦研究历程、对浙大校史和科学史等方面的研究贡献。

初识许良英

我与许良英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的。从1974年到2011年的37年间，我们有过数不清的电话交流、信件来往和零距离长谈。每次交流都让我兴奋，让我受益。

1974年2月15日，我跟随着父亲钱克仁来到北京，参加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祖父钱宝琮举行的追悼会。刚入住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父亲就在招待所登记本上发现了许良英的名字。父亲说，许良英应该就是浙大黑白文艺社后期的社员。他在科学院工作，为什么要住在科学院招待所？父亲带着疑问去敲他的房门，没人应门，便留下一张纸条。不久，许先生外出归来，立刻找到我们。父亲与许先生虽是浙大校友，但既不同届，也不同系，在校时没有直接交往，但大家都是周邦立的好友。许先生得知我们的来意，也去八宝山参加了祖父的追悼会，我至今保留着包括许先生在内的所有追悼会参加者的签名簿。两位校友的两次谈话话题都是昔日的浙大，如竺可桢校长、“求是”校训、黑白文艺社等。他俩时而欢笑，时而争论，当时只有15岁的我在一旁似懂非懂。但我知道了许良英先生于1957年被科学院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不得已回故乡当农民，靠劳动工分养活自己和母亲。他借住中科院招待所是因为他到北京编译《爱因斯坦文集》，要去商务印书馆接洽。商务印书馆每月发他50元生活费。许先

生说，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对爱因斯坦十分崇敬，特别是细读了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深爱上物理学，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

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浙江大学，知道了曾经是浙大积极分子的许良英，也记住了许良英所崇拜的科学大师爱因斯坦的名字。

后来，我了解到，自 1962 年起，许良英先生就自发从事爱因斯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而且是在农村极为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其间蒙受了不少打击、欺辱、曲解甚至掠夺，患难中也亲历了可贵的人性和友情。其恩师王淦昌在他最困难的时期，从四川以“王京”的名字按月汇寄他 30 元，鼎力相助。在竺可桢老校长的正义支持下，许先生曾向周恩来总理申诉，其译稿才获出版的权利。文集第一卷终于 197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部发行。第二卷于 1977 年公开发行，第三卷也于 1979 年问世。这部真正的“啼血”之作是当时世界上出版内容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文库，胡耀邦同志在不同场合向人推荐过此书。该书被评为八十年代大学生最喜爱的 10 本书之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许先生真可谓功不可没。

随着《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许良英重返中科院，成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专业从事科学史研究工作。2002 年 5 月，我编辑了父亲的纪念文集《名师严父——纪念钱克仁米寿》一书，寄给许良英先生，不久就收到了许先生的回信，他称我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从此，我俩开始了书信交流。

从 2003 年起，我四处收集祖父及其他浙大著名学者的史料，他来信加以鼓励。信曰：“知道你近年来忙于为令祖父编文集，接触到很多有关学者，掌握到很多史实。你的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令祖父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他在信中介绍了西迁浙大时数学系的一些情况：

你祖父抗战期间在浙大教的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微积分，我进的是理学院物理系，虽然也选数学系为辅系，但无缘听你祖父的课，也没有同你祖父有直接交往机会。但我知道他早年留学英国，学的是工程，回国后教数学。浙大 1928 年设立文理学院后，聘他为数学系主任。以后陈建功在日本获数学博士，你祖父把数学系主任让给他。几年后，陈建功又把系主任让给更年轻的苏步青。你祖父开的这个好头，令人钦佩。你祖父给我印象是淡泊名利，朴实无华，体现了一个真正科学家本色。陈建功也如此。

你信中提到你祖父 1941 年在湄潭纪念周上的演讲《数学的实用价值》，我记忆中无印象。他认为数学的理论与实际相互为用，不可偏废。我非常同意。但当时由苏步青、陈建功占主导的数学系只讲“纯数学”，完全轻视应用。陈建功教的“高等微积分”和“函数论”，苏步青教的“微分几何”，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物理学起过重大作用，可是他们上课时从来不提一句，他们没有兴趣，也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使我在当时就感到遗憾。由于他们看不起数学的应用，我猜想，你祖父在当时的数学系多少是受到歧视的。

在许先生和众多浙大学者的关怀帮助下，我编撰的《一代学人钱宝琮》由浙江大学出版，许先生阅后，非常高兴，热情鼓励我继续从事浙大名人研究。我们的书信开始论及浙大其他名人，尤其是老校长竺可桢先生。我告诉许先生，我对竺可桢的研究，首先

是从拜读许先生和施雅风先生的 1980 年合写的《竺可桢传略》开始的。2010 年 3 月 26 日，由施雅风院士提议，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浙江大学等单位在北京隆重举行了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我应邀出席，并作《竺可桢：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学术发言。我将发言稿交给许先生，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帮我看看，不敢说出“请审阅”之类的话，因为我知道他正忙于撰写专著《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没想到的是，许先生仔细地审阅后，于 4 月 9 日给我来信，指出了拙文中的一些错误与不足。

大作《竺可桢：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粗略读了一遍，觉得有价值。但由于涉及面太广，难免有疏漏和讹误。我已年届 90，时间精力有限，无法深入讨论，只能就事论事。

文章 P.1 第二段[2]，说竺可桢制定“理想”科学家 3 条标准，“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竺可桢毅然走上了自然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道路。”这个推理不合逻辑。做一个理想的科学家，并不一定都要研究科学史。比如 Einstein（爱因斯坦），就不是科学史家，王淦昌先生对科学史无多大兴趣。

许先生认为，科学史的系统研究迄今不过 100 多年的历史。萨顿的“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论断未免失之偏颇，因为他忽视了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各方面的巨大进步，特别是最近一个世纪中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

我接受许先生的意见，对拙稿进行删减，且修正了逻辑错误，最终刊载于秦大河主编的《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 120 周年文集》。

走进许良英

许良英先生居住的中关村 814 号楼地处北京中关村，他的书房正对着中关村大街，24 小时的车水马龙。许先生戏称自己是处于中国最繁忙的闹市之中。他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之平静心态，在书房潜心研究爱因斯坦的学术思想，理性分析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民主启蒙和科学发展历程，写出了大量的科学与民主专著、论文和书信。

我目睹了一位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简朴生活。在许家，你看不到考究一点的家具，高档一点的电器，地上铺的仍是磨光水泥板，一切陈设都已过时，只有书房（兼客厅）相对现代一点。书橱里塞满了各类书籍，墙上悬挂了多幅爱因斯坦的画像，写字桌不大，已摆满了稿纸、书刊、笔、眼镜和放大镜，略显杂乱。这里就是许先生的工作舞台。许先生喜欢爱因斯坦的如下至理名言：“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我想爱因斯坦的上述语录也是许先生思想境界的真实写照。

许先生从不奢侈，但一听说四川汶川地震，当即向灾区人民捐献两个月离休费，合计人民币 10000 元。他同自己终生崇拜的爱因斯坦一样，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将自己的情感完全建立在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之上。在他身上我们真切地感受到，

一个真正知识分子不仅要做好专业工作，而且必须关怀社会，承担社会责任。

我听到许多浙大名人轶事。王淦昌和束星北教授都是许先生的老师，王先生偏重实验，束先生偏重理论。在贵州湄潭，王先生登报将已去桂林工作的许先生召回浙大当物理系助教，并为他和卢鹤绂教授的工资补贴问题与学校兼管总务的体育教授舒鸿发生冲突，还被打了一拳，在家养伤一个星期。束星北先生很会讲课，能让学生很快地领会、掌握基本概念，还能引导学生从一些物理概念中品味出丰富、深邃的哲学内涵。我问许先生，束星北先生是否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许先生说，他和王先生过去一直以为是的。但是后来许先生的学生在美国查阅爱因斯坦档案时，发现了1943年束教授从贵州湄潭寄给爱因斯坦信，第一句话是：“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既然束直到1943年，还无谋面之缘，哪有1928年就当过爱因斯坦助手一事？为此，许先生特别撰文纠正了有关束星北的误传。这种“爱吾师更爱真理”的求真行为值得称颂。

1942年1月，许先生在湄潭以浙大“物理学会”的名义与胡济民、周志成等同学一起发起并筹划了伽利略逝世300周年纪念会。竺可桢特地从遵义赶来作《伽利略在天文学上之贡献》的报告，胡刚复、何增禄、王淦昌、朱正元等教授也有演讲。两位天主教徒教授方豪（还是天主教神父）和程石泉却在会上大放厥词，公然为罗马教廷迫害伽利略辩护，歪曲历史。

我很想了解浙大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许先生说，杂志是由张其昀教授直接向蒋介石讨来的一笔经费而创办的。张是一个卖力的御用文人，并非是浙大的光彩，不宜过于宣传。夫人王来棣先生说张其昀的课教得很好，但对张在地理课上总是将“解放区”称为“共匪区”表示反感。

我对他的浙大科学史研究有了更多的了解。许先生告诉我，浙大教授中对科学史研究贡献最大的，首推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琏，然后是谭其骧、张荫麟和陈立。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或科学），决不是1944年李约瑟首先提出来的。早在1915年任鸿隽就发表过《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35年竺可桢发表过《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许先生于1941年在浙大三年级时就曾与吴作和、张式等组织起“质与能自然科学社”，致力于科学真理和革命真理的启蒙。他们请束星北教授给社员讲《物质与能量》，组织过一场“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学术讨论会，得出的结论是，由于长期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中国不可能出现像欧洲那样的近代科学。许先生还在自己的“社会学”选修课论文中分析了这个问题，当时所参考的科学史文献就是竺可桢、王琏、钱宝琮、李俨等人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1944年7月，陈立教授于《科学与技术》上发表极有价值的长篇论文《我国科学不发达之心理分析》，1945年钱宝琮教授在浙大夏令讲习会上发表《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之原因》。许先生本人又于1945年3月写过一篇《中国科学发展史略》刊于1946年重庆《科学与生活》第3-4期合刊。

我提出要拜读《中国科学发展史略》一文，他便从书柜里取出一个黑色公文皮包，在一旁的夫人王来棣先生说那个公文皮包是他的宝贝，数十年来一直跟随着他。可惜的是，宝贝皮包内没有《科学与生活》杂志和他的旧作。为此，我们还应该想办法帮助许先生找回那篇论文。

我找到了史料钩沉的门径，收获了不少民国时期浙大学生运动的第一手史料。2010年初，我作为浙大校史研究会的特聘研究员参加了学校档案馆组织的《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研究》课题研究。校史研究会也给许良英寄发了该课题组顾问的聘书。我自掏腰包从南京专程去许家拜访，却发现许先生满脸不高兴，对浙大寄他聘书很不以为然，已将它丢入废纸篓，因为他不清楚校方需要他顾问些什么，也不理解为何浙大研究自己的校史，却在研究人员的聘书上限定时限。这不像是做研究，而是在赶作业。为此，他极力劝阻我不要做那个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也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他改变了态度。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难得见到像你这样热心执着的人！如果你真想写学运史，一定要秉笔直书，彰善瘅恶，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他认为，判断历史事实应当以当年的记载为准，早期的回忆比晚期的回忆更为可信。他直言《黎明前的求是儿女》书中有些文章与史实不相符合。因此，编史者和读史者都应本着独立批判的精神，即浙大的“求是”校训去写、去读。他真是一位怀疑一切权威、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人。

许先生没有详细讲述他参与“一二九运动”、“西迁抗战”和“于子三运动”的浙大三大学生运动，只是希望我多查阅史料档案、多访问亲历者、多阅读相关书籍，不要迷信前人所写的校史稿。他还把自己收藏的当年浙大运动领袖施平撰写的《六十春秋风和雨》给了我，并说当年他只是浙大高工一年级的新生，听了施平的演说，就跟着大家活动，还在“驱郭宣言”上签了名……。

当我执笔的学运史稿基本成型后，我再赴北京，征求许先生的意见，并请他回忆浙大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他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却拨通了老校友李晨先生家的电话，安排我去李家采访，使我获得了许多第一手口述史料，使史稿内容更加准确。通过拜访 90 多岁的李晨先生，我也收获了一些祖父钱宝琮的珍贵史料。

经过编写组一年半的奋力拼搏，学运史稿完成了。我便电话询问许先生，很想听听他的评价。然而，他只说收到了，没有细看。又说他一直忙于那本与夫人合作的《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专著，还说夫人早已写完，而他还得抓紧写。

随着自己研究的深入，更多原始史料的发现，我已感觉到学运史稿的不足，内容需要增加，有些错误应该更正。我已渐渐体会到许先生那句“研究历史不是赶作业”的含义。这也许是许先生没有评价我们史稿的原因之一吧！

“不要叫许老，我还年轻，叫良英！”这是 2009 年 1 月我去许家时，许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已是 90 岁的老人，一点不服老，心态还相当年轻，旺盛执着的工作热情令人望其项背。他一生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追求科学的真、善、美，民主的自由与宽容。他说过，竺可桢校长为浙大定下的校训“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在竺可桢时代的浙大前后学习、工作、生活 11 年，深受“求是”学风的熏陶，奠定了严谨、踏实、敢言的人生底色，成为浙大杰出的“求是”传人。

良英先生，您是浙江大学的骄子！我们怀念您！

2013 年 2 月 26 日写于南京银达雅居（求是儿女网）

“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国利

真人天感泣，公民道弘毅。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三点二十五分，一代学术大家，公民典范，中国大陆著名科学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爱因斯坦文集》（一、二、三卷）的主要编译者许良英先生，因脑溢血医治无效，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消息传出，各界悲痛。许良英先生在浙在杭亲友、无数读者和他的敬仰者亦同感悲伤与缅怀。二月二日下午，由杭州浙大校友会、弘毅读书会、走向公民基金会、大同思想网共同主办的追思许良英先生公民阅读沙龙活动，在吴山下的柘木汇举行。杭州柘木汇艺术家居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佳飞先生不仅提供了场地，还热情地为大家服务。许良英先生的亲友、学生代表、浙大校友、弘毅读书会会友、许良英先生著作的读者，还有来自台湾的网友，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

此次追思活动的主持人是许良英先生的侄孙、浙大人文学院外国哲学研究所博士生许晓光老师。许晓光老师的高祖父许振元先生育有四子一女：良其、良舜、良英、良容和若沫。许晓光老师是排行老大的许良其先生之孙，许良英先生就是许晓光老师的三叔公。许晓光老师的父亲许从平先生（临海回浦中学英文教师，已退休）撰有《肩起黑暗的闸门：我的三叔许良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其中写道，良其、良舜、良英、良容兄弟四个曾在他们家高台門西廂樓南端的書房“風翻書樓”里，大家集中自學，打下了国学和求知的基础。许晓光老师告诉大家，他的名字就是三叔公许良英先生给起的，那还是文革末年，“晓光”两字寓意“黑暗年代的曙光”。许晓光老师说三叔公与他父亲情同父子，而他的精神生命也与三叔公紧密相连，是他思想的源泉和精神的支柱！所以，三叔公的离世令他悲痛万分！不过，许晓光老师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不是追悼而是追思，重温一下许良英先生的生平，分享他的思想和精神，大家不必那么沉重，轻松一点。许晓光老师提议，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祭奠仪式：献菊，鞠躬。会友吕逸尘先生建议同时播放肖邦和德沃夏克的音乐。

在执献白菊并鞠躬祭奠仪式之后，许晓光老师给大家播放了从《腾讯網》上下载的介绍许良英先生的视频《大师》。同时，许晓光老师还带来了一些与许良英先生有关的书籍、著作、生平介绍资料以及许晓光老师于一月二十八日当天晚上撰写的纪念文章《做一个正直的人——悼念三叔公许良英先生》。大家认真观看，传阅拜读，对许良英先生在跌宕起伏坎坷不平的一生中，坚守良知，追求学术和真理，倡导科学和民主，大家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¹

在观看了视频《大师》并传阅了相关介绍资料之后，就进入到互动交流环节。主持人许晓光老师先为大家介绍了他们一家与许良英先生之间的亲情交往，以及他本人自小受到三叔公许良英先生的许多关爱与指点²。

¹ 下面删去介绍许良英生平的一大段文字。编者注

² 下面删去一大段文字，详见许晓光：《做一个正直的人——悼念三叔公许良英先生》。编者注

许晓光老师介绍，王淦昌先生是三叔公的恩师，还有陈立先生也对三叔公很关爱。三叔公晚年有一段时间受到监禁，电话被监听，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家人也不能前去探访。陈立先生就认为，许先生像古代的墨子。许晓光老师还提到，他父亲许从平先生曾把书稿³寄到北京，请三叔公作修改校对，三叔公就亲笔修改，仔细校对，每页都留下了他的笔记。三叔公还对他父亲说，党八股的东西全删去，要清除党文化的痕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良英文集》⁴只能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许晓光老师介绍，三叔公许良英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许成钢是著名经济学家，曾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了十七年书，现在香港任教。次子是水利专家，媳妇也是临海的，他们的女儿现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博士。

许晓光老师在他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做一个正直的人，就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一种难能可贵的不依附任何权贵的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让三叔公在生命坎坷的岁月中，始终坚守是非的底线。尤其在八九后冰天雪地的日子里，他的声音是一种温暖的力量。”

在许晓光老师的发言介绍之后，大家就又请许晓光老师的小叔公许良容先生发言。今天许良容先生夫妇和许晓光老师的两个姑姑都来到了追思会现场。许良容先生说，有一次他在许良英先生家住了二十天，许良英先生的家都是书，各个房间都是书。当年，许良英先生的恩师从工资里寄钱给许良英先生，是师生之谊的模范。一九八四年，北京《瞭望》发表了一篇长文，就是讲《爱因斯坦文集》是怎么出来的⁵。

弘毅读书会义工陈平先生发言说，许良英先生在这个时间段去世，让人倍感追思与怀念，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不光能看到晓光，还能看到曙光了。他提议大家发言要理性并按照罗伯特议事法则来进行，每人五分钟，若还要发言可以再进行第二轮。

会友吕逸尘先生发言说，他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也是学物理的（按：北京清华大学研究生），当年他就是读了《爱因斯坦文集》，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可那时他们老师并不推荐这样的书。二零零五年，他专门到北京拜访了许良英先生。他建议大学校长都应该认真读一下《爱因斯坦文集》。他说，江晓原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还会有爱因斯坦的奇迹发生吗？”牛顿，爱因斯坦，他们都是在体制外边，爱因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小职员。从许良英、王淦昌他们，他觉得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特别强，这好像是一个现象？

一位书友女士发言说，她父亲就是许良英先生的学生，是当年许良英建立的中共党支部里的其中的一个。她今天要代几位许良英先生的学生，还有她的弟弟，在此献上他们的哀思。她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品德要比他的才智更重要。另外，她女儿天性喜欢自然科学，她就买来《爱因斯坦文集》和《鲁迅文集》，作为礼物送给她，她也要进浙大，追随许良英先生的足迹。

退休教师关域声先生发言说，今天有许多许良英先生的亲人家属在这里，这是薪火

³ 许从平：《肩住黑暗的闸门——我的三叔许良英》，明镜出版社，2010。编者注

⁴ 《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明镜出版社，2001。编者注

⁵ 胡国华：《绿色的文集》（报告文学），《瞭望》周刊，1984年37期。编者注

相传了，他要表达致敬！他是昨天才得到消息的，此前他还不知道许良英先生，也不知道他的份量。于是，他网上搜看了，有一篇是仲维光先生写的，他研究自由主义，他连戈尔巴乔夫也骂的，他的文章带有一定的贬义。他说到“两头真”，许良英先生也是“两头真”的人。对于“两头真”这群人，如果用好听的话，可以说是伟大，可贵啊！因为这个人群少啊！他跟李慎之通过一次话，上次在杭州图书馆，与李慎明交过锋，李慎明说他研究苏联为什么垮台，说用了九年时间才弄出了这么个成果，他就说他用九分钟就可以驳倒他。他认为，许良英先生是从平地上上来的，学术上，人文传承上，书斋这条路也非常重要，还有一条路，就是现实政治，也重要。网上的五毛很多，他叫他们左奴。现在中青年不知道改造人是重要。许良英先生很有才华，他的基因是上帝给的。但他认为，即使物理学家也不等于每个人人格上都过关，像钱伟长就出卖过朋友。

目前在绿城任职的一位八零后女生发言说，像柳传志、宋卫平他们都是商界的精英，但她心目中仍然无法逾越的人物却是许良英先生这样的人。现在做父母的都讲怎么赚钱，什么利润之类，对民主自由就关注不够，这可能是体制问题。她公司的陈总本科毕业之后就做了许良英先生的研究生，陈总就特别委托她，今天来念一下他写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什么叫社会的良心？什么叫士可杀不可辱？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他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就是一个真人。

工程师萧行发言说，他先要念一下未能前来的谌卫军老师做的一首诗：追思许良英先生——

最恨人间一月天，幽州痛失民主魂；
纸灰化作白蝴蝶，碧血染成红杜鹃。
巨轮起航天已亮，水手挥汗把舵掌；
历史三峡终通过，世界潮流永向前。

萧行说，他个人的感想是，民主很重要，但自由比民主更重要。我们首先要追求言论的自由。今天可能会有特别的人在这里，如果您有枪那您可以抬高一点点；如果您回去汇报那您可以大事化小。刚才说到了为什么物理学家社会责任感特别强，因为他们有理性。此刻，他还想起了网友黄花菜的一首诗，总之，中国不可能例外！

退休工程师、文化热心人士萧利彬先生上台发言道，如果您手里有枪，要对准日寇和沙俄。萧利彬先生表示，许良英先生的家族成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许良英先生的逝世是中国科学和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为此，他特别在这里向许良英先生的亲人家属鞠躬致敬！萧利彬先生说，许良英先生现在到了天堂里，天堂应该没有反右，没有屠杀，从这一点上，他倒要为许良英先生感到庆幸！萧利彬先生说，到了邓公的时候，他也曾经几次打过入党申请报告。当时还抱有些幻想。今天他这里有刚做的两首诗，给大家念一下：

七绝 笑看狂潮席卷至

(一)

古稀之岁忆沧桑，幾度癫狂幾断肠；

闹市穷乡无净土，苍头赤子尽沉汤。

(二)

神州蒙难叹沉沦，九死一生庆幸存；
笑看狂潮席卷至，蝎蟒灭顶见晴雯。

注：狂潮，指中山先生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一位书友先生起立发言道，他的家中就有《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还有《炎黄春秋》。最近，大家在谈王歧山先生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他认为，民主和独裁是不可以同存的。他觉得康德的著作也是值得阅读的。随后，弘毅读书会义工黄花菜和书友王小姐先后起立上台发言。黄花菜说她为许良英先生书信里的话所感动。

书友王小姐说，她对许良英先生的仙逝深深怀念，许先生明灯长存！有许先生这样的乡贤，临海山水增色。她也身为临海人而自豪。她要用临海的市花兰花赞美受迫害时期的许先生：

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

王小姐说，刚才视频中的一个小细节打动了她，就是在许晓光老师包书之后许先生重新再包的举动，一个人格伟大散发光辉的人总是在细微之处发人深省，给人以向上的勇气和动力。有的时候，煤油灯所照亮的光明远比现代化的光照更明亮！内心具有正义、公义的信仰才是最有力量的信仰。我们都应该像许先生那样做一个正直的人，追求真善美。因为我们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呼吸着同一方空气，更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来自山东的民间学人吕国利上台发言说，对许良英先生非常熟悉。他有个收音机是从台湾寄来的，一般从台湾寄来的东西这边都要检查的，但既然能收到，说明时代变了，这会给大家一点点信心了！刚才吕逸尘、萧行都提到物理学家，的确，物理学家他们很严谨，不过呢，其实各行各业都有杰出人才，包括文盲，还有自学成才的，还有，在二十世纪，对中华民族有最大贡献的三个人，中山先生，蒋公，经国先生，一个是学医的，一个是学军事的，一个是学语言的，俄语，中文。吕国利说，他认为，前苏东国家之所以能够很快转型为民主国家，原因就是他们人民有宗教信仰，比如波兰就有发达的宗教。这些年不断有朋友们骂我们老百姓是垃圾人口，其实问题不在老百姓，是中华文化被摧毁了！他非常同意萧利彬老师的看法，今天我们中国大陆，问题的焦点，纠结的所在，就是一个对现代历史的反思问题。

来自台湾、目前从事保险业的林妍曦小姐也上台发言，她说她正是来自宝岛台湾，她今天都落泪了，她很愿意今后多跟大家认识交流。随后，另一位女士发言说，今天的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作家鹤矾上台发言说，她本来是很宅的，她今天与其说被许先生感动，不如说是被大家所感动，尤其是被萧行这个小伙子感动，他无私奉献，无怨无悔。她感觉，今天来的人很少，但圈子很大。许先生爱物理，但他更爱我们的祖国。现在这个党最要命的弱点就是讲假话，学生们睡眠不足，教育在摧残心灵。她个人最佩服的就是巾帼女杰秋瑾。

退休职工姜在鸿先生上台发言说，许良英先生的思想是不朽的！照例今天的追思会应该在广场上的，应该有更多的人参加。姜先生说，他一出生就是亡国奴，到了五十年代，他在浦东上中学，他的许多老师，像音乐老师，都是好人，但都被打成了右派，就因为他们说了真话。到今天，还是无法无天，我们呼吸的是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有害食品，所以，就要问了，一个不能做好人的社会要不要改变？现在说要跟国际接轨，但专制和民主是不能共存的。在台湾，民主是人民和经国先生一起推动的。五十年代作报告，是一个站在台上；六十年代是几个在主席台上；到了现在，主席台上的跟主席台下的差不多了。姜先生他相信，中国（大陆）是一定会走向民主的。

来自湖南的一位书友先生发言说，他是在常德上的高中，后来考上大学，这位书友先生认为，现在的九零后是最干净的，是公民活动的主角。今天，他看介绍许良英先生生平的视频，他很有触动，许良英先生九十岁了，人还是那么有气质，眼光还是那么清澈。求是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发言道，她也是求是人，他觉得，许良英先生是从善如流，他的著作应该在学校里推广，但为什么我们的推荐书目里没有像《爱因斯坦语录》这样的好书呢？小学生是都应该读的，哪怕读一两句。今天出门时，雨忽然停了，冥冥之中上天在照应我们。

最后，启正中学语文教师刘林老师发言说，许良英先生一生都在求真求知，但今天我们的教育是反教育，学生从小就开始学写假话，学得圆滑，虚假，学生写作文不写真话，学生们说，写真的老师会骂的，所以，这个国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俄国的索尔仁尼琴说过，活着但不说谎言。

夜幕降临，持续了近四个小时的追思许良英先生公民阅读沙龙活动结束了，大家互相勉励，坚信许良英先生一生所追求的民主事业一定能在中国大陆实现。

（公民阅读沙龙_新浪博客 2013-02-04）

铮铮铁骨惊千古，涓涓睿思醒万代

——我眼中的许良英老师

李醒民

北京的严冬，连续数天阴霾密布，愁云惨淡。就在这郁郁寡欢的阴冷日子里，突然从友人那里获悉噩耗：许良英先生（1920-5-3~2013-1-28）不幸在海淀医院寿满天年。1月30日下午3时，先生的遗体捐献仪式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遗体捐献中心举行。我手捧一束鲜花，带着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译作《德国的科学》⁶——我觉得这是作为学生的我

⁶ P. 迪昂：《德国的科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11月第1版，274页。

对先生哀思的最好表达方式——敬献在先生身旁。在书的扉页，我写下这样的文辞：“铮铮铁骨惊千古，涓涓睿思醒万代。”我觉得，这两句话最能刻画先生的贡献、思想、精神、品行和人格，用它作为本文的标题最合适不过了。

迄今，相距先生寿终正寝已两月有半。我执笔撰写这些文字，正值清明过后。在这春和景明、万物复苏、东风料峭中日渐暖意融融的日子里，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最易撩动对先生的追思和思念。霎时间，先生谦和的面庞、睿智的形象、科学的精神、狷介的风骨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使人久久难以释怀。现在，应《社会科学论坛》赵虹主编之约，我愿意乘此机会把往昔的记忆碎片拼缀起来，作为对先生的纪念，并表达我的铭感之意和感恩之情。

(一)

我是文革后国家统一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1978年春，于光远领衔，联名查汝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宝恒（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罗劲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何祚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经常被人误叫或戏称为“何炸麻”）联合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我有幸在两百多人的报考者中名列前茅，于是年10月步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后相继改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大学）。⁷于先生职务颇多，当时是大忙人，其他导师是挂名的。于先生未给我们上过课，也没有做过具体的学术指导。他只是每年趁参加会议之便，邀请我们十余位研究生吃一两次饭。在用餐时，他侃侃而谈，议论横生，海阔天空，几乎无所不及。我当时曾经戏言：于先生培养研究生像机械化养鸡。不过，我还是十分感激他在十年动乱之后，给予我们的宝贵学习机会。同时，于先生开放的胸襟、开明的态度、开阔的思想、开朗的性格，也使我们感悟颇深，获益良多。

读研究生的最后一两年，要准备和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当时，自然辩证法教研室赵中立先生经过沟通，让我去找许良英先生指导。因为许先生是学物理学出身，正在从事科学史研究，与我的所学和研究方向不谋而合。就这样，我成为许先生第一位名副其实的研究生，而许先生则是我名副其实的导师——比那些通过正式程序招生，事后却不闻不问、不做指导的研究生和导师实际上要名副其实得多。

记得第一次拜访许先生，是在1980年9月开学不久的一个午后，此时正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是日天朗气清，阳光灿烂，金风飒爽，我怀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走进许先生在友谊宾馆西北区的寓所。许先生1939年就学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该系任教。他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任中共浙江大学和杭州地区的负责人，从事反专制、求自由的政治活动。解放后，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工作，1952年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1956年与于光远共同创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他仗义执言，敢讲真话，结果被无端打为科学院第一右派，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声讨其“罪责”的文章刊登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的显著位置。翌年，他被发落回老家（浙江临海县张家渡村）劳动改造，当了二十年农民。为了不影

⁷ 关于考取研究生的前后经过，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李醒民：《科学的精神与价值》跋，《科学的精神与价值》，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02~519页。

响妻儿，他被迫与妻子在1963年离婚。直到1979年“四人帮”倒台，他返回北京后才复婚，被分配在自然科学史所工作。当时，研究所和他还没有固定居所，他临时在友谊宾馆安身——这里既是他的工作之地，也是他的休憩之处。

首次见面交谈的时间不长，但是许老师的和蔼、耿直、真诚、认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仔细询问了我的有关概况和学习现状，我也如实地畅谈了自己关于学术研究的未来设想和硕士论文的初步打算。最后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以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作为研究对象。在这次会面中，许老师极深研几的学术精神，穷理尽性的学术态度使我深受感染。我正是在这种精神和态度的指引下，从1980年9月正式为撰写毕业论文做准备，加上此前断断续续地查阅，在一年多时间内浏览了五百多种（篇、册）中、英、日、俄文资料，作了六大本读书摘记和四百余张卡片，笔译出五十多万字的资料，于1981年3月写出题为《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及其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的文稿⁸。其后，经过三大反复，六易其稿，十二次集中修改，历时一年整，终于在8月下旬如期完成硕士论文《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⁹。论文答辩于1981年10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进行（此后我被分配到该单位工作，直至2009年退休），并以四优一良（许老师投的“良好”票）全票通过。这篇论文对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进行了新颖的历史描绘和独到的哲学分析，否定了列宁在《唯批》中的基本观点，还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以本来面目，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观点的估价和看法。该文之所以能够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并显示出切实的现实意义，是与许老师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的。关于硕士论文的写作和发表经过，特别是许老师如何具体指导，我已有专文¹⁰描述和评说，此处不拟赘述。

在其后的岁月里，我与许先生一直保持着联系。特别是在1987年分到住房（保福寺906楼114）后，与许老师的住处（黄庄812楼704）只有一箭之地（后来保福寺小区和黄庄小区的楼牌均改为“中关村”），每年都要数次拜会许老师，就各种议题神聊，当然讨论学术问题居多。中关村地区人满为患，拥挤不堪，连个散步的去处也没有，只能到保福寺东区转转。有时散步，居然能够巧遇喜欢散步的许老师，不免要聊几句。自2000年搬家到玉泉路后，与中关村相距甚远，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是，我对许老师的尊敬和情感依然如故，一有机会便前去探望。2004年的一个冬日，在许老师的书房，我们就民主与科学问题讨论许久。事后，我觉得意犹未尽，回家后给许老师写了一封信^[1]，不知何故却没有寄出。2007年11月16日下午，我带领自己的研究生庞晓光、游清徽、李彤宇、孙红霞拜见许老师，想让他们认识一下这位刚毅、睿智的老人。许老师和夫人王来棣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次聚会虽说不上群贤毕至，但无论如何是少长咸集。当时，大

⁸ 该文稿约十余万字，后来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硕士论文。1983年3月，我以该文稿为基础，完成处女作。该著作于同年出版。参见李醒民：《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1984年第2版，iii+3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哲学）2009年第1版，vx+289页。

⁹ 李醒民：《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杨玉圣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哲学卷（中）），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247~1285页。

¹⁰ 李醒民：《在思想解放的漩涡中——我的硕士论文的写作经过和多舛命运》，合肥：《学术界》。2003年第3期，第224~233页；李醒民：《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29~351页。

家相谈甚欢，耄耋之年的许老师依然精神矍铄，显得相当兴奋，老少三代其乐融融。这次见面的日期之所以记得清楚，因为有许老师夫妇与我们的合影为证。2010年3月，在许老师九秩寿辰前夕，我带领学生前往拜寿。我们向他敬献了鲜花，祝他健康长寿。鲐背之年的许老师思维清晰、敏捷，就民主的普世价值和极左思潮指点江山。临别时，不顾我们阻拦，非要送我们到电梯门口。在此后的某个时候，我还和学生拜望过许老师。

以理性精神追求民主与科学，是许先生一生的使命。许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思想亮点主要也围绕这两方面展开，这充分体现在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对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研究上。此外，他的人格和骨气，也是一笔怎么估价也不过分的精神遗产。下面，我想结合与许老师的交往和交流，围绕这几个议题展开论述。

(二)

许老师在青年时代就热爱科学，把科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据说，在读大学期间，他就把“科学至上，物理第一”的话语写在实验室门口，并立志将来做一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但是，历史的诡谲却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史家和科学思想家。

许老师的科学史著作和译作较多。例如，他在1980年代主持编写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¹¹，翻译了数本科学哲学名著¹²。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他的敏锐而深邃的科学思想。在改革开放伊始，他的一篇短论《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¹³发蒙振聩，唤醒了刚刚在迷梦中苏醒的中国学人和学子。他在文中昌言：“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他明确表示：“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科学能使物尽其利，民主能使人尽其能；一个能使物和人人都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必然会有无穷的生命力。因此，可以说，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显然，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要实现现代化，科学和民主是根本，是关键。”此文当时在科学界、思想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遭到一些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极左派的攻击。

作为《自然辩证法通讯》的编辑，我亲眼见证和参与了许老师数篇经典性论文在该刊的发表。《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史观刍议》¹⁴是为祝贺钱临照先生八秩寿辰而作，许老师秉持他一贯信守的爱因斯坦式的理性论，在批判和借鉴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提出了理解科学发展的“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史观——由历史的纬线和理性的经线组成的网络。《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¹⁵针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糊涂观点和错误做法，郑重指出科学不是生产力，科学不等于技术，不能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为科学正名》¹⁶尖锐批判了在否定“五四”的时尚中，借“唯科学主义”贬斥科学的社会思潮，并鞭挞了

¹¹ 李佩珊、许良英编：《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2004年第2版。

¹² 比如，林德赛、马根瑙：《物理学的基础》，许良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版。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许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¹³ 许良英：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第3~6页。

¹⁴ 许良英：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史观刍议——为祝贺钱临照先生八秩寿辰而作，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3期，第43~48页。

¹⁵ 许良英：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1期，第40~46页。

¹⁶ 许良英：为科学正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辨析，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第33~39页。

乱贴“科学”和“科学主义”标签的不良现象。

在1980年代，我有幸与许老师一起参加过数次学术会议，既在思想上获益匪浅，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1982年11月24~30日，在北京香山植物园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物理学史讨论会”，在许老师的推荐下，我在大会上就硕士论文做学术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惊讶和好评。1984年4月22~26日，我们在洛阳参加“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讨论会”。许老师就物理学与哲学的关系等论题发言，无情地批驳了所谓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和“指导”论。他的发言赢得大多数与会者的理解或赞同，但是却遭到何祚庠的激烈反对，争论从会场、饭桌一直持续到火车站月台。会议期间，我们一起观赏洛阳牡丹，游览龙门石窟，拍摄了不少照片。有一张背景为白马寺齐云塔的照片，右边是方福康、郝柏林，左边是许老师、方励之，我不知怎么被随机地夹在中间了。1985年3月25~29日，我们在杭州浙江大学参加“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许老师提交论文《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我提交论文《简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在会议期间，有两件事引人注目：一是方励之对浙江大学学生的讲演引起轰动，使莘莘学子的思想和情绪久久无法平静；二是许老师不慎视网膜脱落，急需回北京治疗。当时，交通还不发达，机票更为紧张。于是，我把机票让给许老师，自己等了两天才坐上火车。回京后，我领着六岁的女儿去东交民巷同仁医院探视许老师，他刚刚接待了正在中国访问的哈佛大学霍尔顿（Gerald Holton）教授夫妇。走出病房，小女对我说：“这个老爷爷很和善的。他是您的老师？”

《爱因斯坦文集》¹⁷（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收录最齐全的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和出版为伟大的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树立了永恒的丰碑，也是许老师一生的闪光点和不朽的思想遗产。这是许老师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在偏僻的乡间农舍“点着煤油灯”，“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完成的巨译。由于许老师的辛勤劳作，爱因斯坦的思想、精神、人格在中国激励和哺育了改革开放中的几代志士仁人。此外，他还就爱因斯坦撰写了数篇论文。正是在许老师的感召下，我也钟情于爱因斯坦思想研究，三十多年来撰写了多篇论文，并有三部著作¹⁸先后问世，还翻译了关于爱因斯坦的一些译文和译著¹⁹。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爱因斯坦文集》是我读的次数最多、写写划划最多的书籍。

（三）

许老师是老共产党员，长期以来一直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毛泽东的忠实信徒。直到他在1974年向商务印书馆交《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稿时，目睹“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闹剧，才幡然悔悟，彻底摆脱了迷信的泥潭。此时，犹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他发现几十年自己经历的一切就像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一样。解放后走马灯似

¹⁷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二、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977、1979年第1版；2011年第2版。

¹⁸ 李醒民：《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版；1997年第2次印刷，iv+253页。李醒民：《人类精神的又一峰巅——爱因斯坦思想探微》，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242页。李醒民：《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4月第1版，xii+5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第1版，ix+498页。

¹⁹ 比如，Q. 内森、H. 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上册）李醒民译，（下册）刘新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

的政治运动，不仅搞得人人自危，而且使中国失去发展的机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引向崩溃边缘，也使千千万万个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得安生²⁰。这一切，其根源盖出于“念念不忘”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87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他对以往信奉的经典理论失去最后一线希望。从此，他以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缜密思考破解中国困境之道，苦苦求索中国的前途和未来。为此，他把研究民主理论和传播民主、自由精神，作为自己后半生的奋斗目标。

早在1981年发表的《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中，许老师就这样写道：“就整个社会来说，最根本的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权利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学术自由的前提。”他一针见血地揭示：“把人民作为被领导者的‘群众路线’或‘民主作风’，原则上是不能代替以人民作为主人的‘民主’的。前者近乎‘为民做主’，后者则是让人民自己做主。中国历史上一些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是有‘为民做主’的传统，但却没有‘民主’的传统。因此，要树立真正的民主思想，必须经历艰苦的努力，首先是要同反民主的封建遗毒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些明锐见解和铿锵言辞掷地有声，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那么振奋人心。

许老师大概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比较系统地钻研民主问题的。1987年2月，我在访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时，该社社长赠送我刚刚出版还未来得及上市的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的《民主的模式》（*Models of Democracy*）一书。我回国后拿去给许老师浏览，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我见状顺水推舟，借花献佛，以成人之美。在此前后，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主的文章，比如《为“自由”正名》、《驳民主缓行论》、《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等等。在这里，很有必要提及许老师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前夕专门撰写的重要纪念文章《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这篇论文是他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本来作为重头论文拟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发表（同期还有王来棣先生的短稿《五四民主启蒙运动再认识》），无奈在即将付印之时因那场风波而不得不撤下。

晚年，他和夫人王来棣合作，致力于撰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此时，他的左眼视力只有0.01，右眼视力也仅仅0.1，只有借助放大镜，才能勉强辨认和书写。就这样，他们夫妇“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终于基本实现了心中的夙愿——许老师和夫人可以在九泉之下安息了！

每次拜访许老师，在交谈中不免涉及民主的理论问题和在中国的实践。许老师对发源于西方文明的民主精髓有深透的理解。他将其概括为：（1）确认人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权利，即人权。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任何权贵（无论是个人或是寡头集团）的臣民或驯服工具。（2）确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通过“多数决定”原则进行统治。但在任何情况下，处于少数地位的公民依然享有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得被侵犯和剥夺。（3）这种统治只能通过公民的自由赞同来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强迫的和非法的手段。由此，通过定期的公民自由竞争和选举，少数派可能成为多数派，多数派也可能成为少数派；一切取决于选民的意愿。（4）任何政府官吏和人民代表都是人民的公仆，始终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政府首脑和人民代表都由公民选

²⁰ 许老师亲口告诉我，在文革中，连自己的孩子也写大字报和大标语，要“砸烂许良英的狗头”。

举产生，并直接向选民负责；发现有不称职的，可以随时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罢免。

要实行民主，必须以如下各项的保证为条件：（1）公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公民可以公开地发表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对领导人的批评，而不会受到迫害和报复。（终止以言论或文字治罪的历史，废止新闻、出版的检查制度。）（2）严格实行法治，废止任何形式的人治。（终止人治和以权代法的历史。）（3）实行权力制衡，防止绝对权力的出现。（杜绝专制独裁的可能性。）（4）严禁军队干预政治，军队只听命于政府首脑。（杜绝军事政变的可能性，终止军国主义和军政府的历史。）

以上八点是民主的要义，缺一不可。²¹

许老师还针对中国的现实，在批评一些广为流行的错误看法时阐明自己的观点。我根据他的诸多论著和访谈，以及我们师生以往的思想交流，把他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民主、自由、人权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无缘，但是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历史已经证明，民主是最合乎普遍人性的政治制度；民主运动不是造反运动，不是为了改朝换代，不需要自封的“领袖”与职业革命家，也不需要任何地下密谋组织；多数决定不等于民主，它只是实行民主的一种手段；争取和实现民主必须采取民主方法，即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方法，反对暴力，反对不负责任的盲动；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以法治为基础，民主不仅不是造成动乱的根源，而且是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不能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中产阶级身上，而要依靠一批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具有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杜绝腐败，必须让权力处在监督之下，特别是舆论监督，彻底改变舆论一律的传统，让公民充分享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实行阳光政治；以各种借口为幌子的“民主缓行论”是错误的，摒弃“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民主”之类的混乱概念；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最终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必将是漫长而曲折的，需要韧性和远见，不可急于求成，不妨从最基础的思想启蒙开始，而启蒙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之蒙。

许老师对民主的追求并不仅仅停留在口上和文字里，而且尽可能的付诸行动和实践。他起草了诸多公开信、呼吁书，身体力行他主张和倡导的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为此，他经常招致一些麻烦，行动有时也备受限制。我几次拜访他时，都被守在大楼门口乃至家门口的相关人员盘查，登记备案后方可进入。

（四）

在《爱因斯坦》一书中，我在论述爱因斯坦独立的人格、仁爱的人性、高洁的人品后这样写道：“爱因斯坦的人格、人性和人品像他的科学理论和哲学思想一样，也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无价的精神财富。爱因斯坦的形象高峻魁伟，常使人有‘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之叹；爱因斯坦的形象又平易近人，亦使人有‘水性能淡为吾友，竹解虚心即我师’之感。爱因斯坦的深奥思想并不是人人都能完全理解和深入领悟的，但他的高风亮节却是人人都可诚心学习和刻意仿效的。我们有理由确信，爱因斯坦的品德力量

²¹ 许良英：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纽约：《探索》杂志终刊号，1993年8月。见许良英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947c7b70100u9n6.html。这八条早先出现在被撤下的论文《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一文中。

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在世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开花结果，21世纪的人类世界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这样的话完全适合于终生以爱因斯坦为楷模的许良英老师。无怪乎霍尔顿称“他既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又是一位充满勇气的公民，更是一个堪称为典范的人。”

受浙大“求是”传统熏陶，受爱因斯坦思想（比如“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的影响，许老师的最大特点是敢于求真理、讲真话、做真人，对真善美孜孜以求，对假恶丑嫉恶如仇；他总是正气凛然，对于原则性的问题总是直抒己见，毫无保留，言简意赅，深中肯綮；他一贯直行事，对于错误现象，他总是毫不留情地批评，不做老好人，不做乡愿。谭嗣同在《仁学》中慨叹：“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中国的许多事情就坏在滥用职权、腐败堕落的大盗身上，也坏在是非不分、胆小怕事、明哲保身、熙熙攘攘的乡愿身上！不用说，许老师还有其他许多优秀品质值得我敬仰和学习。从我与许老师交往中的几件小事，也许可以尝鼎一脔、窥豹一斑，亦足见其人格、人性和人品之大略。

1983年5月，在常州参加《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编委会会议后，我带着在当地购买的一些土特产看望许老师。尽管这是学生的一点心意，也值不了几个钱，但是许老师执意不收礼物，态度十分坚决，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我虽然感到有点不自在，觉得他好像“不近人情”，但还是为他的举动折服。从此，我去许老师家，总是两手空空，有时只带自己新出版的著作和译著。后来，我招收了自己的研究生，我约法三章：不许研究生送礼，不在研究生文章上署名，也不让研究生在老师文章上署名。

在与许老师讨论问题或神聊时，他不免对一些人和事加以臧否。我记得，他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理批判和恣意玷污爱因斯坦的事件和卖力的学人特别反感（如纪树立等人），耿耿于怀。我宽慰他说：这主要是时代的错误。许老师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当事人也有自己的问题，当时并不是人人都一哄而上批判爱因斯坦的；况且，事后总该多少有所反省，公开承认错误吧。有人以为许老师对人苛刻，其实他的“苛刻”主要是对事而不是对人，他对那些知错必改、知错即改的人向来是宽宏大量的。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某些错误，许老师本人就持有这样的态度——这使我深受感动。在硕士论文中，我引用了爱因斯坦“自述”里的一句话：“这就好像地基从下面给挖掉了，无论在什么地方也看不到能够进行建筑的坚实基础了。”²²许老师看到后，发觉《爱因斯坦文集》中的译文不准确，几次向我表示再版时更正。还有一次，我在研读英文文献时，我发现“自述”开头的一句译文（“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这是使我自己从……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与原文出入很大（应该是：“我很清楚，这样失去了的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是使我自己从……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或“我很清楚，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就这样失去了，而宗教天堂则是我自己从……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尝试。”），随即告诉许老师。他信誓旦旦：“不可能有错！”再次见面时，我拿来原文，他看后坦率地说：“译文错了。这是李宝恒翻译的，我审读过，责任在我。”在《爱

²² P. A. Schilpp, *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 Tudor Cpany, New York, 1949, p. 45. 在《爱因斯坦文集》第1版中，译文是：“这就像一个人脚下的土地都被抽掉了，使他看不到哪里有可以立足的巩固基地。”

因斯坦文集》第2版中，错误已经得到纠正。但是，“自述”还有几处小错误没有改动——也许是他对我的建议（“不能比较的”应译为“不可通约的”；“外部的证实”和“内在的完备”应译为“外部的确认”和“内在的完美”；“物理学是从概念上掌握实在的一种努力，至于实在是否被观察，则被认为是无关的”应译为“物理学是运用概念把握实在的一种尝试，尽管实在被认为是独立于它正在被观察的。”）²³未听清楚或未予重视。

许老师无论思考问题、讲解看法，还是撰写文章，始终思路清晰、观点鲜明、条理清楚、文字简洁，使人明白易懂，直入堂奥，探骊得珠。真可谓“文如其人”！2010年3月给许老师祝寿时，我的研究生问其原因。许老师回答：“我是学科学的。科学家总是设法把复杂的问题加以简化，把深奥的事理讲得明明白白。”我十分赞同许老师的看法，对有些学人故弄玄虚、故作高深、使人如堕五里雾中的做派和文风向来非常反感。也许是受此启发，我后来专门写了一篇针砭时弊的短文——《莫把晦涩当高深》²⁴。

刚刚送别许老师，京城普降瑞雪，多日的阴霾烟消云散。满眼玉树琼枝，西山银装素裹，江山好像也为许老师哀，亦为许老师娇。触景生情，浮想联翩，遂成小诗一首（“挽许良英老师”，2013年2月1日）。我愿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敬献许老师，以表达学生发自内心的仰慕和感念：

突闻噩耗阴霾重，送君一程素雪琼。
科学报国生前志，民主救世歿后情。
铮铮铁骨震大地，涓涓睿思烁苍穹。
仁智静动一身备，高山景行代代宗。

（原载石家庄：《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6期，第131~140、144页。发表时编者有所删节）

注释 -----

[1] 现在，我把这封信命名为“发往天国的信函——一封未及寄出的给许良英老师的信”，附录在这里。

许老师：您好？代问王老师好。

看了您赠送的大作《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一文，很受教益。您在耄耋之年，还和王老师在为中国的民主和前途不断地思考和求索，写出了思想深邃、感情真挚的文章，令人钦敬不已。尤其是，你的缜密思想是建立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的，因而使人心服口服——这是学术与思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精神力量，是任何其他物质力量无法战胜的。

文中有两处的背景您可能不完全了解，现在略做说明。

一、李慎之先生在2003年3月28日给您的信中说，“从一个刊物上读到一篇介绍爱因斯坦自由思想的文章”，我猜想，它也许是我在《科技导报》2003年第3期第22~24页（3月10日出版）发表的《爱因斯坦：自由人为“自由上帝”效劳》一文。该文原是拙作《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1998年4月出版，您手头有这本书）一书“第十章 自由的民主主义”中的一个小节（第331~340页），在我撰写八年之后才得以在中国内地面世。不知我的猜想是否是事实？

二、李慎之先生在给您的第三封回信中说：“民主问题已有十来个青年人‘着意研究’，而科学精神问题，一个也没有。”这句话表明，他对科学界和科学哲学界的情况并不了解。起码，我对科学精神就做过长期的研究。在我先后送给您的三本文集《科学的精神与价值》（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纵一苇之所如》（广西师范大

²³ 李醒民：要依据第一手文献立论——从爱因斯坦的“自述”的几处译文谈起，合肥：《学术界》，2005年第2期，第156~161页。

²⁴ 李醒民：莫把晦涩当高深，上海：《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10日，第5版。

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中,有数十篇论文和文章论及科学精神以及民主问题。在2002年2月发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研究二十年〉一文(收入《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第11~26页),叙述了我的研究经历和思想概要。

李慎之先生敢讲真话,仅此一点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就很了不起,就值得有社会责任感和科学良心的人的敬重,何况他还提出了许多震撼人心和发人深省的思想。但是,依我管见和短见,李慎之先生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对所论及的有关问题,似乎并没有做过学术研究,至少是没有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因此才屡屡出现您指出的事实失实和观点乖舛。

我在1999年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学术和思想犹如鸟之两翼和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学术的思想是瘸子——站立不稳,没有思想的学术是瞎子——毫无眼力。”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多年来一直是立足于学术研究阐发思想的,为中国的学术进步和思想启蒙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对19和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批判学派代表人物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人——爱因斯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两极和多极张力论,哲人科学家,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等课题的研究,都或多或少起了某些作用。这样做乍看起来“远水不解近渴”,但却一步一个脚印,比较实在一些。我想沿着既定的路子继续走下去。

以上看法,不知妥否?

李醒民

2004-11-26

呼唤民主自由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仲维光

一九九二年,许良英以一篇《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震动了海内外。海外学人惊异,在如此专制的情况下,许良英竟然如此大胆。事实上许良英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一直以直言著称。

许良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代物理史高级研究员。他从青年时代开始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时期,他积极地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斗争。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他由于敢于直言,因此不断遭到整肃。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屈服。很长时间内,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作了大量的翻译和介绍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工作,并且在八十年代和方励之一起成为坚持独立思想,提倡科学启蒙,批评各种反民主思潮的知识分子著名人物之一。许良英和东欧许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人性 and 良知的驱使下,从一个共产党人变成了反对极权专制、呼吁民主人权的独立知识分子。

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时期

一九二零年五月三日许良英出生于浙江临海县张家渡。一九三五年初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一九三八年许良英以同等学力身份考取了浙大物理系。那时大学是导师制。许良英选择了王淦昌作为导师。许良英后来自己谈到,在大学期间他的世界观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他在课余时间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刚入学时,他的志愿是作一个“当代物理

学权威”，二年级时变成追求革命的真理，否定了科学救国的理想，认为只有通过革命，彻底改变社会结构，才能发展科学。这时候他立志要作一个“职业革命家”。到了四年级时他希望能作一个“真正的人”。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在浙大发起了“质与能自然科学社”探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开展革命活动。在为进步学生的秘密刊物《笔谈》写的《试论感情与理智》一文中他指出，“感情与理智在最根本、最崇高的领域中是统一的，这也意味着真正的革命家、严肃的科学家和纯正的宗教家三者的灵魂在某些方面是统一的。”文中，他把感情与理智在高级阶段的结合定义为理性。后来他与斯宾诺莎的理性论思想产生强烈的共鸣。他曾经多次说过，在那段时间里他确立了持续至今的人生观。

一九四二年大学毕业后，他到桂林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但是没有找到。一九四四年桂林沦陷，许良英只身流浪到黔桂边界山区的榕江。一九四五年二月他连续步行了二十多天回到设在湄潭的浙大物理系。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政权，许良英一直在浙大物理系作助教。

抗战胜利后浙大开始迁回杭州。许良英取道重庆，沿着长江回到杭州。一九四六年九月他在重庆加入了共产党。此后，他全力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物理系助教只是一个作掩护的公开身份。一九四七年担任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到一九四九年前夕许良英又担任了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学区委书记和大专区委书记，负责大中学学生运动。

从共产党高层干部到“右派分子”

共产党在杭州接管政权后，许良英调离浙江大学，担任杭州市青年委员会学生部长。一九五二年许良英从浙江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科学通报》室副主任，并兼任编译局、计划局以及学术秘书处党支部书记，负责对外宣传。他的任务是审查科学院出版物的政治观点、立场和保密问题。全院几十种学术刊物最后都必须经他签字才能付印。一九五五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许良英因为一个由他介绍入党的人成了胡风分子而受到牵连，被批判、停职审查一年。他因此下决心不再做行政工作。经他要求，于一九五六年调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当时于光远担任组长），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负责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成为共产党中国第一个专职自然哲学高级研究人员。

一九五七年夏天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人民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许良英感到欢欣鼓舞。这一年五到八月间他写了《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成为了解中国科技政策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书中许良英对双百方针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指名批评了曾经受毛泽东宠爱的共产党正统派理论权威艾思奇所重复的李森科的“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观点。他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苏联的“科学中的党性原则”，他指出“自从历史上有了科学，科学研究中确实逐渐形成了一些原则。例如：一切要以事实为根据，在真理面前任何人都一律平等，要求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在逻辑上的正确性，等等，这些原则对于任何真正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是一样要遵守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自此大鸣大放运动变成了反对

右派的政治斗争。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许良英说，“我思想不通，认为这会使共产党失信于人民，很可能是有人反对毛主席路线，于是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共产党员和志士仁人自居，公开反对这一运动。当我得知反右运动是毛主席自己事先布置的，鸣放为的是引蛇出洞，我才发现自己错了。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七三年我对毛主席都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了。”在反右斗争中许良英成为科学院的第一个被批判对象，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他被定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回到浙江原籍。受到这一打击，他妻子怀孕十个月的胎儿夭折于腹中。后来他们离了婚。

在浙江乡下，他和普通农民一样下地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亲。他和母亲都成了专政对象。三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饥饿时，他像许多农民一样因吃糠而患浮肿，严重时连走路都喘。

艰难的农村生活与思想转变

许良英曾谈到他一生中三个转折点。第一个是在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一年，他确立了献身社会、献身革命的人生观。这一次是第二个转折点。尽管被遭打击欺骗，他在思想上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变化主要是在社会和生活环境上。在这一期间他认为有三方面收获：第一，知道了中国大多数人民怎样生活，第二，通读了三十九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大部分列宁全集，使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发言权，第三，编辑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这些为他的第三次转变，思想信念的转变准备了基础。

一九六四年许良英译出爱因斯坦文集五十多万字，但是由于“四清运动”和其它的政治原因，出版被耽搁了下来。期间他又完成了一篇九万字的编译后记，一九六五年由此扩充成十七万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一书。与此同时他又完成了两万五千字的《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一文。六二到六五年间在农村的艰苦生活中，许良英常常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没有节假日。他后来回忆道，“这工作本身是我最大的精神享受，我常常为他（指爱因斯坦）发聋振聩的言词感动得流泪。”

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许良英又被迫恢复了全天劳动，不久又被审查、批斗和监禁。六八年五月到六九年四月涉及到浙江大学地下党问题他被审查批斗，并曾被隔离（实际上是关进私牢）达六个月之久。六九年五月回到故乡后，在全地区万人批斗大会前，他不甘受辱，喝“敌敌畏”（一种农药），自杀未遂。

一九七一年商务印书馆恢复业务，许良英去信询问是否可以出版《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请他将书稿寄去。他写信到上海联系，才得知译稿以及《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一书手稿已经在一九六九年被上海写作组强行“借走”。译稿拒不归还，而书稿则宣称丢失了。他又致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声言如不归还将诉诸法律。直到次年三月他才得到被涂改的翻译稿。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决定补充和修改原稿。为加速编辑工作，商务印书馆雇佣许良英作为临时工，每月五十元人民币生活费（七七年该书出版时又从稿费中扣除）。一九七四年政治形势恶化，许良英又被遣返原籍并且停发生活费。直到七五年政治风向稍有转变，商务印书馆才又请他回来工作，并且恢复了

他的生活费。文集第二卷于该年九月交稿。

一九七四年以后的时期许良英开始了他的第三个转折。一九七四年他看到了“批林批孔”运动的真相，觉醒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骗局。一九七六年四月他在北京又经历了四五天安门事件。七六年底许良英因多年积劳成疾，生病入院。一九七七年春天，他在商务印书馆结识了方励之，并邀请方励之参加他组织的一个小型“爱因斯坦读书报告会”。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最后阶段他还结识了刘宾雁（刘当时也在商务印书馆作临时工）。这两人后来都和许良英成了好朋友。

平反后：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不懈的奋斗

一九七七年许良英写报告给科学院党委希望回到科学院工作，一九七八年三月经当时科学院院长方毅批转给国务院政工组批准才得到解决。两个月后他结束了二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来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一九七九年，许良英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许多人对此万分感激，但是，许良英却拒绝这样做，他在不同场合公开明确表示，“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作错了就要改。”

一九七八年他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工作恢复了，又和离婚的妻子复了婚。这一年他开始了新的工作、和同事一起编写《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

一九七九年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他倡议召开纪念大会，并为大会主讲人周培源起草了报告。报告经《人民日报》摘要发表，其中论及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的一段话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活跃于西单民主墙《四五论坛》的一些青年对西方民主理论所知并不多，对此马上引用，并就此发表了长文。这段话是：“他（指爱因斯坦）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论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结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使个人的权力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经历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摧残之后，我们痛切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一九八零年在胡耀邦的倡导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成员请科学家给他们开设“科学技术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的讲稿主要是由许良英起草的，文章中他着重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一九八一年二月许良英发表了《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一文，文中对上述命题作了更充分的论述，并在大陆第一个批评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认为它还是要做民的主，而民主制是人民做主。

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五年中，许良英通过文章和会议公开宣扬民主，批评专制，在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列入重点整肃对象。只是由于这一运动的早夭，他才得以过关。尽管如此，其后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他仍不避风险不断地指名批评这次政治运动和它的发起人胡乔木和邓力群。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和方励之一起成为科学院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间许良英和他的学生在大陆发起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讨论。一九八八年他著文《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直接批评当局的科技政策。期间他多次公开批评马列主义，批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和“四个现代化”等口号。

一九八六年许良英与方励之和刘宾雁联合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这是第一次由私人发起主办、涉及大量知名人士的非官方的自由讨论会。许良英显示了他的勇气，会议的联系地址就在他家。当年著名右派钱伟长得到邀请后立即告发到中共中央，会议因此流产。在其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许良英虽然未被开除出党，但被迫退休。由于深感民主理论和思想启蒙的重要，退休后，许良英和妻子合作准备撰写一本关于民主理论和历史的书。一九八九年初许良英起草并发起了科学教育界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言论自由，呼吁释放政治犯。在他的努力下公开信征集了四十二名知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签名，其中半数以上是共产党员，有许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七人）和政协（八人）委员。这封公开信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后来八九民运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与此同时，许良英又撰写了几篇文章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其中《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曾在五月的天安门广场上反复广播。“六四”后该文被中宣部理论局定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的代表作。许良英本人被指为是仅次于方励之的八九民运的黑手。六四以后，他虽未被逮捕，但至今未被准许进行党员登记，第二次被开除出党已势所难免。。

许良英专业从事科学史和科学思想研究。在广泛掌握当代科学历史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他对爱因斯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在大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注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卷《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这些译著严肃认真，为中国人打开了认识西方学术思想的窗户。与此同时，许良英还发表了许多对学术界有积极影响的研究科学史理论和科学哲学的文章。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在他的这种理论研究上，还显示出不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局限性。

许良英一生真诚地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他公开发表了许多观点鲜明措辞尖锐的文章，推崇自由民主思想，针砭时政，例如对“社会主义民主”、对“新权威主义”的批评。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许良英代表了大陆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观点。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许良英先生治学严谨。他早年从老师王淦昌先生，学习并继承了独立思想和严肃认真的学风，并且以此训练和要求他的学生和年轻人。在大陆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和粗制滥造的风气下，对严肃的学术研究许良英是个很好的范例。

许良英早年加入共产党，并且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然而他和那些以接近共产党领导人为荣的所谓改革派知识分子却截然不同。由于敢于直言，他不断遭受打击，尽管如此他却一直保持着不屈的批评精神。他始终如一的道德追求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鼓舞。

2013年02月02日（Lycos-Tripod-Multiman...道客巴巴）

哭许良英先生

仲维光

许先生待我“恩重如山”！

东望神州，仰对苍天，抚今追昔，先生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如何想象，如何接受，这世上就再也没了先生！

在我的生命中，我的亲友中，有不多的人影响了我的生活。许先生是我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痕迹的少数的几个人之一。他对我的器重与关心也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所以尽管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年中因为不能够容忍我的经验主义立场，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妥协、不留情的批评，而和我断绝了联系，但是对我的关心却从来不曾，也不会断绝。对此，我深信不疑。

最早知道许良英先生应该是一九六八年，那一年他的长子，许成钢，在革命激情和理想的支配下主动去了东北建设兵团，这引起了我的关切。我是一个晚熟的人。虽然比许成钢大两三岁，可是却一直充满孩子的玩心。虽然从六六年四月干部子弟的怪异刺激了我，而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六八年我却都是凭着直觉，凭着对生活的一些问题的正义冲动及兴趣参加的。虽然先天那种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使我参与很多，但是对未来和人生的规划却从来没有过。直到六八年春天，如许成钢这些同一派的朋友“先知先觉”地走上了“充满未来大志”的人生之路，我才开始积极认真地思考自己的未来。

我之所以走向今天的这条道路除了六八年当时的气氛，也就是我从文化大革命的挫折感到社会和自己的未来问题的所谓的严重性：连毛泽东都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走资派还在走是个永远要警惕并且威胁我们的题目。或许我自己应该对未来有所承担。而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承担应该说和清华附中及包括许成钢在内的很多朋友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我是一个不服输，英雄主义气质很强烈的人。从来觉得有抱负是自己责无旁贷的特征。我喜欢鲜明，而厌恶“温吞水”。当时在我们这个群体最早走向这条路的就是许成钢们，还有我那时的朋友陈淮子等人。所以大约六八年夏天我开始越来越自觉地走向现在这条道路。

一九六八年我听说许良英先生，是作为许成钢的背景。只知道许良英是他的父亲，一位大知识分子。“不凡”的许成钢给他写去绝交信，还画了一把手枪，要他彻底接受改造。而对许成钢的“支边”他却是非常支持。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决心走上这条革命之路，到农村去。我的这条路是革命和传统的混合体。革命豪情的同时还混杂着传统的有志者要在年轻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铭言。我是独子，不愿意蹲在父母身旁，而希望先飞出去历练几年。六九年初我拒绝了分配在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作而在四月到东北白城插队。

第二次再听到许先生的名字的时候，许成钢已经成了“反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不敢和我们联系，回北京也是悄悄的。但是到了七二年后，他希望得到帮助，而那个时候我已经彻底完成了思想的反叛，有条不紊地开始自己的追求。我对于社会的禁锢及这个社会的名誉地位已经不屑一顾，经常会有很多出乎周围人想象的主意和出格的行为。所以许成钢在成为反革命后再次和我联系，并且希望得到帮助。

第二次听到许先生的名字也已经和许先生的个人内容相联系。这次我知道他在农村，但是还在坚持翻译等学术工作，对国家未来非常关心，非常关心并且支持许成钢。

大约在七四年，社会的形势起伏变幻，邓小平复出，批林批孔。我那时对此已经毫不关心。因为我已经彻底看清共产党，用邓小平的话说黑猫白猫共产党都是猫。当时我嘲笑那些关心这些的朋友们，“新地主，老地主，都是地主。”绰号“乌鸦”的朋友则嘲笑我的这句名言说，“这是什么话，莫名其妙。”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知道邓小平主导反右，并且五六年对于匈牙利事件主张坚决镇压，所以我对邓小平从来没有好感，包括七十年代后他的复出和推行所谓改革政策时，我从来没说过他一句好话。那是一个真正杀人不眨眼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

二

一九七五年，许良英先生到北京商务印书馆做临时工编选他的《爱因斯坦文集》。许成钢对我说他父亲担忧国家的前途，很希望能认识一些有志气有思想的年轻人，准备从事一些艰苦的工作，他向许先生推荐了我。那时我身患严重肝炎在家养病，转氨酶五六百以上近一年。尽管如此，我去了商务印书馆，和许先生谈了一下午。

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屋子中的绳子上晾着几件许先生自己洗好的衬衫，许先生穿着也很简单，是个不修边幅和随便的人，一切都很简单。现在回想，那年许先生其实才五十四岁。可脸上已经布满沧桑。

我和许先生的谈话极为激烈，直率但是愉快。我们是两代人，两个世界的人。我谈到我的经历。由于六六年到六八年跟着毛泽东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让我非常痛心，为此我认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出了问题，而专心于认识论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所以最终导致它成为一门专制学说，成为极权主义的革命理论。要说清马克思主义就要弄清楚认识论问题。为此我除了自学哲学外，还在自学数学、物理。对此许先生给予坚决的否定和反对，他认为政治是政治，专制政治和认识论无关。

那次见面我以自己的经历也对他那一代人提出质问，你们读过爱因斯坦等人的作品，为什么会跟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

这些问题都和我六九年后的读书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在我们这群文革的中学生中流传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一个人二十岁的时候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血性，一个人三十岁如果还信仰马克思主义那是他没有思想”。与此同

时，我也在书中读到，当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年轻一代起来问老一代，你们当时干什么去了。

一九七五年我和许先生见面谈的很多问题都溶有那几年读书的痕迹。

概述那一次我们的争论：第一，我明确地推崇经验主义，他坚持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我对共产党是彻底否定的，是吉拉斯的观点，只有彻底抛弃。他则认为毛泽东是暴政，但是认为共产党能够改变，支持邓小平一派。第三，我痛恨四九年后的知识分子，针对那种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却依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我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启蒙，而非反左。启蒙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共产党需要抛弃，而非启蒙、改良。

从那次开始，在其后几年我们的多次对话中，我的中心问题就是，你们这代人读过那么多西方思想家、科学家的著作，为什么会和我们这代人一样，如此愚昧地跟着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此外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上根本是错误的，所以决定了它的教条性、专制性。由于许先生毫不讳言地坚持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对这个观点尤为愤怒。他一直对我坚持强调认识论问题表示坚决的排斥和愤怒。

我记得在我之后，我清华附中的朋友戴建中也去见了。在言谈中戴建中对列宁极不恭敬，这使得许先生对他十分反感。其实我比戴建中的观点更为激烈彻底，但是大约我谈的是思想，所以并没有引起许先生那么强烈的反感。

第一次见面以后，由于形势变化，他又回到浙江，而我则一直陷于重病之中。再听到许先生消息的时候已经粉粹了四人帮，他回到了北京。我不时从许成钢处听到他的消息，如他非常看重一个叫做 CTY 的学生，这位 CTY 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是因为发生了《红与黑》式的事件，被称为于连式的利用了 N 业部副部长的女儿而未被录取。由于那个时候我早已经反叛出这个社会及其精神知识领域，所以我对 CTY 这些人从心底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我确信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够提出问题的人，一定不会还在马克思主义的笼子中。

这种思想让我敌视中国四九年以后的知识界，我声称绝对不买一本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我甚至误以为，四九年后的知识界的情况是四九年以前的延续，因此中国知识界是肤浅的。当然这种思想也是因为我当时无法读到更多的四九年以前的著述，前人的探索研究，也读不到当代海外如余英时先生等人的文章。那十年我能读的只有些许的翻译的内部读物，以及能够找到的各种古典作品。我不过是依靠搜遍这少许书籍的角落，拼命吸吮其中的营养长大的。

这种思想第一次受到撞击是八四年读了洪谦先生的“论时间与空间”。他那种把握概念，阐述问题的能力，让我感到惊讶，在中国居然有和艾耶尔、罗素一样级别的思想人物。后来读了陈寅恪我才看到，原来中国曾经有过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认识齐如山则是更后的事情。

三

许先生返回北京，住在东厂胡同的时候，我和许先生见面不多，而且匆匆。及至他们搬到海淀黄庄新建的教授楼的时候，再去他那儿就有了一个变化。此前我都是找他儿

子许成钢，可那时候逐渐变成每次到他家主要是和他谈。我们这些年轻人已经都是他的客人，无形中，许成钢已经退到了次位。这个变化是耐人寻味的，是人格魅力。我想所有因许成钢而拜访过中关村八一二楼七〇四的他的同学回忆过去，都会发现有类似的体会。

当然我和许先生的争论并没有因为那几年的社会变化和他的变化而减少、减弱。一九八一年夏天的一次见面，我和他之间再次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我记不清楚具体的争论细节，但是在那次争论中，我们都动了情绪。他的激烈的态度和言辞致使王来棣伯母在偶尔旁听的时候，不断地在旁边低声说，太不象话了，太不象话了。

如以往一样，我们之间的那次争论涉及的仍然是根本的经验论者们曾经提出的哲学问题、启蒙思想问题，它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因为我几乎只能在一个答案上选择，要么我全错了，也就是从七零年后走向的路根本是错误的，要么是许先生在基本的哲学概念上错了。

我痛苦至极，因为我的哲学是自学的，并且根本没有老师可找，可问。我无法通过第三者判断自己。而所有一切又是根本性的。大约经过两三周的痛苦彷徨，我只好问我太太，还学文，她当时已经在北大哲学系读过三年，也看了不少哲学书，我说，现在是我抉择的时候，人生最重要的抉择的时候，因为是根本性的分歧，因为涉及未来，我可以转向，你抛开个人情结判断一下，是我对还是他对。还学文经过考虑后说，你是对的，他在基本哲学问题上的理解是错误的。于是我才走过这个问题，从此决定继续坚持自己的方向，而不再和他进行争论。这同时也让我对于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哲学框架，对西方哲学的曲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

七十年代初期后，因为思想的反叛，当然也有马克思式的狂妄的革命情怀，以及经历过六十年代彻底的封闭社会后的无知的井底观天的自大，我对中国知识界极为蔑视，谁也看不上，认为已经没人能够当我的导师了。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九八二年初夏，许成钢突然问我，你是否愿意报考我父亲的研究生，如果你愿意报考，他就争取明年招考一名研究生。你如果不愿意，他就不计划了。因为他已经有四名学生，一个导师一般只能够招收四名，他可以以这四名学生并不都是科学史所的学生，而是和别人合招的为理由，申请明年再招考一名。

这不仅让我大为惊讶，而且极为感动，因为许先生知道我们的分歧，知道我对共产党及其知识界的看法。如果能够进入科学院学习和研究，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因为很多条件都是我在中学当老师所无法比的，我当然愿意。经过一番周折，我所在的中学，北京二十九中居然同意了我报考。在报名后，许先生就拒绝再见我。我再见到许先生的时候是在复试考场上。

我的报考如我一生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我原来的计划是在哲学史和外语考试上超过别的考生，拿分，理论物理不丢分。但是不料评完卷后，恰好相反，理论物理我得分最高，外语居然五十九分不及格。总成绩我是第三。我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十几年刻苦自学哲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甚至读了中文译本后，因为听译者、我的亦师亦友

的忘年交朋友马元德先生说，罗素的英文可当作教科书范本阅读，而又逐字逐句阅读了英文原本。我根本不相信同代人中有比我对于哲学史把握更好的。外语不及格对于我来说更是难以想象。有朋友提示我说是否判卷、计分有误，是否可以请许先生要求招考办公室复查卷子。但是我的确心存疑虑，怎么会万里难挑一的事情又让我碰上？

事实上在我犹豫的时候，许先生已经在得知结果后坚持绝不复查卷子。他并且说仲维光有自学和研究能力，分数不够就不必上了，不需要复查卷子。然而，事情到这种地步，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自然科学史所负责招考的朱兵女士在考场注意到我，她看到结果后坚持要复查卷子，并且说，这个专业很少能招收到有能力的人，我在考场看到了这个考生，今年就是不招也要复查卷子。在她的坚持下，所里重新开封复核了卷子。结果真的是我的卷子判错了，被计算错了分数。外语甚至扣了我两次六分的整洁分。哲学史则由于我的答卷没有完全按照考试的规范，而回答了整整十二张八开纸，阐述对六位哲学家的思想和我的看法，在重新传看后认为分数给低了。与此同时，那一年科学院下达了通知，所有的研究生录取都要进行复试，一个名额要有三人复试。就这样我在曲折中通过了第一关。

在复试中，笔试和口试我的成绩是那两个人的分数总和的两倍多。这个成绩引起所里人的惊异。为此，许先生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们，这个学生是我挑来的，早就认识。有人立即提醒他，你不怕别人说你营私舞弊？许先生则因为他做得正，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中伤，他连想都没想过。

在这件事情上，许先生让我看到他是个公私分明，原则清楚的人。我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件，不知道自己碰到类似的情况是否能够做到。身教胜于言教，这将永远是我做人的一面镜子。在我命运的路上当然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朱兵女士，她对我有知遇之恩。

五

我在许先生那里做了三年学生，那个时候几乎我们每两周就在他家里有一次读书会。除了专业外也交流一些社会思想动态，个人感受。

三年后的毕业答辩上，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我答辩会上，许先生介绍学生的时候，首先就说，这个学生很特殊，我没有进行过任何指导，这篇论文是我所带的学生的论文中写得最好的一篇。

这让我非常震动。没有一个导师是如此介绍自己的学生的。许先生的这个介绍让我知道什么是谦虚做人。

为此，我从来没有提起过许先生的这段评语，因为我知道前辈的坦荡，后辈更应谨慎做人，这不是自嘲的资本。我当然更知道，其实我在许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我所以能够进入爱因斯坦研究，写出这篇论文，完全是许先生引导和影响的结果。因为我本来是由于关心启蒙和社会思想问题而走向科学哲学、物理哲学问题，而非专门的物理思想史研究。所以对于物理学思想史的文献和专业研究的了解，我都是做了许先生的学生，到了科学史所才入门的。他的书架上的书，以及他对那些书的了解都让我更直接地

进入了这个领域，而不必再在黑暗中摸索。我对于爱因斯坦文献的了解更完全是直接得益于许先生的工作。

在毕业后我翻译了瓦伦坦的《爱因斯坦传》，那是一本最好的文学性的爱因斯坦传记。由于从八十年代初进入物理史领域，至今我都在收集每一本有关爱因斯坦的新出版的传记及思想研究，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第二个作者能够写出瓦伦坦这样思想清晰、文采飞扬的传记。我能够直接选择这本传记翻译，让中文世界有幸在法文、英文、德文本之后能够读到，却不是我阅读了很多传记后的选择，而是直接来自许先生的推荐。

这本传记的水平远远高于《居里夫人传》，应该是青少年和关心思想的读者案头必备的图书，而它的印刷量没有能够迅速扩大，其中也有我的疏忽。

在许先生那里做学生的三年，以及后来到所里工作，我和许先生的交往是愉快的。因为那时我基本上不再和他争论哲学问题，而只是专注于爱因斯坦和物理学史问题。在对于科学史和科学家的研究中，尤其是对于近代科学家思想的探究精神的推崇和认识上，我们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许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研究科学史切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就是用自己的思想度测科学家。他推崇爱因斯坦纪念普朗克六十岁生日的文章，而我也非常喜欢爱因斯坦在这篇文章中对于科学家，对人的追求的看法。

六

现在回想一个非常现象，这其实很能够说明我和许良英先生的关系。

许良英先生所在的那个知识群体，其实都是围绕原来在中宣部工作的于光远形成的，其中包括范岱年、何祚庥、赵中立、查汝强、侯德鹏、陈步、何成钧、梁存秀，乃至外围的戈革等人。这些人都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从事意识形态宣传，自然辩证法大批判专业的骨干。我在许先生那里做学生的时候，许先生的其他学生由于许先生的关系也经常往来于范岱年、赵中立、何成钧、李佩珊和梁存秀们周围。但是我却除了因为党外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戈革先生对于古典文学的爱好，而引起共鸣去他的家中多一些外，和其他那些人几乎没有来往。五、六年期间只因为送稿各去过一次何成钧家和赵中立家，而对于住在许先生旁边一个楼的范岱年，我不但从来没去过他家，没有过任何私人交往，而且甚至碰面都没有正面对视过。

我和他们没有任何交往是不奇怪的，因为我在七零年反叛后，就对共产党文人十分厌恶，更遑论这些《一九八四》老大哥手下能干而积极的宣传工作者。我是个异类，他们比我更清楚。但是奇怪的是，第一，那么长的时间，并且如此彻底，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第二就是，许先生能主动招我为学生，而我能和在他们之中也可说是非常典型的，具有同样经历和思想的许良英先生交往如此密切，这就不仅令人奇怪，而且让人深思。

与此同时，我性格中天生喜好交友，重视江湖义气，然而在许良英先生那里作学生的几年中，我和他的其他学生的往来也是如此，和他们中的任何人也没有成为真正的朋友。因为无论世界观、人生观，处事态度和思想，我们之间的差距都太远了。经历了七

零年的反叛后，我和这些同学，几乎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我的热情并没有换来传统中固有的友情。所以一切都染有这个特殊的时代的特点。

这个回忆对比让我看到，能够超越思想和政治的是感情和性格的交流，我和许先生在深处有很多能够相通的东西，否则无法解释。

七

我在自然科学史所工作的时候，对那个社会早已经看穿，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很少去所里，从不参加任何会议，不介入所里的任何事情。所里几乎没人认识我。但是八七年，在一次会议后，和我一个研究室的阎康年先生在我们一同步行回所里去的路上突然对我提到两件事情，并且警告我。

第一件事是，在我批判查汝强的自然辩证法引起的争论中，由于《哲学研究》杂志等封锁我的文章，我给《哲学研究》编辑部的退稿信的回信（见我的文章《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另外一件事是，许先生在所里讨论继任所长人选时，他推荐董光壁先生的时候说，“我的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学生说，在当前四九年后这一代知识分子中，中国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方励之，半个是董光壁。”为此，阎康年警告我说，你这么做和这么说，还不想在所里呆下去，是否还想提职称，分房子？我坦率告诉他，走向这条路，我就已经仔细想了，一不想提职称，二不想分房子，只想能把问题说清楚。

在我离开中国后的第三个月，所里定职称的时候，阎康年们果然立即出手打击我。许先生来信告诉了我这个情况，他说“本来定助理研究员，权在研究室，所职称评定委员会（1983-87年我是副主任）只是听一下汇报，备个案，不进行讨论。想不到今年评定你时，听说戴念祖转述阎康年攻击你的意见，说你自高自大，看不起老专家，陈美东就要大家表决。结果是5:4被否决了。估计投反对票的有：陈美东、……、戴念祖、……、……。投赞成票的：董光壁、潘承湘、席泽宗（已不当所长了）、华觉民（副所长）。”

有意思的是，投赞成票的都是老专家，而投反对票的都是党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精英”。我其实也从来对席泽宗和华觉民先生的学问是很佩服的，而戴念祖们，虽然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是由于我从六七年到七三年常在社科院大院看他的大字报，所以后来他的文字我怎么也看不下去。为此他打击我，我并不放在心上。

这件事对我毫无影响，它反而再次告诉我必须努力，你面前是一座大厦，你必须更加强有力，否则就会被压倒。许先生知道我没有受影响，在信中说，“定职问题，不仅没有挫伤你的锐气，反而激励了你，这使我非常高兴。有志者事竟成，相信你是会成功的。人生最可贵的，是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我自己也是靠着它生活过来的。我们所现在完全由‘文革’时的一个帮派控制着，今年提职称，充分暴露了。”

同样一件事，一句话，在阎康年们看来是如此，在许先生看来却另是一样，这就是做人的差别，对我的思想和为人认识的差别。

八

一九八八年初，我知道自己再在国内呆着，要么接受他们的各种封锁和压制，要么如果还想出国看看，就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思索再三决定出国。在和许先生告别的时候，我非常难过，不知道何时，甚至是否可能再回到所里和他一起工作。未来的路如何也是未知的，因为我去的是一个我毫无语言知识的国度，而我已经将近四十岁了。分手的时候许先生送我到楼下大门口，再三告诫我：你有研究能力，要集中在研究工作上，千万不要读博士，不要浪费时间。

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听到这样的告诫，第一次六九年底，刘升泰，一位神秘的、短暂相识后迅速消失的朋友，他告诫我，生命如同一场马拉松赛跑，要耐得寂寞、耐得贫穷，跑到最后才是胜利，才能够做出大成就。之后他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期，送别广西大学历史教授黄现璠先生回广西。他是中国第一位壮族历史教授，三十年代留日的历史博士。在火车站，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千万不要看重学位，学位是虚的，重要的是你的著述和工作。如果你没有像样的著述和工作，最后一切学位都是自欺欺人。

这是第三次，许先生的这个告诫我不但理解，而且更深知这个对人生的看法，和阎康年那些人的人生观的根本不同。这不是一个混社会的人生观，而是一个鼓励追求、创造的人生观。他鼓励我追求的是踏踏实实地能够立得住贡献，而非个人的名利享受。对此我深知，无论有多少名利都如浮云，都是假的，而能够为历史和人类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一些推进，才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培养支持你的师友的东西。我当然也深知，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许先生这样对我说也是对我的信任，对我能力和品质的肯定。

九

离开中国到达德国，我关门学习了一年的德语。我的目标是阅读，因为我知道我的工作领域是中文世界，我不但要在思想上有所推进，而且在中文文字上也要确立自己的追求和风格，为此，我坎坷的努力和有限的生命只能够允许我集中精力于中文，但是德文的阅读对于我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它能够为我打开一扇窗子，一个新的天地。

离开中国到达德国很快我也决定，不能够因为还要回国而在能够发声的时候，该说的时候不出声，因为我是在国内被封锁而发不出声音才被迫出来的。如果出来不说，回去也发不出声音，那一辈子的就会永远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我离开中国到达德国半年后，也就第二年二月，我申请了访问台湾，六月爆发了六四事件。十二月我作为第一批欧洲学人访问了台湾。我做了该做的，讲了能讲的，所以两年后使馆首先吊销了我太太的护照，直到离开中国五年后，九四年我才第一次回国探亲。到家后母亲告诉我，在我无法回国的时候，许先生给她打过几次电话，问候安慰她，并且对她说，你能有这样一个人子应该感到骄傲。

许先生的电话对于我母亲来说当然是一种言语无法表达的安慰和支持，甚至可以说，在九十年代的十年中，许先生的话对于独自生活中的我的母亲，在精神上起了难以言说的作用。说它支持我母亲走过了九十年代，能够独自活到八十四岁也毫不为过。而许先生对我的肯定也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许先生的电话当然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先生对于学生的呵护，对此我永世铭记。

十

一九九六年年初，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因为九四年我和德国汉学教授马汉茂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和意见分歧而分手，失业在家。那个时候国内恰好准备翻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许先生就在那个编辑委员会上推荐了我，并且强调说懂得德语的人参加翻译的重要性。但是国内的另外一位先生，戈革先生，由于对许先生的长期不满，在这个会上利用梁存秀等几位自然辩证法专家们对我的不满，以我的文体是“精英体”，而提出反对。最后在许先生的坚持下，他们居然提出我说的话，就必须先试译。

散了会，许先生立即写信告诉了我会上的情况。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就在我收到许先生的信的同时也收到戈革先生的信。他在信上对这次会上的事情只字未提，直接对我说，他正在上海主持一套物理学家传记翻译丛书，其中海森堡的传记，他希望全权交给我在德国选题并且翻译。这立即激怒了我。联想到在我八八年离开中国前，许先生委托我和梁存秀联系编辑一本批评查汝强的自然辩证法文集，在我和梁存秀先生联系的时候，他对我的文章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但是当我离开中国后他立即把我的文章从文集中撤除，于是我立即告知许先生戈革先生的这封来信，并且公开给戈革写了同寄梁存秀先生的回信。与此同时作为备忘录，我写了《我依然拒绝低头进入那个知识界》一文。

许先生收到信后极为震惊，回信要我不要公开，说这对谁都不好。由于信和文章邮寄给许先生后我就去美国开会，返回德国获知母亲重病，于是就立即返回北京探亲，所以只回信告知许先生信收到，我马上回京看望母亲。

回到北京前两天我当然都是在医院陪母亲度过。我准备从医院回家后立即去看望许先生，不想第二天许先生就打来电话，问我文章是否发表了。我跟许先生说，我写的是备忘录，不会不通知他就发表，如果发表我一定会事前和他商量。

那一年春天在北京的日子是我最后在许先生身边的日子。我还是如以前一样基本上每一两周去他那里一次。我们还是如以往，有讨论，有争论。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我从德国辗转托人带回国很多德国民众和学生对于六四受难者的捐款，基本上都是通过许先生转给那些需要的人。

十一

二零零一年，在浙江的一个出版社的许先生的侄孙许晓光联系买下了《爱因斯坦语录》的版权，许先生立即推荐我来翻译。我和还学文认真地翻译了这本书，不仅从英文原本，而且对照了德文本，及另外一些爱因斯坦文章的德文原文。在翻译中我惊异地发现，爱因斯坦德文的叙述方式，翻译成英文后，很多地方竟然在语气上做了巨大的改变，

如间接陈述方式改为直接陈述。这让我再次深深地感到，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必须看他原来所使用的文字语言。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

在翻译中德文本的粗疏和错误，乃至偏见是我始料未及的，它让我感到，许先生对于爱因斯坦生平及文献的把握的功力。这在西方学者中也是不多见的。

在译后记中我记述了这些感受，同时提到中国孔子以来留下的良好的知识传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然而这引起了许先生的反感，他对传统是彻底否定的。为此对我说，如果我的译后记保持这段话，他就要在书后加上批判我的文章。看了他的信，我知道我们观点的分歧非一日之事，只能求同存异，回避不同。因此我请他删改我的文章，我看后再决定是否接受。许先生删改了我的译后记，我看了，觉得只是有些话没说，而无强加给我的观点，所以爽快地同意了。

许先生是了解我的固执性格的，对于我同意修改，他甚至感到十分意外。

《爱因斯坦语录》的出版，记下了许先生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我一生从对马克思主义反思开始，走入专心于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启蒙思想研究，由于许先生的关心和帮助，我才进入有关爱因斯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在爱因斯坦研究上，虽然由于命运没有给予我更多的时间，但是已经勾画出了一个轮廓。到今天为止，我一共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爱因斯坦科学思想研究。我完成了一篇爱因斯坦量子思想研究的八万多字的文章。文章的前半部分四万多字已经作为硕士论文发表，后半部分则一直封存在家中。本来我计划在这个研究后，再做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研究，并且同时进入爱因斯坦与宗教、爱因斯坦与文学及艺术的研究，如此最后完成一个较为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研究。但是，可惜后面两大部分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再继续做下去。

第二，翻译出版了一本迄今为止应该说最好的爱因斯坦文学性的传记，瓦伦坦的《爱因斯坦传》。如前所述，这本书完全是在许先生对爱因斯坦传记的了解推荐下选题的。选择翻译这本书，可以说完全是许先生的推荐引导。

第三，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语录》。这本语录在有关爱因斯坦的出版物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们的这个译本，我相信在中文世界中也有它的一定位置。因为我们的译本是考订了英文和德文本翻译的。而这本语录的翻译和出版也是在许先生的呵护下完成的。

实际上这三方面的工作已经为我的爱因斯坦研究和介绍形成了一个基本轮廓，这个轮廓显示出了一个开阔的未来，只是可惜由于生活颠簸、艰难，而没有能够更好地开拓完成这方面的工作。作为许先生的学生和受益者，留下了我人生的遗憾。

十二

二零零三年，在纪念李慎之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感到在很多问题上我应该做出较为彻底清楚的论述。所以在顺手发表了我和许先生的一封通信后，又写了第二篇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学思想问题》。然而，就是这两篇文章造成了许先生和我的彻底决裂。

因为在对于二十世纪的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上，我们的看法相距太远了，所以我当然知道，只要我坚持并且继续发展，这个思想上的彻底分手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个分手的方式却是让人痛苦的。

我在许先生那里经历了很多戏剧性的事情：

第一，他不顾我野蛮的思想、反叛的个性、孱弱的身体，而主动招我为学生。这一点说明他是过人的，是他的同道，范岱年、戈革所望尘莫及的。他以自己的性格超越了时代、世俗的界限，对此，许先生对我来说，无论我如何自信、如何自负，我都必须承认，许先生对我恩重如山。

第二，在许先生那里，尽管双方都知道思想分歧很大，但是我却还是感到自如，而和其他那些老师，尽管没有过思想交流接触，却依然格格不入。这本身就说明很多问题。性格上的、思想的、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根本的知识倾向上的，我们都不相同。

在做人的气质上，我有很多和许先生相通的地方，所以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被别人利用，扩大了我们之间思想的距离。

痛恨平庸，大约是我与许先生相通的一点。

我一生中能够容忍平庸的人，却不能够容忍把平庸当作才能，在需要才能的地方用平庸来滥竽充数的举动。这就是我和一些人无法成为朋友，走近的原因。

因为我自己常常孤独地走在艰苦的人生途中，而这就使得许先生这些前辈的嘱托和鼓励对我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傅雷在他所翻译的《贝多芬传》前言中写道，“在人生的奋斗中，有很多时候你需要伏在伟人的精神上休憩，对于奋斗的后辈来说，同样有很多时候在人生的艰难中需要前辈的搀扶和鼓励。有的时候言语不多，但却是在你坚持度过人生中很多艰难险关，甚至越过深渊时起到了看不到的关键作用”。在这点上，许先生对我恩重如山。

十三

然而，我和许良英先生的关系，最终没有能够战胜时代和社会留给我们的那些思想和精神的荆棘，没有能够超越它，而没有演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可这就是这个黑暗的时代、这个极权主义的实在留给我们人类的一幕。

作为师生，我和许先生的关系也打上了这个荒谬的时代、黑暗的时代深刻的烙印。

按照我骨子里的传统，我们中国人的师生关系，“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师道既尊，学风自善。”（康有为《政论集·在浙之演说》）

然而，这是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时代，我虽然极力想叛离它、逃脱它，可终究没有办到。我和许先生的关系，和一切亲友的关系莫不如此。现在我们常说，共产党文化扭曲了一切、癌变了一切人类的关系，我们的师生关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和爱因斯坦同时代的另外一位大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非常喜爱一句话：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我和许先生都研究思想史，在思想史上我们也既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我们用我们的行为为同代人，为下代人研究这个时代思想的纠葛，思想的歧路、弯路，思想的对抗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蓝本。同时我们也为研究人性与时代及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分析案例。

生在共产党社会，对于一个敏感的人，一个在思想上，知识上有着正常追求的人，一个有正常的良知的人是痛苦的，他不可能自得、自安于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每当回顾以往，我的内心中都充满痛苦：回顾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青年时走过的路，回顾我和许先生的关系，无不留下黑暗年代坎坷曲折的痕迹，被扭曲的社会带来的误导、自欺，无可奈何的无谓的生命浪费。

本来我们可以更对得起生命，做一些对个人、家庭，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事情。可中国，在经历了我的老师这一代，我这一代之后，为后代留下的是破碎污染的山河，堕落的道德，无序的社会和家庭关系，败坏的学风……无论为文字，为学术，为文化，为道德，为现实，我们都没有像祖辈那样为人世留下翔实的、真正有价值的贡献。

我们留下的是反抗，留下的是在黑暗中的挣扎，留下的是极权主义、嗜权的人，癌变一个社会的痕迹，而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所参与的，或者由于我们努力不够，抗争不够而没能够让人们警惕它，阻止它！

这是最沉痛的经验教训，在一个黑暗年代，我们唯有痛苦，很少有可以引以为骄傲的回忆……。

许先生去了，人生的事，让你五味交集，肝胆俱裂，不知身在何处……。

(2013-02-28 17:45:41)

桃李无言报春暖

——悼念导师许良英先生

屈傲诚

2月2日下午，在办公室知道许良英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时，耳中嗡的一声响，就象被电击。心里很乱，根本无心工作。一连几天，都是半夜醒来，辗转难眠。许多往事，在记忆里复苏。导师许良英先生对我的教诲，指导，和关怀，奔涌在心头。

1980年，我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物理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个专业是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联合招生的，导师有三位：王福山先生，许良英先生，倪光炯先生。在报考之前，我对三位先生了解不多，入校之后才有较深了解。王福山先生于1929年至1940年间，在德国师从海森伯学习物理，是海森伯唯一的中国学

生。归国后，一直在上海教书，曾担任复旦物理系系主任多年，德高望重。倪光炯先生是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的主任，又是全国模范教师，照片挂到市中心人民广场的宣传栏里。许良英先生虽然在北京，他的爱因斯坦文集的工作以及如投枪匕首的政论文章，深深影响到文革后的复旦园，是科学哲学界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

在我入校时，复旦大学文革后入校的几个 1978 级哲学系研究生，就已经到北京拜访求教过许良英先生。我记得周义澄在复旦研究生报上，发表了对许良英先生的专访文章。读了那篇专访，知道许先生在 1949 年之前，就是共产党浙江大学的负责人的经历。周义澄本科是学新闻的，那篇专访写得挺好，宣传了许先生思想，介绍了许先生的经历。但是，后来听说许先生十分不满，批评了此文²⁵。说实话，我当时不理解，感到许先生脾气有些怪。人家明明是好心好意扩大他的影响，却无端挨了说落。

我们那届物理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有三个名额。结果只招了两个人。一个是 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王自华，一个是来自山东的 1977 级大学生的我。本来，还准备招一人，是复旦大学毕业的老大学生，但是，因为英语成绩达不到教育部规定的及格标准，而未能进校。三个导师，两个学生。王自华分到了王福山先生名下。倪光炯先生因科研教学与行政事务繁重，暂不带物理学史的研究生。我就分到许良英先生名下。

物理学史研究生的教学安排与管理，是理论物理教研室理论力学的主讲金尚年老师具体负责的。金老师是浙江人，1950 年代初，曾在许良英领导的杭州青委会学生部工作，是许先生的老部下，对许先生了解甚多，讲过不少有关许先生的故事。我因而知道，许先生担任杭州青委会学生部部长时，曾与担任工作部部长的乔石共事，但两人相处不睦。我还知道，共产党地下党出身的许先生性格刚烈，言辞犀利，从不逢迎上级，又反对溜须拍马。金老师称他从来都是全姓全名，许良英同志，从未用过先生，教授，老师的称谓。

1981 年春，许先生到复旦讲学，当然，他的另一目的是考察我这个学生和探讨论文事宜。我和金尚年老师具体安排他的访问事宜。那时，上海的出租车很少，也很难叫到。乘飞机到上海的旅客，大都先乘民航的班车由虹桥机场到市区的民航售票处，然后再转乘公交。我和金尚年老师到市区的民航售票处去接他，第一次见到许先生。他头发已有些花白，瘦削的面孔，戴副眼镜，满脸笑容，让人感到决不是一个性格暴烈的人。事先，王福山先生告诉我上海出租车公司一个专门为人民代表服务的电话号码，我以王先生的名义叫到了一部出租车，还记得从延安路到复旦是二十多元人民币。

一路上，只有许先生，我，以及司机三人。金老师回市区家里，没再返回复旦。许先生兴致很高，谈话很多。早些时候，哲学系的朱亚宗同学告诉过我，许先生的浙江口音即使对南方人来说，也很难听懂。后来，又听到不少人也都有相同的看法。但是，对我来说似乎不是问题。从我和许先生见第一面起，我就从没有一句话听不懂，而我的话，他也从没有误解过一句，这也许是师生缘分。

经金老师的努力和我的奔波，许先生被安排住进复旦的贵宾招待所。那时，尽管经

²⁵ 见本书周义澄：《卓越的科学思想家和当代民主先锋》，编者注。

过了文革，学者并不受特别重视，仍然是按行政级别接待的。许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就是行政13级，属于国内高干。文革后平反，还是13级待遇。我去找复旦的接待处长时，她有意成全批准，把我告诉她的十三级说成了十二级。她说的是上海话，我也没有改正她，反正，许先生住进当时条件还算可以的招待所。

到招待所时，早已过了午饭时间，一位厨师专门为许先生烧了面条。我正要告辞，许先生拉住了我说，学生食堂也没饭了，就在这里吃罢。让厨师多烧了一碗面。第一次见面，老师就请我吃了一碗面，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不算什么，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可是个吃饭要交粮票的年代！

饭后，没谈几句话，许先生就单刀直入，直接问我如何评价毛泽东。我一下语塞，窘在那里。那时，我对毛泽东是有自己的看法，尽管不系统，也决不是中央文件的调门。面对老师，我不能讲假话。但是，要我说实话，我也不敢。尽管，我知道许先生思想解放，追求民主，首次见面，我还是不敢把只有关起门在家里才能讲的话讲出来。许先生看我为难，就把话题转了。其实，在以后的几天中，我们还是谈到过很多话题。像他那样超高智慧的人，是非常容易就能洞察一个年轻人的真实思想的。

许先生在复旦作了两次讲演。一次是晚上在阶梯大教室，人数很多。我已记不清是谁主持的，但有一点记忆清晰，那就是肯定没有复旦大学的行政领导人参加。许先生讲演时，学校和系里的几个行政领导就在窗外的黑影里徘徊，我还和其中一人打了招呼。但是，他们就是不进去。我理解，他们是怕政治上担风险。另一次讲演是在哲学系，与陈珪如等先生作了学术讨论。

与大多数复旦的行政领导对许先生的回避态度相反，来自原浙江大学的教授们对许先生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欢迎。在许先生住的招待所里，我亲眼看到谷超豪先生，夏道行先生十分客气地拜望这位浙江大学的老领导，许先生也特意拜访了苏步青校长。许先生离开复旦那天，苏步青校长正好要到市里开会，学校安排他的车子顺便送一下许先生，苏校长十分乐意。因为我要送许先生上火车，因此也带上了我。车上，苏校长和许先生相谈甚欢，看得出苏校长对许先生十分器重。那也是我唯一一次与苏步青校长的近距离接触。

在复旦，许先生商定了我的论文选题，考查文化革命期间批判爱因斯坦的运动。这是许先生酝酿多时，极具冲动，要全力去作的题目。正好收了我这样一个学生，又正好是在文革中原上海理科批判组的老巢—复旦大学，这些都是揭示那段历史的有利条件。我们也认识到论文题目的政治风险。尽管，那时多数人都在表面上否定文革，但是，角度与背景却大相径庭。不少人只是因为文革中的失势，而反对文革，骨子里仍是封建统治的一套。当时，要在实质上批判文革是十分困难的。而作这样的题目，肯定要牵扯到文革中的不少人物，是一些人的忌讳。对此，我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我也有自己的顾虑。原理科批评组中的一些人，仍然是我在复旦的老师。其实，他们并不是像报纸上清查文章描写的那样丑恶。我不想用清查文革的笔调写这个论文。再一个，是顾虑能否被学术界接受。虽然，我没有给许先生明说我的顾虑，这些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在复旦的第一次见面时，许先生还问到我的家庭情况。我告诉他，我祖父在 1922 年就是美国美以美教会（American Methodist Church）主办的山东泰安萃英中学教师。后来，因为战乱，又辗转多地教书。1957 年在河南商丘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到乡下劳改。我父母是医生，也是基督教徒。1957 年，母亲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父亲因为坚持读圣经，而拒绝参加毛选天天读，被打断了肋骨。许先生闻之，感叹歔嘘不已。后来，我假期回河南家里，知道许先生给我祖父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其中说到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为作论文，我在许先生的指导与帮助下，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上海，北京等地，到学校，研究所，出版社，以至中南海，我访问了数量众多的当事人和文革中及文革后的风云人物。有学校的老师，有科学院的学者，也有政治家和普通百姓，林林总总，涵盖八方。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已经去世，有些却成了当今中国的名人。在考察调研中，我给自己定位，我不是官方的文革清查帮办，我是在作学术研究与纪录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同时，我尊重访问对象的人格。在资料收集集中，特别要提到一点，复旦大学对此课题是非常支持的。经金尚年老师联系，复旦大学领导同意我阅读文革期间理科批判组文章的讨论稿，内部铅印稿等资料。我的这些调研材料，有些引用在我的硕士论文里，有些没有引用。在论文完成之后，所有资料都留在许先生家里。近些年，有人看到了价值。数年之前，许先生曾告知我，有人要借阅和使用那些资料，到他家里去了几个人查找整理。许先生告诉他们，这批资料的收集者是我。以后，这些资料的去处就不得而知了。

在许先生几个研究生中，他唯一在我的论文上签上了作者的名字。先生光明磊落，要替我肩起政治与学术的压力。实际上，对我来说，先生完完全全应该著名的。如果没有先生的名字，我就是欺骗历史。首先，先生的选题和立意，对我的论文起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他，是不会有我的论文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决没有胆识，自己选一个这样的题目作。再者，他亲自改写了多处段落。尤其是结论部分，改写较多。在我们的讨论中，许先生给我讲过，是他，在文革后首先提出了“封建法西斯统治”的说法，他的这个说法也写进我们的文章中。在拜访周培源先生时，许先生与我一起前往。我清楚地记得，在北太平庄周培源先生住所，许先生慷慨激昂地说，“我已经六十岁，就是死了，也不算短寿！”多年以来，那篇论文，被人攻击，遭人非议。但许先生从未退缩半分，所有责难，都有他顶下，没有让我这个学生为这篇论文受到过委屈。

我的论文答辩，是在 1983 年 8 月在北京科学史研究所举行的。答辩委员会由周培源先生，钱临照先生，许良英先生，方励之先生，刘辽先生，戈革先生组成。除周培源先生因事未到，其他先生都悉数出席。那天，气温高达 38 度，会议室既没有空调，又没有电扇。几位先生情绪激愤，争相发言，以至拖过预定时间还意犹未尽，论文获全票通过。

在答辩那天，还有一个不愉快的插曲。答辩前，业务处一位工农兵学员毕业的干部，根本不通知许先生，就派了车，要接研究所的一个领导段伯宇，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说是要平衡许先生的观点。许先生知道后，非常生气，制止了司机，未能发车。后来，我

知道段伯宇曾是研究所的书记，是个老革命。那时，热闹一时的电视剧“敌营十八年”就是讲的他的故事。研究所里，只有他比许先生资格老，并与许先生发生过争论。后来听说，研究所里有人对那个敌营十八年的故事，很不以为然。我想，即使段伯宇书记参加我的答辩，又能怎样，也不至于否定历史吧。答辩之后，我亲眼看到，业务处的人用黑墨汁将方励之等人的评议书涂得一塌糊涂。黑墨汁一时干不了，又点起火来烤。这些文件，在科学院应该都能查到。

我的毕业论文，也提交给复旦大学物理系和王福山，倪光炯，金尚年老师。他们看后，给予很高评价。倪光炯先生还意味深长地说，“可以接受。”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指，曾参与原理科组写作的老师可以接受。

1983年，硕士毕业后，在许先生的推荐下，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现代史研究室工作。与许先生的师生关系之外，又多了一层同事关系。从1983年到1988年我出国学习，五年之间，许先生一如既往，品行上对我教育垂范，学术上对我指导帮助，事业上对我关心爱护。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回忆，值得我记录。

在国外学习期间，许先生仍然关心我的学习和研究。他在1989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有关）文革批 Einstein 的论文竟使 Reich 教授如此感动，十分令人欣慰。研究生院用英文讲科学史的 Dugan 教授最近同王德禄合作搞一个为期3年的研究项目（主要是关于五十年代回国留学生的遭遇）。她说，她在中国这么多年读到的最有价值的科学史论文，就是你这一篇。”1990年代初，许先生提出，我的博士论文可继续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作下去。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他的建议没有被我的美国导师采用。即使这样，许先生仍然尽最大努力帮助我在国内查找我的新论文题目的有关资料，包括转交我汇出的书款，又托研究所赴美开会的苏荣誉转寄书籍。现在想想，这些事情，多应该是学生为先生作的，而他作为老师却为学生作了。行笔至此，深有感恩之情。

在 Ph.D 学习结束时，我尽力想在美国找到一个教职。连续三年，顶风冒雪赶着参加了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去找工作，结果是一无所获。为家庭生计，我又在一个社区大学，读起 computer science，作为养家糊口的技能。在1990年代，有着一个两个高学位，再去读计算机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其中甘苦，许多人都有体会，无需我在此絮言了。不管怎样说，在国外的再次洗牌中，我无可抗拒地被洗到主流旁边。

离开北京之后，我只在2002年回过北京一次，特意看望了许先生。那时，我已转行计算机几年了，在一家美国电讯公司作程序员。我知道许先生曾经对我有所期望。但是，我却没能坚持下来，转了行，辜负了老师的希望。对此，我表达了深深的愧疚之意。许先生没有埋怨我，只是说，你也要生活嘛。

在那次拜望许先生时，他告诉我，一会儿，方觉就要来访，并问我是否知道谁是方觉。我据实回答，不知道。为了不打乱先生的安排，我就告辞了。下楼之后，我意识到，随着时光推移，我对先生的所作所为已经陌生了。许先生去世后，在网上看到与他遗体告别的照片。在吊唁的众人中，绝大多数都不认识，我已经不了解先生近二十多年的生活圈里的人。同时，恐怕也很少有人能知道我这个三十三年前的学生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自己的心是与先生相通的，先生的教诲是永志不忘的。我坚持先生教导的底线，作一个清白的人，作一个正直的人。

2月4日，立春。先生忌日已过头七。凌晨两点，再也不能入睡。窗外，风雪交加，遂酿成诗歌一首。黎明之前，掌灯记下。

唱春风

欲渡黄河冰满川，将登太行雪拥山。
风剑霜刀拦不住，春风直抵玉门关。
融冰化解三尺冻，斗雪无惧百日寒。
引来温雨护幼林，桃李无言报春暖。

（载《华夏快递》13-02-11）

真正的仁者只有傲骨没有傲气

陈恒六

许良英老师去世了。我们几个做学生的觉得应该写些什么以致悼念。我已经二十多年没写过什么东西了，拿起笔来沉甸甸的。我知道我应该写点儿什么。我必须写点儿什么了。

我在1981年春天有幸认识许老师，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而从1981年春至1987年秋，那六年我和许老师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我就写写那六年的事情吧。

一、朝闻道，夕死无憾矣

认识许老师时，我是北师大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许老师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研究员。最初，我是听同班同学段强说起许老师的，他特别佩服许老师，因为他是爱因斯坦迷，而许老师是中文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辑和翻译者。段强是我大学时代的好朋友，我们曾经一起发起组织了北师大交叉学科研究会。参加的人除了段强和我之外，还有哲学系的王本功，数学系的王谦毅和生物系的郭玲等人。当时段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力，后来他曾担任过北京市的副市长，那是后话。在段强的影响下，我也开始认真阅读《爱因斯坦文集》。老实说，真正读出味道的只有第三卷。第三卷收集的是爱因斯坦关于社会政治理念的文章。就这样，我在段强的带动下，成为一名坚定的爱因斯坦的“粉丝”，顺便也就成了许老师的“粉丝”。一天，我在图书馆楼梯上遇到段强，他兴奋地对我说：“快去三楼期刊阅览室，许先生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又发表了一篇好文章。”我快步冲上三楼，找到许老师的文章，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这真是一篇振聋发聩的好文章。我一口气读完，再也忍不住我内心强烈的冲动，提笔给许老师写了一封表达我内心震撼的信。因为不知许老师的通信地址，只好把信寄给杂志社，委托编辑代为转交。大约过了两三个星期，我那时的女朋友郭玲告诉我，许老师约我去面谈。原来许老师儿子许成钢那时的女友吕匡辉也在北师大读书，且和郭玲同班。想必是许老师收到我冒昧的信后，向匡辉了解我的情况，而匡辉肯定也帮我美言了几句，于是促成了我和许老师的见面。我真幸运！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 29

年，我仍清楚地记得同许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事先约好，去友谊宾馆五号楼见许老师，匡辉和郭玲的同班同学李小青和徐燕听说了，也要去见见许老师，于是我就在她们四个同学的陪同下一起去见许老师了。那一天，许老师和我们谈了很多，也谈了很久。我则通过三件事向许老师讲述了我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和体会。

一是谈了通过自己的表哥和哥哥因思想言论被没有民主没有法制的社会剥夺生命和自由的悲惨命运，使我深切地感到没有民主法制的社会是黑暗残暴的社会，表达了自己对民主社会的向往和对没有民主法制的黑暗社会的愤恨。同时也对许老师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为建设民主社会不懈努力的崇敬之情。

二是谈了自己通过阅读《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对爱因斯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解。爱因斯坦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还是一位有良知，且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中国需要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需要像许老师那样的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三是谈了自己通过参加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对建设民主社会实践活动的体会。1980年下半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次人民代表普选工作开始了，全国许多高校的学生为了维护自身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发地举行了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民主活动，并在这次活动中被北师大选区的选民推举为人民代表五名正式候选人之一。我向许老师谈了两点切身体会：首先是同学们对行使自身民主权利非常关注；其次是同学们还特别关注那些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因此我认为，建设民主社会应从两件事着手：一是人民代表必须真正由人民选出，二是人民代表必须关注人民的切身利益，代表选区人民说话。

许老师则鼓励我认真思考科学民主问题。

这次见面，这次谈话，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座名副其实的里程碑。古人说，朝闻道，夕死无憾矣。我那天真有这样的感觉。

二、认真读书，独立思考

认识了许老师之后，我经常去见许老师。为了能更多更直接地接受许老师的教诲，我决定报考许老师要招收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春，我如愿以偿考取了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物理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许老师还联合了另外六名学者一起，作我和另外两名同学的指导老师。那六位导师分别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赵中立老师，中国科技大学的方励之老师，清华大学的何成钧老师，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范岱年老师，浙江大学的汪容老师和北师大的刘辽老师。另外两名同学则是刘兵和王作跃。

在追随许老师读研究生的三年时间里，许老师在我们身上倾注了太多的关爱和期望。是许老师塑造了我的人生价值观。在许老师身上，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人才配称为社会的良心。什么叫士可杀不可辱，什么叫气节，什么叫民族脊梁。

记得许老师曾特别和我们三个学生谈话，说做历史研究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做到秉笔直书。许老师还特别谈到，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

傲骨。他强调做人做学问都要独立思考，不能迷信，不能人云亦云。

许老师带学生的方法与其他老师有很大不同。对我影响很深的一个做法是他每周组织一次的读书讨论会。我和刘兵、王作跃每次都参加，有时同届的科学哲学专业的两个同学田云光和徐兰也参加，还有许老师前两届的研究生屈傲诚和熊伟，以及后来比我们晚一届的研究生仲维光也来参加。我记得还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科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胡新和，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吴国盛也都参加过许老师组织的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人一般事先会报一本书，回去认真研读，然后再向与会的人讲述书的主要内容以及自己的感想，大家再发问讨论。读书会气氛热烈，有时也会争论。我就是许老师组织的读书会上学会读书的。而且回到研究生院我和同学郝致京还另外组织了一个参加人更为广泛的读书会。我在读书会上结识了许多朋友，很多人后来成了要好的朋友。

我在许老师的指导下，比较系统地阅读了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哈佛教授 G.萨顿的科学史理论。后来我和刘兵、仲维光一起，在许老师的鼓励下，翻译了一系列萨顿关于科学史的论著。1984年萨顿诞生100周年。我们又在范岱年老师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李昆峰先生的支持下，翻译出版了萨顿论科学史的论文专集。后来我们还翻译出版了萨顿的名著《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以及《科学的历史》。当时我们几个同学的英文水平还很低，但在许老师的鼓励下，在赵中立老师、何成钧老师还有中国石油大学的戈革先生的帮助下，我们还是完成了介绍萨顿科学史理论的任务。

在许老师的读书会上我还认真研读了剑桥教授 C.P.斯诺的两篇演讲论文《两种文化》以及《科学和政府》。后来我和刘兵一起把这两篇论文以《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为题，在金观涛先生和梁晓燕女士的支持下，作为当时颇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翻译出版了。现在赵中立老师、何成钧老师、戈革先生都已经去世了，我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些无私帮助过我们的老师。在这里我也想向范岱年老师、李昆峰先生、金观涛先生、梁晓燕女士表示我由衷的感激之情。

正是在许老师组织的读书会上，通过研读历史文献，我逐渐形成了毕业论文《爱因斯坦和原子弹》的主要想法。我深切认识到，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爱因斯坦是在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为了防止法西斯纳粹德国率先拥有原子弹来对付民主国家，才毅然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尽快开展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是爱因斯坦反对法西斯专制，向往民主国家的一个重大举措，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毕业后，我在许老师的鼓励下，把毕业论文中这一部分观点专门加以整理，以《从爱因斯坦对待原子弹的态度，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为题，在严家其先生的支持下，发表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

无论是研究爱因斯坦，还是研究萨顿、斯诺，都是力图研究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记得1985年春天，在许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还借纪念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论文80周年之机，在杭州浙江大学成功地举办了爱因斯坦研究讨论会。可惜许老师因操劳过度，一只眼睛突然失明，医生诊断为视网膜脱落。虽经医生精心治疗，但从此许老师的视力大不如前，严重影响了他的阅读写作和研究工作。那时许老师才65岁。25年过去了，许老师一直顽强地坚持阅读写作研究。每次去见许老师，看到他仍然借助放大镜艰难地看

书，心中都万分感慨。许老师真是一个一辈子都在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学者，真是一个一辈子只有傲骨没有傲气的真人。

三、知易行难

三年时间飞逝而过，1985年春天我顺利地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师从许老师做研究生的这三年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充实的三年。尽管那时生活条件还很艰苦，但我的心情却非常好，内心充满欢乐。记得那时我经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奔驰在玉泉路的研究生院，中关村许老师家，清华何老师家，石油大学戈革先生家。还经常去位于友谊宾馆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去见范岱年老师、金观涛先生、李昆峰先生。那时我还经常在许老师和何老师家吃午饭。我无比怀念那些快乐充实的日子，许老师亲自下厨煮的面条和牛尾汤的滋味，我至今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毕业后，我在许老师的亲自过问下，被分配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近现代研究室工作。为此，许老师还专门为我找到中科院研究生院当时的常务副院长吴櫟去交涉。我真的很感谢许老师对我的关爱和栽培。

我在科学史所只工作了两年。虽然还是在许老师的亲自指导下工作，但我的感受却远不及给许老师当研究生的时候。写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就是我刚才说的 1985 年在杭州浙江大学召开的爱因斯坦研究讨论会决定出版一本《爱因斯坦研究》论文集。我 1985 年夏天分配到科学史所后，开始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仿照萨顿编辑出版科学史杂志 ISIS 的方法，为爱因斯坦研究编制一份已有的研究爱因斯坦有关文献的索引。在许老师的亲自指导下，我花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弄好了，科学出版社也已经完成了编辑校对出版印刷工作。书都印好了，样书也看到了，就要发行了，突然不知什么人却下令封存所有印好的书。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毁于一旦，出版自由被无端践踏，令人非常气愤。我为这本书所做的努力也全白费了。我生气之余，也很丧气。许老师为此也挺生气。

第二件事是我到科学史所工作之后，在许老师的支持下，选报了一个研究课题，以当时欧美同学会的 1000 多名会员为调研访谈的对象，系统分析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发挥的作用和个人的命运。为此我还专门申请到了一笔中科院的科研基金。我和当时在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郝致京一起设计了调查问卷，发了 1000 多份调查问卷，回收了 200 多份问卷。许多人在接受我们访谈时只是说些冠冕堂皇的官话，没什么真话实话。坦白说，我很失望。花了许多时间精力，而效果却完全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自己对此很不满意。许老师也不太满意。

第三件事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但结婚三四年了，却一直没有地方住。只能靠亲朋师友的关系四处临时借住。我借住过我侄子位于建国门外雅宝路的房子；我也通过岳母的关系，借住过位于定慧寺六一中学的宿舍；我也通过何老师借住过他女儿女婿在北大六公寓的宿舍；我还通过中科院研究生院学生处的关系，毕业后仍借住在位于中关村 42 号楼的研究生院研究生的宿舍。那几年我每年都得搬家，真是不胜其烦。分配到科学史所后，我向所里提出要住在科学史所的单身宿舍里，那时科学史所

的研究生不管毕业的还是尚未毕业的，都住在位于贡院西街1号和东总布胡同19号甲的单身宿舍里。可科学史所的领导就是不批准我的要求。我一气之下，看好有一间宿舍是空着的，就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把门撬开，强行搬进去住。科学史所管事的人，扬言要把帮我搬家的同学扭送到公安局派出所去，还扬言要对我进行纪律处分。这使我很不开心。许老师也挺不高兴。

其实，最让我不满并最终导致我下决心离开科学史所的原因是1987年初搞的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和随后而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经历过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我所熟悉并尊敬的方励之老师被开除出党。在科学史所组织的政治学习会上，一些人对许老师进行政治攻击。最让我震惊的是，这些攻击许老师的人，并不都是因为不赞成许老师的思想观点，而是因为许老师平时对他们的要求太严格，影响了他们评职称等个人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屈于政治压力，说出的违心之言。科学史所的一些人还催着许老师办理了离休手续。所有这些都让我极度失望。

通过参加这场运动，我认识到许多运动中的斗争，并不是政治思想斗争，而是掺杂了许多个人利益和恩怨。让我特别敬佩的是，许老师面对那些平庸小人的攻击镇定自若，嗤之以鼻。要知道，我到科学史所工作很大程度是想追随许老师，做许老师的助手，受许老师的教诲。那时，我正积极参与中科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探讨，还是中科院青年改革咨询小组的成员。科学史所的小环境让我非常失望。于是，我就和许老师商量，准备离开科学史所，并在1987年秋天，正式调到中科院科技政策局工作。

四、师门辱教，愧对恩师

自从1987年秋天，我离开科学史所，调到中科院政策局工作以后，我和许老师的联系比以前少多了。一方面是因为日常工作繁忙；另一方面是因为87年底我儿子出生了，这使我的生活压力增加了许多。为了减轻自己的生活压力，1988年我就离开了中科院机关，下海去联想公司（当时叫中科院计算所公司）工作。1989年我又被联想公司派到香港工作。再往后1990年我又离开了联想公司去了美国。这以后和许老师的联系就更少了。

从81年春认识许老师，到87年秋离开科学史所去中科院政策局，在那六年的时间里，我和许老师联系密切。在许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我真正懂得了为什么说知易行难。真正明白像许老师那样坚持自己的信念，几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弃，无怨无悔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也实在是太难了。记得我曾经读过学者罗尔纲写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师门辱教记》。大意是说作为学生辜负了老师的栽培和期望。我从87年以后一直就是这样的心情。我辜负了许老师对我的精心栽培和殷切期望。我对不起许老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单独去见许老师。每次去见许老师，我都要拉上以前的同学刘兵或者王作跃，和我一起。好在许老师对我特别宽容，每次都只是略加鞭策，没有严加斥责。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同学刘兵和王作跃，他们都坚持从事科学史研究，并在各自的研究中取得许多成就。刘兵还在做关于科学史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这是对萨顿研究

的继续。王作跃还在从事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以及科学与政府等方面的研究。这是对爱因斯坦研究的深入，是对 C.P.斯诺研究的扩展。衷心希望他们能在各自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不辜负许老师的培养和关爱。

更令我特别高兴的是许老师晚年，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身体仍然非常健康，精神依旧十分敏锐。每次去见许老师之后，我的心情都久久不能平静。从许老师身上，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从许老师身上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无私者无畏，什么叫君子坦荡荡。

如今许老师以 93 高龄驾鹤西去。衷心希望看到许老师毕生为之奋斗的科学民主精神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发扬光大，充分发挥其健康的社会功能。

许良英与《爱因斯坦文集》的命运

刘兵

提要：2006 年，《纽约时报》在介绍许良英时曾将他称为“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许良英在科学史和科学文化领域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在中国最先全面地研究爱因斯坦，并将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和学术思想介绍给国人。

许良英先生及其主持编著的《爱因斯坦文集》的曲折命运，折射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领域，苦苦追寻真理的历程。

1 月 28 日，著名科学史家、学术思想家许良英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 93 岁。美联社在报道许良英去世的消息时提到他获得的荣誉，包括纽约科学院的海因茨·R·帕格尔斯奖和 2008 年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安德烈·萨哈洛夫奖。

2006 年，《纽约时报》在介绍许良英时曾将他称为“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的确，许良英在科学史和科学文化领域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在中国最先全面地研究爱因斯坦，并将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和学术思想介绍给国人。不仅如此，许先生自己也一直以爱因斯坦作为其人生的榜样，他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该书就成为中国人理解爱因斯坦的重要途径。因而，回顾许先生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历程，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一个“农民”的爱因斯坦编译工程

许良英 1920 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初中时，他就憧憬着要做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1939 年，他“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1 年，许良英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2 年大学毕业后，因立志要做一位职业革命家，他谢绝了导师王淦昌要他做其助手的挽留。1945 年，许良英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1949 年杭州解放后，他调任中共杭州市青委机关。

1952 年，许良英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负责科学院出版的几十种学报、期刊和

所有研究专著的政治把关和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1956年，许良英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1957年，他因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而被定为“极右分子”，失去了党籍和公职，1958年回故乡务农达20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回到中国科学院新建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

对爱因斯坦的研究一直是许良英学术研究的重点。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后，科学院党组认为当初对他的处分太重，但又一时无法将他从农村调回来。1962年末，他原工作单位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寄给他一份《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向他征求意见，同时委托他负责编译《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为解决其生活问题，哲学所又将其一部旧译稿《物理学的基础》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很快决定出版该书并预支了稿费，使许良英可以用这笔钱在乡下购买“劳动工分”以维持生活。从此，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开始了对爱因斯坦著作的编译工作。

为了编译爱因斯坦的著作，许良英1963年1月从乡下到北京住了4个月。他先是住在商务印书馆宿舍，几天后就因为是右派（尽管当时已经“摘帽”）而被赶了出来。后来，他到哲学所住了两个月，却又因同样的原因被赶出，最后只好住在朋友家中。其间，商务印书馆与许良英正式签订了约稿合同。此时，他听说上海科委的李宝恒也想翻译爱因斯坦的著作，考虑到自己只是一个农民，工作上多有不便，而李宝恒是党员，所以他就约了李宝恒合作。

在北京的4个月中，许良英从北京图书馆等处找了许多与爱因斯坦有关的书籍，并借了一大堆书带回乡下，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翻译工作。他每天工作长达14个小时以上。当时，农村晚上八九点钟便停电，他就点上煤油灯继续翻译到深夜一两点。在一年半后的1964年10月，许良英就完成了50多万字的译稿，还到上海与李宝恒进行了讨论。此时，商务印书馆却因为“四清”运动，一时也顾不上出版“爱因斯坦”了。

利用商务印书馆推迟出版爱因斯坦著作的时间，许良英又写了长达9万字的编译后记。并在1965年10月，又写成了一部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

爱因斯坦在“批判”中被介绍到中国

在“文革”期间，从1968年开始，“自然科学理论战线”的批判运动开始启动。相应地，爱因斯坦和以相对论为代表的科学理论都经历了一场批判。

1971年10月，许良英从报纸上得知商务印书馆已经恢复业务，于是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出版已译好的译稿，得到的回答是要他立即寄去成稿。不过，此时，那部译稿以及《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书稿却被上海方面的“写作组”因“批判需要”从李宝恒处强行“借用”。许良英在索稿而不被理睬的情况下，写信给上海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不归还译稿他将“诉诸法律”，这才最后要回了译稿，但《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书稿却下落不明。

1972年3月，许良英将译稿带到北京交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决定尽快出版，但因为成稿9年后国外又有新的资料，许良英和李宝恒又继续补译新资料和复校被上海“借用”时被涂改的原稿。正当这些工作进行当中，许良英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一本《爱因斯坦言论集》，从其内容介绍上看与他的译稿完全一样。于是许良英写出揭露文章分别寄给有关人员和各地好友，并到上海交涉。经过谈判，上海有关负责人“指示”，《爱因斯坦言论集》是以许良英等人的译稿为基础，可以加上许的署名，并付给许

稿费，并表示可以给许良英安排工作。对此，许良英明确表示不同意，坚持要由商务印书馆按原计划出书，上海只能出节本。同时，许良英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申诉，信被退回后，他又将申诉信转寄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等人。最终科学院出面将信转给国务院。在此情况下，上海方面只好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上海出的书“内部发行”，而商务印书馆则按原计划公开出版该书。

1973年9月，上海出版了《爱因斯坦论著选》，在扉页的编译说明中提到此书由复旦大学的十几个人“集体编译”，而且“在编译过程中，曾参考过许良英、李宝恒于1962~1965年间的旧译稿”。

考虑到上海抢先出版，许良英等人决定要将原稿内容大大扩充，从原来的一卷扩大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这个意见为商务印书馆同意。鉴于李宝恒当时在上海已无法继续合作，许良英又约了范岱年、赵中立两位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朋友（当年他们也曾因受许良英的牵连而被划为“右派”）合作。1974年9月，译稿的第一卷（46万字）终于交到出版社，并在交稿后一周就送到了印刷厂排印。而此时，上海的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此后又经一系列的波折，收录爱因斯坦科学论文的第二卷译稿也于第二年9月交稿。

1973年在将原编译计划扩充为三卷本时，有人对最初设想的《爱因斯坦选集》的书名提出异议，认为“选集”只能用于革命领袖，而不能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于是书名改成了《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12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终于出版了。约一年后，1977年3月，《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正式出版，第三卷的出版，则一直等到1979年10月。

当年，胡耀邦看到刚出版不久的《爱因斯坦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自1952年后，爱因斯坦在中国就被批判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文革中更是“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胡耀邦便要求下属都去读《爱因斯坦文集》。

许良英介绍给中国人的，是“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而不仅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爱因斯坦”“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怀疑一切权威的人，是一个始终独立思考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真、善、美。”

许良英先生对爱因斯坦的这些评价，也是他自己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载《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02月09日）

不死的老兵：痛悼严师许良英先生

熊伟

英雄不是以成败而论的，许先生是火种。他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薪火相传的火种。

自从知道许良英先生住院的消息，就吊着一颗心。从许先生儿子发布“家父病情通报”后，我就每天都看。1月28日的发布有“情况危急”字眼，说：“昨夜情况忽然直转急下。凌晨医生通知准备最坏情况。血压 20/60，升压药无济于事。血乳酸 12。心脏和肾功能衰竭。今天可能很难。”

“今天可能很难。”但我还是相信许先生能挺过来，他是一个生命力很强的人。不想，今天上午（也就是北京的晚间）十点二十分收到朋友传来的消息：“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11楼的重症监护室去世，终年93岁。”

这消息给我莫大的悲伤。先生的夫人王来棣先生12月31日去世，王师母的音容笑貌还在眼前，我又失去了严师许良英先生，真是痛上加痛！

这两天，因为谈论许先生的原故，妻拿着先生送给我的《八十三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增订版）》读。妻是读医的，对人文人物很陌生。这些天她常问我：“唐德刚是谁啊？许先生批评他了。”“许先生批评了金观涛，批评得对吗？”

2010年我去看望先生时，先生签名送我两本书，一本是《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另一本就是这书信集。

妻子的问题勾起我的回忆。

2010年，先生90岁。我特地去北京看望他。我是12月27日下午到北京的，第二天一早就去看先生。早晨9点钟，敲开了门。应门的正是许先生。进门后在客厅分宾主坐下。先生的这套住处，20多年前可是非常气派，据说是为吸引海外专家盖的。许先生分得一套，也很让许多人红过眼，现在觉得小了许多。

在许先生门下作学生时，我每周都来这里。现在客厅陈设依旧：靠阳台的一侧，中央是两张写字台并在一起。靠墙两侧是排列的书橱，书橱里是挤得满满的中外文书籍。客厅近过道门的一侧是沙发、茶几，与沙发相对的是两个沙发椅，旁边还有一把椅子。另有一门通另外一间小屋。离此门不远，有一巨大的塑料青蛙在不停地向外喷着水汽。

我坐在沙发上，对着阳台的窗户，许先生坐在对面一个黑色沙发椅里。先生已年过90，身体很好，思维敏捷，还像过去那样健谈。先生说话极快，单刀直入，没有虚招。听先生评人论事，十分痛快。

前一次拜见先生是2002年。8年不见，我问起许多人，先生的回答常常有：“后来我们观点不同，就不再来往了。”先生是理想主义者，可和先生志同道合的人却越来越多地被时光带走：如李慎之先生，朱厚泽先生，甚至比许先生小许多的华贻芳先生。

许先生说在刘晓波得诺贝尔奖前后，有三十多位老革命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先生没签，因为他们现在都在网上串联，而先生眼睛不好，不上网。“如果我知道，我也一定会签的。”

忽然，我想起麦克阿瑟将军的演讲：“老兵永远不死，只是逐渐消失”（“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许先生被封为6•4“黑手”，曾经是很让当局害怕的

角色。几年前，已经 80 多岁的老人还要楼前有岗。每年 6·4 来临就要被礼送出京，过了敏感的日子才又被送回来。

有些年，科学院的何祚庥院士就住在许先生对门，另一院士把这描述为“冤家路窄”。何院士得罪了法轮功，也有了保安来站岗。何院士很得意，见人就说他和邻居都有岗了。有人不动声色地回他说：“您和许先生还是不一样：您的岗是公安部的，而许先生的岗却是国安部的！”

先生是老兵。但是，先生还是战斗不止的老兵。先生和师母合作，还在写一本关于民主的大书。我问起进程，先生回答说：“写完了美国，开始写法国了。这本来是年轻人的工作。可年轻人没有兴趣，只好我们来干啦。”要知道，自从 85 年视网膜脱落手术后，先生的目力就几近于零。年迈而目力不佳，如果没有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又有谁会在这种巨大项目上劳神用功呢！更何况，民主还是当局忌讳的话题。

我向许先生请教民主的操作。许先生批评了我：你这还是在闭门造车，精英思想作祟。先生认为当下需要的还是启蒙。先生坚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民主是人民的基本需求，到时水到渠成。先生说，他的看法小布什也曾引用。

2010 年的相会也见到了王师母。和许先生说了一阵子话后，师母也来客厅，坐在许先生旁边。她说自己身体不如许先生好。我和师母都主要是听许先生说。师母脸上总是有笑意，很慈祥。一晃就是中午。先生和师母留饭。我知道先生有午间小睡的习惯。先生已年过 90，师母也 80 多了，我不能打乱两位老人的生活节奏，就告辞了。

没想到，2010 年的相会，就是我见到二老的最后一次。我能有许先生作我的研究生导师是很幸运的。不仅因为许先生是中国当代思想界一位标志性人物，我在学业上得到他的亲身点拨，还因为许先生让我认识到人是生活在不同的层次上的，先生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一同影响我。许先生是一个为理想而生活，而奋斗的战士。

有次我和许先生通电话，快结束谈话时，作为晚辈，我问先生需要什么。先生回答：“我要自由。”我沉默了。我没有能力。

我反复地问自己，许先生的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可是现实是他没有成功，中国体制仍旧专制，官场仍旧腐败，思想仍旧不容自由。那么许先生的意义何在呢？我找到的答案是：英雄不是以成败而论的，许先生是火种。他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薪火相传的火种。

许先生一生奔走呼唤，成为我国民主思想的启蒙者。他治学认真严谨，对人宽厚宽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敬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先生是我们民族精神薪火相传的火种。

许先生安息！

2013-1-29（载《博讯》2013-2-3）

科学史研究的良心

——忆许良英先生言传身教二十余载

胡大年

我是许良英（1920-2013）先生亲自指导的最后一名硕士研究生。1989年秋，我因赴美留学，提前离开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并未能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并毕业。然而，我受到先生言传身教的时间则远不止在科学史所的两年；实际上，自1987年起，在学习和研究工作中，我一直都深深地受益于先生的悉心教导与热情支持。至于先生的著作开始影响我的时间，则可追溯到更早。许良英先生驾鹤西归已数年，为纪念许先生，笔者特修此文，以重温先生对我的言传身教，并展示先生严谨之学风与高尚的人品。

我是在1979年第一次接触到许先生的著作。其间，我正就读于文革后北京市恢复设立的第一批重点高中之一：清华附中。此时虽然课业繁重，且距我们这一届的高考只有一年左右，我仍忙里偷闲阅读了不少课外的闲书。我的父亲在中央党校图书馆工作，他经常借些与科学或科学家有关的图书给我看。那一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本书，一是艾芙·居里著的《居里夫人传》，另一本则为赵中立和许良英先生等编译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正是这两本书，激发了我对科学家的生平与科学史的强烈兴趣，而后者则引导我最终走入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研究。此外，《中国青年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曾在报上连载秦关根所著的《爱因斯坦传》，这一科普式的小传使我对爱因斯坦的生平更为着迷。后来得知，作者在撰写此传前，亦曾请教过许先生。因此，该书对我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亦可间接归功于许先生。

1980年七月，我参加了高考。由于数学考试的意外失利，我未能考上自己的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结果，我被北方交通大学建筑系录取。这虽非我原先填报的志愿（交大电子工程系），却使我有机会学习多种力学课程，部分地满足了我当时学习物理学的渴望。大学四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物理学、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传记方面的书籍与文章。我购买了全部三卷《爱因斯坦文集》，并仔细研读过第一和第三卷。等到大学即将毕业、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之时，我的兴趣已完全不在所学的铁道工程专业（大四的专业课曾有三门补考），而是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自然辩证法专业，这是当年我所能找到的与我的兴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最接近的研究生专业。当时，建筑系里的老师和辅导员们对我居然报考哲学系的研究生都感到十分诧异。虽然经过努力的准备，但由于我不熟悉“自然辩证法”的专业课，此次考研失败了。谁知，此乃塞翁失马，为我三年后直接师从许良英先生留下了机会。

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标准定额局规范处，并在此处工作了三年²⁶。其间，我仍一直关注着与科学史相关的各种书籍、报道和活动，曾寻机旁听了哈

²⁶ 据称，正是我报考哲学系的举动，引起了到交大建筑系招人的国家计委的徐处长的注意，并因此更改了我原定的分配方向（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可笑的是，当初我得知计委招人时（名额只有一个），也曾询问过系里负责分配的辅导员，不知我是否有此机会。谁知这位不过早我两年毕业而后留校的学长，竟以轻蔑的口吻训斥了我一番：“你也想去国家计委？那么重要的国家机关，你又不是党

佛大学科学史系系主任希伯特（Erwin Hiebert）教授在北京友谊宾馆的公开演讲，以及一次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科学史学术讨论会（当时主持会议的正是许先生的弟子，陈恒六先生）。正是在党校举行的这次会议上，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许先生，不过当时并未敢上前搭话，只是坐在会场的后排，远远地望着。1986年底，我终于说服了我的局长，让我参加研究生考试，条件是我答应只考一次。此次报考，我选择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许良英和董光璧两位先生合招的物理学史专业。出于学习和研究现代物理学史的强烈愿望，我特别珍惜这唯一的一次考研机会，利用一切工余时间，对考试科目做了认真的准备。初试于87年2月在当时位于东皇城根的科学史所内举行。由于考试地点距我在颐和园北宫门的家太远，且天气寒冷，为了避免迟到，我在考试期间曾借宿于我父母在城里的一位朋友家。在顺利通过了初试之后，我又参加了由许、董两位先生亲自主持的复试，因而再次见到许先生。当许先生问我今后的研究意向时，我毫不犹豫地提出要研究爱因斯坦。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两位先生听完我的回答后，曾相互对视，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范林和我被正式录取为两位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此后，许先生曾专门找我和范林谈过一次，说明他想主要负责指导我的研究工作。我不知道范林当时是否也想选许先生作为他的导师，但我记得他建议范林跟董光璧先生作论文，因为那时董老师在科学史所好像还没有自己的研究生。

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即1987年秋至1988年夏，我在位于玉泉路的中科院研究生院住校选课，但也定期到中关村与许先生见面，除了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也帮助先生到科学史所取回邮件和各种资料等等。在经历了1986年底的学潮和1987年初胡耀邦辞职等重大事件之后，国内的政治气氛趋于紧张、经济形势也很动荡，中国知识界关于民主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也愈演愈烈。此时的许先生，正在积极从事对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进行民主思想的再启蒙，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在许先生的自述和其他的回忆文章中已有详述。在此，我只想提一下自己所亲眼目睹的许先生在北大与学生交流的生动一幕。

那是在1988年5月间，北大学生组织的“民主沙龙”邀请许先生到北大三角地与学生们会面、讨论。因年近七旬的许先生身体和视力都不好，为了先生的安全，组织者特意请许先生的研究生在他乘坐公交车往返北大的途中帮助保护一下。为此，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全程陪同许先生参加了此次活动。我们大概是在下午三、四点钟抵达北大三角地的，许先生在草坪上席地而作，并立即与先到的学生们开始交谈。没过多久，三角地周围开来好几辆面包车和吉普车，从车上下来至少十几位身着便衣的小伙子，他们很快散布在三角地的周围，并密切注视着许先生和其他参与者的言行。有些人则公然在附近架起了摄像机和带长焦镜头的专业相机，对沙龙的活动进行录像和拍照。面对显而易见的监视，许先生坦然地回答了学生们的各种问题，并就改革的进程、民主和新权威主义等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1988年秋，我从研究生院返回科学史所，跟许先生和董老师学习专业课，主要是自己在家读书和写读书报告。我不仅学习了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献，而且还阅读了威尔斯的

员，怎么可能分配你去？”那意思很清楚：甭做梦了！

《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 by H.G. Wells)和肯尼迪的《大国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by Paul Kennedy)。这期间,许先生也开始与我拟定论文的题目。许先生建议以“爱因斯坦的民主思想”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题目。这一建议显然反映了当时许先生的思考和国内形势的需要,同时也考虑了我的知识背景和兴趣。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经过许先生深思熟虑的建议。

1988年岁末,我一面收集与论文题目相关的资料,一面也着手准备申请自费赴美留学。对于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申请出国留学,我心里是很矛盾的。本来,我的理想计划是,先在许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硕士学位,然后出国留学。但是,当时国家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却迫使我不得不更改原定的方案。按照当时的规定,取得硕士学位后须服务至少5年才能自费出国留学,否则必须赔偿国家一笔巨额培养费。像许多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同学一样,我渴望尽早赴美进一步深造。因此,为了避免5年的等待及更高额的赔款²⁷,我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提前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院奖助学金,一旦成功,则立即办理退学和出国手续。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因为我并不想中途放弃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跟许先生学习的机会。此外,我也觉得很难开口向许先生说明我的有点儿自私的想法。我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任何一位教授对像我这样半途而废的研究生,都会很自然地感到失望和不满。但是,在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当面向许先生谈了我的想法之后,他虽然有些失望,却还是对此表示理解,并且同意为我写推荐信。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他在信中对我的学业和能力作了坦率而又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为我赴美留学申请最后取得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989年,是国内外形势骤变的一年。这时的许良英先生,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主张民主、人权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不但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率先提出,要在1989年“隆重”纪念“五四”七十周年,“重点”宣传民主和人权;并且于当年2月与中国著名地理学和冰川学家施雅风联手,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发起“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在国内外都引起轰动²⁸。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再次引发了学潮及一系列政治事件,最终当局于六月初动用军队镇压了以学生为主的示威和抗争,并罢黜了同情学生的赵紫阳总书记。对此,许先生曾痛心地对我说,“中国的民主政治因此倒退了五十年!”

“六四”之后,许先生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但他却谢绝了亲友们劝他“躲避一下”的忠告,宁愿“为中国民主事业做一个谭嗣同”²⁹。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许先生可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却时刻惦念着他的学生的安全。就在“六四”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许先生亲自打电话到我家,同我商量更改原定的硕士论文题目。直到我告诉他,我已被美国俄亥俄州的凯斯西储备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或 CWRU)的历史系录取,已准备退学和办理出国手续,他才放心。由于“六四”之后公安局对申

²⁷ 此时,我已年逾26周岁,如再等5年,出国就有点太晚了。按当时的规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未满“5年服务期”而辞职自费出国的,须付的“国家培养费”要比本科(学士)毕业生应付的款额更高。

²⁸ 许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一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刊于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1949年以后)“一生都在波涛中”,第18页。

²⁹ 同上。

请离境人员的严格审查，大大延长了申请护照的时间，我一直等到9月中旬才得以动身赴美，那时CWRU已经开学一周了。

我于1989年9月中旬飞抵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开始就读于CWRU历史系的技术与科学史项目。1991年夏，我获得硕士学位；翌年，又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并开始准备作论文。在与许先生以及在美国和德国的爱因斯坦专家们咨询之后，我决定研究“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在中国”这一课题。这就需要查阅大量的原始中文文献，而这一条件在CWRU是不具备的。为此，我决定随我的美国房东搬往加州洛杉矶居住，以便利用加大洛杉矶分校的中文图书馆。谁知，到了洛杉矶才发现，我们的住处距离加大洛杉矶分校很远，交通又不方便，实际上不可能经常去该校图书馆查阅资料，而且该馆在我的研究领域的中文藏书也不够丰富。此外，我在CWRU的论文导师虽是一位极优秀的科学史家，但他的专长是化学史，并不能在现代物理学史、特别是爱因斯坦研究方面给予我很具体的指导。这些都促使我考虑转学。

1993年秋，我成功地转入耶鲁大学，师从国际著名的物理史和爱因斯坦研究的专家Martin J. Klein教授（1924-2009）。早在1983年，许先生访美时就已同Klein教授相识。回国后，许先生曾撰文向中国读者介绍了Klein教授，称其为“现代物理学史研究的先驱”之一，并高度赞扬了他在与托马斯·库恩的论战中，“为维护科学史研究应有的严肃学风”所作出的贡献³⁰。我就是读了这篇文章后，才第一次知道Klein教授的。十几年后，许先生在来信中又指出，Klein教授“是一位严谨而有思想的学者，他对Thomas Kuhn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他的文章都是言之有物的，关于Einstein的研究也是如此。”³¹根据我同Klein教授长达16年交往的经验，我知道他对许先生的学识和人品，也是非常仰慕的。两位老先生曾通过我多次互致问候。在Klein教授任《爱因斯坦全集》主编期间，他曾专门指示出版社，先后将多卷新出版的《全集》寄给许先生。当时科学院图书馆经费困难，买不起这套《全集》，而许先生则高兴地对我说过，他收藏的《全集》卷数，比北图和科图的还全³²。

在耶鲁，除了Klein教授，还有许多杰出的学者不仅向我传授了丰富的知识，而且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其中一位，就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教授。1995年春，我选修了他的“中国近代史问题”研讨班，该课程要求班上的每位研究生完成三篇（每篇至少10页）课程论文。在头两篇文章中，我分别讨论了17至19世纪之间的西学东渐以及数学家魏嗣銮的生平和科学贡献。第三篇写的则是许先生，题为“许良英：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民主主义者”；该文以《纽约时报》1994年3月11日在头版头条对许先生起草的《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所做的报道为切入点，介绍了许先生一生的坎坷经历，并对其思想的演变历程以及爱因斯坦的思想对许先生的影响，作了一个简略的分析。这篇文章虽然在英文文法上还存在许多错误，但其思想内容以及所引用的丰富材料（其中很多都是许先生提供给我的）都获得了史景迁教授的好评。后来得知，原来许先生在1983年访问耶鲁大学时也曾与史景迁交

³⁰ 许良英，“美国物理学史研究工作情况见闻”，《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5期，第53-61页。

³¹ 许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8年3月19日。

³² 许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4年11月15日。

谈过。十三年后，许先生回忆往事，当时对话的情形“犹历历在目”。1996年夏，许先生来信向我推荐新出版的 *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 (H. Lyman Miller 著) 一书以及史景迁教授为该书所撰写的长篇书评，并请我代他向史景迁教授致意，称其“是关心中国未来命运和主持正义的学者，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朋友。”³³

1997年秋，我通过了耶鲁大学的博士资格考试（获哲学硕士），从而可以全力从事论文的研究和写作，研究方向仍为原定的“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影响”。如上所述，自1992年起，我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一研究课题。转入耶鲁之后，我仍继续收集相关的资料并思考相关的问题，并于1994年春在 Klein 教授指导的“研究辅导（Research Tutorial）”课上，完成了一篇课程论文，在戴念祖先生“爱因斯坦在中国”一文的基础上，对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细节，做了进一步的探索。然而，直到1994年底，我仍然不能确认一定能按此题目完成我的博士论文。³⁴

现代物理学史中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展到九十年代末已经产生了大量的专著和研究论文。在此领域，博士研究生已很难再找到一个新颖而又合适的研究题目。很多人一听说我在研究爱因斯坦，便摇头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当他们得知我研究的是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中国的影响时，则又连连称许并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题目虽好，但是否可行仍然是一个问号。我的导师 Klein 及其他关心我的耶鲁教授，都曾关切地询问我能否找到足够的论文资料。当时，我自己对此也没把握，但又必须及时给出一个答案，以便制定论文研究计划和申请回国调研的经费。为此，我于1994年10月底写信求教于许先生。³⁵

先生在接到我的信后，立即作了回覆，指出，“‘Einstein 在中国的影响’，资料非常丰富，做一篇博士论文决无问题。”同时，他还安排转寄给我他刚刚完成的一篇为“全美科学促进会”1995年年会准备的发言稿，题目是《Einstein 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关于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许先生还在信中告我，“戴念祖1979年那篇文章，是我[许良英]建议他写的，并帮助他修改定稿。他[戴念祖]仅花了两个月左右时间，材料北京图书馆里全有。早期材料，北大图书馆也会有。”³⁶

许先生所提供的许多资料和种种建议，都直接启发和推动了我的研究工作。他的许多意见，也展示了一位秉笔直书、一丝不苟而又独立思考的科学史家之风骨，而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关于他与自己的老师束星北的一场争论中。

1994底，许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提出，

在研究中，也请你帮助我解决一个疑案。1979年3月9日，我在浙江大学时的老师束星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文《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1928-29年

³³ 许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6年8月27日。

³⁴ 胡大年，致许良英的信，1994年10月28日。戴念祖的文章，曾刊于赵中立和许良英编译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第396-410页；亦见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第74—85页。

³⁵ 胡大年，致许良英的信，1994年10月28日。

³⁶ 许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4年11月15日。

间在柏林大学“爱因斯坦研究室”当了一年“研究助手”。开始我信以为真，1983年他逝世后，我看了他自己填的几份简历表，觉得根本不可能。1993年出了一本纪念文集《物理学家束星北》，收了他这篇文章，我的8个疑点，以及别人反驳（并无说服力）我的信。待你开始搞研究时，我可把这本书寄给你，请你在Martin的指导下，设法查阅Einstein 1928-29年间的档案，看有没有束星北（Hsin P. Soh）当研究助手之事？当然，这也可作为你论文的一个内容。³⁷

1996年5月，许先生在来信中又再次敦促，

你的研究论文，希望对束星北究竟当过Einstein助手没有这个问题作一可靠的答复。你的导师Martin Klein是Einstein全集的主编，你要查阅Einstein 1927-28年间全部档案该很方便，并且可以向Klein和另几位编辑专家请教，请他们帮助判断。去年李寿枏公开发表束星北传，肯定束当过Einstein[的]助手。同时又有人发起筹备束星北基金，要为此大肆宣传。你应该通过自己的研究，在Klein教授指导下，来澄清这个问题。我的意见都已写在1992年的信中（见去年送给你的非公开出版物《物理学家束星北》），希望你接下去加以研究。³⁸

1997年暑假期间，我驾车前往波士顿市，在波士顿大学Mugar图书馆检索了爱因斯坦档案（复制件），并于8月15日发现了一封束星北写给爱因斯坦的英文信。³⁹该信作于1943年12月17日，其中第一句话的开头即写道，“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中译文为，“很遗憾我还没有机会与您结识”。这句话足以证实许先生的怀疑：如果束星北到1943年尚未与爱因斯坦“结识”，他显然不可能曾在1928年做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⁴⁰

9月13日，我将束星北致爱因斯坦信的内容，打印后函寄许先生（在此之前，我记得已经打电话告知先生）。9月20日，先生收到我的信后迅速回复，称我“发现的这个材料非常有价值，足以否定《光明日报》1979年3月9日那篇《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真实性。”许先生还立即将该信“转寄王淦昌先生一份，请他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⁴¹10月13日，先生又收到我寄去的束星北信的原件复印件，第二天便带着我的两封信去看望正在北京医院住院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仔细看过信后，对许先生说，他知道“束先生要给Einstein寄论文”，“这篇论文是关于加速度的transformation问题”，他还帮助检查过“其中的数学公式”，“至于信的内容，他并不知道”。王先生还认为，“那封信上的签名，确是束先生的。”许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指出，“当时王先生是浙大物理系主任，束先生想邀请Einstein来中国，按常理，应该同王先生商量，但束先生没有这样做。……中国当时深受战乱之苦，束先生竟想请Einstein来中国度余生，是异想天开。”王、许二先生都曾建议我继续查找Einstein给束星北的回信，但迄今为止，仍未查到。⁴²

³⁷ 同上。

³⁸ 许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6年5月5日。

³⁹ Albert Einstein Papers (AEP), Special Collections, Mugar Library,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MA, 56-173.

⁴⁰ 胡大年，《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359-362。

⁴¹ 许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7年9月23日。

⁴² 许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7年10月19日。王先生因二月前被一骑自行车的冒失鬼撞倒，致“膀

我以为，很有可能，爱因斯坦并未回信，其原因之一恐怕就是爱氏感到很难回复束先生的“异想天开”的邀请。假如爱因斯坦真有回信，而且束先生收到了，则束至少会在他的1979年的回忆文章中提到。

根据上述束星北致爱因斯坦的信，许先生曾得出结论，不仅“1979年《光明日报》上那篇文章肯定是不真实的”，而且“束先生从未见过 Einstein”。⁴³ 当时，我是同意许先生的看法的。但十年之后，新发现的证据却部分地改变了我的看法：束先生没有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但他有可能在柏林见过爱氏。2007年7月19日，我在柏林洪堡大学档案馆发现了一张束星北在该校注册的卡片（见图），注册日期是1928年6月19日，专业为数学（注意：束星北填写专业用的是英文 mathematics，而数学专业的其他中国学生在填写时则多用德文 Mathematik）。该卡片显示，束星北1928年夏确实曾就学于柏林大学，但他当时的德文似乎并不熟练，而且只选过一门课（其他中国学生的卡片上，多数列有2至4门课），很可能在该校学习的时间并不长。可惜的是，我们还不知道束先生在柏林大学选修的是什么课，因为所有卡片上都只列课号不列课名，而该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那些号码所代表的课程。



许多人都知道，许先生是一位极为严谨的学者。任何人，无论他的权势、地位、名气、国籍以及与先生的个人关系如何，只要发现他们工作中的错误，先生都一定会给予严肃而尖锐的批评，绝不循私情。在许先生的学术生涯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我自己就曾多次帮他向《爱因斯坦全集》的主编 Klein 教授转达他对《全集》中的某些评注所提出的批评和质疑⁴⁴；又如，他最近撰文对席泽宗院士和李约瑟先生所作的批评⁴⁵。能够像许先生这样，为维护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肃学风而秉笔直书者，实不多见。

更加难得和令人钦佩的，则是那些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和改正的学人，而许先生也是其中一位佼佼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看许先生是如何对待别人对他的呕心之作《爱因斯坦文集》所作的批评的。众所周知，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是由许先生领衔编译，历经十余年呕心沥血的劳作才完成的；它也是先生在国内最广为人知且影响最大的作品。全书共有410篇译文，其中绝大多数是由许先生，以一个被遣送原籍、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极右分子”的身份，独自完成的⁴⁶。通过长期艰苦的

骨开裂”，而住院。据许先生调查，束先生寄给爱氏的论文是：Relativity Transformation Connecting Two Systems in Arbitrary Acceleration, 后发表于 *Nature*, vol. 158, 99, July 1946.

⁴³ 许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7年10月19日。

⁴⁴ 仅仅在以下两封信中，就提了三条意见。见许良英致胡大年的信，1996年1月5日；1996年8月27日。

⁴⁵ 参见许良英，《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与席泽宗先生商榷》，《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第8期。

⁴⁶ 许良英，《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历程：〈爱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订后记》，《科学文化评论》第4卷第6期（2007）：62-70。译文的篇数和字数，见第69页。

努力,《文集》在翻译的信、达、雅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与近年来充斥于国内书市、粗制滥造的所谓“译著”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由于编译者当时所受到的种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的限制,加上爱氏思想的复杂背景,该《文集》的早期版本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错误。1988年,方励之先生在《科技日报》发表书评,指出了《文集》中的两个重要错误。许先生不仅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承认它们是“反科学的时代污染”,而且还就导致这些错误的思想原因,作了极为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反思。⁴⁷ 在其耄耋之年,先生仍孜孜不倦地完成了对上述“时代污染”的彻底清理,于2009年底又出版了《爱因斯坦文集》的增补本。从此,先生终于可以摆脱对爱因斯坦的一种“负罪感”了。⁴⁸

许先生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虚怀若谷的高尚品德,更凸显于其对一封只有四句话的短信的译文数易其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可以说是“长盛不衰”,仅在1980-1998年间,“已发表论文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⁴⁹ 到了九十年代末,更是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问题“炒得火热。”⁵⁰ 恰好,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有爱氏专门为回答这一问题致斯威策先生的一封信(右图为原信复制件的照片)。斯威策(J.S. Switzer)是一位美国陆军上校,退休后到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其间他选修了汉学家 Arthur F. Wright 的阅读课(Reading Course),探讨“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science or no science in China)”。为此,斯威策自作主张,将课上讨论的主要问题记下来寄给了爱因斯坦,并得到爱氏的答复,从而为我们留下了爱氏之卓见。⁵¹ 爱因斯坦回信的内容,大概因李约瑟在其1961年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Poverties and Triumphs of the Chinese Scientific Tradition”)中全文引用而公诸于世。可以想见,该信自然会成为争论的双方都需要关注和利用的重要证据,特别是当该信的译文出现歧义时。

为清楚起见,我将爱因斯坦英文原信的内容复述如下:⁵²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最早出版于1976年1月,当时许先生等编译者为该信的

⁴⁷ 方励之,《评〈爱因斯坦文集〉》刊载于《科技日报》,1988年8月7日;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中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删节稿刊于《科技日报》,1988年8月28日,原稿则收入《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第182-185页。

⁴⁸ 2010年夏,许先生亲口对笔者说过,如果不完成此清理,他将“永远感到对不起爱因斯坦。”

⁴⁹ 引自刘钝,“李约瑟的世界和世界的李约瑟”刊于刘钝和王杨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3页脚注2。

⁵⁰ 同上,第23页。

⁵¹ Arthur F. Wright, 致 Derek J. de Solla Price, 1959年10月20日, AEP, 61-382.

⁵² A. Einstein, 致 J.S. Switzer, 1953年4月23日, AEP, 61-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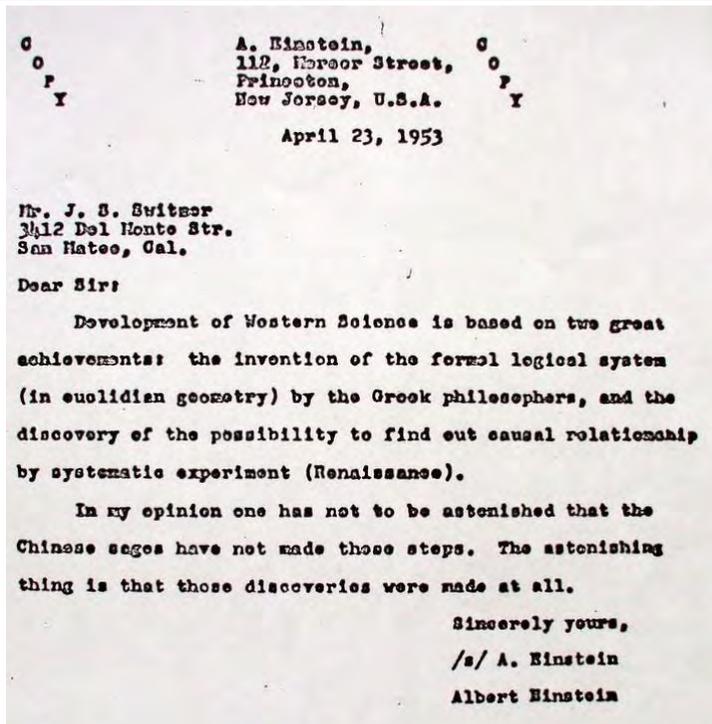
译文加了标题：“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由胡文耕先生将该英文信汉译如下：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需要说明的是，此译文并非基于爱因斯坦的原信，而是译自李约瑟的引文。⁵³ 李约瑟在引用该信时，不仅对爱因斯坦的英文做了少许修改和润色，而且将原文的两个段落并作一段，这是导致误译的一个重要原因。⁵⁴

由于将“these discoveries（这些发现）”误解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发现，译者在上述译文中又加入了“【在中国】”三个字。⁵⁵ 后因发现海外的中译本与此不同，许先生经过深思，意识到“这些发现”并非指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而是指信的开头所说的作为西方科学发展基础的两个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先生仍误以为“‘发现’的主体应该是中国贤哲”，为了避免与前一句相矛盾，而将最后一句理解为“虚拟式”，并在1983年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时，将其译文改为：“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⁵⁶

1998年以前，我并未注意到上述与“李约瑟难题”有关的讨论，也不知道许先生1983年对译文的改动。大约在1998年夏天，我在回国调研时拜会了董光璧老师和许良英先生。交谈中，他们都委托我去爱因斯坦档案查一查爱氏的原信。当年8月10日，我在波士顿大学图书馆不仅找到了爱氏的原信，而且发现了另外两封相关的通信。一封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汉学家 Arthur F. Wright 写给他系里的同事 Derek J. de Solla Price（即



⁵³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1月第一版），第574页。

⁵⁴ 李约瑟对爱因斯坦的英文做了少许修改和润色：见 H. Floris Cohe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第565页注219。笔者目前还不清楚，李约瑟为什么要修改爱氏之原文。

⁵⁵ 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兼答何凯文君》刊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第100-101页。

⁵⁶ 同上，第100页。

著名的科学计量学家普赖斯)教授的,向他推荐爱氏的信,建议将其收入正在编辑的爱因斯坦书信集中,同时还介绍了该信的来历以及斯威策先生的一些背景。另一封是普赖斯写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Oppenheimer)教授的,因普赖斯不知道谁在负责收集和编辑爱氏的材料,他请奥本海默代为转交。⁵⁷12月20日,我将上述3封信同时寄给了董、许两位先生。在信中,我还写道:

我与 Martin J. Klein 教授和 F.L. Holmes 教授讨论过关于如何理解 Einstein 的回信,特别是信的最后一句话的问题。他们都认为, Einstein 信中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使人惊奇的是,那些发现,【不论在何处或被何人,】到底都被做出来了 (and that's enough!)。”由此看来,《爱因斯坦文集》中的中文译文中,译者在最后一句中所加入的“在中国”三个字,是因误解原文而导致的误译,已经偏离了爱因斯坦的原意。“在中国”三个字应该从译文中删去。

Klein 教授认为, Einstein 在其回信中并未就关于古代中国人是否做出了信中所说的两个发现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Martin said that Einstein was not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It is probably irresponsible for him to make such kind of judgment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Einstein 想表达的确切意思应该是:无论谁没有作出那些发现都不奇怪,因为人们本来就不应该期待有任何人会作出上述发现。⁵⁸

我在写此信的前后,还曾打电话与许先生专门讨论过最后一句话的译文。正如先生自己在他的文章中回忆的那样,我当时未能说服他放弃他的“虚拟式”理解和译文。对此,我并未放在心上,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爱氏的信对于我的论文研究以及中国科技史界的重要性。直到最近我无意中读到许先生答何凯文君的文章,才知道,原来先生早在15年以前就将原译文中的“在中国”三字删掉了;2005年初,他又重新审读思考了爱氏致斯威策的信的译文问题,“终于认识到自己固执己见的错误,愉快地接受了胡大年、Martin J. Klein 和张之翔的意见”,并再次修改了译文。⁵⁹

常常有人把许良英先生的执着误作固执。上面的故事证明,实际上先生是闻过则喜。当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不仅不文过饰非,而且将其公诸于众,其心胸之坦荡,在当今中国学界恐少有出其右者。作为许先生的晚辈和学生,在解决东星北是否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以及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译文问题,这两个疑案的过程中,我不过在先生的直接启发和指导下,做了少量辅助工作,却多次受到先生公开的点名致谢和称许,这使我深受感动!先生以其身教,为我们年轻的一代,在如何正确对待他人的学术帮助方面,也树立了楷模。

最后,我还想再讨论一下爱因斯坦致斯威策的信的译文,并对许先生2005年的译文提出两点商榷。该译文先发表于许良英和王瑞智编的《走近爱因斯坦》(辽宁教育出版社,

⁵⁷ Derek J. de Solla Price, 致 Oppenheimer, 1959年10月30日, AEP, 61-383. Arthur F. Wright 教授曾于1947-1959年间就职于斯坦福大学, 1959年以后则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 他在耶鲁培养的博士生中包括现在世界闻名的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教授。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F._Wright, 2011年10月11日查阅。)

⁵⁸ 胡大年, 致董光璧的信, 1998年12月20日。

⁵⁹ 许良英, 《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 第100页。

2005), 其标题由原来的“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改为“西方科学的基础和古代中国无缘”: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 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我看来, 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首先, 我不同意新标题中的“无缘”二字, 建议将标题改作“爱因斯坦答‘古代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通观该信, 我以为爱因斯坦并未作出“无缘”的判断。这里的关键, 在于如何理解该信的第二段第一句, 即“*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据 Arthur F. Wright 所介绍的斯威策与爱因斯坦通信的缘由, 我们知道该信是探讨“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 (the question of science or no science in China)”。为此, 斯威策应该在他的信中询问过爱因斯坦: “为什么古代中国有灿烂的文明, 却未能孕育(西方)科学?”(当然, 要完全确认这一点, 必须要找到斯威策给爱氏的信。)那么, 当爱因斯坦说“中国的贤哲们未曾迈出这两步”只不过是复述斯威策的问题, 但换了一种说法。因此, 这里并不包含爱因斯坦自己的判断。正如上面 Klein 教授所说, 以爱因斯坦对中国历史的有限了解, 他不会如此重大的学术问题轻率地下结论。我以为, 爱因斯坦在这一句话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即使**“中国的贤哲们未曾迈出这两步”人们也不必感到惊讶,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期待世界上任何人会作出这样的发现。对于中国人是否真的未“迈出这两步”, 爱因斯坦其实并未置可否。另外, 先生用逗号将这一从句分为两段, 也容易使读者产生误解。其次, 新译文中最后一句的意思是正确的, 但似乎尚未把原文的语气完全表达出来。这里的难点, 在于如何翻译“*at all*”。我以为, 《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版中的译文, 只要去掉“在中国”三个字, 即“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了”, 要比新译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更贴近原文。

在先生的译文的基础上, 我不揣冒昧又作了一些调整, 将爱氏的信重新翻译如下:⁶⁰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 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所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 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系统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 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们未曾迈出这两步而感到惊讶。令人惊奇的是人们到底发现了它们。

在我学业成长的关键时期, 能受到许良英先生这样学风严谨、品德高尚的导师指导, 让我受益终生。是他亲手将我领进了爱因斯坦研究和现代物理学史研究的大门。他不仅是我授业之师, 更是做人的表率。在科学史研究领域, 他长期抵制各种不正之学风, 对自己的错误从不文过饰非, 对国内外同行的过失则一贯给予坦诚的批评, 无论其名气有多大、地位有多高。他是名符其实的科学史研究领域的良心。

⁶⁰ 本译文摘自拙著《爱因斯坦在中国》, 第1页, 但对译文中的最后一句又做了修改。

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一生：

怀念许良英老师⁶¹

王作跃

2013年1月28日，中国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我的恩师许良英先生（1920-2013）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消息传来，悲痛不已。尽管从许老师2012年10月底摔了一跤、于12月31日住进了北京海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之后，大家已有一些思想准备，但噩耗的到来，还是令人无法接受。

晚年的许老师身体一直很好，只是有一段时间有点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但后来安装人工心脏起搏器以后，他又恢复到了身心状况俱佳的状态，脑子敏锐，十分健谈。2012年10月份我回国讲学，一下飞机就直奔到许老师家里，给他和师母王来棣看刚在香港出版、他的海内外亲友学生们为庆祝他九十寿辰所写的祝寿文集（《呼唤民主与人权》）。书中的第一篇文章是由他当年在浙江大学的老同学、中国著名冰川学家施雅风先生所写，其标题《许良英：呼唤科学自由民主的大家》，对许老师坎坷的一生、杰出的贡献作出了精辟的总结。

确实，许老师从青年时代就受到爱因斯坦影响，热爱科学。他于1939年到浙大攻读物理，师从物理大师王淦昌，体现了很强的科研能力。但不久他就转而投身革命，担任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1947年后任中共杭州市地下党青委委员，领导杭州市大学和中学的所有党组织，推动民主学生运动，有全国性影响。1956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撰写《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另一浙大同学、好友范岱年合著）阐述百家争鸣方针，1957年却因反对“反右”运动而被打成中科院第一个大右派。此后他回浙江老家当了20年农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持编译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于1976年以后陆续出版，对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尤其是对那一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无数个青年学子科学甚至民主启蒙的读物。

关于《爱因斯坦文集》，许老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主要是科学哲学方面的论述）一出版，就吸引了正在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的胡耀邦的注意。1977年，胡耀邦向人推荐这本书，说里面有些文章他读不懂，但读懂的对他都很有启发。1980年，在胡耀邦倡议下，中共中央书记处请科学家讲授科技知识，第一讲是科学史，许老师参与讲稿的写作。通过对中国和世界近代史、近代科技史的反思，他在讲稿中特意提出“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同时，他在《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这篇著名的论文（《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里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1986年，他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访谈《为“自由”正名》，

⁶¹ 本文内容先前由作者以下列方式发表：《“肩住黑暗的闸门”：我所知道的许良英老师》，载王作跃等编，《呼唤民主与人权：贺许良英先生九十寿辰》（香港：明镜出版社，2012年），115-136页；《许良英：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一生》，《南方周末》，2013年1月31日，D23。在此有少许修改。

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概念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深远的反响。后来他又以敏锐的目光、以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发表《驳民主缓行论》（1988）、《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2）和《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1993）等影响广泛的文章。

多年来，正是许老师对科学、民主、自由的不懈倡导使得他赢得了国内外科学界、知识界的敬重。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授予他“萨哈罗夫奖”。2010年，在庆祝许老师九十寿辰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国际著名物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尔顿（Gerald Holton）曾托我转致他对许老师的问候，说：“像他这样的人，实属罕见：他既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又是一个充满勇气的公民，更是一个堪称为典范的人。”⁶²

对我来讲，许老师不仅是我在国内读物理学史研究生的导师，也是我人生的导师。我永远不会忘记，1986年夏天的一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从中国科学院位于北京西郊玉泉路的研究生院，来到中关村812楼704室，去看望他。在此前不久，我接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的通知，告知我被录取为科学史的博士生，并得到四年的奖学金资助。这次是临行前最后一次看望许老师，具体细节已记不清楚，但许老师讲的一段话却铭记在我心中。他告诉我，他很高兴我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到加大去继续学习，希望我能够在科学史学术研究上作出优秀的成就，并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话来描述他对自己和我们这些学生的期望：“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⁶³而这段话又对应了许老师最喜爱的爱因斯坦对民主社会理想的表述：“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⁶⁴

像无数个同代人一样，我最早是通过爱因斯坦知道许老师的。1978年，我考入新乡师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读物理，第二年是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记得读到报纸上整版的文章，记述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和周培源先生在会上的长篇主题发言（后来才知道该发言稿是周培源先生请许老师帮助起草的）。当时系里也很重视这个机会，开了大会，并有系里的老师做学术报告，介绍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和最新的物理学进展，包括统一场论等。⁶⁵但对我来说，真正接触爱因斯坦，是在此后不久读到赵中立和许良英先生主编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⁶⁶我当时正在上原子物理课，讲到玻尔量子论，说原子内的电子有不同的轨道，一个电子还可以从一个轨道跃迁到另一个轨道，但该电子在两个轨道之间跃迁时，是在干什么，被认为是不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我极大的困惑。读《译文集》时才知道，爱因斯坦当年也对玻尔的量子论存有疑问。尽管爱因斯坦的质疑与我的困惑是完全不同的性质——爱因斯坦是从物理和哲学的深度对玻尔量子论质

⁶² Gerald Holton 致王作跃电子邮件，2010年7月26日。

⁶³ 鲁迅这句话出自他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最初发表在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上，网上版见南方网：<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youth/forerunner/200404280880.htm>，2010年8月察看。

⁶⁴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3页。

⁶⁵ 记得当时新乡师院的院长叫聂补吾，1937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但对狭义相对论一直有兴趣，在新乡的爱因斯坦纪念会上讲话时，说相对论仍然有可商榷的地方。印象中别的物理老师对此并不以为然。只是到了后来，才从许老师的另一个研究生、我的师兄屈傲诚那里听到，聂是在当年中国反对相对论的人里少有的对相对论从科学上质疑的一位。

⁶⁶ 赵中立、许良英编译，《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疑，而我主要是学习这个理论遇到了困难——但当时读到他们之间的争论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解脱，使我意识到量子论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理论。从此我开始萌发对爱因斯坦和物理学史的兴趣，而通过这个《译文集》、阅读《自然辩证法通讯》、以及系里对物理学史、物理学哲学有兴趣的薛晓舟教授的介绍，很快知道许良英先生是国内爱因斯坦和物理学史研究的专家，并开始注意阅读先生在这一段时间所发表的文章。

大概是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开始萌发了要从物理转向物理学史的想法。但具体如何学习物理学史，心里没有数，就想到了许良英先生，决定给他写一封信，请教如何学习物理学史。信写好发给先生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地址。这时我的心情其实很矛盾，一方面觉得像许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不可能给一个本科生回信，另一方面当然又非常希望得到许先生的指教。

当很快就接到许先生的回信时，当时的激动的心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很可惜许先生的这封信到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但信中关于如何学好物理学史的忠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许先生说，要学好物理学史，首先要把两个方面的功课学好，一个是物理学本身，另一个是英文。这段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为我指出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我认为，即使在今天，许先生的这段话，仍然是学习物理学史的最好的建议：学好物理学是研究物理学史的基础，即使是做物理学与社会的外史研究，有与没有一个好的物理学基础，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把英文（或其他外文）学好，就只能局限于中文的文献，不能扩展国际视野，不能与国外同行交流。后来回想起来，许先生这段话不仅告诉了我什么是重要的，也告诉了我什么是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他没有提到马列哲学、或自然辩证法等其他当时的学者一般会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必修课。

在信中，许先生还提到他曾经翻译过一本美国物理学家林赛和玛根瑙所著的《物理学的基础》，认其为学习物理学史难得的好书。⁶⁷可惜，我在新乡师院找不到该中译本，但幸运的是，在学校图书馆居然找到了英文原著，就下功夫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它研读完。结果，正如许先生所讲，我获益匪浅。即使今天，该书仍然不失为学习物理学思想史的一本佳作。对我来讲，研读该书还有一个收获，我的英文大有长进，可谓一举两得，成了回应许先生忠告的好途径。

到了1982年，我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寻找物理学史方面的研究生招考信息，希望在此领域继续学习。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赵中立先生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开办了一个物理学思想史的硕士班，为本校培养师资，并聘请了六个校外的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七人导师小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许良英先生，还有《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范岱年、清华的何成钧、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辽、中国科技大学的方励之、和浙江大学的汪容等教授。看到此招生信息，我就马上积极准备考试。记得考试的科目有物理、哲学、政治、和英文。考试完毕，只有忐忑不安地等着。没想到，居然被录取了，当时的心情只能用“欣喜若狂”来形容了。这意味着我不仅可以继续深造，而且有机会跟随我仰慕已久的许先生学习。

⁶⁷ 林赛和玛根瑙著，许良英译，《物理学的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原版是：Robert B. Lindsay and Henry Margenau, *Foundations of Physics* (New York: Wiley, 1957).

只是到了北京以后才陆续从师兄们那里知道，自己其实险些“落榜”，而且是许先生拍板决定“救”了我。据说，当时物理学史要招三名研究生，报考的有几十个人。最后按考试总分算，有四个考生分数相近且远远超出其他人，而我恰好就是第四名，但与第三名胡新和几乎不相上下（记得第一名是刘兵，第二名是陈恒六）。正在大家为此作难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老师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当年他们也在招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生，专业方向与我们的相近，是物理学哲学，准备招两名，但在他们的考生中，只有一个考的比较好。他们就向赵先生提出，你们在第三、第四名中挑一个，另一个我们要。最后，这个选择给了许先生。据师兄们的说法，许先生说“我要年纪小的那个”。当时我是我们四人中年纪最小的，这样我就幸运的留下来。多年后，我曾经向许老师问起此事，他更正说，他当时考虑到不仅我是最年轻的，而且我在所有考生里物理和英文都考得最好。这段历史，今天回想起来，不仅感激许老师的知遇之恩，而且也为当时的学者们融洽的关系和灵活的做法感叹，不知在今天是否还有可能。⁶⁸

在研究生院与许良英、赵中立等老师学习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兴奋、最愉快、最有收获的一段时光。其间，阅读并和师友们讨论两位老师还有范岱年老师等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是最有意义的活动之一。⁶⁹另外一个难忘的经历是我们三个研究生在许老师、赵老师、和何成钧老师的指导下，分工合作写了一篇关于科学史先驱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生平、思想和影响的论文，在1983年在香山举行的第一届中国科技史学会物理学史分会大会上提交。在所学课程里，许老师教的物理学思想史文献选读给我印象最深。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讨论班的形式。许老师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的原始和研究文献，并鼓励大家讲出自己对文献的总结和看法，从而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正是通过这个讨论班的学习和阅读《爱因斯坦文集》，我选择了量子力学史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领域，最终研究的是1925-1926年间围绕着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等价性问题所发生的争论。经过研究，我得出结论，认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以爱因斯坦和玻尔为首的两派物理学家之间关于因果性等问题所发生的纲领性争论的一部分。

作为我的论文导师，许老师对我从选题到文献研究到论文写作都给与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并借给我他自己收藏的大量的中、英、德文著作供我使用。他并谦虚地告诉我，他自己不是量子力学史的专家，所以要我去请教其他学者，包括中国石油学院的戈革教授、北京大学的胡济民教授、和当时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董光璧老师。后来上述三位老师组成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在答辩会上，戈先生表示不赞同我论文的某些结论，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我的论点，而是根据我所掌握的史料对我的结论作了说明，最后答辩委员会通过了我的论文⁷⁰。记得答辩后去见许老师，他对我敢于与戈先生在答辩会上

⁶⁸ 后来赵中立老师告诉我，如果当时哲学所的承诺有变的话，他是准备争取把我们四人全部招收的。当时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就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隔壁，所以后来胡新和与同学朱约林其实是经常到我们学校，和我们以及另外两位在同一教研室但属于科学哲学专业的徐兰、田云光一起上课的。共同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和志趣使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关于赵老师和许老师的友谊，见柯遵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赵中立先生追思会纪录》，《科学文化评论》，第7卷，2010年第三期。

⁶⁹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979年。

⁷⁰ 值得一提的，戈革先生也并未因为学术分歧而影响我们的个人关系，后来在很多方面给我提供热情帮助。

进行学术辩论表示赞赏。对我来讲，这不过是他一直教导我们要坚持独立思考的一个结果。后来我把论文扩充改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又承许老师悉心阅读提出修改意见，对此我感激不尽。

在研究生院这段时间跟许老师学习到的，不光是学业，更多的是在为人和政治上的理念。正如爱因斯坦在回忆居里夫人时所讲，“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⁷¹所有认识许老师的人都知道，他崇尚理性，疾恶如仇，把求真、诚实看的高于一切，视其为要求自己 and 衡量别人为人和学术研究的准则。从师兄们那里，我们也了解到不少关于许老师早年、尤其是 1957 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回家务农、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坎坷经历，以及他与赵老师、范老师和其他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之间的患难之交，并深为他们的友谊而感动。他关爱学生，与我们诚恳平等相待。每次到他那里交谈，都有如沐春风之感。

许老师并利用一切机会让我们学生参与国际交流以开阔眼界。记得有一年美国物理史家、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许老师的好朋友霍尔顿（Gerald Holton）教授来访，许老师让我陪同去长城游览，从而得益不浅。霍尔顿教授当时评价许老师的一句话到现在还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他越了解许老师，他越觉得许老师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man of integrity”）。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美国科学史家希伯特（Erwin Hiebert）教授访华时，许老师特意安排他与自己的恩师王淦昌先生会面，并带上我们几个研究生一起也见到了王先生。

我们这一届研究生上学的时间，1982-1985，正好是许老师和方励之老师等发动中国民主启蒙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时期，也是极左派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期，所以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在做好科学史学术研究的同时，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的思想解放、政治民主改革，为科学的自由发展扫清障碍。在这方面，许老师在 1981 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所发表的《试论科学与民主的社会功能》对我和很多同代人有极大的影响。⁷²稍后，在八十年代中期，方老师在许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在全国各高校所作的鼓动改革开放的演讲更是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参与改造社会的热情。尽管作为学生，我们能做到的实际工作非常有限，但通过许老师等的言传身教，通过对学术界思想交锋的近距离接触，我们确实学到了很多通过别的渠道所学不到的东西。这些学术和思想上的积累终于在 1986 年所爆发的关于科学与哲学的论战中得到了体现。

正如许老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所讲，这场论战部分起源于我们在许老师家里举行的定期非正式讨论班。这个讨论班可以说是我们在研究生院的物理学史讨论班的继续，参加者除了我们这一届的三个研究生外，还有许老师在自然科学史所招收的研究生熊伟师兄（比我们早一年）和仲维光师弟（比我们晚一年）。1985 年我们这一届三人毕业，我和刘兵留校做教师，恒六去了自然科学史所，但在许老师家的讨论班仍然继续到 1988 年。⁷³我记得 1985 年底或 1986 年初有一天，我和刘兵在研究生院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⁷¹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年，第 339 页。

⁷² 许良英，《试论科学与民主的社会功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 年第 1 期，第 3-6 页。

⁷³ 见许良英致王作跃，1990 年 9 月 15 日，王作跃个人收藏，下同。

哲学研究所的查汝强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二十世纪科学的发展既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同时也说明科学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引。查文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对相对论天体物理宇宙学的某些结论，如宇宙有限无边，进行了批评，还给出了一整套他自己总结出的宇宙总规律。我们曾经上过宇宙学的课，包括方励之老师相关的演讲，觉得查先生的文章显示出他对不少物理概念的理解有误，从而对它们的哲学意义作出了牵强附会的解释。后来在许老师家的讨论班讨论这个文章，大家进一步指出查文代表了一种把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倾向，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如不予以反驳，会助长政治干预科学、重蹈以意识形态限制科学自由探索的覆辙。

在许老师的鼓励下，当时我们五人就决定就该文给《中国社会科学》写一个评论，指出其在科学理解上的错误。记得随后我们在仲维光家里又聚了一次，写出评论的初稿，大家再一起讨论定稿寄出。我还记得在此期间我们在中关村参加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宇宙学的辩论，但遗憾的是，当方励之老师以宇宙学家的代表出席参加辩论时，对方原定的辩论者却临时缺席。等到我们的评论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时，我已经到美国去留学了，但对因我们对查文的质疑所引起的科学哲学的争论仍然进行了跟踪关注。关于这场争论，已有不少研究发表，这里就不赘述，只是转述密勒（H. Lyman Miller）在他的《毛后中国的科学与歧见》（*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里对许老师和这整个争论的高度评价：以许良英为首的科学家和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者代表了一种捍卫科学自主性的努力，对整个八十年代的科学与政治关系的演化有极大的影响⁷⁴。

如前所述，我1986年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留学，是得到了许老师的大力支持。令我欣慰的是，许老师因此与我的美国导师、物理学史家贝旦什（Lawrence Badash）教授也结下了友谊。贝旦什教授在美国致力于核军备控制和维护人权的活动，曾任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圣巴巴拉分会主席，所以也十分敬重许老师在中国推动民主、人权的勇气。在他因患胰腺癌不幸于2010年8月23日突然去世之前，曾托我转达他对许老师的良好祝愿：“我要与大家一起来庆祝许良英教授的九十岁生日，并庆祝他为了把我们的世界建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付出的一生的奉献”⁷⁵。

当贝旦什教授在1988年访华时，受到许老师、范岱年老师和科学史所的李佩珊老师在北京的热情款待，并介绍他认识方励之老师。后来许老师写信给我，说贝旦什教授在北京“大大称赞你一番”，并“感谢我教育和训练了这样一位好学生送给了他们”。许老师然后说，“我并没有对你做什么工作，我所做的仅仅是鼓励和支持你去独立思考”⁷⁶。这当然是许老师谦虚之言，但说明他对独立思考的重视，而这与贝旦什教授的教学风格是一致的。到后来我自己当了教授，才更深切的感受到鼓励和支持学生独立思考确实是教学工作的精髓所在。因此我在讲授现代物理学史，讲到爱因斯坦时，就经常提到许老师的一个精辟的观点：爱因斯坦能够做出巨大的科学成就，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而更多的是因为他坚持独立思考，有很强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⁷⁴ H. Lyman Miller, *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⁷⁵ Lawrence Badash 致 王作跃电子邮件，2010年7月10日。

⁷⁶ 许良英致王作跃，1988年5月22日。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许老师是如何在我留学期间仍然帮助我做研究、并影响我的学术思想的。1994年我与贝旦什教授和我的同学彼得·钮舍（Peter Neushul）到中国调研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尤其是海带养殖历史，在北京再次见到了许老师、范岱年老师和李佩珊老师。当贝旦什教授代表我们给他们每人赠送了一个印有大幅爱因斯坦漫画的体恤衫时，他们几位，尤其是许老师脸上所露出灿烂的、孩子般的笑容是我永远难忘的。在北京期间，许老师介绍我们去采访了几位中国科学家，包括叶笃正和薛攀皋先生。后来我和彼得利用在中国收集到的资料，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海洋学家曾呈奎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文章，其中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科学在专制的制度下也许会得到一时的支持与发展，但长远的看，科学的稳固发展，需要的不光是财政上的支持，更需要一个民主的制度和自由的环境，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稳定。而这个观点的形成一方面是建立在我们的史料研究基础上，一方面也是受到了许老师的思想的影响。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国际科学史杂志《爱西斯》（*Isis*）上，并获得2003年度美国科学史学会的普莱斯-韦伯斯奖（Price-Webster Prize）。这是华人学者和近代中国科学题材第一次获得美国科学史学会的奖项。在获奖感言里，我特意感谢了许老师对我们的帮助和对我的影响⁷⁷。

总的来说，留美以后，我和许老师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书信和我每次回国去看望他时的交谈。例如，1986年底放寒假时，我曾短暂回国，听到中国科技大学和北大等学校的学生，受到方励之老师关于改革开放演讲的鼓舞（尽管方老师不赞成上街），纷纷上街游行反对官倒等腐败现象。当我去看望许老师时，他告诉我他和方老师、刘宾雁正在组织一个“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并送给我一份会议通知书（我现在还珍藏着）。等我回到美国不久，就传来了国内因为学潮罢了保护知识分子的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并把方老师这位当年的内控右派再次开除出党。当时我像很多留美学生一样，对此发展感到不满并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我也担心许老师会受到迫害，但不久就接到他的来信，知道他像以往一样，根本没有考虑个人安危：“这次[被开除党籍的]几个人的名单上没有我，将来总有一天会轮上的。好在我早已有充分思想准备，会泰然处之”⁷⁸。

在这封信和随后的几封信里，许老师提到他发表文章和出国学术访问已经受到限制，但他和师母、中国近代史学家王来棣正在筹划写一本关于科学与民主的专著，并要我帮助他们收集相关的资料。在1988年1月14日的信中，他更是明确指出该书“重点不在科学，而在民主，准备对民主的概念、理论、实际[践？]的历史和现状作比较系统的阐述，特别要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做一个对比，探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出路”⁷⁹。记得这段时间，我在系里上美国史和西方文明史的课并作助教，所以就给许老师提供了一些自己在学习这些科目中的收获，包括英国大宪章的产生背景及其对西方民主发展的巨大贡献。

在我珍藏的许老师来信中，1989年1月5-6日的信是最珍贵的历史史料。在这封长达四页的信中，许老师首先提到我托人带给他的一本爱因斯坦挂历，说“这本由希伯来大学和Einstein档案馆参与编制的有Einstein大幅照片的月历，对我是太珍贵了”。在信中，

⁷⁷ 见王作跃，《学习科学史的心路历程》，《中国科技史杂志》，第26卷，第2期（2005）：176-179。

⁷⁸ 许良英致王作跃，1987年11月11日。

⁷⁹ 许良英致王作跃，1988年1月14日。

许老师讲到最近的一些活动：“今年是五·四七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半月前在自然辩证法常务理事会上，我提出应该隆重纪念这两个节日，开展民主启蒙宣传和学术讨论，吴明瑜、方励之等都赞同。于光远接受我们的意见，要把这作为1989年学会活动的‘主旋律’”。信是1月5日夜写就，第二天，许老师又加了两句：“写好这封信，准备付邮，励之来，给我看他今天写给邓小平的一封信，呼吁为庆祝建国四十年、五·四七十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年，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此信将公开发表，估计会引起舆论界注意”。⁸⁰

众所周知，方老师这封信不仅引起媒体关注，而且对当年的一系列思想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老师自己也联合四十一位其他科学家和学者发表公开信，响应方老师的呼吁，推动国内言论自由、政治民主改革。在1989年4月14日（胡耀邦去世的前夜）给我写的信中，许老师提到这四十二人信，是“1月中旬开始搞的，中间我病了，拖到二月中旬才发出”，并讲到自己“最近已写了四五篇纪念五四和批判新权威主义的文章”。⁸¹ 随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对许老师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深知民主改革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曾经劝说在天安门抗议的学生停止绝食，返回学校，但悲剧发生以后，他严词谴责用暴力压制学生运动。我们大家，包括很多认识许老师的国际科学史同行，都为他的安全担忧，但他一如既往，泰然处之。

大约一年后，许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讲到自己在这段时期的沉重心情，说美国学者送他《爱因斯坦全集》第二卷作为他的七十岁生日礼物，但他“在这个窒息阴霾的日子里，根本没有什么可高兴的，生日也是如此”。许老师尤其抨击当时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压制，提到他的两本书——他的论文集《科学·民主·理性》和与方老师合编的《爱因斯坦研究》第一辑——都被禁，不能出版。⁸²

面对种种阻力和高压，许老师没有屈服，也没有消沉，而是继续致力推动中国的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1989年以后，许老师在人权方面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1995年组织四十五位中国知识分子签署《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回应。即使因此而受到种种打压，许老师决不退缩，继续公开为民主和人权鼓与呼，并得到国际科学界的声援。美国物理学会2008年授予许老师萨哈罗夫人权奖（Sakharov Prize），奖辞称颂此奖给许老师是因为他“一生致力于倡导真理、民主和人权”（“A lifetime’s advocacy of truth,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当年四月份，美国物理学会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举行年会，并举行各个奖项——包括萨哈罗夫奖——的颁奖仪式。许老师因健康原因不能亲往领奖，派大儿子、经济学家许成钢与会代他领奖，并特意邀请我和他在美的另一学生胡大年赴会参与授奖活动。在会上，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美国物理学界乃至国际科学界对许老师致力于科学与人权事业的尊重和敬佩。正巧，在这次大会上许老师的好友霍尔顿教授也被授予派斯物理学史奖（Abraham Pais Prize），而霍尔顿教授在会上会下也一再跟我们讲到他对许老师的敬重。

会议期间，美国物理学会特意安排一个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我做了演讲《爱因斯坦、

⁸⁰许良英致王作跃，1989年1月5-6日。

⁸¹许良英致王作跃，1989年4月14日。

⁸²许良英致王作跃，1990年5月20日。如前述，《科学·民主·理性》后来在香港出版。

萨哈罗夫和许良英：为人权而奋斗的科学家》，介绍他们在实践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捍卫人权上的历史和相互联系。我最后讲到，“给许良英教授颁发萨哈罗夫奖，不仅是对他这样一个在无畏地推动着人权的人，所给与的恰如其分的认可，而且是对所有那些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推动以和平方式进行渐进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推进人权的人们——无论是科学家或非科学家——一个令人振奋的激励”。⁸³

同一年，我发表了根据博士论文扩充和改写的英文专著《在卫星的阴影下：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和冷战中的美国》，并把它题献给我的两个导师，许老师和贝旦什教授。在序言中我提到，在自己的科学史生涯中，“我受益于许良英教授最多，是他把我引向了科学史，给了我支持和鼓励，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以自己对人权的倡导，在如何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方面，给我和其他很多人树立了一个榜样”。⁸⁴

能认识恩师许良英先生、跟随他研习科学史、并在如何做人、如何以各种方式推动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上得到他的教诲和影响，是我一生的荣幸。在我的心目中，许老师，像鲁迅和爱因斯坦一样，真正做到了勇于去肩住黑暗的闸门，为把世界建成一个宽阔光明的地方，为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让我们以许老师为榜样，一起在中国和所有地方来推动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

卓越的科学思想家和当代民主先锋

——悼念许良英先生

周义澄

去年方励之先生逝世以后与许良英先生通过一次电话。结束通话时我请先生多多保重，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再到北京，到中关村那个高楼上拜望老师和师母。许先生知道我在中国领事馆拒绝入境签证的故事，安慰我说有机会的。我多次自问这个愿望是不是一个白日梦，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这个心愿便真的成为不可实现的梦想了。

我一直认为，许良英、方励之二位先生是中国鲜有的爱因斯坦一般的科学思想家，又都是当代民主人权事业的先锋。三十多年来，许先生是我最初学术研究的引路人，是我硕士论文重要的思想启发者，是我博士论文的评阅老师，后来又成了中国民主自由事业中的前辈同道。许先生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盏明灯。

师生情谊始于纪念爱因斯坦

⁸³ Zuoyue Wang, “Einstein, Sakharov, and Xu Liangying: Scientists for Human Rights,” speech at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pril 13, 2008, St. Louis.

⁸⁴ Zuoyue Wang, *In Sputnik's Shadow: 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and Cold War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 xii. 该书中文版于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见王作跃，《美国近现代科技环境政策史研究：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到奥巴马》，《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2月，第7卷第1期，107-114页。

许先生一生研究爱因斯坦，呕心沥血十余年主持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在上一世纪70至80年代，给中国万千大学生、研究生带来了划时代的影响。这套文集也成了我与先生认识的媒介。1979年3月，正值爱因斯坦诞生100周年，我们复旦大学哲学系首届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准备在校内举办爱因斯坦的照片展览，以与北京的纪念活动相呼应。我们的导师陈珪如教授发话称好，哲学系领导拨出经费，自然辩证法教研室老师大力支持，我的老娘家新闻系也将摄影教研室的全套暗房设备提供我随时使用。我写信与许先生联络，先生非常高兴，给我寄来了一些照片，包括在他和赵中立编译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中刊用的照片。我也将自己在其他中外书刊上收集翻摄到的爱因斯坦的照片寄了一套给许先生。3月14日前后，我们在复旦大学“南京路”展出了爱因斯坦生平的数十幅照片，全面介绍和高度评价了这位人类历史上的巨星、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大字报”栏前人头攒动，校园里激起了小小的浪花。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掌权者的宣传机构对爱因斯坦展开了历时多年的大批判，政治上谩骂爱因斯坦是美帝侵略野心的辩护士，哲学和科学上攻击相对论是反动黑旗。在这场批判运动中，上海是重要基地，以复旦大学为中心的上海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笔名“李柯”）及《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杂志充当了急先锋，他们还窃用了许先生的编译资料。对此先生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对我说，在复旦举办爱因斯坦的纪念活动具有特别的意义。之后先生又担任了由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物理系联合招生的物理学史专业（设在复旦物理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他在复旦的研究生屈傲诚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文革中批判爱因斯坦的历史研究。⁸⁵

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争议

许先生为爱因斯坦在中国的不公平遭遇拨乱反正，更重要的是把科学家的卓越思想和价值观广为传播。我读文集，常被爱因斯坦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品格深深吸引。爱因斯坦对学术自由（发表自由）的张扬，对民主制度的追求，对社会主义的评论以及对计划经济“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和“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的警告，简直振聋发聩。

刚从文化革命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学术界在政治上为爱因斯坦平反尚显大度，在哲学思想的评价上则小心翼翼。许先生在他的论文《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见解》中大胆地为爱因斯坦摘去了唯心主义、马赫主义的帽子，认为其主导的哲学思想是自然科学唯物论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的结合，即唯理论的唯物论。同时又延续以往的评论说爱因斯坦不懂辩证法，“祇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无可奈何地摇摆”（《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372-377页）。平心而论，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先生把爱因斯坦拉到唯物主义的队伍中来已经很不容易。不过我思索的却是：伟大的科学成就不会来自平庸的哲学思想。爱因斯坦在创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过程中深刻的批判态度，思想实验中高度的洞察力和探索精神，显示了出色的思维方式。他的科学思想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资源。依据《爱因斯坦文集》（那时第三卷尚未出版）和国外的一些书刊资料，包括前苏联学术界关于爱因斯坦的研究成果，在纪念爱因斯坦的图片展览之后，我着手写作了研究生时期的第一篇专业论文：“试论爱

⁸⁵ 见本文集屈傲诚：《桃李无言报春晖》，编者注。

因斯坦的辩证法”，提出“爱因斯坦在他的科学研究领域之中，在他的专业范围里，确实有辩证唯物主义，有自然辩证法”。我将文章寄给许老师请求指正。老师回信称文章说理清楚，但是，“爱因斯坦有自然辩证法”这个结论他不同意，希望我仔细斟酌。先生还决定将我的文章交给他的研究生们传阅。

我的论文还涉及到爱因斯坦的另一桩公案。1924年，爱德华·伯恩斯坦把藏匿多年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请他就书稿可否出版发表意见。爱因斯坦的意见是：“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02-203页）文化革命大批判曾经以此指控爱因斯坦“蔑视辩证法”，并以恩格斯“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断语宣判爱因斯坦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文集编译者在脚注中则严肃批评爱因斯坦的“无知”和“偏见”，为反共份子攻击马克思主义提供材料。许先生在后来的文章中也依然表示爱因斯坦对恩格斯手稿的伟大价值采取“轻率的否定态度”“令人惋惜”（《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见解》）。我在论文中提到了苏联科学院院士凯德洛夫的研究结果：伯恩斯坦只给爱因斯坦看了恩格斯关于物理学方面的文章，没有让他读到全部手稿，这是爱因斯坦没有做出准确评判的一个原因。而我为爱因斯坦所作的辩解是，他的评价主要是从物理学和物理学史方面说的，并没有否定作为一本书，作为一个学说和一种哲学的“自然辩证法”。我自知这种辩解有点苍白无力。但是我接着说，爱因斯坦不是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没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必把他对《自然辩证法》的态度看得那么大逆不道，充其量只是一个非无产阶级自然科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表了一些评价不高的意见而已（周义澄：“试论爱因斯坦的辩证法”，《大学生》杂志，复旦大学出版，1979年第2期）。许先生觉得这样的说法可以接受，但恩格斯著作的价值不可低估。

《爱因斯坦文集》主体完稿于文化革命之中，编译者的某些政治表态可以理解。还应当承认，即使在文革结束之后的社会环境下，无论是许先生还是我本人，思考和表达的基本框架还是传统的唯心—唯物，形而上学—辩证法僵硬的两分法；而且总要把列宁或恩格斯的话抬出来作论据。作为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如许先生的门生仲维光所说，那时候的许良英可谓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捍卫者”（仲维光：“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份子研究”，1991年）。先生自己也说，凡是他认为损害马克思主义声誉和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东西，都无法容忍。在多年后的论文中，直到1996年发表的《爱因斯坦评传》，先生对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总体评价没有改变，但是完全取消了对爱因斯坦“不懂辩证法”的批评。在新版《爱因斯坦文集》中也删除了对爱因斯坦关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态度的指责，删除了对现代宇宙学研究的否定。经历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许先生专门写文章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文集中的错误是“反科学的时代污染”，是对爱因斯坦的亵渎。先生说，迷信是真理的大敌，必须用科学和民主来破除；破除由忠诚所支持的迷信，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爱因斯坦文集》中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1988年8月28日《科技日报》）。先生自省精神之深刻可见一斑。

研究生初期真是一个值得回首的开放年代，在党委书记夏征农和校长苏步青的支持

下，民办《大学生》杂志由复旦大学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编辑出版，我担任编委，关于爱因斯坦的论文发表在《大学生》杂志的“学术与研究”栏目中。许先生曾经在信中对这个杂志大加鼓励，说：“《大学生》编得很活泼，可以帮助青年同志活跃思想，开阔眼界，青年同学们的确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园地。”

科学直觉研究的学术请教

1980年我去北京，为硕士学位论文作学术调查，拜访了许良英先生，记得先生当时住在一个宾馆里。我选择的论文题目是直觉在科学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爱因斯坦的一生中，关于科学直觉的谈话和文字很多。说起 *Intuition*，许先生非常熟悉，觉得这个选题有新意，但也有难度，有风险，因为直觉在传统哲学中往往是和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我还专门与先生讨论了1952年5月爱因斯坦在给好友索洛文的信中提出的思维与经验的关系图式。虽然这是第一次见面，可是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有人说许先生很凶，其实他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我好奇地了解了先生以往经历中的一些细节。先生也关切地问了我的大学背景。他认为新闻系本科出身可能在思考和文字表达上功夫比较好，但是与来自物理系、数学系的理科毕业生比较，要研究科学哲学，在实证科学基础上明显有短处。要设法寻找至少一门学科的专业依托。先生的忠告，我铭记一生。我决定在认知心理学上多下苦功。

北京访问归来遇到新闻系董荣华老师，他是我大学时代的班主任，此时正主管校刊。听我介绍了许良英的跌宕经历，董老师命我马上写一篇人物通讯，登在《复旦校刊》上。于是这位物理大师王淦昌的高足，早年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发配到浙江老家当农民的右派份子，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许良英传奇般的人生一时成了复旦校园少男少女们谈论的话题。我把《复旦校刊》给许先生寄去，并对文章发表前未及送先生过目表示抱歉。许先生不高兴了，说他不喜欢“吹捧”文章，中国的吹捧文章太多。我对先生的谦逊心怀敬意，但是并不赞同这个意见。我以为中国多的是对权贵的吹捧，缺的是对社会底层仁人义士的颂扬，尤其是像许先生那样被打入另册的右派份子，从来得不到社会公正的评论。现在一想起自己撰写了中国大地上第一篇介绍许良英先生的文章——还不免有几分骄傲。

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会议上

1986年12月中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于光远当选为理事长，为劝阻学生上街坐镇科大因而不能来京的方励之被选为副理事长，许先生是常务理事，我作为小字辈被选为新科理事。研究会的工作人员私下告诉我，许良英和另一位老同志极力推荐我为新一届理事候选人。我将感激之情放在心底：先生还是我的博士论文的评阅人之一，我的导师胡曲园教授对我说过，许先生是在北京的评阅人中最早将评审意见寄来的一位，而且评语写得很好。会议期间，我将刚刚出版的《科学创造与直觉》一书送给许先生，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我对许先生的帮助表示了感谢。

在一次分组会议上我作了一个发言，建议中央主管理论的领导（我点名胡乔木同志）通读已经出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我说通读马恩全集是我们这些研究生的基本功，文革之后出版的第40至50卷包含有马恩极其丰富的理论精华。而胡乔木关于人

道主义和异化的那个小册子，尽管引用了 20 多条马恩语录，但看得出作者似乎没有好好读过全集的后 11 卷（我假定胡乔木在文革结束前像许良英那样已经通读过前 39 卷）。比如对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很重视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胡的小册子似乎不屑一顾。当然领导同志日理万机，国家大事十分繁忙，600 万字没有几个月是读不下来的，但是，不读好马恩的书，要做好理论领导恐怕有困难。根据我的接触，像薛德震（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这些前辈对马恩著作都很熟悉。我刚说完，许先生马上开口：“我完全同意周义澄同志的发言”。

会议期间，许先生还问起我三年前的桂林会议事件，因为他也听说与会的北京某教授向邓办（究竟是邓力群办公室还是邓小平办公室一直没搞清楚）密报了复旦大学几位研究生的出格言论，先生对“老师出卖学生”特别气愤。1983 年 6 月，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其他几个单位在广西桂林举办了“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讨论会。复旦哲学系的六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在会上作了“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的联合发言，提出要重视现代认知科学的新成就，包括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的发生认识论，重视当代自然科学提出的认识论问题以及真理的多元性等等。我们游山玩水回到学校之后不久，党委就找我们，要我们谈认识，作检讨。10 月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校内风声鹤唳，说桂林会议事件已被列为上海清除污染的重点。小道消息还说这些研究生可能无法毕业；而我当时已经是教师身份（1981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为在职博士研究生），处分可能更严重。好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原校党委书记夏征农历来开明，主管此事的党委办公室主任盛善珠女士菩萨心肠，哲学系领导息事宁人，主要是后来全国政治大天气多云转晴，我们才逃过一劫。事件全部经过，我对先生如实相告。至于那位教授是否密报，无从查起。我告诉先生，在 1984 年 8 月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上，龚育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向李继宗老师（复旦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桂林会议的筹备者和参加者）详细了解了桂林会议的整个过程。许先生关怀年轻学生，如同他的孩子一般，事隔多年，他还将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想起这些，我们这些后辈无任感激。

皮亚杰与爱因斯坦学术交往的疑问

1987 年夏天，我到北京准备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八届国际逻辑学科学哲学方法论会议，一日下午来到中关村先生住处，提出了长期存放在心中的一个疑问，那就是爱因斯坦与认知心理学大师皮亚杰之间的学术交往。皮亚杰对现代心理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最早介绍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主任左任侠教授，他是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皮亚杰与爱因斯坦这两位科学大家一生中有两次重要交往。1928 年他们在一个会议上相遇，爱因斯坦向皮亚杰建议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儿童关于时间、速度的知觉及概念的形成，尤其是同时性概念如何形成。这是爱因斯坦长期思考的问题。在经典力学中，时间是一个比较直接初级的概念，速度由时间来定义；而在相对论中，时间和速度相互定义，速度用时间、空间去说明，时间又靠速度来度量，不存在哪个概念更基础；速度又影响时空（尺短钟慢），概念上有困惑。皮亚杰接受爱因斯坦的建议，研究儿童的时间、运动、速度以及空间概念的形成达 20 年之久。皮亚杰的研究表明，最原始的直觉是追越的、快慢的直觉，而后是不同物体同时性的直觉，最后有速度

的直觉，这就从心理学上支持了相对论的理论基础。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前不久，皮亚杰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住了三个月，应爱因斯坦要求介绍了儿童各种守恒概念形成的实验结果。爱因斯坦因此感叹，心理学比物理学困难得多。这两个重大事件，我在《科学创造与直觉》一书中已有说明，资料来源是皮亚杰认知心理学论著的一些中译本。可是《爱因斯坦文集》似乎遗缺了对两位大师重要交往的介绍，在爱因斯坦生平活动年表中也没有明确记载。年表中提到了1928年爱因斯坦去瑞士达沃斯（Davos）疗养并讲学，文集也刊登了爱因斯坦当时所作的演讲稿“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最近的变化”，其中有现代场论对传统的时间、空间和物质概念的动摇，流行的因果性理论不能解释物理学中出现的物质新特性等说法，可以说这从侧面印证了两人的第一次交往（当时皮亚杰在瑞士日内瓦教书研究）。我向先生提出了这个疑问，先生说要查对有关原始文献。

我们的话题为那天方励之突破“警卫保护”光临许宅而打断。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再向先生请教。

《北京之春》的重要作者，中国当代民主事业的先锋

1989年之后，生活的波涛将我推到大洋彼岸，我在美国担任《中国之春》、《北京之春》杂志的编辑。从对共产党的迷信中彻底解脱出来的许先生，此时也以更加鲜明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民间政治舞台上。我与先生的关系，演变成为海外民主运动刊物的编辑与作者的关系，真是历史的有趣安排。

多年失却联系的许先生起初不知道我在《北京之春》，其文章大多交给他最信任的方励之转发。1995年2月号《北京之春》刊出的“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一文，就是方先生转来的许良英为美国科学协进会准备的发言稿。1996年11月，我又收到方先生的信，其中附有许先生的最新文章“为王丹辩护”，许先生说“交适当刊物发表”，方先生就把文章送到了我这里。那年10月王丹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许良英拍案而起，对中共当局施加的莫须有罪名严加批驳。先生说自己被青年善良纯真的心感动得老泪纵横，我读着文章也感叹万分。我拨通了先生的电话，告诉他我在《北京之春》担任编辑，亚衣是我的笔名，正在处理先生为王丹辩护的大作。先生马上说，你是新闻系毕业的嘛，这是你的本行。老先生的记忆力叫我佩服。这些年来先生在《北京之春》上发表的文章有十多篇，其中“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段回忆和思考”（1997年）、“中国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1998）、“《六四真相》掩盖了核心真相”（2003年）、“爱因斯坦奇迹年探源”（2005年）、“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2007年）等，在海外民主运动中都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许先生年事日高，对民主事业的热情不减。我曾经和朋友说，许良英简直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早在1986年，许良英领头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1988年参与北大“草地沙龙”演讲；1989年1月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2月许良英发起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42人联名信；1994年3月联络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发表了《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刊登在《纽约时报》上；1995年4月又起草《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许先生因此获得了1995年美国纽约科学院的海因茨·佩格尔斯（Heinz R Pagels）科学家人权奖和2008年美国

物理学会向“为人权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颁发的安德烈·萨哈洛夫（Андрейд Сахаров）奖。可以说，许先生早期在文章中极力推崇的爱因斯坦的社会责任感，晚年成了他为建立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内容，《北京之春》杂志忠实地记录了先生的活动足迹。

2005年6月初在香港，我在老朋友朱杏清的办公室给许先生打电话，告诉他香港夏菲尔公司出版了我的《流亡者访谈录》，想寄一本给他，不知是否能够收到。先生要我寄信人和收信人均用英文书写，说这样比较容易收到。我问先生电话是否安全，先生说24小时被监听。我说那你的这个办法不是让他们知道了？于是我在话筒里大声说，监听电话的女士先生们，你们辛苦了，我是许良英先生的学生，现在有一本书要寄给老师，请你们帮忙送到，不要中途拦截，如果你们要看，我可以再送一本给你们，谢谢。许先生听完哈哈大笑，说这样更加收不到了。果然先生一直没有收到这本书，我在美国又寄过一次，也没收到。

回想起先生的音容笑貌，总是那样光灿照人。他有一颗真诚的心。先生嫉恶如仇，在科学哲学界与同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的何祚麻这类棍子式人物坚持论战几十年；对钱学森、李泽厚等的伪科学、伪民主，批评毫不留情；对那些生活在西方现代社会，却依恋东方愚昧，满脑子权欲私利的民运人士深表失望。刘宾雁本是同道，先生还是直言反对“第二种忠诚”。我问先生，你为王丹辩护，文章里为什么还写了他那么多缺点？先生说，王丹是他所见天安门学生领袖中最优秀的一个。1998年采访王丹，对先生满怀敬意的王丹告诉我，许先生从来不勉强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亚衣：《流亡者访谈录》，81页）。

晚年先生视力不好，但是思维依然敏捷，反应仍旧迅速。在方励之先生去世之后与许先生的那次通话中，我提到了与方先生对知识份子独立性的讨论。我说方先生认为中国根本没有知识份子，许先生马上说，这个我不同意，中国没有知识份子，那我们这些人算什么？是文盲？——当时我就想，天底下也许没有再比先生更直率的人了。直率后面是人的真诚。今天，这种真诚似乎已经在国人的本性中退化。多少年之后，人间或许再也看不到这类真诚。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这是爱因斯坦说过的话。方励之和许良英两位先生相继去世，使我失去了这样的师长朋友，想起他们，无边的孤独便深深地折磨着我。

（2013年2月5日于美国）香港《前哨》杂志2013年3月号

悼念许良英先生

李彤宇

今天收到导师李醒民先生的邮件，说许良英先生故去。见此消息心中顿生悲戚，所

以如此不仅仅因为中国又失去了一位敢说真话、有风骨、有见地的思想家，还在于我与许先生曾有过近距离的“交流”。近距离的“交流”就是在北京读博士期间，曾四次到访许先生家。先生的和善、睿智、率直让我至今难忘。这里纪念许先生不去进行宏大的评介，我无此资格、亦无此能力，只是想通过回忆四次到访许先生家，以寄哀思。

第一次是在李老师带领下和同门师兄妹去的，时间是2007年11月15日。至今已近六年，时间记得如此真切，需要做个说明。这一年9月我去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师从李老师读博。李老师每月都要召集学生“论道”，10月份的一次“论道”当中谈到要带我们去探望许先生。老师回忆1978年报考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导师是于光远先生，于先生太忙了，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就让许先生来指导（关于这一情况参见李醒民《在思想解放的漩涡中——我的硕士论文的写作经过和多舛命运》），并谈到许先生的指导影响至深。我当时不知道许良英何许人？回去上网一查，才知道是大师级人物，当然也期待一睹先生的风采。11月15日下午5时，在老师带领下一行六人从玉泉校区出发到中关村许先生家。到了按门铃，一位老者开门，形象定格在我的大脑中，高个、较瘦、背稍弯、银发向上直、满是皱纹的脸、带眼镜、精神矍铄。后面还有一位老者，是许先生的夫人，后来知道叫王来棣，中国现代史学家。进到先生的书房中，最醒目的是墙上挂的爱因斯坦晚年像，深邃的目光注视好像着这个空间中的每一个人。先生早就准备好椅子，落座后李老师向先生夫介绍了我们几个，接着就畅谈起来，现在想来大致就是李老师问候许先生夫妇的身体，回忆八十年代工作时的情形。许先生当时已87岁，思维敏捷，说话方言较浓，初听时需仔细辨别。许先生谈到他在写一个自传性的东西，并将写成的部分让我们带回去看。聊了大约一小时，一起合影留念，我们起身告别。许先生坚持要送我们到电梯，和善、睿智的87岁老者又一次在我的大脑中定格。

第二次是2009年，想来应该是4月份，哪天记不清了。这次是我独自访谈许先生。这里要交待一下背景。我博士论文是《八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哲学与思想解放》，这是一项浩大工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访谈学术界和思想界重要人物，许先生当然是其中之一。和先生事先预约，先生听了我的想法后欣然答应，告诉我中午要休息，午后2:30可过来。我按时到达，先生亲自开门，引我到书房。落座后我详细地谈了我的想法和工作进展，先生听过后从书柜里拿出已经准备好的三本书。一本是英文原版《科学与异议》，这是该书作者送给许先生的，书上有赠言；一本是王作跃（许先生的学生）用英文写的关于中国留美学生的科技史著作，是王作跃送给自己老师的；还有一本是许先生自己的一个文集，是台湾的一个出版社出的。接着就和许先生聊起来，许先生没谈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有些东西公开的资料较多，可以去找。交谈着重回顾了自然辩证法的源起，回顾了五十年代（20世纪）中期他与于光远就自然科学和哲学中间这门哲学性质的学科的名称有过激烈的争论，是叫自然辩证法还是叫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二人意见不同，后来暂名为“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聊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看到许先生显出倦意，我起身请求和许先生合影，在爱因斯坦像下留念，然后告辞。先生坚持送我到电梯口。

第三次时间大约是2010年3月，我记得是刚开学去北京，天气还不是很暖和。这次还是李老师带着我们几个一起去的，去看望许先生并祝老人九秩。我们去时买了鲜花，

一行到了许先生家。先生还是到门口接，引到书房落座，王老师也从房间出来和我们一起座。李老师问候了许先生和王老师身体，先生回答还可以，只是心脏有点小问题；王老师患鼻癌，已做过手术，还在休养。细想起来有两件事印象很深，一件事是谈论当时社会上左的言论有很大影响，另一件事是当时讨论的很热的普世价值问题。印象深是因为在谈论中我震惊于先生以 90 高龄对现实问题如此敏感，和外界联系如此密切，思路和表达如此清晰。后来了解到，先生还就普世价值发表过反响甚大的文章。在交谈中还有一个细节，我来的时候带来先生上次借给我的合影的照片。先生看到那本英文版的《科学与异议》很是惊奇，说这两天一直在找这本书，大家都笑了，先生已忘记把书借给我了。一起愉快地聊了约一个小时，我们起身，先生还是坚持送到电梯口。

第四次是大约是 2011 年 5 月，好象是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情况是这样的，1989 年是五四运动 70 周年，当时社会各界都搞纪念活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召集自然辩证法界学者，讨论科学民主纪念五四，其中有许先生夫妇。讨论会后发言要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 年第 3 期出版，就在校样已出，准备印刷的时候，政治风波爆发，稿子撤下来。这件事情的口述者是李老师，李老师当时是编辑部主任，这件事情也是他处理的。在事情发生 20 多年后，李老师在给我们解疑时（大约 2010）说了这件事，后来又把当年发言的文本给我，我在博士论文中用到这一珍贵的资料。2011 年 5 月论文答辩后，李老师要我把资料复印件送给许先生（上面有许先生夫妇的文章）。我记得是中午拿过去的，许先生开门，我把资料送到先生书房。王老师正在书房座着，好象身体不太好感冒的样子。那天可能保姆不在，许先生到厨房给老伴准备午饭。这次没太多停留，资料送到，说明情况后即告辞。出来后，回思良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两位诺大年纪老人相依生活的场景永铭脑际！

斯人去矣，晚辈后学忆缀点滴，以为念！

（写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

怀念许良英先生

谈庆明

我最早知道许良英这个名字是在 1957 年，听说他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号右派分子，当时并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文革以后才逐渐地对许先生有所了解。先是从朱兆祥先生那里知道，朱、许两位都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员。到了 1989 年和 1995 年，朱先生两次对我愤慨地说起“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给上级组织写信也不行”的事。这两次写信，都是许先生发动起草，请他们老师王淦昌先生领衔给中共中央的上书，其一是在 1989 年，由王淦昌、施雅风等 42 人签名，呼吁中央推进政治民主化；其二是 1995 年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全世界上千著名科学家，包括国内数十名院士和著名知识分子、国际上十名诺贝尔奖得主联署。

再就是，我在多次和李佩珊（生物学史家，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编者注）先生交谈中，知道她从1978年起开始和许先生亲密合作。李先生非常敬重许先生，常常和我谈起他们对科技史的研究情况。譬如，她对我说过，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学术民主”的说法不对，只能说“学术自由”。这种提法真是精辟透彻，使我恍然大悟！

1989年学潮被镇压以后，中关村里进驻部队，许先生和方励之两家被警察围堵，电话被窃听。上面不敢抓捕许先生，因为许先生的言行都遵循党章国法。此后若干年，每逢六四，上面都会特别“照顾”许先生，请他离开北京，出去旅游。

李佩（郭永怀夫人，李佩珊的姐姐，编者注）先生曾经为中关村离退休人员举办报告和座谈会，有好几次会议的内容是回顾中国科学院的早年活动，每次都要请许先生到会参与回顾。许先生的讲话简练深刻，对我们后来人颇多启发。

新世纪开始，上面对许先生的关注开始松动，我便登门拜访请教。后来，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去问候他和王来棣先生。有时候我会带着问题去请教，更多的时候，则是把我的见闻说给他们两位听，许先生常常给以评论。有时，他会笑笑说，喔！挺有意思。有时，则面孔笔板，毫不客气地严厉批评。

我的脑海中，回忆起有这样几件事：

第一次见面，我自报来历。他反应很快，说我大概就是李佩珊跟我说起过的，力学所里有一位很有思想的人吧。

我们说起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他告诉我，他是怎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原来，他在整风运动以前，一直是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到了反右开始，他不相信反右是毛泽东发动的，而是认为毛要整风，下面的人不愿意，背着毛泽东发动了反右。由于许先生“猖狂反对反右运动”，因此被打成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号右派分子。

随后，要送他去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他拒绝去，并引用毛泽东说的话，右派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该去劳动改造。于是他自动辞职，回浙江老家农村务农二十年。

他知道我是苏州人，北京大学毕业。他对我说，我们中间（包括他自己）最早觉悟的是我的老乡和同学——林昭，并且送给我一张光盘，胡杰自费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从此，我才得知我们中间有林昭这样一位中国当代史中最为可歌可泣的英雄女儿。

许先生对我说，他觉悟得比林昭晚。林昭自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就在改造期间专门研究马恩列斯毛，特别是在上海监狱里，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血书）中，已经揭露和控诉我们这个社会是“极权”社会；许先生则是在1974年，经历和体验了江青和毛泽东导演的“批林批孔”以后，才开始破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

开始，我们讨论科学和科学史比较多。我给他说起，有一句名言称“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认为，这种提法不仅不科学，而且否定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三个概念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三者之间不能

用“是”字来划等号的。我认为正确的提法是：人是生产力，各行各业中有良知的专家才是第一生产力。许先生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后来我发现，许先生在他1989年发表的“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一文中，就说过：“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用科学来改造社会，用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来更新旧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对科学和现代化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决不应该只见物而不见人，舍本求末必然劳而无功”；“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是不对的，“科学是人类关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它的着眼点在求得自然规律的‘知’，这种‘知’有一部分可用于生产，即为‘用’。……而‘用’的方法和诀窍，就统称为技术。”

许先生经常给我介绍他和一些老的知识分子革命家之间的交流。他从1998年起，他和李慎之先生开始书信来往，他们两人逐渐形成莫逆之交。我对他的介绍饶有兴趣，许先生就送给我由他编写出版的他与李慎之的《八十三封书信》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收获非常大。我从中读懂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演化轨迹：他们一开始是怎样追随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在建立“新中国”以后又怎样经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痛苦的反思，觉悟到过去所参与的暴力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错误的；终于认识到，当前需要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而首要的任务是解放思想，推进从上到下的思想启蒙，首先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启蒙。

有一阵子，社会上揭露了上层知识分子中曾经有过“卧底”和“告密”的事。因为涉及知名人士，有人不相信会有此类事情发生。为了求个水落石出，我直接请问了做人做事绝对认真的当事人许良英先生。许先生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方励之和刘宾雁到他家里来商量筹备反右30周年座谈会，以及后来那位知名人士告密的事情经过。这类事情也充分说明，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的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知识分子被政治运动吓怕了，夹着尾巴做人；也有少部分人的精神被严重扭曲，甚至做了卖身求荣的事。可见当今启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有一次，我们请到谢韬来做有关社会民主主义的报告，也请了许先生来参加。当谢韬说到，马恩晚期也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许先生当即指出谢韬的某一引证缺乏依据，并引出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马恩晚期并没有放弃武装夺取政权，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贯主张。许先生说：1875年，李卜克内西与拉萨尔派代表一道起草《哥达纲领》。这个《哥达纲领》，遭到马、恩严厉批判。恩格斯在看到这个纲领草案8天后的1875年3月18日给倍倍尔的长信中说，这个“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批判的，……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信中有一段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分重要的话：“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马恩全集》19卷，7页）意思是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谈自由。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是以此为经典发挥而成的。

又有一次，我们请到李锐和杨继绳来做报告，也请了许先生和夫人王来棣先生参加。李锐和杨继绳的报告非常精彩。杨继绳还特别为今后政治改革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三步路线图：1.执政党内不同的观点应当公开；2.执政党内要明确“游戏规则”；3.将民主法治

推向全社会。因为不少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赶来参加这次会议，会后我们特地摄影留念。

当前大家最关心的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上民主法治。社会上有三种时间估计，短的 20 年，中的 30-50 年，长的还得一个世纪。我问许先生怎么看？他认为黑暗的时期不会太长。他反问我，你回忆一下你们北大的情况，在 1989 年 3 月份时北大是什么样子的？两个月以后的 5 月又变得什么样子？随着社会的发展，矛盾的积累，群众的觉悟越来越高，平时在不断蓄积着能量，一旦起来，变化也快。许先生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啊！”这句话概括了许先生一辈子追求的“民主和科学”的真理！

我最后一次见到许先生，是在 2012 年 11 月上旬。那次去，许先生告诉我，他不小心摔了一跤，他指着他的头说，缝了三针。我真为他担心，怕他伤及脑子。看到他还是那么敏捷，我就放心了，只是劝许先生今后走路要特别小心。那天使我不放心的倒是王来棣先生，她坐在躺椅上，身上盖着毯子，说话声音比过去弱得多。我也不好意思细问她，怕刺激她。我心里却担心着，别是癌症转移到了晚期吧。到了今年元旦假期，再去探望他们，按了门铃却无答复，再去还是没人。后来，才听说，王先生已经在 12 月 31 日去世，而许先生也因脑溢血住进海淀医院重症监护室。从此再也见不到这样两位可敬可亲的导师了。我相信，他们两位的品格、思想和精神将会传承下去。

2013-2-10

明时不作弥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我对许良英教授的回忆

吴水清

听到许良英教授逝世的消息，我很悲痛，那还是蒋春暄教授告诉我的，他还发来网上有关许良英教授的报道[1]，使我沉醉在往日与他往来的林林总总的回忆中……。

1，最先认识他的是王淦昌送我的那本书[2]

由于自己由电化学方向转向科学史方向，我离开《现代物理知识》主编岗位后，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申请到一个课题组，专门调研科学家与科学史的重大事件，正好由王淦昌院士送我一本《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我反复阅读，对于这本书主编之一的许良英教授，有了初步的印象，再加上王淦昌院士的介绍，我更加尊敬这位一生坎坷、学富五车的长者。

在他被贬到故乡农村后，还在翻译《爱因斯坦文集》，生活极其贫困，王淦昌院士知道了，化名王京每月按时寄 30 元生活费，还千方百计为他联系工作。当时王老在国家最保密的部门工作，从事核弹研究。

许良英教授以顺利出版《爱因斯坦文集》，以感谢恩师非同寻常的关爱，多少年后与王淦昌院士询问此事，他只是付之一笑，让我感染到那一代师生友谊的特别意义，令

我有高山仰止的感叹。

2. 与许良英教授邂逅在王淦昌院士病房

那是1998年11月9日，我自己去北京医院看望王淦昌院士，正好许良英教授也在门口登记处，他用手猛然推我一把，我回头一看，是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我马上退到一边，让他先登记，让他先进去。过后，我也到王淦昌院士病房，才知道他也是看望王老的，彼此一笑，也就消去了刚刚的误解。王老伸出手来，笑着指我说，他就是《现代物理知识》主编吴水清，我恭敬地向他问候。

那天王老问起1942年文章，许良英教授在后来寄给我的文章中谈到他所记忆的历史事实。[3]——

我告诉先生，1942年4月先生指定我做毕业论文时讲过这封信的内容，但未见过这封信的原件。我是1945年回浙江大学后从1942年《物理学评论》的缩微胶卷上才读到信的全文的。先生一向全力注视物理学前沿，而又虚怀若谷，不愿炫耀自己过去的成就，也不注意保存自己的历史资料，这封信的原件很可能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给别人看过。我们的谈话超过了护士允许的5分钟，她进行了干预，先生也已显得很累，握住了我的手，要我以后再后来。

应该说这是物理学历史最重要的一幕，有关王淦昌院士的1942年那封信和发表的文章，被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称为“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是“一篇极有创造性的文章”，被称为1942年最重要的物理学事件。[4][5]

在许良英教授的提议下，用他的照相机，请王淦昌之子王德基照像，留下我陪同许良英教授看望病中王淦昌院士的历史照片。后来，许良英教授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方守贤院士，将那张珍贵的照片洗好带给我，如今这张照片成为我回忆他的历史文献了，如今大有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叹了。

3. 我的《追求卓越——王淦昌年表》竟提到他19次

王淦昌院士走后不到一年，在他逝世周年的中国物理学会纪念会议上，我向与会者方守贤院士等赠送我的《追求卓越——王淦昌年表》，[6]感慨万千，如今却要纪念他的学生离世了，我是悲愤交加的。

匆匆翻阅我纪念王老的书，竟然19次提到许良英教授，分布在第30，33，34，41，46，48，67，110，113，168，204，213，244，255，257，261，262，288，291页。在这些文字中，倾注了我对于许良英教授的尊敬、钦佩和仰慕，也刻骨铭心地彰显了许良英教授对于他的恩师王淦昌院士的怀念、崇拜和敬意。

在字里行间里，表达了王老请“导生”吃饭、“共享人间温暖”的师生情；也历史地称赞当年王淦昌院士和他学生进行最前沿科学研究的奋斗乐趣和无奈；

记述了王老千方百计打听参加革命的许良英下落、登报寻学生后迎接他归来的激动人心的情景；也回忆了王淦昌院士应学生许良英教授之邀，在《科学通报》发表世界原

子核物理学发展历史评论的积极意义；

报道许良英教授被摘去右派帽子后，王淦昌院士称他为同志的感染人的场面；也记录了王淦昌院士就“相对论批判”的反批判问题，致信许良英教授而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一些反科学的混蛋，给以致命的打击”；

记载许良英教授探视师母病情又闻师母辞世的悲切情景；也反映王淦昌院士最后岁月在北京医院与弟子许良英等讨论中微子和诺贝尔奖的场面……。

作为科学史学者，我见证了活跃在科学舞台的几代人的精英，我是无怨无悔也无憾的，那位讥讽我宣传科学家的人，尽管他以民主党派经营自己的官运，但他的所作所为是会受到良心自责的。与王淦昌院士、许良英教授相比，那些既得利益者足以汗颜。

4. 在庆贺王淦昌院士八五诞辰的日子里

1992年5月23日，由我主持的《王淦昌先生八五华诞中青年专家座谈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办公会议室举行，王老的学生丁大钊、杨福家、程开甲、吕敏、胡济民、许良英、周志成、林克椿、黄祖洽、汪容和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物理学二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等给我来信，酿就了人们在庆贺王淦昌院士八五诞辰的日子里的热烈氛围。

许良英先生发来的贺词是：“功高德高寿高 敬贺恩师淦昌先生八五大寿 学生许良英 1992.5.20” [7]

随后，在我编辑《王淦昌全集》的时候，许良英教授寄来他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的有关争论文章，我没有刊发，想必他一定知道我的苦衷。后来给我电话，说起对于科学家和科学史的看法，想让我去录音采访，我都没有赴约，很对不起他。

往事如烟，先生作古，使我想起唐代文学家段成式的《哭李群玉》诗，虽没有“酒里诗中三十年”的漫长经历，却能够体味许良英教授“纵横唐突世喧喧”的人生品格，所庆幸他能够“明时不作弥衡死”，毕竟最后是“傲尽公卿归九泉” [8]了，随王淦昌而去，那是一种超脱和精神升华。尚若遇到王老淦昌恩师，请代我行私淑弟子之谊吧。

许良英先生永远活在怀念他的人们心中。

参考文献

- [1]蒋春暄推荐：武夷山——用摘抄纪念许良英先生学术动态 № 95442013/02/15p。25766-25718 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学术委员会张志杰纪念室主办主编吴水清
- [2]胡济民、许良英、汪容、范岱年：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7
- [3]许良英，痛悼恩师王淦昌先生，1999，3，2
- [4]李炳安，杨振宁。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载胡济民，许良英，汪容，范岱年。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7：12-29
- [5]怀英，中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J]现代物理知识，1992，4（3）：封二

[6]吴水清,追求卓越——王淦昌年表[M]。北京:经济出版社,1999,10

[7]吴水清,王淦昌先生八五华诞中青年专家座谈会文献[J]现代物理知识,1993,5(2增刊):106

[8]郭秀华,高培权。历代哀祭诗词精华二百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9:87
我眼中的圣者

科学不是生产力——纪念许良英先生

杜钧福

我和许先生算是同行,也共同在中关村住了几十年,但从未谋面,虽然我对其人很敬仰,主要因为他毕生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有独立见解,不阿世。

1980年代,科技体制改革初期,社会上鼓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只有他力排众议,坚持“科学不是生产力”的正确观点(见《自然辩证法杂志》1989年第1期)。

其实,科学不是生产力乃是常识,争论这样的问题,如同皇帝的新衣故事一样可笑。在当时的报纸上,往往在通栏标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下面,文章题目是“尽快将科学研究转化为生产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既然要将科学转化为生产力,就说明它不是生产力。正如面包是麦子“转化”的,而不能说麦子就是面包一样。

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据说来自邓小平。而邓之所以这样说,据说因为马克思有类似的话。我没查马克思的原著,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查,但感觉,就算马克思是伟人,他的话也不能“一句顶一万句”。他的意思也许是在强调某一方面,不能光从字面理解。

科学与其说是生产力,毋宁说是思想体系。其实,在文革以前,执政党也是这样理解的。当时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放在中国科学院,在党的关系上归“宣传口”领导。文革开始后,这样的关系有所改变,直到文革后成立社会科学院,才彻底分家。

其实,邓小平提出“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也许是好意,想让大家重视科学技术。这当然比叫大家重视“阶级斗争”强得多。但凡是非科学的判断,最后总不能落下好的结果。这“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总的负面效应是主要的。

所谓负面效应,就是杀鸡取蛋。你要母鸡下蛋,就先得喂好母鸡,而不能强迫,威胁说你不下蛋就没得吃了而且照此实行。

当然,基础研究的“转化”问题,绝对不像母鸡下蛋那样简单。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可以区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有比较明确的应用背景,但依然不能直接用于技术领域。基础研究离应用更远,甚至说不清和哪项应用有联系。

当时的指导思想,仍然有文革前和文革中对知识分子歧视的成分,就是认为搞科研的这些人“理论脱离实际”,仍执着于象牙塔中的研究,必须让他们受穷,赶他们到“联系实际”的题目上去。科学不是生产力吗?生产力可以赚钱,那你们还要钱干什么?

这就是 1980 年代科研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我们研究所，几乎所有课题组都往“实际”上“挂靠”，但以后结果证明，绝大多数是浪费资源。所里也开发了几个项目，有的成立了公司，但最后只有磁性材料成了气候。

就全国来说，也是如此。十几年后，在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上，江泽民先生又一次谈到“研究成果转化”问题，说仍“转化”得不理想。这个问题，我和现在已故的“转化”倡导者陈春先教授讨论过。当时我的意见是，根本没有什么“成果”，当然没有转化。那些所谓成果都是吹出来的，骗人可以，但什么东西也“转化”不了。如果有成果，“转化”应不成问题。

这一“科学是生产力”的判断所造成的恶果影响深远。2009 年我和朋友到青岛旅游，住的旅馆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共建”。这件事本身就很稀罕，因为“共建”是文革中的“新鲜事物”，现在已很少提了。但他们“共建”的是青少年教育基地（可能还有爱国两字，记不得了），也还说得过去。他们这个所，擅长的似乎是一种早已灭绝的古生物多孔虫的研究。在旅馆的整个一面墙上，镶嵌着很多多孔虫的化石标本。其布局是，横向是时间轴，跨度有几百万年之久，垂直方向是海洋深度分布。我站在这面墙前扫了多孔虫知识的盲，深深感叹，这可能是世界上介绍多孔虫知识最全面最生动的一面墙。

我家对门有一家研究所，也是中国科学院的，两三年前办了个博物馆。我却从未光顾。为什么？票价太贵，60 元。据他们所的人说，倒是经常有领导参观。这就对了。领导来，当然希望清静一些，老百姓来少点好。所以，比起这个所，青岛海洋所的科学家不惜屈尊和一家普通旅馆（似乎不上星）“共建”，无偿向青少年普及古生物知识，值得尊敬。

这还不够。在另外几面墙上还悬挂着一些介绍该所的照片。从中我们知道，这个研究所有几位多孔虫方面的大权威，都是院士。其中一位女院士，为多孔虫研究开辟了新的应用领域，就是设计并印染出了多孔虫图案的花布，有照片展示她身穿这种多孔虫花布衣服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学术报告的风采，并着重说明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身穿多孔虫图案衣服的人。

看到此处，不由得由衷佩服他们对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态度。在我所混迹的圈子里，也有图案这种东西，我们的行话叫“斑图”。“斑图形成”（pattern formation）还是一个研究领域分支，开过不少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从艺术观点来看，有些“斑图”还是很好看的。在纽约还举行过“科学艺术”大赛，赛的就是这类东西。但是我们谁也没想到把它们做成花布，穿在身上，争这个世界第一。

这一经历深深触动了我。我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丝毫没有轻视这些院士专家的意思。我完全相信，这些院士专家在国际学术领域中的地位是我们这些混事的人所不敢望其项背的。他们多年在这个一时看不见现实应用的领域辛苦耕耘，做出了极有水平的工作。从我所见的多孔虫展示墙来看，他们对工作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但是在当前声称是“科学的春天”的日子里他们却遭遇研究成果“转化”的滑铁卢，在舆论和研究经费的双重压力下，出此下策，充当了服装模特的角色。

我就不明白，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就不能养活几个专门研究多孔虫的专家，叫

他们不要成天为了怎么“转化”费心。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项古生物研究对于生物进化、海陆变迁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最近看到黄河清先生一篇文章，说1949年后大陆知识分子的惨状，内容都是文革前或文革中被迫害的案例。其实，文革后知识分子难道不惨？

回忆当年许良英先生孤军奋战的情景，感到历史上一切智者都是孤独的。当时也有些人怀疑此说，但不敢或不能公开反对。许先生的文章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像我辈，虽然同意许先生的看法，但无话语权，无法表达。不像今天，至少可以在网上发表文章表述自己的意见。

(2013-03-05 来自新浪杜钧福的 BLOG)

一件小事——追忆许良英先生

史晓雷

2013年1月28日下午3点多，我收到朋友的短信，告诉我许良英先生去世了。我心里一怔，感觉还是突然了，因为我一直关注着许先生与王来棣先生博客（由其家人负责）上的病情通报，总期待着奇迹会发生。可是，这次先生没能熬过去。余生也晚，与许先生仅有一面之缘，写一点追忆文字，算是对先生的纪念。

我第一次得知许良英先生的名字是在东华大学读硕士时，那时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翻到《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和《爱因斯坦文集》，上面看到有许良英的名字，但对许先生的身世一无所知。读硕士期间参加了湖南科技出版社一个书评征文活动，文章刊登在了《科学时报》，大概是得了二等（三等？）奖，奖品是一定价码的书籍（限该出版社出版的），我查到当时刚出了一套爱因斯坦全集（当时仅出版了前5卷），于是申请要了该套书。因为爱因斯坦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科学家。这5卷的主译者并没有许良英先生，但是与后面的故事密切相关，所以先搁置这里。

2007年9月我考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3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活就在北京东城区朝内大街与朝内北小街交界的九爷府（又名孚王府）度过。当时已经对许良英先生有了一定了解，特别是在网上看了一些他与李慎之先生的通信。2008年春天，研究所邀请了一些所里资深的研究员给我们研究生谈些治学的心得体会，为此组织了一系列的讲座。记得当时邀请到的专家有：技术史专家潘吉星研究员，物理学史专家戴念祖研究员，技术史专家华觉明研究员，天文学史专家陈久金研究员，数学史专家郭书春研究员，记得还请去了政策所的樊洪业研究员，当然还有许良英先生。4月29日是许先生讲座的日期（注：关于许先生讲座的日期，我记不清楚了，恰好在网上读到孙烈兄写的《国运沧桑扬科学民主，岁月蹉跎守纯粹人生——悼念中国学界良知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提到是4月29日，当时此系列讲座的负责人是所里的田淼老师与孙烈），演讲的情景我能记得一些。记得在讲座中他痛斥了科学院一些领导随意挂名的现象，就是在自己并没有付出心血的学术著作上挂名，而且他并未避讳，直接说出了那位领导的名字。他还对李政道与杨振宁的争论表达了看法，他个人比较挺前者，对后者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记得讲座后我还提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有关他与李慎之通信方面的；一个是有关近些年来社会上有股思潮——把五四时期的思潮与后来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请他谈谈看法。前者的回答我记不清了，后者他表达了他不认同这种观点，至于如何展开的，我记不清楚了。

讲座结束后，我恰好到所里的东小院办公室去，正好许先生坐在门左侧的椅子上。我突然想请许良英先生签一个名，于是跑到西院的8号宿舍去找签名的书。当时书架上就有那套《爱因斯坦全集》，我忘记了许先生不是那5卷的主译，只是觉得与爱因斯坦有关，拿起了其中一卷（很可能是第2卷）就返回东院办公室了。我向许先生说明了意思，许先生拿起书看了一会，他对我说，这本书不是他写（译）的，他不签。我恳请了一遍，他执意不签。我有些失落，转头一想，我收藏有《科学世界》杂志2005年国际物理年（纪念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创立100周年）出版的两本爱因斯坦专辑，我可以送许先生一本然后换一个签名。返回宿舍取杂志的时候，我把相机也带上了，想顺便可以与他合影留念。到了办公室，我直接给他递了那本封面印有爱因斯坦头像的杂志，说是送他的。他看了一会，显出很喜欢的样子，转头问我为何送他。我告诉他，我有两本，我可以送他一本，但条件是请他在我的那一本上签一个名字。之前执意不签的许先生终于答应了，就在那个专辑的第一页上边栏签了他的名字。我也乘机请在场的田淼老师给我和许先生合了一张影。

许先生在东小院歇了一会，然后所里安排了车送他回去。临走时，记得张柏春老师（或者是田老师？）提醒我说，许先生眼睛不好（我之前不知道他视力很差了），要我送他上车。出了东院送他走的是邹大海老师和我，出东门台阶的时候，我主动上前搀扶他，他执意自己走下去。门口，所里的车已经在等他了。我们目送他上车回去。此后，我再也没能见过他。

离开北京后，我一直在网络上关注着许先生的动态，也看到了之前我没关注的一些东西。比如我读谈束星北的那篇报告文学，看了许良英、关洪、樊洪业等先生的纠正，他们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束星北，而不是把本来已经歪曲的历史再次遭受扭曲；关于爱因斯坦那封著名的给J.S.Switzer的信，他与席泽宗先生的商榷文章；当然还有他在《炎黄春秋》发表的那些谈论民主与普世价值的雄文。

正如傅国涌先生所言，科学、民主、理性，是他文集的三个关键词，也是他最后几十年念兹在兹的。许良英先生是五四“德赛”精神杰出的践行者，是中国再启蒙时代勇猛的呐喊者，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坐标和楷模。写一副挽联悼念先生：

心忧民主科学，九十三年遗直在；
力喊启蒙理性，八千里路大星沈。

1月30日早晨，笔者改签了返家的火车票，参加了下午在北大医院举行的许良英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2013年2月5日，五柳村博客）

国运沧桑扬科学民主 岁月蹉跎守纯粹人生

——悼念中国学界良知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

孙烈

“我与许良英在同一个研究所。”这是一位科学史家向国外同人介绍自己时说的一句话。许先生在国内学界的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许先生生于 1920 年。借助时间坐标，或许能对他的人生起点多一些理解。在他出生的前一年（1919），中国发生“五四运动”，许先生早年即受到“德先生和赛先生”思想的洗礼，而后追求科学与民主，成为他毕生的使命，并且从未做过丝毫的放弃。在他出生的第二年（1921）爱因斯坦终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许先生精研爱因斯坦数十载，堪称“为之辛苦见平生”。无疑，这种历史背景对许良英先生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

许先生的人生颇有传奇色彩，今天，我们可以将不少历史事件与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对于像我这样的后学，听到或看到有关许良英的事迹，常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总是给人正直、勇敢、有良知、求真知的印象，而不论事情发生在哪一时期。近百年的中国远远不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时代，对于经历过多番动荡与浩劫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在混乱、困苦的人生低谷能一如既往地坚守其人生的信念，不辍学术追求，决非易事。许先生拥有的这种纯粹的人生使他的人格具有独特的魅力。有人曾将许先生誉为“中国科学界民主运动的推手”。不过，我不赞同“科学界”和“推手”的说法，我认为将许先生视为现代“中国知识界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旗手”应更符合实际。

实际上，我虽对许先生之大名早有所知，但上述认识也只是与先生“在同一研究所”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我在一个不大的城市读中学时，偶然买到了绿皮精装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立即视若珍宝。我相信，《爱因斯坦文集》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说法，一定不是夸张，应该有不少人与我有相似的经历，也都曾怀着激动的心情在那字里行间中寻找人生的目标和意义。那时尚无互联网，我无从得知有关编译者的任何故事，但相信他一定是中国最了解爱因斯坦之人。崇拜爱因斯坦，自然没有理由不尊敬许良英这个名字。

10 年前，我考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研究生，才对许先生的个人际遇有所了解。此后，又有两次直接的接触。现在想来，我与许先生的交往虽然很少，但印象却很深。

第一次见到许先生是在 2005 年 3 月（？）。那一年是国际物理年与爱因斯坦年，国内办了不少纪念活动。我在研究生院看到有一则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奇迹年”的讲座，顿时激起了我的兴趣。讲座是李佩教授组织的，地点在“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当时不论从研究生院出发还是从研究所走，交通都不便利，可是它丝毫没有妨碍我做出去听报告的决定。那天我早早出门，可能是最早到会场的听众。许先生进屋时，我注意打量了一下，他身穿中山装，满头银发、双颊凹陷，走路不快，腰身略显佝偻，清瘦而矍铄。他有较浓江浙口音，讲话时略带手势，语速较快。若干年后，一提起许先生，我脑海中浮现出他的形象仍定格在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模样。在报告中，他主要介绍爱恩斯

坦一生中的两次创造的高峰期与主要的科学成就。有一个观点尤其令我记忆犹新，许先生认为，爱因斯坦一生至少有 8 项成果可获诺贝尔奖！演讲中，他认为爱因斯坦的论文质量高，特别是 1905 年，几篇论文分别解决了不同的但都十分重要问题。他还多次称赞爱因斯坦和平、自由的思想与崇高的品格。报告由李佩教授主持，她特意重复了许先生关于“有理由 8 次获诺贝尔奖”的观点，而且还结合现状说道：与爱因斯坦相比，我们现在有的科研人员却要把一篇论文拆成几篇发表。报告后，我趁许先生走下讲台之际，问了两个关于爱因斯坦生平的小问题。当听说我也在同一研究所读书时，还询问了我几句关于研究所和研究生的情况。那天到场的大约有 30 多人，我看也有其他人想找他交流，就匆匆告别返回。

2008 年，我第二次聆听许先生的学术报告，也是我再一次见到他老人家。这次机会源于研究所在 2007-2008 年度举办的“科技史治学方法与经验”的系列讲座。该讲座以科技史届老专家面向研究生作专题报告的形式，既向青年学生传授治学经验，同时也成为一次整理国内科技史学术思想的好机会。许良英先生的讲座安排在 4 月 29 日。我是此次讲座的课代表，有机会为许先生拍了照片。报告题目是“科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科学史研究者的精神境界，另一个是关于科学同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关系。关于前一个问题，他认为：搞科学史的人，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得远，眼界更广，接受一切对人类有益的思想资源。在谈到后一个问题时，许先生结合文革时期批相对论等实例，抨击了一些国内学者对待科学的态度；他赞同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观点，但不接受其“不可通约”的主张，至于费耶阿本德有关“科学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则持完全反对的态度。许先生认为，科学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大，我们需要独立的批判精神，排除官方意识形态的干扰。这次报告让我对许先生又多了一份了解和尊敬，因为纵然是做公开报告，他讲话仍是直来直去，爱憎分明，言辞激烈，却不觉得他是出于狭隘的私心。

许先生是一个有大爱之心的人，这不仅体现在他做学问的精神境界，他在生活中也是如此。08 年的讲座后不久，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大家发现，许先生是本研究所捐款最多之人——他一次捐出了自己 2 个月的全部收入。

近两年，我偶尔得知一些关于许先生的消息，主要来自他的学生——纽约州立大学的胡大年老师。据我所知，在研究所为许先生道贺 90 寿辰的时候，他的身体还相当不错。当得知老先生不久前病重住院时，我还祈盼能有好转。哪知，今日竟传来噩耗！

也许，近日会有人问起我或我的同事关于许先生的事情。我想，我们都会说，“我与许良英在同一研究所。”这种自豪感出自我们对许先生一生守护学术良心的尊敬。

2013.01.28 夜于柏林（载许良英与王来棣博客）

范岱年和许良英

——浙大“求是”精神的传承者

熊卫民

范岱年先生是我们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的论文，尤其是译作，是这几个学科，尤其是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得以在中国建立的根基。当年考研究生时，我就认真研读过他的文章和译著。但直到大约十年前，我才在樊洪业先生的办公室和许良英先生的家中，先后两次邂逅他。而开始与范先生深入交流，则是2013年2月的事。那时，许良英先生刚刚去世。我知道，范先生是与许先生密切交往了近七十年的老朋友，所以很想请他谈一谈许先生。范先生不同意，说会自写纪念文章。我想，作为年轻人，我看待过往会有不同的视角，且由我来执笔，肯定会较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要容易一些。所以，我就以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者的身份，改请范先生谈他的那些中国科学院内的浙江大学校友——其实目的仍然是请他谈许先生，因为那些人多是许先生提名调过来的，与许先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次范先生同意了，而我们合作的成果就是《中国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一文⁸⁶。它从范、许等人1950年代的政治经历出发，对地下党员屡遭排挤、打击的命运作了反思，引发不少反响。

此文也让范先生对我刮目相看。不久，他跟我联系，提议我帮他做口述历史。我写过几本传记，知道这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事，所以，此前一两年，手头积压了大量本职工作的我已婉拒过几位老院士向我提出的类似建议。但我不忍心放弃这么有价值的一项工作：范先生不仅是1978年后西方科学哲学进入中国的主要引入者，还出身于一个留学世家，且曾参加过地下党、当过右派，其经历十分丰富；而他记忆力既好，心态又很开放，对很多往事都有深入思考。在口述历史工作中，这种访谈对象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于是我跟师友们商量。樊洪业先生说，把范先生的传记列入“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选题计划时，他就想过让我去帮范先生，只是他知道我忙，不忍给我添担子。作为我的顶头上司，院史研究室主任王扬宗研究员十分尊重范先生，支持我去帮他。适从美国回来探亲的王作跃教授获悉此事后，把他2011年四次访谈范先生的录音交给我，希望我能把他已起步的工作完成。

既然访谈价值很大，师友们很支持，我就接下了这项工作。于是，从2013年夏天起，我每周访谈范先生半天，至2014年春天基本谈完。然后是文字整理工作，从最初的誊录稿，到我的整理稿，再到范先生的审定稿，历时一年才告完成。期间我还先后到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浙江上虞去考察范先生成长、学习过的地方。书稿提交给丛书主编后，我们又根据审稿人的众多建议，两次大修，至2016年春天方基本定稿。

从2004年至2013年，我差不多每月都会去看望许良英先生两三次，几乎每次都跟

⁸⁶熊卫民.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范岱年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2013(4): 84-107.

他有深入交谈。2012年10月25日他在晨练时不慎摔倒，是我和王作跃教授将他送去医院的。半个月后他因这次摔倒的后遗症而住院。2012年12月16日晚上我去医院探望他，他还跟我说了很可能是他人生中说的最后几句话。最近三年，为了帮范先生整理口述自传，我跟范岱年先生又有十分密切的交流。回看这两位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前辈，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人的命运真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性格所决定。

许先生是个引人注目的奇人。他智力高超，目光敏锐，深受浙大校训“求是”精神的熏陶，真正做到了“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道德高尚，不存什么私心；为人十分自信，说话不分场合、不留情面，写作文笔犀利、说理透彻，行事果敢决绝、“虽千万人吾往矣”、“虽九死而不悔”。这种个性，令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崇敬，促使他早年在革命上、中晚年在学术上取得较大成功。但智力高超者常常会对平庸之辈不耐烦，道德高尚者难免会以律己方式律人，相处一久，平凡的、有着种种私欲的常人也容易畏惧他、疏远他，那些心胸狭隘的甚至一有机会就要报复他。于是，同一种个性，又使他人缘差，因而在政治运动中多次遭遇重大打击——从胡风分子嫌疑，到“右派”，到两次被开除党籍等。换成常人，经受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会软瘫下来，而他却是愈战愈勇，老而弥坚，健康工作到93岁。

范先生是个并不给他人造成压力的常人。他知识渊博而又谦虚，道德过硬而又宽厚，既真诚又善良，既热情又平和。与这样的人相处，不但很少产生冲突，还常有如沐春风之感。这种个性，使他获得了很多人的友谊。人们很容易亲近他，很愿意和他合作，很乐意帮助他，即使在他落难的时候，也有不少人愿意或明或暗地对他伸以援手，哪怕这样做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风险。他确实受难了，但这种受难纯粹是因为不当的体制和错误的政策，不是因为人事矛盾。所以，只要有办法，人们都愿意给他帮助。因而，他能在贱民身份未除的情况下，重新回到学术界，甚至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不能当作者，他就做翻译；不能发表署名文章，他就做编辑，反正不脱离学术。笔耕不辍，日拱一卒，几十年下来，他发表了大量译著，编辑了大量文章，成了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引入者、开创者和守门人，并对全国性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都曾加入过地下党，都是学者，但许先生、范先生的倾向明显不同。当年，许先生是压抑了自己对于物理学研究的兴趣，拒绝了导师王淦昌教授留他下来做助教的建议，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决然离开浙江大学去外地主动寻找共产党。而范先生却是因抹不开邀请者的情面而被动加入共产党，虽然他以参加革命作为知是非、有道德的青年的义务，但还是深切盼望自己在革命成功后能成为教授。许先生谈人论事洞若观火，一旦做出决定，执行起来就意志如铁（他给长子取名为“成钢”，这恐怕不仅是他寄予儿子的期望，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在他的身上，有着浓烈的革命家气质。范先生博览群书，惯于体察和倾听各种意见，并不相信唯一真理的存在，更不以为自己掌握了它。在执行决定时，并不完全排除决定有误或自己失误的可能。在他的身上，洋溢出来的是浓烈的学者气质。

许先生嫉恶如仇、锋芒毕露，常对他所认为的“假、恶、丑”或不当言行展开尖锐

的批评乃至针尖对麦芒的斗争。记得有一次他随口说起自己当着胡耀邦等多位中央书记处领导的面批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的事⁸⁷，听得前来访谈的王作跃教授和我瞠目结舌——仅仅因为上司改了他一小段文稿，他就敢如此让上司在更高层领导面前难以下台！他当然是浙大“求是”精神的传承者，其纯粹程度，甚至超过了作为该精神最初阐释者的竺可桢校长。

范先生温和宽厚，善良坦诚，律己以严，待人以宽，他人滴水之恩、自己尺寸之失，均牢记于心，从不隐瞒。譬如，在修订口述自传中，他补入了一段在“肃反”运动中，他响应号召检举长辈李季谷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事，并一再认错、道歉。再如，在反右运动中，身为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整风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的他，反被打成了右派。对此，他的态度是：庆幸被打成右派的是自己，而不是由自己来打右派。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善良，还体现了强烈的求真精神。他固然在锋锐程度上远不及许先生，但我们能说他不是浙大“求是”精神的传承者么？

可能正是在孜孜不倦“求是”上的一致性，律人甚严、不时与人绝交的许先生才和范先生相濡以沫，密切合作，保持了近七十年的友谊，结成了终身的挚友。许先生乃特殊材料铸成，英才天纵，是学不了的；而范先生有如一位邻居，其成才之路和睿智的人生态度，很可作为常人之楷模。

范先生在1937年夏天学会了游泳，然后，他在塘里游泳，在湖里游泳，在水库游泳，在河里游泳，在江里游泳，在海里游泳，虽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技能，但每周两三次，一游就是八十年！这个运动给了他健康的体魄，使他的记忆力还犹如青年。希望范先生能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游过一百年！

（本文系作者在“范岱年先生九十寿辰暨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修订）

痛悼老友许良英

于浩成

昨晚胡少安来电话，告知老友许良英去世的消息。前些天，许的夫人，历史学者王来棣去世，不久许本人也卧病在床，昏迷不醒。医生说如再不醒来，有成为植物人的危险。现在，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许良英是我国当代一位著名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我们的民主法治改革的战友。他的去世是为我们的重大损失。我感到十分悲痛！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与他就结识了。1976年初过春节时，我从沙洋五七干校获准返京回家，在厂甸旧书摊中偶然买到许良英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写信给许，他立即回信，并将其第一二卷寄赠给我。我看后才知道，第一二卷都是讲的天

⁸⁷ 据熊卫民、王作跃对许良英的访谈，2012年10月24日。

体物理学⁸⁸，我一点也看不懂。第三卷为社会政治评论文集。其中一篇讲到，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管理公有财产的官员们能否有民主监督，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大意）这段话对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给了我以重大启示。后来才读到南斯拉夫第四号人物-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奥地利著名哲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社会主义-通向奴役之路》，（台湾殷海光译）更加深了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因此《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一书给我印象极深。

1986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为了纪念反右三十周年，提出召开右派问题研讨会。许良英还给我写了邀请函，希望我参加。但是，钱伟长将此事向邓小平告密，邓即发怒，下令制止该会的举行。同时开除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党籍。因为邓错将许良英记成王若望，许方逃过一劫。

1989年2月，我主持的“法制与社会主义发展研究所”在首钢召开一次关于政治改革的研讨会。许良英应邀出席并带来许多自然科学家签署的，向中央要求“释放魏京生，保障人权，实现民主”的请愿书。（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央发出的三封请愿书中的第二封）与会很多学者、作家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如：李洪林、张显扬、戈扬等。

当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引发学生悼念并示威游行。几天后，许良英给我打电话，介绍北大的一个学生找我，后又取消了。但是当晚北大学生刘刚还是来到我家。他拿出北大自治学生会的章程和宣言草稿，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求修改。我表示这事我不便参与。刘刚表示不满，说：“你们只是号召民主，而不做实事。”他还是让我提意见，我便在宣言草稿上做了些文字修饰。过后许良英打电话给我，问这事是否给我找了麻烦。原来许并不同意刘刚来找我的。六四以后，我被关进武警学校时，专案组老王询问我这件事。我说明后，第二天老王就取来当时我改过几个字的草稿，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90年底解除我的“监视居住”被释放回家。2月份，许良英约我写一篇关于政改与民主的文章，他也同时写了一篇，共同发表出来。其后，1994年春季的一个大风天，丁子霖打电话给我，说有几本英文书赠送给我，现在她手上，是否去她那里取书。我看风太大，就说改日吧。当天下午，丁子霖，蒋培坤夫妇来到我家送书，并拿出一份“要求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法制”的信，让我签名，我立即同意并签了名。当晚，我考虑，我正向当局申请赴美讲学（三年来，美国几个大学多次邀请我出去讲学，公安部一直未批）我怕这个签名会影响我的出国申请。次日上午，我找到许良英，告他我现在的处境，许同意为我撤出签名。后来我听说他们又找了邵燕祥等两三个人签名后发表了。丁子霖还说有一人参加签名后又退出了。我深感许良英的宽厚大度，对人的体谅，理解。

2005年，我在美国旅居十一年后回国。我与许良英通了电话。我告诉他，我在美国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引述他的民主论一文中的段落，他很高兴。我们对有些中青年人在发表文章中总是喜欢自我作古，发表任何理论都表示是自己的创建，不遵守世界学术界的惯例，不尊重别人的创意很是反感。后来我听说他和李慎之曾相互通信，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我向他提起此事，他立即将他们的讨论通信发给我。我在回信中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也同我讨论他的观点。

2008年底《零八宪章》草稿曾有人向他征求意见并签名。他对文稿中的一些提法提出商榷，十分认真慎重。因一些提法没有达成一致而没有签名。但是他表达了对这个文

⁸⁸ 《爱集》第三卷是1979年出版的，第一卷是哲学，第二卷是物理学。编者注。

稿总体的支持。

朱厚泽逝世时，在向朱厚泽遗体告别会上，我遇到许良英。他已坐了轮椅⁸⁹，但是面容清癯，两眼炯炯有光。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许良英翻译出版《爱因斯坦文集》，对我国知识分子启蒙的作用十分巨大。他身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为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奔走呼号，成为我国民主思想的启蒙者。他治学认真严谨，对人宽厚宽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敬仰！

2013-1-30

当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怀念良师益友许良英

盛禹九

许良英先生辞世，给人们留下太多的悲痛、怀念与思索。傅国涌记述许良英年轻时的志向——“他在大学时代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许良英的一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在接连不断的社会动荡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自己的梦想：从职业革命家到成为著名的科学史家；在传播爱因斯坦思想作出巨大贡献之后，又义无反顾地走向民主思想的启蒙和实践。许良英是当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把科学和民主的火种播撒在神州大地，自己却铁骨铮铮，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重重磨难。他不愧是一个“大写的人”，是当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中我最敬仰的人物之一。

鄙人有幸在晚年和许良英有过一些交往。下面记述的是其中的片段回忆：

“《阶级分析》已面目全非”

第一次接近许良英是2003年4月，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的七层楼上，按下许家门铃，一个带眼镜的、清癯健旺的老人开门迎接我，他就是我慕名已久的许良英。

其实，那次我去许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找许良英，而是找他的夫人王来棣。不久前，她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和批判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文中特别引证毛发表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原稿，该稿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为“反革命”和“半反革命”一类；50年代出版的《毛选》把这篇文章的有关段落全删除了。我很想看看王来棣的这篇文章，事先和来棣先生进行过联系，得到她的同意来她家取稿。

许先生把我引进客厅入座。清秀文静的来棣先生穿着一身黑色衣裤从里屋走出来，

⁸⁹ 许良英只在去世前一个月坐过轮椅。编者注。

把早已准备好的《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文的复印稿给我，并作了简要的介绍：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得到汪精卫的赏识，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篇文章原载 1925 年 12 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国农民》1926 年 2 月号和《中国青年》1926 年 3 月号也先后转载，随后又在广州和汕头出版了单行本。当时这几个杂志刊登的《阶级分析》，在文字上略有不同，但主要内容和所有观点都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是，原文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极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与此相关，原文有一张说明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1951 年毛泽东将此文收入《毛选》，删去了原稿近一半的篇幅。他所删去的主要是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也把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全部删去。因此，《阶级分析》的《毛选》版与原文相较，已面目全非了。当时这篇文章的影响很大，致使 1926 年部份北伐军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普遍不满和恐慌，纷纷写文章质疑和批驳。”

接着，来棣先生把她写这篇文章的有关参考资料也给了我：除了毛原稿复印件外，还有 1927 年 6 月 26 日出版《现代评论》周刊《打倒智识阶级》（作者：宇文）；另一篇是 1927 年 9 月出版的《一般》（杂志）《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的》（作者：心如）。后面两篇文章中写道：

“去年下半年，猛听到了很大的叫喊：‘打倒智识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家’……的声音一同发出”；

“据说党军所到之的地方，墙上贴有‘打倒智识阶级’的标语……连一向大胆的张奚若先生听了好像都发生了恐慌……”

“一个人仅仅有点智识，断不能就成为他们的罪状。智识阶级的范围渺茫得很。在中国的智识还依然幼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稍专门智识和稍有普通智识的人们，如工程师、律师、医生、管账先生和教孩子物理化学的人们，都放在智识阶级里面，这一班人一向都是拿他们筋力和脑力向社会换饭吃的……所以这一班低级的智识阶级是不能打倒，不应该打倒的……”

这些历史资料说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后，的确“引起知识界的普遍不满和恐慌”。有资料证实：1927 年 4 月，国学大师王国维得知藏书大家叶德辉在长沙被“农会法庭”当作“土豪劣绅”处决后，深感忧郁和不安；6 月 2 日，王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遗书，遂自沉于昆明湖。

我告诉来棣先生：“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起，我在《中国青年》编辑部工作了 30 多年。我们资料室有比较完整的《中国青年》的历史档案资料。长期以来，从没有人去关心、翻阅和发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稿中的问题。你写这篇文章，还原《阶级分析》一文的本来面目，对研究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贡献。”

写到这里，顺便提及一件事：1998 年 10 月，《中国青年》编辑部出版“《中国青年》（1923—1998）”光盘版。我读了王来棣的文章后，特意去查找《中国青年》光盘版的上

述文章，发现和 1951 年《毛选》版本一样，1926 年 3 月号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和各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的表格，在光盘版中也都全部删除了。

“马克思的最大错误是主张专政”

我和王来棣反思和议论毛泽东的文章，坐在一旁的许良英按捺不住了。他心直口快，也加入到我们议论的行列。许先生说：

“你们刚才谈到毛的知识分子政策，使我想起 1958 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还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坑了几百人，我比他多几百倍。’当时我只觉得有点奇怪，没有往深处想。现在对照他早年发表的那篇‘阶级分析’文章，还有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毛泽东自命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他暴君心态的自我表白，是他的‘反右’阴谋全面胜利后的一种得意忘形的表演。”

许良英说到这里，似乎有点激动。他停了下来，从椅子上站起，走到桌旁拿起杯子喝水。于是，我接着他的话说：

“现在有些人写文章提到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时，在它后面特别加了个括号和旁注——（秦始皇加斯大林），好像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与马克思无关似的。其实，正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成为毛泽东实践的理论根据。毛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把列宁、斯大林比喻为‘两把刀子’，而毛的专政谋略及其灾难性后果不仅大大超过了秦始皇，也大大超过了列宁和斯大林……”

许先生回到座位上，放下手中的杯子，听我发言，扬起右手对我说：

“我同意你的观点，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排斥民主，这是逆历史的潮流，造成 20 世纪人类的大灾难。和对毛泽东的迷信一样，我对马克思的认识觉悟也很晚；回到老家当了 20 年多年农民，通读了 39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才对马克思有了一些认识。现在看来，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他的革命理论，他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很成问题的，有的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来说，也是完全错误的。”

“想不到他出卖了我们”

提到毛泽东的“专政谋略”，我们的话题又从马克思回到 1957 年的“反右”。当许良英得知我和刘宾雁曾同在团中央工作，是朋友，也是难友时，他情不自禁地谈起 1986 年他和方励之、刘宾雁一同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事，并且带有情绪地说：

“那个会后来流产了。为什么流产？原因就在于我们 3 人在讨论邀请名单时，有钱伟长的名字。参加会议的通知是我邮寄给他的。想不到他出卖了我们。作为奖赏，邓小平赐给他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位。随后，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谈话，指责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赵紫阳插话：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要召开纪念反右 30

周年大会。赵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于是邓小平说，要把这3人立即开除出党。之后，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方、刘、王被开除党籍。按计划，在3人之后还要开除10人，我首当其冲。由于我们决定无限期推迟反右历史讨论会的会期，赵紫阳发了善心，我因此得以幸免。”

我告诉他：“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出卖’你们的人，在反右前夕，我曾经对他进行过采访。根据他当时对我的谈话，我发现把他打成右派也是冤枉的：他本来就是左派嘛。”

初次见面一席话，有着众多的共同语言，我们之间的距离顿时拉近了，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快中午了，许先生留我吃饭：那是一顿几乎没有多少油盐的“白菜汤泡饭”。那顿饭，使我切身感受到这位高级知识分子极其简朴的生活。

临走时，许良英赠我两本书：一部是他的文集《科学·民主·理性》（香港版）；另一本是他校译的《爱因斯坦语录》。从此开始我俩之间的交往。

“民主集中制是‘画蛇添足’”

此后，不断收到许先生寄来的资料——主要是他近年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还有他和老友们进行学术交流的部分信件。从这些资料里，我进一步了解到：许良英有着许多不同于常人、独立的、富有理性的见解和思考；特别在民主思想方面，他针对当前许多传统观念和对民主的误读，作了不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例如

——把 Majority decisions 译成“少数服从多数”，决不是简单的翻译错误，它反映了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民主概念认识的混乱。Majority decisions 是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之一，可直译为“多数决定”或“多数裁定”。但是，“多数决定”原则并不意味着，凡是多数人作出的决定，少数人都必须服从。少数人仍有保留和申辩个人意见的自由和权利。因为有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科学上更是如此。

——民主在本质上是无阶级性的，也不存在国界。所谓“东方特色”（也称“中国特色”——盛注），不过是传统的封建专制的烙印，主要表现为特权思想、等级制、世袭制、人身依附关系和人治，它同民主水火不兼容。强调“东方特色”，实际上是一个多世纪前早已破产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调的翻版。

——把卢梭作为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是错误的。“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卢梭以前就有了。卢梭认为，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可以随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这种主张导致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的暴政：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将近4000人被送上断头台，连革命家丹东和化学家拉瓦锡都不能幸免，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卢梭的“公意”理论到20世纪20年代转化成“极权主义”。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专政，1933年上台的德国“纳粹”党的统治，都属于同一类型。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的“画蛇添足”，并不符合民主制度的原则。民主本身就包含集中的意思。“民主集中制”按字义上是双重的集中，必然对民主产生强

加的限制，使民主名存实亡。特别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表明主权不在人民，而在一个居于万民之上的指导者个人或集团，这就谈不上民主。民主不需要有自外于人民的“指导者”。以“人民之主”自居者，要不是神话中的“救世主”，就是历史中的“君王”。

许良英的这些闪光思想，给了我很大启示。2008年8月，我给许良英去信，支持他和胡绩伟关于“新民主主义”讨论中的观点，如“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提出‘新民主主义’，完全是为了与国民党争夺统治权的宣传策略；他自己从来没有想真的这样做”，等等。我在信中引用李锐的话：“民主就是民主，并无新旧之分。把民主主义加上一个‘旧’字作状语，再给它作一些限制和增补而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已经不是民主主义了。”以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否定。可喜的是，胡绩伟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终于接受了许良英的观点。

2009年4月，我给许良英送去我的《怀念与思考》一书，并对他关于民主的许多见解表示赞赏。于是，许先生对我讲了以下一段话：

“我国的民主启蒙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1919年，陈独秀以气吞山河的气势高呼：只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可一年后，他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又改口说：‘若不经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这样，这位中国的民主启蒙者又自己亲手扼杀了民主！在经过一番剧烈的折腾之后，陈独秀在离世前两年终于有了自我反思，认识到‘最浅薄的见解，莫过于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用品’。这个反思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但很可惜，陈独秀的反思至今并没有成为人们的共识。当前许多知识分子和当政者对民主问题的漠视，说明真正的民主主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芽、扎根，是多么不容易！这就需要我们去作一些民主重新启蒙的工作。”

此前已获悉，许良英正在写一本关于民主的书；当我问及这本书的进展情况时，许先生很低调地说：“我现在做这件事，已有点力不从心了！”如今，听说这本取名为《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书，经过许良英和夫人王来棣20多年的共同努力，大部分已经完成。这是一部高屋建瓴、全面系统阐述民主的来源和实质的力作，是两位老人留给国人的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的人身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许良英不仅是民主思想的启蒙者，也是民主的践行者。改革开放后，他一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呼吁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做了许多“讲真话，倡正义、维人权”的事。例如：1986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1992年又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4年，他起草《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一文，在国内得不到发表后，刊发在《纽约时报》头版头条；1995年，许良英再一次起草呼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签名者45人（其中包括各界著名人士，如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周辅成、吴祖光等），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08年，为了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许良英写下《林昭，中国的布鲁诺永生！》一文，高度赞扬这位“民主追寻者”的“巾帼英雄”“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政

治思想境界最高、战斗力最强的思想者和勇士”。

2006年8月,《纽约时报》以整版报道许良英,标题是《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2008年4月,美国物理学会颁发许良英“萨哈诺夫奖”;许良英在“获奖感言”中说:“是爱因斯坦的人权和民主思想唤醒了我。自那以后,我投身于中国的人权斗争和启蒙事业。我的目标是把践踏人权的独裁专政的中国变成尊重人权的自由民主的现代中国。”这年8月,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曼谷发表演讲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林肯,另一个是许良英。小布什说:“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为此,许多好心人十分担心许良英的人身安全。当我和许先生聊天时,曾特别提到这件事。许良英不无幽默地对我说:

“我住在高楼,年纪大了,很少下楼出外活动,不会在外面摔跤、闯祸。虽然我的电话经常有人在偷听,每到节日敏感的时期,楼下会有专人为我站岗放哨,不让外面的任何人来接近我。因此,请放心,我的人身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辩证法不是科学方法”

2010年2月22日,我给许良英写信,请教有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一些问题。我在信中写道:

“关于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评价,自这部著作问世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见解。除了上述爱因斯坦的观点(即‘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恩格斯)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盛注)之外,有些学者还不同意恩格斯的另一观点——‘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卢卡奇认为:‘恩格斯的错误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忽视了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否定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卢卡奇还指出,取消了实践中的主体性,仅仅是保持概念的流动性,实际上依然是将辩证法视为一种‘科学’,而取消了辩证法本身的革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律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如此等等。”

我对爱因斯坦和自然科学完全是门外汉,不知道上面这些和‘主旋律’完全相背离的观点是否正确?记得您在《自然辩证法·后记》一文中是这样表述你的观点的:

‘经过一百年来自然科学领域的实践的检验,《自然辩证法》中的某些论点和结论确实是过时了,必须加以修正。……但是,这一著作的基本思想、基本观点和方法依然是正确的,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自然辩证法》究竟哪些论点和结论是‘过时了,必须加以修正’?从1987年至今,又过去了20多年,在这段漫长求索的路程中,您是否仍坚持原来的观点,或者又有许多新的领悟和思索呢?以上这些问题,我想向您求教。”

一个星期后，收到许良英长篇复信，其主要内容摘抄如下：

“‘自然辩证法’我已 20 多年没有接触了，想不到你对它竟如此感兴趣。”

我 1978 年 11 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后面并无‘《自然辩证法》后记’字样。这篇文章是于光远要我写的，作为他的《自然辩证法》新译本的一个附录。在经典著作中加上这样一篇由中国人写的文章，历史上似乎无先例，也可见当时于光远对我的信任。我是在故乡当了 20 年农民后，于 1978 年 6 月回科学院工作的。那时我虽然已从毛泽东的迷信中猛醒，但依然崇拜马、恩、列，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篇文章只是抽象地提出要发展，根本没有想到要批判。”

“1986 年，为了纪念‘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建立 30 周年，我写了一篇回忆和评论文章——《自然辩证法在中国 30 年的风风雨雨》，文章最后部分严厉指出 Engels《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始终未见有人公开指出过，而我在 1940 年第一次读到此书时就已发现。1977 年前后，我曾向于光远谈过这个问题。当时他未表态，几天后告诉我，他核查了 Engels 原文，觉得 Engels 并没有错，这令我十分失望，因为于光远是学物理出身的，把物理基本知识也忘光了。”

“1980 年开始，思想逐步开放，主要反映在 1980 年 10 月中国科技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的论文第一部分《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其主题思想完全打破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框架。”

“Marx 所传承的 Hegel 的‘辩证法’，在抽象的哲学思辨领域中有助于活跃思想，但在科学研究中毫无用处。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基础依然是 Aristotle 建立的形式逻辑。Einstein 在 1953 年给 J.S.Switzer 的信中说过：西方科学发展的基础是：①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②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系统的实验。显然，辩证法不是科学方法。”

我这里比较详细地摘抄了我和许良英的来往信件，只是想说明许良英这位科学工作者的严谨、诚实和公正。

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许良英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不仅表现在治学上，也表现在为人处世之中。

我写过《走近爱因斯坦故居》一文，记述 2006 年访问美国普林斯顿爱因斯坦故居的一些见闻经历，自以为所引用的资料都是有根据的。许良英看了这篇文章后，又给我写了封长信说：读着鄙人的一些文章，“不时产生共鸣，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对我进行鼓励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走近》一文中的许多差错。信中说：

“由于我同爱因斯坦结缘已 70 多年，而他的故居我也曾于 1983 年造访过，因此怀着强烈兴趣细读这篇文章。完全出乎意外，你所介绍的许多情况与我所了解的竟大不相同。我 1962—76 年编译 3 卷本《爱因斯坦文集》，读过 20 来种爱因斯坦传记，自认为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和思想是了解的。现把我所了解的与你文所介绍的作一对照：”

接着，他一一列举了我的文章在时间、地点和人物各方面的重要错误。例如：

“爱因斯坦 1933 年到美国后的工作单位，不是普林斯顿大学，而是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

“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信建议研制原子弹，不是 1936 年，而是 1939 年。制造原子弹的原理‘铀核分裂’，是 1939 年 1 月才发现的。”

“说爱因斯坦晚年‘与子女儿在一起居住’，也有问题：1936 年他的妻子 Elsa 去世后，他的日常生活由终生私人秘书 Helenen Dukas（1928 年开始任职）料理。一起生活的还有继女 Margot，她是 Elsa 与前夫所生。至于 Einstein 的两个儿子，一直跟随他们的母亲 Mileva Maric（1919 年与 Einstein 离婚），再未与 Einstein 共同生活过。他们的长子 Hans Albert Einstein 是 Berkeley 加州大学水利工程学教授；幼子 Eduard Einstein 患精神病，长期生活在精神病院中。Einstein 逝世后，故居由 Helene Dukas 和 Margot 居住。他们相继于 1982 年和 1986 年逝世。”⁹⁰

如此等等，使我自愧行文粗糙之余，深深感受到许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良师益友，对他充满着由衷的敬意。

1935 年 11 月 23 日，爱因斯坦在纽约举行的居里夫人悼念会上的悼词中，讲过这样一段话：

“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⁹¹

爱因斯坦的这段话，对许良英先生也是完全适合的。

——2013 年 2 月 16 日于北京
（香港《开放》杂志 2013 年 3 月号）

拨开历史的迷雾

——读许良英和友人学术交流信件

盛禹九

许良英在他的“自述”——《幻想挫折反思探索》一文里，记述了自己为追求科学和民主崎岖坎坷的一生；在谈到他曲折的心路历程时，有这么一段话：

⁹⁰ 编者对照许良英与作者的书信原稿对这几段做了多处修改。

⁹¹ 编者根据《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对这一段做了多处修改。

李慎之在他传世之作《风雨沧桑五十年》中说，他1949年读到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对其中的一段话：“‘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他心头为之一震。可是我当时并无特殊感觉。因为我从1938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向往共产主义理想，也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专政是通向理想天堂的必由之路。……直到1974年以后，我才开始醒悟到：马克思主张专政而否定民主，是他最大的历史错误，是完全违背人类的历史潮流。

马克思主张专政为什么是错误的？许良英在“自述”里没有细说，也没有见到他发表专文来阐述；但就我所知，在他和友人进行学术交流通信中，有比较系统、鲜明、具有说服力的论述。这些论述拨开历史的迷雾，让人们看到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著作”中的核心思想和本质。

马克思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

第一次见到许良英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他在1993年6月1日写给刘宾雁的一封信中。许良英针对刘宾雁来信中的一些观点，比如“依然坚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要为马克思恢复名誉，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很反感，对议会制和多党制也不满”等等，表示不同的看法。许良英认为：

“马克思作为一位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他的革命理论，他对历史发展的判断，他的经济学理论，现在看来是很成问题的，有的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来说也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

许良英在信中接着说：

“有人认为，马克思是要民主自由的，只是列宁变了样。可是马克思肯定民主自由的话，都是他成为Marxist以前说的，出现于《马恩全集》第1卷的前半部。而在这以后，对民主、自由概念就只有嘲笑、批判和否定。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偶然说了句‘以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但这不过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后的一种理想。而他一再强调，走向这个天堂国的道路，只能是‘专政’、‘暴力’。恩格斯则说得更明白，有国家就没有自由。因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暴政不是不能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根据的。你认为这是‘一大冤案’，这仅出于一种感情上的偏爱，缺乏理性的思考。我是痛苦地思考了十多年才作出这一判断的。我作出这一判断所根据的是：（1）自己一生的感受和所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现实；（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7—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代表性著作和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对于像我们这样自以为是为民主事业而斗争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许良英曾告诉我，可能由于基本观点的分歧，此后刘宾雁没有给他写信，从此双方失去联系，但他对老友关注之心没有泯灭。19年后，刘宾雁的骨灰回国安葬在北京天山墓园，92岁的许良英步履蹒跚来到刘的墓前，表达对曾经为同一目标奋斗过的老友的尊重和怀念。

马、恩从未放弃暴力革命思想

许良英对马克思的专政学说进行比较深入的批判，是在2007年8月24日给李锐的信中。这封信一开头就对李锐说：

“您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写的序言《功劳盖世罪恶滔天》，‘罪恶滔天’，说得太好了！”

接着，他对李锐在“序言”中写的一段话——“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没有建立共产党，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共产主义’是被抛弃的口号”表示异议。许良英认为：

“这个论断与历史事实不符。据我所知，马、恩不仅没有建立过共产党，也没有建立过社会民主党。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创建最早的是德国，是1869年由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共同兴建的，当时叫‘社会民主工党’。两派合并时达成一个共同纲领，称《哥达纲领》。这个由李卜克内西与拉萨尔派代表一道起草的《哥达纲领》，遭到马、恩的严厉批判。恩格斯在看到这个纲领草案8天后的1875年3月18日给倍倍尔的长信中说，这个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批判的，……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信中有一段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分重要的话：

‘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马恩全集》19卷7页）意思是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谈自由。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以此为经典发挥而成的。”

许良英的这封信中还提到：

“1875年4月，马克思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文中把要求普选权、人民机制等称之为‘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并反对‘宗教信仰自由’，认为党必须‘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文中着力地宣传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并且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的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恩全集》19卷31页）

由此可见，直到1875年，马、恩依旧在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8年后，马克思就去世了；去世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改变这些基本概念。”

针对当前流行的所谓“马、恩晚年放弃暴力革命”的观点，许良英在这封信中作了辩正。他说：

“由于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恩格斯对它刮目相看，在他去世前5个月的1895年3月，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中说，可以‘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能夺得的一切阵地’。李卜克内西就此撰文，宣布可以放弃暴力革命。可是立即遭到恩格斯的批评。他于1895年4月3日给法国拉法格的信中说，‘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黑和白，

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马恩全集》39卷436页）意思是说，议会斗争与暴力革命不是黑白不相容的。由此可见，恩格斯从未放弃暴力革命思想。”

实际上，早在1988年11月，许良英在“全国现代化理论讨论会”上，就已提出“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的观点。当时坐在许身边的李锐曾当面责问许良英：“你为什么批判马克思？”“六四风波”后，李锐思想有了很大变化。2004年，李锐又一次见到许良英，两人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时，李锐说：“现在我同你一样。”

“专政”必然造成灾难性后果

许良英对马克思专政学说的评议，还见之于和其他老友的通信中。2007年9月12日他给刘绪贻教授写信，回答刘向许提出的一个问题——“你反驳辛、谢论点的目的是什么”，许良英这样写道：

“我批驳他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指出他们做学问的态度太不严肃，把自己的主观想象硬套在马、恩头上，连《哥达纲领批判》这样的名篇也不查一查。二是说明马、恩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以后，其主要论点，如‘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主义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一直到晚年都未改变。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Joseph Weydemeyer的信中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他的‘贡献’。……有人认为，马、恩从未建立过完整的思想体系，因此不存在所谓‘马克思主义’。我不能苟同。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实际存在的。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共产主义。人类经历了13—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18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到19世纪，民主思想早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历史主流，可是，19世纪中叶马、恩却标新立异地主张专政，反对民主，这显然是完全逆历史潮流的。必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20世纪的历史已经成为明证。”

是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中，没有比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更受到捍卫者的青睐和批判者的唾弃的了。众所周知，苏共的许许多多令人发指的惨绝人寰的暴行，都无不是假“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理直气壮地、大规模地实行的。在五、六十年代，随着列宁、斯大林恐怖统治内幕的曝光，许多西方共产党甚至兴起一股修改译文热，即在自己的党纲中将“无产阶级专政”纷纷改为“无产阶级执政”，以示与苏共那些举世震惊的暴行划清界限。在中国，毛、邓时期也主张、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暴政绵延，冤案不断。而在今天，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民觉悟的提高，一些当政者认识上也有所变化：至少在公开的政治文件和报告中，已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了，说明他们对这类词汇也开始有所忌讳，尽管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看不出一贯执行的“专政”政策和实践有多少改变。

赞扬张宣三批判马克思主义

2004年—2008年，著名学者张宣三写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之一）（之二）

两篇文章，全面系统地批判马克思主义。2008年7月和9月，许良英读了这两篇文章后，满怀热情地接连给张宣三写了两封信。信中说：

“在我所了解的思想较解放的老人中，只有已故的李慎之同我一样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但他从不公开说，只在信中告诉我。现在意外地发现你也持同样的见解，真是空谷足音，令人振奋！”

“读完你的文章，感到非常有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彻底的批判。这篇极有份量的论文（之一）4年前就已写成，可惜我当时没有看，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之所以会犯这个错误，主要是抱着成见，以为你也和十几年前一样，认同王若水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人主义’，是要求自由、民主的。想不到你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否定得比我彻底。我1987年开始否定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政治思想上考虑，而你从基本哲学思想上来全面论证，还查阅了马、恩有关的全部著作。这项批判工作太重要了，应该会引起强烈共鸣。”

张宣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后，的确引起了广大学术界的重视和共鸣。李锐特别为此书作序，充分肯定这本书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新民主主义”是毛的宣传策略

众所周知，胡绩伟写过一些文章，十分肯定和赞扬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胡在晚年还提出，“胡赵十年新政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等等。对此，许良英曾多次给胡绩伟写信，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许良英认为：

——当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高唱“四大自由”，反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标榜“军队国家化”，完全是为了与国民党争夺统治权的宣传策略，他自己从来没有想真的这样做。就说“革命圣地”延安，何曾有过“四大自由”：王实味仅仅提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遭围攻，甚至被处死。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是清一色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如果中间有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允许他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吗？

至于1949年以后的3年，表面上有党外民主人士担任国家副主席、副总理和部长，但他们没有多少实权，重大的决策都由各单位的党组先讨论决定，党外领导人只是事后附和而已。……当时根本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特别是1951年搞的思想改造运动，不允许有思想自由。不允许公民有基本权利（即人权）的政体，无论如何不能称为民主政体。

——“新民主主义”问题，就在一个“新”字上。所谓“新”，就是必须由共产党领导，这是对民主的否定。胡耀邦主政时期，虽然没有表示过要放弃党的领导，但他强调党领导的目的是建立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在实际上，他有意地逐步缩小党的作用，如实行党政职责分开，实行行政首长、校长、厂长负责制，党组织不得干预；并规定首长由选举产生，而且必须实行差额选举。……因此我认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义，不值得认真对待。我们讨论‘胡赵十年新政’时，最好不要把两者拉扯在一起。

可喜的是，胡绩伟经过认真反复思考后，终于接受了许良英的意见。他临终前不久在《对新民主主义的反思》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当年在‘民主主义’四字之前之所以加上一个‘新’字，是为了埋下两个伏笔：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前途。现在看来，这个‘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已经越来越腐化、黑化了……”

“对于‘重建新民主主义’的提法，现在我的考虑是否用‘高度民主’的社会这个提法，可能更好一点。这样，既可以避免所谓真假的悖论，又可以避免什么主义的局限性。如果有更准确的更好的提法，我也不坚持自己的看法。就其实质来说，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道路。”

对“专政”有切肤之痛

许良英对马克思的专政学说有深刻认识和尖锐批判，正如前面他给刘宾雁信中所提到的，除了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马、恩思想有全面彻底的了解外，对其学说所造成人类社会的灾难性后果，特别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有着切肤之痛的深刻感受。

众所周知：许良英 1938 年参加革命后，一直是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忠实信徒。1957 年“鸣放”期间，许良英不仅没有任何“反党言论”，而且当他听到这类逆耳的言论时，都予以反驳。他只是提出党不应进行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对生死与共的朋友，怎么可以对他们无情无义”，因此成了右派，而且被定为“极右分子”。

“自己莫名其妙地自食其果”，“被定为‘专政对象’以后，仍死心塌地地迷信毛泽东和马克思，直到 1974 年才开始从对毛泽东的迷信中醒悟过来，1984 年才决心摒弃马克思主义。”许良英如是说。

许良英打成“极右”后，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送黑龙江农场“劳动改造”。他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经受不住东北的严寒，决定选择离职回乡当农民的道路。

许良英作为“专政对象”在农村生活了 20 多年，经历过太多的磨难；特别是文革期间，当地“贫下中农会议”要开万人大会批斗许良英。按当地惯例，受批斗者都要五花大绑，双膝下跪。许良英无法忍受这种凌辱，在批斗前 4 小时喝下两瓶敌敌畏，以死抗拒，被当地卫生所医生救活。

文革结束后，1977 年 4 月，许良英被调回中国科学院工作，并得到平反。在 1989 年的民主运动中，许良英发起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签名者有包括王淦昌在内的著名科学家 42 人。之后，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方励之被诬蔑为‘黑手’遭到通缉。亲友们为许良英的安全担忧，劝他躲避一下，许良英拒绝了。他说：

“我已经作过‘三世人’（指许一生经历三个阶段：1920—1949，1949—1969，1969 年以后——盛注），已经活得够长了。邓小平说，用 20 万人的生命可以换取 20 年的稳定。我若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一个谭嗣同，当死而无悔。”

许良英就是这样为科学和民主奋斗了一生。他始终敢于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表现出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超人胆识和大无畏的铮铮风骨。他的崇高品格和感人业绩，将永远受到世人的景仰和怀念！

天蒙蒙雾重重 良师诤友已去矣

——悼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女士

丁子霖 蒋培坤

在龙年岁末，北京浓重的雾霾中，我们遽然痛失了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女士。

自从 1992 年结识以来，他们一直是我们的良师诤友；二十多年来，我们与他们的交往从未间断过。

1 月 30 日下午，北京依然是雾霾重重。这天是首都各界人士与许先生遗体告别的日子。

在这个日子，我们想起了去年九月下旬，我们回南方前去看望他们夫妇的情景。那时王老师脸部有些消瘦，她的癌症已渐渐得到控制；许先生精神尚好，只是行动有些缓慢。他劝我们不要回南方，岁数大了，不宜常走动。我们告诉他们，时间不长，不到年底就回，回来后再来看你们。没有想到，这居然是我们最后一次与他们见面。他们走得太匆忙，没有等到我们再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就离去了。

去年 12 月初我们从南方农村回到北京后，因为忙，一直拖到下旬才给他们家里去电话，这才知道他们两人都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我们赶到海淀医院去看望他们。许先生已经处于长时间昏睡之中，我们一个劲儿地在他耳旁叫“许先生，许先生……”，叫了好久才见他两只眼睛先后睁开一条缝（后据其小儿媳讲，这就算醒了），喉间发出细微的声音，但就是说不出一句话。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有人来看他了。接着我们又去看望了王老师，她已经失去知觉，任凭我们怎么呼喊，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只能默默地在她身旁站了一会儿……。第二天，她平静地过世了。我们盼望许先生能出现奇迹。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他的“病情报告”（他长子许成钢给我们留的“博客”）。有一段时间病情似乎平稳些，我们也稍稍宽心。1 月 23 日他长子要回香港，说两周后再回来。没有想到，成钢离开的第二天，许先生病情恶化，接着就停止了呼吸。王老师殁于去年 12 月 31 日，许先生殁于今年 1 月 28 日，一前一后俩人相随而去，相差还不到一个月。

如今与许先生的遗体告别，不由得回想起这二十多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在我们脑海里像电影般闪动，禁不住悲恸欲绝，难以自拔。

感谢上苍，让我们在苦难中有缘结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这对启蒙思想家夫妇。

回顾许先生和王老师在一生中做过什么事、出过什么著作；追索许先生青年时代“把脑袋别在裤带上”（许先生对我们这样说过）参加了地下党斗争；中共建政后又怎样成为“没有右派言论的右派”；当“右派”后又怎样在老家农村“挣工分”苦苦熬过二十年，其间又怎样一边务农、一边从事编译、研究爱因斯坦著作，由此走上科学、民主的坦途，成为上一个世纪中华民族史上的启蒙思想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一直为中国的民主、人权、法治奔走呼号……，这不是几篇文章几本书所能尽述的。许先生生前说过他要写一部回忆录，但据了解只写到1958年，他本打算余下的部分要到他95岁以后再完成，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写完。

我们在这里只想以个人的角度，讲述他们夫妇自1992年以后这二十多年里与我们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们认为，这也许能让人们了解许良英夫妇平时为人处事的准则，更清晰地体会到什么是许良英精神。

（一）

回想1992年，这一年对于我们两家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年10月，我们在中国科协的《未来与发展》刊物上读到许良英先生的一篇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该文掷地有声地打破了“六四”血腥镇压和随后的大清洗所造成的万马齐喑、一片沉寂的氛围。为此，在党员重新登记时当局不准许他登记为党员，就此结束了他46年的党龄。而我们也同他一样，遭受到类似的命运。在这一年以及此前因接受美国ABC等海外媒体采访，披露了儿子和其他遇难者被害的真相，公开谴责了“六四”大屠杀而遭受当局剥夺教席、停止招收研究生、禁止发表文章等一系列处罚，丁更因拒绝党员重新登记而被中共除名，从此也就结束了32年的党龄。

我们正是在备受丧子之痛和行政打压的情况下，读到本系一位青年教师传来的许先生的那篇震聋发聩的文章，读后受到极大震动。当即托他帮助联系，请求拜见。没过几天，我们就获得了许先生的热情相邀。

第一次是在他们家中见面。那时的许、丁两人均已无中共党籍。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没有客套，没有寒暄，气氛亲切、坦诚。他们夫妇俩除了详询我们儿子遇难前后和家庭的情况，还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苦难经历和思想变化过程。在这两位前辈面前，丁也毫无顾虑地向他们坦诚了“六四”开枪前自己对中共政权的愚忠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无知……。

与许先生夫妇的相见、相识，对我们当时的走向来说确实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在当时，发出公开抗争第一声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高压，如何坚持下去。可以说，那时我们又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痛、困惑、渺茫，无所适从。

中国人民大学与中科院黄庄宿舍相距不远，骑自行车只需要十来分钟。从此，我们就经常去许先生夫妇家。

在我们的观察中，这二十年中的前十年，他们家几乎是遭受中共迫害的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心灵港湾和驿站。从五十年代的“右派”，到七十年代“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

运动的政治犯，八十年代“六四”惨案的良心犯，九十年代的各种政治反抗者……，对于来访者，他们总是一一热情接待，有些还在他家里住下。这段时间许先生常常接到民运人士的来电、来信，不论其声名显赫还是地位低微，他们总是有电必回、有信必复，绝不拖延。像魏京生、徐文立夫妇、刘念春夫妇、王丹及其父母、刘刚弟弟……等等，都是许先生夫妇介绍我们认识的。而当魏、徐、王、刘等人在狱中时，他们的家人又都是许先生家的常客。

许先生夫妇对我们“六四”受难者群体更有着一份特殊的关爱。他们始终如一地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他们不仅帮助各方朋友向我们转达捐款，而且自己拿出钱来捐给难属。他们默默地为我们这个受难的弱势群体做了许许多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实事。许先生夫妇不仅是个呼吁民主、人权的启蒙思想家，而且还是个充满爱心的人权践行者。

他们一直帮助我们寻访同命运者，初期一些重要的受难者线索，如体院学生“六四”重残者方政，北大遇难讲师肖波的孪生遗孤等线索都是他向我们提供的。不仅如此，他还委托身边一些年轻人来协助我们寻访。记得九十年代中期那几年寻访到的人数急剧增加，眼看着不少受难家庭遭受精神和经济困难双重折磨，而我们所能募集到的捐款又极其有限，常常陷于对新找到的家庭无捐款可转的窘境，许先生夫妇得知后常常在我们去拜访时从书柜中抽出书中夹着的捐款交给我们，有美元、德国马克、日元、人民币、……这些都是海外友人托他转交的人道捐款。当然，那时我们更多是处于“断炊绝粮”的状态。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他家，王老师到里屋拿出一个白信封，内中装着5000元人民币，说明是他们自己捐的。我们实在不忍心收下，因为我们太清楚他们日常俭朴的生活了——布衣布裤，粗茶淡饭。老俩口脚上穿的塑料拖鞋都是5元一双的。此后，他们还从自己身边的同事、老友处为我们募集到一笔又一笔捐款。其中有一笔十分感人，那时单位搞房补（改善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有一对已退休的老知识分子，从他们那里得知我们难属的艰难境况后，决定不买新房子，从房补中拿出10000元托许先生夫妇捐给了我们。王老师罹患鼻癌后还惦着难属，知道我们每年都举行新春餐会，她连续数年早早准备好一些营养品让我转交给其他患病的老年难属。

北京体院学生方政在当年的“六四”凌晨从天安门广场和平撤出时遭坦克碾压失去双腿，被撵出北京后去海南谋生又一直厄运连连，许先生夫妇始终挂念着他的处境。当他们得知方政远在海南日子艰难，想回合肥父母身边，但屡次申请均遭当局拒绝。俩老心急了，要丁一定想方设法帮方解决户口问题，后来丁终于找人了结了这个难题。方政是个重情义的人，在他几年前被迫去国赴美前夕从安徽来京与“天安门母亲”话别后，已经很疲乏了，他还是执意让其妹夫推着他坐的那辆破旧轮椅从万柳地区走了一个多小时到黄庄许家，与许先生夫妇亲自告别——现在许先生夫妇过世了，那次一别竟成永诀。

北京青年工人黄宁“六四”中遭枪击，双目失明，就此失业。妻子怀孕在身，黄宁自强不息，伤愈后即上了按摩学校，但结业后苦于找不到工作。许先生得知后主动通过老友帮他托关系、找门路，终于在市内一所按摩医院谋得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许先生夫妇虽是高龄老人，但从来都笔耕不辍，每次我们拜访，他俩都是停笔从伏案几头站起，在我们身上不知耗费了他们多少宝贵的时光。他们对于难属群体从不吝惜

时间和精力，总是耐心地倾听我们事无巨细的诉说：新寻访到的难属及其家庭状况，人道捐款的收转，难属间的交流，当局的阻拦，骚扰和破坏，以及我们的应对……我们报喜亦报忧，从不向他们隐瞒，有时许先生会听得爽朗大笑，而王老师则在一旁会心地微笑。

(二)

蒋同许先生一样，出生在南方农村，从来就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自从我们成家后，生活清苦，孩子多，只有在孩子生日那一天全家吃面，从来都轮不上他。我们与许先生相识后的第二个冬天，他们知道 1993 年 11 月 15 日是蒋的生日。于是，他们夫妇在家中特意为蒋张罗过六十岁生日，不仅准备了奶油蛋糕，还按我们南方人的习俗吃了面。这都是老俩口亲手操持的，友人小齐为我们摄下了当时的珍贵镜头，至今翻看那张包括他们小孙女在一起的合影，真是不胜唏嘘！那天谁都未提“六四”，更未提我们的亡儿，但大家心里都惦着。许先生夫妇以他们博大的爱默默地抚慰我们的丧子之痛。此情此景，怎能忘怀！？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们住在无锡乡下。这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30 日，无锡市国家安全局以“经济来源不清”的莫须有罪名，把我们秘密关押在无锡某处达 43 天之久，重获自由后回到北京，得知除了周淑庄等难友为我们呼吁外，许先生也挺身而出，对西方媒体说：说丁子霖贪污捐款？岂有此理！他怒斥当局无道！

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常常遭受到国安部门的盯梢、骚扰、监控，甚至长时间的监视居住，有时一年中便衣在门口会累积看守达三个月之久。而许先生夫妇也几乎与我们同时，受到海淀警察的把门监视、上门盘问，一碰到敏感时间、敏感事件就要把眼睛紧盯着他们，甚至病得不能出门仍依然如故。他们把这看做家常便饭，有时气极了就斥责他们没有人性。

许先生为人处事泾渭分明，只求真理、不认亲疏。有时也会对我们当面批评，毫不客气。记得有次为了一位民运人士，他严肃地批评丁：“你根本不懂政治！”“你太轻信了！”丁不服气顶撞他：“我怎么不懂政治了？我一辈子吃了政治多少亏，我儿子都被政治害死了，我厌恶透政治了！”丁越说越激动，竟从座上站起来，许先生亦被气得站了起来。王老师急得忙在一边拉劝：“你们两人心脏都不好，干嘛这么激动，都给我坐下。”

这场争执过后不久，许先生为了说服丁，一天突然亲自步行到我们人大宿舍家中，一进门就对丁说：“你不是要事实吗？我求证过了，我给某某的父亲打了电话，他父亲亲口在电话中讲的，他们家从来没有在中南海住过……，更谈不上江青抱过某某”。原来那天他老人家步行来我们家就为了这一件事。在事实面前，丁不得不口服。过了些日子，丁又获悉那位民运人士的一些表现，证实了许先生对人对事的判断。当时我们在无锡，等不及回北京，丁立即拨通了长途，在电话里对许先生说：“您是对的，我错了！”这回丁确实是心服了。

(三)

1994年3月，那时北京、上海等地逮捕了一大批人，包括北京的魏京生，国内再度风声鹤唳。我们万分焦急，蒋建议由许先生牵头发一份公开信，呼吁释放政治犯，并带去了蒋草拟的呼吁书文本。许先生说这个主意与他不谋而合，完全赞同。但看过蒋草拟的文本后对蒋说：“这样写不行！你们搞文学专业的，文字不够理性、简明……。”他很快亲自动手写出了那份世人所知的《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而且运用他的影响力征集到了邵燕祥、刘辽、张抗抗等人的签名，刊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被人们称之为“七君子上书”。

许先生政治嗅觉极其敏锐。此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在联合国宽容年发起了《迎接国际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征集了王淦昌、杨宪益、周辅成、林牧、吴祖光等45人签名。这封公开信影响很大，得到了国际上上千名科学家乃至10名诺贝尔奖得主签名，可谓上个世纪90年代中华民族史上的一项壮举。

许先生对人对事疾恶如仇，眼皮底下容不得半粒沙子，不管是谁，只要在他面前撒了谎，他都要一追到底，丝毫不留情面。曾有一位民运圈里的老人，自称曾担任过前中共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当时他拥有很多群众（现称粉丝），他先识许先生，后许又把他介绍给我们。在我们的印象中，许多与他相识的人（包括我们在内）从未怀疑过此人这段光荣历史，国内民运人士这样口口相传，海外媒体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介绍他的身份。可唯独许先生较了真。他以一位科学家的求真精神写信向其本人直接求索真相（许先生好傻啊！）逼得对方气恨不已，但又不得不做出书面答复。那年元旦，正好我们去向许先生夫妇拜年，两位老人正在打笔仗呢，你来我往。那天一进门，许先生就对我们说：“这个元旦我倒霉透了，不得不给他写这样的长信。”我们听了挺纳闷，随后他给我们看了对方的来信。我们记得此信开头是这样写的：“好吧！我来向你交代历史……。”然后是哪年哪月干了什么，哪年至哪年……。果然，从此以后，这位老人在有生之年，再也不向人提起那段光荣历史了。其实，今天想来，许先生这样做，又何尝不是对他人的爱护呢！

许先生夫妇俩都是原则性极强的人，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许先生刚直不阿，坚定不屈，王老师则柔中有刚，韧性不折，他们俩都是民主理念的忠实践行者。

记得在1998年，国内涌动组建反对党。许先生夫妇和我们都持不赞成的态度，认为当时组党条件尚不成熟，不能轻信当局去民政局申请那一套鬼话，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把89年“六四”之后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那批民主火种被当局像割韭菜那样一起割光。我们与许先生夫妇不约而同，都持有同样的看法，用不着讨论即成共识。我们都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劝诫身边的朋友。

一天突然获悉，继王有才在杭州之后，徐文立在北京也宣布成立民主党了，而且这两人都去当地民政局申请登记。我们来到许先生家，他连声埋怨：“徐文立不该上当，他年岁也不小了，又多年坐牢，有从政的经验，怎么会这样误判形势呢！”许先生接着对我们说：就在前一天，徐文立还在他家里信誓旦旦地说：他自己是“广交友，不结社”。可是泼水难收啊！

此后一些日子里，我们再去许家，他拿出徐文立每天给他发来抬头写着“徐办”的

文告给我们看，大家都哭笑不得。终于，最担心的事不久就发生了，浙江王有才与北京的徐文立等一些同道们先后相继被捕并被判了重刑。

我们再去许先生家时，他不仅不再责备与埋怨，而是拿出一份为徐文立他们辩护要求释放的呼吁书，征集我们签名，丁甚是不解，快语道：“这样不听劝，一意孤行……。”许先生一脸正气，站起来严肃地对我们说：“不！伏尔泰曾经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

感谢许先生，他又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民主教育课。

（四）

在我们所了解的人之中，最典型的是他对刘晓波的态度。许先生是个爱才、惜才的人，平素对刘晓波并无成见。那是因为刘在“八九六四”后在秦城监狱以“见证人”身份对狱方说了“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句话。官方利用此话在海内外媒体广为散布，以图掩盖血腥屠杀的罪行。许先生对刘的这番言论极为愤怒，说他是在为当局说话。刘晓波出了秦城监狱后又写了《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一文。许先生更为光火。他认为这是学运参加者自己跳出来对“八九”运动采取否定态度⁹²。当时，我们与许先生不谋而合，也不同意此文的立场、观点，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愿见刘。后来在刘经人一再转达要求同我们见面的意向后，我们才终于在1996年夏天同他见了面，通过当面直接交谈才渐渐消除了一些隔阂。然而，许先生却始终坚持不见。据刘亲自告诉我们：在屡次请求拒见之后，一天他和周舵两人请包遵信（那时许先生刚为包的文集做了序）领着他们叩开了许先生的门。没想到，许先生一点面子都不给，连包先生在内三人一起都被他轰出了家门。

事后，我们曾试着问过许先生：“您不是信奉伏尔泰的名言吗？为什么不给刘晓波他们见面的机会呢？”他说：“这不同于观点的争论。”他平生最看不得背叛或变节（我们分析这也许是他青少年时代做地下党工作所形成的观念）。其实，我们后来之所以原谅刘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话，是因为当时他在广场，确实没有亲眼见过死人；而我们寻找到的广场旗杆下的死难者也是后来才发现的。至于《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一文，最多只是观点上的不同而已。

同在北京住，刘晓波在2008年底失去自由前始终未能如愿与许先生见面，也许正因如此，所以他在文章中总是反复忏悔、反思，也多次请求我们在许先生面前多作解释，也许在他内心深处一直在期盼着老人的宽恕和原谅吧！

据我们从旁观察，许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已不再批评刘晓波了，但毕竟心结未曾解开。2008年底我们返京后得知，由刘晓波参加起草和发起的《零八宪章》，总体上许先生是支持的，但认为在某些方面还需要斟酌、修改，可惜当时时间已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夫妇俩没有签名。事后我们曾设想过，如果当年不是蒋在无锡发作脑梗，早日回京参与征集签名与沟通的话，说不定许先生夫妇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⁹² 据杨思梁回忆，许良英对刘晓波不满，还有一个原因：许认为刘不是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而是想自己出名。编者注。

(五)

自从我们认识了许先生夫妇，他们俩就热心地把我们介绍给他们所信赖的老朋友，如杨宪益、李慎之、于浩成、胡绩伟、方励之等人，这些人中我们有些没有能来得及见上面就去世了。他们还把一些新朋友介绍给我们。在我们面前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番天地境界，让我们学了不少、懂了不少。在逆境中也得到了不少关爱与安慰。

李慎之先生与许先生夫妇之间是交情很深的老朋友，许先生早就向李先生推荐我们，只是那几年我们总是南来北往，留在北京的时间不多，因此一再错过，未曾见上面。但在1999年李发表《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后，许先生很高兴地把文章复印了给我们看。读后丁直率地提出：“文章写得很好，但既然是写五十年，为什么其间发生的‘八九·六四’这样重大的事件只字不提呢？”许先生听了默默无语。

未隔多久便有了回音。一天，我们在许先生家，他对我们说：李先生接受我们的意见，而且坦然相告：“他对邓小平起用他复出工作有知遇之恩，所以才在‘五十年’里回避了。”其实，李对“六四”屠杀的评价是负面的。他如此坦陈，我们就能理解。许先生看我们平静地接受了对方的解释，显然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商量日后安排我们与李的相见（人民大学谢韬老校长在他生前也曾力促我们与李见面）。未料李猝然离世，竟成了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许先生每次忆及李先生都难掩黯然神伤之色。

许先生与方励之先生的友谊也是人所共知的。我们与方的交往，也是靠许先生的介绍。在1995年5月，许先生与丁同获纽约科学院“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丁对此感到忐忑不安。当年该院委托许先生征求丁意见是否愿意接受时，丁就表示自己不够资格获此殊荣，但在许先生一再鼓励下，由他联系请方励之夫妇代表他和丁领奖并代致答词。1995年夏丁写好答词交给了许先生便回南方乡下。就此，我们也建立起了与方励之先生夫妇未曾谋面的联系和友谊。

在2000年冬，我们住在无锡乡下尚未返京，一天夜里突然接到方励之先生的电话，交谈甚短，他只是问丁的出生年月、地点及父母亲的姓名。因电话是遭窃听的，丁据实告所问后不便进一步问他为何要了解这些。方听了只是爽朗地告诉丁，他也是1936年出生在上海。

当年回京后按惯例立即向许先生夫妇电话报到，约定过几天待我们安顿下来后再去拜访，未料，次日早上许先生便叩门前来了。那时我们还住人民大学宿舍，年底隆冬，天气极冷，而许先生竟是一如既往靠一路步行走来的。我们看着他身上穿着棉衣，但腿部单薄，而且，大概由于走的急，袜子往棉鞋中缩，以致袜子与棉毛裤脱节，裸露出了一段脚踝骨。我们十分不安，本应该是我们过去的，怎能这么冷天让他跑来呢！

我们纳闷莫非有什么急事啊？

坐定，他急着告诉我们是受方励之先生之托，来向我们说明那天夜里在南方给我们去电的用意。询问简况是为了推荐我们申请诺贝尔和平奖，而且还特意说明，天体物理专业不能推荐此类奖项，方是受文史哲方面推荐人之托来了解的。原来如此！

面对许先生这位热情正直的老人，丁必需敞开心扉，告诉他：早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先是瑞典的茉莉，后是中国人权的刘青，在电话里都不约而同地告诉丁，要推荐丁申请诺奖。丁当时明确告诉对方，请不要推荐我，还是让我做自己该做的事吧。后来又有海外媒体采访提起这件事，就都是这个态度。

许先生十分坚决，一再鼓励和说服丁。最后丁表示：请他转告方先生及国外的朋友们：“我感谢他们的好意；若提名，千万不要再提我个人，请提‘天安门母亲’群体”。

(六)

2006年2月，高智晟律师因发起“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并在网上发表绝食日记，一时间各地纷纷响应，声势很大。当时丁总有一种不祥之感，仿佛眼前又出现了十六年前那些寝食难安的日日夜夜……，更担心重蹈八年前民间组党的复辙。于是以个人名义给高智晟律师写了一封公开信：《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致高智晟先生的公开信》。未料所及，这封信捅了马蜂窝，立即招致海内外铺天盖地的质疑、批判。后来又旁及其他（正如许先生所说的“不懂政治”啊！）。在我们所敬重、所信赖的许先生生命岁月的最后十年里，他们的日子过得孤独与寂寞。他们家里再也不像前十年那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他们的一些老友或已离世，或已年老多病，行动不便；原来一些著名的政治犯及其家属或刑满归家团聚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去了异国他乡，生活在自由的世界里；再有或者另作选择，在国内自谋生路，忙于经营，人们再也不需要来求助于他们了。所以许先生夫妇家的心灵港湾和驿站，渐渐亦告历史终结。现在世界已从外电时代转入互联网时代，人们的信息来得容易，且来源广泛。许先生夫妇不会用电脑，信息来源逐渐缩小。再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闻热点，上个世纪或本世纪前些年的热点慢慢让位给了今天的热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关怀，上世纪70后被后起80后、90后所代替了。现在70、80的人逐渐走入历史。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我们自2003年搬出人民大学宿舍，离他们家也远了些，尤其这十年，因身体原因，我们已不再能骑自行车了，每年春秋两季在南方乡下度过，所以也不可能像前十年那样勤去他们家了。但每次离京前、返京后都会去看望他们，其间在外地也会通电话，这已成为惯例。

尽管如此，在我们最后与他们几次交往中，发现两位老人虽然与外界交往少了，来访者也少了，但他们心情淡定、从容，倒可以抓紧时间集中精力从事民主理论研究和回忆录的撰写。

这里顺便记下一件趣事：

2011年3月，我们返锡前去他们家拜访，顺告当年2月1日中东爆发茉莉花革命的局势，以及当日某公安部门找到我们某难属征询赔偿一事。许先生夫妇听后对我们说：“怪不得前几天（应是2月8日前）片警来吩咐许不要出门。许很不解，问对方“为什么？”答曰：“茉莉花革命，2月8日那天要在北京好几个地方示威，其中就有中关村。”许先生忙问：“中关村什么地方？”答曰：“中关村图书大厦。”许先生闻声说：“好极了！”

那里正在我家对面，走过人行天桥就不远了，明天我一定去看看。”吓得那小警察慌忙劝说：“老先生，您千万别去；您如去了，我可闯了大祸饭碗不保了。”

许先生趁此机会还问那位警察，我们这个院里你们除了“看”我还要“看谁啊？”小警察倒是挺坦率，告知除了你们家还有一家地下宗教的。讲完这件趣事，许先生开怀大笑，王老师在一旁也忍俊不住。如今回忆起来，恍如昨日，但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风雨如晦，许良英远行

——怀念许良英先生

王凌云 王宪曾

二〇一二年六月初，我们从美国探亲回来即去看望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老师，照例向他们汇报王丹近况和他们关心的人和事。当时，我们感觉许先生精神有些沉闷，话语不多。我们想，可能是年初因心脏不适住了一段医院，身体尚没复原，加之前不久方励之教授猝然逝世，他们是患难知交，如今先他而去，对他带来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十月初，我们从山东回来，去看望二位老人，见许先生气色很好，言谈爽朗。他说常去马路对面的小公园散步，我们劝他出门还是拄个拐杖好，因为中关村一带车水马龙，老人过马路很不安全。这次见面，只是看来王老师较几个月前瘦了许多，但却精神尚好，有说有笑。她很高兴地将国家博物馆文物捐献证书拿给我们看，这是半年前王老师交我办理的，将她五十多年前采访整理的数十位中共创始人的访谈记录捐献给国家博物馆。此后，因我家遭遇拆迁，诸事繁多。我们正准备新年去看望二位老人，却传来王老师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不幸病逝，许先生也在医院处于昏迷中。“怎么会这样呢？”简直无法令人置信。三个月前王老师站在家门口向我们挥手，许先生执意送我们到电梯口的情景不断在脑海中闪动。

当时，许先生正处在高烧中，只想待病情稍稍稳定转入普通病房后再去探视。那时只有一个信念，许先生一定能闯过这一关。记得我同王丹在电话中谈到许先生的病情时，表示担心许先生病愈回家后发现王老师已离他而去，能不能经受得住这种打击。他很有信心地说：凭许先生的顽强性格，一定能挺过来。何曾料到，一月二十八日噩耗传来，许先生还是没能醒过来。一月三十日我们在哀雨愁雾中送先生远行。

在我们家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我们成了许先生家的常客。

许良英为王丹陷狱大声疾呼

一九九五年五月，王丹第二次被捕秘密关押。家人在焦急、等待、无奈中度日。一九九六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要求家人在“六四”期间不要做对王丹不利的事，言外之意是不让我们对外讲话。我们来到许先生家，就在五月二十一日王丹被秘密关押一周年

之际，要不要公开说话请教许先生。他沉思良久，说：既然他们（北京市公安局）那样说了，就再忍一忍吧！一个月过去了，仍无结果，家人和朋友们都很着急，我们便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薛驹写信，希望他从法律的角度过问一下王丹被秘密囚禁一事，许先生亲自修改信稿。

这一年的十月，王丹被提起公诉。我从法院拿到起诉书的副本，回到家立即给许先生打电话，将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告诉他。听后，他极其愤怒，说了一句：“比我想像的还荒唐！”十月三十日，王丹“阴谋颠覆政府”案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审判长在休庭半个小时后，即宣告对王丹判以十一年重刑。回到家刚一进门，我们便急急地给许先生去电话，他说，已经知道了。原来在法庭闭庭七分钟后，中国的新华社便向海外宣布了王丹一案的审判结果。当法院终审裁定后，许先生估计：不会出三年事情便会有结果。

还是在这一年的七八月间，外边纷纷传言，有的说王丹已被判七年徒刑，有朋友到家来，说王丹已判劳动教养，人已经发配到黑龙江省的一个劳改农场。为此，我们写信给北京市负责政法工作的强卫，要求就此事予以证实，但却没有回音。此前，许良英先生曾经声言：王丹一旦被判，他要说话。八月间，中国科学院党委派人找许先生谈话。因为许先生听说王丹已经被判劳教，为此，科学院党委找了相关部门询问，证实王丹尚没被判，但准备要判。他们要许先生在判之前不要说话。几天后，许先生所在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党组织派人到他家来，说据他们了解，王丹准备要判，要求他在被判之前不要说话，判之后，他要是向有关部门写信，要先向研究所领导打招呼，许先生说：“人已经被判了，写信还有什么用！我只有抗议。”来人说抗议书要先给党委看。

王丹被判以重刑，许先生极为愤慨，不顾当局的重重阻挠和沉重压力，不顾自身处在险恶的环境之中，挺身而出，奋笔写出了《为王丹辩护》一文，向世人昭示真相，彰显了这位自由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和磊落胸怀。我接到这篇文章后，饱含热泪，一连读了三遍。我们立即将文章传真发给美国刘青先生，不久即在《纽约时报》头版刊出。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仅有的一篇为政治犯公开辩护的文章。这是一篇檄文，文章指出：“就在大张旗鼓宣传‘精神文明’的今天，却要对这样一个青年判处比当年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判处共产党员更重的徒刑，实在令人费解和深思”。文章最后写道：“他被判如此重刑，这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但我深信，只要正义和公理尚在人间，这个冤案一定像‘反右’、‘文革’时的无数冤案一样，得到平反昭雪。我在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令人痛心的是，许先生还是没有等到这一天。

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王丹远在锦州服刑，每个月探视回来，我们都到许先生家，向他们报告王丹狱中情况，两位老人极为关心王丹的健康，为他寻医买药。一九九八年四月，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为名将王丹流放到美国，许先生一如既往指教他、鼓励他。

许良英、王来棣、周辅成、刘辽等曾经历过更多风雨坎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都有一身正气，他们渴望国家民主、富强，关心和支持为中国民主化事业献身的青年一代，薪

火相传。

许良英先生是王丹的楷模，他那刚直不阿的品格和为追求、争取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虽九死而未悔”的精神深深影响着他。许王两位先生也是我们的良师和益友，在我们最困难的那些日子里，是他们给了我们温暖、勇气和信心。十几年来，在和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老师的交谈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那种独持己见，不随流俗和孤傲的学者风范。

如今两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这种精神将永留在我们心中。

（2013-5-1 香港《前哨》5期）

许良英先生，我的忘年之交

江棋生

1月28日下午1点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与世长辞。1月29日下午，我走进中关村812楼704室许先生家，在到过数十次的极为简朴的书房兼客厅中，我忍住心中的痛楚与哀婉，扫视着那熟悉不过的书柜、书桌和高高摞起的书稿，扫视着墙上那张经典的爱因斯坦画像，耳畔似乎响起许先生招牌式的带有浓重浙江味的普通话：“江棋生，你来得正好，快说说有什么新鲜事。”1月30日下午，我手持许先生栩栩如生的遗像和白菊花，缓缓走近他的身旁，在咫尺之遥向他鞠躬道别，为这位有着传奇色彩、在他93年人生历程中充分展现了生命尊严的老人，作最后的送行；为这位看似平常的倔老头、我的忘年之交，作最后的送行。

1992年12月，我与许良英先生第一次见面。“自那天以后，我们经常见面，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资讯，成了忘年交。”上面这句话，出自许良英先生为我的《看守所杂记》一书所写的序言，说得恰如其分，字字为真。不过，他说的“无拘束”，自然是指我没大没小“无拘束”。许先生比我年长将近30岁，但在我们的交往中，一是见面不用预约；二是无话不谈；三是共鸣为主、时有争论；四是在他那儿吃了午饭还要睡个午觉，醒了接着聊。正是在这种真诚朋友般的零距离交往中，我对许先生的思想、人品、性格和习性有了真切的感知和了解。

在这篇小文中，我想说说许先生高纯度的表里如一和刚直方正。我认为，在为人处世的谱系中，如果说“外貌忠诚谨慎，实际欺世盗名”的乡愿处在一极，则许先生正好处在另一极：貌实合一，无假唯真。我甚至想说，偌大一个中国，13亿国人中，像许先生这样的率真耿介之士，不知还能有几位？我想，凡是见过许先生的人都可以作证，从许先生嘴里，听不到假话，也听不到无关痛痒的真话；造访者需要一颗比较大的心脏，去听他直率冷峻的真话，有时还要听他盛怒之下发出的“混蛋”、“真不要脸”等骂娘话。

许先生的骂娘话，基本上都是冲着十分可恶的人和事去的。例如，在他对坚持专制、陷国人于血泊之中的民主的敌人进行谴责、声讨时，就能听到他的怒骂之声：“混蛋！”。他在对权贵劣迹和政客行径进行批判、抨击时，也会声色俱厉地开骂：“真不要脸！”对其他各色人等，只要他内心有了明确看法，他会一律开门见山实话实说，从不藏着掖着、语焉不详，因此我听得最多的，是他直率冷峻、不留情面的真话。例如，我听到过他对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王希哲、陈子明、刘晓波等正负两面都毫不含糊的评价。我还听到过他对杨振宁的污点政治操守和不良人品的恶评和讥评。有一次，我提到何祚庥这个人“左得可恶”，许先生说：“他就住在我隔壁，我和他无话可说，从来来往。”

我认为，不在背后议论人、评价人，谁都做不到，关键是当面说的与背后说的是否一致，说的与做的是否一致。许先生做到了两个一致；甚至，与他背后所作的批评相比，他当面对人的批评不仅毫不注水，有时甚至更为直率，更为尖锐，更为劈头盖脸。

这就是许先生，不可多得的许先生。

许先生的貌实合一、无假唯真，除了直率冷峻、不讲客气的一面，还有动情动容、袒露心扉的另一面。我记得，当他提到他的恩师王淦昌先生时，他会孩子般地真情流露，笑容灿烂。1994年春，我对许先生说，今年是我的母校——常熟市中建校80周年，我想找王老，让他题“学海无涯”四个字。许先生马上给我王老家的电话号码，并说：要不要我先打个电话通气？我说：不要不要，我用常熟话和王老通话，就能搞定。他说：你这么有把握？我说：是的。他听罢哈哈大笑，说：不行的话要说实话，我来帮忙。

许先生也常常动情动容地正面评价他所肯定的人和事，这时他用得最多的，是“难得”这两个字；若生赞叹之意，他就会说“很难得！”或“十分难得！”。得到他赞叹的人，有林昭、顾准、胡耀邦、吴祖光、李慎之、赵紫阳、刘宾雁、胡绩伟、李锐、于浩成、丁子霖、蒋培坤、朱厚泽、鲍彤、方励之……

使我印象深刻的另一种动情动容，是许先生与他人共同分担现实苦难时的动情动容。每当他和我提起极权制度下的受害者——胡风分子、五七年右派、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六四政治受难者、上访者、维权者……，他都心情沉重，脸有戚容。他深深理解和同情受害者的命运和处境，义无反顾地站出来锵然发声，关切和声援他们的正义抗争。这时，他展现的是他的公民精神，他的善心、博爱和人道情怀。

我不想讳言，如果没能真正走近许先生的话，他很可能让人敬而远之或畏而远之。有人曾问过我：“你怎么能和这样一位倔老头成了忘年交呢？”我对他说，一是真诚地共鸣；二是不违心地附和；三是略为婉转地表达自己的异议。应当说，这三条不是什么“秘诀”，只是按本色行事。

2013年2月3日于北京家中
(刊于2013年2月7日《阳光事务周刊》总第42期)

从自我启蒙做起——回忆许良英先生

齐晋生

一

1989年的洪大浪潮，汹涌激荡，这个时候，我遇到了许先生。

5月17日这一天，学生绝食已经进入第五天，气氛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我带着宣传品，去黄庄808楼的叶笃正家。

客厅里，叶笃正满面倦容，穿一件有七个扣子的新式白衬衣，因最下面的扣子扣错了位置，致下摆不齐，一只手插腰一只手拿着电话听筒，声音嘶哑地讲着什么，目光时时瞟向厅内唯一的客人——清瘦而矍铄，后来知道这位就是许先生。

我和许先生目光接触点头示意后，把宣传品放在茶几，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边看电视边看叶老像个指挥员似的打电话，挂断一个再拨一个，谈话的内容大致是联络谁谁，紧急呼吁召开人代会。

电话打完了，叶、许两位先生交换了一下情况，恰在这时，电视里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嗯”我用手一指，叶老把声音放大，三人同看屏幕：中央电视台的画面显示的是天安门广场，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已经被人掷墨污损，那位灰发的主持人正在讲述着事情经过。

电视镜头拉近到毛泽东画像，又回摇到城楼下的人群，当说到三名外地人不是学生，并被人们扭送至公安局时，许先生说话了：“全国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想这么做的。”叶老紧接着大声补充：“是有几千万人想这么干的呀！”

看完电视，我依照笔记简单叙述了夜间在天安门的亲历见闻等，临出门时，许先生拿过我的小本，翻到空页，写下了他的地址和姓名，邀我以后带信息给他。

这次见面我记忆深刻，是因为毛像事件，许先生思维敏，出口快。

《政治学》里，亚里士多德提道：

“法治代表理性的统治，而人治难免使政治混入兽性的因素，即使最好的人也不能消除兽欲、热忱和私人情感，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和腐败。”

“谁说应该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用许先生自己的话：“个人统治的人治是兽性的表现。”

二

许先生的签字写得小而工整，看地址是812楼704。而我住813楼212。

自然，远亲不如近邻。

交往渐频，知道许先生有两个特别之处：

一个是当过右派，自投罗网当的右派。

全国有几十万知识分子入罗网，但是许先生是为了反对抓右派而当的右派，是因为对出尔反尔搞阴（阳）谋的恶劣行径极为反感，从而大声疾呼，败阵独战，当的右派。

性格，好生了得。

再一个，自杀过。

我八岁上语文课就学习过《董存瑞的战斗故事》，虽然觉得自己要是“舍身炸碉堡”，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但从小对敢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们是充满了敬意的。

1953年由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的《新名词词典》里，这样解释自杀：

“并非自然的或因意外事件招致的死亡，亦非因他人或外力的加害，而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强制并加速其自身的死亡叫自杀。自杀的方式有服毒、绝食、跳水、坠楼、用武器自戕等。自杀的根本原因因为**病态社会**所造成，故在资本主义各国极为常见。”

文革中的各种自杀，极其惨烈：

傅雷服毒，陈梦家自缢，罗广斌跳楼，老舍沉湖，范长江跳井，熊十力绝食，刘允斌卧轨，黄绍竑刎颈。江红蕉撞车，释良卿自焚，赵畸投海，顾圣婴开煤气，翦伯赞服速可眠，等等。

草民们绝食而亡，在盛水的脸盆里呛死，用剪子剪断自己的喉管...种种不忍听闻的死法是什么词典里都没有列入的，足见中国当时的社会病态到了何种地步。

许良英是喝敌敌畏。

百年来，陈天华为唤醒国人，王国维为文化殉情，阮玲玉为生活无奈，朱湘为爱情破灭，续范亭为呼吁抗战，等等，自杀动机各异，只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让众多自杀者的动机趋同：为了逃避各种残暴的迫害、侮辱和体罚。

和许先生同庚的徐干生先生，著书《“文革”亲历记略》，其中引用了当年他自己写的日记：

“六六年九月三日：

今天革命同学命令我们这一批牛鬼蛇神和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爬狗洞并跪着绕行校园，这是伸张正义，是我们所应得的。我想，这也是我向党向人民谢罪的开始，我决心重新做人，接受改造，在将来报答祖国人民，补赎我的罪过。”

“九月十日：

晚上放假。我因膝部脓肿，需要再换一点药膏，涂一涂，希望快点好，以便更好劳动，所以在七点半回家，洗腿换药，至九点半就寝。”（《复归的素人》第79和83页。）

“爬伤”，在一周后仍然“膝部脓肿”。

这位中学老师事后回忆：

“队伍爬过一块不很规则的长方形四条边，全长大约四百公尺左右。这批非人非兽的异类在光天化日之下，蓬头垢面、魂飞魄散、仓皇夺命，分段爬过碎砖路面、碎石路面和部分水泥路面，膝盖磨破，血肉模糊。当爬回原点时，个个精疲力竭，不敢抬起头来，依旧龟缩在灼热的碎石堆上，听候红卫兵的最后发落。我只知道，我自己奉命站起来的时候，怎么也停不下心脏不规则的狂跳，但觉天旋地转，头昏目眩，却毫不感到膝盖上皮肉尽去的痛楚。这是我一生中最奇怪的经验之一：当一个人**恐怖到灵魂出窍**的时候，肉体的痛苦便逸出了感觉之外。”

“灵魂出窍”，半生半死，生不如死，所以：

“TO BE OR NOT TO BE”？

生，还是死！（文革中，家父也曾被逼至绝境。）

加缪说：“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你觉得自己的人生还能活出自己理想中的价值，就值得好好去活；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活不出理想价值，就只好自杀。如果确实是经过审慎思考才作出决断的，自杀反而是一个人人格完整的表现，我们就要尊重这种人生选择，而不是像刘擎一样“只荣耀其理想、精神和事业，却惋惜其性格、选择，以及所谓的消极与忧郁气质。”

自杀是维护自身尊严的最后方式。

一个充满理性的人才才会认可人的尊严是最崇高的，在自己意愿的驱使下断然了结，用惨烈的死亡证明，我之所能，你所不能。用唯一的死亡，证明我的尊严是多么高贵，我是真正的人，只有人才会自杀。

伪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如此强大，专制下的个人根本无力反抗。

你居然如此逼我，我只好动用属于自己的唯一武器——生命，跟你作最后的必死的决战！

以证明清白，以表示愤怒，以寻求失去的正义！

三

有一天谈及长安街的死难人数，我告诉许先生，我妻子所在的北大计算机系有一位博士生，叫严勇，他的弟弟严文就是在六·四被射杀的，我曾随同妻子去三里河看望过严文的父母。

丧子的巨大痛苦和打击彻底摧垮了严母，她终日神情恍惚，阴暗的房间里没有一丝生气……

先生听罢我的讲述，眼睛盯着我说，丁子霖正在搜寻“6.4”死难者名单，随即告诉我丁老师在人大的地址，并特意嘱我在6月4日的敏感日之后再去看她们，否则会遭到盯守丁宅“国安”们的盘问，引起麻烦。

第一次去人大，未经许先生“打招呼”，丁老师事后开玩笑，说我健壮高大，以为

我是“便衣”，经与许老电话回问，旋即取得信任。

我与蒋、丁夫妇相熟后，便常去看望她们，许先生新写就的文章也常带去共享。

当时情势很坏，有不明身份的人不分昼夜地打骚扰电话，用极其下流的语言谩骂他们是“卖国贼”等等，导致丁子霖的睡眠和心脏恶化，经常白天也躺在床上。

许先生的电话问候和徒步登门抚慰给予了她们最宝贵的安慰和支持，使得她们能熬过最初的几年。蒋、丁夫妇也经常回访许先生。1994年蒋培坤老师的“六十大寿”是携丁子霖上门到许先生家过的，许先生看丁子霖的精神渐好，很高兴。笑道：“还不曾听说过有谁特意到别人家去过生日呢。”

四

九十年代年和本世纪初，许先生和我谈及思想转变和现代迷信的话题，曾两次举他自己的例子，提到他去韶山参观的往事。讲述自己当初是怎么去“瞻仰革命圣地”，举动是多么“可笑”；怎么怀着迷信的心情，注目院前屋后各室圣物；感念丰功伟绩，居然看完驻足不忍离去，复又拜谒，以致几进几出方罢。

“我那时候真是迷信啊。”

先生对“旧我”是这样痛恨，解剖自己如此绝情，对我这个“忘年交”如此交心交情，是我一生之仅见。（傅国涌先生对许老的描述极准确：“他一直葆有一颗童心，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对人是敞开的。”任何时候都是“严肃的、真诚的”。）

深刻反思告别昨非，完成之字形大折返而前行的“两头真”老人，我也交识数几，而许先生的特别之处使我十分敬重和珍视，也让我不断思考。

对他自己的思想转变，许先生写道：“**我则学鲁迅那副铁石心肠，用冰冷的解剖刀来剖析自己，也剖析别人和一切。**”

许先生四岁丧父，母亲对其影响很大：贫穷的母亲“对穷苦人有天然的同情心，见到讨饭的总要给钱给饭。我小时也如此。”

1942年2月，许良英因在遵义见到民众苦状，“**我的良心受到谴责**，无法再躲到科学的象牙之塔里，觉得中国社会需要革命，自己不能袖手旁观。”即弃学物理，转读《西行漫记》、《革命的再生》、《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马恩列斯毛的系列著作。当时“我不是为了民主找到党，而是为了彻底解决社会的不公，实现共产主义而入党的。”

从1940年到70年代末，“一直迷信马克思主义”。1942年入党前读过“延安版的《列宁选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未注明作者为刘少奇）等，对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都奉为天经地义。”

被打成右派后，“在农村时通读《马恩全集》时，并没有特别注意专政问题。”1978年回科学院读史对照文革，反思、总结：“认识到科学与民主是现代人类文明两大支柱。”

“不过由于长期迷恋马克思主义，以为摒弃其错误和过时的成分，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存在价值的。1987年因胡耀邦被罢黜，使我心中仅存的对共产党的一线希望和

克思主义的一点残余的信念都彻底破灭了。”

1988年11月，许先生指出：“**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断言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许先生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实现专政的构想时，引用了恩格斯给倍倍尔信中的这段话：

“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许先生指出，这段话也是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基础。并质问道：“**只有进入共产主义天堂才允许有自由，**”“**真是自欺欺人！**”

许先生与鲁迅一样，对敌人绝不宽容。

章诒和曾撰文，揭露黄苗子、冯亦代的告密和卧底行为，当时遭到如下的质疑和指摘：

一. 告密、卧底诚然不对，但帐应该算到毛的头上，大奸大恶叫他一人全扛了，纯属制度问题，跟下面的人无关。

二. 告密与卧底，虽为人不齿，但放到当时的环境中，一切皆可原谅，不揪个人为好，社会“疮疤”揭不得。

许先生此前这样回答过：“**人性良知是高于一切的，它自有绝对的客观性。**”

许先生说自己在“1974年猛醒之后所以反思比较彻底，主要受爱因斯坦影响。”

对爱因斯坦，许先生1938年精读过，60年代又再读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他从这本在1930年出版的书中，摘录的部分警句，并引为座右铭：

“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承受。”

“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

许先生翻译爱因斯坦的著作，走近爱因斯坦，与爱因斯坦对话，得爱因斯坦真传。许先生的凛凛正气恰如爱因斯坦所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的意义，其人格的力量常常远胜于单纯的才智。**”

五

许先生有位浙大校友丁傲，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火药学专家，校友聚会聊天时向他问起家父的情况，丁傲答道：“是我的老领导了……”

初夏的一天，我一落座，许先生便提及这次和丁教授的见面，丁傲的生动描述使得许先生对家父有了初步印象，增加了兴趣，随即要我详谈家父的身世和经历。我讲述了出身、开蒙、上交大，弃学、抗战、干军工等这些家父的历程和思想来历，又从大跃进、文革，聊到“六·四”。

当谈到家父在 89 年“5.19”看到晚间新闻联播宣布戒严令后，彻夜踱步，天亮见到我，痛极含泪：“我都七十多岁了……”的时候，许先生轻叹道：“……成这个样子了。”

我也吐露自己的文革亲历和感受，许先生语气变重，嘱咐我“你写下来。”

交往二十多年，这四个字是许先生对我最郑重的叮嘱。

……

许先生身后捐献遗体，更让我悲中加泪。

无墓碑，无坟茔，无哭处。

谈话间，许先生最讨厌“精英”式的人物。

“我说的民主意识，指的是，不仅真正懂得民主概念的正确涵义，自身还应坚持民主精神，不可自视高人一等，更不可以领袖自居，而应以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

先生的这些话，朴实而亲切。

我再也见不到先生了，而对许良英先生的唯一纪念只能是：

“写下来。”

2016 年 5 月 16 日

许良英的五大贡献

王德禄

许良英先生是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 2013 年 1 月 28 日去世以后，我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全打乱了，好像只有写点东西才能平复我激动难抑的心情。在许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章中，我初次提出他的五大贡献，这次又进一步做了梳理，我认为许良英的五大贡献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以爱因斯坦研究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研究民主理论和促进中国民主化、对“反右”运动的历史反思、在中国全球化进程中传播普世价值。

(1)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许良英从小就对科学十分着迷，1957年，许良英与范岱年合著的《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24日，胡耀邦总书记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科学家为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领导讲授科学技术知识，第一讲由钱三强讲授科学史，讲稿是许良英和李佩珊起草的。在讲稿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论断就是“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1983年，许良英、李佩珊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许良英被美国物理学会授予萨哈罗夫奖，许良英被认为是科学家履行社会责任、捍卫人权的典范。

(2) **以爱因斯坦研究促进中国改革开放。**许良英从小就十分崇拜爱因斯坦，初中二年级就为爱因斯坦的故事所吸引。18岁时精读了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书中很多思想对许良英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7年反右运动时，许良英被定为极右分子。他选择回乡务农“自谋生路”。1962年于光远给许良英寄来《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邀许良英参加编译工作，许良英表示愿意参加这项工作，从此许良英走上了研究爱因斯坦的道路。

后来许良英成为了中国乃至全世界不可多得的爱因斯坦研究学者之一，许良英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共三卷，分别于1976年、1977年、1979年出版。也许一切都是机缘巧合，这套文集的出版，正迎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需求，引起读者的高度重视。1979年初，恰逢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国内召开了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大会。这个大会非常隆重，有1000多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了纪念大会。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初兴起的爱因斯坦热，是对文革中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运动的反思，爱因斯坦也成为文革后年轻人寻求自我的精神源泉，更是改革开放后重新重视科学的一个典型事件。据说胡耀邦看完此书后，也向人们大力推荐此书。

(3) **研究民主理论和促进中国民主化。**许良英八十年代初关于民主的代表性的文章是《论科学与民主的社会功能》。1989年1月，许良英与老同学施雅风发起42人签名的联名信，要求政治民主化，这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1992年许良英发表在《未来与发展》上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一文，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1989年以后，许良英与夫人王来棣全力以赴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4) **对“反右”运动的历史反思。**1986年，许良英等三人发起“反右”3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个倡议引起了全国的轩然大波，由于政治的干预，这个会议没有如期进行，但是理清“反右”运动的历史真相，一定是走向民主的基石。

(5) **在中国全球化进程中传播普世价值。**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人们的思想解放；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使得普世价值的讨论骤然热了起来，许良英积极参与这场讨论，澄清了许多混乱的概念。他指出普世价值中的价值实际上就是道德准则或道德标准。许良英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2008年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路上，途经泰国曼谷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引用了许良英关于普世价值的观点，“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在许良英追悼会上，我献了一篇悼词：“许良英和爱因斯坦一样是一个纯粹、率真的人。他对科学民主的不懈追求使他获得萨哈罗夫奖。他的努力在于使中国融入世界：即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普世价值。”

在遗体告别会的现场，有记者采访我，问怎么看待许良英的贡献？我说许良英的贡献就在于他推动中国的全球化，从价值层面推动中国的全球化。全球化有若干层级，最底层的是货物在全球流动，其次是资本和技术在全球流动，最高层次是价值在全球流动，这就是普世价值。

载搜狐博客 2013 年 02 月 01 日

许良英：中国“世纪老人”的世界意义

王德禄

在中国的思想界有一个词“两头真”，意思是“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进入老年后大彻大悟，真诚地追求自由与民主”。进入 21 世纪后，我与一些“两头真”的老人交流较多，发现他们愈加炉火纯青，成为追求自由民主的领袖人物，我把这些人称之为“世纪老人”。我认为，这些“世纪老人”在人类追求普世价值的道路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些典型的“世纪老人”有：李锐、李慎之、杜润生、朱厚泽和胡绩伟，许良英是其中反思最深入的人之一。

我曾就这一话题，与许良英先生多次交流，许良英对我的看法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在西方世界，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民主更加普遍。”在朱厚泽去世之后，这个话题谈的就更多了。胡绩伟去世前，我曾去拜访他，和他提出关于中国“世纪老人”的问题，胡绩伟对这个提法较为认可，当我问他能否为后代留下一些什么？他提出，分权应该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后来我和许先生谈到胡绩伟的遗言时，我说，我仍然认为中国出现的“世纪老人”是人类历史上的独特现象，正是因为中国有了 30 年的改革开放，而中国现在仍然在改革的进程中，所以这些“世纪老人”的思考就有了更加伟大的意义。这次许良英没有否定我，答应再想想，说等我从美国回来后，再和我交流这个问题。

我到了美国后感到美国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左倾的很多，大陆改革开放后，出国的许多学社会科学的学者学有所成，但对中国问题的反思不够，有一些人甚至成为新左派。因此更显得中国“世纪老人”的价值。

能和中国“世纪老人”相类似的是二战期间的犹太科学家，这些人以新自由主义学术团体“朝圣山学会”最为著名，其代表人物是：哈耶克、波普尔和波兰尼。学会的思想以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坚持产权私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极权主义，维护民主制度。这些科学家和中国“世纪老人”共同的特点是都曾饱受极权主义的摧残，对乌托邦的批判有着更切身的感受。

从美国回来后，每次去看望许先生，不是王来棣有病，就是他有病，总没有机会能深入地继续探讨这个问题。现在许良英走了，这个问题再也不可能和他交流了，但是我越发感到他的精神具有世界意义。

（载王德禄博客 2013 年 02 月 04 日）

许良英生命的最后岁月

王德禄

要说许良英先生生命的最后岁月，要从何说起呢？我觉得 90 岁生日以后都是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我曾经和他也几次谈到，应该多留下一些个人历史的回忆，但是他却不以为然，几次说他能活过 100 岁。但是岁月不饶人，进入 2012 年，许先生就真正进入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2012 年元旦，我和程宏去看望许先生，刚刚谈了几分钟，许先生突然说头晕，支撑不住了。我们马上叫了“120”，许平和程宏送许先生去了 301 医院，原来以为是脑溢血，后来发现是心率偏慢、心脏供血不足。301 医院给许先生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之后他的身体逐渐康复。住院期间，我、刘志光、武文生、程宏与许先生的两个儿子忙忙碌碌一直到他出院。许先生后来说，2012 年是个倒霉年，元旦就住了医院。这句话一语成谶，2012 年的年底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2012 年的最后一天王来棣去世，而 2013 年第一个月还没过完，许先生就去世了。

2012 年另外一件不幸的事是方励之先生于 4 月 6 日去世了，我听到这个噩耗后去了许良英先生家，发现他比我早知道方励之先生去世的消息。他和我讲述了第一次和方励之在商务印书馆的相识，又讲述了他和方励之在浙大演讲的故事。他还说，他和方励之发起“反右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没想到对当局产生这么大的刺激。许先生说我对这件事了解得比较多，希望我能写一写在这段时间我与方励之的交往。在说话间他很欣赏方励之充沛的精力，他说方励之能够同时做几件事，即使在嘈杂的火车上他也能够写论文，他说这点他和方励之很不相同，他要干一个事情，就要集中精力去干，根本没有精力旁顾其它。在许良英先生 90 寿辰纪念文章中，方励之说他只写了与许良英交往的一小部分内容，他说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去追忆他与许良英的交往。方励之和许良英相继去世让我感到人生无常。

30 多年来我经常在许良英先生家吃饭，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请他在外头吃一次饭，可是他明确说他不愿意在外头吃饭。我和神化的袁总在上海新荣记吃过几次饭，袁总说这是有名的台州馆子，我说等新荣记开到北京时，我要请许良英去吃一次。不久，北京金融街就开了一家，于是我就邀请许良英一家去新荣记吃饭。2012 年 6 月 9 日晚上，袁总委托他的女儿来北京做东，我、武文生、刘志光、程宏都参加了，许良英一家包括王来棣、许成钢、许平、陈罕立都去了。新荣记是台州老乡开的，以台州风味为主，许良英吃到很多家乡的饭菜，很是满意。没想到的是，许良英先生的二儿媳陈罕立从小生活在

台州，对这顿饭更是满心欢喜。这是我唯一一次请许良英先生在外头吃饭，而且他很满意。

2012年9月《呼唤民主与人权：贺许良英先生九十寿辰》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许先生的学生王作跃和儿子许成钢都为这本书的出版尽了力。我的一篇回忆文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许良英的五大贡献》，编入了这本回忆文集。我在记述许良英90寿辰的博客中提到了五大贡献，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许先生也告诉我他的浙大校友对这五大贡献的提法比较认同。许先生去世后，我又把这五大贡献的提法做了一些梳理并发表出来，五大贡献依次是：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二、以爱因斯坦研究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三、研究民主理论和促进中国民主化，四、对“反右”运动的历史反思，五、在中国全球化进程中传播普世价值。

2012年10月25日，许先生在小区附近摔倒。前额缝了7针，谁知这件事成为了许先生去世的主要原因。本来随着青肿逐渐消失，许先生的身体逐渐恢复。记得12月9日是周日，我按常例去他家看望他，他洗完澡后换衣服显得很吃力，我帮他把衣服穿好，这是我第一次为他做这么贴身的服务，竟然也是最后一次为他服务。他自己也显得很无奈，说了一句：“怎么回事，连衣服也穿不上了？”这天从他家出来，我的感觉很不好，也很担心他的身体。他去世后，我回忆起来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谈话交流。

12月12日半夜他从床上跌下来，为此他再次住院，检查为脑溢血，医生为他做了引流手术。我从外地出差回来看他时，他已经处于昏睡状态。从医院出来后，我和程宏就想去他们家看看王来棣先生，正巧碰上许成钢送她去医院。2012年以来王来棣先生的健康是每况愈下，到了年底两位老人同时住在海淀医院。王来棣先生于2012年12月31日不幸病逝，享年86岁。当天，许先生就转入重症监护室。

2013年1月28日上午，武文生来电话说医院报许先生病危，我把手头事匆匆办完后就和武文生往医院赶。我和武文生在下午13点25分赶到海淀医院，而许先生也在下午13点25分离开了人世，享年93岁。

30多年来我经常去许先生家，在他家都是和许良英先生、王来棣先生一起谈话。每次许先生情绪激动时，都是由王来棣先生出面劝解。我有时想如果没有王先生，许先生的生活和情绪会是怎么样的呢？没想到这种情况在这对夫妻身上并没有出现：王先生去世之前，许先生就不能说话了；王先生去世以后，许先生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王先生去世28天后，许先生就离开了人世。

（2013-02-17 作者搜狐博客）

宁折不屈——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许良英

杨思梁

历经重大社会变故的人，其性格、思想甚至信仰通常会改变。毕竟，人要适应环境变迁才能生存，更何况那是个天翻地覆的年代。许良英（1920.5.3—2013.1.28）一生经历

过的丧乱、动乱和苦难，即使和饱经灾难的同辈人相比，也是多得异乎寻常。但他却自始至终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把价值和原则作为追求的目标，而不是达到某种目标的手段。在他心目中，理想高于一切，包括他的生命。

一、理想主义的来源

许良英的理想主义大概来源于他的正直和同情心。他虽然4岁丧父，但凭他能够读书并一直上到大学这一点看，他的家庭状况比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要好。他中学立志成为物理学家以及大学时期投身革命，并非完全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为了救国救民，或者说，为了帮助自己的同胞脱离苦难。皖南事变后他决定参加中共地下党，也主要是出于对国民党欺凌共产党的义愤。这种义愤居然使他轻易地放弃了成为物理学家的少年大志，多少也说明他是个激情澎湃的人。许良英自己说，他当时投身革命是出于科学的求真精神、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对理想和领袖虔诚的信仰（他说这是一种宗教精神），这应该是正确的概括。当时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别于为了吃饱饭而投身革命的工农）大致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所不同的是，许多同侪后来或多或少放弃了自己当年的理想，许良英却始终保留着他的求真态度和对理想的虔诚。（求真也和浙江大学“求是”的校训有关。浙大的校歌唱道“名为求是，实启尔求真”。校长竺可桢解释说，“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这是他一生悲剧的根源，而他的悲剧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悲剧。

许良英大学期间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并且读了大量与专业无关的哲学、科学史和“进步”书刊。他自己说只花了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专业课。但他不仅能顺利完成大学学业，而且毕业时业师王淦昌教授还要留他做助教，可见他的智商和精力不同寻常。假如当年他听从王淦昌的劝导留校任教，也许中国就多了一位两弹一星功勋，中共少了一个叛逆者，王淦昌日后也不需要为这位学生操那么多心，许良英自己的和家人的生活也会顺利得多。但中国就会少了一面正直的镜子，一个民主和科学的先声。

二、革命胜利之后的彷徨和挫折

许良英多次说过，他参加革命时并没想到自己能看到胜利的一天。他是坚定了要“肩住黑暗的闸门”（不止是鲁迅，许多名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因此自己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过革命胜利后该干点什么。众所周知，许良英之辈是中共里面极少数的知识层。连他们都没准备好接管政权（更不要说建设了），更何况党内那些半知识分子或大老粗们。难怪后来国家的经济建设变成了一场大灾难，整个国家变成了人间地狱。毕竟，政治斗争和武装革命完全不同于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

1949年之后，许良英被调去做党的组织工作，1952年6月又被派往北京中科院担任他后来极为反感的政治审查员。正是这一调动，招徕了他后来的噩梦。假如留在杭州，许良英个人的命运估计会好些。笔者曾经问过他，当时如果留在浙大会怎么样。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浙大1949年之后遭受了四大伤害：1）竺可桢校长下大工夫培植的理工医农全科大学被拆分为四，许多精英教授被调走【笔者插话，精英教授到别的地方不是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吗？他答：精英教授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精英。被谁管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凤凰卫视的何亮亮先生在“腾飞中国”中介绍苏步青教授时说，1952年

浙江大学被调走的正教授达 150 人。何先生的这个节目主要介绍 1911 年之后中国的名人大事。从部分内容上看，叫“折腾中国”或许更合适。)】。2) 浙大的地下党员几乎全被调走。在白区参加地下革命的人都是有觉悟者，解放区过来的接管者比较差，不懂教育，无法与教授们沟通。清华的何东昌，蒋南翔留了下来，所以清华过渡容易些。3) 1952 年院校合并时，部分中专和大学合并。可是中专的教、学员素质却不够。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老师和学生，如 1949 年前浙大的办学经历所示。4) 大学里掺沙子，把工农兵管理者派往大学任领导。比如地质系的某书记，被派去之前对领导说，自己是大老粗，怕无法胜任。领导告诉他，越粗越好。

笔者本来是想问他假如留在浙大对他自己后来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许良英对浙大命运的评论，其它浙大学长也曾说过。许良英的回答似乎表明，他认为不管他当时是否留在浙大，都不能避免学校的噩运。这无疑是正确的预测。后来的历史确实也说明了这一点。1952 年院校调整时，浙大上下都不同意把学校拆散，但学校最终还是被拆。不少人认为，这次院系调整表面看似是在学苏联，但实际上是为了巩固政权，主要是为了把教会大学整掉，顺便把一些中共信不过的大学拆散。一个执政党，为了巩固政权，连国家的大学体系都可以破坏，难怪后来会对知识份子下那么重的手。

或许主要因为在北京的缘故，许良英 1957 年成了右派。他大概是反右运动中最另类的右派。因为当年的这场运动是针对党外知识分子的，而他当时是有着 11 年党龄的掌权者。他被打成极右派也并非因为他发表过什么反党言论（他不可能自己反对自己），而是因为他公开反对反右运动。他之所以自投毛为知识份子设的“阳谋”罗网，是出于他的理想主义者本性。他自己说，他反对突然向知识份子变脸，是因为“这会使党失信于民”。他最初还觉得那些反鸣放的干部有违毛的旨意。当领导告诉他反右斗争是毛亲自策划的，他才如梦初醒，但还没有对毛产生怀疑。（许良英自己说，直到 1974 年，看到毛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江青想当女皇，他才看清楚毛的真实面目，看清楚政治运动的骗局。见他的《幻想·挫折·反思·探索——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该文原打算发表在《黎明前的求是儿女——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社团》一书中，但后来发表于《红岩儿女》第三部，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 年。多有删节。）既然是领导告诉他毛的意图，说明当年看清反右真实面目者，绝非许良英一人。但敢于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者，在共产党内部，恐怕只有许良英一人。

当年的党内高层人士显然没有意识到，维护真理其实也是保护自己。有人说毛从一开始就有个通盘计谋：1957 年先扫除知识分子，消灭党外民主，1959 年再镇压党内不同意见，扫除党内民主，然后发动文革，成为皇帝。这一假设是否正确暂且不表。假如当年党内多些人像许良英那样坚持道德标准，为无辜的知识分子说句公道话，两年后毛也许就不敢那么大胆地在庐山会议上清除彭、黄、张、周。而文革中受害的那些高干假如 1959 年敢于为彭、黄、张、周主持公道，毛可能就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地发动文革，这些高干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国家的命运了。可见，维护真理与维护个人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1980 年代初，当局开始反思政治运动，提倡政治文明，承认当年的政治野蛮。同时

提倡全民族的精神文明。一个自称为人民的政党当年竟然是个野蛮党，一个号称人类四大文明的民族 1980 年代在精神上还没跨入文明的门槛（或者说又倒退回了野蛮状态），回想起来，令人毛骨悚然。虽然这主要是毛所造成，但另一方面，也许是许良英这样的人太少了。以历史的眼光看，许良英其实是在捍卫人类的文明价值。他也许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样做是否可以保护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社会成员，但他显然强烈意识到“失信于民”对民族和对执政党的巨大代价。中共许多高层人物则要经过文革的灾难才理解了这个基本的事实。而且有不少人至今仍然没有理解。

反右之后，许良英回乡当了 20 年农民。其间经历了二件大事：1969 年 8 月，他因不堪羞辱而自杀。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害怕受凌辱。对他来说，不能辩论，而且要被五花大绑，双膝下跪，这种野蛮社会的人格侮辱是不可忍受的。许良英的灾难验证了革命导师列宁的预测：革命吞噬自己的子女。只是这吞噬的残酷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一个忠诚的革命者已经被当成反革命者批判，并流放到乡下当了自谋出路的农民，竟然还不放过。难怪许良英在 1979 年右派改正和恢复党籍后，毫无欣喜，因为“57 年自己不该定为右派。而党 50 年代后已经腐败变质。回到这样的队伍，心情十分沉重，郁闷”（见《幻想·挫折·反思·探索——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许良英当时可能没想到，自己会在 1986 年 11 月因为组织反右 30 周年历史学术讨论会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这次开除，估计他是毫无遗憾感了。

许良英在做农民期间的第二件大事是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1976 年出版）。这一文集确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更令人震撼的是翻译的过程：一位身材瘦小的农民，晚上就着煤油灯，在人类最恶劣的思想环境里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这是一幅多么奇特的历史画面？（足以成为一幅油画的题材）。他后来能够连续与人交谈 3-4 个小时而不喝一口水，大概是这个时候练就的本事。更难想象的是，他这种白天务农晚上翻译的生活，竟然还被夫人羡慕：“他倒好，清闲地做他的翻译，留下我一人拉扯大两个孩子”。如果读者知道许夫人王来棣所受过的苦，应该知道此话的真实成分。

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过程同样充满戏剧性。现在看来，那几个复旦的教授不可能主动冒名顶替许良英成为翻译者，他们甚至都不可能知道有这么本译著要出版。很可能是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强行决定要这几位复旦教授这么做的。当时的内部出版物大都是为了批判用，但它们却无意中成了地下畅销书。中共高层总是不希望老百姓有思想，或者希望左右人民的思想。但有史以来，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完全控制人民的思想。

三、求是首先要尊重事实

许良英对学术的严谨是许多学者所无法比拟的，虽然他谦虚地说自己不是一位学者。2004 年起，他开始准备重版 30 年前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2007 年完成修订，2009 年再版），增补了一些重要文章，修改了书中一些过左的注释。他当时的视力已经很差，右眼 0.1，左眼 0.01（他自己说看人没眼睛没鼻子），却坚持每天长时间工作，实在难能可贵。他说，他每天坚持去公园爬小山，还说要学习他的亲家——许平的岳父今年（2013 年）94 岁还坚持冬泳。

许良英所受的科学训练加上他的理想主义性格铸就了他对真理的执著。这一执著并

没有因为 20 年的苦难而改变。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事实的无条件尊重。有几个例子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为《黎明前的求是儿女——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社团》一书写的序言中强调“对历史事实必须绝对尊重”，并说“独立的批判精神是求是精神应有的定义”。他在序言中举了个例子【该书原打算作为内部读物出版，2008 年 9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其改为公开读物发行，但多有删节。除了序言外，许良英还为该书写了《悼周志成》、《悼念田万钟》以及《浙大地下党及其有关情况》等文章。2008 年 6 月 10 号，在该书尚未正式发行之时，许良英便根据校样中的删节，自费出版了补缺 29 页。许良英生前整理了他的著述（包括与人合作）以及翻译成果共计 194 种。他去世后，家人又发现了几十种。他的论文集已在香港和海外出版，但在大陆还未能发行】：“人们习惯于把 1949 年以前群众运动的发展主要归因于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在浙大，1931 年和 1935 年（学生运动最盛的年份。31 年要求政府抗日，35 年是支持北京的 129 学生运动——笔者注）根本没有一个共产党员。1943 年以后浙大才有地下党组织。地下党虽然在斗争策略和力量整合方面会使运动大为改观。但是，如果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优良的学校氛围，这种作用也就无从显现。同在杭州的之江大学党支部存在的时间远比浙大长，但学生运动无甚起色。群众自身的素质起决定作用，党组织只能起粘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这些话绝对不只是出于谦虚（许良英是浙大最早的三名地下党员之一，且担任过支部书记）。谦虚虽然是一种好品质，但对许良英来说，它远不如尊重事实那么重要。可惜的是，许良英的这段序言出版时被删除了。

在同书的《悼周志成》一文中，许良英回忆了自己（因贫穷）和周志成同床合衣，共同追求理想的革命友谊以及周对工作和同事的热情，也写了周的性格缺陷和因为精神崩溃所做的荒唐事，包括 1957 年周的胡言乱语以及对许良英的投石下井，还有周志成 1979 年回京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我缺少脊梁骨”。许良英说“这句令人震惊的话，不仅使我长期所受的伤害完全释怀，而且使我心酸和歉疚。我当初对他引导，实际上是误导，是害了他。要是他不跟我走，他会成为一位出色的科学家（许介绍周参加浙大地下党）”。可惜，这些内容出版时被删除。实际上，这样的描写除了表明许良英对事实的尊重外，还表现了他对个人的宽容。宽容是他后半生大力提倡的重要价值之一。

许良英对事实尊重表现在不同的地方。笔者曾经询问他，对管维炎教授六四回忆录中提到他的几处文字有什么看法（管和他曾经是邻居，同住 812 楼）。他回信（2007.6.4）说，其中只有一半是对的：他和方励之、刘宾雁当年打算召开的是 30 多人的小型反右 30 周年学术讨论会，而不是管维炎所说的 100 多人的研讨会；而且，钱伟长当时还不是政协副主席；管的回忆录说许良英组织了两次签名，要求释放魏京生，实际上他只组织过一次签名，签名信中没有提魏的名字，而是呼吁中止因思想、言论治罪的历史。他在信中还说，他不同意管维炎对六四的结论，认为他“在政治上是相当糊涂的”。

笔者的《唯心与违心》一文草就后，寄去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了三页信（2005.9.25），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并指出了一些关键性的错误。其中之一是，笔者根据接触过的少量马恩译文（包括中学课本收入的恩格斯在马克思揭幕典礼上的演讲）推测，文革前马恩全集的译文是不可读的。他回信说不对，他读过文革前的全部 39 卷马恩全集，虽然其中有很多错误，但还是可读的（据说只有胡耀邦等少数人通读过 39 卷全集）。文中介

绍陈立教授 1939 年在浙大作“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演讲时（许说这次演讲是他的革命理论的一个主要来源），笔者想当然地加了一句“当时这一题目为官方所禁”。他指出，当时国民党允许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许良英还说过一个故事证明当年的学校较现在自由：1948 年，有个上海的学生演艺社来杭州，演出一台“张开希（与蒋介石同音）选总统”。戏中的美国人用文明棍敲着蒋的头说，“my dear Chiang Kai-shee”。当局竟然没干涉。想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同一回信中还有一处可以说明他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笔者在文中讨论了心理学被姚文元依据毛的理论而扼杀时说，“在中国，政治和学术冲突，历来是学术让路”。他认为这样说“太轻描淡写”，给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说法。笔者没敢采用。但笔者这句“轻描淡写的说法”，即使在以大胆著称的《南方周末》发表时还是被删除了。

许良英是绝对的理想主义者【笔者以为，理想主义者和绝对理想主义者的区别大致是这样：一位信仰诚实的理想主义者或许会像孔夫子所说的那样，不会告父亲偷羊，但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却不会容忍任何欺骗】，他不会在任何时候背叛自己的原则，也不能容忍任何与事实不符的东西。有一次，一位当时浙大地下党的外围成员写信请求许良英证明他当时是地下党成员，因为这关系到大笔医药费是否可以报销。来信称许良英为“老权同志”（这是许当年的化名，很少人知道）。收到信的那天，笔者正好去拜访他。他气愤地说，“XX 当时根本没有入党。他一定是从别人那里打听到我的化名。”笔者碰巧熟悉这位老同志，他委屈地说，当年他和地下党员们参加同样的活动，如果被抓，同样是要杀头的。而且，并不是他不愿入党，而是地下党组织没有时间给他举行宣誓仪式。这些具体情况，估计许良英也知道，但对他来说，事实是不能迁就的

在事实面前，许良英甚至对自己的老师也不讲情面。他晚年花了大量精力求证出他的导师束星北并没有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见过爱因斯坦。对于科学史来说，这其实不是个非常重要的史实。但对许良英来说，只要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就没有大小轻重之分。“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这句话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做人的目标，但对许良英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指南。他心目中的实事或真理，大概就像柏拉图理念中的三角形，不能有丝毫缺损

许良英对真理的执著，不仅仅是针对国人的。对西方人他也持同样的态度。比如，他发现哈佛大学教授 Roderick MacFarquhar《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I,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74）中有些说法与他知道的事实不符，而且误用了他的话，马上去信指出。他对西方所推崇的某些中国民主斗士，甚至某些得过大奖的著名人士，颇有微词，甚至不屑一顾。他认为某些人权斗士更关心自己的名利，甚至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而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这对中国的民主发展，其实是很不利的。作为中共的叛逆者，且两次被开除党籍，许良英当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严格地说，许良英第二次并没有被正式开除党籍。他和笔者说起过党员登记的事。1990 年党员登记时，他所在的党小组和中国科学院党委都同意他登记，但中央不同意，因为他不仅公开反对六四，且公开声明无法与中央“保持一致”】。2008 年，他被美国物理学会授予“萨哈罗夫人权奖”。但是，他并没有迎合西方媒体或西方人权活动家（这些活动家们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饭碗而行事）。他所从事的事业，完全是

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为宗旨，以追求真理为最终目标。

四、对马列理论和暴力革命的反思

马、恩理论和马列理论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很多人研究。但在中国，不少自诩或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对基本的马列问题似乎也不太清楚。（毛本人一会儿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他又号召部下学习马克思主义。估计他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难怪许良英对党内那些领袖们的理论水平不以为然。有一次（2004.7.11）他和笔者说起文革中讨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荒唐事。恩格斯的这些手稿被爱因斯坦认为“从当代物理学和物理学史的角度看都没什么特殊的趣味”【见《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等编译，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02页。这次谈话之后，笔者发现许良英1978年写过文章，正面介绍恩格斯的这本书。他和笔者的这次谈话显然证明他晚年对这本书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网络上有文章说，爱因斯坦在审阅过这些手稿后，说它们是“胡说八道，疯人之作”。笔者尚未查证该说法是否属实。http://www.360doc.com/content/08/11/05/18/75332_1883427.shtml】。（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恩格斯自学物理的笔记）。书中最长的关于电的那章（写于1882年），甚至连电的基本原理都没弄通，所以爱因斯坦不认为该书值得出版。可就因为毛（步苏联人后尘）的推崇，这本书多年之中竟然在中国成为必读书。中国科学院还组织科学家研究它。许多著名科学家（具体名字读者可以很方便地查到）都写了学习文章。这就不仅仅是缺乏学术规范的问题了。只要生活在专制文化之中，就谈不上学术的自由。失去自由的科学家就可能沦为御用工具。李森科和米丘林之流，在中国不乏其人。

即使在与其它几位真正关心中国民主的严肃学者的交往中，许良英也同样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有一次，（2007-3-25）他和笔者谈起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2）。当时该文在国内外正大受赞扬，但许良英却认为其中有两大错误：1.强行挽救一种已经被证明破产的“指导思想”不是科学的态度，更何况马克思晚年并没有主张可以通过民主取得政权，也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2.北欧的模式不能被认为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

另一次（2005-11-12下午），许良英说起自己与王若水学术观点的不同。王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马克思主义是好的，是以人为本的。是列宁及其追随者提出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许良英说，李锐开始也持有王若水的观点，不同意他批判马克思，并在1988年还当面质问他为什么要批马。但据许良英说，赵紫阳去世之前，他们去参加浙大一地下党员的遗体告别时，李锐表示同意许批马】许良英却认为，马克思的主要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自己在回答 Joseph Weydemeyer 的信（写于1852年3月5日）中所说的，也是马的最大错误，因为它直接导致了20世纪的极权主义。但他也同意卡尔·波普尔指出的马克思的三大错误：1、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改造，只能推翻；2、认为工人阶级的状况会越来越贫困；3、没有经过任何论证就断然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后不会产生新贵族。【见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Lessons of this Century, with Two Talks on Freedom and the Democratic State*），London, 2000, p.19.】

许良英不仅反思历史，更关注现实。他晚年对革命本身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中国的悲剧是革命领袖们学了法国的暴力革命和秦始皇的暴力统治；过分热衷于血淋淋的法国雅各宾专政，而对代表人类进步的英国光荣革命却毫无兴趣，对同样出于法国的三权分立和“自由、平等、博爱”理念更视为忌讳之禁。就连陈、李等五四领袖 1920 年前后也开始放弃民主和科学，相信暴力革命和极权专制，鼓吹苏俄革命，这多少是受马列理论的影响。也正是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许良英不赞成 1989 年学生上街和滞留天安门广场，更对当局的暴力镇压无比愤慨。他说，当年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确实是要推翻国民党政府的，但并没有遭到多少暴力。而天安门的学生们根本没想推翻政府，却遭到了暴力镇压，这一对比令人无语。

中国暴力革命的根源无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中国社会已经无力再次经历暴力革命的破坏。而马列理论中最值得研究的问题无疑是它和中国暴力革命的联系。虽然中共的暴力革命和我们民族中某些劣性特征以及频繁的农民起义有关，但多少得归咎于马列主义。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暴力革命，对其根源作一理论的探索无疑是有益的。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一篇艳体纪实表明，国家豢养的一批所谓学者关注的“科研题目”是革命领袖的青年时期之类的问题。正因为官方“学者”们的忽视，许良英对暴力问题的关注，便尤其有现实价值。

许良英认为，要避免暴力就应该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学。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晚年全力关注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甚至在耄耋之年，不顾自己的视力和体力，与夫人王来棣合作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他俩所关心的，其实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文明的基本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许良英做了什么其实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别是他对理想的坚持，对真理的维护以及他的正直、坦诚和对自己认定目标的不懈努力，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士大夫的精神。是现在国人所普遍缺乏但又不应该缺乏的精神。现在，许先生和夫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愿他们毕生所倾心的目标，能够早日在他们所热爱却又让他们饱受苦难的国土上实现。

纪念许良英先生

谢 泳

今晨起来，一开电脑，即看到许良英先生逝世的消息，感到十分悲痛。转念一想，许先生已届高年，历经劫难，享此高寿，也算是上苍对中国知识分子悲惨人生的一点最后哀悯吧。

我最早知道许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一个地方师专念书的学生，何以会对许先生感兴趣？容我多说两句。

那个时候，中国的学术环境不可和今天同日而语，在交通和信息传播方面，是传统社会的末期，虽然时间已到了二十世纪，但这是将要转折的最后关头，没跨过之前，在基本方式上与前一两百年并无实质变化。那时中国个人没有电话，联系的基本方式还是书信。

我虽然在师专念书，但比较关心政治、思想和文学方面的事，我上学主要是看书看报。1983年毕业后，我留在晋中专编校刊。我不喜欢到图书馆去看书，因为怕麻烦，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我当时不懂任何学术方法，一个地方师专，哪有人教你这些东西。我想到的一个简单办法是订阅全国各类期刊，然后了解思想和学术动向。那几年，我长期订阅的报纸杂志有近二十几种，学校收发室的人都感觉很奇怪。我订阅的杂志中有一本《自然辩证法通讯》，它里面经常刊登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都是关于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这本杂志，我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停订。我当时比较喜欢的报纸是《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那个时候的学术中心，不在大学，而在社科、报界和作协。八十年代影响人们思想的主要人物和杂志与大学联系并不紧密，比如金观涛、李泽厚、刘再复、刘宾雁、严家其、戴晴、苏晓康等人，都不是大学里的。

大约是1986年前后，《自然辩证法通讯》刊出许先生一篇文章，是批评查汝强的。文章我当时也未见得就懂，但感觉上是许先生讲得有道理。当时在人们的思维中，马克思主义及方法是什么事都能管得了的，你只要学了它几乎无所不能，而且它什么都可以指导，科学也不例外。我对那时的文章，已没有印象，但许先生文章告诉我，不是这么回事，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知识。那时的青年都很有热情，我看了文章，当即给许先生写了一信，内容已无记忆，但肯定是表达自己受到文章启发一类意思。想不到过了不久，许先生真还给我回了一短信，大意是鼓励我好好学习。信保存下来，可惜我人在厦门，无法抄出了。

因为家父过去有右派经历，我在八十年代有一种偏向，凡右派我都敬重。我以为他们都是好人，都是极有才华的人，凡他们的书，我都热衷阅读。后来年纪稍长，才发现不能这样看问题，不能把自己的身世感带到对历史的认识中去。在当时知名右派中，许先生还是最不知名的，但他和刘宾雁、方励之提议召开反右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事，却让中国知识界更多人认识了许先生，而且他对自由民主的认识，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是最坚定的。有些人可能还反思民主的缺点，但我印象中许先生则只讲民主的好处，只讲民主对中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晚年始终在探索这一问题。我以为这是许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思想遗产，现在还不是讨论民主缺点的时候，在中国，这不是一个纯粹学术问题，许先生在这方面最清醒，也最有勇气。

人生还真有些奇遇。2004年，许先生早已退休（我不使用离休概念），他所在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恰好刘钝先生出任所长。2001年春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查资料，曾和刘先生有一面之缘。后来刘先生非常关照我，为我谋得了一个在所里访学的机会，那一年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认识了不少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期间，我写了一篇《1949年前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及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写这篇论文时，我曾和所里的张藜、熊卫民二位，去看过一次许先生，那时许先生身体康健，思维活跃，而且保持了一向鲜明的直爽风格。言谈中我刚流露想写这么一篇文章的计划，许先生马上说“你懂什么爱因斯坦相对论”，我赶忙说：“不是相对论，是相对论传到中国的历史”。

我在山西有个朋友，十多年前，在北京潘家园买到一批上世纪七十年代商务印书馆

档案，其中有一部分是许先生编辑《爱因斯坦文集》时和出版社的往来书信，数量相当可观。我本来建议就此写一本专书，还提了一个思路和体例，可惜朋友不在学界，终日忙于公务，没有完成。去年夏天，我回太原，重提此事，他还希望能一起拜访许先生，可惜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不过材料保存下来，日后一定能以合适的方式披露给学界，也是对许先生的最好纪念。

当年建议召开反右学术讨论会的三位右派，已经都去世了。许先生年纪最长，最后离开。他的存在，让时间将一份历史遗产鲜活保存在真实记忆中，他的离去，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思想遗产。在中国，许先生和他另两位朋友，注定是悲剧人物，因为他们有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完整的知识系统，他们发现了真实，并勇敢地表达了真实，不因个人一时得失，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从丁酉之劫到己巳之难，一生两次有悲剧命运者，必会在历史中发出他们永恒的光辉，套用尼采的话说，他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他们死后方生！

2013年1月29日于厦门

许良英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影响

武文生

1988年夏天，我有缘认识许良英先生，经常得到他的教诲；之后，通过许先生又先后得识王德禄先生、华贻芳先生，他们三位是对我的人生和思想发展影响非常大的人。惊悉许先生去世噩耗，谨回忆一些经历片段，以表纪念。

睿智的民主启蒙者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思想启蒙的年代。许良英先生是我重要的思想启蒙者。我于1985年8月31日进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专业读书，当时北大氛围较自由，学生思想活跃，使我很受益。除本专业的学习之外，我因喜爱文史，选了社会学等多种选修课，在北大图书馆广泛涉猎多种书籍、刊物，尤其是人物传记和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著作，尤爱读科学家传记。当时，《自然辩证法通讯》影响较大，也是我最喜爱的刊物之一。记忆中，1986年夏天我首先读到的是屈傲诚和许先生合作的论文，《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系统梳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官方组织对爱因斯坦批判的历史，使我对“文革”的无耻、荒诞和对人类文化的破坏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之后，我延伸阅读创刊以来的《自然辩证法通讯》，许先生的著名论文《科学与民主的社会功能》，我读了多次，还曾复印收藏，其核心观点使我深受震撼：“科学能使物尽其利，民主能使人尽其能；一个能使物和人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必然会有无穷的生命力。因此，可以说，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显然，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要实现现代化，科学和民主是根本，是关键。”

1988年5月份，许先生曾应邀到北大参与“草地沙龙”活动，在未名湖边的一处草坪上，参加者以北大学生为主，有几十人。许先生主要介绍他关于民主理论的研究成果，明确提出中国迫切需要民主启蒙运动。我参加了这次活动，但并未发言，也未向许先生提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许先生。

1988年6月份，北大地球物理系研究生柴庆丰在北大附近被几个社会人员殴打并用刀捅死，引发北大学潮，主要关注师生安全，并呼吁民主自由，当时称作“柴庆丰事件”。在“柴庆丰事件”后期的一个晚上，在北大“三角地”的一次聚会中，我结识北大校友刘刚（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刘说当时有便衣跟踪他，我带他到我们宿舍住宿，并进行了较多的交流，才知道刘刚就是“草地沙龙”的主办人。刘刚觉得我关心民主，对科学史有兴趣，提出我应去拜访许良英先生，并告诉我许先生的地址和电话。

其后不久，估计是1988年7-8月间的一天上午，当时北大放暑假，我去中关村812楼拜访许先生。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包括家庭和在北大学习的情况，也谈了我和刘刚的相识，较多地谈了当时发生不久的“柴庆丰事件”。对于一位没有预约就初次上门求教的大学生，许先生放下手头的工作，耐心地和我交谈了1-2个小时。当时我想，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我是刘刚介绍来的，许先生对刘刚较为了解；二是我是北大学生，许先生对北大学生有较高的期待；三是我是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的系主任胡济民教授是许先生浙大老同学。后来，我才知道，许先生平易近人，注重思想启蒙，他花很多时间与人交流思想，尤其是对于爱思考、有独立见解的青年学生。记得当天是阴天，我穿的是T恤衫和短裤，许先生还关切地问我衣服是否穿少了，使我很感动。

初次拜访许先生，使我如沐春风，觉得这是一位真正值得我尊敬、请教的师长。此后，我经常去许先生处拜访、请教，基本上1-2周要去一次。我向许先生介绍自己的学习、读书情况，也向许先生介绍北大的一些动态；许先生送给我最近写的文章，并向我推荐他认为重要的书籍和文章，有时我在许先生家读书，会呆大半天，许先生和她的夫人王来棣先生经常留我在他们家吃饭。

许先生当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他认为中国需要长期的民主启蒙，准备组织一个关于民主理论研究的学习小组。他可能觉得我读书面较宽，关心历史和理论，基本素质还可以，希望我参加，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但1989年的形势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许先生设想的民主理论学习小组并未实际组织起来。许先生知道我经常逛书店，就交给我200元钱，嘱我为他代购关于民主研究方面有价值的书，但这个任务我完成的并不好。

许先生在民主启蒙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先导性工作。他曾送给我《为“自由”正名》、《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等文章，我认真读了，在一些思考的关键点上豁然开朗，尤其是消除了我的一些糊涂认识。后来，我与王德禄先生交流，他认为许先生受物理学家的科学训练，后来又长期从事科学史研究，他的思考和文章，直指问题的本原。

当时北大的思想很活跃，很多元，也很混乱。记得当时有几位青年教师在校内开讲座，鼓吹德国、日本式的“现代化”道路。我虽在讲座现场递条子，提出反对意见，但

并未足够认识到其危害性，我告诉许先生后，他严肃地指出这是反民主的思想逆流，要认真批驳。其后有人提出所谓“新权威主义”学说，也有北大青年教师参与其中。许先生明确指出，这是开历史倒车，是饮鸩止渴。他还积极鼓励我们年轻人写反驳“新权威主义”的文章。1989年1月，在许先生的鼓励下，我们几位北大同学去参加在北京市委党校召开的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一个讨论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应《深圳商报》一位记者的约稿，王丹（北大历史系88级学生）和我把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在该报刊出。这是“六四”后导致该报被停刊整顿的原因之一。

我在北大上学时，一直对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感兴趣，曾读了不少相关的书籍和刊物，如《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的许多论文，我都读过，也读过很多科学家的传记。我有机会向许先生请教后，曾征询可否报考他的研究生，许先生说他已经停招研究生。我曾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阅读许先生和李佩珊先生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尤其是许先生执笔的前言、后记，关于科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方面的论述，尤其是“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的思想，使我受益非浅。

我虽然对科学历史、科学社会学很感兴趣，但思想认识也很庞杂。当时气功热很流行，“人体特异功能”成为一些“科学家”的研究热点，钱学森就提出所谓“人体科学可能是一场新的科学革命”的说法，当时迷惑了不少人。1987年“气功大师”严新曾在北大大讲堂做所谓“带功报告”，清华物理系的教授现场发布他们的“仪器检测结果”，我参加了这场报告会并轻信其结果。一次我去拜访许先生时，同他谈到这些情况。许先生批评我思想太糊涂，我当时很天真，认为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与许先生发生争执，他很严厉地批评了我，同时送给我他批驳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论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申振钰女士主编的《关于人体特异功能争论的资料》。我读了这本资料，才了解了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争论的前因后果，为自己的盲信而感到后怕。此后，我对种种打着“科学”名义的现代迷信，鉴别能力大为提高。

坚韧的人权呼吁者

许先生既将中国的民主启蒙作为长期的任务，也抓住时机积极促进民主，尤其是为保障人权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9年初，许先生说最近比较忙，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但暂时不能告诉我。3月初，我读到他起草并发起的42位知识分子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才明白这就是许先生说的“重要事情”。这是众多中国的自然科学家首次共同表达他们关于政治改革的要求。我后来知道，许先生在起草这封信时，曾长时间思考、反复斟酌，征集签名时，他与每人都要深谈1-2个小时，力求达成思想共识。42人联名信是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先声。

1988年下半年，王丹与北大学生社团学海社谈妥，成立北大学海社中国社会问题研究部，他任部长，请我作为高年级的学生积极参与、支持他的工作（当时我是大四学生），我同意了。王丹以此名义开始组织“民主沙龙”，基本上每周一次，就一个主题约请一位学者与大家交流。我们还尝试编一本刊物《新五四》，许先生对我们的活动是积极支持的，

受聘为《新五四》的顾问之一。

1988年前后，我曾有段时间想做职业民主活动人士，自认为这肯定有危险，不适合结婚，并因此而婉拒一位中学女同学的求爱。许先生曾是中共地下党员、老资格的学生运动领导人。他多次同我讲，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时期，当时“国统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都是成绩优秀、真正追求民主自由的青年学生，只有国民党的特务才是职业学生。今天的北大学生追求民主，也应学好功课。中国的民主启蒙主要依靠有独立思想、业务能力突出的知识分子。受许先生的影响，我放弃了做职业民主人士的念头，在此后的人生历程中，在不同的职业岗位坚持学习，努力提高业务能力。许先生有鉴于中共搞秘密活动的教训，认为追求民主必须用民主的方式和手段，始终坚持民主启蒙是公开的、思想性、非组织化的活动。许先生经历中共建国后多次残酷的政治斗争，在反胡风、反右、“文革”中多次经历“九死一生”的考验，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但始终保持赤子之心，他一直非常爱护青年学生，坚决反对某些人不负责任的激进主张。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不幸去世。我下午去许先生家，他对胡耀邦的去世很悲痛，和我一起追忆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进改革开放、保护知识分子方面的历史贡献，使我加深对胡耀邦的认识。4月19日晚，我在北大“三角地”主持第十六次“民主沙龙”，主题是“缅怀胡耀邦同志的丰功伟绩”，我讲的内容主要是4月15日下午与许先生共同追思胡耀邦时总结的九条。这次“民主沙龙”结束后，北大同学群情振奋，组成了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这是当时首次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的雏形。

学生民主运动爆发后，我积极投身其中，4月22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胡耀邦追悼会。因为受许先生影响，我始终保持冷静克制的态度，坚持和平理性的方式。在当局发表《人民日报》“4.26社论”后，政治形势较紧张，他送给我一本《于子三运动》，认为大学生们应该保护来之不易的民主运动成果，着重搞好校园民主建设，如选举学生自治会等；学生应该适时复课，不应无限期罢课；要充分认识到政治的残酷性和当局者的铁血手段，青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将许先生的意思转达给一些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多数人同意。但因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搞政治的，加之临近毕业，一直认为自己是学生民主运动冷静的积极参与者，也没有要当运动组织者的愿望，在学生民主运动中是边缘化的，许先生的意见未能影响到更多人，也未能对学生运动的走向产生大的影响，我一直引以为憾。

5月10日晚上，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师主办“五四”七十周年纪念会，许先生参加会议并最后一位发言。他提出学生的基本任务是学习，不可长期罢课，希望各校立即复课。并告诫学生运动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王丹曾告诉我，有人给他出主意，发动绝食。我把这一消息告诉许先生后，他坚决反对绝食，认为青年学生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必须对参与者的生命安全负责任，绝食激化了矛盾，后果难以预测；而且必须认识到最高当局者在政治斗争中是残酷无情的，奉行铁腕手段，已经下决心镇压，学生不能对他抱有幻想。我把许先生的意见尽快转告了王丹，但王当时没想到后来会有三千人参加绝食，只是说他与别人共同发起绝食，不好失信。5月13日学生绝食开始后，

许先生一直为绝食学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担心。他身患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外出活动较少。5月18日晚，他应邀参加知识界声援学生会议，并在会上第一个发言，强调这次民主运动已取得空前的伟大的胜利，我们必须紧急呼吁学生停止绝食，并撤离广场回学校。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许先生的意见，决定成立“知识界救援团”，劝说学生停止绝食。

当局者出动几十万大军，悍然镇压八九民主运动酿成“六四”血案后，许先生表现出铮铮铁骨的中国知识分子风采。1990年冬天，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的新春联谊会上，因许先生是“敏感人物”，主办者未安排许先生发言。许先生主动申请发言，痛批“政治流氓”何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政治空气稍有松动，几位朋友想在港办一本刊物《东方》，想在京约稿。王德禄先生主持策划，约请一些学者就《今后十年中国改革的前景与问题》开展笔谈，许先生花力气写了《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稿子组好后，因原已沟通好的资金未到位而使筹办刊物流产，后设法改在中国未来研究会主办的《未来与发展》分两辑发表，许先生的文章在第五期发表，他指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们从现代迷信中清醒过来，于是有十年改革开放的局面。改革的目标，1981年曾确定为：建设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人们为这个目标所吸引，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作祟，民主始终是寸步难行。特别是1989年6月4日那场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发表时被编辑改为“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主自由被视为洪水猛兽，坚持主张民主的人被斥为“敌对分子”。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反右’和‘文革’年代，棍子、帽子满天飞，稍有独立思想的言论、著作一概被禁，而骗子、流氓、娼妓的胡话、禁吃却使权贵们如获至宝，正义之士无不中华民族的厄运而唏嘘。现在，从南到北骤然又吹起了强劲的改革之风，人们为之雀跃，似乎又出现了希望，但是这次改革，谈的只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而回避政治改革，更是讳言民主。这种拐脚的改革能否成功，殊堪怀疑。”许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后，人们争相传阅，被宣传当局视为严重的政治事故。

其后，许先生不断为中国的人权、民主呼吁：

1994年3月8日，许先生夫妇等7位知识分子发表《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

1995年5月16日，许先生起草并征集45位知识分子签名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 呼吁实现国内宽容》发表；

1996年10月30日，王丹被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八年徒刑后，11月10日许先生发表《为王丹辩护》。

在这些呼吁书发表后，许先生多次被软禁，他并没有退缩。但他后来意识到，当局者对他这样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不敢太过分，但对参与签名的年轻人，处罚则严厉得多。为了保护年轻人，后来他较少采用这种方式。

不断探索的自由思想者

自我有机会向许先生请教以来，读了他关于民主理论、科学史等方面的重要论文，

1991年读到许先生的思想自传手稿（写到1958年他被打成“极右分子”回农村劳动时期止），其后又读到《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八十三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等，使我对许先生的人生经历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尤其是认识到他作为自由思想者的思考和探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自1978年“右派”平反后，许先生以全部精力和心血研究科学和民主问题，他认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的赖以发展的基础，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而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一个共同的本质就是崇尚理性。关于科学精神的研究，集中体现在许先生关于爱因斯坦思想和科学史的研究。许先生数十年长期从事爱因斯坦研究，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主持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并对爱因斯坦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他1983年11月在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讨论会宣读的论文《爱因斯坦的理性论思想和现代科学》，着重剖析了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提出爱氏的主导思想是“理性论的实在论”，“它的实质是：相信自然界的统一性和真理的客观性，相信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相信科学和人类的必然进步。”

1986年2月，为祝贺著名科学史家钱临照先生80寿辰，许先生完成了论文《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史观刍议》。他提出，“人类进行科学活动的历史，仿佛像一个向着未来和人类精神活动的各个领域无限展开的网络。”许先生认为：这个网络在纵向有着比较鲜明的线索，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一些共同的特性，他称之为“历史的经线”，包括：历史的变动性、历史的制约性和相对性，历史的继承性和积累性（科学知识以及整个文明，是人类各个世代创造并代代相传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历史产物），历史的无限容纳性（凡是对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的开拓和深化有所贡献的，无论属于哪个民族、哪个阶级，崇尚哪种价值观念和信仰，坚持哪种哲学观点，在历史上都有其应有的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因为这些贡献有助于历史的前进）。许先生认为，“就历史的横截面来说，贯穿在各种科学活动中，普遍存在着一些基本概念，它们是一切科学探索的动力。”他称之为“理性的纬线”，包括：世界统一性的信念、世界可理解性的信念、人类的经验和理性一致的信念、科学和人类必然进步的信念。他特别提出，“人类间这种感觉经验的一致性和理论性思维的一致性，既是历史事实（实际上是由于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结构），又是一种信念。没有这两种一致性，科学就失去客观意义，就不成为科学。这表明：‘人人生而平等’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两条真理，也正是科学赖以生存的生理和心理基础。”这是许先生关于人类共同的“人性”的深刻理解，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将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

关于民主的研究，则要艰苦的多。许先生和夫人王来棣先生不顾年高体弱，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民主历史和理论研究。他们制订了全面的研究计划，着手系统梳理自古希腊雅典民主制、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英国、美国、法国等建立民主政治的实践，深入研读斯宾诺莎、洛克等先哲关于民主、自由、人权方面的著作，分析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方面的探索，着手写作。

1989年初，在多篇论文中，许先生提出，民主政治的内涵包括四个主要方面：

（1）确认人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权利，即人权。公民是国

家的主人，不是任何权贵（无论是个人还是寡头集团）的臣民或驯服工具。

（2）确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通过多数决定的原则来实行统治。不言而喻，处于少数地位的公民依然受到法律保护，依然享有公民的各项权利。

（3）这种统治只能通过（全体或多数）公民的自由赞同来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强迫和非法手段。由此，通过定期的公民自由竞争和选择，少数派可能成为多数派，多数派也可能成为少数派；一切取决于选民的意愿。

（4）任何政府官吏和人民代表都是人民的公仆，始终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政府首脑和人民代表都由公民选举产生，并直接向选民负责。如发现有不称职的，可以随时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罢免。

他认为，要实行民主制度，必须有四条重要保证：

（一）公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公民可以公开的发表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对领导人的批评，而不受到迫害和报复；（二）严格实行法治，废止任何形式的人治；（三）实行权力制衡，防止绝对权力的出现；（四）严禁军队干预政治，军队只听命于政府首脑。

与此同时，许先生首先从若干基本概念入手，进行系统的梳理，做正本清源的工作。1986年，他提出为“自由”正名；1989年，他著文《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澄清关于民主制的基本原则。

许先生对历史的洞察力使他对许多问题有深刻的认识。1992年经济改革再次显出生机以后，有人以亚洲“四小龙”为例，认为单纯的改革改革是可行的，许先生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中明确指出，“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权和官吏受不到广大人民和独立舆论的监督，必然‘官倒’猖獗，腐败成风，社会矛盾必然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他并辛辣地嘲讽，“如果人仅仅是经济动物，生产力的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那么值得称道的并不是亚洲‘四小龙’，而是希特勒当政时的德国。……1933年1月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1933-1938年5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68%，平均年增长率11%……。根据这一‘伟大功绩’，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最近重读此文，联想到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所谓“中国模式”的叫嚣，令人十分感慨。

许先生治学严谨，他的论文，必须是广泛收集关键资料，深入研读和思考后才下笔，他的文章数量并不多。尤其是1989年以后，许先生的文章在中国大陆报刊无法发表。他的思考，很多反映在他同友人的通信中。仅我所知有限的信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前十年，他和百岁老人陈立先生、李慎之先生、戴厚英女士、刘绪贻先生等就有大量探讨思想、社会、历史的通信。其中，李慎之先生去世后，许先生和李先生的通信，经李先生公子李三达编辑为《八十三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两位致力于民主启蒙的自由思想者，在五年多时间里，以通信的方式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传为知识界佳话。进一步收集许先生同知识界人士的通信，将是研究当代思想史很有价值

的资料。

我在北大读书时，曾受美国革命时代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很大影响，曾研读当时能找到的潘恩的全部著作，并将潘恩视作自己的启蒙导师。潘恩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中，都曾是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但他的经历十分坎坷。记得我与师友交流时，曾将许先生比作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托马斯·潘恩”。

许先生在评价爱因斯坦时，曾饱含深情地说：“只要稍微深入地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和为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在治学和处世上，他都有始终如一的崇高的目标，处处显示出高度的原则性。他在真理面前虚怀若谷，只有老老实实的服从，没有虚伪的自尊。他用锐利的批判眼光去分析一切，也用同样锐利的批判的眼光来解剖自己。他知错必改，闻过则喜，从不文过饰非。他的所谓‘多变’，就是他的知错必改的光明磊落态度的表现，是出于对真理的虔诚的尊崇，是对自己终生信守的原则的坚持。而这正是一个真正理性论者的本色。”这恰是奉爱因斯坦为精神榜样的许先生的写照。

1988年有缘向许先生当面请教以来，许先生对我的思想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也非常关心。我的理想曾是追随许先生从事民主启蒙工作，后因造化弄人，我以商业咨询为业，对于民主启蒙，也就有心无力，实在愧对许先生的关怀和期望。许先生年逾九十，仍与王先生辛勤笔耕，进行民主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作为晚辈，祝愿许先生关于民主理论的研究著作，成为中国民主启蒙的利器！

现在轮到我为你流泪了

王丹

1月28日下午四点多，我获悉噩耗：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我的启蒙恩师许良英先生因病于今天下午一时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三岁。得知许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楞了一下，知道早已经知道要发生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也许是因为已经有心理准备，也许是因为还有既定行程必须完成，所以似乎没有惊天动地的悲哀。晚上回到家里，还是坚持把需要处理的事情处理完，包括跟纽约的胡平商量海外的追悼活动。各类杂事大致就绪，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一坐下来，眼泪就流下来了。

原来，我的坚强是假的。

第一次去许先生家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大一学生，那是1988年。算一算，跟许先生的忘年交已经是25年了。这25年的岁月中，除了在狱中的几年外，我始终没有中断过跟许先生的联系。在最艰难的1993年到95年之间，更是每周到他家报到，那样的黑云密布的年代，那样的患难情，其实也多少演变成了祖孙情。我出国之后，我父母继续这样的感情纽带，隔一两个月也会到许先生那里去一趟。已经有朋友问我要纪念许先生的文章，我写不出来。当你对一个人有太深的情感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写出纪念文的。我想，我需要时间。我现在的哀思，只能是第一时间的即可反应，而真正能在时间长河上留下痕迹的记忆，还要等到我能更平静地面对许先生的离去。许先生一生

致力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事业，曾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中期，两次发起科学家联名信，呼吁政治改革与宽容，成为中国知识界参与民主化运动的先锋。近十几年来，除了继续不畏压力大胆发声之外，许先生潜心民主理论的研究，进行了大量撰述工作。2008年4月，许良英先生获得“萨哈罗夫奖”。四个月后，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曼谷发表演讲时引用了他的话：

“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是的，让我们永远记住许良英先生的话，永远向往，珍惜，追求，保卫自由，平等。因为，这是在固守我们的人性我希望世人能永远铭记许良英先生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做出的毕生贡献，也期待他的理想终将有实现的一天。

许先生永远是我高山仰止的恩师。他虽然走了，但对我来说，他是永生的。伤感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写出纪念文的。我想，我需要时间。记得1995年当局对方兴未艾的新一波反对运动进行镇压，我第二次入狱，很多人被迫噤声，许先生也受到警告。但是他仍然在海外媒体上发表了题为《为王丹辩护》的公开信，说听到我被捕的消息后“老泪纵横”。

许先生，现在轮到我为你流泪了。

（载《参与》2013年01月28日）

自由之友 真理志士——纪念许良英先生

范亚峰

经历了两年的幽居生活之后，我正准备透一口气，找机会拜访许良英先生，孰知2012年底传来许先生一病不起、进入危重监护室的消息，元月28日得知许先生在奋战一个月之后告别人寰，而自己2010年与许先生的一面竟成永诀。

1995年春天，我于人生的极端困顿、混乱与苦痛当中拜访许良英先生。此后的10多年间，许先生的人格成为我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时时思及的楷模。1995年之后，许先生在黄庄附近的家成为我人格成长的力量源泉之一。在耳闻目睹中国知识界许多的叛卖、乡愿和软骨之后，我对学术的意义深感困惑，对知识分子群体深感失望。而通过无数次的求教，在一次次暮色苍茫中走出许先生的家，于灯火阑珊中漫步在京城の春色秋雨里，我青年期生命中所积郁的苦痛逐渐飘散。

2003年秋，我到许先生家中，递上由我发起的、由秋风、王怡等朋友参与撰写和反复修改十多次的公开信《保障言论自由 维护基本人权——关于湖北警方拘捕作家杜斌的50人声明》，许先生看了文本表示赞赏，当即答应参与签名。此后，我时常到许先生家中，就维权运动中许多人事求教于许先生。我也常常带一些朋友去许良英先生家中问学求道，冉亮先生惊叹道：许先生真是修炼出来了。许良英先生不仅是民主运动的启蒙思想家，更是维权运动的先行者和精神导师。

依我自己的体会，许良英先生最为人所服膺的，乃是其几十年说真话、做真人、万死不辞而修炼成的人格结构，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台州式的硬气，及老浙大的求是精神构成许良英先生人格的核心要素。台州先贤方孝孺刚直不屈，孤忠赴难的“台州式的硬气”给予其巨大的影响，我记得许先生曾当面赞赏方孝孺“是个硬骨头”。老浙大竺可桢校长的两个经典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构成了许良英先生一生求索的核心线索，而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就是许良英先生求索的答案。他多次说，竺可桢校长为他母校浙江大学定下的校训“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从中国文化与社会、政治转型的高度看待许先生及其一生的探索，其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至终以民主启蒙者自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中启蒙话语的代表性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许先生所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是从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角度冲击和瓦解极权意识形态的最重大的力量；许先生对于爱因斯坦民主思想的介绍，则直接启发了八零年代的公共人物方励之先生，许先生的人格典范及民主思想则全方位地熏陶了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先生，及众多八九一代青年。我以为，许良英先生作为精神导师的作用和意义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已然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未来必被更多发掘、感怀和铭记。

然而，吾爱我师，吾更爱真理。作为深受许先生人格浸润和思想启迪的后来者，我更有责任讨论许先生一些重要的观点。

我以为，许先生至晚年也并未完全摆脱其前半生的乌托邦思维的影响，其对于爱因斯坦人格的复杂性及思想的复杂性显然缺乏足够的体认；对于民主话语有一种近乎原教旨的捍卫。而深受其影响的方励之先生根据科学思想的传播历史，建构出极为粗陋的相关性模型，推导出中国尚需数百年（自1989年起214年）才能实现民主化的结论，其背后简单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更是近于荒谬⁹³。方先生对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及社会理论常识的缺乏，反映了大陆公共领域的科学家在人文社科素养方面的不足。

其次，许良英先生对刘军宁先生提出的共和·民主·宪政架构的批评，显然对于军宁先生的问题意识及学术思想贡献缺乏足够同情的理解。刘军宁先生以共和、民主、宪政作为自由政体的核心框架，较之许先生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四者并立的框架更为符合宪政思想的脉络，而且共和、民主、宪政的框架更是中国自由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建构本土化的可贵尝试。军宁先生提出自由主义的平面、演化、超验三种论证路径，发人深省。而2000年之后，军宁先生独力提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近几年力排加诸宪政话语之上的不必要前提，如儒家宪政等，一再重申自由价值的首要意义。还要说明的是，刘军宁先生虽然受到许先生的批评，然而2003年深秋，军宁先生等与我一起访问许先生的时候，二人毫无罅隙、恳谈甚欢。

晚清从宪政话语走向革命话语，1989年之后的中国思想则从民主话语走向宪政话语，其中思想史的依据值得仔细考察。二十世纪以革命话语压倒晚清的宪政话语的民国党治政体，恰恰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期说实现了华人

⁹³ 方励之：《民主何时能实现？——纪念“五四”九十年》。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FANG-Lizhi/kd090331-3.gb.html>。

地区民主化的飞跃，革命话语以军政训政宪政的反革命得以成功，其间复杂的思想纠葛绝不可以民主话语的独大度之，而一意贬斥孙中山的人格及事功不过是盲目尊崇之的镜像而已。从近代思想史的复杂纠葛中可见，大陆 1989 年之后，告别革命话语引发了复杂的张力，而思想界的民主话语逐渐转为九零年代的法治话语，进而再变为零零年代的宪政话语，逐渐生发出李凡先生所谓极权的威权化（近似于训政）、威权的民主化（近似于宪政）的民主化转型两期说，大陆学界从晚清到台湾民主化的台湾模式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在 1989 血泊中痛定思痛的大陆思想界学人对于民主、宪政等的思考是审慎而深刻的。21 世纪中国的精神革命，既需要民主启蒙在公民行动中继续推进、自我启蒙，也需要文艺复兴、家庭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可能是改革宗运动的深化）等互为犄角、相互呼应。我们深切缅怀、充分尊敬许良英先生及自由先驱们的牺牲奉献和辛苦耕耘，更当着眼当下，对风起云涌的公民维权行动者们，及传扬福音的自由使者们给予极大的关注。

我带了五岁多的儿子去参加许先生的告别仪式，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成为像许先生那样正直、诚实的自由之友、真理志士。

旅美民主人士在纽约举行“许良英追思会”

文德

2013 年 1 月 28 日，中国著名科学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人权倡导者许良英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 93 岁。2 月 2 日下午 13~17 时，旅居美国的民主人士在纽约法拉盛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举行“许良英追思会”。追思会由《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主持。参加追思会并发言的有著名民运人士徐水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宋书元，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陈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李进进，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王书君，政论作家、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著名艺术家荣伟，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古川，民主人士林青、上海异议人士蔡桂华，以及刚到纽约不久的杨雨。

胡平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许良英先生追思会，缅怀许先生的非凡经历，道德文章，表达我们的哀思，从先辈那里吸取精神力量。胡平还回顾了许良英先生在反右运动中被打为“极右”分子的经历，以及许良英先生发起八九民主运动的经历，特别是六四以后不断为民主与人权鼓与呼的经历。在反右运动中，许良英本来没有发表意见，但当毛泽东实行“阳谋”把那些积极发表意见的人士打为右派时，许良英先生不高兴了，说怎么能这么干呢？于是被打为“极右”分子。在八九民主运动爆发之前的 1989 年 2 月 26 日，许良英先生发起 42 人联名发表，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北京科教界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参与这一签名的有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王淦昌，以及茅于軾、于浩成、张显扬、李洪林、包遵信、邵燕祥、吴祖光等著名人士。

“六四”屠杀、黑云压城之后，许良英先生发表不少文章鼓吹政治民主，阐述民主启蒙，并几次发起公民联署公开信，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1992年，许良英先生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呼吁政治体制改革。1994年，良英先生又与妻子王来棣及丁子霖等发起《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公开信，并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翌年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公开信，全世界上千著名科学家、学者，包括国内数十名院士和著名知识分子、国际上十名诺贝尔奖得主联署。

徐水良回顾了与许良英先生交往经历，特别是他两次入狱期间，许良英先生在外边不断为他的自由奔走营救。徐水良说：“在我第二次坐牢十年中，许先生不仅一直坚持不懈地营救我，而且每年都给我家寄钱，补贴我家生活。我在监狱读的书，往往是许先生辗转寄给我的，包括介绍西方理论学术的各种著作。许先生的书，使我能够跟上外界思想的步伐。”

王军涛：如果让我以一个字概括许良英先生给我的印象，那就是纯净！虽然他经历了人世间几个肮脏的阶段，受到许多迫害和磨难，但他仍然保持纯净的精神境界。他的追求和忠诚都是不掺杂一丝的私心，他维护所追求的理念也是不做任何妥协。那么什么是许先生的理念呢？我觉得，就是启蒙学者所说的五四精神的两个词：科学与民主。现在由于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学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争论有更复杂的理解和评论，但启蒙学者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批判仍然使这两个词有最大影响力。许先生本来可以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因为投身政治和受迫害失去机会。在重新获得机会后，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崇尚和传播爱因斯坦的思想。这里，既有对真理的坚守，也有对政治和社会进步及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高度责任心。许先生的政治取向很简洁，就是民主。他憎恨专制，反对独裁，主张权力回归人民。这些都对中国仍然有重大意义！

陈破空：许良英先生活了93岁，另一个人，独裁者邓小平，也活了93岁。时间是公平的，生命规律是公平的。并非因为邓小平养尊处优，有专车专列专家医疗组而多活几年；也并非因为许良英生活简单简朴清贫而少活几年。关键在于生命的意义。六四镇压时，邓小平85岁，他所思所想，是如何保证他自己安度晚年，出于一己之私，他出动军队，血腥镇压年轻学生。但六四后，他也只活了八年。他享受了，但享受了多少？却在历史上留下污名，遗臭万年。而许良英先生，因为坚守民主信念，为中国民主化鼓与呼，流芳千古。在许良英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真正的意义。

宋书元说，虽然他没有见过许先生，但感觉许先生与他的性格很相似，都是很直白的人。

林青：我在1996年和刘贤斌、马少华一起去到许先生家里看望他，他的教诲依然在心里铭记：他反思自己和乔石等一起搞地下党时候的学生时代，希望我们学会独立思考、理性行动，要理解民主的真谛，培养自己内在的民主素养和信念。他举例一个同样在秦城监狱出来的学生所写的文章，依然没有摆脱共产党的八股文风和思维模式，希望我们多读原著多研究历史真相，洗去大脑中共党从小熏陶的一切毒素。许良英的去世让我很悲哀，真正具有民族精神风骨的民主老人渐渐都走了，而我们还没有成长起来，我们太缺少许先生一代人的精神和素养，缺少他们敢为天下先、誓为天下谋的境界，他们

有人生价值超越物质世界的勇气，我们没有了，我们把价值和物质二元存在的社会完全合二为一为物质世界，我们没了精神，只存在了物质追求和现实思维。我也很爱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可以弯曲，但人不能弯曲。愿许良英精神永存。

古川：我曾在 2007 或 2008 年的时候去拜望过许良英先生。当时我在《国家历史》（即现在的《看历史》杂志）做记者，许先生说你们做国家历史，能发表有关民主的文章吗？许先生将一篇他写的民主的文章给我带回去，这篇文章最后没有在《国家历史》杂志发表。我觉得还是最敬佩许先生的勇气，无论是在反右运动时，还是在八九运动时，特别是六四镇压之后，许先生还发出公开信要求进行民主化，大力为民主与人权鼓与呼。这是最值得我们今天追思与纪念的。

杨雨：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对许良英先生的追思，也是对我们的激励。许良英先生作为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我们树立了一面道义与实践的旗帜。在处于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浮躁作风与犬儒危机，因此，对我们来说，仅有激情是不够的，更多的是需要淡定的心态和实干的精神。如同许老先生的心路历程与人生一样。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能看出，许老先生的一生，虽然受到过中共的蒙蔽，但是，正是由于独立思考的缘故，使许先生成为了“追求真理的叛逆者”，从而让许先生的后 40 年人生刻画了许多自由思想的印记。许先生虽身在体制内，但仍然坚持为许多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大声疾呼，并提供帮助，这样的人品，就足以令许多炒作出来的所谓“学术明星”汗颜。如果一名中国知识分子，连真话都不敢讲，何来“思想”可言？没有真相就没有自由，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事实判断才是价值判断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闯出中共思想专制的牢笼与规训，让自由的哲思辉煌崛起，如此，方能创造出高贵、优美的人格篇章。尽管我这代人与许先生在年龄上有两代人的距离，但从精神距离上来说，我们又是如此的接近，因为我们都认同的是自由思想与民主人权。所以，在精神层面上来讲，许先生既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同道。思想家荣格说：“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本是不重要的，说到底，最紧要的是个人的生命——只有它创造着历史，只有这时，伟大的转变才会首次发生。”那么，今天，我们是否也能说：许良英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到处是许先生的精神！

（参与首发 www.canyu.org）

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

铁流

“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这两句话，是吴祖光先生生前赠我一条幅写的，我受之有愧，一生须强项但也屈过。“反右斗争”后期，为求得“组织”的宽大处理，曾写过“认罪悔改书”。虽然这份悔改书虽不像一些人“我的交待”那样，痛揭别人“反党罪恶”而去立功赎罪，但也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据知从不承认自己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上海的彭文应，一个就是北京的许良英。

我当时在四川成都，自无缘相识许良英先生，但 2007 年“反右斗争”50 周年大祭岁月，我却数次破门拜见了。为了不忘记历史，北京右友发起了“反右斗争 50 周年”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签名诉求，要求：一，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二，执政当局应向受害人赔理道歉；三，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

第一稿文本由杜光老师草拟，经钟沛璋老师修改。由我和任众先生、燕豚符女士拿着文本来分头串连。任众负责北京地区难友，燕豚符女士负责北大难友，因我当年是《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右派份子又有车，负责串连上层有名气的右派，许良英先生便是串连的第一人。去前我查阅过他有关的资料：

许良英先生 1920 年 5 月 3 日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下的张家渡，1939 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在辗转流徙中完成学业。他在专业上显示出的天分和特质，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赏识，他却一心从科学转向革命，历尽艰辛寻找中共地下党，终于在 1946 年如愿以偿。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并秘密领导浙大乃至杭州的学运。上世纪 50 年代初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想摆脱政治，回到科学研究当中，1956 年出版了《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未料 1957 年风云突变，并没有“右派”言论的他，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中科院第一个右派，回故乡种地二十多年。从 1962 年起，他在农村的煤油灯下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1976 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影响了几代人。1979 年，他的“右派”身份获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从事科学史研究，主编了《20 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被金克木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1980 年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从那时起，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倡导民主、科学、人权。

大约是 2007 年 1 月 23 日（？），我和太太驱车去到海淀区他的居室，那是极其简陋的三居室，连地板也没有，屋里家具更是陈旧不堪，不像著名科学家住的地方，然而他和他夫人历史学家王来棣女士就长年住在这里读书写作。他个儿精瘦，两眼炯炯有神，腰板硬朗笔直，声洪音响，老而不苍，80 多岁的耄耋老人了，思路十分清晰。见面时我按照一般习惯夸他一翻说：听说许老师都 87 岁高寿了，早早地活过了毛泽东……他突然把脸一沉道：毛泽东，他算个什么东西，怎么拿我和他比？他是个整人害人的暴君！我一下搞得很窘，连声道：比错了，比错了！毛泽东，算个什么东西？他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一边看诉求文本一边说：毛泽东一生干了不少坏事，仅一个“反右运动”就戕害了近百万知识分子，几乎毁掉了中华民族。

他详细地把诉求文本看了两三翻，认为写得不错，但有几处措词不准确必须修改。我立即向钟沛璋老师拨通电话，转呈了他的意见，同意修改。他却不签自己名字，要我改好后拿来他再签。我心里嘀咕：这老头真倔，没点通融余地，只好笑着告辞。三天后再和太太登门造访，他看了修改稿二话不说签下了他的大名，然后与我攀谈起往事来。他说 1987 年“反右斗争”30 周年，他和刘宾雁、方励之发起搞个研讨会，他的家就是联络地址。本来是按事先研究好的名单发邀请信，方励之却去邀请了钱伟长。想不到钱伟长却拿着邀请信去向邓小平告密，结果邓一生气就把刘宾雁、王若望一下开除了

党藉。其实王若望只是参与者并不是发起者，我却免难了⁹⁴。外面传说是费孝通的密，不对，是钱伟长，所以他才一步登天，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⁹⁵。自此后再没有人提起召开“反右斗争”纪念会一事，没想到今天你们发起了，但愿这个会能开的成功。

我走时他送了我一册《许良英文集》。此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我也把我主编的《往事微痕》寄送给他。此后我被有关当局严格管控，为恐给老人增加麻烦再未去登门叩拜。

白驹过隙，光阴荏苒。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许先生，中国永远失去了许先生！

（来源：《参与》2013-1-31）

以科学精神 追求自由民主

——送别许良英纪实

俞梅荪

2013年1月28日，93岁许良英在北京逝世。他是我国的科学史家，毕生致力于争取人权，推进民主进程；不畏暴政，为正义呐喊，被誉为“中国的良心和傲骨”。

良英驾鹤 精神永存

1月30日下午2时，我随严正学、王书瑶等来到北京大学医学部，送别许良英。在学院路的大门口，遭遇6、7位保安模样人的检查，态度强硬地要求每人出示身份证并作登记。我问，为何如此严厉？答：平时也如此。大门口内停有警车。

我们辗转来到遗体捐献告别室，许良英遗像以他深邃的目光看着人世间，两侧悬挂着大幅挽联，倾述着世人对他的留恋：

科学思想传承爱氏大爱人类赤子之心永存

民主启蒙见证历史期盼中国自由精神不朽

3时，人们三三两两陆续到来，因地处生疏冷僻，不如八宝山公墓容易找到。一位身着西服50多岁的某先生，高喊大家排队，我随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进入送别室。丁子霖与许家长子许成钢倾述，难掩悲伤而哭泣。我向为民主自由倾尽心力的许先生深深鞠躬，不舍离去，欲留下拍场景照，被这位先生指使三位年轻人强行推出大门，其后又见留下拍照者被推了出来。据说这位先生是清华大学教师并许良英的学生，操办送别竟负有打压任务。37岁蒙冤遭清洗的中共地下党员许良英，93岁告别人世，仍无法安息。党何以如此惧怕一个敢讲真话的前辈共产党人？

杜光（85岁中央党校反右运动受难者，离休教授）：许先生思想的深刻性和人品风

⁹⁴ 同时被开除党籍的还有方励之，王若望既不是发起者也不是参与者——编者注。

⁹⁵ 不是人大副委员长，是政协副主席——编者注。

骨使人敬佩，他远去了，其精神和思想永存。

江棋生（原中国人民大学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六四”坐牢5年半）：许先生的独立人格、道义勇气和人性光辉，永远激励我们坚毅前行！

胡佳（北京维权人士，反右受难者之子）：为了能来这里，昨晚我没回家，以防被警方拦截，作为晚辈来送别，他的遗憾，我们要给他弥补。

李三达：父亲李慎之与许良英是同道好友，电话交流常被掐断，他俩通信交流的84封信已编辑出版。

许成钢：父亲许良英一生为民主和科学的发展，精神不朽，望大家能够继承。

一些送别者说，许良英传承爱因斯坦的科学探索精神，将物理学和革命交织在一起，为追求政治自由与民主社会而呐喊，面对暴政和打压，不屈不挠，是我国民主思想的启蒙者和践行者。

送别持续一个半小时，达两百人，大都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民间人士，有十多位求告无门滞留北京的底层访民。人们悼念许良英，向往宪政民主法治。

从“左派”到“极右”的跌宕人生

许良英，1920年生于浙江临海，1939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物理学家王淦昌。1946年加入中共，1947年任中共浙江大学支部书记，发起并领导“学生罢课、教授罢教”等行动，引爆了“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暴行、反对屠杀青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遍及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1952年奉调北京参加组建中国科学院，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受审，调任中科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科学思想史研究。

1958年，自认“很左”的许良英，反对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而发表看法：“明明是我们党反复动员人家提意见，却把提出意见的人当作敌人，失信于民。”一周后，他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和公职，在农村劳动改造20年。其间，在王淦昌支持下，以“旨在用毛泽东想确认和批判世界上所有有政治立场和哲学立场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的名义，他作为农民克服巨大困难，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三卷），向周恩来总理申诉，1976年得以出版。这部“啼血”之作是当时世界上最完整的爱因斯坦文集，后被胡耀邦在不同场合积极推荐，被评为八十年代大学生最喜爱的十本书之一，其科学民主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许良英在论文中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必须要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科学才能进步。”1986年秋，他和方励之、刘宾雁发起纪念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研讨会，被官方打压而夭折，随即诱发包括胡耀邦总书记下台等一系列的整肃。

1989年1月，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写公开信，呼吁释放政治犯。同年2月，许良英和地理学家施雅风起草呼吁民主的公开信提出：“1，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同步，建立民主监督机制，反对腐败；2，保障公民自由权利，首先是言论、出版、新闻自由；3，释放因言论被治罪者；4，重视科学和教育的发展。”42人联署，其中许多科学家。当时这两封信在高校大学生和知识界影响很大。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许多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缅怀，呼吁民主人权，反贪污腐败。“六四”前夕，许良英和方励之、于浩成等被公安部监控。“六四”之后，他未获

中共党员重新登记。他说：“中国进入了黑暗时期，即使国民党也没有这么狠毒，邓小平对人民干了一件世界历史上最凶残绝伦的事。”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许良英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指出：“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一切国家赖以发展的动力。光搞经济是不行的，就像是拐了一条腿，原来的那些问题都还存在，将来会出大乱子。”致使发表此文的那期杂志被查封。

1994年，许良英和丁子霖等6人发起《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公开信。他说：探讨现代化而不提及人权，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1995年，许良英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公开信，全世界一千多位著名科学家、学者，包括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国内数十位院士联署。随后，他为“六四”学生领袖王丹等民主人士公开辩护其无罪。

1997年，邓小平去世。许良英提出：“应当从邓小平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要学习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结果国民党现在还是执政党；如果中共当权者执迷不悟，难逃菲律宾马科斯、印尼苏哈托的下场。”

追念方励之 叹心中憾事

2012年8月9日下午，在北京郊外回龙观的方励之追思会（前两次被警方打压），我见到身体硬朗的许先生，他和胡佳等一大早去西郊为刘宾雁扫墓。与会者缅怀方励之为民主启蒙运动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贡献，是青年的良师和知识分子的楷模。有人对方励之“六四”以后，被迫流亡美国而深感遗憾。

王书瑶（78岁，北大物理系学生反右受难者）说：“方励之应该留在国内，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大不了坐几年牢。”

许良英说：“方励之如留在国内，会有生命危险。他是科学家，不是政治家，不能苛求。”

1989年“六四”之后，人们的理想破灭，一切向钱看，经济高速发展，政改停滞，民主运动几近夭折。许多人缅怀方励之，他作为民主运动的启蒙者及领军人物，人们寄希望他若留在国内，有利推动民主运动。我在发言中介绍黄慈萍（原中国科大方励之的学生）和戴晴（北京作家）的这一观点，不少人赞同。戴晴曾说：“方励之如留在国内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他不是激进民主运动派！而且他当时是出于理想和对党的责任感而去努力推动改革，但党内斗争而不容，造成他的悲剧！”

傍晚，精神矍铄的许良英和大家一起来到严正学家的铁玫瑰园，瞻仰林昭铜像（严正学创作）。林昭是北大中文系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劳改，1968年被枪杀，终年36岁。北大有800多位优秀学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长期劳改劳教，其中被枪杀、自杀、劳改死，共达30多人。

2007年4月，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之际，我作为反右死难者之子，随杜光、王书瑶等40多位反右受难者冲破警方阻力，聚会呼吁翻案和索赔；全国两千余反右受难者老人

联署上书；北大反右受难者们坚持维权上访 18 年。这一切，了却许良英和方励之为纪念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的夙愿。

2007 年以来，反右受难者群体或个体的上书和上访都无回音，却招来警方的全面监控和打压，其中 2011 年 80 岁闫桂勋（北大数学力学系学生反右受难者）上访北大被派来的保安员打伤，北大的反右暴行持续至今竟达 56 年。这些耄耋老者每年都有去世而不瞑目，但右派维权依然坚持至今，不断发出悲怆的呐喊。

“我自滴泪哭良英”

送别许良英的当晚，我把有关图文发给朋友们，收到不少回信，摘要如下：

冯志轩（84 岁反右受难者，国家机械工业部离休干部，许良英的好友）：许良英终生正直磊落，世人有口皆碑。他去享天国祥和，人世间也必会变迁。

悼许良英

力争民主赴荆程，求真求实尽生平。
安得精英皆效法，我自滴泪哭良英！
终生磊落满征程，俯仰无愧历生平。
华夏广域堪南冠，焚香默祷祭良英！
九三岁月漫漫程，苦雨凄风伴生平。
笑看尘寰款款梦，极乐天国慰良英！

刘皓宇（82 岁反右受难者，湖南日报离休编辑）：

科学精英许良英，毕生追索为求真；
人生自古谁无死，活在民心便永生。

唐奔：我读许良英和李慎之的通信集，其深刻见识使我震撼，佩服之至。这样优秀的共产党人人为何挨整、被边缘化，那些无德无能，甚至无耻之徒，却仕途亨通？！

裴毅然：许先生对红色革命的一路认识，真诚并负责的记录下那一代人的真实脚印，嘉惠于我这样的研究者，看清那一代学子何以被迷的原因。

清明感怀：

送别许良英之日，正是我 1994 年在中南海任职秘书时，被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并栽赃陷害而冤狱三年的刑满释放“新生”之日。冤案 20 年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存无着，祸及家人的劫难没完没了，泱泱大国，难寻公理。

想到家父惨死于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弟弟因此患有精神病史；因我冤狱致使弟弟的住房被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原委员私企老板惠进德侵吞，而滞留精神病医院已 12 年；我依法参与右派维权，为自己和弟弟维权，求告无门，长期被警方监控打压。

痛感宪政民主法治，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深感历史的责任落到吾辈肩上。——修订于 2013 年清明节

【作者】: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 首发《纵览中国》4月4日清明节
- 转发《新唐人》4月6日
- 初稿简版原载《争鸣》杂志 2013年3月号

附件:

右军便是自由神（诗三章）

鲍彤

六亿神州尽舜尧，舜尧失语独夫嚣。
共和国里人权死，不哭前朝哭本朝！
国有义师起右军，右军就是国之魂。
分明五十年前事，五十万魂叩国门。
胆碧汗青照国难，头颅同掷血斑斑。
冲冠易水今犹昔，不破焚坑总不还。

作于 2007 年，反右派运动 50 周年
2013-04-11，整理

我认识的许良英伯伯

李亢美

最近一直通过许良英和王来棣先生的博客关注许伯伯的病情，心里似乎早就有了不祥的预感。这次他终于没能挺过来。

许伯伯是我父母的朋友。对父辈的好友我非常尊重，因为他们是一群素质很高的人。而许伯伯的个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通过一件偶然的事情。

大概是 2006 年的一天，我正好在家。父亲请来好多客人，都是耄耋之年。那天他们在讨论写一份东西，大概是列了一个提纲。这时候我听见许伯伯问那位要执笔的人：“你看过 XXX 那本书吗？”那人回答：“没有。”许伯伯又说了一本书，那人还是摇头：“没看过。”许伯伯说：“没看过这些书，你怎么可能写的出来呢？没有几年的学习和研究怎么能弄得明白呢？你先读读书吧！我学了几十年了。”言语中他带着一种自信和霸气。

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直言，我还真是头一回见。在座的这些老人哪个不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许伯伯能出此直言一定很牛！顿时让我肃然起敬。（后来我读到他对杨振宁和其他人的评论，才知道他的“直言不讳”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望尘莫及的。）在他们后来的谈话中，我特别留意听他讲话。许伯伯有很浓的浙江口音，有时候很难听明白他的话，但是我记住了他不时提到一本他写的《科学·民主·理性》。

散会后，我问许伯伯书店是否可以买到他写的那本书。他说：“国内没有。不过，我

可以送给你一本，是国内简装的。”我太高兴了：“真谢谢您，我可以跟您回家取一趟吗？”（因为我第二天就要走了。）这时天已晚，父亲请来社里的司机送许伯伯和其他的人回家，车满了。许伯伯说：“这样，我让司机给你带过来吧。”这时候的许伯伯是个非常可亲的老人，完全没有了刚才的霸气。

我认真地拜读了《科学·民主·理性》。老实说，这本文集中有几篇我没有全读懂，但是受益颇深。我明白了为什么许伯伯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和锐利，还有严谨和科学的态度。因为他不仅是个社会学家，思想家，还是个物理学家。

许伯伯可谓是当今一位难得的真正有良知的大知识分子。他经历非常坎坷，政治运动的磨难，离婚，复婚，以死抗拒凌辱，20年近似被流放的“农民生涯”，人生种种苦难他都经历了。然而他从没放弃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求和学习，从没失去他做人的根本。他的坦诚，刚直，没有被世俗所吞噬和改造。无论是面对权贵还是名流，他挺身捍卫科学和正义。

身为知识分子，许伯伯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的思想宝库，还有在中国这个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中，他始终坚守的那份社会责任，保持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深深地致敬！

（载新浪李亢美博客 2013-02-04 15:17:41）

许良英先生的几点政治遗产

姜福祯

许良英先生走了，我们一时难以估量这位老人对历史进步的巨大影响，这需要时间和来自各方面的大量资料佐证，但是这位老人充满理想主义人格魅力，孜孜不倦追求真理以及刚正不阿、宁折不屈的精神境界，对当代民主运动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我第一次听到许先生名字的时候，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的好友王德禄所在的《自然辩证法杂志》社聚集着一批精英，王德禄跟我谈起最多的便是许良英、方励之、金观涛等人，他最津津乐道的便是许先生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和科技史研究。稍后，从他那儿我看到许先生写的关于百花齐放的文章，我才知道许先生的追求不只是科学，更包括民主。从这时候开始我就是许先生的粉丝了。

许先生去世后，傅国涌对许先生的评介是“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畏无惧”，不只是傅国涌，众口一词的评价都是围绕着一个真字，这应该是许先生最鲜明的个性特点和政治遗产。

我对许先生了解不是很多，但我还是想简单梳理一下这份遗产，并希望大家一起来总结和丰富这份遗产，以昭示激励那些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们。

一、为真而来，为真而去

许良英先生当年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真诚地来到共产党的队伍。

抗日战争期间，他带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深得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的欣赏。但是除了科学之外，他发现一条更有效、更迫切的路径，这就是在野的共产党所倡导的反专制，求自由的政治理想。为了寻找共产党，他偷偷离开了浙大，急得爱才心切的王淦昌教授登报寻他，1945年他虽然返回浙大任物理系助教但是很快加入共产党，在担任中共浙江大学支部书记期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于子三事件”，身为浙大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他发起领导了浙大学生罢课、教授罢教等行动，引爆了“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暴行、反对屠杀青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波及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1949年解放后，他任中共杭州青委委员兼大专区委书记，与时任杭州青委委员的乔石同事。

全国解放后他参加了科学院组建的工作，1952年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1957年与于光远共同创建和负责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与于光远共同担任负责。1958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被打为极右派，回故乡劳动改造。至此为止，共产党彻底背叛了“联合政府”“反对专制”的政治追求，走向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个人迷信和政治独裁的道路。至此为止，许先生追求的真理实际上也已经不复存在，无论当时许良英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许先生没有进一步阉割自己，在政治上跟上领袖和党的思想布署。而是选择回乡务农，一去就是20年，至此为止，为真而来的革命理想沦陷了。

在右派戴帽期间，许良英自然不能不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但是他并没有从理想主义者变成犬儒主义或奴隶主义者，“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许良英先生则重温科学救国的理想，做了一件必定名垂青史的大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让他的右派生涯熠熠生辉。因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的复出是很早的，但是他只去做自己的事情，并不去歌功颂德，也没有重新回到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上来。他依旧在思考，在寻觅救国救民的真理，为寻求人类普遍适应的民主价值观，70年代末期他与自己的党实际上已经渐行渐远，直到93岁高龄去世，许良英先生为继续寻找和坚守救国救民真理，真诚地投身到当代民主运动和政治异见异者的行列。

2011年他在《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中说“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因此，民主与科学更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全人类最宝贵的共同精神财富，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建设。标榜社会主义而否定民主，最典型的莫过于1933—1945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缩写Nazi，即‘纳粹’），以及不久前宣告解散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标榜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实行的是最残酷、最黑暗、灭绝人性的专制统治。”至此可谓“狼奶”吐尽，成为坚定自信的民主主义者。

正如许先生的好朋友王德禄在胡绩伟老人去世后所言：“又一位世纪老人去了，我以为‘两头真’群体中，有几个代表人物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他们用了毕生精力追求真理，亲历各种不同的政治人生；进入老年后，又真诚、积极全面的反思社会、政治与

人生。我把他们称之为‘世纪老人’。他们的反思必将为实现人类的普世价值有所贡献。”在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反叛者之中，许良英自我反思，傲然独立，直接把自己置身于民主人士的行列并且加入独立中文笔会，他人格力量和精神遗产的光辉灼然照人，不可不谓之中华民族的脊梁。

二、真假要辩，真假必辩

可以说真假问题是困扰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许良英先生既敢于面对统治集团最高领导，也善于面对朝野内外知识分子。

面对统治集团和制度层面许良英坦然说“当时（1940年代）我们痛恨国民党，就是因为感觉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和腐败不可忍受，因此参加了共产党。哪想到后来共产党的专制和腐败比国民党更厉害。”

为分辨民主和伪民主，为分辨极权、集权和威权，为分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为分辨所谓“多数人暴政”，许良英先生与朝野内外知识分子，与民运同仁和御用学者都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辩。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十分较真，锱铢必较，并不因为是朋友就不辩和少辩。

面对当下专制的内容和特点，许良英先生说：“极权主义把专制推到极点。传统的专制统治者主要是在政治上奴役臣民，其他领域却鞭长莫及，只能听之任之。极权统治者则要控制一切领域，不允许有个人隐私，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所宣扬的‘全面专政’。”

新权威主义是80年代末萧功秦、吴稼祥、王沪宁等人提出来的，恰好经历了六四之后的政治高压，90年代初期发育成熟，成为体制内外犬儒者的一款遮羞布，于是“民主缓行论”和“新权威主义”一时成为时髦，记得当时一些民运同仁也表示赞成，认为这是被新加坡模式证明的一条可行之路。为此许良英先生先后撰写了《驳民主缓行论》、《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与吴江先生商榷》、《也谈“普世价值”》、《从“专制的对立面”的争论看民主启蒙的艰巨》、《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在这些文章中许良英和王来棣从卢梭的“公意”理论与洛克的个体平等、独立理论实践的后果上，从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上，主要是基本人权和民主权利的不可或缺的角度，将新权威主义和民主缓行论等反民主论点驳得体无完肤，尤其是从普世价值的合理性根源上剥掉了御用学者的画皮。他说：“专制的对立面是什么？是民主，立宪，或自由？专制是一种政治体制，掌握统治权力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少数人的集团（寡头）。民主是一种相反的政体，政权由全体公民掌握，即“主权在民”。“立宪”是指以宪法为根据建立政府，而宪法必须包含两个基本内容：（1）保障每个公民生而具有的各种权利；（2）约束政府的权力，严禁它从事任何超越宪法的活动。”这一段清楚地表明无论什么新权威还是旧权威，只要没有主权在民的实际内容，都只能是寡头政治，并没有什么专制下的民主，这一点也正是真民主和伪民主的试金石。在去伪存真的争辩之中许良英分别与查汝强、吴江、顾昕、金观涛等人进行过论辩，特别是对揣摩领导意志，谋取个人利益，制造一套套假大空的所谓“真理”的

人进行批判。因为在专制社会所谓“真理报”“人民报”和国家媒体经常会制造一些“真理”，欺骗和愚弄一般民众，除蔽和祛魅既需要火眼金睛也需要真诚和勇气。

国际社会看到了许良英在推动中国的民主、人权、政治改革方面的巨大贡献，1995年9月纽约科学院授予许良英和丁子霖“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授予他“萨哈洛夫人权奖”。

三、人微言真，人重言真

不拔高自己，不遮蔽别人，不掠人之美，人微言轻的时候说真话，得志得势的时候也说真话，君子立诚并非易事。

《爱因斯坦文集》出版的时候，中国为了对国内外宣传，报刊中对许良英的名衔是“由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许良英主持”，许良英立即去信要求更正，严正指出：“我既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著名’人物，我不过是一个农民，一个没有公职的人民公社社员；编译工作也不是我‘主持’的，我们5个编译者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是共患难的同志，只不过选题计划是我拟订的，工作量也较大而已。”（许从平《肩住黑暗的闸门——我的三叔许良英》）

许良英嫉恶如仇，怒则敢言，言则求真，言则无畏，无论在困境当农民还是在顺境当官都能如此，纵然在反右、六四前后那样的恶劣环境，他也迎难而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反右派的时候许多人是躺着中枪，他却是自己堵到枪眼上的。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可谓万马齐喑，多数人不知所措，许良英则顶风而上，斥责毛泽东主持的引蛇出洞的“阳谋”。

大道至简，唯真而已，许良英坚信自己在道上，才敢于坚守自己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独立立场和良知。

1986年夏，他与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活动加上年底的学运，触怒了太上皇，以至于邓对“反对自由化不力”的总书记胡耀邦失去信心，将其整肃下台。

1989年2月他发起了呼吁保护人权释放政治犯的公开信，42名著名科学家和作家联署，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89年没有倒霉已经万幸，“死不悔改”的是还在政治形势严峻的1992年，他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的著名文章，此后连续多年他都在为改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不遗余力地呼吁呐喊，总是活跃在当代民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特别值得赞赏的是王丹出狱后处境险恶，许先生一直为此呼吁呐喊，王丹再次入狱后，当时的环境可谓万马齐喑，他还是写了《为王丹辩护》的文章，形成巨大影响。

四、尊崇科学矢志不渝，呕心沥血编译《爱选》

《毛选》之后一个时代结束了，在新开启的时代中《爱选》对中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十分巨大，这是因为爱因斯坦不仅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他的民主思想和和平主义一直是

他行为方式，他是《政府论》作者洛克的极力推崇者，洛克的民主思想是这个世界公民的清泉活水。

《爱选》第一卷在1976年付印，1977年1月开始发行，当时正值“四人帮”被打倒后不久，书上还标明了“内部发行”。

到1994年为止，《爱选》第一卷共印刷四次，第二、第三卷分别印刷三次。此书影响之巨大，因为在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爱选》出版之前，经历了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文化荒芜，关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少量翻译介绍只见布云不见下雨，《爱因斯坦文集》首次全面地将爱因斯坦的科学和思想介绍到国内。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到1980年3月第三卷全部出齐共选译了410篇文章，共135万字，是当时世界上收集爱因斯坦思想资料最完备的文集。

许良英的好友王德禄说“我觉得改革开放的时候，《爱因斯坦文集》对我来说是影响最大的。当时并没有一本民主方面的书写得很好，可以作为精神上支撑的力量，而《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却让我感到是一种精神源泉。如果问改革开放中哪个人、哪个思想对我影响最大，那肯定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排第一。所以，我认为爱因斯坦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对年轻人的思想解放具有很大的启蒙意义。”

林爱民、刘志光、樊洪业也都认为自己是爱因斯坦思想启蒙的一个标本，而这种启蒙是科学和民主同步、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步的。

胡大年撰文谈到过《爱选》对胡耀邦的影响，应该是可信的。此外，在80年代大学生最爱读的10种书的问卷调查中《爱因斯坦文集》赫然其中。

《爱因斯坦文集》是80年代的畅销书，是许许多多知识精英和青年学者的案头书，它的启蒙作用可见一斑

五、做真人、做好人，坚持“台州硬气”

许良英所谓做人就是以“平常心”做“平常人”，人人人格平等，不可自恃高人一等。就是人格独立，相互尊重，就是以己之心推及他人，这一点许先生多次谈到，此处也不赘述，熟悉先生的人都会有所体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没有民主主义的诉求，简陋的民本主义也被巨大的专制阴霾所遮蔽，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处事方式是深入骨髓的文化细胞，而许良英肯定是“不识时务”的一类。如果从70代末先生在事业高峰毅然归队，颌首称臣抑或是独坐书斋，坐享其成，都会有一把不错的椅子吧？不因为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而失真，正是许良英身为异类的突出标志。

许良英的侄子如是说：“影响三叔一生的另一条座右铭是：‘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这是清初文人陆陇其的话，它是我们台州人引为自豪的硬骨头精神的一种理性的昇华，为三叔终生所信守，使他对人间的逆流恶浪能泰然处之。”“他的一生，历尽坎坷艰辛，他传承了台州人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硬骨头’精神，正如鲁迅为纪念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左联作家柔石《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称道的‘台州式硬气’”。（许从平《许良英简传》）许良英自己也说“五不怕”都经历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

从方孝孺到柔石再到许良英，从潘天寿的硬气画风到当代台州人文风尚，是否有一

种“台州硬气”值得思考。

结语

许良英先生说：“总之，民主是同自由、人权、法治融为一体的，而人权又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204年前的法国《人权宣言》就已庄严指出：‘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凡有志于现代化的人，都必须永远记住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许良英：《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

环顾百年宪政未至，环顾当下公众不幸、腐败猖獗，此言至真至善也！

（写于2013年1月31日，3月发表于《议报》，4月5日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记忆许良英

蒙木

胡耀邦曾经向干部推荐说：“《爱因斯坦文集》，我大部分读不懂，但就是那读懂的一点点已经受益匪浅。”《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是一个曲折的故事，那是因为这译本竟然出自一个中国农民之手。

不过年

过年了，平时我不大给别人打电话发短信。记得有一次初一我破了例，因为着实佩服几位忘年的先生，包括许良英。接通许老电话，他劈头第一句是：“有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给您拜个年。他回答：“噢，我给你拜年，给你拜年。”“嗨，您这么客气干嘛，做晚辈的给您拜个年是应该的。”“为什么年轻的给年老的拜年是应该的，年老的就不该给年轻的拜年呢？”

不久前，我把这事告诉了忘年学长张玲先生，记起这事因为新近许先生去了。张先生说：“许先生说得对，其实以往老一辈人平时工作什么的很忙，赶稿写作翻译什么的都寄希望于这有限的空闲，不希望被打扰。像我们家过去总是公开说——我们不过年。”她还给我讲她曾经在钱锺书故去的那年特意问候杨绛，并表达过年了，如需帮助就招呼一下。杨绛的回答也是：“谢谢，我们家不过年。”不过年，并非不通人情，而是珍重时间，或者说珍重生命。张先生很早前还对我说过：对老人，最好的尊重就是不打扰他们。

认识许良英先生，那是因为爱因斯坦。喜欢爱因斯坦的思想性的文章，尤其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洞见，让我惊异，我一直渴望能策划一本《爱因斯坦文录》。那个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我的感受，同许先生所讲的胡耀邦的感受一样。他曾经向干部推荐说：“《爱因斯坦文集》，我大部分读不懂，但就是那读懂的一点点已经受益匪浅。”《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是一个曲折的故事，那是因为这译本竟然出自一个中国农民之手。

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

许先生的故事让我一度自省起来。他说早在 1957 年他就被定性为极右分子，被撤销一切职务，送黑龙江密山的农场劳动。这个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党干部、中科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创办人，因为身体不好索性选择回家做农民去了。那时做农民，意味着永远没有出路。我突然无语：做中国农民原是一种惩罚？我想我被惩罚这么久竟然还不自知？许先生还讲过《爱因斯坦文集》出版后，时值爱因斯坦诞辰九十九周年，1978 年 3 月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消息，说《文集》的编译工作“是由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许良英主持”。许先生说：“我感到恶心，立即去信说：本人既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我不过是一个农民。”因此要求更正。

他为什么有缘翻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一度被定性为“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正是为了“要批判全世界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包括科学家，要把其政治和哲学言论编译出来以供批判之用”，崇拜爱因斯坦的许良英被记起，因此他 1963 年从乡下到北京商务印书馆的宿舍（应为招待所——编者注）、中科院哲学所等地住了一段时间搜集资料，因为是右派，最后只好借宿朋友家中。后来他借了一大堆书带回乡下开始他的编译工作。商务印书馆每月给他预支五十元的稿费去换工分。农村晚上八九点就停电，他在煤油灯下继续工作到深夜。后来商务印书馆领导换人，顾不上爱因斯坦了。他的恩师王淦昌先生开始以化名每月接济他三十元生活费，让他安心工作。1979 年 1 月许良英的右派身份得到“改正”。他说：“对于右派改正和恢复党籍我毫无欣喜之情。”但也就是这一年，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终于由商务正式出版了，我想他应该是很欣慰的。

许良英从初二就开始崇拜爱因斯坦，高中毕业后精读了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许先生对爱因斯坦的崇拜自始皆然。1969 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派员找他借爱因斯坦著作的译稿，说是“中央文革小组”已把批判爱因斯坦列为理论批判的重点。他回答说：“爱因斯坦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科学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在报刊上公开批判他，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大概六七年前我曾和黎明等一起拜望许先生，黎明老师写过爱因斯坦传，他谈起了爱因斯坦对不起老婆的逸事。许先生勃然大怒，义正词严地训斥黎明老师没有根据。我觉得可爱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对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发飙，辩才无碍的黎明老师也白发苍苍了，低着头边搓手边点头：许先生说得是，说得是。我无端想起契诃夫的一段手记：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指点着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太说：“你呀，总是长不大呢？”

容易发飙的老孩子

许良英先生风度雍容和峻切严正互为一体。一直深切地记得有次我自己给他还书（我从他那里借来的一些不易得的书），他坐在我对面突然问我多大了。得到回答后，自己靠过沙发背去，突然放声笑起来：哈哈，我比你大五十二岁，哈哈。非常非常澄澈的笑容，宛如一个孩子。

他老人家一旦谈起爱因斯坦啊、民主啊、启蒙啊都体现了峻切的一面。我曾经咨询

他关于启蒙的问题，他说要启蒙，知识分子必须先启自己的蒙。他还对卢梭理论极为反感，他建议我多读读洛克的书，我知道他的晚年一直在着力写作民主思想史，他曾经说过：“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和目的，人权是民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四位一体构成民主政治的大厦。”

还有一些我们不断被教导要淡忘的历史，我也曾拿一些自己道听途说的有限故事问他真否可信，不小心就会遇到他老人家的飙起：“谁说的！谁说的！告诉我，我找他！”我因此理解对面坐着的，是一个非常率真的人。张玲老师曾经给我启蒙：你想想，没有那点彪劲，如何过得了那个艰苦的年代？别人经常并不和你讲道理的。

今天我回想着这多少有些两面的记忆，想起《世说新语》所载的嵇康。《世说新语·容止》中说嵇康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德行》载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而《品藻》载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俊（古字通‘峻’）伤其道。”这我们从《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慨想。其实这封绝交信，并不是真的写给山涛看的，否则他后来不会把孩子托给这个人，而是借机公开自己的人格和立场罢了，表现了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那个侧面。传统士人总是有一个政治梦，当这个梦严重受阻的时候，他们能干些什么，又如何表达自己，这是理解魏晋风流的根本所在，后来曹雪芹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世说新语·雅量》又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比较起来，许先生高寿九十余，是为嵇康所不及，网上很多超过《思旧赋》字数数倍的悼念文章，斯为时代之庆幸。我还想，许先生的遗产也并不是广陵散，斯为思想之庆幸。

（2013-3-1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追求真理 终生不渝

——沉痛悼念许良英先生

费良勇

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楷模许良英先生于 2013 年元月 28 日在北京辞世，享年 93 岁。许良英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史家、思想家和民主人权活动家。他是三卷版《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译者。他撰写了大量维护人权的信件和请愿书，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在共产专制的残酷打压下，他言行一致，坚持理想，不畏强权，我行我素，为科学民主和自由平等而奔走呼号，付出了沉重的人生代价。

许老突然去世，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2012 年 10 月 8 日和 9 日，我们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了第五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会前，许良英先生于 9

月 12 日亲笔书写了给大会的致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的所有成员沉痛悼念许良英先生，并向许先生的家人表示深切慰问！希望许先生的家人节哀顺变！

许良英先生 1920 年 5 月 3 日生于浙江省临海市。他 1942 年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主要研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他敬佩爱因斯坦的科研精神和学术成果，更敬佩爱因斯坦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关爱社会、关注人类未来的人文关怀和担当精神。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专制腐败，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中共当时反对国民党专制，号称要争自由和民主，要解放人民，为人民谋幸福。1949 年他担任著名科学杂志《科学通报》编辑。1955 年因为“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他被批判和停职审查一年。1957 年因反对反右运动被划为极右派，开除党籍，并被送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如此，直到 1974 年，他还是痴迷地坚信共产党。1974 年他目睹了荒唐的批林批孔运动后，才猛然醒悟。一旦看透了共产党的专制腐败，他就一步步投入了反对共产专制的民主运动之中。1978 年中共摘掉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恢复了他的党籍。他回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1985 年，他第二次被中共开除党籍，原因是他在浙江大学演讲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 年，他同方励之和刘宾雁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1989 年，他写出政治民主化的联署信，42 人签名。1992 年，他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4 年，《纽约时报》在头版上刊登了他的文章《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1995 年，他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联署活动，45 人签名。

许良英先生晚年对参加中共进行了深刻反思。1980 年代末他就指出：“当时（1940 年代）我们痛恨国民党，就是因为感觉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和腐败不可忍受，因此参加了共产党。哪想到后来共产党的专制和腐败比国民党更厉害。”事实上，中共夺取江山以后马上把人民推进了万丈火坑。名曰解放，实为奴役。中共全面地恢复了专制，并创造性地发展出极权专制。毛共暴政的残酷性、荒唐性和野蛮性，远远超过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也远远超过发动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在和平时期，毛共竟害死四千万人，饿死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抗日战争八年期间中国人死亡总数（1200 万人），也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中全球死亡人数总和（一战 1000 多万人，二战 5500 万人）。饿死人数超过中国两千年来所有大饥荒饿死人数总和（根据史料统计，在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 2129 年中，发生 203 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总共死亡了 2991 万人）。

1957 年，流氓暴君毛泽东玩弄“引蛇出洞”的“阳谋”，先甜言蜜语鼓动知识分子向中共提意见以帮助中共整风，再像杀人魔王张献忠借科举考试之机杀害考生一样，突然变脸，把那些敢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毛泽东“引蛇出洞”期间，许良英先生没有参加鸣放，但是，在毛泽东通过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也就是发布了“反右”动员令之后，许良英先生顶风而上，痛斥毛泽东的“阳谋”。他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被划成性质严重的“极右派”。《人民日报》还多次发表文章，批判他的“极右”言论。他被遣送回浙江老家，成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直到 1978 年。许良英先生由于刚直不阿仗义执

言而付出了 20 年青春的代价。

许良英先生对自己和人类有坚韧超强的信念，面对严峻的现实从不灰心丧气，日复一日努力工作。他在 1999 年 9 月 1 日写给朋友的回信中说：“表面上，中国这块几千年来沉积成的板块是坚不可破的，但在整个人类文明洪流的不间断冲击下，早已在逐渐溶化中。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他在生命的末期，还用同样的话来勉励我们为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

许良英先生追求科学民主和自由平等的信念引起了国际反响。2006 年，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专文《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讲述许良英的生平故事。2008 年 8 月 7 日赴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前夕，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泰国首都曼谷发表有关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讲话。小布什在讲话中提到：“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小布什敦促中共当局顺应世界和历史潮流，实行法治，尊重人权。

许良英先生晚年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虽然近十年来我的处境相当困难，文章不让发表，电话一直被窃听，还曾一度遭软禁，不少人不敢同我来往，但我始终没有感到孤独。”我们将永远铭记许良英先生为中国自由民主做出的杰出贡献。许先生虽然生前未看到中国的民主化，但他的理想终将实现。

许良英先生永垂不朽！

（博讯来稿 2013 年元月 29 日写于 纽伦堡）

纪念许良英先生

郭少坤

今天下午五点半钟打开互联网，一行令我不愿意看到的文字“许良英先生追悼会将于一月三十日在北京举行”映入我的眼帘！

就在前几天，我在和于浩成老师的通话中还谈到老师的病情，我说将在春节后去看望他，可言犹在耳，许老师竟溘然辞世，使我陷入无限的遗憾和痛苦之中。

能够得识于许良英老师这样的中华知识分子精英，是我在 2001 年出狱后在北京上访期间，蒙朋友王丹的母亲王凌云老师介绍所至。我在获得许良英老师的住址后便来到许老师家，当许老师听完我讲述自己为农民维权被当局制造冤假错案入狱二年不得不过来京上访后，老人愤怒地说了一句：“他们简直是流氓！”但他对我上访维权并不报有多大希望，只是安慰我要搞好身体。并在不久，委托朋友转交给我一千元人民币，说是帮助我解决生活困难和伤病治疗问题，使我感动不已。从此，我对许老师更加是尊敬。（我曾经写下《走近许良英》一文，被《北京之春》发表。）

在后来的不断去北京上访中，我有时间就去拜访他，老人经常对我谈起中国民主道路的艰辛，并鼓励我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法治人权事业努力奋斗。老人的形象，老人的思想，老人的语言，一直在激励着我顽强的生活着，……

2012年底，我从网上看到许老师的夫人王来隶先生辞世，同时看到许老也住进海淀医院。我在为此悲伤之际想到在春节后去看望病中的许老以示安慰，可没有想到，上帝并没有为我预备这个时间，使我未能见到我所尊敬的许老师最终一面。

人生有很多遗憾，但遗憾并不意味着人生的不完美，只要我们来这个世界上，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和自己国家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同胞的福祉尽力了，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自我谴责和遗憾的了。因此，我想，许良英老师和他的夫人王先生都会因为他的良心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奉献而幸福长眠！

谨以此拙文为祷！望许良英老师九天有灵，听我祈祷，是为至愿！

国家六级伤残人民警察、维权者：郭少坤

公元2013年元月30日晚于徐州家中

（载博讯2013年1月30日）

理性尊严德行——悼念许良英先生

沈洪

一个连小布什都知道并引用其讲话的科学家，没理由在他的祖国被封锁太久。没有什么永垂不朽，时间会站在良知这一边。

许良英先生一生接受采访次数不多，视频访问恐怕寥寥。他的愿望是做一个真正的人：有理性，有尊严，有德行。我想他是做到了。

采访许老的渊源，要追溯到2011年初。访问袁伟时先生，他推荐了98岁高龄仍在奋笔不辍的刘绪贻先生，采访完刘老，他则力荐近几年间通信往来、他很敬重的许老。

彼时能检索到的许老资料并不多，学者傅国涌写过几篇。之后几次拜访许老，借书、聊天儿，也把《大师》栏目想采访的老人名单带给他看过，听他臧否“×××还可以；×××很不错的；×××混蛋，很差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有自己的判断，觉得差劲的一定会讲上一段我所不知的旧事，真是爱憎分明、耿直坦率的老头儿。

再后来，《炎黄春秋》能发表他的文章了，谈民主，和人论战。磨铁几欲要出他和王来隶先生合著的《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了。20多年前他说“知识分子要先启自己的蒙，再影响他人”，便坐言起行研究起民主理论来，这也是他们晚年心血最重之处。只可惜，二老健康状况的坏消息比出版突破禁区的好消息来得快了些。

鲁迅有句话是“肩住黑暗的闸门”，他视之为座右铭。我问他，另一句“在战斗中侧身而立”呢？据说袁永熙在当了20年右派后，很信这句话，经常跟儿子讲，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许老听罢直言，“这样的思想就把儿子逼坏了，什么话都不敢说，是一个病态的人，有什么意思？人要腰杆挺起来做人，有什么话要说就说。”

我想，简要回顾他“做过三世人”的波涛一生，才能知道求知、求真、坦荡，这些词的分量有多重。

许良英少年时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着迷，立志“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抗日战争初期，在流亡中进入大学时，对现实的不满促使他研读革命理论，进而思想激变，恩师王淦昌的赏识和“一起拿诺贝尔奖”的愿景，也拦不住他满心虔诚地投身革命洪流。之所以说是洪流，那不是一个人的选择，几乎是一代进步青年的选择。以扛住沉重的因袭黑暗的闸门为己任，让下一代人进到光明自由的天地。

随着浙大从贵州复原回到杭州，多年沉闷的民主运动也走出低谷，开始蓬勃发展。地下党组织正式建立支部，许良英们继续积极开展工作。这期间，爆发了“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于子三运动。这里不得不提到，让许良英念念不忘和引以为豪的老校长竺可桢，“以校为家，待生如子。”也正是他，用“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革命精神，鼓舞和支持着愿为真理而献身的年轻人。

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许良英受到了人生第一次政治打击。因曾介绍胡风集团“骨干”入党，遭怀疑、批判，停职审查一年。1956年“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们迎来了黄金年。当时从城里到中关村，有专车接送高级知识分子，待遇也很不错。此时已决心从事学术研究的许良英，以为能从此安于书斋生活，哪料想风雨欲来。

在“双百”方针、“整风鸣放”、“拆墙”、“填沟”、“通气”等言辞的反复动员下，“鸣放”局面空前热闹。许良英却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党员自居，公开反对反右派斗争，因此成了科学院第一个自己跳出来的右派。

忠诚的代价，是回故乡当了20年农民。即便如此，他还是一片赤诚。“大跃进”时，受各地放高产“卫星”的鼓舞，他也“滚一身泥巴”，以体力劳动认真改造自己。“党所号召的我都闻风而起”，“文革”开始后，许良英以当年参加地下党的心境，响应号召支持造反派，写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一个虔诚的细节是，他曾特意去韶山朝圣，“在韶山住了一宿，五次进出毛泽东故居，每次都噙着热泪。”直到1974年向商务印书馆交《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稿，目睹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闹剧，他才彻底从迷信中猛醒过来。“回头一看，几十年的一切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衣》一样。”

1978年，许良英正式恢复了公职。从近代和现代科学史的研究起，进而系统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以及民主的历史和理论，“过去信奉的意识形态教条受到颠覆性冲击”。1986年“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许良英是主要发起人之一。1989年，他又发起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签名的有42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科学家为政治问题表态。1992年他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为“和平演变”的合理性辩护。1994年，他起草的《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全文刊发在《纽约时报》

头版头条。1995年，他再一次发起呼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签名者45人，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2006年8月，《纽约时报》以整版报道了他，标题是《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

2008年，小布什在曼谷发表演讲时引用他的话，“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很久前读到王康的一篇旧文《科学家的选择与责任》，专门谈到了爱因斯坦和萨哈罗夫。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把许多时间和精力用于非物理学专业的社会问题，是世界科学界的一个伟大传统，也让我在一个更开阔的谱系里，找到了许良英的坐标。引用王康的话来说，“在探索宇宙奥秘、赞叹大自然壮丽同时，真正的科学家必然会在内心深处焕发谦卑、感恩和救赎这三种神圣感受，也就必然会抗议一切人类不幸、丑陋和苦难，就必然会拥有殉道者式的命运。”

然而殉道者不会永远孤独。1988年以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欧洲议会设立“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颁发给对维护人权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曼德拉、昂山素季都曾获此奖项。1989年，萨哈罗夫去世。戈尔巴乔夫的悼词中写道，“我被深深震撼。在同一个星球上，同一个历史大翻转关头，俄罗斯总有天才和先驱站在自由与奴役、光明与黑暗临界处，我为俄国庆幸。”

回到“爱因斯坦之问”，那个曾经使科学家有机会对他的同胞进行启蒙而且丰富他们精神世界的时代，难道真的过去了吗？

谨以此文纪念许老求知、求真、坦荡的一生，愿活着的我们，一起读懂他。

（来自《许良英、王来棣博客》，2013-02-09）

深切怀念民主导师许良英先生

王德邦

从网络上得知许良英先生于公元2013年元月28日离开了这个他深切关爱、忧思的世界。看到此消息时，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毕竟许良英先生是93岁高龄的老人了，“离开”是一个早该想到的结局。虽然许先生生前，在我每次拜访他，称他为“许老”时，都被他严肃的指出不要称“老”，并且当即数出一批如胡绩伟、杜润生等比他自己年纪还大的老人，认为他们才配称“老”，而自己在这些老前辈或老同道面前就算年青的了，所以他要求我就称他许先生或许老师。由此可见许先生有一颗永远年青的心！也因为如此，今天我仍不敢称他为“许老”。

对许先生我接触不多，但印象不浅。说实在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愿意去见许先生，或者说有点胆怯去见许先生。因为他太严肃认真，有时简直认真严肃到有些不

近人情。这样使我这个说话不太严谨，学识难称渊博的人，就常常在与许先生谈话时担心说错话而让他费时费力来纠正。

记得我第一次拜访许良英先生是 1995 年 12 月中旬，当时是跟任不寐一起前往许先生家中的。当天我们乘电梯上楼后，敲开许先生家的房门时，并没有发生我们常常从书中读到那种热情待客的情景，相反，我印象中许先生不仅没有热情叫我们进门，就是我们进了门后，他也没有让我们就座的意思。记得许先生用类似有点像审讯一样的语气问我们是怎么来的？让我们各自说明自己的情况。当时我内心真涌起了一丝凉意。

在听到我们介绍了各自情况，并将西安林牧老先生的一封介绍信呈上后，许先生才转为关心而又有点奇怪地询问我们：你们进楼上电梯时没有被拦住？我们说没有受到什么阻拦。他又问发现有人坐在楼下电梯口没有？我们也如实地说没有发现。他就有点自言自语地说：那就怪了。难道他们撤走了？随后许先生向我们解释，说近来楼下有人值班，昨天还将前来的客人拦下，今天可能撤走了。听了许先生这番问话，我才明白刚才进门时许先生那个态度。他大概在提防便衣前来。如此我内心也就释然了。

许先生叫我们在他那窄小的客厅中两张简易的沙发上坐下，许先生的夫人王来棣老师送来茶水，我们就与许先生展开话题。因为我们那次是从西安转道北京，许先生先问了西安一些情况，就聊到北京当时的形势。记得许先生在对当时局势表达深切忧虑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对参加当年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以及其中一些学生领袖提出了严厉批评，甚至说那些参加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根本不懂民主。言谈中他还提到王丹，说王丹出狱后到他这里来，说自己在监狱里面才看得进去书。许先生说这怎么能行，要能沉下心来好好读书。如果中国国内有一百个懂民主的人，那中国的局势就不会这样了。听着许先生对当年参与八九民主运动人士如此严厉的批评，及对中国形势当时那么悲观的估计，我这个作为八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心中真不是滋味。谈话到最后，许先生很认真地拿出纸笔给我们开列了一个读书清单，记得上面有《美国民主历程》、《民主简易读本》等等一大批启蒙类的书籍。后来我们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到北京新华书店按照许先生所列书目购买了一批图书。这些书对我深入了解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有很大教益。

第二次拜访许先生大约是 8 年后的 2003 年，浙江学者傅国涌先生让我转交一本《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与樊百华等合著）的书给许良英先生。当我联系好送去时，许先生居然问：傅国涌怎么将书寄到你那了？你跟傅国涌很熟？这些问题简直让我不知如何回答。过后我再一想，这正是做自然科学研究者的严肃认真，什么都得寻根问底，都得弄个明明白白。

第三次是 2006 年夏天，我是陪一个朋友前往拜访许先生。记得那个朋友有点信奉神秘主义，讲一些什么天数、运程。结果谈话几句后就被许良英先生问得张口结舌，最后被弄得哑口无言。所以那次谈话时间很短，可能也就半个来小时，我们就匆匆离开了。

第四次拜访许良英先生是 2008 年冬天。当时我与另一个朋友前往许先生家中，谈论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对八九六四的问题上。我当时说起北洋军阀段祺瑞对镇压学生

的态度：1926年3月18日，学生抗议北洋政府而引起了北洋政府卫队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当时北洋军阀执政段琪瑞顿足长叹，说自己“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之，当时虽为摆设装饰的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国务院的阁员作出总辞职，段琪瑞颁布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而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政府也没加以阻拦。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可见当年的北洋军阀比八九年及其之后的中国当局要胜过千万倍。

在我陈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对待学生请愿态度并愤怒谴责八九当局时，许良英先生静静地听着，在我讲完后，他马上盯着我问：你讲的这些是真的吗？有资料记载吗？我说这是从史料上查找得到的，现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查到相关材料。许先生当时反复问了我从哪些材料上看到，通过什么可以查到。我当时凭记忆说了自己了解这些事的情况。随后许先生给了我一个他的邮箱，叮嘱我回去后将详细查找到的有关北洋军阀对待学生请愿的情况材料发到他邮箱中。结果，在我回家因忙于杂务而过了几天没有顾得上查找好时，有一天忽然接到许先生电话，他居然在电话那头不无惊喜地说关于北洋军阀段祺瑞镇压学生忏悔一事的材料他查到了，的确是那样。电话中许先生还叫我有空到家中去，我当即答应改日要前去拜访。

2008年底，随着《零八宪章》的发布，我先被抄家，再被软禁，后来行动变得极不方便。再后来我就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南方我生长的故乡——桂林。这样一来，使得回北京成了一件需要反复计划的事。之后也就再没有机会前去拜访许先生了。许良英先生虽然仙逝，但他那种严肃认真、寻根问底、不懈奋斗的科学精神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坚守，将让我铭记终生！

民主导师许良英先生千古！

我和许良英先生的渊源及几次交往

——暨悼许良英先生

王金波

2013年1月28日15时半，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接许良英先生家人报，今天下午十三时二十二分，许翁辞世。享年93岁。”我吃了一惊，立即打许先生家的座机，无人接听。给江棋生打电话，他没听说。给傅国涌打电话，噩耗得到证实。

我是在“六·四”镇压后的官方批判文章中第一次见到许先生的名字的，后来在1990年代后期的外电中偶尔听到过他的消息。1998年参加筹组中国民主党后，我在临沂收到外地朋友寄来的资料，得知许先生虽不赞成组党，但在营救被捕组党人士的过程中起了

重要作用。1999年我到杭州后，了解到许先生的更多情况。4月的一个晚上，在王东海家偶然碰到傅国涌。健谈的傅国涌跟我和高焯炬畅谈了一个通宵，其中包括他极为推崇的许先生。

当时在异议和民运界，有两位德高望重的浙江籍老人直接介入民运的一些事务。一个是祖籍义乌、居住在西安的林牧老先生，被很多民运人士尊称为林老。另一个是祖籍临海、比林老年长七岁、居住在北京的许先生。当我按林老的叫法称许先生为许老时，傅国涌给我纠正说，按照习惯，大家都叫他许先生，他不喜欢别人喊他许老。后来杨宽兴告诉我，许先生从不认为自己年龄大，所以不喜欢别人叫他许老。

这年4月，我在王东海家看到一篇许先生写的文章《“八九”十年感言》。文中关于民运人士心态、反思和学习的自我启蒙、责任伦理，以及公开、理性、非暴力等原则的观点，契合了我多年以来的思考。而许先生的这段话，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一直让我深思：“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还应有冷静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的矛头当然主要是应指向当政者的专制压迫、践踏人权和一切黑暗腐败现象；但对于民运阵营中所出现的各种不良倾向和恶劣行为，也应予以必要的批评，而不应纵容姑息。只有这种是非鲜明的不偏不倚的批判精神，才能保证民主力量的健康成长。”

我把这篇文章带给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的朋友们看了，他们打算发表在《在野党》杂志，并委托我征求许先生的意见。我在王东海家给许先生打电话，许先生表示同意，并要求一个字也不能改。后来，《在野党》杂志在5月的第九期和7月的第十期作为特稿分两次刊发此文。我还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外地的一些朋友。

想不到的是，2001年我入狱后，许先生的名字和这篇文章作为“罪证”出现在了 my 判决书中，从而使我和许先生的渊源被以法律的名义固化。这是我的自豪。我曾得意地告诉其他在押人员和犯人，这是中科院的一个科学家，是中国爱因斯坦研究的权威。

2000年11月，我去西安拜访林老，林老拿出许先生寄给他的一封信给我们几个年轻人看。信中谈的主要是法轮功问题。许先生认为当局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他还提到主张镇压法轮功的何祚庥，好像是说何祚庥跟他是邻居，但两人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何祚庥为人很无耻。

2007年11月，我第一次拜访许先生。当时包遵信先生刚去世（2007年10月28日），而林牧（2006年10月15日）、何家栋（2006年10月16日）两位老先生也刚去世一年多。杨宽兴跟包、何均有交情，他从外地来北京参加包先生葬礼后感叹不已：“趁着这些国宝级的老人还健在，赶快去见一面，否则不知什么时候再也见不到了。”这话说得没错，我也有切身体会。我2005年出狱后，有个心愿打算三到五年内完成，那就是去西安拜访一次林老，以答谢我入狱期间他的帮助。我听别的朋友说林老饭量很大，身体不错，所以觉得迟几年没关系。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林老竟在睡梦中突然离世，没有任何征兆。而2012年突然离世的王东海，则是又一个令我抱憾终生未能再见一面的长者，因为他才65岁。

最近几年国内又先后有朱厚泽（2010年5月9日）、谢韬（2010年8月25日）、李普（2010年11月8日）、胡绩伟（2012年9月16日）等老人离世。这些老人均曾在1949年前接受过非共产主义教育，他们的凋零，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损失。

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许先生及其恩师王淦昌等45名国内知识分子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签名呼吁，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有1128人参加，其中有10位诺贝尔奖得主。国内签名的具体操作，主要是由几个年轻人拿着稿子骑自行车到各个老人家里完成的。这几个年轻人，就包括杨宽兴。所以，杨宽兴跟许先生是老相识。十多年以后，杨宽兴打算拜访那些老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许先生。

许先生家住中关村中科院的一个宿舍楼，挨着中关村大街。许先生家进门是餐厅，里面是许先生的工作室兼会客厅，有一张大桌子和书橱，右侧墙上挂着爱因斯坦画像，还有一个茶几和几个椅子。许先生请我俩坐在茶几边的椅子上，给我们倒上水，然后坐在爱因斯坦画像下。

许先生对不是很熟悉或不经常见面的人的面部识别的能力已经退化，见了杨宽兴没认出来，但清楚地记得杨宽兴的名字，所以很高兴。他问了杨宽兴的近况，并让我们说说最近的动态。他不会用电脑，跟外界接触也不多，消息很闭塞。听我们说今年“六四”前四川有个叫陈云飞的“八九”学生在《成都商报》刊登广告纪念“六四”母亲，他显得很高兴且很有兴趣，用笔记下来，说要找报纸看看。

杨宽兴高兴地说，许先生还是原来的样子，十多年了，简直一点都没变，而且身体看起来也不错。许先生用手比划着，带着天真的表情说：“我都八十八了，我觉得我还能活好多年呢。”

我告诉许先生，他的名字出现在了 my 判决书中。他很纳闷，问怎么回事。我说，我给别人寄《“八九”十年感言》的事被作为“罪证”出现在了 my 判决书中。许先生听了，像做了错事的小学生被老师批评了一样，面带愧色，显得很不好意思——那一刻的表情，让我觉得许先生很可爱。

我们还见到了王来棣老师。她也记得杨宽兴。跟许先生一样，王老师没有丝毫架子和虚假客套，流露出的是以知识的自信作底蕴的简练、礼貌和谦逊。

后来我又去过许先生家三次。一次是2008年5月，杨海时隔十年又来北京，我和王德邦陪他去拜访许先生。许先生很高兴，特意把王老师叫过来见了杨海。杨海是1995年《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签名人之一，许先生和王老师对他格外亲热。

另一次是2009年2月12日，我跟李海和欧阳小戎去的。李海跟许先生早就认识，此前多次见面。许先生说，王老师患有鼻癌，年前在301医院住院。王老师跟我们打了声招呼，看起来跟以前没啥区别。我还把张小刚的问好转达给许先生。张小刚是许先生的小儿子许平的同学，此前曾委托我代他向许先生问好。

还有一次，应是 2008 年，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我和《国家历史》杂志记者古川一起去的。古川邀请许先生给《国家历史》写稿，许先生给了古川一篇关于民主的文章，但后来该文未能在《国家历史》发表。

这三次见到我，许先生都没认出来，但记得我的名字。每次去，他都让我们每个人写下名字。

许先生丝毫不掩饰对王丹、江棋生、傅国涌等晚辈的欣赏。他自豪地指着窗外说：“89 年北大学生游行，我就每天看着王丹他们在我楼下走过去。”他称江棋生是个真正的硬骨头。他说傅国涌是个难得的才子。但显然，因消息闭塞，许先生对一些事务的判断难免有不周和偏颇之处。可这并不影响大家对他的尊敬。

他当时正和王老师一起重写世界民主史。他认为现在需要厘清人们对民主的误解。虽然他的一些观点有待商榷，但其精神令人叹服。

1940 年代，许先生曾任浙江大学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跟乔石、吴学谦是上下级同事。1949 年以后，他们也有联系。但 1978 年乔石升任中联部副部长后，许先生主动跟乔石中断来往。他不想跟大官打交道。而对饱受迫害的异议人士，他却乐于打交道，并尽力提供帮助。

高瑜说，许先生 1987 年之后，“支持方励之，谴责屠杀，介入人权事件，成为名副其实的异议人士。”“哈维尔担任总统之后，仍旧称自己是异议人士，在中国唯有许良英先生可以享有如此殊荣。”“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当局对许良英做了不予以党员登记处理，这是这位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终生的光荣。”

许良英先生，将以一个名副其实的异议人士的身份，获得永生。

2013 年 1 月 30 日，于许良英先生遗体告别之日

2013 年 2 月 4 日订正于北京

（文章来源：八九一代通讯 2/15/2013）

中国当代启蒙思想家许良英言论摘抄⁹⁶

吴汝徽

许良英是谁？有人可能不认识。我也是最近才想深入了解一下这个人。我阅读《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时并未注意这个叫许良英的翻译者。现在有些相见恨晚之感。我一度很服膺顾准，李慎之在给朱学勤信中称顾准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超过五四时期的所有思想家。但是许良英对顾准的评价并不高，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许良英自认为自己的思考早已超越了顾准。许良英对林昭评价甚高，认为林昭是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大

⁹⁶ 转引自许从平：《忆民主先行者许良英》（2015 年 5 月）。作者摘抄的许良英言论在文字上与原文略有差异，请读者援引时注意核对原文。编者注。

陆知识分子中政治思想境界最高、战斗力最强的思想者和勇士。这个评价肯定超过了顾准。许良英这个人很狂，我是说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有一种穿透力。比如对卢梭、马克思，他的看法不同于流俗。中国大陆喜欢卢梭的人很多，但是许良英一眼看穿卢梭的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的成分。对马克思同样不客气，指责马克思是造成整个 20 世纪人类灾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在 19 世纪早期要走向民主的时候，却提出要专政，反对民主。现在看，曾经被大批特批的修正主义才真正代表了一种理性的思考，也体现了思想家们的良知。综观许良英的论著，我以为许良英之所以能获得思想界知识界的高度评价，不是在于他的思想，而是在于他的识见与勇气。他真正知道什么是人权、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不像有的人写了很多文章其实是懵懵懂懂，甚至是糊里糊涂，等于没把话说清楚。普世价值，民主理论其实并不高深，在西方国家，不过是常识而已，然而在中国，总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予以拒绝，或者有意无意地予以歪曲误读。无意歪曲或误读是理解力、识见力问题，而有意歪曲或误读则一定是别有用心。许良英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他的大脑非常清晰，是非衡断明澈，表述简洁准确，当然，还在于他个人对常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坚守和捍卫。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民主思想启蒙家。当下中国需要涌现出更多像许良英这样的思想启蒙家。他主张知识分子先对自己进行民主思想启蒙，我是非常赞同的。对民主问题，宪政问题，人权问题，法治问题，自由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基本的共识，而不是被各自的利益所左右，或“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是良知问题，更是真理问题。许良英不赞同拖延民主改革，狠狠批评了甚嚣尘上的民主缓行论。针对广为流行的“民主素质论”，他以美国为例说，普及教育虽然有助于民主制的建立和发展，但不是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个人以为，许良英最有价值的识见是在他与李慎之先生的通信里。私人通信心不设防，智慧的火花随时碰撞。有时，哪怕是只言片语，却有拨云破雾、醍醐灌顶一般的感觉。以下是鄙人在阅读许良英文献时随手摘录出的一些片段，请各位博友品读。

一、个性解放、人性、人道主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类概念常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这是极大的历史误会。这些概念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提出来并加以充分论证了的，是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实质上是没有阶级性的。⁹⁷

二、科学和民主是现代国家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这里所说的民主，是自由、平等、法治、人权、人性、人道主义等概念的总称。民主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否则，就根本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⁹⁸

三、民主运动不是造反运动，不是为了改朝换代，也不需要自封的“领袖”与职业革命家，反对地下密谋组织，反对不负责任的盲目行动，主张和平、非暴力、负责任。

四、中国要实现民主首先是要有一批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并且具有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自己的思

⁹⁷ 《为“自由”正名》，载《新观察》1986年第20期，编者注。

⁹⁸ 同上，编者注。

想去影响社会，促成民主。”⁹⁹

五、把国家整个建设事业局限于经济建设，把现代化说成是“四化”，实际上是重蹈了一个世纪前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覆辙。几百年来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无数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现代化，首先是要使人（特别是先行者和中坚分子）成为现代的人，具有现代意识，即具有现代的价值观。所谓现代人，就是经过 14-16 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启迪而觉醒了的，并且经过 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用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武装起来的人。¹⁰⁰

六、对现代民主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比卢梭早一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而“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洛克和卢梭以前就有了。事实上，卢梭的思想十分混乱，甚至有不少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的成分，这些错误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和 20 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¹⁰¹

七、民主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的保证。¹⁰²

八、现代意识的核心是科学意识和民主意识。民主意识的主要内容有：

（1）公民意识（包括人格独立，人的尊严，人格平等，四大自由，公民基本权利（即人权）的不可侵犯和转让；同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臣民”意识相对立）。

（2）民主原则（包括主权在民，多数决定，保护少数，自由选举，对官吏监督，权力制衡；同历史上任何个人或寡头的专制统治原则相对立）。

（3）法治意识（包括人人受法律保护，人人遵守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容许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的存在；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治”和个人随心所欲的无政府主义相对立）。¹⁰³

九、现代化实质上就是西方化。¹⁰⁴

十、民主、人权概念，是人际关系中普遍人性的体现，不分民族、阶级，不分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因此也是绝对的，普适的。¹⁰⁵

十一、“法治”（rule of law）是与民主、自由、人权互相结合成为一体的概念，是指法律由公民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约束政府：法律至高无上，人

⁹⁹ 《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载《中国的良心——民运百人的心路历程》，1993年6月，香港。编者注。

¹⁰⁰ 《关于科学意识和现代化建设的几个基本认识问题》，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8期。编者注。

¹⁰¹ 《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这段话是作者1999年写的注（2），见《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2000年香港明镜出版社。编者注。

¹⁰² 《民主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的保证》，载1989年5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作者原定标题是《“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纪念“五四”70周年》。编者注。

¹⁰³ 《关于科学意识和现代化建设的几个基本认识问题》。编者注。

¹⁰⁴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题目改为《也谈“普世价值”》。编者注。

¹⁰⁵ 同上。编者注。

人必须遵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有法治。至于“法制”或所谓“依法治国”(rule by law)，在各种专制政权中都存在，统治者通过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人民，并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因此，决不可把“法治”与“法制”混为一谈。¹⁰⁶

十二、在西方文献中，“价值”一词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涵义。“价值”译自英文 value，只要查查普通的英文词典，就会发现，它除了通常为大家所熟悉意义“效用”(worth)之外，还有一个在当前中国知识界可以说是陌生的涵义：社会伦理道德准则(standards)。它通常用复数 values。“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是指全人类都遵守的伦理道德准则，与“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无关。¹⁰⁷

十三、中国古代某些君主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前要征询臣民意见，在意见有分歧时，往往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是最后决定权始终为君主掌握，即主权在君主，多数决定仅供参考。民主则是主权在民，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¹⁰⁸

十四、科学家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仅要做好科学研究，还应该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命运。¹⁰⁹

十五、不能将民主、共和、宪政这些概念并列。民主概念的内涵实际上已包含了共和(政府首脑由选举产生)和宪政(政府权力受宪法限制)，虽然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元首(国王)是世袭的，但他并无实际的政治权力，掌握实权的是议会和政府首脑(首相)。因此，立宪君主制与共和只是形式不同，实质是相同的。总之，把民主与共和、宪政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可以与民主相提并论的是自由、人权、法治，四者紧密联系，互为依存。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和目的，人权是民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四位一体构成民主政治的大厦。¹¹⁰

十六、顾准对民主有不少误解，对自由、人权这些基本概念也是隔膜的。顾准文集中根本没有论述自由的文章；议论民主时也没有涉及自由、人权。Aristotle 早已明确地指出民主的精神是自由，以后 Spinoza 和 Locke 更是作了透彻的阐述。顾准没有吸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却误把 Schumpeter 的糟粕当作经典。他的混乱思想对王元化、刘军宁产生了很大影响。¹¹¹

十七、林昭是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政治思想境界最高、战斗力最强的思想者和勇士。¹¹²

十八、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马克思在 19 世纪早期要走向民主的时候，却提出要

¹⁰⁶ 同上。编者注。

¹⁰⁷ 《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与吴江先生商榷》，见傅国涌的博客(2009.11.11)。编者注。

¹⁰⁸ 同上。编者注。

¹⁰⁹ 《肩住黑暗的闸门，做一个真正的人》，腾讯《大师》60-61 期，2011 年 7 月 14 日记者沈洪采访。编者注。

¹¹⁰ 《对张钦楠同志〈中国往何处去——历史、理论、政党(学习笔记)〉的意见》，2009 年 3 月 29 日。编者注。

¹¹¹ 致李慎之，2002 年 11 月 5 日。见《八十三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增订版)》，同心同理书屋，2010 年 12 月。编者注。

¹¹² 《林昭，中国的布鲁诺永生！——纪念林昭殉难 40 周年》，载傅国涌编《林昭之死》，香港开放出版社，2008 年 9 月。编者注。

专政，反对民主。这是造成整个 20 世纪人类灾难的一个主要原因¹¹³。（马克思的最大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并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导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暴政，也导致中国‘五四’民主启蒙运动在‘五四’后一年就夭折了。）¹¹⁴

十九、要同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不能依靠少数官吏，因为“官官相护”已成历史通病。要根除腐败，只有使一切官吏无例外地置于人民的公开监督之下，首先是接受舆论的监督。要使舆论产生有效的监督作用，必须彻底改变舆论一律的传统，公民应该充分享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¹¹⁵

二十、法国《人权宣言》庄严指出：“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凡有志于现代化的人，都必须永远记住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¹¹⁶

二十一、是美国革命影响了法国革命，而非法国革命影响美国革命。美国创建了近代最为健全的民主政制。13 年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在美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¹¹⁷

二十二、李慎之说：季羨林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今称爱国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国学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¹¹⁸。许良英：你对季羨林的评价，我有同感。现在他竟叫嚷什么“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可是权贵们正是需要这样的吹鼓手。¹¹⁹

二十三、从人性的共同本质和未来的趋势（全球一体化）看，未来的文明是不分东西的，但由于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条件不同，东西文明和差别是十分明显的，现代文明两大支柱，科学和民主，都来自西方。

二十四、雅典和近代西方的民主制，既是形式民主，也是实质民主。Lenin（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万倍，这是自欺欺人。连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不允许的政权，它的“民主”只能说是零！¹²⁰

二十五、民主就是民主，不存在有什么不同种类的民主。¹²¹

二十六、不可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不可把商品概念套用在科学知识上，不可急功近利地要求基础科学产生经济效益，而看不见发展基础科学的重要性。¹²²

二十七、要杜绝腐败，必须使权力随时处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是权力的运作处于高度透明状态，首先是要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每个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都必须公之于众，这就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早已实现并行之有效的阳光政策，而在我国却

¹¹³ 《肩住黑暗的闸门，做一个真正的人》。编者注。

¹¹⁴ 《〈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序》。2000 年香港明镜出版社。编者注。

¹¹⁵ 《驳民主缓行论》，载 1989 年 1 月 9 日《蛇口通讯报》。编者注。

¹¹⁶ 《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载纽约《探索》杂志，1993 年 8 月号（终刊号）。编者注。

¹¹⁷ 《走出伪民主误区》，载《炎黄春秋》，2011 年 10 月号。编者注。

¹¹⁸ 李慎之致许良英，2001 年 4 月 21 日。编者注。

¹¹⁹ 致李慎之，2001 年 5 月 5 日。编者注。

¹²⁰ 致李慎之，2002 年 11 月 5 日。编者注。

¹²¹ 同上，编者注。

¹²² 《世纪末中国科学的危机》，载 1994 年 7 月 29 日香港《华侨日报》。编者注。

未见踪影。阻力何在？一目了然，毋庸赘言。¹²³

二十八、雅典民主制的核心内容是“多数决定”原则，这已为现代民主理论所确认，并继承下来。可是，如果把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地应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必然会产生与民主理想相反的严重后果。“多数决定”的滥用，必然导致“多数暴政”。可是，所谓“多数暴政”绝对不能成为中国不搞民主的借口，因为多数暴政完全可以防止和杜绝。¹²⁴

二十九、防止和杜绝多数暴政的唯一可能，是确认人人都具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天赋权利即人权。每个人生而具有的不可侵犯的人权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和前提。¹²⁵

三十、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有法治。没有民主制度，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¹²⁶

三十一、历史已经证明，民主是最合乎普遍人性的政治制度，但是中国的民主道路将是漫长而崎岖的，需要韧性，有远见，不可浮躁，不可急于求成。首要的工作不外乎于启蒙，没有广泛、深入的民主思想启蒙，没有公众的自觉，民主不过是空话。¹²⁷

三十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回到“五四”，开展民主启蒙运动。而这种启蒙，首先必须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对自己过去所接受的各种思想进行彻底清理和反思，从人性的高度审视一切。¹²⁸

发表时间：2013-02-21 20:10:12

纪念许良英先生

张博树

许良英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了。就在几个月前，老先生还为在纽约召开的“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亲笔题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这里所说的“人同此心”，自然指的是国人所向往的宪政民主，许老先生已经为此奋斗了几十年，现在竟成为他的未竟之志。

我和许良英先生只见过一次面。那是 2007 年夏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在互联网发表后不久，老共产党人、前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先生建议我和许老聊一聊，并亲自打通许老家电话，代为联系。9 月 17 日下午，天下着雨，我按照约定来到海淀黄庄许老寓所。虽然时年已经 88 岁，老先生看上去仍然精神矍铄，且十分健谈。许良英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是率直，甚至有些固执。他表示看过我的宪政改革报告，但对“报告”这个用语表示不满。“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向谁报告哇？”

¹²³ 《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与吴江先生商榷》。编者注。

¹²⁴ 《民主需要思想启蒙》，《财经》记者采访，2012。编者注。

¹²⁵ 同上。编者注。

¹²⁶ 同上。编者注。

¹²⁷ 同上。编者注。

¹²⁸ 同上。编者注。

我向他解释“报告”在这里的意思是公共产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的“上书”或“奏折”，并不影响学者的独立性，许先生听罢也笑了。作为已经两度被开除党籍、也曾经被开除公职的过来人，许老当然知道这样的文章会有什么后果。他很关切地问起社科院的反应，提醒我要有必要的思想准备。我们聊了很多社科院、哲学所的往事，许先生还向我详细介绍了他和老伴王来棣正在从事的研究和著述《民主的历史与理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已经进行了多年，许老希望通过这部书，纠正人们在民主理解上的一些误区。

许良英以中国学界的硬骨头闻名。他早年学物理，曾是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许老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他认为，爱因斯坦科学方法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于独立的批判精神：“在早期他的批判锋芒是针对于物理学领域中在原则问题上居统治地位的‘教条式的顽固’，针对于哲学上的先验论。爱因斯坦尖锐地批判柏拉图和康德，说这些‘哲学家对科学思想的进步起过有害的影响，他们把某些基本概念从经验的领域里排除出去，而放到虚无缥缈的先验的顶峰上去。’而他不得不把它们‘从柏拉图的奥林帕斯天堂拖下来，并且企图揭露它们的世俗血统’。在哲学史上，最初对先验论进行有力批判的是休谟，以后马赫又用这种批判精神来考查牛顿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观念。爱因斯坦接受并且发扬了人类思想史中这份有价值的遗产，使他在物理学革命时期能够所向披靡，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闯禁区，敢于创新。这种独立的批判精神，也使他能够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别人不盲从附和，不随波逐流；对自己永不自满自足，永不固步自封，永不停顿地向未知的真理探索。”（见许良英《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的特点》一文）

科学意味着求真。在许良英看来，“‘求真理’在自由、宽容的社会，应该是纯智力操作的问题，但在不是完全宽容的社会，即使在西方古代雅典的民主社会中，‘求真理’必须克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种种困难，以及外界的压力和干扰，甚至要冒生命的危险。科学史中有无数为真理而献身的先驱。上火刑的 Bruno（布鲁诺）和被终身监禁的 Galileo（伽利略）是大家都熟悉的例子。”（见《83 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这些话当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有感而发。想想今天又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为求真、甚至只是为说两句真话付出代价？许良英就是其中的一个。

作为中国著名的异见知识分子，许良英做过许多勇敢的事情。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许良英发起或参与过多起呼吁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公开信签署活动。特别是 1989 年初，许良英起草致中共中央公开信，要求政治改革，保障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释放思想犯，这封公开信有 40 多位科学家和学者联署，影响深远。许良英公开支持“八九”学运，谴责“六四”镇压；1992 年，许良英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1994 年在《纽约时报》发表《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呼吁》；1995 年，又发起呼吁“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鉴于许良英对民主、人权事业的贡献，2008 年他获得了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

但恰恰是因为他的真话说得太多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北京警方“关照”的对象。

如果谈具体的学术或科学话题，或许许老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人物，他好争辩，

有时甚至有点儿偏执（我从其他朋友处听到过不少这样的故事，我自己和许老的唯一一次接触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也正是这位老人可爱、可敬之处。他活得很真实，一点儿不做作。他就是他。

许良英已经成为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努力已经化成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但愿我们都来珍惜这份遗产。

（2013年2月3日，于新泽西《中国人权》双周刊 2/9/2013）

一个大写的人——沉痛悲悼许良英

朱长超

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离开了这个令人又爱又恨的世界。许多中国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一个没有英雄人物的民族，是可悲的；出了英雄人物，却不让人民知道的民族，是更加可悲的。然而，中国人不知道他，美国人知道他。2006年8月，《纽约时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他。标题是《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2008年4月，他又获得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小布什在一次演讲时引用了两个人的话，一个是林肯，另一个就是他。这个人，就是前几天才去世的中国思想家、民主战士许良英教授。布什总统是这样说的，“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他是一个右派。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导演的一场收拾知识分子、以防止欧洲引起的民主思潮的反知识反文化反民主的运动，毛泽东运用了他的自我欣赏的“阳谋”，即引蛇出洞策略。然后置自由民主知识分子于死地。许良英到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意见，他对反右运动本身产生了怀疑。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并且是极右派。人民日报发了专栏文章批判他。从此，他离开了科学院，回到家乡务农，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当当了二十年。

他是一个科学史专家。即使在当右派分子、当农民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他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地富反坏右分子，即使到了农村，也会受到歧视和压制。在艰辛而压抑的漫长岁月中，在煤油灯下，他翻译了爱因斯坦的文集。这本书在中国结束十年文革、十年停办大学后的知识饥荒年代，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它传播了科学和文明。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民主战士。他的独立思想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而翻译者的艰难的经历和不屈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广大中国读者。

他具有崇高的人格。1987年，是反右运动30周年，他与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商量

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讨论会，总结历史教训，这本来是右派分子的权利，对国家的进步，也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时还没有解放的右派分子钱伟长向邓小平告了密，邓小平大怒，下令将刘宾雁，方励之，许良英三个发起人开除出党。谁知，邓小平年纪大了，许良英的名字他一时想不起来，错说成了王若望。三人被清除出党，许良英侥幸未被清除。但是，他没有为自己高兴，他宣布是自己参加了此事，理由应由自己承担。你看，铁肩担道义，他具有多么真诚而强烈的责任心啊。他有一种愿意为真理殉道的精神。

他是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不问风险，尽心尽力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不息。1989年，他发起了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签名的有42人。文件呼吁：一、政治改革要与经济改革同步，建立民主监督机制，反对腐败；二、保证公民自由权利，首先是言论、出版、新闻自由；三、释放因为言论被治罪的人；四、重视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有许多科学家为政治问题表了态。89年六四事件后，他并没有为白色恐怖所吓倒，仍然勇敢地抗争。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他没有沉默。1992年，他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的文章，为“和平演变”的合理性辩护。为政治改革呼吁。1994年，他起草了《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文件，全文刊发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1995年，他再一次发起呼吁：《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45位著名人士在呼吁书上签了名，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同时，他经常被监视，被软禁。一个垂垂老人，努力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抗争着、呼喊着的。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啊。屈原说，虽九死而不悔，许良英，为中国的民主大业，就坚持着这样一种精神。

许良英是一位科学史家，却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科学家成为民主战士的，有其历史的传统。布鲁诺曾经为捍卫日心说而宁愿接受火刑。他在被审判时说，在真理面前决不后退半步。在听到宗教裁判所判决他火刑的时候，他宣称，“你们对我宣读判决，比我听到判决更加害怕。”俄国的萨哈罗夫是物理学家，是苏俄的氢弹之父。他也坚持揭露苏俄的专制和独裁，长期处于软禁、流放的境地，但决不向专制制度屈服。许良英，方励之，都是这样的科学家和民主战士。

许良英等科学家在科学上作出了成就，同时也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战士。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本质上是统一的。人类有天然地追求真相、真理、正义的要求。热爱科学真理的人，也一定热爱社会的真理。在科学王国自由追求和探索真理的人，也一定在社会王国和思想王国里努力追求真理。而科学家的执着和坚持精神，使他们虽九死而不悔，成为孜孜以求的坚定不移的战士。

许先生的著作和精神曾给我很大的鼓舞。我主要是从许先生的著作和文章中吸取营养。我也与他有过几次书信的交往。90年代，我应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之约，编写爱因斯坦的思想小品，想简约地介绍爱因斯坦对人生、教育、科学、自由、民主、道德等方面的理念，其主要参考书是许先生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我给许先生去了信，许先生很支持对爱因斯坦思想的研究和传播，但此书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在书信交往中，许先生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对后辈学人的平等热诚的态度，使我十分感动。

如今，许良英教授离开了人世。他把许多未完成的工作交予了后人。他留下了一大

堆宝贵的精神财富。1989年，苏联的民主战士、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去世。戈尔巴乔夫在悼词中说道，“我被深深震撼。在同一个地球上，在一个历史大翻转关头，俄罗斯总有天才和先驱站在自由与奴役、光明与黑暗的临界处。我为俄国庆幸。”在中国，对于许先生的去世，有些坚持要“向朝鲜同志学习”的人，也许会暗暗地高兴，庆幸终于减少了一个总是引起他们麻烦的人，这下可以减少一个监控的对象了。但是，我要说，中国有这样一位“站在自由与奴役、光明与黑暗临界处”的科学史家和民主战士，这是祖国的希望，这是中华的骄傲。这是黑暗世界中的一粒灯火，这是燃烧草原的一颗火种。我们应该为中国庆幸，为中国的科学和民主事业庆幸。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有人说，中国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一片荒芜，但是，李慎之说，不，我们还有顾准。同样地，我们可以大声说，在思想的领域，我们还有许良英。鲁迅曾经说过，有石头在，火种是不会绝的。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的时候说过，如果欧洲有更多的居里夫人这样高尚的人，欧洲一定会有更加光辉的未来。我们也要说，如果中国有更多的许良英这样的人，中国一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2013-1-31《独立评论》）

许良英，为真理奋斗的爱因斯坦传人

Dennis Overbye¹²⁹

北京——（中国知名物理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许良英，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享年92岁。——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者注）第一次遭到清洗时，许良英37岁，是一名很有前途的物理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也是一名共产党老地下党员。他不得不和妻子离婚，离开自己的儿子，搬到母亲乡下的农场（农村老家，编者注）。

30年后，在当局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镇压中，许良英因心脏病发作而躲过了牢狱之灾，或是更严重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抢走了许良英博士（我从未得过博士学位，许良英注）在农场改造期间呕心沥血翻译出来的爱因斯坦文集。武装警卫（便衣警察，编者注）曾经包围了他的住所，以防止他接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此事发生于1994年，编者注）。

70年来，许良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中国的传人。他把革命和物理学交织在一起，为政治自由和科学探索精神之价值而呼喊，尽管执政者往往不关心这

¹²⁹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8月22日。许良英在2006年8月29日给王作跃的信中给出了对本文的勘误（文中以“许良英注”表示），2013年本文重新发表时更正了部分错误，但仍有些错误未做更正。编者注。

些。他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在失而复得后出版，帮助中国人再次燃起了对爱因斯坦和科学的兴趣。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说，科学是国家现代化和发展的关键，但许良英并没有感到高兴。

“他们只是利用科学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最近说。

他说，当局仍然在窃听他的电话。

如今86岁的许良英已是白发苍苍。年复一年，一批批的学者、人权活动人士和记者来到他的俯瞰北京市内大学区的、堆满书籍的公寓中，拜访这位老人。

如果他不是中国年纪最大的异见人士，他至少一定是中国学问最卓越的异见人士了，发表了200多篇论文，编著了六本书。历史学家梅瀚澜（H. Lyman Miller）在其著作《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科学和异见》（*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Mao China*）一书中，称他为“典范人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来形容他，庶不为过。而他那一身傲骨，却丝毫不减当年。

12年前，他在《纽约时报》上公然说后来共产党的改革派是“谄媚小人”。

最近某天的上午，许良英坐在扶手椅上，讲述起他作为爱因斯坦式的民主人士的冒险经历，他用手指点着，双臂在空中挥舞，不时发出爽朗大笑。在对面的文件柜上摆着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肖像，正神情严肃地向下俯视。

“伟大的心灵总是遭遇来自平庸者的强烈反对”，题词这样写道。

许良英身着蓝色衬衣，穿着拖鞋，戴着厚厚的眼镜，他从自己舒适的扶手椅上站起来，走到这幅肖像的下面，说道，“这是他最好的一句名言。”

许良英于1920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市，他和爱因斯坦之间的缘分始于中学时读到的一本爱因斯坦文集《我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这本书中既讲科学，又谈政治。书中有一段话被年轻的许良英划了线：“国家为人而立，而非人为国家而活。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使其有机会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

许良英说，“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1939年，他进入浙江大学，他在自己的入学志愿表格中写道，他想要成为“现代物理学的权威”。但政治打断了梦想。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为避兵火，浙大屡次搬迁，有时遇到轰炸，学生们不得不逃到山洞里躲藏。在这期间，许良英跋涉了中国的广大乡村，洞悉了不少触目惊心的现实。有人衣衫褴褛，穴居苟活，地主却丰衣足食。

“这样的差异太不合理”，他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想法，并得出结论，中国需要“完全的革命”。他下定决心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

同时，他在学业上也成绩优异，毕业时，他的导师、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想让他担任其研究助理，研究中微子这种神奇的亚原子粒子。

可是，年轻的许良英却起身投奔革命。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曾在五所学校任教。日军侵占他所执教的省份后，他的老导师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启事，恳请他回去从事研究。许良英确实回到了大学，但他继续热心于政治，让物理系成为了该大学的共产党活动中心，而他则成了党委书记（支部书记，编者注）。

1949年，共产党终于夺取政权，许良英来到北京，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在中科院，他做过一段时间的总审查员，检查科学论文是否有反革命倾向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如今他说当时的工作是“错走了一步”。不久，他就发现，他不可能既追随爱因斯坦，又追随毛泽东。

1957年，毛泽东号召开展“百花齐放”运动，鼓励人们畅所欲言、提出批评。但后来，毛发现事态失控，随即决定又发起一个新的运动，铲除“右派分子”。

许良英对新运动提出批评，他自己也遭到了《人民日报》的抨击，该报称他不仅是右派，而是极端右派。中国科学院命令他到中国东北的农场工作，但他提出，自己患有关节炎而东北太冷。

于是，中科院让他自便。他便回到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

他的妻子王来棣是一名历史学家，当时夫妻二人已有一个7岁和一个14岁（4岁，许良英注）的孩子，而妻子又有孕在身。他说，妻子痛哭了三天，以至于引起小产，孩子没有保住。因为保护丈夫，王来棣被开除出党。许良英说，在“巨大的压力下”，妻子提出离婚（离婚是在60年代初，许良英注）。他被迫回到临海的老家农场。

后来，他被摘了右派帽子。1962年，科学院让他翻译一部新的爱因斯坦哲学散文（论文，编者注）和演讲集。

出版爱因斯坦著作的决定并不是完全出自对他的尊崇。“毛泽东想成为全世界的革命领袖，”许良英解释道。他说，为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想确认并批判世界上所有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也上了共产党的黑名单，这还要拜斯大林的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之赐。此人在1947年称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反革命，有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哲学假设的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但根据广义相对论，时空可以被弯曲成一个球体，因此，即使时空没有边界，但也是有限的。另外，相对论暗示宇宙有一个起源，因此宣扬了神学。

日丹诺夫的理论 and 毛泽东的观点不谋而合，毛也认为宇宙应该是永远运动的状态。也有不长的一段时间，许良英也对这一观点产生过共鸣。

他说，在科学上，“我同意爱因斯坦的理论，因为科学无阶级。”

但是，他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我认为爱因斯坦理论中的哲学部分是某种资本主义理论。”

他耗时两年，几乎是独自翻译了爱因斯坦的197篇文章。但是这些文章的出版被搁置了，因为在毛泽东的另外一次运动中，印刷厂的工人被遣散到了乡下。

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没收了许良英的翻译稿，以及他写的一份有关爱因斯坦哲学的手稿。

1969年，许良英得知，这些文件落到了一个上海激进组织手中。该组织名叫上海理科批判组。该组织是为了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而成立的。

许良英要求拿回他的文稿，并且向上海革委会投诉，以防理科批判组自行发表这些翻译稿。随后，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据纽约城市大学（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的历史学家胡大年说，许良英的勇气折服了理科批判组。胡大年的新书《中国与爱因斯坦》（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讲了这段故事。

最后，许良英拿回了自己的翻译稿及出版权，但是另外那份手稿却丢失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从1975年（1976年，许良英注）开始，爱因斯坦的文章（文集，编者注）先后出版。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1978年3月14日，爱因斯坦诞辰99年之际，《人民日报》重新刊登了许良英著作的序言（许良英为周培源起草的《爱因斯坦文集》序言，编者注）。序言中称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一年后，一千名中国科学家齐聚北京，庆祝这位智者的百年诞辰。

邓小平等新领导人开始强调科学是中国强盛的关键，号召人民“实事求是”。

许良英重新回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与王来棣复婚，成为新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的主编（1978年我回科学院工作，是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近代与现代世界科学史，并非担任《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许良英注）。

但是事实证明，与党相比，爱因斯坦才是许良英真正的灯塔。1981年，许良英在论文中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认为必须要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科学才能进步。

包括许良英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政府把资源都投入到发展技术上，基础研究只能挨饿。

许良英说，这是封闭社会的症状。1986年，许良英写道，“在这方面，我们要多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那些国家，学术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许良英说，“我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回归爱因斯坦。”

1989年1月，许良英的朋友、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释放政治犯。许良英说，那太有限了。当年2月，他和他的老友、中科院地理学家施雅风起草了他们呼吁民主的公开信。许良英说，“我们都认为，中国其实需要政治改革。”

他说，“他们需要政治民主，需要保护公民的权利，应该有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他们需要终止因言获罪的漫长历史。中国有这样的历史，已经持续了几千年。”

当被问到他写这封信心中是否有担忧时，许良英大笑。他解释道，很久以前，当他加入地下党的时候，他就冒过生命危险。他说，“没什么好怕的。”

42个人在他的公开信上签了名，包括许多科学家。

这封信以及方励之的信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学生和其他人，他们在1989年4月蜂拥至天安门广场，缅怀胡耀邦这位受迫害的政治活动家，并在广场上抗议腐败和缺乏人权等问题。其中许多人身穿写着“科学与民主”的T恤衫，这是20世纪早期以来中国政治活动及民众表达愿望的口号。

6月4日，中国军队开着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数百人被打死。

许良英表示，这场镇压将会作为邓小平的一个历史事件被人铭记。“邓小平出动坦克和飞机杀害群众，他枪杀群众，眼都不眨一下，”他说，“甚至连日本人都没这么做过”（我说过“日本政府对本国人民也没有这样干过”，许良英注）。

事后，许良英没有被捕，他表示，这也许是因为他在几个月前心脏病发作，因此没能参加抗议活动。（方励之前往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后来离开了中国。）

有人建议他离开北京，许良英拒绝了。当时，他已经69岁，身体很虚弱。他说，“如果我被捕，我已经做好了死在监狱里的准备”。

1994年，许良英和其他六人发表了一份新的呼吁人权的公开信，这些人中包括一位遇难的天安门抗议者的父母。信中说道，“探讨现代化而不提及人权，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发表这封信时，恰逢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按计划访问北京，许良英因此被暂时软禁在家，以防止他与克里斯托弗会谈。

1995年，美国纽约科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授予许良英汉恩茨·R·佩格尔斯（Heinz R. Pagels）科学家人权奖，以表彰他为争取自由做出的贡献。但在许良英写了另一封信并再次遭受软禁后，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会长给中国政府写信，询问许良英的安全情况。

如今，许良英已经退休。2001年，《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My Views: Xu Liangying's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Science, Democracy and Reason）由香港明镜出版社（Mirror Books）出版。他和妻子正在共同撰写一本有关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的书。其妻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科学和民主是两个单独的概念，”他说，“它们相辅相成，但民主是更根本的问题。”

虽然中国现任领导人高调地宣扬科学发展，但他们没能说服许良英。

1997年，邓小平的接班人江泽民援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中国人权状况辩护，称民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许良英因此对江嗤之以鼻，他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首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本质上恰恰是强调绝对性。”即物理定律和光速在所有观察者眼中都是不变的。

“另一方面，民主和自由也是绝对的，因为人性是普遍的，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许良英表示，他相信，中国未来一定会接纳这些普遍价值。他指出，当学生领袖王丹在1989年（1988年，许良英注）第一次创办民主沙龙时，只有20人参加。但仅仅过了半年，就有超过3000人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抗议活动。

许良英说，“所以，我从未怀疑过年轻人的力量。”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6年8月22日。

翻译：陶梦萦

载2013年1月2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科学家、民主人士许良英去世

储百亮 (Chris Buckley)

中国科学家、民主倡导人士许良英周一（指2013年1月28日，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2月1日——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者注）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他因谴责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清洗而被下放到农村，在此期间翻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著作，并因此闻名于世。

他的儿子许成钢证实了他的死讯。

许良英的一生经历了中国20世纪发生的许多动乱，他也从一名共产党的狂热支持者转变成了直言不讳批评政府的人士。1989年，呼吁民主的抗议活动在被军方镇压之前，受到了他的激励。

终其一生，他都坚信，科学为中国带来了理性的灯塔，爱因斯坦的成就便是例证。

“迷信是真理的大敌”，他去年告诉中国的《财经》杂志，“必须用科学和民主来破除形形色色现代迷信，破除由忠诚所支持的迷信。”

许良英于1920年5月3日出生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1939年，他进入浙江大学，并在入学志愿表格中写道，他立志要成为“现代物理学的权威”。还在上高中时，他便阅读了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

日军侵华中断了许良英的学业，迫使他所在的学校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也让他看到了农村生活残忍的差异。他认定，要改变中国，就必须进行“完全的革命”。他成了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并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

作为科学家，许良英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共产党1949年当政后，这一背景使得他被提拔进入了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

在中科院，他当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员，工作是清除研究论文中任何不可接受的观点和敏感信息。他儿子说，他后来骄傲地谈到自己让许多论文被送至国外发表了。

但到了1957年，许良英在科学领域所珍视的坦率为他带来了厄运。当年，在那场“百花齐放”的运动中，毛泽东敦促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说出并曝光党的不足。但当得到

的反馈是大量批评时，毛泽东谴责批评他的人是“右派分子”。

对毛泽东的出尔反尔深感失望的许良英大声为“百花齐放”运动辩护。他因此而被免职，并开除党籍，还被称作“极右派”。

1958年，面临被关劳改农场进行“再教育”的许良英说服了官员，将他下放至农村老家。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老家当农民。为了能让他的妻子王来棣和两个儿子留在北京，夫妇俩先是假离婚，后来又再复婚。

许良英之前的学生、纽约城市大学（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历史学教授胡大年说，许良英从1962年开始翻译爱因斯坦的作品，依靠朋友从北京的图书馆借书寄给他。

但是在毛泽东时代，甚至连抽象的物理概念都不能在意识形态的运动中幸免。文化大革命期间，来自上海的激进分子来到农场，没收了一部许良英翻译爱因斯坦作品的手稿，并在他们的运动中用来指责相对论和其他所谓的“资产阶级科学”的发现。

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后，数十年激烈的动乱也随之结束，改革家邓小平上台。邓小平郑重承诺，科学和技术将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随后，许良英等众多被下放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从农村返城。

他恢复了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和党员身份，并出版了他翻译的三卷爱因斯坦作品。

然而，许良英相信，中国所需要的不仅是对科学的实际应用。他和他的朋友、后来成为异见分子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逝世于2012年4月）开始带头呼吁，除非中国进行思想“启蒙”，并最终实行完全的民主制度，否则中国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进步。2006年，许良英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20世纪80年代末，“我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回归爱因斯坦。”

历史学家胡大年说，到1989年，在那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抗议中，许良英是那些领导抗议的“众多学生的精神领袖”。他的儿子许成钢说，许良英并没有直接参与示威，当邓小平调用坦克和武装士兵对抗议者进行镇压时，许良英非常愤怒，但并不太意外。

他还说，“他非常了解这个政府的本性”。

再次被共产党疏远后，许良英在警察的监视下在他位于北京高校区摆满书籍的住所中住了将近十年。许良英的朋友、北京异见人士胡佳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许良英仍然是寻求民主变革的年轻人的导师。

许良英的妻子、历史学家王来棣于去年12月31日逝世。

除了儿子许成钢，其他仍然健在的家庭成员还有儿子许平、兄弟许良容和一个孙女。

2008年，许良英因为“一生宣扬真理、民主和人权”而被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授予安德烈·萨哈洛夫奖（Andrei Sakharov Prize）。他所取得的最高正式学位是理学学士学位。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陈亦亭、陈柳

载2013年2月6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许良英：鼓舞我在逆境中奋发向上的精神偶像

吴高兴

许良英先生以逆境中的入世精神，以他对社会底层的血肉关爱，对自由、民主、人权、科学和社会公正一以贯之的执著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常人难以企及的意志和勇毅，铸就了道德上的辉煌。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有人说过，许良英是二十世纪的费尔巴哈，我却更愿意把先生比之为蒋介石高压统治下的殷海光。我以为，先生一生的成就，道德第一，思想第二，科学第三。

【文前小序】这是写于 2006 年的一篇旧稿，当时友人洪泳雪编撰《在家乡时的许良英》一书，我应征而作此文，后该书因故未成，此稿一直未能面世，今不作任何改动并以原题发表，以此寄托我对许良英先生这位当代中国鲁迅的哀思。

我与许良英先生已经有 28 年没有见过面了，但是 28 年来，尤其是身处逆境的 17 年来，又好像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作为我心中的精神偶像，时时在鼓舞着我。我之热爱许先生，并非因为他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家乡都出过不少杰出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成为我的偶像；我之热爱许先生，也并非出于对他的政治见解的完全认同——事实上在这方面他对我更多的是批评。在临海，跟我一样崇拜先生的人不少，其中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越是蔑视权贵的人，对许先生就越是崇拜。我的朋友之中，有敢于指着地委书记的鼻子破口大骂的，也有骂起顶头上司毫无顾忌的，但这些人提起许先生，没有一个不肃然起敬的。就我自己来说，我知道自己的缺点——骂起别人来往往口无遮拦，但容不得别人骂我，可是先生骂起我来毫不留情，反而越发引起我对他的尊敬。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困顿之中给他写过几次信，他每次都给我回了信，言辞恳切地勉励我，人在逆境之中思想是最容易觉醒的，使我精神倍感振奋。但有一次，我写信给他，对他提倡民主启蒙问题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回信生气地回答我：“启蒙启谁的蒙？首先要起知识分子自己的蒙！”先生为此还痛骂我是“造反派”。我对此一直感到很委屈，仿佛当年徐懋庸为文艺界两个口号问题写信给他所尊敬的鲁迅先生，反而挨了鲁迅一顿痛骂；但我又一直觉得，在先生面前自己好比乡村的顽童，惹塾师生气是常事，挨塾师的骂也是常事，感情上反而更加靠近了。仔细想想，像我这个喝了几十年“狼奶”，中毒至深的人确实该骂，不骂哪来的思想觉醒？再说，正直无忌，可能这正是我热爱许先生的原因。

我有幸认识许先生，是由于家乡的朋友洪泳雪的介绍。1970 年代初，先生还在张家渡以“右派”的戴罪之身当农民，我原是临海一中心高气盛的“红卫兵”，紧跟“伟大领袖”闹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回乡当了民办教师。1974 年，咏雪多次跟我说起，张家渡有一个“右派”，精通马列主义，专门研究爱因斯坦的，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 年被遣返回乡当农民，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那儿去玩，那时我虽然相信“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但对具体的“右派分子”并不反感，当时举国上下正在兴起读《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等马列原著的热潮，听说他对马列原著非常熟

悉，不禁悠然而生敬佩之情，自然非常乐意去玩。

初见许先生，他那一副铮铮铁骨的样子就深深刻入心中令人终生难忘：年约五十开外，穿一身半新不旧的中山装，瘦高个、背微驼，长方脸、直鼻梁，浓密而略显蓬乱的头发掩不住两眼睿智的光芒，仿佛如一尊铁铸的塑像，这马上令我想起鲁迅那种刚正不阿的气质。他孤身一人住在小镇的一所四合院里，房间是木地板的底楼，房间两边的墙壁上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架。他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在家做研究或译述，三餐自烧自吃。由于先生白天要劳动，我和咏雪去他家一般都在晚上，我们到他家时，先生往往已经伏案进入科学的世界了。当时我就觉得奇怪：这位“大右派”劳动改造时总要挑打稻或挑肥之类最苦最脏的活干，繁重的体力劳动累都累死了，还要自己烧饭，又孤独又寂寞，怎么还能看书做研究？我甚至到现在都有一种想深入破解的欲望：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啊，连续不断的政治狂风暴雨，坎坷繁重的日常生活，加上芸芸众生的炎凉世态……毕竟山石尖锐的棱角也经不住岁月沧桑的磨砺，毕竟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哪怕山寺的弥陀也难挡凡尘的诱惑，可是先生与人时悬陈怒骂，不倨不阿，独处时孤灯黄卷，甘之如饴，这样的生活二十年如一日，这是怎样的精神守望？！真令人心敬佩之而身不能至！

我与许先生交往最密切的时期正值“批林批孔”，他是负有“原罪”却毫无负罪感的“右派”，年龄比我父亲还要大几岁，我是从城里回乡的老“红卫兵”，属于那种所谓“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彼此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可想而知，但感情上非常融洽，他像长辈和朋友那样叫我的名字不带姓，我则没大没小的叫他“老许”。那时谈论最热烈的话题，自然是“批林批孔”，这从我当时向他借阅而至今未还的两本书《历代法家著作选注》和《法家著作选读》（前一本封面记名“许良英”，后一本是他弟弟的名字“许良容”）可以看出。实事求是地说，除了深感他学识的渊博，先生对当时那些现实政治问题的看法，并未在我心中留下什么印象，或许是我当时感兴趣的仅仅是法家那些犀利的文章本身，或许是先生对“批林批孔”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有反感却不便对我这个“老造反派”多说。政治问题肯定要谈，至今难忘的是面红耳赤的争论。我这个当时已经被驱逐出派性急流旋涡的“犯错误的老造反派”（当时台州城里那些权倾一时的“造反派”头头给我的称号），毫无城府而口口声声“政治充满阴谋诡计”，这使“老许”非常愤慨，他一气愤就急急巴巴，训斥我“你、你、你懂什么？”我则用“你这是书糊”来回敬他，而且因他的急巴而有一丝快感。

这位居老而若少的学者令我心生敬意的首先是他人格。那时咏雪经常跟我说起，“老许”这人嫉恶如仇，凡是她痛恨的，不管是朋友还是亲人，她训斥起来都毫不留情，甚至会把你赶出去；但是嫉恶如仇的人总是从善如流的，对于那些生活艰难的农民他却十分同情，那时他辛辛苦苦的译述也有一些稿酬，但自己舍不得用，总要送给别人。据我所知，先生在经济上有一种在常人看来不可理喻的“怪脾气”。回北京工作以后，先生在家乡的外甥女造房子向他借钱，他一分不给，但却一直在时不时地接济一些正义而艰难的朋友，而这些朋友与先生并无私人交情，例如我在杭州的一些朋友就受到过先生的接济。陈龙德因不愿向恶势力低头而劳教致残，与先生素无谋面之缘，但是去年先生偏偏辗转寄了两千块钱。我常想，先生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和爱因斯坦研究专家，

身处“高层”，现在的生活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吧，可是不然。据近几年拜访过先生的咏雪说，先生现在还是一家三代人同住中科院一套房子，他跟老夫人两人只有一个房间，相比于那些住别墅、坐轿车的走红学者，经济上其实并不宽余。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之于先生，我因为正直一点吃些小苦头又算得了什么呢？

许先生治学的专业是自然科学史，主要是爱因斯坦，但他在社会科学领域却兼通西方和马列——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尤其是民主政治理论，几乎无所不晓。在那个“反帝反修”的“文革”年代，跟先生的交谈自然不可能涉及如今他极其关注且卓有成就的民主政治理论，那时我作为一个好学的青年，最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号召全国阅读的马列六本原著，他在这方面的熟悉程度令我十分惊讶。三十多年了，我至今记忆犹深。有一次我发现他的书架上有一本人民出版社的《〈反杜林论〉提要 and 注释》，我随手取出翻阅，一下子就被“老许”那密密麻麻的批注吸引住了，我很吃惊，在我看来是最有权威性的注释本，原来有许多错误，被称为唯物辩证法三大基本规律的对立统一、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其来龙去脉和发展，“老许”在批注中都讲得清清楚楚，这些情况我闻所未闻，使我这个自以为马列墨水喝得不少的青年第一次感到没上过高山不知道山之高。当时我还天真地想，中央怎么不把“老许”这样的人请去搞注释啊！这本小册子我借了一直没有归还，大约先生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也从未向我索要，但我却因珍视其中先生的批注而长期保存在身边，本来留个纪念多好啊，可惜的是，大约因为介绍给朋友看，书一经转手就容易丢失，如今找不到了！

先生本可以闭门做学问，但他像爱因斯坦那样具有强烈的人世关怀，一生既追求真理，努力窥视上帝的奥秘，又关注社会的进步，为自由和民主倾其精力。先生早年曾立志献身科学，但后因痛恨蒋介石的专制和追求民主而投身革命，晚年同样为追求民主而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我觉得他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犹如飞蛾扑火，哪怕焚身也在所不惜。我相信，如果没有整整二十年的“右派”经历，先生一定能够跻身中国科学界泰斗的行列，但是，正如林毓生评价殷海光时所说，人生中的道德成就、思想成就与事功成就，如果三者不可得兼，那么道德成就比其他两者更加重要，人生最大的责任是在生命中以仁爱和勇毅获致道德的尊严，道德上达到很高成就的人，特别令人敬佩。先生的盛年是在张家渡小镇上度过的，他因此而失去了学术上的辉煌，但他却以逆境中的入世精神，以他对社会底层的血肉关爱，对自由、民主、人权、科学和社会公正一以贯之的执著追求，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常人难以企及的意志和勇毅，铸就了道德上的辉煌。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人说过，许良英是二十世纪的费尔巴哈，我却更愿意把先生比之为蒋介石高压统治下的殷海光。我以为，先生一生的成就，道德第一，思想第二，科学第三。

去年夏天，我为做学问的事与许先生通过两次信，我不知先生近年视力不好，其中有一封写得很长，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封必复，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这使我至今十分内疚。他的信一如既往，言辞激烈，笔锋犀利，毫不留情的批评之中流露出对晚辈的殷殷关切。他要我读一读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等书，并且告诫我，做学问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要耐得住寂寞，不可急于求成。他说：“求知，探索，这本身就是生活的最大乐趣”。我想，这不正是先生自己对生活的

体验吗？我在此唯一可以庆幸地告诉先生的是，我也有这种感受！而且我还认识到，做学问与做其他事情一样，有无成就以及成就的大小是第二位的，关键在于是否尽到了努力，是否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和才力！

去年7月，我从《南方周末》上看到先生推荐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和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读书目的文章，写信向他求教有关读书的问题，他回信要求我不要称他为“许老”，说自己“虽然已85岁，但精力还充沛，精神状态同青年时没有两样，甚至可能比有些青年人还要年青些。”我在信中借用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话，称先生毕生的使命可以用“战斗”两个字来概括，他不以为然，表示对“战斗”一词十分厌恶，认为自己年轻时也受过“斗争”哲学的欺骗，现在觉醒了。我悟出这才是先生不同于时人的境界。先生实在是一座高山，令我时时景仰；先生实在是一条大河，使我得以近距离倾听社会良心之潮的怒吼。我愿先生像高山那样长寿，像大河那样永远澎湃！

先生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奋发向上。回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开始接触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念，其中就有先生对我的潜移默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在逆境中结识了王东海、陈龙德、毛国良、傅国涌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与他们谈起许先生，朋友们都受到先生精神的感染。“六·四”以后我在逆境中度过了十七年，之所以不愿意懈怠堕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先生这一尊偶像和楷模。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许良英先生是当今社会最令我敬仰的人，他才是我们临海人的最大骄傲，我有幸与先生相识交往，就更加感到骄傲！

2006年3月19日起稿于临海望江门近江斋，4月4日修改于杭州

载《民主中国》2013年02月10日

悼念许良英先生

洪泳雪

2013年1月28日晚，老同事吴高兴发来短信：“泳雪：许良英先生逝世！”一看，我怔住了，一阵悲伤袭来，于是，我回了短信：“高兴：我为他悲伤！”

近一个月前，也是高兴告知许先生（在京）重病监护、他夫人（王来棣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我向先生的儿媳陈罕立发了短信，表示哀悼与祝愿。之后又问了先生的侄子许从平，我们盼望先生战胜灾祸，恢复健康，因为他与夫人合著的《民主的历史与理论》还没有完工，他划右派之后的自传也没有下笔，他的生命力是不会枯萎的。但，数十年的心脏疾病显然禁受不了相濡以沫的老伴离去如此沉重的打击，他是与老伴一起走了。他给自己，也给人们留下了多少遗憾！

我是许先生的同村（临海括苍镇张家渡村）人，我深知，许先生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作为科学家，他主要做出了三大贡献：1、翻译《爱因斯坦文集》。2、呼吁科学与民主。3、人格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许先生又是留下了太多珍贵的遗

产，值得我们好好地继承。

许先生在家乡时，正直、硬气、勤劳、刻苦、纯真、高洁、古道热肠……人人乐道。

1970 前后数年，作为乡村中学的民办教师，我在先生家走动较多。我向先生借了好多马恩列斯的书，亲聆了有关马列、爱因斯坦、康帕内拉、……诸多教诲。“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决不做行尸走肉……”先生说过好多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先生影响下，文化革命中，作为公社的教师小头头，我保持纯洁。后来清理阶级队伍，除了批我“吹捧大右派许良英”，找不到其他任何问题。一次批判，反而提高我的声誉，之后担任了八年乡中学的校长。

乡中校长任内，我刻苦耐劳、一心一意为学校，但难免有人找茬子诋毁你。此时，事实证明我没错，只好心服口服。对此，我感到特别惬意，我知道，是先生的影响使然。

受先生影响，我洁身自好，努力工作，也算实现了一点价值：为两所乡中尽过力；在区中时成绩满意，还发表一些文章，得到中学高级教师职称；退休后一边锻炼身体，一边读读写写。重要的，无论在那里，我可以理直气壮、响亮地说话——如果做过亏心事，说话能响亮吗？

更使我感动的，是先生待我的亲情。我于 1995、2001、2010、2011 四次上北京看望许先生，都受到先生的热情接待。特别在我退休后的两次，许先生抽出许多宝贵时间陪我，跟我交谈，为我买菜，邀我吃饭，还坚决为我付住房的费用……我知道，先生是以他的平常心珍视划右时的贫贱之交。

2010 年暑期，那一次是先生住院之后休养将息之时，他是想跟我多说的。而当时的我，只着眼于先生年少时及划右派之后在家乡的情况，不想触及其他。因而，尽管先生邀我多留一些天，可以一个月、二十天，而我却执意在第十天便回家了……现在想起来，我多么地后悔，我应该请先生讲讲在浙大时、在北京时诸多经历，说说他脑海中留存的多少生动的细节……我虽没有写好他的能力，但记录还是行的，就能多少弥补一点他后半生自传未下笔的遗憾——当时先生是力邀的，而我是多么的浑，我真是后悔死了！

2011 年初夏，我又去北京，这一次，我结合着与妻子的旅游。我去先生家，他还是热情地招待我，按我的要求回答问题。言谈之中，先生说到想在年内写好《民主的历史与理论》，明年写 1958 年之后的自传，我顿感先生压力的沉重——92 岁高龄啊！于是，我缩短行程，祝愿他早日完成写作，提早回了家乡。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先生仍陪我好几天，我感到自责！

如今，许先生与我们永别了，我说，许先生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有一颗平常心，但他又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

愿许先生与他的夫人在天之灵安息！

2013 年 1 月 30 日

载 2013 年 2 月 20 日《科普作家报》（台州市科协主办）

没有写完的民主思想

——初忆许良英先生

傅国涌

2013年1月28日下午13:25,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噩耗传来,我说不出的悲伤。虽然自1月1日得知王来棣先生前一天去世、许先生人事不省以来,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这二十八天中,我一直在不安中为先生祈祷,愿他挺过这一关。他的家人对我说,先生的生命体征还很顽强,我抱有幻想,或许奇迹会发生。二十八天,他在重症监护室里静静地躺着,我关注着病情的变化。六天前,我到病房探视,在他的床前、看着他面容安详,如同睡着了,我默默地为他祷告,那几天他的状况有所好转,我大得安慰。不料这一别就是永诀。想起2012年9月9日下午,在中关村他家中那次见面,那时王先生已很虚弱,许先生也没有以前那么健谈,至少言谈之中已无往日的激情。但我没有多想,他一直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我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10月底寄去。因为外出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大约在12月初给他去过一个电话,问他照片收到否。他说早就收到了,当时他的声音还很硬朗,说起王先生住院了,在301医院,还没有查出是什么病。他还问我:“你知道我最近在忙什么吗?”他说正在忙一件想不到的事,看自传的清样,那其实只能算是半本自传(写到1958年),1990年前后他无法发表文章,没事可做时写下的。如今书未问世,他人却走了!我不曾想到,这就是最后一次通话。

想起近十八年来与先生交往的许多事情、许多细节,他跟我说过的许多话,我的泪水再一次模糊了双眼。早在1980年代末那个春夏之交,我其实就读过先生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章《民主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的保证》,当时还抄了下来,记得是贴在王府井一带的电线杆上,我没有留意作者的姓名。多年后才知是先生之作,原题《“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直到1995年夏天,我才读到先生的大量文章,如《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等,这是我真正了解先生的开始。也是那一年,我在西湖边的三联书店买到了先生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浅绿色的精装本,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艰辛岁月中,先生在故乡的煤油灯下完成了这个工程。这位年轻时冒着生命危险,一心寻找中共地下党,决心为红色革命献身的共产党人,在1957年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右派”,他的言论几次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他选择了自谋生路,回到故乡浙江临海张家渡种田,一去就是整整二十年。

我读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的大部分,第三卷的全部,爱因斯坦关切社会的那些文字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那时,我读到了他《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两文,那是包括他在内的中国物理学家、科学家群体走过的光荣荆棘路的见证。

就是那一年,那个布满了阴霾的冬天,我意外地收到了先生给我的来信,还有二千元人民币,是托他弟弟辗转送来的。当时,我妻子住院,信和钱是送到医院的病床上。

我与先生素昧平生，他只是读到了我的一篇不成熟的长文《民主阶段论》，并听说我生活困难，就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信中说，这钱是一位离休老干部在工资中节约下来的，托他转送给有需要的人。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那个冬天很冷，先生的问候和关怀成为永远的温暖。（长期以来像我这样得到过他无私帮助过的人有很多，我知道的就有不少。）他在信中对我的有些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强调首先把民主的概念搞清楚。从那时起，先生就走进了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开始了跨越十八个年头的来往。

一、花二十五年搞清民主的概念

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中关村，敲开了他的家门，如同早已相熟，我们的交谈非常愉快。记得那天他留我吃了中饭，接着聊。他特别推荐我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书。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在三联书店问世后，他就注意到了，并主动给作者去信。他真正开始思考民主的问题是80年代初。1980年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接着发表论文《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加以较为全面的论证。他说那时他对民主的概念其实也很模糊，多年后自述：“由于我当时对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所知甚少，附和了国内长期以来流行的观点，把卢梭作为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系统学习民主的历史和有关的理论著作，方知道对现代民主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比卢梭早一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而‘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洛克和卢梭以前就有了。事实上，卢梭的思想十分混乱，甚至有不少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的成分，这些错误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和20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

为了搞清楚民主的源流，从1988年前后起，他与夫人王来棣先生合作，决心写一部《民主论》，因为不久得知胡绩伟先生也要写一部同名的书，他们决定改名为《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二十五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在这个浩大的工程上，他主要负责撰写《民主在西方的历史》部分，从雅典一直写到美国，法国部分还没有来得及动笔，他就倒下了。他说，由于对西方历史不熟悉，每形成一个概念都需要阅读大量历史文献和有关论著，而他的视力只有0.1，加上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各种干扰又很多，写作断断续续，进展很慢，现在完成的主体部分，大约有19万字。我有一次和王天成兄去看他，天成告诉他一本有关荷兰史的文献，英文版的，砖头一样的大书，他没有读过，就叮嘱天成帮他复印。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书，觉得跟他的研究有关，也会推荐给他，他觉得有价值，都会去买。他的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处处可以体现出来。特别是他对荷兰共和国和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英国议会民主的形成和洛克思想的研究，都是见前人之所未见，对我们了解民主历史和理论形成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的启发。

经过长期的阅读、研究和思考，他逐步搞清楚了民主的概念。在当代汉语世界，他对民主理解的深刻，和表述的清晰和透彻是少见的。他不同意将民主、共和、宪政这些概念并列，他说：“民主概念的内涵实际上已包含了共和（政府首脑由选举产生）和宪政（政府权力受宪法限制），虽然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元首（国王）是世袭的，但他并无实际

的政治权力，掌握实权的是议会和政府首脑（首相）。因此，立宪君主制与共和只是形式不同，实质是相同的。总之，把民主与共和、宪政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可以与民主相提并论的是自由、人权、法治，四者紧密联系，互为依存。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和目的，人权是民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四位一体构成民主政治的大厦。”

1999年到2000年间，先生80岁时，他有位晚辈要为他编文集，全部文章我校对了几遍，这使我完整地通读了先生的文章，包括他上世纪50年代写的。他亲自将文章分成六类：科学史探讨；爱因斯坦研究；哲学思考；为民主、自由、人权呼喊；念师友；忆往事。他将文集取名为《科学 民主 理性》，这三个关键词，正是他生命最后几十年中念兹在兹的，“五四”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正是他一心追求的。早在1988年他有文集要出版，就以此为题，最后书没有印出，拆版了。

二、说真话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

从1998年起，他与李慎之先生保持了五年的通信，期间也曾陆续复印过一些给我，2003年春天李先生去世后，他们将他们之间全部的通信复印了一份给我，我当时写了一篇长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43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本来还想写一篇解读许先生思想的文字，一拖再拖，拖了整十年，许先生这篇还没有写出来，实在是惭愧。如今，许先生已离我而去。他们的价值观有高度共识，对于具体的人、事乃至观点也有不少的分歧，在信中都有讨论，包括对顾准的认识，他们与顾准差不多都是同时代人，《顾准文集》自1994年出版以后，曾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小小的震动，李先生对顾准的思想和人格都极为推崇，许先生虽也“十分敬佩”顾准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却不讳言自己对顾准思想局限的看法。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就指出顾准许多观点是很成问题的。他说，顾准对民主有不少误解，对自由、人权这些基本概念也是隔膜的。

但当他看了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却深受感动，对林昭的思想大为认同。2008年是林昭被杀40周年，我想编一本纪念文集，给他写信，他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并放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林昭，中国的布鲁诺永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当他看到林昭血书中提出的“极权”这个说法时，感到万分震惊。因为“极权”或“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他要等到1980年前后才首次见到，而林昭在1960年就知道了，并经常使用。这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他认为“林昭可以说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政治思想境界最高、战斗力最强的思想者和勇士”。林昭的事迹，使熟悉世界科学史的他联想到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的思想家布鲁诺。他给寄来手稿时，还特意复印了一张布鲁诺的画像。

耿直、无畏，对权势说真话诚然难，因为有风险。更难得的是对身边的人、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直言不讳，也因此伤了不少知识界朋友的面子，使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其实在我看来他一直葆有一颗童心，他是一座不设防的城，他对人是敞开的，他对人、对事的评判从无顾忌，完全从本心出发，也不是所有的评判都对，但他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活得很真实，从年轻时代到最终岁月，从无更改。他说自己一生不说谎话，除了1949

年前跟国民党特务斗之外。

在他人看来，他傲然站立在这样的时代，需要特别巨大的道德勇气，而对他来说只是出于赤子之心。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到晚年都为他的处境担忧，而他却坦然地表示，自己只是那个直指皇帝无衣的小孩而已。说真话，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他也身体力行做到了。他不在乎为此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三、“做一个人！”

他在2000年说，“80岁对我依然是沉重、抑郁的岁月，依然是无尽的苦涩和窒息。”他一生多数岁月都是在逆境中熬过，真正轻松、舒畅的日子并不多，即使1957年之前也有过反胡风的阴影，80年代是他发挥作用最大的十年，可以说引领风潮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也伴随着诸多的曲折。然而，十八年来，我每一次见到先生，他总是那样安静、笃定，与他谈论现实和历史，各种人事、思想，他从不急躁，这个时代的浮动不安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狼奶他从1974年后渐渐吐出。他80年代的一些观点，当时有些人不能接受，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发现他反思得最彻底、告别得最早。我常常想，毕竟他是民国教育出来的，从立本小学到浙江大学，教育赋予他的气质是深水静流、不骄不躁，一步一个脚印，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不幻想一步登天。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竺可桢的“求是”精神和浙江大学校训》，对于他学习、工作、生活过十一年的母校深怀感恩之心。“文革”时期他被揪斗，也曾关在浙大。在那里他完成了物理系的学业，深受王淦昌等教授的赏识，一心要他留校任教，他却决然离开，要投身颠覆民国的革命洪流，主动卷入了那个时代的大潮当中，历经磨难，他最终回到了主流文明的价值当中，民国教育给予了他自我反思的可能性，他对自己早年受的教育记忆犹新。

2000年，我写了《爱因斯坦的影子：许良英的道路》一文，他不大同意这个题目，认为自己走的路跟爱因斯坦不一样，在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关怀上，他已比爱氏走得更远。但他认可我指出他的三个思想源头，包括爱因斯坦的思想、台州地域文化、浙大“求是”精神，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他的精神坐标，成全了他一生的人格。

括苍之巅望海尖，地势莫嫌偏。上通永安下灵江，人文地理善。……开学歌唱乐融融，烂漫见天真。迅速地球经数转，得失问寸心。吾侪少年须务本，本立而道生。

这是立本小学的校歌，曾和家乡的山水一同陶冶过他少年的情操。他对科学的追求、对家国的关切意识，都是在千年曙光最初照到的括苍山下形成的，《爱因斯坦文集》也是在这里译出来的。张家渡，这个小小的山镇，他们家的“高台门”和“风翻书楼”，正是在那里他最初遇到了爱因斯坦，1938年，他通读了爱因斯坦的第一个中译本《我的世界观》，立志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为此投靠浙江大学物理系，1939年他如愿以偿，到广西宜山入学，成为胡刚复、王淦昌、束星北这些物理学家的弟子。然而，他的志向在大学时代发生了改变，第一学期的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他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2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

从此，做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成为先生毕生的追求，无论革命时代、反右时代、启蒙时代。如果要在先生身上寻找最宝贵的元素，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这块土地的人。

他一生都是这样做的，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摇动他。他给予我最大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上的，不如说是人格上的。自从1995年那个冬天以来，无论来信还是面谈，他曾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念叨，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所以，他理解的启蒙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上，而是将自己放置其中，他耿耿在念的首先是自我启蒙，所以他会穷二十五年去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所以，他会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童心，所以他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各种社会不义，也可以批评许多知识分子。爱因斯坦说：“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他几乎都做到了。在最糟糕的沉默中，他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声音，他这样做只是从良知出发。他在1996年黯然对我说，没有想到宽容呼吁引来更大的不宽容，导致王丹等人入狱。从此，他不再发起联名信。他并不赞同高调的理想主义，虽然他一贯地坚持了道义立场。中关村812楼，曾经是令人注目的一幢楼，他在那里一次次地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多年以来，每次去北京，先生的家几乎是我必去之处，我经常不打电话就直接去了，他几乎无例外的在家。他常常要留我吃饭，几乎每次都是吃大馄饨（他牙不好），他亲自烧的，里面加汤圆，王先生说这是他的喜好。如今王先生、许先生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相继离开，中关村的房已空，那熟悉的声音、那熟悉的面容都已不再，对于我，中关村，十七年来我一次次进出过的那道门将永远关上了。岁月更替，荣华消逝，我的怀念将伴随着我今生的所有时间，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愿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成为中国的持久祝福。

2013年1月29日杭州

（原载《中国青年报》2013年2月4日）

“谢谢火炬给你光明”

——回望许良英先生的心路历程

傅国涌

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先生在北京连续的雾霾中告别了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他跨越九十三年的人生，经历了中国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他与这个动荡曲折、起伏不定的时代血肉相连，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他养成了天天读报的习惯，关注着国内外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那年他才11岁。1940年以来，他不再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一次次卷入历史的漩涡当中，乃至粉身碎骨都不在乎。在他年轻时代，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这一诗句曾深深地打动过他：“谢谢火炬给你光明，但不要忘记那执火炬的人呀，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从强敌入侵的浙大求学之时起，他以自己的生命、思考和追求深深介入了大时代跃

动的脉搏之中，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尤其是他的心路历程，成为了一个风雨仓皇时代强有力的见证。只有将他放在百年中国革命、战争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乃至放在整个世界思潮翻滚、变化激荡的20世纪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他在每个时代关节点上的选择，理解他走过的血泪交错的人生之路和思想上的归去来兮。他生于1920年，正是思潮多元、充满变数的“五四”时代，但在他成长的年代，“五四”的浪花早已消退，他遭遇的是“九一八”以来空前的民族危机，做亡国奴的恐惧使他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和不满，他憎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曾在日记上写下“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被老师叫去训了一顿，说喊口号是要杀头的。那时，报纸常常开天窗，各地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的消息，他还是隐约知道了，虽然他只是个偏僻地区的小学生，蒋介石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军阀”、“卖国贼”。国民党在他幼小的心目中不过是“说好话做坏事的”，他们所谓的“政治”则是肮脏的交易，他非常厌恶“政治”，并找到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精神避难所，一心梦想成为法拉第、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1937年抗战爆发，他失学回家，在故乡自学一年，接触到大量近代物理学的新书，撞入了一个令他惊喜欲狂、眼花缭乱的神秘新天地，他还精读了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从初中起对物理一直是最感兴趣的，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崇拜爱因斯坦，但不曾想到还有这样一个奇妙、美丽的新境界，他决心终生在这里面探索，成为一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为此他报考了浙江大学物理系，1939年2月在广西宜山入学，成为王淦昌先生的得意弟子。

然而，当浙大辗转迁徙到遵义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对物理的兴趣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的激情，他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红色书籍的阅读和革命哲学的思考中，并一步步摆脱对生死的恐惧，决心寻找中共地下党，走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简单地以为推翻了国民党政权，中国就好了。一个热切的“科学救国”论者转变成了狂热的革命者，并没有人鼓动他，他是自觉地被裹挟进那个时代的红色浪潮当中的。很多年后，2001年6月24日，他写给李慎之先生的信里说：“我走上革命道路，不是靠任何师友的启蒙，而主要是从现实和书本上领悟得来的。……我投身革命的过程另一个与别人不同的是，我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找到党的，而是为彻底解决社会的不公、实现共产主义而入党的。”李慎之则说自己参加革命的思想动力，“一个是爱国主义，或曰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一种朦胧而强烈的平等思想（甚至不是‘公正’的思想，那时候我还不懂）。”

许先生说，第一次听说“共产党”这个名词是1927年，当时就有好感。临海县城有个振华中学，学生中有共产党，被国民党关在监牢里，他们的主张是“劫富济贫”。以后又听说国民党枪毙共产党人，被枪毙的都是青年学生。1935年春天，他读到《申报》记者写的红军撤离江西后的“匪区”采访录，第一次对共产党有了比较具体（虽然还极其模糊）的认识。他从小读过《水浒传》，天真地把共产党和梁山泊的英雄好汉联系在一起。1936年在浙大高工读书时，曾在杭州南星桥军营受训，听到了一些红军的故事，并知道他们军训的枪是方志敏残部弹尽粮绝被俘后留下的，几百人就被埋在他们军训的大操场下，这件事发生在八个月前，使他受到很大震动。1938年，他家乡临海张家渡村里有人到过延安，给家里寄回一本油印的抗大讲义《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读物，拿到时很高兴，可惜读不懂，但从此他开始关心起马克思主义哲学，

希望有一天可以读懂，甚至产生过一个念头：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现代物理学新发现的许多惊人现象。那时，理论物理学仍是他的最爱。1939年暑假，他买到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此后，他又读到介绍马列主义理论的刊物《理论与现实》，还有关于红军长征的小册子。

1940年初，他到遵义不久，即在老城一座作为浙大总办公室的大院照壁上，看到了“实行三民主义”的标语，但“三民”两字字迹模糊，细看隐约露出“共产”两字，这是红军五年前留下的标语：“实行共产主义”，他生平第一次看到就感到分外亲切。就是在这里，人民的苦难深深地摇撼着他，他目睹遵义街头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背着大筐沉重煤炭的运煤工人，一队队被绳子捆着、光着腿在寒风中抖索的“壮丁”，眼前的现实击破了他的“科学救国”梦，从那个春天起，他再也无心钻物理，决心告别“象牙塔”。他开始集中精力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个苏联人的《中国的再生》以及《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红色书籍。他说自己从小胆小怕死，为了革命，必须正视极端严重的生死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思想斗争，他有自信可以面对枪口、刑具和刺刀了，才主动申请参加浙大的左翼社团“黑白文艺社”。他希望自己做一块通向共产主义大道上的小小的无名的铺路石。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浙大校内的空气骤然变得紧张，“黑白”社垮了，他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质与能自然科学社”，4月1日正式成立，出定期壁报《质与能》，组织“中国科学为什么不发达？”等讨论。他认真地学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学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浙大没有地下党的情况下，他自觉地追随红色革命，为了相互砥砺，他写了八九千字的论文《试论感情与理智》，在浙大的进步同学中悄悄流传多年。1942年他大学毕业，王淦昌先生一心要他留校做助教，研究最前沿的物理学问题，认为他研究物理很有前途，说他有三个优点：1、做学问态度诚实；2、理解力强；3、有创造性能力。但他无动于衷，因为他决志要去寻找中共地下党。结果在桂林找了几年也没找到，1945年1月下旬，王淦昌写信要他即回浙大，并说曾在贵阳日报上登广告找他。从桂林一路流浪回到湄潭，历经169天，行程2555里，其中步行2100里，在黔南遭遇大雪，路上还差一点被五六个国民党兵打死。当他结束半年的流浪生活，回到浙大时满身虱子、胸口创痕斑斑、腰间脊椎得了关节炎，符合世人对“共产党人”的想象，所以一个国民党特务学生就指他为“共产党”。其实，他要等到一年多后、浙大复员路过重庆《新华日报》馆才解决入党问题。在此之前，他足足找了五年地下党，独自在党外追求了六年之久。

这条风险莫测、置生死于度外的路是他主动选择的，所以，他说自己的经历是比较独特的，主要不是靠熟人或朋友的引导，而是直接从书本中接触主义，并出于对黑暗现实的愤恨。他从一开始就把革命看作是生命的同义语。在杭州领导地下党和学生运动的岁月，直到1948年11月以前，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活着见到“解放”，他以为自己在“解放”前就会死在监狱里或刑场上（后来有人指控“许良英搞革命是为了死”）。1949年5月3日当他用整个生命追求的那一天到来时，他甚至幻想“应该有万道金光垂天而下，到处飘荡着五彩云霞”，事实上一切都很平静，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变化，而他冒着生死所从事的地下革命结束了。那一天正巧是他29岁的生日。

一个天资聪颖、自小爱读书、爱思考的青年，从20岁起竟然放弃“科学救国”梦，

决心不顾生死，去走这样一条革命之路，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然而在那个时代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同时代许多知识青年的选择，顾准（1915）、胡绩伟（1916）、韦君宜（1917）、李锐（1917）、李慎之（1923）……几乎都是如此，作为后“五四”一代人，他们几乎都是在“一二九”前后的抗战烽火中接受大学教育，在“五四”思想先辈中，他们亲鲁迅、远胡适，走的是当年“南陈北李”首倡的路，当1942年许良英不顾恩师王淦昌再三的挽留、决意去寻找中共地下党时，始作俑者陈独秀先生已在四川江津的小石屋里，贫病交加之中完成了对自己一生的反思，回到了“五四”最初的启蒙轨道，在《我的根本意见》中清楚地指出：“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可惜这些声音当时未能广为人知，更遑论影响青年的思想。当陈独秀在给西流等人的信中否定斯大林模式之时，也正是青年许良英悄悄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时。

在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年心中，鲁迅的吸引力远超过胡适，李慎之先生曾经说，“鲁迅的著作永远是对我心灵的启示与激励，……我六十年来一直爱戴崇敬鲁迅。对胡适的感情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晚年他的思想倒转了过来，“认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许先生回忆，1939年暑假，通读了20卷本《鲁迅全集》中所有的杂文，鲁迅精神世界给予他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他一直把自己比作鲁迅所说的那种肩闸门的人，“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年青的一代去宽阔光明的地方。”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讲到柔石“台州式硬气和迂”，在台州历史上出过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孺，他一直以台州家乡人的硬气而自豪，他在中小学时代就被人称为“硬头硬脑”，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大大地契合他的个性。即使到了晚年，他对胡适的看法仍没有大的改变，这和李慎之的回归胡适不同，虽然他已看清自己一生走过的路。

1957年，他在中国科学院一夜之间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他本来没有右派言论，他对自己栖身的党一腔热忱，对领袖无比忠诚，5月24日他到北大看大字报，认为“诬蔑党、诬蔑马列主义的毒草出现不少”，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他还对同去的赵中立说：“十七年来，每次阶级斗争我都积极参与，唯有这一次却只能袖手旁观，内心非常痛苦。”当6月8日《人民日报》不仅登出社论，而且以8个版面刊登批判毒草的文章和报道，他坐不住了，他无法理解《人民日报》为什么突然翻脸，帽子扣得这么大，这种做法太粗暴了。他以为是宣传部擅自做主，他为此思想不通，到处找人去谈，包括杜润生、于光远、范文澜、潘梓年、郁文、张毕来等人，到6月17日他觉得自己思想通了，“心情十分愉快，回想自己前几天的情绪，觉得可笑，活像一个堂吉诃德。”从1940年到1944年，他说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堂吉诃德”，以后改变了，自从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揭发后，这一思想又复活起来。他的“堂吉诃德”之举使他遭遇了“碎骨之痛”。

其实，1949年他就遇到了看不懂的问题，杭州刚易手，地下党走到地上，他到杭州青委工作，领导告诉他，如果到宣传部可以当副部长，在组织部只能当科长，在伙食、看文件、参加会议等方面的待遇都不一样，而他认为干革命连生命也不计较，现在计较这些未免太可耻了。他宁愿当科长。发现部长一律吃中灶，而他和大家一起吃大灶，经

常一起参加劳动，而那些曾经一同战斗过的同志一旦当上部长，就摆出了“首长”样子。当然，他那个时候是标准的左派，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在杭州发动学生把私营商店的资本家逐户拉出来揪斗。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因他介绍入党的方然成了“胡风分子”，而受到审查，10个月后才放下包袱。

1958年2月下旬他被开除党籍，党纪处分书上连他的入党时间、地点都是错的，在“犯错误原因”一栏赫然写着“一贯有个人野心，每当个人野心不能满足，就同党对抗。”他当即表示完全不能同意，毫无事实根据。而来人表示：“这一栏是支部的意见，用不着征求你同意。”青年时代历经千辛万苦、花了五年多时间找到的党将他甩出去了，他的隐痛可想而知。3月1日他拒绝接受保留公职、去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监督劳动的处分。在行政处分决定书上签字时，他发现被定为“极右分子”，表示不服，对方说：“这是组织上定的，用不着同你讨论。”最终他选择了在当时无异于绝路的“自谋生路”，但在处分决定后面的空白处，他依然诚恳地写下誓言：“保证永远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保证永远不说一句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话，不做一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他真诚地相信自己错了，他要用体力劳动来改造自己，脱胎新生。在故乡农村劳动改造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是大跃进、“文革”，他都毫无怀疑，无条件地相信党报说的，利用劳动之余阅读《毛泽东选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此曾得罪很多人。直到1970年他在故乡回顾自己前半生，还说，“我一生最感到光荣和幸福的，是有幸七次见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也曾有幸多次听到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教诲。”1972年他从北京经河南回家乡，特地到韶山朝圣，五次进出毛泽东故居，每次都含着热泪。

1974年，他为《爱因斯坦文集》出版的事留在北京，目睹“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的表演以及江青的种种丑态，终于从长期的迷信和个人崇拜噩梦中醒过来，从此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并重新审视此前走过的道路。血雨腥风的地下党时代早已过去，与他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于子三等牺牲了，吴大信等许多人坐过国民党的牢狱。他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文革”以来一系列的运动，九死一生，曾遭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离婚、监禁、自杀，毛泽东所谓的“五不怕”他都一一经受了。在农村幽暗的煤油灯下，他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研究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渐渐回到主流文明的轨道上，他早年接受的科学训练，他少年时代就遭遇的爱因斯坦思想，一点点将他唤醒。

1938年，也是在临海张家渡的“风翻书楼”，他认真地读了爱因斯坦的箴言，“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和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

然而，爱因斯坦所推崇的这些民主自由思想不久就被他自己抛弃了。他真诚地信服了斗争、专政、铁的纪律、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那一套话语，并由衷地以为通过革命可以

实现理想的公平。为此付出了足足三十四年的光阴。

1978年，当他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时已58岁，和这个国家一样，许多宝贵的时间都浪费了，他心情沉重而抑郁。随着《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的陆续问世，以及他对科学哲学和世界科学史的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开始对中国真正产生影响力，他发出的声音越出了科学界，成为80年代中国启蒙时代的中流砥柱。经过长时期的苦难和思考，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从那时起，他穷尽生命最后的数十年，努力为中国引入思想的火种。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精神资源也一一复活，民国教育给予他的影响开始发酵，立本小学、海门慈幼院、海门东山中学到浙大高工再到浙大，他受到的健全教育，在他摆脱意识形态给他的负面影响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长期的哲学思考和他的世界科学史视野，对于他最后研究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不是贸然踏进这个领域，而是一步步跟着时代走过来的，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每个脚印中都凝结着他和时代的血汗，他的文字不是书斋和研究室的产物，而是在忧患的人生和民族的困苦中一点一滴悟出来的，每个字都如铁铸一般。如果说1981年他发表的《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述的，对世界文明史的重新理解也刚刚起步，那么到1988年发表的《驳民主缓行论》，1989年发表的《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等一系列文章，他对民主的思考开始变得成熟起来。等到他离世前几年在《炎黄春秋》发表的那些文章，特别是还没有问世的著作《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他已摸到了人类文明史的门槛，找到了一条通往现代中国的路径，看见了文明的曙色。虽然他不能及身而见了。

他在生命的黄昏一再眺望未来，为此满怀信心，他不在乎自己生前能否看见，他只知道朝前走去。他连遗体都捐献了，没有墓，没有碑，他浩然独立的人格，他毕生为这片土地的付出就是他立在世间永存的丰碑。当他离世之时，北京只有漫天的雾霾为他送行，没有铺天盖地的鲜花、挽联和赞誉之词，只有民间小部分人的哀伤和悲泣，他默默地离开，如同他生前的姿态，不张扬，不喧哗，他知道大江浩浩汤汤，日夜东流，什么雾霾也挡不住。他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泰戈尔的诗依然坚定有力，他就是那个站在黑暗当中执火炬的人：

谢谢火炬给你光明，但不要忘记那执火炬的人呀，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2013年2月13日杭州

（原载《中国改革》2013年3月号，《律师文摘》2013年第一期、《江淮文史》2013年第3期转载）

泪别许良英先生

傅国涌

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的意义。

——爱因斯坦

2013年1月28日下午1点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我得到噩耗大约是2点多钟，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六天前，我曾到重症监护室探视先生，我一直盼望着奇迹发生。他的家人还在讨论，哪些音乐是最让他心动的，准备在他醒过来以后，帮助他恢复神志。但他再也没有醒来。当夜，我订好了次日飞北京的机票，29日晚上抵达雾霾中的北京。30日早上起来，北京依然是漫天雾霾，能见度很低，我来到熟悉的中关村812楼先生住了三十年的家。在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最显眼的就是挂了多年的那幅爱因斯坦黑白照片。爱因斯坦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他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也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1938年他在上大学前读到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中译本，在心灵上受到的最大冲击不是爱因斯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是关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那些观点：“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当作国家的奴隶。”2001年我写了《爱因斯坦的影子：许良英的道路》一文（收入开放出版的《脊梁》一书），先生不大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只对了一半”，他在2002年3月23日跟我说，“我1940年以后走的道路比Einstein更是远得多，完全放弃自己爱好的专业，完全投身于社会革命，决心做一块革命道路上无名的铺路石。Einstein一生以科学研究为主，旁及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我考虑得比他多些，比他彻底些。”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局限于专业研究领域，年轻时代他把自己献给了革命，1978年他结束20年的农民生活，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从事世界科学史、科学哲学的研究，他却把重心放在了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上面，为此付出了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大约2003年前后，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要写一本书，以《从同志到公民》（《Comrade to Citizen》）为题，已着手搜集他的文章。他在2004年5月跟我说，“我觉得她这个书名很有意思，可以反映我和李慎之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从革命者到启蒙者，从同志到公民，从1970年代开始，他逐渐完成了角色转型。

1月30日那天，我在先生生前工作的书桌上写挽联，一直到下午一点半才完成，匆匆赶往北大医学院遗体捐赠中心，大门口聚集了大批保安，气氛有一点紧张。我到达现场时，“科学思想传承爱氏大爱人类赤子之心永存；民主启蒙见证历史期盼中国自由精神不朽。”王德禄、武文生、刘志光送的这副挽联正在悬挂。“探真理，抗强权，一生波折，铸独立精神；秉正义，舍天伦，半世流离，树慨然正气。”是他长子许成钢和媳妇郭迪敬献的。“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私无畏；争民主，探科学，守理性，有始有终。”是我们全家送的。“雾失京都，哭我华夏又失一忠良；寒锁大地，痛我中国又少一精英。”是陈龙德、吴高兴送的。“天地同悲，哭我民族良知；京都雾霾，送别中华英杰。”是杨海、王德邦送的。“良心无价，先生人格永远活在心中；英风千秋，先生思想长久垂范后世。”是刘庆梅送的。“一生求真，科学民主理性；千古师表，后学义士铭心。”是王天成送的。“今岁逢奇寒，先损夫人，再弱许公，民主阵营失老师；京城多阴霾，雾锁九门，犹如毒弹，你方唱罢我登台。”是韩三洲送的。“心忧民主科学，九十三年遗直在；力喊启蒙理性，八千里路大星沉。”是哈尔滨赶来的史晓雷送的。“讲科学，论民主，启蒙世人思想倾心良苦；研历史，倡人权，力行普世价值，尽致英鉴。”是姚监复、姚蜀平、程宏、林爱民送的。“中国良心，高举德赛垂百载；学界英杰，洞穿黑夜照千秋。”是武宜

三和香港五七学社同人送的。“把那渴望呼吸到自由的人，给我吧！把一切无家可归沦落天涯的人，给我吧！——译自《一个女神脚下》”。这是李淑娴并代表已故方励之先生发来的挽词之一。“德先生、赛先生，前有方先生，后有许先生，前仆后继两先生；说右论、批左论，方述天体论，许译相对论，耿直方正可推论。”这是万润南先生送的挽联，下联尤其写得好，他的挽联涉及许先生和方励之先生，其实，许先生对民主的觉悟还在方先生之前，他们的关系并非是前仆后继。许比方年长 16 岁，1977 年两人因爱因斯坦而结缘，一见如故，共同经历了 1980 年代的难忘岁月，一起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有力推手。直到 1989 年的十多年中，他们“来往一直很密，无所不谈，真是心心相印。”1986 年，他们与刘宾雁共同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赵紫阳向邓小平口头汇报这件事时，把他错成了王若望，所以邓随口要开除三个人的党籍，而在批判刘宾雁的材料中赫然就有《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上面留的联系地址是他家的，署名也是他在第一个。他虽逃过了 1987 年，却没有幸免于 1989 年。他生平最后的一篇文章就是 10 月 7 日为《方励之选集》写的序言。他对方的评价很高，他曾几次跟我说起，方精力充沛，思想敏锐，能量和冲击力都比他大。方对他也是十分推崇，1990 年代初，方初到美国时，曾对默尔·戈德曼说，自己的民主思想最初是受许良英的影响。这是当时在场的费正清图书馆的南希转告他的。所以，1994 年，默尔·戈德曼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一书中指出，“许的民主观很大大地影响了他年轻的同行方励之，方转而影响了中国学生。”书中还有一段话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许是在政治上和智力上对方励之影响最大的。他读过由他的亲密朋友、物理学家和科学史家许良英译成中文的《爱因斯坦文集》。作为一位人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直言不讳的鼓吹者，和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成为方的榜样。”

2001 年，我在一篇文章中说，20 世纪后 20 年中几次知识分子群体的民主呼喊都是他促成的。主要是指 1989 年 2 月 26 日的 42 人联名信和 1995 年 5 月 45 人联名的宽容呼吁书，特别是“六四”后的黑暗中他所起的作用。但这样表述不够准确，他马上纠正我的说法，认为这与事实有出入，至少 1989 年 1 月方励之给邓小平的信，以及二、三月间两批文艺界知识分子响应方励之信的公开信不是他促成的。相反，他和施雅风发起的 42 人联名信倒是受了方的影响，不过，方当时只提出释放魏京生，他考虑得更深远些，提出政治民主化和结束以言治罪的历史。他表示，从胡耀邦去世到“六四”前，北京和各地知识分子发表的不少宣言，都不是他促成的，他只在其中两个宣言上签了名。不过，他补充说，早在 1988 年 11 月，他就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率先提出要纪念“五四”70 周年和《人权宣言》200 周年，开展民主启蒙运动，立即得到与会的方励之等人热烈附和，于是就定为 1989 年活动的主旋律，他本人就写了一系列文章。“六四”之后，他大义凛然，不顾危险，再一次被他青年时投身的党甩出，在党员重新登记时不让他登记。经历过大半生的挫折、患难和迫害之后，他已百炼成钢，在时代浪涛起伏不定的冲刷中，他如同一块撼不动的礁石，傲然屹立。他独立无畏的声音一次次横穿 1990 年代的冷风苦雨，无论是 1992 年那篇惊动海内外的雄文《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4 年的《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1995 年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1996 年的《为王丹辩护》……他不仅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尊严，更

是为这个古老民族留下了浩然长存的正气。在很长的时期内，他在现实中被冷落、被边缘、被封杀，但他赢得了历史。

许先生头枕着菊花，面色安详，如同睡着了，他的四围摆满了挽联和花圈，最后许多挽联都挂不下了，一面墙上贴满了海内外的大量唁电、悼辞，李锐老先生送的花圈摆在醒目的位置，还有丁子霖、蒋培坤老师送的花篮，胡舒立和财新传媒全体员工送的花篮，艾未未托人送来的花篮……大约有三百多人在雾霾和严寒中赶来与先生告别，由于场地太小，一次只能进来十个人，这么多人要在室外的寒风中排队，原定3点开始的遗体告别，2点25分就提前开始了。人流缓缓地移动，最先进入的是丁子霖、蒋培坤和王丹的父母王宪曾、王凌云等人，丁老师的眼泪感染了全场，许多人潸然泪下。范岱年、胡亚东、邵燕祥、杜光、姚监复、蔡德诚、陶世龙……等老先生来了，江棋生、刘苏里、徐晓、韩三洲、俞梅荪、靳海科、张宏海等来了，刘宾雁的女儿刘小雁、李慎之的儿子李三达他们来了，许多年轻人来了。他们中有许多人与许先生生前并无直接的接触，完全是为他的人格、思想所感召。许多先生生前的友好、晚辈泣不成声，有些与先生并无深交的年轻人也在默默流泪。面对先生的离去，许多人表达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敬意，一位研究科学史的学者说“我们只是苟活者”，一位住在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的学者在留言本上留下了“同在一院无缘聆教”的遗憾。

这是一次沉默的告别，没有人说一句话，只有许先生生前最喜欢的《渔光曲》旋律在流淌，家人特意选了没有歌唱的琵琶和古琴曲。他儿子成钢说，从年轻时代起，《渔光曲》就是他的最爱，那是上世纪30年代一部同名电影的插曲，“烟雾里辛苦等鱼踪！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天已明，力已尽，眼望着渔村路万重。腰已酸，手已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相信这歌词引起了他内心强烈的共鸣，他一生总是站在被损害、被侮辱的弱者一边，他自己也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1940年初到遵义，他即被底层人民的苦难震撼，由此义无反顾踏上革命之路。“六四”之后的无边黑暗当中，他不顾巨大的压力，一次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王丹，为“六四”难属，为许多不知名的受迫害者，他伸出的援手曾温暖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小人物。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革命资历，或在学术上的成就而自认为高人一等，他总是以平等的心态与我们相交。他说自己少年时代读到陆陇其的一句话：“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深受启发，一直视为座右铭。他多次跟我说，“傲态即自视高人一等，是绝对不可取的。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如斯宾诺莎、洛克、爱因斯坦都无半点傲态，我的老师竺可桢、王淦昌、陈立也是这样。民主的前提就是承认人人生而平等，反对等级观念。民主精神要求自己的就是要以平常心，做平常人。”

他之所以喜欢《渔光曲》，正是基于他对底层、对弱者、对受苦者的天然同情，他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人，我们因此可以理解他在一生中的几次重大抉择。同时，对于知识界在“六四”以后普遍的沉默和怯懦，他虽然也感到痛心，但他从不赞同将那些没有勇气站出来批评黑暗现实的知识分子一概骂倒，他认为，只要是不为虎作伥而勤勤恳恳从事本业工作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受到尊重。十多年前，他专门跟我举了一个例子，他的浙大物理系同学邹国兴平时读书非常用功，每门课都考得90分以上，但从未表达过什么政治性的言论。1942年春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给邹发奖状，“纪念周”（当

时大中小学每周必须举行一次纪念孙中山的集会，以进行党化教育）时邹有意不去领，理学院院长托他带去，想不到邹拿到奖状当场撕掉，一边说“可耻，可耻！”他认可那些真正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索工作的知识分子。

他这一生真正做到了有傲骨而无傲态，傲骨是对权势而言的，对于他生活中接触到的人，他从无傲态，他对所有人都直言无忌，并非只对权力说真话，他的直言也因此伤过许多人，特别是许多成名的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他们对他或敬而远之，或颇有意见。一次聚会时，曾彦修、何方两位老先生提及“毛主席”，他当场指出，怎么还叫“毛主席”而不是直呼其名，结果惹得两位老先生很不高兴，何方先生跟我说，称“毛主席”只是习惯，如同称“爱新觉罗玄烨”为康熙一样，并无他意。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直言而且较真的人，有时会令人难堪，以致难以接受。我有时想，许先生活了九十三岁，却童心未泯，他以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自比，他身上“台州式的硬气”和“迂”，也是他引以自豪的。正是他这样的个性和文化底气，才成就了他的人格。

十三年前，他 80 岁时，我曾问过他一个问题，在他 80 年的人生中哪个时期最痛苦？他回答：“自从 1940—41 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即立志要做一个‘人’），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的意义。’）以后，对人类和社会满怀希望，对个人得失很少甚至不屑计较，因此，即使在逆境中也感觉不到‘痛苦’。面对权势者的暴戾和社会上的黑暗，我只有愤懑和抗争。环境越险恶，越需要抗争的勇气。当然，抗争并不是要搞暴力斗争，而是一种合乎理性的韧性的斗争”。正是有这样的心态，他才熬过了 1958 到 1978 年在故乡农村漫长的时光，在“六四”后的二十四年中他依然能坚持研究、思考和呐喊。他无数次强调，在中国追求民主要坚守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准则，反对地下斗争和秘密组织。他自己是从小地下党走出来的，深知其中的弊端，他甚至讨厌“战斗”这样的词汇。他多次跟我说，独立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特别要有独立批判精神，这是爱因斯坦一生所高扬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的是反思精神和独立的批判精神，他说，在这方面鲁迅和爱因斯坦都是我们的榜样。他青年时代就喜欢读鲁迅作品，一生中曾两次读《鲁迅全集》，为后人肩起黑暗的闸门是他毕生的追求，他做到了。最后他将遗体都捐献了，在他身后没有墓，没有碑，没有遗言，他晚年的文章、著作，他写给许多人的大量书信，他毕生的求真精神，他人格上的示范，就是他留给后世的无形之碑。当他离世之际，北京只有漫天的雾霾为他送行，只有民间一部分人默默的哀伤和悲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言的压抑。对于这一切，我深信，他并不在意，他一生都没有为个人的得失计较过。他将自己全然献给了这个社会，并已竭尽全力。我站在他的遗体前，含泪为他祷告，并与他做最后的告别：“许先生，从此再也听不到您说话了，再也看不见您了。但您将一直活在我心中。您安息吧。”

2013 年 2 月 20 日杭州

（原载《开放》2013 年第 3 期）

追忆许良英

张轩中

2011年，我开始教名叫黄宇的年轻人广义相对论，教了几天以后，我意识到，我们爱因斯坦学校应该有更大的视野与舞台，于是，我找到我的浙江上虞的同乡老前辈，也是我们春晖中学以前的老校长的儿子范岱年老先生，请他为我们爱因斯坦学校的学校名题词。范先生在与我说了一段上虞话后，就开始题字，他的毛笔字写得很是流畅，让我用相机赶紧拍摄下来，因为那是可以重复写字的那种练字的宣纸，时间一长就会风干。我当时觉得这个方式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我们爱因斯坦学校也好像写在这种宣纸上的字，时间一长一定会被风吹干。

于是，范先生介绍我去访问许良英先生，一来是因为他们共同翻译过《爱因斯坦文集》，二来是因为我们都算是浙江同乡，虽然与这些老前辈相比，我显得过分年轻，但这不影响我与他们有思想的交流。范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以后，就说好了，约定我过几天去访问许先生。

于是过了几天，我去了许先生家，许先生家也在那个大院子里，我在楼下徘徊，有点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见许先生，而他的学生很多已经是著名教授，所以在我心目中是一个资格很老的老头，我害怕我上了楼以后无话可说。但既然已经来了，就要把我的真实目的说出去，我一是来送我写的书《相对论通俗演义》，二是来请许先生在我的《爱因斯坦文集》上签字，三是请他接受我们爱因斯坦学校的访谈。不可否认，我是带着不可告人的广告的目的，来到许先生家。

我先打了一个电话，对先生说：“许先生，我已经到您楼下了！”

许先生以非常冷酷的声音说：“你上来吧！”

于是，我就坐电梯上了高处，到了门口，我敲了一下虚掩的门，一个白发苍苍的有点微微驼背的老头给我开了门。

老者延请我坐到客厅的沙发上，我发现整个客厅全是书，以及一张很明显的爱因斯坦的大照片。这照片上写着一段英语，我看不太懂，大概是说什么人卑鄙。于是我介绍了自己的来历，是浙江人，谈到我们的老师的老师，是刘辽先生。于是许先生觉得我更加亲近一些了，于是对我说了很多不见外的话。我拿出《爱因斯坦文集》，请他签字的时候，他在扉页上写了很小的三个字许良英。

于是，我告诉他，我们几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爱因斯坦学校，专门学习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他很关心地问，这个学校有多少人？我当时很害怕，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空壳，根本就没有什么注册的合法的身份，就是在网络上交流的qq群，已经很少的线下交流。但考虑到我们的qq群里大约一共有500个人。于是，我就胡诌道，有500个人吧。许先生听到以后很感兴趣，很高兴，说很不少了，你应该在你们学校普及民主。我说好的，民主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但我们现在更多是集中在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许先生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没有民主来得更重要。我于是唯唯诺诺地说，是是，但我们的民主，缺少技术层面的支撑，这是一个技术问题，要改良社会，必须先掌握资

源。许先生听到后，很不高兴，把我批判了一番，说民主思想的启蒙更重要，你不能做奴才。

我觉得很可笑，一个在旧室里做民主定义的研究的老者，上来就骂一个年轻人是奴才，他到底是什么鲁迅般的人物吗？但我认为民主的实现，必须在掌握了电力资源与石油资源等等资源以后，才可以谈论的技术问题，而被他说成是一个思想问题。于是，我又应付了几句，就逃走了。我对许先生说，我过几天拿着摄像机再来采访您。

许先生说，好吧。他给我一份他的自传，叫我去看看，了解一下他的人生经历。我对他的人生经历是有所了解，只不过对所谓民主的实现方式，与他存在一定的思想分歧。

又过了几天，我带着黄宇再次来到许先生家，把摄像机什么都调整好了，开始了采访，这一次，先生说虽然我思想糊涂，像一个小奴才，但书写得还不错。我估计他看了我的书的前面几页了。说完他就笑了。我也变得轻松了一些。于是开始了接下去的访谈。

我们谈到最后，我开始问一个问题，我说他是不是对现在的年轻人觉得绝望。许先生又很生气，骂了我一句，说怎么会绝望？我对年轻人没有绝望……他说了很多，总之我已经知道，他不会绝望。这个时候冬天的下午，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嘴角微微抖动，显得很无力很激动。

我说我也只是随便问问。我知道在我面前的人，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他的喜怒哀乐现在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正如现在已经没有警察把着他的门，他对当代年轻人的影响已经式微，我甚至已经知道，他在这个书斋里所研究的民主的理论与被告义，民主的思想发展与潮流演进，最终都只能是书斋里的呐喊，在这个无意义的荒凉的时代成为一种泣血的悲鸣。我感到一种行将就木的悲凉，我不知道我这个 500 人的爱因斯坦学校能不能继承他的事业与想象，这个老先生的家的对面，就是繁华的海龙大厦，那里有很多电子商贩，技术革命的浪潮已经把这个时代带进了后现代思想。那些民主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显得那么可笑。

当然我无法笑出来，我看出时代是反讽的，我身边的许先生多少有点落寞，我知道等我告辞以后，我要面临的是自己的生活，而非祖国的命运。

于是，我起身告退，我知道那天我所进入的房间，是方励之们当年进入的房间，这些谈话古老而且深远，穿越了时空。我无法清楚我到底想从许先生那里求证什么，我同样无力改变任何东西，许先生起身，把我送到电梯门口，眼神中充满了一个老者的无奈与慈祥……

（2013 年 01 月 29 日相对论吧）

记忆许良英先生

顾以忠

阅读了 3 月 5 日《今日临海》，获知许良英先生已于 1 月 28 日在北京辞世，享年 93 岁。对许良英先生的去世，我深表沉痛的哀悼。

许良英先生不应该走得静悄悄的。3 月 5 日《今日临海》第 3 版上有两篇文章介绍

许先生。一篇是《一个“农民”的爱因斯坦编译工程》，材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另一篇是《记忆许良英》，材料摘自文汇报读书周刊。另外还配发了两幅图像，遗像下面有简要的文字介绍：许良英（1920~2013.1.28），男，浙江临海市张家渡镇张家渡村人。中国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主要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研究员，著名科学家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52年任《科学通报》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到地方接受劳动改造，回故乡当了20年农民。在此期间，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恢复公职，回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恢复工作后，主编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2008年获美国物理学会“安德烈·萨哈洛夫奖”。

许良英先生走了，在他辞世一个多月后，《今日临海》用一个版面报道介绍了他，算是临海对许良英先生的纪念。如果允许我大胆的猜测，我想许良英先生的去世，在北京，在香港，在美国……带给人们的震动，会比临海大得多。

我和许良英先生从未见过面，应该是不认识的。但我读过他的文章，并且机缘巧合地读到他的亲笔信和他的写作原稿，在字里行间让我感受到许良英先生有崇高的品德和伟大的精神。因而，我尊敬他，钦佩他。

大概是文革期间的1972年吧，在全国发起读马列著作的读书运动，中央列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著作作为必读书，为配合读书运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联合组织专家，对六本马列著作做详细的注解，以供人们阅读参考。那年春节，我在张家渡村岳母家过年。一天，我妻子拿过来一摞文稿，说是同村的许良英先生写的，让我看看，提提意见。我接过来一看，洋洋洒洒上万字，内容是对两报一刊为六本马列著作注解的质疑。我看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我哪看得懂啊！很快地我就让妻子把文稿送还给许先生。这样，我才第一次知道许良英先生其人，也是第一次读到许良英先生的文稿。妻子还告诉我，许良英先生原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57年被划为右派，被开除了公职，孤身一人回到老家当农民，与年迈的老母亲相依为命，住在破屋，真是可怜。许良英先生劳动不惜力，思想好，送钱送粮票给有困难的贫苦农民。听了妻子的介绍后，我感慨万千，心潮翻滚，有说不出的苦味在心头。许良英先生的这篇质疑两报一刊的稿子，有没有寄出去，我不得而知。

想当年，我国处于指鹿为马的政治黑暗时代，许良英先生是个右派分子身份的农民，竟敢对当时思想界大权威两报一刊出的文章质疑，提不同意见。真是太大了，你不要命啦！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才能无畏。自身处境是那样的艰难，还在为追求真理而奋争着。这，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呢！

1988年，我还在城西中学高中部工作。是年五月份，我在校长室收到许良英先生寄给校长的亲笔信，还记得大致内容说，城西中学教师×××、×××写了一篇关于许良英的报道文章，登在《台州日报》×月×日第×版上，颇有吹捧之嫌，不实之处有五，需更正。更正处已告《台州日报》编辑部，希望学校领导批评教育这两位教师，要实事求是，不能凭空捏造，夸大其辞。读了许良英先生的信，我顿时心生敬仰，一个凛然正气的高大形象印进我的脑海中。无独有偶，在今年3月5日《今日临海》第3版《一个“农民”的爱因斯坦编译工程》文章里，又让我看到了情节相同的故事。文章里写许良英先生1978年恢复公职后，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完稿后计划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于是1978年3月新华社向海内外发布消息，说《文集》的编译工作“是由中国著名的物

理学家许良英主持”，许良英回应：我感到恶心。还去信更正说：“本人既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我不过是一个农民”。啊，许良英先生是多么正直和纯洁啊，他容不得半点的虚假和粉饰。一般人都是乐意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吹捧的，而吹捧名人是多么平常的事啊，可许良英先生却绝不让吹捧之恶习发生在他的身上。许良英先生追求的是真实，完全的真实。这也许是专家研究科学的基本原则，也是许良英先生为人处世的信条吧！

许良英先生是老革命，这我在杭二中工作期间曾翻阅过有关的档案，得知许良英先生解放前是浙江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今天阅读报纸，知道许良英先生是著名的科学史家，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三卷，并写下了9万字的编译后记，还写成了一部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许良英先生成就了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啊！

许良英先生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是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许良英先生是一座碑！我要高声赞美：男儿性刚烈，丈夫气概豪。儒雅书生气，农民耿直憨。

许先生，您走好！谨以上文表达我的敬意。

2013年6月1日

《临海退教协通讯》，2013年3月号

一世坎坷求知求真

——悼许良英先生

鹤砚

2013年1月31日，弘毅读书会的朋友一再给我留言，希望我能去参加2月2日下午在柘木汇召开的物理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许良英先生的追思会。

恕我孤陋，在此之前，我竟从未听说有许良英其人。于是开始搜索他的生平与思想。如果网络可靠，我是会被他的精神思想所震撼；但无论如何，网络总比官方新闻可靠一些，所以我对他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但并非一条死啃书本的书虫。在抗战烽火中，日寇18架飞机在浙大校舍投下118枚炸弹，这118颗炸弹也掀起他内心万丈狂澜。他于是决心走出物理理论的世外桃源，经历一次彻彻底底的革命……

他最爱的是物理，但他更爱国家，可悲的是这个国家并不爱他。在经历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之后，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奉为真理的他却莫名其妙地自食其果，成为专政的对象。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他也不例外地中了“阳谋”的圈套，成为科学界首批右派，被下放到冰天雪地的东北边疆劳动改造¹³⁰；妻子由于日夜哀恸，腹中的孩子不幸流产。

长夜漫漫，唯有靠爱因斯坦的灵光照亮自己。他回家当了农民，排除万难译介了《物理学的基础》、《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现代科学及其哲学》……

¹³⁰ 许被要求去东北，但并未去。编者注

困顿的生活中，他的恩师，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化名“王京”每月给他汇来三十元钱，这每月的三十元，保证了他在地狱的深渊还能抓住科学这根救命稻草。

那是一个“罢黜百家，独尊毛著”的时代，他的译著一直未能顺利出版，而文革厄运又降到他头上。因为地下党的“光荣经历”，他被指控为“特务”而被捕入狱。在挨了三次批斗之后，又被通知要参加万人批斗大会，而且要把他五花大绑，并要求他双膝下跪。

士可杀不可辱。他终于忍无可忍，喝下了整整两瓶敌敌畏，公然反抗这粗暴野蛮、没有人道的摧残。算他命大，经过整整 12 个小时的抢救，他又从鬼门关中闯了过来。

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事实往往是：福未到来，波折又起。

1969 年 11 月，有人找他借译稿，说是中央文革小组要开始批判爱因斯坦。他身兼右派和“特务”双重身份，却无所顾忌地说，爱因斯坦是批不倒的，倒的只可能是我国的国际形象。

铁骨铮铮，可见一斑！

许良英先生从小就是爱因斯坦的铁杆粉丝，到晚年更像是被爱因斯坦附了体一般。他不仅仅痴迷于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更痴迷于一代巨星的民主自由思想。“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经历生死磨难之后，爱因斯坦的这段名言就化为热血在他老迈的血管里日夜沸腾。1986 年他与朋友发起“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历史讨论会”，认为该把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引起热烈反响。1989 年 2 月他与 42 个著名知识分子联名上书，要求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实现民主，杜绝腐败；保证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释放一切因思想、言论被判刑或劳教者。1994 年他又和邵燕祥、张抗抗等 7 个知识分子发表《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一文，并因此被软禁在家中。1995 年 5 月，为迎接国际宽容年，他又联合 45 名知识分子发起“宽容呼吁”，主要意见有：

(1) 以宽容精神对待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各种见解，不再把有独立见解的人当作“敌对分子”，加以压制打击、监视、软禁、甚至拘捕。

(2)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并释放尚在狱中的有关人员。

(3) 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果敢地结束我国自古以来文字狱这一不光彩的传统。

在生命的最后 20 年，许先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写了很多文章，为民主、科学、自由高声呐喊，无论遇到什么打击，始终高昂头颅，坚持独立的批判精神。“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艾青的名言。不是不想安度晚年，不是不知道说真话的代价，只是不舍这五千年的古国文明，不舍这 960 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他才拖着老迈的病腿为中国下一代人的光明前途日夜奔走，才排万难冒百死，求真相，说真话，做真人……

恕我愚昧，我很幼稚地认为大家都是为了国家的光明与人民的幸福，这跟我们政府的执政方针并无冲突，那么，赤胆忠心的许先生为何一世坎坷，屡遭打击？就因为许先

生屡屡触及体制的弊端？

近来常有高官落马，人人拍手称快。但我们把一两只肥鸭子赶下台，肯定会有更多瘦鸭子来填补这空缺，最后这些瘦鸭子也必定要吃成一只只大肥鸭。不去挖掘腐败的根源，而以腐败为借口，掩饰体制上的缺陷，反腐的结果无非是多养肥几只鸭子而已。

换汤不换药，是国家不得进步的根源；而欺骗撒谎，以及对先驱者的一向的打击报复，更是致使历史屡屡倒退的巨大毒瘤。

我又想起了乐清籍诗人周素子，她家7口人，却戴了11顶帽子，也由于不合作，不唱赞歌，而且不停地揭露真相，至今滞留新西兰不得归国。可怜她字里行间全是西湖山水，全是乐清老屋；在新西兰生活了几十年，始终不肯学习英语，因为她对方块字爱入骨髓，她说英语那能叫语言文字吗，像蚯蚓一样，什么玩意儿……

还有多少像她一样把祖国爱到骨头里的炎黄子孙，却被亲爱的祖国拒之门外呢？

有人就喜欢自欺欺人，比如《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皇帝。许先生虽然活了90多岁，但脾气更像那个孩子，一心一意要喊出真相。年过古稀的周素子也一样。至于那孩子的结局如何，安徒生是不敢写的，因为童话是写给孩子看的，不能太血腥。而现实永远不是童话，它就像那个一丝不挂的皇帝，赤裸裸，丑陋不堪。

我想，什么“最”“永远”“万岁”之类的话，就属于皇帝身上自欺欺人的新装，只能让人浮想联翩。对“新装”下丑陋的躯体，我们如果能主动摘去这些自编的神话，这些虚假的光环，那就真的是“正确伟大光荣”之举了。自己主动摘，与被别人摘掉，结果肯定不一样。

我又想，如果天安门城楼前的形象照如果能一年一换，或一月一换，让历史上为国家做过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或当今感动中国的“最美”人物等“轮番上阵”，那么，即使我们不发一言，世界人民也知道我们已开始迈向民主了。因为他们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这个国家真正属于人民，而不是某一个人。

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说到底我不懂政治，也不知这是不是犯了天条。

但是，感谢当今的中国，还有说话的地方！

谨以此追悼许良英先生！

（2003-02-02 温州博客网个人主页）

追思许良英：大雪无痕觅仙踪

年大六

踽踽独行在北京郊野一条大河空旷的河滩上，但思绪断断片片，纷纷扬扬

万籁俱寂。惟有伴随着脚步轻微作响的冰雪破碎声。走了一段，蓦然回首：新踩出

的足迹已经淹没在大雪中。

前些日子刚接到学界一友人告知许良英先生仙逝的消息时，我正巧在细读许老十年前的力作——《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万言长文，因设想撰写一篇题为《许良英与〈经济学周报〉在 1989》的文章——这倒不是因为已经得知许老病危住院；说实话，尽管同居京城，因为处境特殊，早已习惯于独来独往，相当孤陋寡闻；之所以有此设想，是因为觉得有关史实很有价值，无论如何不该埋没。

九十年代中期，因为辗转传阅王若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复印件结识的一位哲学界朋友，去年十一月来看望我时，我还曾想有机会一起拜会许老……

据网上资讯，去年底，许老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爱侣去世后，已经住院的许老从此一言不发……

还有，搜集研读有关史料时，发现许老《〈未完成的涅槃〉读后感》是一篇价值无可替代的佳作。篇末注明“于九三年大雪中”。部分重要内容是同一年我出狱不久和许老原籍一友人赴京拜会他时已经概略谈到的，有关详情，容当后叙。

前事历历。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往来古今，人事代谢。许老没有留下遗言。从网上信息看，并非因为不可能。也许，许老以此表示他已经无话可说？！

揣摩许老最后的心境，我想起自己去年写的一首小诗：

春天的阳光不再温暖，
鬓发已经覆盖冰霜。
夏日的晚霞不再迷人，
爱人的名字闪烁在墓碑上。
秋天的果实不再甜蜜，
夭折的青涩留下多少惆怅！
只有冬天的大雪令我神往：
愿纯净的良知洁白地埋葬。

前事历历。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往来古今，人事代谢。许老没有留下遗言。

大雪无痕觅仙踪。

雾霾罩地漫天。鸟飞绝。人踪灭。寒江飞雪：“逝者如斯夫”。

附笔：

文中说设想撰写一篇题为《许良英与〈经济学周报〉在 1989》的文章，是近来忆起 1993 年秋冬之间拜访许良英夫妇产生的想法。

当时许老原籍一友人赴京拜会他，恰逢我一同赴京，我因被当局视为北京工自联幕后一个“长胡子的黑手”（其实，如同前年海外明镜出版社出的曾任北京工自联法律顾问和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的宪法学博士李进进著《从广场到秦城》一书附件 6 记述，当时我赴京“本是应《光明日报》一位编辑之约”修改一篇政治学论文，后来因采访工自

联“卷入”运动，比如“在历史博物馆门前组织了一个民主讨论会”；“通过这个民主讨论会，他于是又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的通信组织”，并化名“潘霓”，留在工自联做了特约评论员)；为此于1989年7月被拘禁，1992年4月被控“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且“罪行重大”，虽有救护一名戒严部队少校军官的“立功表现”，仍判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因为本人户籍在浙江省，1992年6月由北京秦城监狱移押位于杭州市临平的浙江第四监狱，翌年7月刑满释放；10月到11月间，到北京和原籍山西省阳泉市探亲访友。在京期间，拜访了一些学术单位和包括许良英老在内的若干学界知名人士。

那位友人提醒，许老夫妇处在监控中，但见面后许老听了友人介绍我的基本情况后，还是很感兴趣地询问了工自联有关情况和背景。我也谈了出狱后想先了解一些情况，研究点问题的打算。许老针对我的想法，谈了若干显然深思熟虑的意见和主张，后来我发现已经见诸文字，在京部分学人中一度流传的许良英：《<未完成的涅槃>读后感》一文中不少内容的雏形在跟我的谈话中已经形成。全文附后，显然比凭借个人回忆整理要权威。

许老关切地问到我个人的经济生活出路，我说已经“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只有自谋出路，自食其力。

他拿了装在信封里的几百马克执意送我，说是关心中国大陆持不同政见者人权的德国友人的一点心意。推辞不过，只好接受。当场分给许老那位老乡一半，托他转交浙江有关困难人士。其余一半，我随后回原籍探亲时，买了东西送给当时尚在狱中的几名因风波中表现获罪的良心犯家属（其中一名一只眼睛已在狱中失明，还有一名正病重住院）。

这次拜见值得记述的有关情况今后再整理吧。

2013年2月7日黎明 于北京某区出租屋，时在雪霁严寒中

真诚、耿直、无畏的典范

——回忆许良英先生二、三事

邓焕武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笔者有幸熟识了两位从体制内历史地裂变出来的精英斗士——林牧先生与许良英先生。且与他们一起奋斗过，并结下了终生难息的战斗友情。

说起许良英先生，自然亦等于是说起他的夫人——王来棣先生；他们夫妇二人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外表各异，内在相同。即：二人的个性风格虽有差异，但是，其人格品德一样比金子闪光。良英先生是个真性情的典范人物；他有错，但他绝对没有假。良英先生是现实中真正的揭穿“皇帝新衣”的“孩童”。他到老仍然童心不灭，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笔者觉得，许良英先生是现实中，最可爱的老人之一；他的夫人——王来楛先生，亦然也。

大约在 1994 年左右，许良英先生听北京、天津朋友说起我的坎坷经历，使他感觉兴趣。于是许先生对之说：“下次见到邓焕武，把他带过来，我想见见他……”。就这样，这些朋友把这当作完成一项任务一样，记在心里。

之后有一次，我出差路过天津，吕洪来说起此事，并决意要陪同我一起去北京见许良英先生。说实话，起初良英先生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太好。事情是这样的——记不得是第一次或是第二次去见良英先生，我带去当时新撰的拙作《〈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读后感》油印本，开本上有党治国先生撰写的《序》；想请良英先生阅后，予以认真指导一下……。不想，他接过去翻开封面，看到党治国写的《序》，就颇为反感地批评说：“写什么序呀，吹吹捧捧的……”。恰当其时，我见许先生桌案上正摆放着包遵信先生回忆“六四”的文稿打印本——《……涅槃》什么的，记不清楚了；而许先生正在为其撰写的《序》的部分手稿，也摆放着。于是我心里笑着嘀咕：“别人写序是吹吹捧捧，那你怎么也写呢？……”

许先生确实像个无邪的孩子，他对我批评之后，已经发现我看到桌子上的文稿，并且猜到我心里想说什么；于是，许先生自己也笑了，但他当时就此未有再说什么。我亦立马转换了话题。当我不久再次去见良英先生时，他主动把话题转回来，十分坦诚地说：自从他在认知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本能地反感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架的文字；而王希哲的文章无疑是这种文字，所以他很不喜欢……。许先生大概为了鼓励我，故而接着说：“……小册子看了，你的文笔还是不差的”。

1995 年夏天，笔者受林牧先生之托，专程去北京议事（主要为响应联合国倡导的 1995 年国际宽容年联名上书），又几次去见良英先生。同以往一样，只要王师母在家，她总是坐在许先生一旁，微笑地听着，有时亦插话，慢声细语说着，但总是颇有见地。我觉得有缘认识这样可敬的同乡大姑，真的颇感高兴！

因为这次联名上书活动，我被重庆情治当局硬硬打成“重婚”罪名，被判 8 个月徒刑。1996 年 1 月刑满出狱后得知——由于许先生顾忌有人可能投机联名上书，故而除了王丹一人之外，其他草根人士名字，都被许先生一笔抹掉！于是，这次联名上书被搞得三不四——既不是科技界教育界人士的，亦不是各界人士的……。这同林牧先生和我们原本设想的各界公民上书不相吻合！……

对此笔者认为，这同许先生无意中的精英意识有关。其结果，被搞成堪似“贵族民运”作派似的！其负面影响已显而易见——公民在民主运动中，竟然被分为不同等级，这可是何等荒谬绝伦的现象！就此，数年后当我再次去见良英先生时，坦陈了自己的意见。于是，他若有所思地沉默不语。我知道，这时良英先生已在反省思考中，但还需要时间。恰好，这次师母不在家。为了乘热打铁，也为了转换话题，我再一次提起刘晓波：“近期来，刘晓波写了不少文章，而且，有些文章的确写得好……”。这时，见良英先生表情平和，不再像上次那样激烈反感，就接着说：“刘晓波实际上已经是领军人物……”。

但许老这时打断我的话，他说：“这种人我无法看好，他改不了的！……”。对此，我当时也再次表达了己见：“对人，不好看死了吧！……”。但是，从排郭事件以来的一连串实践，无情地确证了许良英先生在识人上的金睛火眼！对此，笔者不能不诚服呀！

笔者最后一次看望良英先生，是在 2005 年。我和严正学君一起去的。因为他们二人是台州同乡，其间不免说起一些故乡的人物风情。许先生当时说起话来很具兴趣，像个孩子似的。因此师母笑着说：“你们看，他说起故乡的人事，就特来劲了……”。良英先生听了，仍然一个劲地呵呵笑着……。

临别时，良英先生赠送我们每人一本《爱因斯坦文集》。

2013 年 2 月 7 日于温州鹿城居（博讯：自由发稿区）

自由精神的启蒙者

许成钢 许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妻子王来棣（见本刊 2013 年第 4 期《历史真相的寻踪者》）因癌症去世的当天，住在同一间医院的许良英在因脑溢血术后感染昏迷不醒十余天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4 周后，2013 年 1 月 28 日，许良英因医治无效去世，走完了他 93 年跌宕起伏的一生。

许良英 1920 年 5 月 3 日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市张家渡村。父亲在他五岁时去世。许良英跟随母亲生活，年少时通过阅读对爱迪生、法拉第等科学家产生兴趣，植下科学救国的理想。中学时代，他读到爱因斯坦的著作，自此成为爱因斯坦的终身追随者——学术的和思想的。抗日战争期间，许良英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因显露物理方面才华，深得国际知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的欣赏。与此同时，面对社会黑暗，他的心逐渐从科学转向了反专制、求自由的政治活动。他曾参与竺可桢领导的“文军西征”，沿途所见劳苦大众日常生活，感触极深，遂为共产党人的平等正义承诺而感召。1942 年毕业时，为了寻找共产党，他婉拒王淦昌要他留校任教的邀请，离开了浙大，急得爱才心切的王淦昌登报寻他。

1945 年他返回浙大物理系任教，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任中共浙江大学支部书记。在轰动全国的“于子三事件”（于子三为当时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47 年被捕被国民党在狱中秘密杀害）中，以许良英为首的浙大地下党发起了浙大学生罢课、教授罢教等行动，引爆了“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暴行、反对屠杀青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遍及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这是 1949 年以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7 年，他任中共杭州市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学区委书记，49 年 3 月任杭州市委青委委员兼大专区委书记。1949 年 5 月杭州解放后，任杭州市青委学生部部长，与时任组织部部长的乔石同事。

1952年许良英被调入中国科学院，担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并在组建中科院的专家队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方然的入党介绍人，许良英被停职审查一年。这是他第一次受到政治冲击。

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创建，他与于光远共同担任负责人，期待在中国建立科学哲学体系。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6月13日，许良英以党员身份在党内会议上明确反对《人民日报》6月8日批判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文章。从此到处活动，游说，公开反对“反右”运动。因此他被打为中科院第一“右派”。声讨其“罪责”的文章刊登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的显著位置。因抗拒强迫劳改的处置，他被开除公职，被迫回到老家农村劳动改造，从此一去20年。劳改期间，在于光远、王淦昌及科学院一些领导人（如秦力生）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以一个“右派”（后为“摘帽右派”）农民的身份发起、规划、组织，并在后期克服“文革”的巨大困难，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编译者还包括范岱年、赵中立和张宣三）。“文革”刚结束，文集获得首次出版，是当时世界上文字最完整的爱因斯坦文集。这使得爱因斯坦的科学、民主精神影响了中国几代人。晚年许良英北京的寓所中一直悬挂着爱因斯坦的肖像，照片下的题词写着：伟大的心灵总是遭遇来自平庸者的强烈反对。曾多次访问许良英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古德曼说，这句话也是刻画许良英的最好的写照。

1974年，由于爱因斯坦文集工作的需要，许良英曾短暂逗留北京。他目睹了“批林批孔”运动的疯狂状况，清醒认识到“文革”的真相，并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问题。他自称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科学和民主口号需要重提，中国仍需启蒙。

1978年许良英获得平反，重返中国科学院。他主持编写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被金克木先生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与钱三强等科学家一道为政治局授课，讲解世界近代科技史和科技政策，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听课者包括时任总书记胡耀邦。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许良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深刻指出“新权威主义”之危害、最早阐释民主和人权基本原则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民主和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经济发展绝不是全部目的。同时，他强调宽容是维护人权的基本原则，通向民主的道路只能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启蒙。

许良英一生最后20年里最重要的工作是与夫人王来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合著《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以推动中国民主、人权的启蒙运动。此书除法国部分未完成外，整体已经完成，只待出版。他与王来棣合作的《从“专制的对立面”的争论看民主启蒙的艰巨》和他个人的《走出伪民主误区》（分别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12期、2011年10期）是他们生前发表的最后两篇有影响力的作品。许良英在推动中国民主、人权、政治改革方面的巨大贡献得到国际科学界的公认。为表彰他的贡献，1995年5月，纽约科学院授予他“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2008年4月，美国物理学会授予他“萨哈罗夫人权奖”。

许良英正直善良，勇敢顽强，疾恶如仇，生活俭朴，毕生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和民主。他的逝世是中国科学与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

2013年1月30日下午3时许良英遗体告别式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遗体捐献中心举行。遵其与夫人相同的遗愿，他的遗体也捐献给医学事业。

（原载财新网《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5期，这里做了少量修改）

做人——做学问，人生观——世界观

许成钢

“非凡的人总要遭到平庸小人的疯狂反对。”

—— 爱因斯坦

做人正直勇敢，顽强善良，以及对社会黑暗丑恶势力的疾恶如仇，是自幼父亲对我教育的最重要的部分。在我刚刚能够听懂故事的时候，最早听到的是父亲讲的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半夜鸡叫》以及《水浒》里面的“李逵探母”等。当时父亲在东厂胡同二号家里给我讲这些故事的许多情景片断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面对父亲讲述的连环画画面，我常被感动得潸然泪下。父亲教我做诚实坦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孩子；教我的英雄是李逵式的直勇搏击的战士。父亲给我的童年教育里，除了漠视甚至鄙视名利之外，不存在任何与功名、财富和地位相关的内容。这一“过于”强调诚实和正直并且漠视功名的非孔孟之道的“片面”教育使我一生很难“适应”现实社会，甚至时常感到处处格格不入。

记得在幼儿园时期，有一次在家里见到父母解放初期身穿干部制服的照片，误以为是军装，到幼儿园向小朋友吹牛说我爸过去是解放军（科学院幼儿园的小朋友里几乎没有任何人的家长是军人）。结果好奇的小朋友到家里询问，被当面揭穿。父亲极其严肃地教育了我必须诚实的道理。虽然多少有些委屈，但诚实做人的基本准则却铭刻在心。

对世界对自然的好奇探索和理解，也是自幼父亲对我启发引导和教育的重要部分。直到自己从事研究工作之后，我才真正理解，对世界的真挚的好奇心与做人的正直，是作为一个学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在我童年生活的记忆里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幕是父亲带我参观刚建成的北京天文馆。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面对令我眼花缭乱的宇宙和地球模型及观测仪器，父亲给我讲解宇宙的奥妙带来的巨大的兴奋。利用北京天文馆的宇宙及地球模型，父亲向我解释大地是个球，地球与太阳、月亮的关系，日食与月食的现象与原因，太阳系的结构。并向我解释天文馆大厅正中悬挂的巨大的“傅科摆”如何能证明地球的自转。虽然对此道理的真正理解是以后的事，但每当我见到“傅科摆”时，尤其是在北京天文馆，我都会回想起那一幕。父亲也领我看过位于建国门的古观象台，讲解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测天象的方法。

稍晚些，父亲反复给我讲述在黑暗的中世纪，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为真理而惨遭迫害并为之献身的故事。那些故事自幼铭刻在我心里，其深刻含义至今仍然让我思索不止。在事实面前，在科学面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人的理论是天经地义不可挑战的。而揭示真理时常会同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冲突，古今中外追求真理都要付出代价。特别是在专制的社会里，真理遭到权贵利益集团的扼杀，愚昧产生于对言论的封锁，产生于权贵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追求真理经常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这种代价使得不畏暴政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寥若晨星。最让我骄傲的是，父亲是这寥寥晨星之一。

记得在幼儿园年代，一次乘车，有人给母亲让座。我很不解，问父亲为什么。父亲告诉我妈妈要生宝宝了。那时所居住的东厂胡同2号是科学院的宿舍。院子里的“大人”都是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或干部，孩子们即便不是幼儿园同学也是整天玩耍在一起，甚为和谐。但是从某一天起，我感到一些年龄稍大的孩子变得态度异常冷漠甚至敌意。有人直率地说，你爸爸是右派。虽然“右派”一词闻所未闻，但从小朋友无端的敌意中已经可以猜到几分。那天晚上我问父亲，“他们说你是右派。是吗？”“什么是右派？”他说我还太小，长大以后会明白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成年以后，吴敬琏教授曾经向我提起那天目击科学院全院大会批判“大右派”的父亲的情景。在批判会后他同父亲乘同一辆卡车从中关村回东城。

从那天又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到家里同母亲谈话，态度非常严厉，母亲一直在哭泣。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母亲哭，感到十分惶恐。成年后才知道，在那段时期，党组织要求母亲把父亲赶出家门，迫使其顺从党给他的处分去东北劳改。母亲无法执行这一“任务”，而且深感她曾以性命为之奋斗、对其极其忠诚的党极其不公正，使她无法理解，无法接受。这使她极度悲愤，导致我的妹妹也随着母亲的过度悲哀而胎死腹中。此后因为“包庇”父亲的“右派言行”母亲受到严厉处分。

不久父亲被迫孤身离家回浙江老家务农，接受“改造”。没有人知道这一去何时再归。他没有机会见到我进入小学的那天，更从来没见过我作为中学生的样子。自从父亲离家直到我成年，我只在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时同父亲短暂见过面，但每次都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1961年父亲第一次回北京时，我已经小学三年级。那年初春的一天，父亲突然回到家里。见到父亲的喜悦之外，他那补丁摞补丁的花子服也让我惊讶与伤心。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他的衣服堪与现在存放在父母家中的他1978年从农村带回的褴褛衣衫相媲美（见图）。当时正值全国的“困难时期”，即由“大跃进”引发的全国大饥荒时期。全国穷困，千百万人饿毙。消息封锁，文字狱盛行。在北京念小学的我，除了时常“吃糠咽菜”感受饥饿外，对京城之外发生的灾难一无所知。

作为一个曾经被划为右派的农民，他的境遇远比其他人困难得多。虽然衣衫褴褛，一贫如洗，饱受歧视，父亲表现出的乐观和信心却超过我所见过的所有的人。尽管被党列为敌人，那时的他仍然以全部热情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党的路线，忠于毛泽

东，并以此教育我。此后十多年醒悟之后，我们全家都“嘲笑”他当年的愚忠。我记得那时他称自己是像李双双一样的农民（李双双是当时流行电影《李双双》中的女主角，是个大公无私维护集体利益的人民公社社员）。每当谈起他美丽的家乡——浙江临海张家渡村，就兴奋不已。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家乡之风景如画，那清澈见底涓涓流淌的溪水，象鼻岩之美不让桂林山水等等。他对家乡优美景色的描述，从我儿时开始，一直讲述到如今耄耋之年时，还是眷恋依旧，希望有朝一日能乘高速列车重返家乡再次欣赏家乡如画的美景。

1963年我五年级时，父亲第二次回北京。这也是我在成年之前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那年他回来的原因是为了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前身《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他虽然极其穷困，却为筹备此项工作兴奋不已。在短暂的父子团圆的日子里，他向我谈起爱因斯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爱因斯坦”这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的名字。父亲用最深入浅出方式向我解释爱因斯坦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伟大贡献。他重新提起我在幼儿园时曾经问过他的一些物理问题，诸如：为什么汽车开动时人会向后倒、刹车时又会向前倒？为什么汽车开动时窗外的东西会往后跑？等等。父亲简单地做了些解释后说，待我长大后才能进一步解释。在重新提起这些问题时，他深入浅出地提到了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的故事是我自幼就听他讲起的。虽然只是朦朦胧胧，类似这种关于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的许多启蒙性科学史的讲解，让我潜移默化地体会到实证观察与科学理论发展的紧密关系。

父亲除了讲科学以外，也大量的讲“革命”。那是个“革命”的年代，那时的他，虽然被党整肃，但对残酷整肃他的政治体制仍然并没有清醒认识，对反右的阴谋与阳谋仍然不能识破，内心仍然是个忠诚于党的革命战士。他诚心诚意地承认自己反对反右运动的错误。父亲曾送给我一本小说《红岩》，书中有许多他的批注。他多次向我讲述与这本书的主题内容相关的他自己地下党时期的经历，以及到重庆寻找共产党的经历，包括浙江大学地下党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于子三事件（从我懂事起，家里的墙上就一直张贴着于子三的肖像）。于子三是当时浙大的一名进步学生，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他与地下党有联系，但并不是党员。1947年10月于子三被秘密逮捕，后被杀害在浙江保安司令部监狱。由此爆发了反迫害争自由的全国性学生运动。当时父亲是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

1963年父亲回来时，带我走访了许多他过去在地下党时期，以及在科学院工作时的朋友和同事，例如李晨，吕东明，赵中立等。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同革命、国家，以及学术息息相关的，而不是家庭问题，或一般的人事关系……。这一切对我当时来说，虽然似懂非懂，但觉得很新鲜也很刺激。

那段与父亲的接触，时间虽然短暂，但他的谈吐，使我感受到了很多同龄人感受不到的新鲜内容。当年我在香山慈幼院读小学。同学大多是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在此背景下，同学中流行对家长官职和工资级别以及家庭财富程度方面的攀比之风。父亲回京时，我向他提到同学之间的这种攀比风气。父亲对此表示大不以为然，全然冷漠。那时我心里感到，父亲一定是我们全班同学所有家长中最穷的，但却是最有学问的，也

一定是最革命的。

父亲在京的短暂访问很快就结束了。我记得那天和母亲、弟弟一起送别父亲的那一幕，我们送他到家附近的灯市口无轨电车站，从那里他乘车前往北京火车站。他用扁担挑着从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与科学院图书馆借来的大量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献。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打那时分开后，一别就是12年。那时作为一个农民，父亲居然能在北京图书馆借到如此大量的图书，当时的我未觉诧异，以后想起来觉得这真是奇迹。后来才知道，当时父亲的这项工作是属于中共高层所下达的任务。

父亲回到浙江农村以后，我和他的往来只限于通信。他给我寄来过多卷的《十万个为什么？》，书中他写了许多批注，绝大部分批注都是指出书中的各种逻辑错误和事实错误。他这种指出流行书籍中逻辑错误与事实错误的做法，对我少年时期的思想影响非常大，使我自幼的心灵里种下了重逻辑重事实不盲从的种子。在那个时代，凡是印在书上的就是正确的，而从那时起“唯书为上，唯铅字为准”的崇尚潮流在我心里已经开始动摇。当然，面对毛泽东和政治体制的独立思考独立批判的能力，则是在很多年后，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后才获得的。

在我读初中一年级时，父亲给我寄来了他用笔名“林因”发表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之所以用笔名，是因为被划为右派后，他被禁止用真名发表论文。当我收到这篇论文时，异常兴奋。虽然并不能真地看懂，但懵懵懂懂地读了很多遍，有些命题留下深刻印象，由此激发的对科学和哲学的热情和兴趣对我以后的思想的发展意义深远。我与个别谈得来的同学讨论这篇论文。当时我们班里有一两位同学读书较广，涉猎很多历史、哲学与物理的入门知识。在那个以革命压制知识、以热血掩盖愚昧的年代，居然还有人知道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但是没有同学能读懂这篇论文。从那时起，我开始自学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当时国内大学普遍使用的哲学教科书。我在自学这本大学哲学教科书时，很自以为得意，觉得自己很超前（以为自己一个初一学生可以读懂大学的哲学教科书）。碰到一些阅读困难或想不通的命题，如否定之否定规律等，在与父亲的通信中试图向父亲请教。可是，没有想到父亲回信中对这本当时流行的大学教科书，以及一些流行的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评的核心是关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基本关系问题。他认为哲学是科学的工具，不可君临科学之上发号施令。哲学可以为科学探索开路，但不可为科学堵路。

从那时起，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通过通信和交谈，父亲多次同我讨论与世界观问题相关的基本问题：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数学与科学的关系；逻辑与实证的关系；关于科学的起源；关于科学同希腊哲学在根本上的差别；关于科学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关于数学是人工的逻辑结构，哲学也是人工的逻辑结构，它们关心的是逻辑的一致性；而科学关心的是外在世界，和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所以它一定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关于哲学对科学的可能的启发意义；关于哲学并不能够从普遍意义上指导科学；等等。从我读初中一年级时起，我就记得父亲讲解的这些基本道理，持续至今。这对我思想里形成的对世界的基本的认识有重大影响。实际上，这些基本认识至今都对我的研究与教学有着实质性的基本影响。譬如：如何认识经济科学？如何认识理论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关系？

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概念混乱，以致对经济学的发展和教学造成严重的恶果。之所以说是“严重恶果”，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到底是数学还是科学，概念混乱。结果把经济学变成了像数学一样，起点是公理（假设），其终点是逻辑的证明；判断的标准是逻辑证明的优美。但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它的起点必须是观察，是实证的内容；其终点必须仍然是观察，是实证的验证。起点和终点之间的逻辑结构，是为了帮助人们更深刻地去认识事实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去组织人们的观察。

在我读初一和初二年级的那段时间里，与父亲有大量的通信往来，通信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一些基本哲学观点和有关革命的思想。这使我深受其影响，当然没可能与其“划清界限”。父亲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虔诚的愚忠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使我从一个极为顽皮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积极上进的学生。在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时，我变成了同学老师公认的学习优秀政治上积极上进的学生，被同学选为少先队副大队长。当时清华附中共青团分团委很希望我加入共青团，我自己也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共青团。但因不能与父亲划清界限遭到否决。我在二十多年后才得知这件事情的原委。那时清华附中分团委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上级机构是清华大学团委。分团委把我的入团材料报上大学团委，后者否决了我的入团申请及分团委的建议。原因是，清华大学党委和团委掌握了父亲在反右运动中的所谓“右派罪行”：为清华大学的右派（如物理系的何成钧教授等）鸣冤叫屈，攻击党的“反右运动”，说反右运动破坏了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等等，而我不能和父亲划清界限。

为与父亲划清界限，我曾经读过一些反右时主要报刊上批判父亲罪行的文章，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别的报纸。让我吃惊的是党报刊登的他的罪名，说他造谣说党中央分裂了，说刘少奇、彭真反对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让我同父亲划清界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父子感情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此外，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引起我内心产生强烈矛盾：一方面，自幼父亲对我的基本教育都是忠诚于共产党。基于父亲对我的一贯教育，我忠诚于共产党。但另一方面党要我同我的父亲划清界限。这一对矛盾在我心里非常尖锐。我同父亲的所有通信来往，以及有限的父子交谈，要么是做人要诚实；要么是要我忠于党，忠诚于革命事业；要么是有关科学和哲学的基本道理。我看不到什么是应该划清界限的地方，怎么划清界限。

1966年初夏，文化革命爆发。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成立以后，他们首先打击的对象之一就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干部或优秀学生。虽然年纪还小，我那时脑子里的愚忠已经相当深入。以为共产党毛主席发动的所有革命运动一定有深刻的为了解放全人类的道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革命；是毛主席亲自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推行血统论，尤其是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使得自己的头脑非常混乱，非常痛苦。认为这是毛主席发动的革命的基本内容，认为自己过去不能与父亲划清界限，意味着自己将成为革命对象……。于是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示与他断然划清界限。写这封信是我一生最让我自己感到耻辱的一件事。从此，我与父亲的通信往来中断了将近十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真正能够与父亲划清界限。事实上，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自己后来的一系列政治与思想上的活动、

行为及后果，都同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70年，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因从事探讨文化革命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自学研究活动被打成反革命时，每一次的批斗会和大多数批判我的大字报中，在我的罪名上都要提到我出身于反动家庭，父亲是个大右派等等，我的罪名总是与父亲是个大右派的背景形影不离。

在文革高潮时期，也就是1966年8月，在毛泽东发表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之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在全国最先张贴出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把刘少奇与彭罗陆杨联系在一起。当时我看了这些大字报感到非常诧异：怎么回事，毛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的革命对象怎么会与父亲当年的“右派言论”是一样的呢？当年也许父亲不但没有错，反而是有先见之明？这些问题都装在我的心里，除了极个别信得过的同学（文革时的红卫兵战友）外，从未敢与其他人提起过。无独有偶，多年以后，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在其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引用父亲当年的这些“罪行”作为其讨论文革起源主线的证据。但是父亲认为他当时的这些言论是听别人说的，自己并不相信，也不符事实。

大约在1974年，在中断多年通信后，第一次在黑龙江农村收到父亲从浙江农村寄来的信。当时我迫于监督劳动的条件以及对政治社会问题的颓丧情绪（我于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完全停止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转而把所有业余时间用于自学数学、物理学和电子工程，集中精力于控制方面的技术革新。父亲来信教导我应该坚持原来的志向，不可因受打击而放弃初衷。他还寄给我《康帕内拉（Campanella）传》，要我学习这位中世纪宗教迫害下永不屈服的战士。鼓励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鼓励我关心更宽广的问题，从社会到政治，从科学到历史。在我身陷逆境的时候，此书竟成了我与那时的恋人吕匡辉的一本重要的共同的读物。这些鼓励是我自从被打成反革命以后，恢复自信以及广泛兴趣的最重要的支持，是我的精神的转折点。父亲寄给我一些关于狭义相对论以及相关的科学史的书籍。那段自学给了我关于相对论的启蒙知识，对后来理解科学史及相关的科学哲学讨论非常重要。父亲鼓励我关注当时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运动。在此鼓励下，我得以部分重拾政治经济学兴趣。好在自从林彪毙命之后，我的“罪行”有所减轻，归还了部分被没收的书籍。虽因身陷囹圄与世隔绝，对当时政治运动的背景一无所知，面对当时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铺天盖地的声势，我感到其逻辑难以理解。对照《资本论》英文本（经恩格斯亲自译校），我发现官方（现在归咎于四人帮）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议论及批判违反马克思的原意，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存在基本概念问题。

1975年夏天，我同父亲时隔12年后第一次得以相见。那次相见于杭州的原因很特殊。1974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我的“反革命案件”下了正式“结论”，诬陷我在十几岁时曾组织过遍布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及军队的、目的在于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组织。父亲得知此情，强烈要求我设法寻找途径力争平反。尽管他的身份是农民，依然想方设法寻找他的朋友来帮助，全力以赴地做各方面的努力。此外，他当时非常迫切地希望能见到我的另一个特殊的原因直到见面后才知道。除了我的“反革命”平反问题外，他要同我谈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认识；第二，是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当然这两方面是联在一起的）；第三，就是对当时国家前途的深刻担

忧。在文革之前，虽然被打成右派，父亲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愚忠仍超出常人。父亲对毛泽东的迷信直至 1974 年才猛然醒悟；他开始醒悟文化革命是个大骗局，毛泽东是个大骗子，大暴君。他强烈希望我能够意识到：毛泽东发动、四人帮推动的文革对国家造成巨大的灾难；他对国家的前途深感极度的担忧。在文字狱盛行的恐怖年代，这些话都只能面谈。虽然对政治内幕细节知之不多，我在对待文革及许多相关问题上，在此之前就已经持相当批判态度。所以，我和父亲的看法一拍即合。

1976 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浩劫结束。父亲终于可以全时地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了。1978 年以前，父亲的身份仍然是个“农民工”：是农村户口的商务印书馆每月领取 50 元生活费的临时工。在经历了呕心沥血的十多年坎坷之后，1976 年深秋《爱因斯坦文集》终于即将出版。但四人帮的覆灭使父亲乐极生悲。他受了风寒，咳嗽不止，饭也吃不下。我陪他去医院门诊，查出右肺有阴影和空洞。下午商务印书馆通知父亲去看刚到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样书。在路上，父亲咳了血。第二天又咳了一茶杯。于是商务编辑陈兆福和我送父亲住进了北京结核病院，后又怀疑是肺癌。在那段期间，我几乎每天陪在他的病房。前往探视父亲的人络绎不绝，以为他要不久于人世。

万幸的是，医院对父亲的各种严重怀疑都被逐一排除。3 个月后，父亲回到商务印书馆做临时工，直到 1978 年回到中国科学院。父亲在商务印书馆除了着力《爱因斯坦文集》及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外，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每个礼拜组织一个小型讨论会（workshop），讨论爱因斯坦研究的文献。经常来参加讨论会的人员有赵中立、张宣三，方励之也来参加过几次。我每次都去旁听，甚至还报告过一些文献。记忆最深的内容是有关产生爱因斯坦早期成就的科学（理论和现象）和哲学的基础。与此相关，父亲建议我翻译几篇著名物理学史家霍尔顿（Gerald Holton）关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史以及科学哲学的论文。这些工作和讨论给我留下难忘印象。其中有些对我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例如，霍尔顿关于爱因斯坦与牛顿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对比，尤其是他们的共性；方励之关于“科学走进来，哲学退出去”的议论，等等。在那段时间里，黑龙江建设兵团时的挚友王贞平也来商务印书馆参加了几次爱因斯坦讨论会，并参加了一部分翻译霍尔顿科学论文的工作。最近，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回想起当年回京，向伯母说明你的情况，她凄然泪下。又去商务印书馆招待所见伯父，他身着农民黑棉袄，爽朗而乐观。而我目睹中国知识界精英蒙此不白之冤，则悲愤不已。”

我于 1984 年离开中国社科院去哈佛经济系做访问学者时，在哈佛拜见的第一个师长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父亲的朋友，物理系的霍尔顿教授；他也是在哈佛第一个邀请我赴家宴，第一个邀请我到乡间别墅与他家人小住度假的师长。难怪我的经济学思维里充满了与物理学历史和发现过程相关的内容。同霍尔顿教授的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更像是上帝为父亲同他的友谊而设。那是在 2008 年美国物理学会大会的颁奖仪式上。父亲与霍尔顿教授同时获奖：霍尔顿教授荣获 Pais 物理史奖，而我则代表父亲领取萨哈洛夫人权奖。

1986 年，父亲与方励之和刘宾雁在中关村家里小聚，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

讨论会”，共议和反思“反右运动”之教训，以防类似惨剧重演，祸害国家人民。不幸，这项计划被当局封杀，方励之和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同时被开除党籍的还有王若望，是当局把父亲误为王若望，使父亲得以暂时幸免。同时，深得民心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职。这是自从文革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与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的最严重的政治事件。

这个消息震惊了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文革以后的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在1987年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前，广大留学生普遍意气风发地认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朝着民主的方向缓慢前进，言论自由逐渐得到保障，反右运动之类的悲剧不会重现。却万万没想到胡耀邦本人会因为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著名知识分子重新遭受迫害。受此冲击，哈佛、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等学校的留学生分别独立自发发起组织起草公开信；以后合而为一，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发表了千人“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如今这千名签字的学者里，许多是国际、国内的学术带头人，或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国际机构之要员。我当时在哈佛经济系读博士，在深度担忧之中与其他忧国忧民的同学一起，亦为此尽了些绵薄之力。千人公开信中说，胡耀邦的去职“将极大地损伤全国人民进行改革与建设四化的积极性，使我们感到震惊和不安。”“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处置和批判，……使人感到这是打击知识分子、压制思想解放历史悲剧之重演。”“我们以为，近来事态的发展是与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的，并使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受到了严重侵犯。发展下去会断送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古今中外，专制、腐败和恫吓从来是促成社会不稳定的基本要素。不幸的是，1987年初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成了两年后的“六四”事件的前奏。历史悲剧以血腥的方式重演。

在1988至1989年期间，政治改革未见踪影，“新权威主义”却甚嚣尘上。鼓吹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宜提倡民主和人权，而必须走新权威主义之路，以新加坡为榜样；或者至少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曲线民主。当年鼓吹“新权威主义”者之中，居心叵测者有之，认识不清或心存幻想者更有人在。父亲从民主和人权的基本原则出发，旗帜鲜明地深刻指出“新权威主义”之危害。最具迷惑力的反对民主及鼓吹新权威主义的论点强调民主可能不利经济发展。对此，父亲强调过的最突出的要点之一是，民主和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经济发展既不能离开民主，也绝对不是改革发展的全部目的。父亲的这些要点同著名经济学家森（Amartya Sen，获1998年诺贝尔奖）以及科尔奈（Janos Kornai，对中国以及全世界转轨经济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所长期强调的民主和人权之见解完全一致。即，民主与人权不仅有其可能作为经济发展手段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 value），更重要的是其作为人的社会及发展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同时，父亲强调宽容为维护人权的基本原则，强调通向民主的道路只能是长期的思想启蒙；反对任何急于一蹴而就的过激行为，尤其反对任何以民主或人权为名义的秘密团体活动，使用阴谋或暴力手段。事过二十多年，“新权威主义”体制长期刻意压制民主与人权导致的后果现已昭然若揭，父亲对“新权威主义”的深刻批判不幸而言中。专制剥夺民权益发肆无忌惮，贪污腐败益发泛滥成灾，社会矛盾益发激化，违反民主法治的“维稳术”越维越不稳。虽然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体制内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问题，已经赫然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可否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即使只为了维持经济发展，新权

威主义体制也已是非改不可了。

忧国忧民，为推动政治民主化，1989年2月，父亲发起致赵紫阳总书记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42名著名学者签字，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多个中科院及社科院研究所的正副所长，院士，著名作家等。信中充分肯定十年改革的成就，同时指出因政治改革的缺失而导致的严重问题，尤其是腐败盛行。呼吁尽快尽力进行政治改革。纽约发行的《世界日报》评论说，“这封公开信在海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后来八九民运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在1989年4月开始的北京学生争民主反腐败运动期间，父亲努力向学生申述民主的基本原则；并以他有限的影响力，反对任何过激做法，力主学生停止绝食回到校园，以理智冷静争取民主，以思想启蒙为争取民主之长远道路等等。可是当时他的主张未被采纳。六四大屠杀之后，父亲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许多亲友强烈劝他离家避难，他毅然拒绝。在接受国外记者电话采访时，父亲在被窃听录音的电话中公开宣布，他随时准备被捕，愿为民主事业做一个谭嗣同，死而无悔。

父亲为民主所做的努力以及遭遇得到了国际学术界、新闻界及政界的关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古德曼教授（Merle Goldman）是其中之一。古德曼教授曾两次访问过父亲。在一次访问时，她注意到并默背了父亲书房墙上悬挂的爱因斯坦肖像下的一句爱因斯坦语录：“Great spirits have always found violent opposition from mediocrities（非凡的人总要遭到平庸小人的疯狂反对）。”她回到哈佛后，要我打长途电话回家，帮她确认这段语录的每一个字。她说这句话确切地描述了父亲的境界和遭遇，她要在她的著作里引用。她说，父亲是她心中的英雄（“he is my hero”）。她曾在若干著作中向世人系统介绍父亲在人权民主方面的努力和见解。在她的著作《在中国播种民主的种子：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一书中，古德曼教授介绍了1989年2月父亲发起的公开信对后来学术民主运动的影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米勒（H.Lyman Miller）教授在其著作《后毛时期中国的科学与持不同政见者（*Science and Dissent in Post Mao-China*）》中则详细介绍了父亲组织这封公开信的科学家背景。实际上父亲是此书讨论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古德曼教授的另一著作《从革命同志到公民（*From Revolutionary Comrade to Citizen*）》中，她介绍了父亲1992年的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

父亲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北京出版的《未来与发展》杂志1992年第五期，为“今后十年中国改革的前景与问题”大型笔谈的文章之一。文章直指邓小平南巡有意回避的问题：政治民主。此文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震动。但由于刊载此文，导致该杂志几乎被迫停刊。父亲在文中回顾，在1981年，改革的目标“曾确定为：建设一个‘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人们为这个目标所吸引，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作祟，民主始终是寸步难行。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出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之后，民主自由被视为洪水猛兽，坚持主张民主的人被斥之为‘敌对分子’。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反右’和‘文革’年代。”父亲指出，光搞经济就像是拐了一条腿，原来的那些问题都还存在，将来会出大乱子。还尖锐地指出，如果人是经济动物，经济搞好了，就什么都好了，那希特勒搞得最好。因为纳粹上台之后，德

国经济年增长率达 11%，何况希特勒搞的也是“社会主义”，我们应该高喊“希特勒万岁”了！事隔十八年后，在充分观察中国及其他转轨国家的发展的基础上，2010 年，著名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在为吴敬琏教授八十寿辰的祝寿辞中，以相同的方式独立地重述了与父亲以上完全相同的论点。

事隔近二十年，中国的改革已造就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困境，进一步改革所面对的重大挑战，均比那时更清楚，在没有政治民主的经济发展下，司法不能独立，言论新闻不能自由，民怨益发高涨，社会不能稳定。在没有政治民主的经济改革中，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交换导致腐败愈演愈烈，巨大经济利益引发的对政治权力的争斗更加危险，不仅改革不能前进，甚至政治不能稳定。如今，“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已逐渐成为仁人志士的共同认识。

1994 年 3 月，父亲同六位知识分子共同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改善我国人权状况，指出“舍人权而侈谈现代化，无异缘木求鱼”。次日，《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长篇报道。但是这一呼吁改善人权状况的努力却导致父母亲的人权受到极其严重的侵犯。先是他们被软禁在家；随后他们无论是外出做操，还是去医院看病，都有警察跟随其后。从那时起，住所的第一层楼门口，多年来一直都有警察，目的是监守，禁止父亲与外人来往。我每次回国探视父母，都受到穿警服或着便衣的警察的严密监视。甚至我的朋友来看我也受到警察的无端骚扰与恐吓。那时有社科院的同事开玩笑说，如今治安不好，令尊真福气，有保镖 24 小时保护。多名国际国内的学者向我讲述过他们探望父亲时遭受警察骚扰甚至被扣押的经历，其中多数人因此未能见到父亲；但仍有少数人使用巧妙方法瞒过警察见到父亲。

在父母被软禁期间，1995 年的一幕强迫“旅游”颇有戏剧性。那年 9 月，“第四届国际妇女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同年 8 月，我去东京参加“国际经济计量学”大会，计划会议之后回北京探望父母。此前，警察到父亲家里来，要求父亲在妇女大会期间离开北京，遭拒绝。中科院奉命出面帮助劝说父亲离开北京。父亲说，必须要等远道归来的儿子回来一起决定。记得在我回到北京之后，在路上已经看到家门口停了两辆警车。临近家门时，警察从车里出来呼唤我的名字，使我十分吃惊，没有料到陌生警察会知道我的名字。警察在确认我已回到北京后，很快就到了我父母家，要求全家离开北京。于是，由中科院具体安排，我们全家于 1995 年 8 月底，在科学院干部的陪同下一同离开北京来到山东烟台，到烟台的第一站居然是住在警备司令部的招待所。

1995 年 5 月，父亲发起了一封题为《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与 1989 年公开信相同，此信有 45 位国内著名知识分子签名（有相当一些现在已经过世了），其中许多是在不同方面对国家做出过非常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学者。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中国人民，父亲和他们一起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为推动中国的进步做出了贡献。1993 年联合国决定将 1995 年定为“国际宽容年”，以促进联合国《宽容原则宣言》的基本精神。该宣言指出，“宽容是一种确认人权、多元化包括多元文化、民主和法治的责任。它摒弃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并确认国际人权文件所提出的标准。”父亲希望在此宽容年之际，向国内外有识之士呼吁宽容之原则，关注中国的状况。

在父亲起草的“宽容呼吁书”里，提到了古今中外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因不宽容而践踏人权的事件。例如，在中世纪的西方，把思想上的异端看成是洪水猛兽，以至于把布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The N

VOL. CXLIII . . . No. 49,632

Copyright © 1994 The New York Times

7 Chinese Intellectuals Appeal For End to Political Repression

Beijing Urged to Free Dissidents and Stop Arrests

By PATRICK E. TYLER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BEIJING, March 10 —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s latest crackdown on dissidents, seven leading scientists and intellectuals appealed in writing today to President Jiang Zemin for an end to repression of free speech and for the release of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statement, made available to Western journalists a day before Secretary of State Warren Christopher is to begin an official visit, i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petitio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human rights from a group of eminent intellectuals since the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s in 1989.

Arrests Are Protested

The group said it was protesting the arrests and intimidation of dissidents over the last week in advance of Mr. Christopher's visit and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e appeal to the authorities to bravely end our country's history of punishing people for their ideas, speech and writing, and release all those imprisoned because of their ideas and speech," said the petition, signed by seven intellectuals. The group was led by Xu Liangying, a 74-year-old historian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who helped translate Albert Einstein's collected works into Chinese.

"People of insight, who are concerned with the fate of the nation and who are dedicated to our country's modernization, feel shocked and at the same time upset and worried," the statement said, adding, "To talk about modernization without mentioning human rights is like climbing a tree to catch a fish." [Text of appeal, page A10.]

The tone and spirit of the statement recalled the popular movement that rose in the winter of 1989 and gathered momentum that spring, first among intellectuals, then among students and workers. Their protests in favor of democracy paralyzed Beijing and seiz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or weeks until the movement was crushed by tanks and machine-gun fire in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4, 1989.

Petition Mailed to Officials

Mr. Xu said he mailed the petition today to President Jiang and to Qiao Shi,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r parliament. Official Chinese news organizations have not yet reported the appeal, but its existence is likely to become widely known here through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beamed to China.

Providing a copy of the petition to The New York Times, Professor Xu asked that it be conveyed to Mr. Christopher and expressed a desire to meet with him during his three-day visit, which begins on Friday.

In Tokyo, Mr. Christopher sought to play down expectations that he might meet with dissidents, saying he had no "plans to do so at the present time." [Page A10.]

The other signers were Ding Zilin and Jiang Peikun, philosophy professors whose son was killed during the military crackdown four years ago; Shao Yanxiang, a poet; the writer Zhang Kangkang; Liu Liao, a physicist; and Professor Xu's wife, Wang Laili, a historian.

All are well known and command

Continued on Page A10, Column 1

1994年3月10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导父亲发起的
呼吁当局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公开信

鲁诺当众烧死；用刑讯手段逼迫伽利略放弃地动说等等历史悲剧。与此并列，呼吁书里提到中国 1955 年的“反胡风运动”，受害者 2000 人；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把全国 11% 以上的知识分子打成专政对象；“文革”更是消灭异己的民族大灾难。到 1978 年以后，虽然许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初步展现过一些好转的局面，可是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所必须的宽容制度或氛围，还是发生了 1989 年的六四惨案。这份呼吁书中说：宽容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也是政治民主化的条件；宽容体现为对人权与自由的尊重，又应以道德准则和法律为界限。

这份呼吁书同时在国际间，在香港和纽约用中英文同时发表，在国内外引起非常广泛的反响。呼吁书发表之后，世界上有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活动家，包括 10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份呼吁书上签了名。不出所料，许多签字者受到当局的严重骚扰与威胁。而出乎意料的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杨振宁居然迫不及待地配合当局的骚扰与威胁，以卑劣手段破坏宽容呼吁书的声誉。此举如同在三十年代曾经出现过的极少数为纳粹服务迫害其他科学家（包括攻击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科学家，如勒纳德（Lenard）和斯塔克（Stark）。他的倒行逆施立即引起各界强烈谴责。例如当时纽约的《世界日报》上发表一文题为，《杨振宁博士何必站出来反对宽容？》著名作家王若望先生亦发表文章（《动向》1995 年 8 月号）评论杨振宁的作为。他说，在呼吁书发表之后，“得知王淦昌列名于‘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杨振宁迫不及待地前往‘做工作’”。王若望先生还说，“杨振宁父亲是我的朋友，当年我们同被打成‘右’派，无奈‘右’派的儿子却是极‘左’派的孝子贤孙”。他表示“对杨振宁这位博士，在事件之后如此紧逼，如此积极地甘当丑角”，“深感恶心”。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几个月后，1995 年 9 月，纽约科学院宣布，为表彰父亲在推动科学家的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授予父亲“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与丁子霖共得）。纽约科学院在颁奖声明中特别提到这份宽容呼吁书。

几年之后，2008 年美国物理学会（APS）宣布授予父亲“萨哈洛夫人权奖”。美国物理学会的颁奖声明说，授奖于父亲是“为其一生通过写作及向公众传播，宣扬真理、民主和人权，即使在遭受监视、软禁、骚扰与威胁，甚至流放的情况下也不放弃（For a lifetime's advocacy of truth,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 despite surveillance and house arrest, harassment and threats, even banishment -- through his writings, and publicly speaking his mind）。”美国物理学会还说，“正是通过许良英的工作，爱因斯坦的人权、社会正义、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思想在中国开始广为人知，也被 1980 年代以来的民主运动所引用。在这一时期，许还大量写作，宣扬科学与文化的繁荣需要学术自由。”“1995 年 4 月，他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他的呼吁的签名者常常成为政府的迫害对象。九十年代以来，APS 国际科学家自由委员会一直关注着许的政治和身体状况。”

由于父亲身体不好，不能亲自前往领奖，于是由我替父亲赴美参加美国物理学会 2008 年大会的颁奖仪式。在颁奖仪式上，我代表父亲将《爱因斯坦文集》三卷经学会主席赠送给美国物理学会（现藏于美国物理学会的玻尔物理学史图书馆），获热烈欢迎。同年 8 月 7 日，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在泰国曼谷就美国与亚太国家和地区关系的总结性“告别”演讲中，引用父亲关于人权的一贯见解。他说，“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

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美国物理学会萨哈洛夫人权奖甄选委员会成员哲杰西（Edward Gerjusy）和曾敏儿（Betty Tsang）两位教授对媒体说明该委员会为何在全世界诸多极为优秀的致力于人权的物理学家中决定授奖给父亲，因为他“几十年来致力于人权和自由，即使遭到迫害，仍坚持不懈，深具爱因斯坦的精神。”在父亲九十寿辰之际，曾敏儿教授在她给父亲的祝寿辞中写道，“许良英老师，只有在罕有的人生时刻能遇到像你这样不凡的人物。”

最后让我引用爱因斯坦在《探索的动机》一文中的话来结束此文。这是爱因斯坦在普朗克六十岁生日的庆祝会上所讲的。“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也是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品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父亲一贯谦卑，反对我将其同科学巨匠普朗克相提并论。为了更确切地表达我的用意，也许我应该把爱因斯坦原话中的“科学的庙堂”改为“科学与民主的庙堂”。众多的人们敬重父亲，是因为他为科学与民主的真诚和执着；因为他只服从于真理；也因为他毕生为推动中国的科学与民主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民主的历史》出版说明¹³¹

许成钢

这本著作《民主的历史》是先父母许良英、王来棣伉俪晚年共同工作二十多年的未完成著作。许良英教授，国际、国内著名科学史家，主要研究领域为爱因斯坦研究、物理学史、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以及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王来棣教授，知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¹³²、五四运动史、民国史以及民主的历史。他们原本坚持完成全部书稿后才考虑出版问题，多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2012年初成功地劝说他们改变了计划，使他们同意先整理出版已经完成的部分，待以后再版时，再补上其他章节。不幸，几个月后，二老相继去世，留下眼前这部当时为出版而整理好的未完成书稿。

本书最初的写作计划产生于1988年7月，原定书名为《民主论》。后因发现已有著作同名，故改为《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原计划针对国内大量流行的各种对于民主的历史

¹³¹ 本文的写作得到家弟许平的帮助，尤其是在关于许良英的文献方面的帮助，特此感谢。

¹³² 王来棣的主要著作之一《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李锐序，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纽约），收集了她五十年代亲自采访过的30多位中共创始人和早期党员（包括李达、冯白驹、曾希圣、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陈望道、施复亮、沈雁冰、邵力子、杨之华、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锄平、朱务善、刘仁静、于树德、邓颖超、刘清扬、贾石亭、马馥塘、黄秀珍、吴德峰、夏之栩、萧三、陈公培等人）的访谈记录。还包括一个附录，讨论了毛泽东从20年代，到延安，到反右，到文革，对知识分子的一贯立场。

和理论的误解，系统介绍民主制度从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到近现代荷兰、英美法的产生、进化和运作的历程，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坎坷命运，以及自古至今民主理论的发展。甚至计划讨论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民主制度。但因他事干扰，年老体衰，一直未能完成。因此，逐渐缩减计划。在2012年4月份给一位老友的信中，许良英决定将书名改为现名。与缩减后的计划相比，主要未完成的部分是关于法国革命（第十章）和民主理论（第三编）的内容。他们对这些部分已经作了大量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内容要写。在此，我将尽力客观准确地简要勾勒这本著作的思想背景和渊源。同时，也记录一些与本书主题直接相关的讨论，与读者共享。

在本书的写作中，王来棣执笔古希腊部分（第一章）和中国部分（第二篇），许良英负责其他部分。在这个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项目中，许良英起着主导作用。他强调，思想启蒙是建立民主的前提，而启蒙者自己必须先启自己的蒙。在他的人生中，他的启蒙始于中学时（1938年）阅读爱因斯坦1930年的文章《我的世界观》。其中爱因斯坦所说的“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让他思索一生。到晚年他认识到，这是爱因斯坦发现的一个可与相对论相媲美的社会铁律。虽然许良英的一生跌宕起伏，思想上也受过蒙昧和现代迷信的欺骗（见本书序言），但爱因斯坦的思想在他心里种下的启蒙种子却从未泯灭，最终更引导他摆脱蒙昧，使民主的思想发展壮大。本书即为这颗种子萌发出的硕果。

在国际、国内，许良英最为世人熟知的工作是他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¹³³。《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方式独特，分为哲学卷（卷一）、物理学卷（卷二）、社会-政治卷（卷三）。社会-政治卷中收集了爱因斯坦一生中关于民主的思想和实践的主要讨论。而许良英对民主的认识，其源头正是《爱因斯坦文集》。《爱因斯坦文集》是文革之后第一部从科学家的角度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科学与民主的文献。1977年下半年，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读了刚出版的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以后在他任中组部部长时，曾要求下属阅读《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对许良英的启蒙作用贯穿其一生，而这正是他将晚年的全部精力倾注在这部关于民主的著作上的基本动力。1933年爱因斯坦不顾自身安危谴责了刚上台的纳粹的暴行，“他的挚友冯·劳厄（Max von Laue）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要采取克制态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要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斯宾诺莎（Spinoza）、伏尔泰（Voltaire）和洪堡（Humboldt）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呢？’二十年后他在接受一个人权奖时说：……对社会上那些‘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爱因斯坦的民主、

¹³³ 这部三卷本文集（商务印书馆，1977~1979）是在世界上所有文字中，第一部全面收集爱因斯坦论著的文集（英文版的《爱因斯坦全集》*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的编译工作在1980年代才开始。第1卷出版于1987年，现已出版到第13卷，收录了截止到1923年的著作，距离爱因斯坦停止工作的1955年还很遥远）。而且它迄今仍是世界上仅有的一部全面收集爱因斯坦论著的选集。这个浩瀚的工作的主体是他在作为一个摘帽右派，靠挣工分为生的浙江农民的时候完成的。编译工作始于1962年。文集的第一卷出版于文革结束的那年，1976年。是文革结束时国内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宣布1957年给他划右派为错误（见《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第一版）。

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1995年）。许良英对民主的关注，一直都出于这种社会责任感。从80年代以来，这些关注一直都与中国的改革历程紧密相关。

在改革刚刚起步的1980年代初，科学研究制度的改革曾经是全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作为最早参加国内规划、研究中国科学政策的学者之一（见[1]），这个时期许良英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讨论更多与科学的基本价值和科研制度相关。1980年7月他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时任总书记）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的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史》[2]中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针对当时改革中最流行的口号“科学是生产力”，他指出，科学本身不是生产力，只是通过技术才转化为生产力；科学的社会功能不仅发展了生产力，而且还提高了人的认识、思想和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科学是决定社会兴亡的基本价值和力量。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价值观与民主密不可分。1981年他在《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点。他说，“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保护科学的政策中一条最根本的原则是：‘宽容’（toleration）。这就是，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一切思想、言论都允许自由发表，不因见解上的不同而受到迫害。这就基本上保证了学术自由，实现了百家争鸣的可能性。”爱因斯坦“认为，科学需要三种自由。...就整个社会来说，最根本的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权利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可以说，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¹³⁴在《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3]的《结束语》中，他又结合近代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全面历史，进一步阐述了相关的论点。1986年底，这些基本观点又分别以《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1986年11月6日、12月23日）。

本书第43页，在叙述了中国的三大发明在催生欧洲现代文明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后写到：“以产生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而自傲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至今仍走不上现代化的正道？这也正是本书最后部分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这个科学与民主的关系的问题是比所谓“李约瑟谜题”更深刻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许良英早在1940年代就对这类问题产生了兴趣。在发表于1946年的《三大发明的奇迹》中，他写道：“在中国被扼死了的三大发明，到了西洋反而获得无限活力，担任着助长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角色，这充分地证明了：科学的发展决不是导源于单纯零星的发明和发现，而是依据于整个社会的发展的，倘不了解科学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社会人’由于生活需要而不断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的产物，那么，三大发明的两种相反的遭遇，就成为不可思议的奇迹了。”同年，他还组织同学讨论过“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结论是“不推翻封建统治，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科学”（许良英自传，未发表）。在1985年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结束语》（其中许多观点来自他与范岱年1957年合著的《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许良英写到：

¹³⁴ 另外两种自由是“每个人在必要的劳动之外还要有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和精力的自由。这两种自由，他称之为外在的自由。此外，对于科学和一般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还需要一种内心的自由，这就是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要有自由地独立思考的精神。”（许良英，《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

近代科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欧洲，而曾经长期在科学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以三大发明促进欧洲近代文明兴起的中国，以及为欧洲保存古代希腊文化、传播东方科学技术的阿拉伯，却都产生不出近代科学，这是科学史上一个十分有启发性并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事实。……

科学的发展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首先是(A)……。其次是(B)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就是，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是否同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相容？是否可能确立起科学发展所必须的思想自由的政治保证？

……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以后才开始逐渐具备……。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资本主义迟迟未能产生和发展的的问题。……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实行的重农抑商、鄙薄技艺、尊经崇古等政策，以及科举取士、大兴文字狱等措施，也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和思想的自由发展。

对于阻碍中国科技发展、迟滞现代化进程的原因，许良英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列举了大量史实，批评了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急功近利“向钱看”，将基础科学和教育看做慈善事业的做法（第3节）；揭露了苏联、法西斯德国、中国“文化革命”时期在自然科学中滥用阶级性和所谓党性原则产生的恶果（第5节）；论证了“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第6节）。

在发表于1991年的《关于科学意识和现代化建设的几个基本认识问题》一文中，许良英提出“用科学意识审视当前流行的两个重要概念”，即“科学是生产力”以及“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科学是生产力”的概念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不利于基础科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了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一种……方法和精神，对人类精神生活的价值。……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将“现代化”等同于“四个现代化”，实际就将现代化局限于经济建设领域，“是重蹈了一个多世纪前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覆辙。几百年来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无数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现代化，首先是要使人（特别是先行者和中坚分子）成为现代的人，具有现代意识，即具有现代的价值观。所谓现代人，就是经过14~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启迪而觉醒了的，并且经过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用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现代意识的核心是科学意识和民主意识。民主意识的主要内容有：①公民意识（包括人格独立，人的尊严，人格平等，四大自由，公民基本权利[即人权]的不可侵犯和转让；同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封建“臣民”意识相对立）。②民主原则（包括主权在民，多数决定，保护少数，自由选举，对官吏监督，权力制衡；同历史上任何个人或寡头的专制统治原则相对立）。③法治意识（包括人人受法律保护，人人遵守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容许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利存在；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治’和个人随心所欲的无政府主义相对立）”。

80年代中后期，反对民主制度，反对民主改革的“新权威主义”甚嚣尘上。由于几十

年的封杀和歪曲，国人，包括学者和“改革派”，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贫乏、概念极其混乱。许良英是最早清晰地认清国人对民主认识之贫乏和新权威主义反民主实质的学者，认为这是造成中国民主的困境和新权威主义兴起的基本条件之一。他指出，“1984—1985年间全国发表的13万篇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章中，仅有一篇是专门论述民主的。不巧，这一篇却又是充满误解和曲解的短文。对此，我已于1988年第6期的《政治学研究》上作了评论。最近三、四个月来，报刊上讨论民主的文章逐渐多起来了，但对民主概念作了正确阐述的却为数甚微，而叫卖‘新权威主义’之类公然为专制主义张目的反民主谬论却充斥市场。”（《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

这里提到的发表于《政治学研究》的文章，指的是他的《关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一文。在此文中，他批评某些年轻学者，包括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的中文译者，对阿罗不可能性定理¹³⁵的严重误解，概念混淆的翻译，对阿罗著作的基本误导甚至南辕北辙的解释。他以其对民主理论的透彻理解和坚实的数学基础，依赖阿罗的原著（而不是中译本），逐字逐句引用并解释阿罗定理的公理（假设），逐步解释其逻辑和结论，指出阿罗定理“证明了传统的民主观念是完全能站得住的”，“为传统民主观念的合理性提供了严密的逻辑论证”。他还指出，阿罗定理从人性的基本公理证明的关于“集体理性”的定理，是超越文化、超越历史、超越国界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是证明普世价值的基本定理。

在这篇论文的第一段他清楚地指出“民主理论的科学研究在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对民主基本概念存在着许多流传已久的误解”。从此，他不断呼吁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任何关心改革和民主的学者（学生），还是政策制定者、执行者，或者是新闻工作者，都必须特别关注这一基本问题。这是引发他开始写作本书的学术诱因之一。

本书的另一主要背景是从80年代以来兴起的“民主缓行论”。当时经济改革步履蹒跚，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不但在社会中，甚至在“改革派”中，流行着一种改革阶段论，对推动民主的政治改革态度消极。在民主缓行论的文章中，大量的似是而非甚至曲解的论点，表明流行观点中对民主制度和历史的无知和基本误解。许良英在1989年接连发表《驳民主缓行论》等多篇文章，厘清多种流行的混乱认识。他说，“在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中，目前最有市场的是民主缓行论，认为中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只有待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期，在条件成熟后才能实现。其理由不外乎：（1）中国经济落后，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人认为民主是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但是，“同200年前的美国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及今天的中国。当时美国是个农业国，城镇居民仅占总人口的6%；我国目前是36%。按1965年的物价计算，1800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仅231美元。”“（2）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众多，人民不会行使民主权利。”但是，“在历史上，义务教育制的出现是19世纪中叶的事，比民主制要晚得多。”“（3）中国没有民主和法治传统，要改变

¹³⁵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民主机制的核心理论。阿罗解决的关于民主机制的理论问题，渊源久远。其基本观察和猜想，早由法国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民主主义学者、数学家孔多赛提出（孔多赛饱受雅各宾派的红色恐怖之迫害）。阿罗的理论从若干关于人性的基本公理出发，以严格的公理化体系，证明民主制度可以运行的条件，证明现实存在的民主制度的逻辑。阿罗由于这一伟大贡献，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传统，是一个长期任务。”然而，虽然“民主对于中国是舶来品。可是，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也同中国的传统无缘。…民主思想的输入，至少比马克思主义早十几年。”最后，“（4）一搞民主就会乱，会影响安定团结，妨碍经济改革，因此，只有在完成经济改革后才能谈民主。”对此，他清晰地反驳道，“说民主不利安定团结和经济改革，这种说法要不是对民主概念的无知，就是有意曲解。…民主不仅不是造成动乱的根源，而且是安定团结的可靠保证。因为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有两层理由：首先，经济改革是关系全体公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重大改革措施必须得到多数公民的认同，这样才能共同承担困难和风险。”“其次，对改革危害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不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是无法杜绝的。”

在以上背景下，许良英、王来棣伉俪于1988年7月21日初步拟定了本书前身的写作计划。以下是许良英在当天的日记中对当初计划的记述。

下午同棣讨论《民主论》的提纲。初步考虑内容如下（估计20-30万字，一年内完成）：

引言——概括总的观点，并记述产生过程

上编——历史的回顾

1. 论希腊民主制
2. 从黑暗愚昧的中世纪到人的觉醒
3. 民主的启蒙——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4. 民主制在欧美的实行和演变
5. 二十世纪的大动荡和大进展
6. 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早期
7. 评孙中山的民主思想
8. 五四的号角
9.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问题

10.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强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经济落后，症结就在政治上不民主；马克思、列宁的最大历史错误是否定民主，主张专政；没有民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下编——理论的探讨

1. 作为历史动力的民主——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民主是现代化的关键，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
2. 作为人际关系理想的民主——民主的理性基础。是人性、理性和社会正义的体现，本身没有阶级性
3. 民主概念的基本内容
4. 对民主概念的种种误解和曲解——如社会主义民主，民主集中制
5. 民主的保证和障碍
6. 驳民主缓行论
7. 驳 Schumpeter 的修正和所谓精英统治
8. Arrow 不可能性原理、投票悖论和民主理论关系的分析
9. 多元民主制，共同参与，Teledemocracy [指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民主制 — 本文作者注]

10. 为实现政治民主化而奋斗

将此写作计划与本书内容做一比较，不难看出，上编（历史的回顾）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动：原来的1~8章，扩充为目前的8（第一编）+5（第二编）章及附录，而缺少了原第5、9、10章的内容。但在许良英的许多其他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中，已充分讨论了第10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相关的论题，如：《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1986），《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2），《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1993年6月1日致刘宾雁》（见自选文集《科学·民主·理性》，2001）等。

1989年夏天发生的政治社会悲剧，让他痛心疾首。他更痛感国人，从年长的学者到青年学生，从改革派到普通民众，虽然在某些时候高喊要民主的口号，但普遍缺少关于民主的基本意识，普遍缺少关于民主制度运作的基本常识。更痛感这个基本缺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障碍。他认为民主思想启蒙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先决条件。而“启蒙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之蒙”（《许良英：民主需要思想启蒙》）。从1990年起，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许良英、王来棣伉俪倾注了他们晚年的全部精力，撰写这部书稿，为自己启蒙，为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为所有关心改革、关心社会进步的国人启蒙。在本书的序言中，他们说，“要实现中国民主化，必须开展民主思想启蒙运动，首先要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首先要启自己的蒙。我们写这部书稿的过程也是自我启蒙的过程，希望读者也能在这种氛围下阅读。”

本书未完成的原计划的第九章“呼唤民主、科学、理性的启蒙运动”应该是集中讨论启蒙精神和启蒙历史的部分¹³⁶。许良英认为，启蒙是推动民主、建立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个启蒙，经济发展本身不仅并不能自动导致民主制度，而且任何非民主的制度一定阻碍科学技术发展，阻碍经济发展。启蒙的内容深刻广泛，包括基本价值观，例如人权的价值观、科学的价值观、理性的观念、民主的观念以及民主的决策机制问题等。这超出通常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中讨论民主的范围。本书的第三到第八章实际上浸透了这种精神。但是这一章还应该更系统地阐述他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见解：“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科学和民主是现代国家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

1992年，在那场政治悲剧之后，经济改革重启。似乎在政治高压下经济可以改革，可以起飞。不仅在中国的“改革派”中，甚至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顶尖智库（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都普遍流行“经济先行、政治随后”的改革顺序论。在此背景下，许良英发表了著名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他说，民主和人权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经济发展绝对不是全部目的，“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他在发表此文几年之后读到诺奖经济学得主森（A.Sen）和国际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Kornai）等的相关著作，非常高兴地知道他们的基本见解与自己相同。但是很多学者及“改革派”，对此缺少认识。针对当时的形势，他尖锐地指出，“现在，从南到北骤然又吹起强劲的‘改革’之风，…但是这次改革，谈的只是经济改革和

¹³⁶ 另一种可能是，这一章主要讨论法国的启蒙运动，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他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其中提到伏尔泰、孟德斯鸠）可能与这章的内容相关。若果如此，他的《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可能也与这章相关。

发展生产力，而回避政治改革，更是讳言民主。”“这种本末倒置无异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绝无成功之可能。”他指出二次大战前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National Socialism 的德语简称为 Nazi），在政治专制下也使国家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但终因危害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而覆灭。

如今，他二十多年前的以下预言全都不幸言中：“有人以所谓‘四小龙’为范例，认为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龙本来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经济起飞并无体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国大陆首先碰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权和官吏受不到广大人民和独立舆论的监督，必然‘官倒’猖獗，腐败成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历史的铁律，谁也逃脱不了。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而腐败和官倒是无法容忍的，它们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

在先父母撰写本书的二十几年里，我同他们有过几十次相关的深入讨论，这里概述其中反复讨论过的几个重要题目。许王伉俪倾其后半生之全力于本书，主要动机之一是他们意识到，启蒙对国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其中他多次谈及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先生。许良英高度赞赏顾准的人格，以及他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前瞻性见解。但是，他认为囿于顾准当年的环境，在阅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受到的严重限制，在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中，对希腊民主制度的史实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对民主的概念，都存在误解。正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正直的人，无畏的人，追求真理的人，他的误解以及这一误解的传播才更令人担忧，担忧在本来就人数不多的优秀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对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的基本误解。这是直接阻碍中国政治改革的因素之一。

造成国人在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方面困惑的原因之一，是一系列与民主对立，或者字面上与民主混淆的流行概念，例如专政、民主集中制、精英民主以及文革中所谓的“大民主”等等。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他不懈地努力从源头上澄清各种思想和概念的混淆。他确切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1852年）；它与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格格不入（《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他指明“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的产物，与民主毫无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耶拿代表大会》，1905年）。他指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从概念上违反民主的基本原则，从操作上有害于民主改革。至于以文革中所谓的“大民主”混淆民主的概念，他尖锐地指出，那些以文革的野蛮行为和无耻宣传混淆民主概念的，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别有用心。

我与他最后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系统讨论是2012年10月底。在这次谈话前的几天，他在住所附近摔伤，头部缝了4针，头上缠满纱布。这次脑部的摔伤导致他四十天后中风，因术后引起肺部感染而高烧不醒，三个月后去世。但当时，虽然头部重伤，年过92，他仍然头脑非常清醒，记忆丰富且准确，逻辑严谨，分析锐利。那次讨论的重点是关于洛克的人权和民主的理论。我向他报告自己在研究产权与宪政之间的基本关系方面，开始着手的跨国实证研究的想法及进展。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以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洛

克的宪政理论，及追随其后的政治学理论的实证研究。其中产权的概念直接源于洛克的人权的定义；宪政的概念是洛克首先系统讨论的。他对此感到极大兴趣和支持。也许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随即把自己长期使用的，写满眉批脚注的英文版《政府论》（洛克的最主要著作）送给我¹³⁷。

在多次讨论中，包括最后的那次讨论，他都反复尖锐地批评卢梭的反民主的论点。并把写满了他的批评意见的，自己使用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文版送给我。对于真诚希望了解、推动民主的国人，在各种概念混淆中，可能负面影响最大的外来的误导来源之一，就是卢梭和法国大革命。从晚清革命者邹容（1903年）到共产主义革命先驱陈独秀（1915年）都错将卢梭标榜为世界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首创者，认为是法国大革命首先实践了现代民主制，并倾力追随之。至今仍然导致国内不少盲从和严重的误入歧途。这是在中国传播民主思想的基本障碍之一。因为卢梭的思想，原则上，是最早为极权主义奠定基础的理论；从法国革命时期红色恐怖的创始人罗伯斯庇尔到文化革命时期的红卫兵都深受卢梭的影响。因此罗素称卢梭是“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罗素《西方哲学史》，1955年）。许王伉俪原计划在第十章“多变的法国民主革命”中系统讨论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在过去多年的面对面讨论中，我知道他们对相关内容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可惜，因健康原因，写作缓慢，未能成文。为了能使此书尽早面世，他们决定以2011年发表于《炎黄春秋》的《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作为附录，暂时代替这一章，待以后再版时再将全文加进去。最终，他们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没能如愿写出，抱憾终生。

本书的第三篇“理论的探讨”，因二老晚年精力体力的限制未能完成。其原始写作计划见本文前面报告的，原《民主论》计划中的下编（理论的探讨）。虽然未能成书，但在许良英的其他著作、日记与通信中，对其中的论题，都有大量讨论。以下对此简略介绍。

第一，关于“作为历史动力的民主——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民主是现代化的关键，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的主题，可见《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1981年）、《为什么说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未发表）和《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1989年）。

第二，关于“作为人际关系理想的民主——民主的理性基础。是人性、理性和社会正义的体现，本身没有阶级性”的主题，在他1989年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人民日报》有篇报道《当今北京人的公德意识》，说连日来，北京人的公德意识“越升越高，令人感叹不止”，结语是：“五月，北京人经受磨难也经受洗礼！”读时，催人欲泪。这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证明中国人民是一伟大的人民，什么“阿Q”性格

¹³⁷ 从我儿时起，他就常寄给我写满眉批脚注的书。阅读每一本他批注过的书都让我获益匪浅。但这本书与以前所有那些都不同。直到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才意识到，这本书是他送给我的最后一部他自己认真阅读、批注、使用过的著作。在这本书中，还夹着一张纸条，记录着他曾提到的牛津大学的依萨·柏林（Isaiah Berlin）关于启蒙思想的哲学研究。

和“丑陋的中国人”，在民主洪流中都被冲洗干净。这充分证明，民主是人性和理性的体现，民主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保证；相反，专制与高压是动乱的根源。

作为国际知名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许良英在《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2009年）中，针对中国某位领导人的讲话“爱因斯坦先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所作出的相对论，我相信也可用于政治领域。民主和人权也是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和普遍的”反驳道：

作为它[相对论]的逻辑基础“相对性原理”是说：自然规律对于不同的运动状态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不变的，绝对的。因此，相对论实际上是绝对论，它揭示了自然规律不因运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的绝对性。至于民主、人权概念，是人际关系中普遍人性的体现，不分民族、阶级，不分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因此也是绝对的、普适的。

第三，关于“民主概念的基本内容”方面的主题，在发表于1993年的文章《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中，他把“从古代希腊到启蒙时期政治思想家所创立，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各国人民为之奋斗抗争并行行之有效的民主理论的基本内容”归纳如下“（1）确认人人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权利，即人权。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任何权贵（无论是个人或是寡头集团）的臣民或驯服工具。（2）确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全体公民通过“多数决定”原则进行统治。但在任何情况下，处于少数地位的公民依然享有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得被侵犯和剥夺。（3）这种统治只能通过公民的自由赞同来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强迫的和非法的手段。由此，通过定期的公民自由竞争和选举，少数派可能成为多数派，多数派也可能成为少数派；一切取决于选民的意愿。（4）任何政府官吏和人民代表都是人民的公仆，始终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政府首脑和人民代表都由公民选举产生，并直接向选民负责；发现有不称职的，可以随时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罢免。”

2009年，在《对张钦楠同志〈中国往何处去——历史、理论、政党（学习笔记）〉的意见》一文中，他提出，“可以与民主相提并论的是自由、人权、法治，四者紧密联系，互为依存。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和目的，人权是民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四位一体构成民主政治的大厦。”

第四，关于“对民主概念的种种误解和曲解——如社会主义民主，民主集中制”的论题，许良英在许多文章里对相关的误解与曲解作了澄清。例如，在1988年的《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在2012年的《民主需要思想启蒙》（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民主不利于安定团结、法治比民主重要、只有经济发达才能实现民主、民主素质论、“大民主、小民主”、“民主作风”）等。

第五，关于“民主的保证和障碍”的论题，他说，“要实行民主，必须以如下各项的保证为条件：（1）公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公民可以公开地发表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对领导人的批评，而不受到迫害和报复（终止以言论或文字治罪的历史，废止新闻、出版的检查制度）。（2）严格实行法治，废止任何形式的人治（终止人治和以权代法的历史）。（3）实行权力制衡，防止绝对权力的出现（杜绝专制独裁的可能性）。（4）严禁军队干预政治，军队只听命于政府首脑（杜绝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终止军国主义和军政府的历史)。”(《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1993)。他还指出，“中国宪法早已规定要实现“高度民主”，可是碰到两个严重障碍。首先是“打江山、坐江山”和“为民做主”的封建意识。其次是一些抬轿吹喇叭者从海外自由市场的阴暗角落里贩来一些伪劣商品，甚至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找出一些腐尸烂肉充当珍宝来糊弄人。”(《弘扬民主批驳反民主逆流》，1989)。

第六，在关于“驳民主缓行论”的论题方面，在发表于1989年的《驳民主缓行论》中，他批驳了中国民主缓行论的各种“理由”：经济落后、文化教育落后、无民主法治传统、以及影响安定团结等。

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始终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信心，尤其对青年人充满信心，认为追求民主、自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大势所趋。他晚年一直在极其顽强地与衰老和疾病斗争，目的是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尽一份力，更期待着能亲眼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的日子。意外的事故使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相信此刻他正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吾辈的努力，期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参考文献

- [1] 许良英、范岱年，《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出版社，1957，北京。
- [2] 钱三强、仓孝和、许良英、李佩珊、杜石然，《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科学技术知识讲座（一）》，知识出版社，1980，北京。
- [3] 李佩珊、许良英主编，《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科学出版社，1985，北京。

附录：许良英关于民主的部分著作目录（包括少数未发表的）

据不完全统计，许良英关于民主的著作有63篇，这里列出其中一部分（未发表的给出写作时间。书末附录一中已有的著作，这里只给出附录一中的序号，在附录一中，这些著作的序号后带有“*”）。

46, 61, 92, 94, 102, 104, 105, 109, 111~116, 124, 128, 129, 133, 143, 144, 147, 151, 182~186, 188~191。

《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摘要）》，1984.12.15。

《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系《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结束语》的第5节，1986.12.23。《人民日报》摘要发表。

《为什么说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写作年代不详。

《科学高于生产力，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1989.1.23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对张宣三〈我国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的评论》，2000.2.23。

《名家推荐：大学生暑假阅读书目》，《南方周末》2005.7.14。

《爱因斯坦的反腐败名言》，2007.10.27。

《对张钦楠同志〈中国往何处去——历史、理论、政党（学习笔记）〉的意见》，2009.3.29.给张钦楠的信。

《对李锐同志〈中国向何处去（内容提纲）〉的意见》，2009.4.3.给李锐的信。

《许良英：必须用科学和民主来破除现代迷信》，《信睿》2012年第6期。

《许良英：民主需要思想启蒙》，《财经》记者采访，2012。

科学、哲学和自由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从引力波到方先生¹³⁸ *

许成钢

2016年2月11日一组美国物理学家宣布，自从1916年爱因斯坦预言存在引力波以来，他们第一次直接证实了引力波的存在。这在人类科学历史上是个振奋人心的大消息。与此相似的上一次重大发现是赫兹1887年证实电磁波的存在（电磁波的存在是麦克斯韦在1864年发表的理论中预言的）。赫兹的发现奠定了无线电技术以至今天信息革命的基础。在科学上，甚至可能在应用上，发现引力波的重要性要超出发现电磁波。由过去两次重大科学发现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中国，中国的落后不容争辩。金钱的投入绝对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究其原因，众说纷纭。在人类的科学探索进入引力波阶段的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刺激我们再探讨中国科学落后的深层原因，制度的原因。

与此巧合，这一日的第二天，2016年2月12日，是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八十诞辰。方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宇宙模型以及引力波的科学家。在文革期间，1974年人类第一次通过发现双脉冲星间接证实存在引力波后不久（这个工作获199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方先生就发表了论文对双脉冲星和引力波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探讨；而且更早在1972年他就已经发表了相关的相对论宇宙学的论文。其科学成就在国际上享有高度声誉。但因制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他的研究工作自始至终不能在国内顺利展开，不得不与面对的各种禁锢，包括阻碍科学的哲学，进行顽强的斗争。

我认识方老师是在1977年，家父许良英组织的“爱因斯坦问题读书报告会”上。在这个环境里，从方老师那里第一次知道了爱因斯坦关于引力波的概念、预言和几十年来物理学界对引力波的探测；知道了宇宙大爆炸理论等；确切地知道了这些重要科学发展与马列哲学的基本冲突。

那是在1977年春。当时农村户口，身份为商务印书馆临时工的家父，在商务印书馆自己的办公室里，组织了这次读书报告会。我自幼（七岁）就因家父被打成右派，而被迫与其分离，仅维系有限的通信往来。尤其是从1963年到1975年间，我们从未见过面。后来因我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因文革时期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而治罪），甚至连通信也长期中断。我们父子的团圆始于1976年秋，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困退”回北京。我在农村自学多年后，回北京求学心更切。与家父被迫分离十几年后重聚，其中的愉悦除了人伦之乐，更包括精神的，包括拜访他学界的朋友们为

¹³⁸ 感谢李淑娴授权在此文中引用她的私人信件。感谢许平和王作跃在此文写作中提供的帮助。此文发表于2016年2月17日《FT中文网》，其早先版本题为《科学和哲学的永远的老师：纪念方励之》，是应李淑娴邀请，为《方励之纪念文集》而作。

* 由于文中频繁提到许良英，更由于方励之与许良英的特殊关系，正如作者所说，“追思方老师是追思家父的重要部分”，因此应作者要求，我们将此文收入文集。编者注。

师。例如他物理学界的朋友，何成钧、邹国兴、汪容、朱兆祥、解俊民、戈革等，以及与他一起参与《爱因斯坦文集》翻译的朋友范岱年、赵中立、张宣三等。1977年春，家父提起科大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给他的来信中指出《爱因斯坦文集》中，关于双星光谱一词的翻译错误，这使得家父非常兴奋，因为这个词关系到基本概念，关系到对验证狭义相对论的基本手段¹³⁹。相关译法是家父与物理学界几个老朋友反复斟酌而未能解决的问题。

他们二人都深受爱因斯坦关于民主和社会问题的见解的启发。由此，他与方老师结成挚友直至生命结束（家父在方老师去世之后8个月过世）。在见到方老师之前，家父多次向我提起，极其赞赏其才干、学识、成就和为人。家父说从方老师身上“可以看到爱因斯坦的这种精神”（《〈爱因斯坦文集〉中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1988年《科技日报》），即科学的精神和知识分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家父在臧否人物时一贯反对溢美之词，追求准确，近乎苛刻，任何人概莫能外。从与方老师交往的亲身经历中，我深知，家父的这些话是准确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方老师的基本特点的。

在1977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读书报告会每周一次，直至1978年初。经常参加的人除了方老师、家父、我，还有赵中立、张宣三¹⁴⁰等。方老师来过多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此前，我在黑龙江农村研读了大量马恩列毛和社会科学著作，钻研过电子工程、计算机工程等，自学了英语、理论物理和数理方程，对力学、电磁学和狭义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打下了还算扎实的基础（能从基本物理假设独立推导麦克斯韦方程和狭义相对论的主要结果）；对广义相对论则只限于基本概念的了解和粗略推理；对于产生相对论的哲学观念虽然感兴趣，但知之甚少。我参加读书报告会的最大兴趣在于了解爱因斯坦的方法论。家父建议我特别集中研读霍尔顿（Gerald Holton，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爱因斯坦问题专家、物理学史家）关于爱因斯坦和物理学思想的论文。读书报告会最初的目的为撰写爱因斯坦传记和探讨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以及方法论）的两本著作做准备。家父和方老师负责思想史部分；家父和赵中立、张宣三负责生平。我参与研讨爱因斯坦生平的工作，集中在爱因斯坦早期思想的形成，包括狭义相对论的产生和研究，向广义相对论发展的思想等等¹⁴¹。由于有机会直接接受了方老师的影响，这段讨论会和工作的经历对我一生收益巨大。我对于从伽利略到牛顿、到麦克斯韦、再到爱因斯坦的科学和思想的演进，以及伟大物理学家形成科学体系的特点的认识，都产生于那时。后来这些认识对我做社会科学研究有基本影响，一直是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基本精神，也是我能够对社会科学界的一些基本问题持尖锐批评态度的依据。迄今，在经历过许多经济学界最精华的讨论会（例如同时有四五个诺贝尔奖得主参加的小型研讨会）以后，我仍感到当年的这个读书报告会系列是我参加过的最受启发、最深入、最精辟的研讨会之一。

¹³⁹ 方励之在《许良英先生九秩贺》专门提到这个使他们结为挚友的事件时解释，“用双星光谱的时间变化可以证明，不同颜色的光在宇宙空间中的传播速度一样。它是支持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一个有名的观测。”

¹⁴⁰ 1978年初，张宣三因参加组建社科院工经所工作而离开。后任工经所的副所长（前总理朱镕基届时曾为工经所一个室的主任）。

¹⁴¹ 在参加读书报告会期间，我曾写过一些笔记，并参加翻译了Gerald Holton关于爱因斯坦思想的论文（如《狭义相对论的起源》，《马赫、爱因斯坦和对实在的探索》，《爱因斯坦、迈克尔孙和“判决试验”》，见霍尔顿《科学思想史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尤其是方老师关于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方法论的深刻见解，让我受益终生。

以讨论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论和思想来源为契机，以下是我记忆的近四十年前的读书报告会的相关历史背景和方老师的见解的片段¹⁴²。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对关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研究对象，什么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什么是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什么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对这些方面问题的深入讨论竟是我以后难求难遇的¹⁴³，更启发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科学落后的基本原因所在。

文革期间，在批判“封资修”的政治推动下，中国曾经自上而下兴起过批判爱因斯坦、批判相对论的丑剧闹剧。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具有个人色彩的特殊产物，但这场丑剧背后有更基本的背景，尤其是列宁批判马赫的时空观，以“哲学”统治科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以下简称《唯批》）的传统和制度。虽然文革结束后，对毛的个人迷信大大淡化了，但埋藏在一些人灵魂深处的“哲学”却仍然横行于世。在那个噩梦初醒的年代，国内的政治现实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动摇、不可怀疑的唯一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其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居高临下统治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切学术学科。我在农村时，曾熟读马恩列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熟悉列宁批判彭加勒、马赫为“伟大的物理学家，渺小的哲学家”（《唯批》）等论点。通过阅读爱因斯坦的著作以及 Holton 研究爱因斯坦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著作，我虽然已经知道爱因斯坦发展相对论的想法深受马赫哲学思想的影响，而马赫的哲学思想是与伽利略一脉相承的产物；对于那种靠权力支撑的政治与哲学统治科学的立场持基本怀疑态度；但由于缺少具体、坚实的科学论据的支持，我那时的许多见解只停留在抽象的层次。

方老师在读书报告会上的讨论，使我茅塞顿开。他指出，爱因斯坦是在马赫的科学哲学的影响下取得相对论的重大成果的。马赫是在近代物理中第一个突破传统牛顿时空观的物理学家（而这正是列宁所批判的地方）。牛顿认为，宇宙由绝对的空间标架构成，所有物质在其中运动。而马赫认为不存在绝对空间，因为物质和空间是不可分的。所谓惯性运动，是相对于整个宇宙物质背景的匀速运动，而不是相对于绝对空间的。即，没有物质就没有物理的空间；空间的延伸一定伴随着物质的延伸。爱因斯坦称马赫的这个见解为马赫原理。在马赫原理的指导下，爱因斯坦把物质在整个宇宙中大致均匀分布作为其宇宙学的基本假设。从此，人类对于宇宙的探讨从局部发展到整体。这是哥白尼之后人类对宇宙认识的重要进展。马赫的哲学观念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指导的相对论的成果，得到了系统的试验和观察验证。相反，列宁坚持的绝对时空观已经被大量科学实验和观察证伪。列宁在科学上和哲学上的错误见解在中国的文革时期进一步发酵，演变成极其荒唐的批判相对论的丑剧。直到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在霸道的哲学和垄断的政治权力下，仍然有极左和依仗权势的人们，借用列宁的错话，把马赫、爱因斯坦等的科学成就贬

¹⁴² 《方励之选集》（六卷本）中收入方老师大量文章，全面准确反映方老师的见解。我记忆中难免会有与之不符之处。若果如此，则一定是我的记忆差错，应以《选集》文本为准。

¹⁴³ 我从1991年到200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LSE）执教17年。LSE长期以来是世界上科学哲学研究的最重要机构之一。而且我所在的经济系有同事密切关心科学哲学，哲学系也有同事非常关心经济学，两系之间有经济学哲学教学研究项目。出于兴趣，我在LSE期间有意旁听了一些相关的科学哲学讨论。但与这个读书报告会相比，常感到他们的讨论站得不够高，视野不够宽广。

低为“伟大的科学”和“渺小的哲学”，压制科学和思想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使得“革命导师”的断言极具讽刺意味：相对论、宇宙学这些“伟大的科学”是在被蔑称为“渺小的哲学”的指引下产生的。而科学最终是依赖实验和观察的验证而确立的。相反，由权力强加的“伟大”在科学中完全没有立足的基础。其后果是，在“革命导师”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对科学，对人类，造成损害。

方老师以古希腊的宇宙说直至当代的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为例，总结了科学与哲学两千多年发展的历史。他说，当没有建立科学的时候，对于科学不能解释的重要现象，例如宇宙现象，人们依赖想像和哲学推理。例如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德的宇宙观。在读书报告会中，他系统讨论了人类的宇宙观从哲学（包括神学）到科学的演变过程。讨论涵盖了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中世纪的阿奎那、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近现代的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以及当代的宇宙学。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他的下述论点：在自由的环境下，在没有政治权力干预下，当系统的科学还未能发展时，老的哲学和宇宙观，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逻辑，都曾对科学，对物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不可或缺的基本作用。但是在政治宗教权力的干预下，在统治的环境下，与权力捆绑在一起的老旧哲学可以变成科学发展的禁锢。例如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学说于一身的阿奎那学说，一旦成为不可挑战的神圣的宗教经典，一旦宗教和哲学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裁判”，这个伴随权力的哲学就成了科学发展的禁锢。附在某个“学说”上的权力越大，这个“学说”就离科学越远。哥白尼和伽利略时代发生的与文革发生的以权力压制科学的悲剧性质相同，如出一辙。方老师尖锐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宇宙总规律”，或马列毛的哲学和宇宙观是如此落后武断，甚至还远不如阿奎那体系有严密逻辑，还不如保罗二世之后的神学。但是当科学的发展能够系统地解释许多自然现象后，在这些相关领域科学就取代了哲学。科学与哲学的最大差别在于，科学是通过试验和观察验证的，而哲学不是。因此，人类进步的整个趋势，人类认识的领域是，“科学一步一步走进来，哲学一步一步退出去。”随着科学的发展，一个又一个领域从哲学的领域变成了科学的领域。在这些科学领域，例如天体物理，哲学必须让位于科学。近四十年来，他的这些话一直铭刻在我心里，是指导我研究工作的原则。

方老师是少有的对哲学，对哲学史，有深入了解，并且能够以好的哲学指引物理研究，以物理学最前沿的成果指引哲学发展的物理学家。他用世界科学和文明发展的历史说明，科学摆脱宗教、摆脱政治强权和过时哲学的制约，一定需要依靠科学自身的成就，依靠科学证明神学经典和过时哲学的论断的错误。以二十世纪广义相对论之后迅猛发展的天体物理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为例，方老师一一指出马列毛哲学的过时及其与科学发现之间的基本矛盾。其中最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他系统地以现代宇宙学关于宇宙尺度（即宇宙有限）和宇宙膨胀的证据，包括天体红移现象、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等，驳斥被用来束缚科学发展的哲学断言。面对这一系列科学发现，宇宙无限论之类的老旧哲学断言无法自圆其说，不攻自破。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方老师以物理学的实际发现和发展，反驳列宁关于电子无限可分，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断言。这些政治人物原本对物理一窍不通，他们的断言依赖的是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那些断言是借助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才变得重要。在那个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年代，极左势力仍然极端

强势。由于其依赖政治力量进行威胁恫吓，思想解放仍然极端困难，甚至危险。方老师不仅在读书报告会和学术场合，而且更在公众场合（我有幸在1970年代末旁听过多场方老师关于这个命题的精辟入理振聋发聩的演讲），以这些命题为突破口，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开启了科学启蒙运动，向在中国长期盛行的政治统治科学、“哲学”统治科学的传统开战。在马列毛主义统治一切，政治统治一切，不知何谓科学的环境里，这种启蒙对全社会各方面，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科学研究到教育，从政策到媒体，其影响之深刻，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过分。可惜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方老师被迫远赴他乡的年代之后，虽然伴随改革开放，在技术层面学术更开放，人们对于国际上领先的技术性的文献有更多的了解，但由方老师开启的科学启蒙运动，在许多领域不仅没能继续深入，反而时常倍受干扰，甚至难以为继。文革回潮迹象的益发显现，则更让人担忧自由和科学发展的前途。

在关于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方面，方老师对我的启示也如醍醐灌顶，让我终生受益。他强调，只有具有和谐秩序的现象才值得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即科学研究应该有意忽略复杂及混乱的现象。他引用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彭加勒的话解释说，研究大自然是因为来自大自然和谐的秩序带来的美；对这种美的追求带来的乐趣。相比之下，把水泼到墙上溅起溅落的复杂混乱无和谐可言的现象，则不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与他讨论自己的自学过程，完全凭兴趣，着重代数、解析几何与微积分，而轻视了欧氏几何。他清晰地指出欧几里得几何对于科学，对于逻辑思维的基本作用，远远超过代数和微积分。但更引人深思的是，他话锋一转，指出，自从马赫指出空间与物质不可分后，几何与物理已经不可分，欧几里得几何关于空间的无限性也要受科学观察的检验。

科学的各个领域之间，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互通的，科学、自由、民主是互通的。在没有政治、宗教的干扰时，方老师说的“科学一步一步走进来，哲学一步一步退出去”原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与追求真善美一致的哲学会在相关领域被科学替代之后，自行退出。但是，当政治、宗教观念被冠以哲学命题，哲学变成维护权力的工具的时候，权力以“哲学”为武器，用来阻挠科学发展时，则科学、文明倒退，愚昧盛行。这正是反右、文革以来中国的状态。方老师的研究领域，天体物理学更是首当其冲。原因是，马恩列毛自然辩证法直接对天体物理学基础的命题有“神圣”的断言，即时空的平直性和无限性。这些断言并不是马恩列毛的发明，但被神圣化、绝对化、政治化。平直无限时空的见解来自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以后被纳入牛顿物理世界的观念。原本由于科学的发展，时空观随之变化全属自然。但这些古代流行的时空观自从列宁和苏共时代就被神圣化，在中国更在反右、文革背景下，神圣化的“哲学”把无数科学研究的对象变成禁区，“哲学”变成文字狱的判据。由此，不突破这些政治和“哲学”的禁锢，科学就无法发展。但是一个领域的基本突破就可能带动在所有科学领域，包括社会科学，甚至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突破。正因为如此，“神圣”“正统”的“哲学界”借助政治力量层层阻挠，竭力防止“哲学一步一步退出去”。这类以政治权力支撑的意识形态，是阻碍中国许多科学领域发展的基本障碍。面对如此艰难的障碍，能够突破这一禁锢的科学家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对科学和哲学有深刻的认识。方老师是勇于并且有能力承担此任的极少数科学家之一，实为凤毛麟角。这是方老师的影响远超出天体物理的一个基本原因。

文革后邓小平鼓吹“科学是生产力”，在政治上对于提高科学研究的地位、推动改革起了一些正面作用。但它被鼓吹为了不起的思想解放的政治口号和推动“科学春天”的改革，则严重误导了科学研究的方向、误导资源配置，为政治干预科学研究留下伏笔。在读书报告会以及当时一系列的公开演讲中，方老师多次深刻批判这种严重误导的口号的基本错误。他指出，在科学历史和科学发展中，提高生产力这类实用目的并不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他引用科学史的例子，从亚里士多德到哥白尼、伽利略，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赫兹发现电磁波到70年代间接发现引力波，说明自古至今，重大的科学上的突破都源于科学家本身探求真理的好奇心，探求世界和谐之美的动机，源于科学探求中寻找的途径。几乎所有重大的科学上的突破都不是源于实用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如今发现引力波再次重现这一基本道理。实用和生产力的提高是科学发展的一部分附带产品。科学的作用，除了实用和提高生产力外，还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文化、生活方式，等等。

平生第一次见到方老师的情景在我脑海里至今仍然栩栩如生，恍如昨日。那天，方老师风尘仆仆，穿一身退了色的蓝灰中山装，挎着学生式的书包，笑呵呵地来到房门大开的办公室。方老师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个人，从科学的角度，完全彻底破除了我从马列主义哲学中接受到的，违反科学、反对科学的误导说教。因此我多次向家父表达对方老师的敬佩。记得有一次在读书报告会休息期间，家父指着我对方老师说，“他对你很崇拜！”家父所指的我的“崇拜”就是我不断从多个角度认识、体会方老师以科学证据和理论破除马列教条的那些精辟深刻的批判。方老师呵呵一笑，说，“崇拜就不好了。”“任何时候，对任何人，崇拜都不好。”我理解，方老师此话的含意并非通常国人所说的谦虚，而是指科学和政治的基本原则。方老师在读书会以及其他无数场合中曾反复指出，宗教是屈从于神权的，所有借助哲学或政治权力干预科学的做法，依赖的都是神圣化的权势。从中世纪以宗教和神权干预科学，到近现代的悲剧，都是如此。而科学与宗教的根本区别在于，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平等的，都必须经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哥白尼通过对行星的观测与计算，建立起新的理论。伽利略用望远镜看到新的论据，证明地动，既不是凭借宗教信仰，甚至也不凭借哥白尼的地动说。方老师还特别以爱因斯坦为例说明科学以证据为准绳，与特权不相容的基本性质。在红移现象的证据发现之后，爱因斯坦立即放弃了他的模型里面引入的宇宙学项，承认自己早先理论的错误。

自从1979年去清华机械系读研究生，与方老师来往的机会就变得很少。在那个时期，自然辩证法是必修课，而方老师关于自然辩证法发表了不少颇具批判性的公开演讲。其中尤其是以物理学的证据驳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列宁《唯批》中违反科学的断言，极具说服力。因为这些著名的断言长期以来经常被用来作为棍子打击科学家，方老师的演讲在清华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里引起很大反响并在同学和教师中产生热烈的讨论。记得一次在研究生宿舍里，同学们和教师的私下的辩论中，面对当代物理学对恩格斯和列宁哲学断言的有力证伪，缺少科学知识的自然辩证法教师只能无奈地嘟囔着，“我们不同意方励之的反马列主义的观点。”

方老师1991年4月到哈佛演讲，我正在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最后阶段，有幸在异国他乡再见到他。但因为国际瞩目的地位，从学术、人权、到国际政治，方方

面面关心他、切望与他联系的人非常多，我与他的谈话只能简而短之，主要集中于与推动中国人权、民主的运动以及与家父相关的内容。之后，我们通过多次电话，绝大多数内容都与家父以及人权问题有关。2008年春，我赴圣路易斯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代身体欠佳的家父领取萨哈洛夫人权奖。在此前后，方老师来过多次电话，通报和讨论与人权奖有关的事宜。领奖当晚，在美国物理学会国际科学家自由委员会举行的晚宴上，所有的与会者在谈到家父时，都要提到方老师：人们都知道他们之间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知道他们在继承爱因斯坦遗志、推动中国的科学、人权与民主事业方面的不懈努力与默契配合。

2012年春，惊悉方老师突然驾鹤西去，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悲恸之情无以自拔。至今方老师的个人主页，联系地址，包括他的 email、他带着亚利桑那大学校徽的 skype 用户名等，都像过去一样保持在我最常联系的目录上，让我感到仍然还能随时和他通话。方老师去世的噩耗对家父来说更是一记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据家母说，这一打击使得从来意志坚强的家父，不仅在一两个月后都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从此身体和精力就一直每况愈下，几个月之后即随方老师西去。追思方老师是追思家父的重要部分。追思家父也是追思方老师的重要部分。方老师的夫人以及他一生的合作者李淑娴教授，在家父去世时发来感人肺腑的言语，“许良英：励之和我亲爱、知心的挚友，你去了，在励之去了几个月之后，在你的相知、相爱一生的爱妻去了不足一个月之后！你是励之和我的忘年之交。在生命的旅程上，我们有太多的理解，尤其你与励之；在面对苦难的遭遇时你与励之，有太多的精神可比。”

在方老师八十诞辰的前一天宣布的，发现引力波的重大突破，一定让方老师在天之灵极感欣慰。但中国的自由、民主、科学的发展更是方老师永不释怀的梦想。

2016年2月14日

愿爷爷的精神与世长存

许蒙

直到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遗体捐献中心见到爷爷遗体的那一刹那，我才真的意识到，爷爷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他再也不会用他那中气十足而乡音浓重的声音迎接我回家：“哦哟，小许蒙回来了”。想到他的音容笑貌不禁泪盈满眶，然而更遗憾的是，我来不及亲口告诉他，他是一个多么可敬可爱而又绝无仅有的爷爷。长大懂事离开家以后的我才明白，在如今这个越来越浮躁功利的社会，他拥有怎样可贵的精神与风骨。

在爷爷的两个儿子仅七岁半和四岁的稚龄时他便被迫离京回浙江临海老家务农。尤其是我的爸爸，还未记事爷爷便已离家，“父亲”在他的整个成长经历中，也许仅仅是靠屈指可数的几封书信维系的那个音容相貌都模糊不清的“陌生人”，以至于十八岁成年后相见时，个性内向腼腆的爸爸连爷爷的“普通话”都听不懂，甚至不敢看他的眼睛。与爸

爸和伯父相比，有幸在爷爷身边长大的我，想在此记录下他生活中的点滴趣事，因为那恰恰反映出一个人最本真的性情。爷爷不是圣人，他并不完美，他的性格太直太倔，执着坚韧追求真理的同时也会伤人伤己。然而他活得太真，听不得假话虚话，最瞧不起溜须拍马之人，想必他亦希望我为他而写的文章更贴近真实而不是一味褒扬。

我从三岁起便一直和爷爷奶奶及父母住在一起，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离京上大学。一提起家，在我脑海中最先浮起的，一定是那个整整齐齐两大排书柜的书房，最显眼的地方，悬挂着爱因斯坦的肖像。从我记事起，那个房间便常常高朋满座。客人年龄背景跨度相当大，有两鬓斑白的爷爷伯伯，有青春朝气的学生，还有高鼻碧眼的外国朋友。谈话气氛多是热烈愉快的，幼儿园放学回来的我还曾被叫去献过舞，讲过故事。但也常常，爷爷中气十足的大嗓门用压倒一切的音量咆哮着，声音轻易穿透书房和我的房间两道门。最后的结果，有时是客人灰溜溜的出门，有时是传来激烈的争吵最后“转危为安”，最夸张的一次是客人忿忿地冲出书房，一边穿外套一边回头和爷爷对骂，爷爷大吼：“滚！你滚！”，客人火冒三丈大力摔门走人。奶奶总会无奈地边收拾茶几边劝爷爷：“人家不过是和你观点不同，你又何必必要言辞这么激烈”，又或者劝他“不要这么不留情面地批评人”。

敬佩崇拜爷爷的人很多，但恐怕他得罪的人数亦不相上下。爷爷性格耿直，心直口快，说话从不顾及所谓的面子或人情。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的一个远方亲戚来家里做客。这个姐姐16岁考取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勤奋努力成绩拔尖，性格更是活泼可爱。爷爷经常会叫她来家里吃饭聊天。有一次晚饭，爸爸晚到了很久，解释说最近工作非常忙总是加班。姐姐笑着说，“工作忙是好事，有名有利啊”。这本不过是很平常的玩笑话，爷爷却当场翻脸，毫不留情地训斥道：“工作的初衷怎么能是为了名和利呢？应该是为了对社会有贡献，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嘛！你年纪轻轻怎么能想法就这么功利！太不应该了！”。严厉的语气让还不到二十岁的姐姐脸上再挂不住，当场拭泪。奶奶和爸妈赶紧圆场，说她不过是开玩笑，何必这么较真，一点也不给人留面子。这样的片段不过是他“毫不留情”的众多事例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

这便是他的原则，也是与生俱来的秉性，活得太真太直，从不肯退让与妥协，哪怕这让他付出了扣着右派帽子回乡务农、妻离子散近二十载的惨痛代价，哪怕九十年代他常常遭到变相软禁、监听、跟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面对困境，他从来都是轻蔑地冷嗤那些不敢说真话的小人，不计后果地坚持自己说真话的原则。可能会有人不相信现代社会真的还有这么理想主义的人，但若非视名利金钱如粪土，一心只追求真理，又何以解释他每每表现出的这些“过于直言不讳”，毫不顾及人情世故及自身安危的言行。

他最看不起的便是溜须拍马，虚伪世故的人，常常在家里看新闻联播都总是骂不绝口，看到他非常痛恨的某些政治流氓之类的人出场，或者他绝对不能苟同的观点时，“混蛋！”，“狗屁！”，“无耻！”，“马屁精！”，“胡说八道！”等等在客厅里像连珠炮般一层层炸开，成为了我晚饭后做作业时习以为常的背景音。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又确实有些霸道，甚至“专制”。他认为对的事情，有时便听不进别人相左的声音。但如果跟他据理力争，从道理上说服他的话，他都马上很坦诚地承认错误并道歉。即便是对我这么个小孙女，主动承认错误这样的事情亦不是一次两次，更从来不会“倚老卖老”，摆出长辈的身份和威严来压制人。爷爷的性格有点过于极端，对于他厌恶鄙视的，他会毫不留情地破

口大骂，但是对有才情有节气的人，却是发自身心的敬佩和赞赏，常常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

爷爷奶奶一辈子崎岖坎坷地走来，生活节俭简朴惯了，甚至可以说是过于艰苦朴素。洗衣洗菜洗碗洗手的水要积攒起来冲厕所，衣服不管穿了多少年，只要没到打明显补丁的地步，再褪色破旧也还是照穿不误。最夸张的是，家中的午饭几十年如一日，前十年是杂菜煮烂面条，后十年是杂菜煮速冻馄饨加汤圆。虽然面汤馄饨里放很多蔬菜，营养是够了，但是一大锅杂七杂八地炖在一起，其外观真是让人不忍直视。这道特色午餐恐怕来过家里做客的亲戚朋友们都印象深刻。从小学到大学，身边的同学们永远在抱怨食堂的饭菜难吃，但是我却总觉得和家里的饭比起来相当美味。屋子里本就被各种大部头的书籍堆得满满当当，边边角角里更是塞满了各种“废物”。吃光的果酱瓶子洗一洗留着装其他东西，买菜买东西给的塑料袋攒了满满几个大包，速冻馄饨吃完后的塑料盒子和包装袋，爷爷也都舍不得扔，全都攒起来说是可以派其他用场。有时候这类“废物”堆了太多，奶奶和妈妈实在看不过去，才偷偷地拿去丢掉一些。去菜市场买菜，爷爷都舍不得买稍贵一些的，家附近菜场小贩都知道向他兜售特价清仓货总能成功。在这样“抠门”地对待自己，几毛钱都舍不得多花的情况下，爷爷捐起钱来却是极为豪爽：汶川地震，捐两个月的离休费；老家的立本小学100周年校庆，捐一万给学生买书；报纸电视上看到某个贫困残疾孩子勤奋好学，家里却困难得揭不开锅，汇去几千；认识某个为了揭露社会真相而不惜丢了工作的艺术家，资助一万……。他和奶奶一辈子都是工薪阶层，基本生活来源不过是那些离休工资。那时节一万块钱，是他们好几个月才能够攒得下来的。碰到耗费好几年心血的书稿出版了，拿到一笔稿费，这“额外”的收入他更是要找到各种渠道捐掉。奶奶有的时候会埋怨他捐得太豪爽，毕竟年纪大了，以后的医药费自费的部分也会不菲，但他却仍然这样乐善好施。

爷爷的心脏一直不太好，累到或者气到容易引致心脏病发作。有次一连几天爷爷都在书房躺椅上闭目养神，没办法写作看书，晚上更是听不到熟悉的新闻联播的声音。而那几日并没有来访宾客话不投机之类的事情，我问了奶奶，她连连叹气，说爷爷明明身体不好，在赶自己的书稿的同时，仍然答应帮助并不熟识的学生看论文提修改意见，把自己累倒了。奶奶的劝说却并不奏效，之后仍然常常听到奶奶埋怨爷爷不顾自己精力有限，还总是轻易答应帮助别人。

对于家人，作为爷爷奶奶，他们也是与众不同的。常常听到关于“隔代亲”，祖父母过于溺爱孙子孙女的事情，但这在我家从来只有相反案例。他们始终坚持，孩子从小绝不能娇纵溺爱，要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才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爷爷除了经常讲他小时候条件如何如何艰苦，展示给我看他回乡务农时候穿的补丁摞补丁乞丐一般的褴褛褂衫，耳提面命我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多么幸福之外，更是严格杜绝一切会造成我娇生惯养的行为。对我这个唯一的孙女，他们从未给过我压岁钱和零花钱，更是从记事起就要求我自己能做的事要自己做。例如，6岁起便要吃完饭洗自己的碗；经常用国外小孩独立自主的事例来教育我；妈妈偶尔为我买来新上市还较贵的水果，每次都被爷爷批评太宠着我；如果我犯了错遭到爸妈的批评和训斥，爷爷奶奶绝对不会出面护着我；学校组织拉练、军训等等，他们也从不会说心疼我的话，而是说多吃苦锻炼一下是好事。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除此之外，爷爷奶奶虽然离休在家，但他们根本没多少闲暇时

间，白天要看书看报写文章出书，晚上要看新闻看访谈了解国内外时事，还要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客人，留给我的时间其实极为有限。以至于看到别人家拿着好吃好玩的宠着孩子无微不至的爷爷奶奶，心里着实非常羡慕。但长大离家后，相比很多同龄人，我能更快更好地适应各种环境，才明白他们的教育方式对我有着怎样正面的影响。

若说爷爷曾经送过我什么礼物的话，那一定是书了。从幼儿园的《格林童话》，小学时候一整套的《科学家的故事》，中学的《少儿百科全书》，到我考上大学生物专业后的达尔文的名著《一个自然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以及他自己校、编、译的《爱因斯坦语录》，《走近爱因斯坦》等等，甚至我关系最好的几个朋友来我家时都被赠予了他的书。只是惭愧的是，我对于书对于知识的热情和他相比差之千里。每次他的书出版，总是会跟出版社订上起码一两百本，寄回家里来散发给感兴趣的亲朋好友们，我就曾多次用自行车帮他由邮局把书驮回家。除了书，爷爷还非常喜欢把他看到觉得很有意思、值得一阅的文章复印下来，分发给家人朋友，以至于复印店伙计都跟他非常熟识，按批发价给他送货上门，每次送来的都有一推车。不幸的是，因为有些文章内容敏感，又被广而发之，不知怎么被当局知道，后来复印店被警告，再也不敢接爷爷的复印单了。看书看报是他最大的兴趣爱好，除去书房整整两大排的书柜早已爆满，客厅里新添的书柜都很快被他塞得满满当当，到后来连放书柜的地方也没有了，很多文件书籍（包括新版的《爱因斯坦文集》）都只能堆到阳台上。

他总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学校的那一套应试教育非常不以为然。题海战术，死记硬背从来都是他最嗤之以鼻的。从小学开始就非常流行的各种课外培训班，补课班，奥数班等等，他一概说：“没有意思！我小时候下了课都是跑出去玩儿的！小孩子就是应该出去玩儿的嘛！上课好好听讲，把知识真正弄懂就够了！”期末考试前，他也常常劝我不要熬夜做题，应该早早上床休息，这样第二天脑子才是灵活的，而复习应该是平时早就做了好几遍的事情。他也非常反对分数挂帅，认为考一百分“没必要”，培养求知欲、好奇心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中学时代开始上物理课以后，爷爷有时会在饭桌上考我牛顿三定律是怎么回事，伽利略是何许人也等等一连串的问题。我常常被他问到哑口无言，甚至有次羞愧得哭了起来，这时候他会哈哈大笑，说其实很多物理学家也回答不清楚这最最基本的问题，然后非常有条理地，引经据典地回答这些问题。不过这也导致我从来不敢拿物理习题去问爷爷，怕被他反问到羞愧难当。然而也有他被我问倒的时候。我大约四岁的时候曾经问他：“为什么树可以长得那么高，人却不可以？”他非常坦诚地说“不知道”，并且夸我问得好。他没有因为我是小孩子而随便敷衍我，更不会不懂装懂。他甚至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当时在美国做生物学博士后的伯母，请她来回答我这个问题。

初中的政治思想课，老师要求每人写一篇短论文，爷爷奶奶非常认真地与我讨论论文题目，建议我写“人治与法治”。当然这样大的命题对于当时才十三、四岁的我来说，只能写得非常浅显。但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零零散散地在家里的餐桌上，听爷爷奶奶讲关于他们那个年代的种种浩劫，关于89年的那场惨剧，以及民主、法治、“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等等。虽然年幼的我并不太懂得这背后的深刻意义，但仍然帮助我在这方面比同龄人有了全面很多的认识，以及懂得独立思考，不盲听盲从的重要性。

虽然爷爷严肃的时候吓死人，可其实他很多时候都像个孩子一样。碰到没听过的新奇事物，会一惊一乍地欢呼雀跃：“哦！哦哟！嘿！这个新鲜了！”；买到便宜的东西，会炫耀地到处说；对人对事对物，总是十分的诚挚热情；最难得的是，他视名利如粪土，对于他热爱的事物，会恨不得把心掏出来完全献上。他的工作，他的理想，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比他自身和家人的利益，位置都要高。

想到再也见不到我可敬可爱可畏可叹的爷爷，不禁悲痛不已。若要用什么来总结爷爷这跌宕起伏的一生所坚持的，那便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他的母校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竺可桢校长对这两个字的阐述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最好的例子就是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行为，他们亦是爷爷常常提起并意欲效仿的榜样。为了“求是”，爷爷付出了他所能奉献的全部，包括最后他的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做科研教学之用）。惟愿爷爷的灵魂能够安息，他的精神能够与世长存。

浩然正气越千载

——痛悼三叔许良英

许从平

2013年1月28日下午，三叔的小儿子许平弟媳陈罕立从北京来电话，惊悉三叔1点25分仙逝。听到噩耗，我头如雷轰、心似刀绞，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三叔比我父亲还要亲，这怎不使我感到万分悲痛！！

万万想不到三叔走得这么突然，这么快。上月，他还写信给我。他对我的谆谆教诲，依然在耳际回响；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眼前呈现。三叔，我多么想念您啊！

他上个月写给我的信，可能是他一生写的最后一封信，在这里抄录全文以作纪念：

从平：

11月中旬两信都收到。你去了一次香港，大开眼界，很有好处。

上封信中告诉你，我已开始写批驳北大教授尹保云在《炎黄春秋》上把民主与专制混为一谈的长文，结果却搁下了，是因为意外地插进另一件更重要的工作，这是看自传（1958年以前）的校样。这部自传，系1989年6·4之后至1992年最沉闷的三年中写的，共22万字。只有你一人看过。今年上半年，对我作过访谈的腾讯网记者介绍一位资深的三联书店编辑来，我借他我的自传稿，后来未见讯息。11月1日突然送来已排印好的稿样，使我喜出望外。因为三联声誉很高，自传由他们出，当然很理想的了。现在，我和许平都在赶看校样。

这个冬天北京特别冷，我已很多天没有出门。来棣住在301医院已三个星期了。就写到这里。

祝：冬安！

三叔

2012.12.4

我回信，希望他在近年续写 1958 年以后的自传，其中 1958 年—1978 年这 20 年在老家当农民的往事，我可以帮助他一起回忆，争取早日全部完成。按照他的健康状况来看，多活几年是毫无问题的。然而，想不到他竟这么快地走了，让人难以接受。我未能见上他最后一面，是我终生最大的遗憾！

2012 年第 8 期《炎黄春秋》杂志刊有北大教授尹保云的长文《对“民主”的三个认识误区》。文中说：“作为现代文明最高体现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世界范围聚集有用因素的基础上而形成的，西欧本土因素与外来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最重要的外来因素恰恰是由中华文明提供的，即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科层官僚和文官考试制度（即科举考试）。”并且说：“西方民主制度是西方传统的‘民主’与中国传统的‘集权’两个系列的因素相结合的产物。”等等。文中错误论调，令人吃惊；竟然出自堂堂北大教授之口，可悲！我即写信告诉三叔，他于 8 月 31 日回信说：“《炎黄春秋》上尹保云长文《对“民主”的三个认识误区》，我原没有注意，经你指出后，觉得错误严重，应该批驳。我准备以《民主与专制不可混淆》为题。想不到一位北大教授竟会如此不成器！”我一直期待着三叔早日写成批驳文章，可是却已无法完成了，令人遗憾！不知还有谁会写这篇批驳文章？

当今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谈论有关民主的很多文章，作者不是曲解民主的真正含义，就是披上“假民主”的外衣，为“专制”辩护，他们都是一些“学者”、“教授”，由于国人普遍对民主的无知，包括知识分子中间许多人，也同样不懂民主的真谛，容易受骗上当。三叔说自己虽然青年时代投身于民主革命斗争，向国民党政权要民主、要人权，实际上根本不懂民主和人权的真正意义，以为只要代表多数人民利益的共产党掌权了，就民主了。经历了三次民族大灾难后，直到 70 年代中期才猛然醒悟，然后通过不断的认真学习，总算搞清楚民主概念的内涵。所以他一再呼吁要进行民主思想启蒙教育，尤其是知识分子自身要不断地反思和学习，要启自己思想的蒙。近年，三叔曾写了多篇文章，批驳那些宣扬“伪民主”和“反民主”的文章，已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有：《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2009 年第 7 期）、《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2010 年第 12 期）、《走出伪民主的误区》（2011 年第 10 期），等等。这些文章影响较大。

三叔一生跌宕起伏，坎坷曲折；但却波澜壮阔，可歌可颂。在三叔身上，最令人崇敬的是台州人的硬骨头精神——“台州式硬气”——正如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称道的。古有明代不怕杀头“灭十族”的台州人——方孝孺；今有不怕杀头光明磊落的台州人——许良英。一方山水一方人，正是家乡的明山秀水孕育了这种精神。三叔自小酷爱家乡浙江临海张家渡的山山水水，盛赞家乡的山光水色美如画，他最钟情于括苍山下、永安溪畔的象鼻岩。在三叔身上，铁骨铮铮，一身浩然之气。正是这种浩然之气，使他无论在逆境之中、在恐怖高压下，还是在死神面前，无畏无惧，脸不改色心不跳，泰然处之。这种宁折不弯、不怕杀头的大无畏精神，在当今社会是极为稀缺的。

抗日战争期间，在已搬迁到贵州的流亡大学——浙江大学读书时，三叔决心投身革命，经过一年半不懈的思想斗争，彻底解决了生死问题。他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到“解放”，以为自己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就已经死在敌人的监狱里或刑场上。1947 年，他担任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后任杭州工委委员兼大专区委书记，对新党员，首先进行“气节”，即

生死问题的教育。怕杀头，就不要入党。“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叔所领导的地下党被怀疑是叛徒特务组织，把他从老家张家渡押送到浙江大学审查。在浙大，受到多次批斗，批斗会上把他用“喷气式”解押上台。在关押了长达11个月后，最后审查结论：个人历史全部清白；整个地下党系统属于红线。然后，他被遣送回家。可是，回到张家渡，当地准备召开全区万人大会，把他当作“城西区反革命总根子”来批斗。三叔无法忍受再次的凌辱，以死来抗拒。批斗大会前晚，我彻夜守候在他床边以防意外。大约凌晨4点钟，就在我离开到灶间拿粥来充饥时的一刹那，他把早已藏在身上的二瓶农药“敌敌畏”喝了下去。幸好抢救及时，大难不死。当我看到三叔躺在医院走廊的石板地上抢救时的那种惨状，惨不忍睹。我欲哭无泪，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几乎晕倒在地。三叔昏迷了12个小时，苍蝇飞到他嘴边都死掉。在三叔劫难时，我满腔悲痛与愤恨。“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如果失去三叔，不仅是个人家庭，而且是国家、民族的损失。那年，三叔还只有49岁。那天夜里，面对死神，三叔还感叹地对我说：“我终生遗憾的事是再也不能做世界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因为这个领域中国至今还是空白。”在他生命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祖国科学事业和自己的责任。

为了推动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以全面推动改革发展，1987年，三叔与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当年“右派”钱伟长通过民盟把邀请信交给当局，致使会议流产。邓小平下令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把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党籍，其后发生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等一系列的整肃。在高压下，三叔无畏无惧，胸怀坦荡。1987年8月27日他在给我的信里明确地说：“国运、民心是大事，个人遭遇算得了什么？真正要改革，要实现现代化，没有谭嗣同这样的志士，是不可能成功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豪迈地表示：“这头杀在民族有用的地方，死而无憾！”三叔真正做到了“五不怕”，即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开除公职、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他是“五不怕”的过来人，五个“不怕”他都亲身经历过。

1994年3月，三叔起草了《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呼吁书，有三婶王来棣、丁子霖、邵燕祥等人联署。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载了呼吁书全文以及记者对三叔的访谈，在国内国际产生重大影响。可是，三叔本人却遭到软禁。《美国之音》记者从美国洛杉矶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他。在采访谈话中他这样表示：“把我抓起来，我准备死在监狱里，做中国第一个为人权而死的人，像过去的谭嗣同一样。这也好，我已活到74岁，我已活得够了，我解放前提着脑袋搞革命，那时没有想到会见到解放，我没想到会到49年。现在见到了，看到国家被搞成这个样子，我的生死问题青年时就不考虑，现在用不着担心，我会从容地对待。”

“做中国第一个为人权而死的人，像过去的谭嗣同一样”，三叔的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在三叔身上只有傲骨，没有傲气。1938年在他上大学前家居自学时，就把清初文人陆陇其的名言“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为三叔终生所信守，它是我们台州人引为自豪的“硬骨头”精神的一种理性的升华。

三叔对社会上的黑暗丑恶势力，以及坏人坏事疾恶如仇，但待人真诚坦率，直来直

去。他说自己一生可引为骄傲的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除了解放前对付国民党特务)。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他就是一位这样的“三真”之人。三叔一再强调,致力于民主事业者必须以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人人人格平等,不可自视高人一等,他自己也做到了。可是,在当今所谓“民运人士”中,有人自视飞在天上的“明星”,不懂民主,却要高喊“民主”;替“专制”吹喇叭,却自吹在宣扬“民主”;是个“政治流氓”,却成了“民主旗手”,而且还有人为他吹捧。三叔对这些人非常反感和厌恶,他曾在给我的信上说:“与这类无耻之徒接触,只能玷污自己。”

三叔一生,从少年尊崇爱因斯坦,青年立志“科学救国”,做“当代物理学权威”;到大学读书时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不惜掉头颅,抛尽韶光;后来又从“愚忠”中解脱出来,转而又大彻大悟,最终回到科学与民主的立场上来。正如许成钢在他祝他父亲90大寿时写的文章中所说:“众多的人敬重父亲,是因为他为科学与民主的真诚和执著;因为他只服从真理;也因为他毕生为推动中国的科学与民主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三叔因公开反对“反右派”运动,被作为中国科学院头号“右派”受到批斗。1958年6月回老家张家渡,当了20年农民。1961年5月,我在临海二中(复名“回浦中学”)高中毕业班读书,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下放回乡,与三叔在同一个生产队当了10年农民。在此期间,我有近二年与三叔同住一室朝夕相处。他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更重要的是引导我怎样做人,如何选择人生道路。他走过的道路和他的一言一行是我最好的榜样;亲聆他的教诲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他对我的关爱胜似父亲。

1978年6月,三叔恢复工作回科学院后,仍然关心着我。有文章发表,或新书出版,以及好的材料和书籍,都及时寄来。有时,刚写好的文章尚未发表先寄来让我看。他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心却仍然牵挂着我,书信来往,就成了最好的交流。在这30多年中,他写给我的书信多达385封。每次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他的来信,是一种极好的精神享受。这些书信和文章都成了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像甘露一样滋润我成长、成熟。如今,三叔以他93岁高寿走了,但他依然活在我心中。在他90大寿时,我撰写了回忆录《我和三叔许良英》,印了500册,赠送亲友。2010年12月,香港明镜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改为《肩住黑暗的闸门——我的三叔许良英》。此书记述了三叔民主思想对我的影响和启迪,使我受到民主思想启蒙教育;并记录下他一生为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而奋斗的历史。留下这段历史纪录,使我感到无比欣慰,也是我一生最大的精神安慰。让更多的人认识三叔,了解三叔,这是我的心愿。三叔的思想,三叔的精神,依然活在千万人的心中,永远,永远!三叔的民主思想必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国人受到启蒙!他播下的民主种子,必将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他的民主理念必将代代传承!!

最后,以三叔90大寿我献给他的祝寿诗结束:

真理深藏傲骨在,且将冷眼对魑魅;
逆流恶浪无所惧,浩然正气越千载。

2013.1.30

做一个正直的人

——悼念三叔公许良英先生

许晓光

下午两点父亲来电，三叔公在一点二十五分去世了！尽管一直关注叔公的病情，但他离世的消息仍令人悲痛万分！我的精神生命是与叔公紧密相连的，是他塑造了我的人格、坚定了我的信念。和我父亲一样，叔公也是我思想的源泉和精神的支柱！

我出生在文革末年，名字就是叔公起的。晓光两字寓意“黑暗年代的曙光”，寄托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希望。生命中第一次有叔公的印象是在我五岁生日时，收到叔公从北京寄来的生日礼物，是两本彩色的童话故事画册，其中一本就是《皇帝的新衣》。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希望我做一个人！

这是叔公对我最早的教诲，这简单而深邃的一句话却困惑了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小男孩怎么可能理解一位饱经沧桑却热爱生命如故的六旬老人的肺腑之言？即使今日我已步入中年，但扪心自问，“做一个正直的人”谈何容易，尤其在一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社会。

父亲与三叔公情同父子，他们曾在临海老家当农民共同生活十多年。叔公去北京后，两人一直保持密切的通信。30多年来，叔公寄给父亲的信有360多封，信件中往往附有叔公在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因此，我从中学开始就接触到叔公推崇科学精神与民主制度的思想。高一时的“六四事件”，也因为叔公而对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更多关注。

大学期间，我开始与叔公直接通信。他指导我应该如何读书，尤其是思辩性强的哲学著作，一定要细嚼慢咽。有次我问他是否应该入党，结果被狠批了一顿。他说以前他们这一代是真正为了信仰而入党，出生入死，可现在入党的动机不纯，功利性太强。因为他的教导，我即使在浙大读研时被评为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也拒绝了组织的好意。那时收到叔公的文章，都会仔细拜读，如《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92）、《人权概念与现代民主理论》（93）、《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95）。我曾写过一篇有关浙大“求是”校训的小文《弘扬求是精神》，很得意地寄给叔公，结果他认为我对“求是精神”的理解很肤浅。

我小时候叔公来老家与我有过合影，但真正第一次与叔公面对面交谈是在98年暑假做硕士论文收集资料来北京。他一口夹杂临海土话的普通话对我没有任何问题，交谈间，我仿佛见到爷爷的影子，他们四兄弟说话神态很像。亲切的笑容、敏捷的思维，与他谈话是种极大的精神享受！但在他面前，不可以有半点的虚伪和言不由衷，否则，他犀利的言辞会让你无地自容。

我在研究生毕业后进了杭州出版社做编辑。叔公给我推荐了一本《爱因斯坦语录》，请他在德国的学生仲维光先生翻译，并为中文本作序。他在序言的第一段写道：“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有不朽贡献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热切关心人类事务、主持社会正义的

世界公民，一位有探索精神和独立批判精神的思想家”。我想，这段话也是叔公对自己人生的写照，他始终以爱因斯坦做为榜样，以他的人格力量和思想激励和感染着我们！

当 06 年《纽约时报》刊出介绍他的长文，我将文章译成中文《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事业奋斗的反叛者》。文章这样评价叔公：“七十年来，许良英作为中国的爱因斯坦传人，投身于革命与物理学的双重事业，宣扬政治自由和科学探索的价值，不时地与中国的官方立场针锋相对。用“德高望重”来形容这位老者，就犹如白雪应覆盖于高山般的贴切，尽管他看来还没丢失毫厘的反叛之心。”

做一个正直的人，就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一种难能可贵的不依附任何权贵的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可以让叔公在生命坎坷的岁月中，始终坚守是非的底线。他的《为王丹辩护》、《89 十年感言》都写得义正辞严、浩然正气。尤其在 89 后冰天雪地的日子里，他的声音是一种温暖的力量。难怪美国前总统布什在 08 年来北京参加奥运会前在曼谷的演讲中提到：“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由于工作原因，去年我连续三次到北京拜访叔公。叔公依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很高兴我能继续在浙大攻读伦理学博士，他特别推崇斯宾洛莎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谈到他和叔婆花了十多年心血写的《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特别提到民主价值中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是一个都不能少。

我还很温馨地记得，5 月那次我去拿父亲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为祝贺叔公 90 大寿而写的回忆录《肩起黑暗的闸门：我的三叔许良英》。在我将书用报纸包扎好以后，叔公觉得不放心，亲自又重新捆了一遍。他做事一丝不苟的态度可见一斑！叔婆就坐在边上笑我们。

如果将我的生命分成两半，今天就是这个日子-----有叔公的日子和没有叔公的岁月。在人生未来许许多多的日子里，叔公许良英先生的音容笑貌会一遍遍出现在我脑海中，在披荆斩棘的路上，许先生的精神将与我同在！

（2013 年 1 月 28 日晚于杭州，

载 2013 年 2 月 5 日许晓光博客）

第二辑
悼念王来棣





1941年冬，王来棣（后左）
与温州永嘉中学高一同学



1948年于杭州西湖



1951年4月与许成钢
在杭州市青委



↖ 1961年王来棣
（左5）在北京王府
大街东厂胡同1号，
近代史所。

↑ 1964年春，王来
棣（右3）与近代史
组同志于办公室门
前丁香树下。

← 1965.10. 王来
棣（前左1）在山东
黄县劳动。



↑ 1981.10.15. 于武汉东湖宾馆，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与日本学者石田米子交谈。

➔ 1986.11. 与丁日初（中）、陈崧在中山市中山纪念堂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1984.5.20. 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与近代史所同事。

右起：石芳勤，王来棣，贾熟村，
龙盛运，刘耀，钱宏



老年王来棣于北京中关村

校友王来棣：温州走出的史家

金辉

据《东方早报》1月19日报道：在2012年的最后一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因病离开人世，享年86岁。几乎与此同时，其先生许良英也住进了北京海淀医院重症监护室，28天后伉俪二人重逢于天国。消息传开后，很多熟知许良英、王来棣夫妇故事的知识分子感到震惊。王来棣是温州人，是从平阳鳌江王宅走出的现代史专家。

上世纪初，平阳鳌江还只是个停靠渔船的埠头，旧称“坞舫头”。深受维新运动影响的王理孚热心兴办教育和开发家乡的工商业，成了鳌江开埠先驱。王理孚次子王载彤（字文川），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他创建经营王广源商号，发展成为综合性大企业；他兴建码头，使鳌江成了当时浙南进出口贸易重镇。王文川育有三女一子，王来棣是次女。

几年前我们计划就其祖父王理孚之事采访她，王来燕推荐我与王来棣联系。可王来棣称自己身体有恙，无法接受采访，只得作罢。当得知王来棣驾鹤西去，便与其子许成钢联系准备采访。不料，没几天许成钢的父亲也去世，许家丧事连连，我不忍打扰。于是采访了王来燕。

王来燕现居江苏徐州。当她15岁还在温州中学读高中时，便放下课本，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报名参军，成了志愿军，但她没有跨过鸭绿江。后由部队保送到北京航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沈阳等地航空工厂从事技术工作。对于姐姐的过世，王来燕是心疼的，但是她更为自己有这样的二姐而自豪。那天，我们在电话里一起回忆王来棣先生。

相继去世痛追忆 捐献遗体见风骨

金：前些日子，先后从《东方早报》、《南方周末》等媒体上得知令姐去世，温州乡亲为她的过世感到震惊。我与您的外甥许成钢先生通过电话，也表达了我们的问候。

令姐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名家，她的品德与其先生一样，传承了中国读书人的风骨，令我们后人敬仰。那天您去参加她的追悼会了吗？

王：棣姐4年前患上鼻癌，做了切除手术，虽手术还算成功，可癌细胞还是转移了。近半年来，她一天天瘦了下去，一直瘦到真正只剩下皮包骨头。我是去年12月30日赶到北京的，当时她已处于弥留状态，我们姐俩没能说上一句话，很是遗憾。

根据棣姐生前遗愿，她的遗体捐赠给北大医学部遗体捐赠中心。那天真是有点惨，我姐夫许良英病危要进行抢救，我的外甥许成钢、许平兄弟俩只得分工，由成钢护送母亲遗体，许平送父亲进重症监护室抢救。因此，兄弟俩没有精力细安排举行遗体告别仪式。1月28日，许良英也逝世。听说，他们准备在适当的时间再举行追思会。

祖父赠字影响大 大学参加地下党

金：面对变故，你们也只能节哀顺变，继承遗志，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你们都出生在鳌江，应该一起长大的。您能说说令姐在家乡时的一些故事吗？

王：我们都出生在鳌江。当我5岁时，我们家搬到了温州市区，居住在大南门土地堂巷一带。这时在平阳临中已读了一年的棣姐转学永嘉县立中学（今温州二中）读初二。棣姐比我大10岁。记得她经常带同学到家里，他们聚集在一起，好像是开会。现在想来可能是读书会。他们嫌我“捣乱”，总是把我关在门外，我不肯，闹着要进去。后来她去青田、杭州等地读书，我们很少见面。听说，1942年她考取永嘉县立中学高中时，祖父送给她四个字“毋忘国耻”，对她影响很大。

棣姐在中学时代的一些情况，我也是从她的老同学沙里（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回忆录中获得的：1942年，读高一的沙里，担任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棣姐担任副主席。随着温州各校话剧运动的开展，他们也组织了永中剧团，沙里任团长，她任副团长。他们不仅在校园里演出宣传抗战剧目，同时走向社会公演。他们在演出话剧《雷雨》中，国文教师潘希真（即台湾著名散文作家琦君）饰演女主角繁漪，引起轰动。因此，她与琦君交情深厚。

金：年轻时的令姐就很活跃，有一腔爱国热情。听说在浙江大学读书时便参加地下党活动，并成了地下党员。您有听她说起当时的情景吗？

王：地下活动是保密的，家里人都不知道她的行踪。1949年后她仍然很少讲起过去的光荣历史。我也是断断续续了解到，在浙江大学读书期间，她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47年9月加入地下党。1949年5月杭州解放，姐姐任中共浙江大学总支书记。6月，被派往浙江省青年干部学校，任第三中队指导员兼第三支部书记。8月，调中共杭州市青委组织部，曾任组织科科长。

我是在1951年7月才第一次见到姐夫。当年我告别了母校报名参加志愿军，要在杭州集合，顺便去过他们家，他们刚刚结婚不久。他们送我一张结婚照，留做纪念。姐夫许良英在浙大物理系当助教时和姐姐结为终身伴侣。

访谈中共创始人 研究中国当代史

金：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经历过革命斗争的考验，新中国的成立，正是发挥作用的大好时机，所以很快被调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了，此时应该是出成果的好时光，是不是这样？

王：也可以说，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坎坷命运。1952年9月，他们夫妇俩一起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姐姐分配在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身）现代史组，从事现代史研究。

在第三所，姐姐的工作热情很高，而且精通业务，成了所里的骨干，曾任所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她早期的研究涵盖五四运动、中国无政府主义派、中共早期历史等领域。

她在研究中共初建时期历史时，从口述资料的搜集入手。在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帮助下，自1956年4月至1957年5月间，她访谈的30多名中共创始人中，包括党政高级领导人，如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邓颖超、李达等；著名知识分子，如邵力子、施复亮、罗章龙、沈雁冰、丁玲、陈望道、萧三等。整理出来的访谈记录稿，受访者大都作了认真修改、补充和订正，为重建早期中共历史收集了珍贵的资料。她成了第一个系统地以访谈方式研究中共建党史的学者。

“反右”运动开始时，她是所运动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姐夫被打成“极右分子”后，她因劝阻无效，以“包庇右派”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并降级。为此，她伤心过度，怀孕10个月的胎儿惨死腹中，学术研究也中断。

为了保住两个儿子在北京的户籍，他俩只得违心办理离婚手续，直到1979年平反后复婚。那时，我在东北工作，也因出身成分被隔离审查，彼此失去联系。这些情况也是后来听说的。

金：她在苦难中是怎么过来的，你知道吗？

王：“反右”运动中，姐夫许良英被错划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配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监督劳动，每月29元生活费。他不去，选择辞职“自谋生路”，回到台州老家务农。此间他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

20年中，棣姐独自带着两个儿子在北京艰苦度日。她很坚强，有困难自己克服。我妈妈知道她生活困难，要资助她一笔钱，她谢绝了。许成钢到黑龙江绥滨军垦农场劳动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尽折磨。成钢说：那个年代，敢和他联系的人只有他的母亲，经常去信鼓励他坚强面对，努力进取。

“文革”期间，为了保护一些正在挨整的中共创始人，在外调的威胁逼迫时，她被迫烧毁了部分珍藏的访谈记录资料。

一颗爱心系灾区 梅花精神传后人

金：王先生是位坚强的女性，不论在家中，还是学术研究中，她始终坚持真理，追求真理，身上有“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的梅花精神。您是怎么看待二姐的？

王：平日里，姐姐和姐夫生活非常简朴，家中除了满屋子的书籍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像样摆设，可他们有一颗爱心，对灾区老百姓却一点儿不吝啬，四川汶川地震那年，不声不响地捐赠了一万元人民币。他们都是胸怀坦荡、有理想有追求的战士。早年出生入死投身革命，追求民主、自由，身后又将遗体捐赠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实在是精神可嘉，难能可贵，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姐姐而自豪。

金：是的，二姐走了，可是她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不知她生前与温州的联系多否，她的子女现在的情况如何？

王：棣姐回平阳老家的机会不多，新中国成立后她仅回家5次。但她热爱家乡，尊重先辈。2002年，平阳县鳌江镇出版的《鳌江开埠先贤王理孚与王文川》一书，姐姐撰

写了《怀念父亲王文川先生》和回忆小姑妈的文章《王凤阁生平》，当时，她的视力已经严重减退，但仍然克服困难，坚持完稿。永强九旬老人王兆襄先生研究王理孚，撰写了《王理孚先生年谱》一文，后由我寄到北京请姐姐审阅。她非常认真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对文章进行了修改补充，对祖父的生平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虽然她的一生命运坎坷，可她的孩子挺优秀的。长子许成钢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香港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妻子郭迪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现为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次子许平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学博士、教授级高工，妻子陈罕立现为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王来棣孙女许蒙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环境科学博士生。

（原载《温州都市报》2013年3月9日）

北望云天黯无语——追念王来棣先生

傅国涌

2013年第一天，在严寒中惊闻噩耗，王来棣先生已于2012年的最后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此时，许良英先生在昏迷了十多天之后，已送进海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想起2012年9月9日下午，在北京中关村见到王先生，我要给她拍一张照，她还去梳了一下头发，然后安详地坐在椅子上，斜阳穿过玻璃打在她的脸上。其时她身体已经比较虚弱，还不停地起身去给我们拿矿泉水，去阳台上找书。她说自己脑子不够用了，很多事想不起来了。临别时，她要起来送我，不曾想这就是最后一次见到她。自从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她们家，十七年来，我曾无数次走进这个家，每次与许先生聊天，她总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偶尔说几句，她的语调总是那样轻柔，她与许先生心意相通，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从理念到现实的判断大体都是一致的，每当许先生说起某些人、某些事有点激动，她总是在旁边轻轻地提醒。

自我认识她以来，每次见到她都是那样平静，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乃至晚年的疾病，她身体虽越来越衰弱，但是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从容、淡定和平静，她对现实环境的险恶有清醒的认识，却没有任何的焦躁、不安，或激愤，有的是从容面对，坚持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尽其所能地为自己的目标努力。

2009年春夏之交，我去她家，当时正值“五四”90周年前后，她是长期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我问起，在她看来，“五四”运动主要受什么影响？她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6月1日她给我来信说，事后想起来，这样说不对——

“五四”一般指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为起点，主要是受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的刺激，陈独秀等从国外回来不久，接受西方文艺复兴、民主启蒙的影响，他在《青年》创刊号上就向中国人介绍近代文明的核心内容：“人权”和“科学”（后来“人权”扩大为“民主”），反对帝制复辟，批判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伦理道德观，提倡解放思想，做自己、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我说的十月革命影响，指的是

1918—1920 年间新文化运动从提倡民主、自由、平等转为“走俄国人的路”，五四民主启蒙运动因此夭折，变了质。特此更正。

平时我都是和许先生通信，王先生有什么话也都是通过许先生转告。所以收到她的信我很意外，那份认真，令我感动。这大约是她直接写给我的第二封信（此前 2005 年她读了我的《主角与配角》之后，曾专门给我写过一封信）。她自从几年前得病、做过手术之后，记忆力已大大减退，读书会头痛，但是生活还能自理。2012 年 1 月初，我去北京，事先没有打电话，就直接去了他们家，那天许先生在 301 医院住院，我和王先生闲话家常，单独聊过一次，聊起她的家乡，她的爷爷，她少女时代在家乡的一些事。

她于 1926 年生浙江平阳县一个书香门第，我曾听她说，她爷爷当年买下南麂列岛，率先开发。读了她怀念爷爷的文章，才知她爷爷王理孚先生 1909 年在浙江谘议局选举中当选为议员，辛亥革命后担任浙江都督汤寿潜的秘书，曾做过鄞县知事，1917 年辞官回乡，不仅开发荒岛，而且在家乡鳌江镇上兴办教育、实业，授意儿子王文川先生（也就是她父亲）开设了王广源商号，在他们推动下，昔日的渔村鳌江出现了银行、电报局、电话局、电灯厂和医院等，成为浙南一个繁华的现代市镇。她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1939 年考入温州永嘉中学，在校期间就显示了才华和理想，曾与琦君、林翘翘等师生一同参加话剧表演，她是话剧团副团长，上演过《茶花女》、《北京人》、《雷雨》等话剧。她还是学校“霜叶红于二月花”诗社的主要成员。抗战后考入浙大史地系，1949 年毕业。大约 2005 年她跟我谈起竺可桢校长，在她眼里，竺可桢不大会说话，却是一位可敬的校长，她说：“在我脑子里他像父亲一样，同学生的关系”。她印象最深的是竺可桢对于子三运动的态度，她当时就听过校长一次讲话，非常感动。在浙大，她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还担任过浙大的总支委员。正是在浙大，她与当时物理系的助教、地下党的负责人许先生相识、相爱，并结为伴侣，他们一生的命运也就紧紧结合在一起。

1957 年 6 月，反右运动发生，许良英先生本来没有“右派”言论，那时他是一个一心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党员，但他想不通为什么突然要搞反右斗争，这不是失信于人吗？明明是党鼓励大家提意见，却反过来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打击。他要起来“维护真理和党的利益”。他因为反对反右而落入网罗，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1958 年 3 月 1 日，给他的处理是保留公职、发配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监督劳动，他想不通，结果选择了当时几乎就是绝路的自谋生路。当他回到家中，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王来棣先生哭了，当时她怀孕已快分娩，一连哭了几个晚上，结果孩子被哭死在肚子里。她却还是谅解许先生，给了他不少精神上的安慰，使他鼓起重新生活的勇气，结果以同情右派丈夫的“罪名”被株连，开除党籍、还取消了研究党史的资格。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从事研究工作，奉命研究中共建党史（附带搞清楚无政府主义对建党的影响），从 1956 年 5 月起，她在一年当中采访了三十多位建党的当事人，包括李达、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冯白驹、邓颖超、刘清扬、陈望道、邵力子、施复亮、罗章龙、包惠僧、张申府、沈雁冰、杨之华、丁玲、刘仁静、萧三等，已列入 1957 年下半年采访计划的有董必武、李维汉、李富春、谭平山等。采访被迫中止，采访记录和收集的文字资料全部交公。如果光是看这个

名单，这些口述史料的珍贵也可以想见。他们的口述有细节，不回避，生动而丰富，比如很多受访者直言最初信的是无政府主义，并不理解马列主义到底是什么。她最初做这个工作，只是奉命而行，并没有意识到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当时大陆学界还没有口述史这个概念，实际上她就是口述史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尽管不是自觉的。她整理的大部分访谈记录稿都经过了受访者本人亲自审阅、校正，那些删改过的地方，有的就是因为怕触犯领袖权威。她回忆当年采访时，受访者往往比较轻松，实话实说，能够坦诚说出自己当年的真实感受，一旦形成文字就难免有所顾虑。林伯渠在原始记录稿上做了很大的改动，几乎删掉了三分之二。

屡经劫难，李达、徐特立、罗章龙、张申府、包惠僧、刘仁静等人的记录或被烧毁，或丢失了，幸存下来的26篇口述记录（五十年后才成书《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在海外问世），当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关乎这个日后将影响整个中国命运的革命党的历史起源，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口述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当年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王先生的后记《关于“走俄国人的路”的思考》，她特别提到这26位受访者中有很多人是在“反右”和“文革”中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这是他们最初踏上这条路时万万想不到的，历史就是如此残酷。

1958年4月，许先生决定回故乡浙江临海张家渡务农，临行前对她说：“等我五年，我一定带着当地组织好的鉴定来见你！”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论等多少年！相信你回故乡后表现一定是好的，因为依你的性格，凡是你思想不通的事，很难强加于你；凡是你思想通的，你一定积极拼命干。回故乡是你自己想到的，肯定会有好结果。”

这一别近二十年。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她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成人，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庭责任。1970年，她的长子许成钢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关押。她在北京忧心如焚，很多年后，许成钢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残酷折磨下，自尽身亡的事时有发生。母亲在她所在的学部（社科院前身）及近代史所目击了整肃的残忍，担心我会发生意外。深知我已丧失所有自由（在被隔离监禁的这段时间里，所有通信来往都要通过专案组的审查），她大量寄信寄书给我，用隐晦的语言用各种曲折的方式鼓励我坚持下去。那段时间和我唯一的通信来往就是我母亲。母亲的通信是我主要的精神支柱。

1957年大难临头时，她是丈夫许良英先生唯一的安慰，1970年代的无边黑暗当中，她又成为儿子许成钢唯一的精神支柱。一个外表纤弱的女子，在患难与逼迫中成全了两代知识分子（许成钢日后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家）。她身上有一种难以战胜的力量，她是柔弱的，朴实的，纯真的，却有着比金子还要可贵的品质，不仅是她的正直，还有她身上处处流露出的文明和教养，她的家庭和民国教育所赋予她的那些品质。晚年的她似乎永远都是那样平静，我见到她以来，她从来都是波澜不惊的样子，说话从来慢声细语，即使对现实的犀利批评也出以文雅的表述，那是因为她经历过太多风雨，从1957年到1970年到1989年以后，一路走来，她已不会被任何险恶所撼动。

当王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重读台湾学者吕芳上的学术著作《从学生运动

到运动学生》，关于 1919 到 1929 年的学运史研究。王先生和许先生夫妇在 1940 年代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中经受洗礼，那已经不是单纯的学运，背后有中共地下党若隐若现的手，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条战线”。正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一代知识青年抛洒青春、热血，义无反顾地投身反对国民党的洪流，他们以为从此告别了黑暗的旧中国，迎来的将是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那年许先生 29 岁，她 23 岁。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们的会是漫长的炼狱之路。

当 1970 年代末，许先生回到中国科学院，他已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作过反思，并开始思考民主的问题。王先生那时的研究方向也逐渐转到这方面来，陆续发表了《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的演变和所揭示的问题》、《论希腊民主制》、《中国人接受人权概念的艰难历程》等有分量的论文，特别是晚年那篇研究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始版本的论文受到学界关注。她收集了《毛泽东选集》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 年最初发表、转载的多个版本，发现收入选集时删节了将近一半，变得面目全非了。原文把“反动派知识阶级”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则被归入“中产阶级”，“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也就是把知识分子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选集虽删除了这些文字，但其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并没有改变。所以，她从挖掘这一文献入手，解剖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带给整个民族的灾难，从延安时期一直到“文革”。

王先生一向低调、谦和，目光柔和，不事张扬，世人很少知道她的作为，她一直默默地站在许良英先生的后面，其实她不仅在自己的专业上有建树，而且在 1980 年代以来，她秉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始终跟许先生站在一起，参与了许多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争民主、争人权的行动。1989 年 2 月 28 日，许先生发起一份联名公开信，提出政治改革、保障言论出版新闻等自由、释放所有因思想定罪的青年、增加教育和科研经费等四条建议，有 42 位知识分子参与签名，包括 28 位自然科学家签了名，她也名列其中。3 月 18 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阎明复约请他们夫妇及施雅风面谈了四个多小时，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不久，惊心动魄的 89 民运爆发，随之而来的严酷镇压，让他们 1980 年代的全部希望化为泡影。在 1990 年代最黑暗的年头，他们中关村 812 楼的家几乎成了一个风雨中的堡垒，他们家的灯光透出的乃是一个民族微弱的希望。1994 年 3 月 11 日，他们夫妇和丁子霖、蒋培坤夫妇、邵燕祥、刘辽、张抗抗七人发表《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第二天家门就被大批警察堵上。1995 年春天，许良英先生从西安的青年朋友杨海那里得知当年是“联合国宽容年”，他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 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周辅成、吴祖光等各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签了名，王先生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这些隐没在历史深处的声音终将浮出水面，若不是他们这些有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在最黑暗的时刻发出的亮光，我们的当代史将变得更为不堪。

多少惊涛骇浪都过来了，我深信炼狱之后，他们夫妇内心已无比清醒，只想脚踏实地，在余生为未来的中国尽力，对现实他们已看透，也想透了，到 80 年代后期，他们当

年的同事、同志，有的已进入权力中枢，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他们反思早，也反思的彻底。他们面朝未来活着，不再纠缠于眼前的一切，他们的淡泊之心和探索的韧劲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从1988年起，他们夫妇决心写一本《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从古希腊写到中国，从头学起，由她执笔的希腊部分、中国部分早已完稿，许先生负责的部分从罗马、荷兰、英国、美国到法国民主演变的历史，因为工程浩大，法国部分尚未完成，理论探讨部分也未完成。这本书稿计划分三编，第一编《民主在西方的历程》，包括雅典、罗马、文艺复兴、荷兰共和国、英国两次民主革命、议会民主制的形成、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美国民主制的创立和发展、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第一章《希腊雅典的民主制》主要由她负责（许先生也参与了）。从希腊民主制产生的历史背景、雅典民主制的演变到雅典民主制的内容和特点，以及民主制度对雅典社会的影响，斯巴达与雅典的比较等，对持续了256年的雅典民主制追根溯源，论证非常详实，尤其值得一提是，他们没有回避雅典民主制度的缺陷，而是用事实说明，雅典人虽然创造了顺应人性的政治制度，却还没有形成人权概念，没有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权利，建立民主制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比如将多数决定原则无条件地应用到一切领域，造成了驱逐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哥拉事件，甚至处死苏格拉底这样的悲剧；比如只有城邦自由民中的男性才享有公民权，妇女、外邦人被排除在外，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

第二编《民主在中国的传播》，共分五章。王先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这个部分当然由她执笔。第一章《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第二章《19世纪40—9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第三章《戊戌变法与思想解放运动》，第四章《孙中山的民主观》，第五章《“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夭折》，特别是后面两章，不仅是她长期研究的结果，也融入了她们一生的经历、亲身的人生体验。她认真梳理了孙中山民主观的演变的四个阶段，以及对人权、自由、平等的看法，发现其中“往往自相矛盾，或有意无意地加以曲解”。她指出孙中山民主观混乱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对革命失败原因总结的错误，“革命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并不是由于党员自由平等思想太多，而恰恰是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民主自由的真正含义缺乏认识”，孙中山却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平等自由的思想”。对于“五四”启蒙运动的夭折，学界长期以来都比较认同“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她却认为是启蒙运动主流本身发生了变化，从主张民主走向了否定民主，导致启蒙的夭折。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陈独秀，从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起，在多篇文章中都以阶级斗争否定民主，将民主看作“资产阶级的专有物”，是资产阶级“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治底诡计”，也就是说启蒙者自己扼杀了启蒙运动。她分析陈独秀转向否定民主的原因，发现他无论在接受马列主义之前还是之后，都有排斥异己的问题，他身上有一种定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倾向，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陈独秀等五四运动的激进派所以能够轻率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否定民主，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理解不深。整个五四时期，没有一篇系统介绍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文章。偶有涉及，也常夹杂着误解。他们往往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民主革命的主要代表。”她指出，“五四”前后陈独秀只有一篇短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论及民主人权思想的历史渊源，其中有不少问题，不仅对西方文明史的观点有误，事实上也有错误。可见当时他对民主的认识十分肤浅，而当时“五四”的启蒙者中无人撰文指正。直到晚年，经历政治

上的严重挫折，尝尽种种痛苦之后，他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噩梦中醒来，冷静反思，对民主才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尽管没有摆脱阶级斗争的思想痕迹，给民主贴上了阶级的标签。

第三编《理论的探讨》尚未完成。从她们夫妇决心合力研究民主的来龙去脉迄今，已过去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耗去了他们晚年的主要精力。她在论陈独秀的最后说，“他30—40年代关于民主问题的新见解，成为禁品，只有少数人才能接触到，未能在思想界激起应有的浪花。他发动的民主启蒙运动，至今将近一个世纪，仍远未完成任务。”她们自称，整个研究、写作的漫长过程也是她们自我启蒙的过程。

李慎之先生生前很佩服他们下大决心，愿意费这么大的精力、时间去做这件事。如今书还未成，王先生却已先走了。此刻，摸着冰冷的键盘，在江南的隐晦中，我想起在风雨跌宕的中国默默地耗尽了一生的王先生，想起她淡淡的笑容，想起她轻声细语的谈论，更想起她内心磐石般的笃定，许多往事断断续续浮现在眼前。北望云天，我已黯然无语，愿她安息！愿许先生康复！

2013年1月2日初稿、1月14日改（原载《经济观察报》2013年1月14日、《明报》2013年1月，《炎黄春秋》2013年3月号）

右派妻子的苦与痛——纪念王来棣先生

熊卫民

2013年元旦的早上，我一打开电脑，就收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王作跃教授的邮件：“沉痛悼念王来棣师母！”——这位可敬的老人已于前一天下午去世。虽然我熟悉她的病情，早已有心理准备，仍然感觉遗憾：为什么老天不多给三天，让她在过完87岁生日，尤其是等她病重的丈夫许良英转危为安之后再走呢？

王先生患的是鼻癌，4年前做了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本身还算成功，可癌细胞还是转移了。只是因为她年纪大了，生长机能变衰，癌细胞增殖得也慢，所以病情发展得不快。近半年来，她一天天瘦了下去，一直瘦到真正只剩下皮包骨头。

我见过王先生脸庞丰满的模样。自2003年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和学习以来，我养成了探望研究所元老许良英先生、向他请教问题的习惯。大多数时候，王先生都是慈祥地和我打一声招呼，然后到另一个房间安静地做她自己的事，或者就坐到我们旁边，听我们谈话，偶尔插上一两句。

有一次，我跟许先生谈起了我所参加的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一些活动。她很感兴趣，主动向我询问了有关口述历史的现状和动向的很多问题，还向我借了几本口述历史方面的出版物。当时我不知道她兴奋的原因，直到三年前她送我一本新著——《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原来，她也在做口述历史，而且还是这个领域的先驱。

她的相关工作始于1956年4月。作为浙江大学史地系前学生地下党员，她在1949年后很受信任。1952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她先后参加范文澜、刘大年领导的研究项目，体现出了很强的工作能力。1956年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向科学进军”。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下，近代史所让她一个一个访谈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陈望道、萧三、刘清扬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有关的人物。当时她还没能配备最新的盒式磁带录音机，所以只是留下了大量的访谈记录、访谈整理稿以及受访人的修改稿。

可惜的是，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才进行了一半，“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因为反对“反右派”，她的丈夫许良英被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号右派揪了出来，在院内、院外均遭到大批判，《人民日报》还刊发了批判许良英的专文《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等。她如遭雷击，连续多日以泪洗面，已孕育了几个月的胎儿死在腹中。然后，“极右分子”许良英被发配回浙江老家务农，靠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亲；她不同意与许良英划清界限，也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她所承担的访谈中共创始人的工作自然就停了下来。从此，恩爱夫妻不得不天各一方。几年后，为了让未成年的孩子少受些歧视，她最终还是不得不选择与许良英离婚。直至1978年许良英头上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之后，他们才重新结合。

2012年11月的一天，我去看望不久前因摔跤而受伤的许先生。门铃响了好一阵后，门才慢慢打开——是王先生开的门。她认出了我，颤颤巍巍地把我让进门。在此前的几个月，她经常犯迷糊，有时连天天来做饭的保姆都不认得了，但那天很清醒。她告诉我，许先生去医院换药了。她打开影集，让我一起看她和许先生的老照片。因为已转移到喉部的肿瘤，她说话已相当困难，但她仍坚持用含混不清的语调告诉我：这张照片是何时拍摄的，拍那张照片时“许先生还没回家（指北京她这儿——作者注）呢”。翻到他们一家四口在“反右”前夕拍的照片，她说：（反右之后）“许先生还做了一点翻译工作，而我，要独自一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二十年没干什么事（业）。人生最美好的时间全耽搁了。”虽然她已经瘦得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迟缓的语调中的那种哀怨，仍溢于言表。

就在之后不久，王先生进医院，听说再也没有清醒过。所以，这句话也许是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对人生所作的最后总结。

但1978年之后，她还是有一些事业的。她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立宪派的“和平独立”与辛亥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等多篇论文，其中，她和许良英共同署名的《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走出伪民主误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她还对前述五十年前的访谈作了重新整理，对受访人删改整理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将部分整理稿和修订稿同时影印出版。受国内很多知识精英并不懂得民主真谛的刺激，在离休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她和许良英合作撰写《民主的历史与理论》一书。他们从古代的希腊、罗马，一直写到近代的荷兰、英国、美国、法国，已完成大部分的工作量。我认为，王作跃教授在邮件中对王来棣先生所作的评价是中肯的：

师母是一位杰出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她对中共早期党史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和许良英老师合作的民主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也将对中国的民主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她的去世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

天国不会再有不讲道理的政治运动，愿忧郁了半生的王先生到那里之后能够长葆笑颜，并保佑她的丈夫战胜病魔。

感谢范岱年教授、王作跃教授和许平先生帮助核实和修订文稿。

（2013年1月1日南方周末）

悼念王来棣师母

仲维光

年前传来令人担心的消息，许先生因为不慎摔倒，颅内出血后住院，同时获知王来棣师母癌症末期再次住院。这真的让我在二零一二年年底的心情低落至极点，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一三年。寄希望许先生和师母能够平顺恢复。不想还是在元月1日听到王师母辞世的消息。

尽管我似乎是有思想准备，但是还是感到天崩地裂，感到无法接受。

我和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师母的关系是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

我是七五年在商务印书馆许良英先生的临时住所认识许良英先生的，但是早在七十年代初期，还不曾见过许良英先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了王来棣师母。我和她的长子许成钢在一个中学，是一个群体中的朋友。那时候我们是一群充满想象力和激情的孩子。王师母对我来说是一个慈祥的长者，这个感觉从来没有变过，一直到后来我成为了许良英先生的学生，还是如此。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听同学说，她实际上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很多章节的撰写者。那个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本书可都是大学者的事情，所以王老师在我们心里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可这层神秘从来没有压倒过她的亲切和蔼，所以我永远的感觉是，她是一个典型的充满感情的母亲。

七十年代初期我是一个充满反叛的孩子，从七五年我第一次见到许先生，在商务印书馆，我们就争论。后来他们搬到了科学院黄庄宿舍，我到许先生那里去的时候还是继续争论，有几次我们争论的非常激烈，几乎都动了感情。但是王老师永远是微笑地看着我们争论。有她在，我甚至潜意识里总是以为王老师在支持我。这是她性格的力量，让我们感到亲切，也是她人性的力量。

在许先生家我不知道吃过多少次饭。每次无论许先生还是王老师都让我感到如在自己的家里。她总是在不停地照料着我。我的那些同学大约都在许先生家吃过饭，都会对此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感受。

在我人生的路上，除了父母亲友外，结识了很多师长朋友，这些师长朋友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影响甚至远过于我的家庭。在我激烈地和家庭产生冲突的时候，我甚至深深

经常地说，我是在朋友师长中长大的，没有父母可以，可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些朋友师长，长辈的有参与过早期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戴孝侯老先生，好友葛维建的父母，外文局的葛一凡先生夫妇，懂得多门语言的马元德先生，房管局的鲁玉昆先生……。四十年和王老师的接触，让我深感王老师在我人生路上的深切影响。我能够有今天，渗透了他们的关心和帮助。

自从两千年初，我母亲去世，其后我在济南的长兄仲雨村去世，让我深感人生之如梦之须臾。我真的是无法想象这些亲人的离去，无法接受这些现实。因为你的生命曾经和他们紧密相连，在每一步都有他们的痕迹，如今他们走了，你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他们的世界会是怎样。现在王老师的离去，再次让我感到心神恍惚、天摇地动，我真的是无法理解，人究竟为什么要来、要走？人究竟又为什么忙碌了一生？

王老师健在的时候，我们聊天经常谈到，为了社会和人生的公正，为了民主。仔细想来，大约还是波普的那句话，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世界。为了让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亲友能够生活的更好。

大约也还是爱因斯坦那句话，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够找到那短暂而充满风险的一生的意义。

王来棣师母把她的爱，她的奋斗留给了我们，我永远忘不了她的音容笑貌，忘不了她的母亲般的慈祥。

（《博讯》）

2013-1-1 德国·埃森

我所知道的许良英和王来棣

——我的怀念

吴大信（浙大校友，49史地）

看了同志们写的怀念许良英、王来棣同志的文章，深受教育和启发，更加深了我对他俩的怀念之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大助教许良英已迅速进步。他曾专程去重庆找新华日报社，要求入党，并在校内推动、帮助带秘密性的进步社团组织进行活动和发展。47年1月许被上海党组织（浙大学运的上级领导组织）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47年2月浙大地下党正式成立支部，许担任支部委员（书记是刘茂森）。47年6月他接任支书。他先后领导了浙大的抗暴运动、五月运动和于子三运动。我是46年秋进浙大的，在“求是”校训的指引下，在许良英通过李景先、温泽民等对我的帮助下，我参加了抗暴运动、五月运动，并参加了三天的抗暴宣传队和拓荒社。拓荒社是当时浙大最活跃的进步组织。五月运动时以拓荒社等为骨干力量，组织了五月宣传队。我被任命为总队长（下有四个分队）。在

许良英通过李景先、温泽民等对我的帮助下，我在1947年7月28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支部干事，47年10月任支部代理书记，48年1月提前转正任支书，直到48年8月我被敌人逮捕为止，这三年我一直在许良英的领导下工作。

49年1月26日浙大师生在党领导下，把我营救出狱，我当时想去北平，途经徐州，被徐州地下党留下后，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徐州工作，直到离休。因此我对许良英和王来棣的接触和了解主要是在1946~1948年这三年。对这三年浙大大学运中的许良英和王来棣，许多同志都已写了文章，过去我也已经写过，在此我就不再多说了。主要是谈谈我对他俩的怀念之情，重点谈谈许对下属党员深刻关心、关怀的情况。

48年夏，敌人针对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专门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更残酷地加强了白色恐怖，我当时十分暴露，为了保护我和陈永时（宣传队第二分队长）的安全，48年6月许不顾个人安危，只身送我和陈永时从浙大经十多里路到杭州郊区“留下”进行隐蔽。半个月后，白色恐怖略为缓和，许又专门通知我们回到浙大。同年8月许即通知我准备撤退到解放区。为此，8月22日晚还专门在他工作的物理实验室开会，决定我将“支部总结工作”一文在当晚汇报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后即可离校撤退。不幸我在几小时后的23日凌晨就被捕。我被捕后，许良英通过竺校长、苏步青教授、学生自治会等进行多种营救工作。49年1月26日浙大师生在地下党陈向明、许良英的领导下，把我营救出狱。我出狱后，因当时白色恐怖更趋严重，许又不顾个人安危只身把我送到“留下”看坟的亲戚处再进行隐匿。在“留下”，已不能再隐蔽后，我回到了浙大。许又迅速让我在徐州舅舅的帮助下，北上到徐州，再设法去北京，直到我安全到徐州为止。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多次为了我的安全不避艰险地来来去去，那种情景，那种深厚的同志情谊，使我毕生不能忘怀。在今天，他不幸去世，更触动了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许良英同志在领导当年浙大大学运时，也有不足之处，这主要是于子三被捕后，面对浙大这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残酷斗争，他迅速告诉每一个党员不要害怕，要注意隐蔽和安全，他设法通过竺校长、学生自治会中少数人进行营救，但他没有通过党员迅速大力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有力的斗争和营救。（这一点在曾参加过一二·一运动具有学运经验的洪德明为此迅速来到浙大加强领导下，不久就得到了改正）。但这正好反映了许对下属党员和同志的深刻关怀，真如有的同志所讲的“许一生的质朴，对真理、对同志深刻而执着的关怀，体现了他首先而且一辈子所追求的是要做一个人，一个品质高尚的人”。这是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的。

我和王来棣同志，不仅是史地系同班的同学，而且是一起参加抗暴宣传队和五月宣传队的战友，当时我主要是和宣传一队的赵槐、王来棣一起进行活动。王来棣不仅在进行宣传活动时十分积极、勇敢和机智，而且在宣传队的很多其他活动中，也显得最为活泼和幽默，因而大家送给她一个雅号叫小猴子。王来棣在宣传队员中进步得最快，在老党员赵槐的建议下，我入党几天后就发展她（同时还有宣传二队队长陈永时）入党。因此我也是王来棣的入党介绍人。对她解放后情况，因几十年来我不在北京，没有什么发言权。现在我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她在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后不得不暂时离婚。而在许被摘帽后，虽仍处在监护中，她和许不仅毅然复婚，还共同为解放后国家的民主建设继续进行奋斗，正是许和她俩这种一辈子的为国家民主建设不懈奋斗的生动事迹深深地教育了

我，这也是我们这些还在世的老同志应该为建立富强民主的祖国而多少还要继续做点贡献的事情。

因有的同志在文章中提到浙大地下新民主青年团 Y.F 的问题，我需要在这儿讲几句。浙大地下党在 47 年 8 月开始筹建 Y.F，并对 Y.F 进行发展，由于当时浙大已有了抗暴、五月运动、于子三运动等三大运动的群众基础，加上 Y.F 更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因而它发展得比党员更快。九月初，它已发展到五十人左右。当时上级党曾想成立浙大 Y.F 总支，为此九月份曾在紧邻浙大的庆春门外城墙边开过一次会，对此参加的有李景先、我、高亮之、陈尔玉、陈永时、于子三、杨铭等八、九个人。但不久于子三被捕，上级立即决定原总支取消不再成立，改由党直接领导，办法是党员和 Y.F 混合在一起编成小组，由党员任组长，在混编中进行小组生活，党员有时再单独过一次小组生活，这一办法从 47 年 9 月一直沿用到 48 年 8 月我被捕为止（我被捕后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47 年 8 月筹建 Y.F 时，支部分工虽由李景先负责，但实际工作则由我负责。因我是宣传队的总队长，Y.F 原先几乎都是宣传队的队员，而且他们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我同意批准的，因此为了对 Y.F 的情况负责，我敢说我所了解的情况是最正确的（几年前，对此我已写过材料）。

（来自《求实儿女》网）

历史真相的寻找者：纪念王来棣

许成钢 许平

2012 年的最后一天，即将 87 岁的历史学家王来棣在与癌症奋斗四年后，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她是以访谈中共创始人方式研究中共建党史的第一人。

王来棣生于 1926 年 1 月 2 日，浙江平阳鳌江。其祖父王理孚（字海髯）1909 年当选清末浙江省谏议局议员；1911 年任中华民国浙江省都督府秘书，主管财政。曾与时任敢死队队长的蒋介石因财政问题当面发生冲突（王栻，《我所知道的父亲》）。因不满政治腐败、不愿陷入党争，“阅墙操戈”，1916 到 1917 年任鄞县知事十个月后辞职，回乡从事实业，建立“南鹿渔佃公司”开发南鹿岛。其父王载彤（字文川）继承并发展了父业：自 1924 年开设王广源商号始，十几年间使鳌江与上海、香港、大连等港口通航，企业涵盖养殖、商贸、矿业、化工、航运、房地产等。到抗战前夕，鳌江从小渔村发展为繁荣市镇，2002 年王理孚、王载彤父子被鳌江镇委称为“鳌江开埠先贤”。然日军的封锁、入侵与轰炸摧毁了几乎所有这一切。

王来棣在其祖父 1903 年创建并曾任校长和国文教师的鳌江小学（鳌江第一个新式学堂）读书。鼓吹社会进化论的《天演论》（严复译自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为该校国文课教科书。

1939 年考取温州中学离开鳌江时，祖父送给她的四个字“毋望国耻”在她心中铭刻一生。在中学期间，她参与了学生救亡工作，为妇女识字班讲课，随宣传队进行抗日宣

传。初中时曾与一群进步同学投奔粟裕领导的新四军，因年幼被拒。在温州的永嘉中学念书时，日机天天轰炸，日舰数次登陆，生活极端困难，但却给温州的文化事业带来了非正常的繁荣。许多在外地工作的温籍学者、教授、专家、艺术家回到温州，从事文艺活动、在中学任教。如一代词宗夏承焘，夏的高足、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及上海知名教育家钱天起都曾在永中任教。“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温州。在地下党的指引下，同学们组织了读书会，议论政治，读马列主义、苏联文学，宣传抗日救亡。此间她曾担任永中学生自治会副主席、剧团副团长（主席、团长为曾任统战部局长、副秘书长及政协副主席的沙里。见沙里《桃李芬芳忆母校》）。

1945年到1949年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学习。开始在外语系，为便于地下党活动，转到史地系。她的三叔，南京大学史学教授王棣（戊戌变法及严复问题专家）对她在研究历史的兴趣和严谨治学的作风上有重要影响。

她于1947年秋参加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同年9月入党。在于子三运动中负责外校的申诉、宣传和联络。1948年1月，任中共杭州工委领导下的中学区委委员，先后在杭高、杭师、高工等校建立新民主青年社组织。9月，任中共浙江大学总支部委员，先后负责联系校学生自治会和各院系及女同学会，任系级支部书记。面对可能的被捕和牺牲，她没有恐惧，敢于负责、勇于承担。她在地下党的领导名叫金宇星，半年后才知道他是物理系教师许良英。许被她的男孩子性格所吸引，写了一封哲理重于感情的信给她，表白了一个自认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革命者对男女私情的看法。49年元旦，浙大女同学励进会的壁报向她约稿，她将这封信以“一封情书”为题发表了。1950年他们结为终生伴侣。

1949年5月杭州解放，王来棣任中共浙江大学总支书记。6月，被派往浙江省青年干部学校，任第三中队指导员兼第三支部书记。8月，调中共杭州市青委组织部，任团工科副科长。

1952年9月，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组。曾任助理研究员，兼所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早期的研究工作涵盖五四运动、中国无政府主义派、中共早期历史。她是第一个以系统地访谈中共创始人的方式研究中共建党历史的学者。被访谈的三十多位中共创始人中，包括党政最高领导人，如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邓颖超、李达等；著名知识分子，如邵力子、施复亮、罗章龙、沈雁冰、丁玲、陈望道、萧三等。这是绝大多数被访谈者唯一的为中共建党而做的访谈。由于反右运动，这个研究被迫中止。直到2007年在香港出版了幸存的部分访谈记录——《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李锐作序）。除26篇访谈录外，书中也收入了她写的《后记——关于“走俄国人的路”的思考》、论文《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并附录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原版原文）。

1957年反右运动时，因拒绝执行党组织的要求，驱赶被划为“极右分子”且抗拒劳改的丈夫许良英离家，以及“参加了以许良英为首的宗派小集团，背着党进行非组织活动”（指参加了1957年2月由原杭州市工委委员许良英、钟沛璋共同发起召开筹备于子三殉难10周年纪念活动的座谈会），于1958年4月受到开除党籍和行政降级的处分，并被剥夺研究党史的资格。

此后研究工作重点转到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先后参加了汪士汉主持的《五四运动》、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刘大年主编《中国近代史稿》等书的编写或增订修改。文革期间，为了保护一些正在挨整的中共创始人，在外调的威胁迫近时，她被迫烧毁了部分珍藏的资料和访谈记录。

1978年王来棣得到平反恢复党籍。1982年任副研究员。参与编写《中国近代史稿》第三卷，先后发表了《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剖析》、《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五四运动》、《立宪派的“和平独立”与辛亥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的演变和所揭示的问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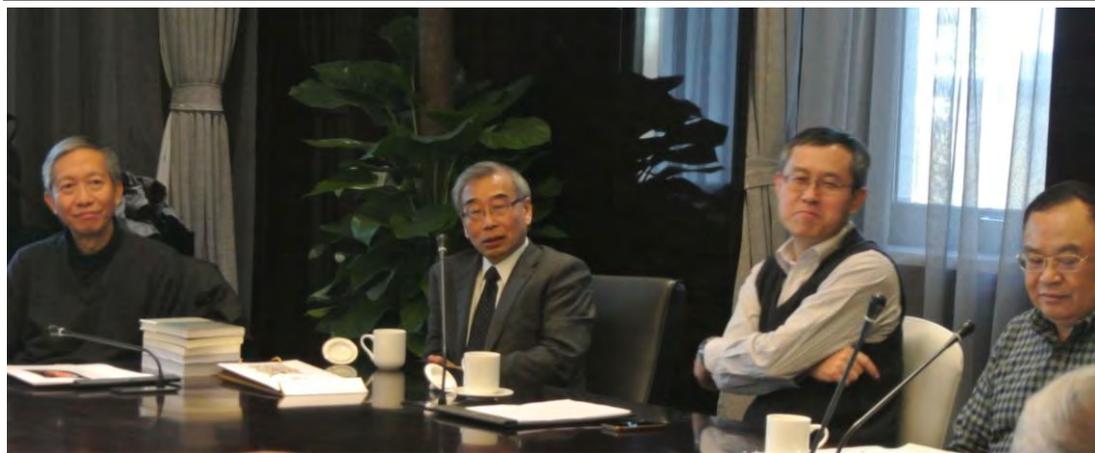
在1980年代以来，她与许良英和其他朋友一起，参与了重要的争民主、人权的活动。包括发起签署1989年2月关于政治改革、保障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的公开信；1994年3月《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呼吁书；1995年《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公开信等。从1989年起，她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与许良英合著《民主的历史与理论》。其中一些章节已经以论文形式发表。如《论希腊民主制》，《历史的启示——斯巴达和雅典之比较》，《中国人接受人权观念的艰难历程》等。全书的多数章节已经完成。2008年身患癌症后，她仍然尽力工作，直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她与许良英合作的《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与《从“专制的对立面”的争论看民主启蒙的艰巨》（《炎黄春秋》2010年12期、2011年10期）是她最后两篇有影响的著作。

她雍容，独立，自强。有女人的温和但没有矫揉造作。容易与人沟通，又不琐碎。永远怕给他人造成负担。长期身患疾病，她哀叹花费医疗费用（公费）同时丧失了工作能力是浪费。生前反复表达逝后要捐献遗体给医学事业。遵从其遗愿，她长眠在北大医学部。

原载《财新·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4期，这里有较大改动

第三辑
许良英王来棣追思会





2016年1月15日下午，在许良英、王来棣伉俪去世三周年，他们的遗著《民主的历史》出版7个月之际，在北京召开了许良英、王来棣追思会。参会人员包括许的亲属、学生、同事、朋友或其后人近30人。会前，许的家人向与会者赠送了7本书：《民主的历史》、王来棣编《中共创始人访谈录》、王作跃等编《呼唤民主与人权——贺许良英先生九十寿辰》文集、许从平《肩住黑暗的闸门——我的三叔许良英》与《忆民主先行者许良英》，以及本文集的试印本（上下册）。

会议由许良英的忘年交武文生主持。

武文生：开场白

各位先生，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我们邀请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先生多年的好朋友、好同事、学生、家人，还有一些朋友的后人，一起举行一个简单的追思会。大家都知道，许先生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史家、爱因斯坦的资深研究者、民主理论的启蒙思想家和著名的人权活动家。

许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年了，王先生比他早离世1个月左右。我们一直想开这么一个追思会，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开成，现在已经是他们离世整三年了，大家觉得不能再拖了，所以我们今天利用这样一个时间开个追思会。因为条件和时间的安排，人数也不多，将近30人，基本上都是许先生的老朋友、老同事和学生、家人，所以我们也是自己人开的一个会。

范岱年先生是许先生多年的老朋友，也是多年合作研究的伙伴，对许先生了解比较深入，我们先请范先生开个头。



范岱年：我同良英同志的交往

良英同志去世三周年了，一直要开追思会，到今天才开。当年我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浙大的《求是》一开始要用，后来给删掉了。这是《许良英纪念文集》里有的，我就不按照那个讲了。

我是1944年进入浙大的，1946年二年级的时候许先生做我们的热学助教，指导实验，我那是头一次认识他。1948年吴大胜介绍我加入地下党，给我一个暗号，到浙江图书馆联系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是谁。暗号一对，结果是许良英，他就带我到物理系实验室的暗室里入党宣誓。在他领导下做了一些事。我那时做几个工人的家庭教师，给他们讲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价值。我向许良英汇报，问能不能发展他们入党。他说“好”，我就先发展了一个工人党员章正明，他是杭州第一个工人党员，解放后很红，成了浙江省工会副主席，同谭震林也曾一起开会，后来当了杭州的



劳动局长，文革的时候因为反对林彪被打成“反革命”。他们一共五个人一起入党，解放后都成了杭州市的干部和丝织厂的领导。

解放后我们到了杭州市青委。当时杭州地下党市委书记林枫（不是党校的林枫，是另外一位林枫）对地下党的工作有个评价：在杭州地下党中许良英是第一功，因为许良英在浙大发展的党员最多，到解放的时候地下党员有 60 人，中途送到解放区的还有很多，而且于子三运动在全国都有影响。

我们一起参加了军管会，先是在青委，许良英是党务工作科科长，我是干事。许良英后来成了青委的学生部长，乔石是组织部长。当时杭州市委有个学校党委会，许良英是宣传委员，我是秘书。1951 年镇压反革命，公安局文教科把文教系统的逮捕名单拿来请学校党委会讨论，其中有浙大物理系的束星北教授。许良英说，他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而且在政治上是同情地下党的，只是抗战时参加过军令部的雷达研究，所以不应该逮捕他。当时学校党委会书记俞铭璜，委员莫璞、刘容、乔石等都是知识分子，都理解束先生工作的性质，就把他从逮捕名单上划掉了。

1952 年他调到科学院，然后他提名把我们好一大批人都调到科学院。他当时是《科学通报》编辑部主任兼科学院的团委书记。他本来是很受领导重用的，但在 1955 年反胡风运动中受到审查。胡风的朋友中有一个方然，1950 年，杭州市青委书记周力行要介绍方然入党，缺一个入党介绍人。由于许良英是党工科科长，周力行让他当介绍人，因此 55 年就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最后停职反省。这就有点伤感情了，他后来就不愿意留在科学院院部了，当时党组是想把他调去做情报所副所长（袁翰青是所长），他不愿意去，希望搞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一期就是许良英编的。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反右开始后他很想不通，说这是中央分裂了，以为是刘少奇的保守派反对毛主席的鸣放路线，他是这么个理解，最后知道完全错了，实际上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阳谋”。那次在北大礼堂开批判会，一个是许良英，一个是李德齐同志（解放前北大的学生会主席、地下党员）。他们两个人都是哲学所的，当时就作为批判对象，要我们去批判，划清界线。当时对我们很关键：批判得好就没事，批判得不好你也成右派了。但我也批不出什么东西，所以也被划为右派。右派分为六类，许良英是第二类，要让他到北大荒去劳动。但是他关节炎很严重，不能去，哲学所的吴传启说你不能去的话就到农村去，他就辞职回家了。后来在农村，他倒是很快（1961 年）就摘了帽子，听说当了临海县的政协委员（许成钢插话：是列席县政协会）。之后于光远、龚育之要翻译一些科学家的著作，他就参与翻译爱因斯坦的著作了。翻好后，文革的时候他的稿子被上海从李宝恒处抄去。许良英很勇敢，当了右派还跟姚文元下面的人打官司，后来就告到周恩来那里。结果他翻译的爱因斯坦著作可继续出版，上海的不算了。他觉得把他们抄去的那部分重新出版没意思，所以要扩充物理学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一些俄文、德文的稿子，他要我负责翻译。这个工作也是他拉我去的。翻译方面，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西。

文革快结束的时候想让他到北京来。那时候进京必须要有人事部门盖章的介绍信，当时没有这个章，我们就写了一封信，说要让他来北京写稿子，盖了《自然辩证法

通讯》编辑部的组稿信章（长方形），结果地方上就让他出来了。那次他就住在赵中立家里，还得了很重的肺病，吐血，就是 1975-76 年左右。改革开放以后，他又回到科学院，最近听任知恕讲，他回科学院杜润生起了点作用，叫把许良英找回来，来了以后就在科学史所工作。

梁存秀插话：据我所知，他本来想回哲学所，但两个 1957 年的积极分子已经当了副所长，反对他回来。57 年“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李奇也反对他回来，所以他只好另谋出路。

李德齐插话：他回中科院是不是跟竺可桢有关系？竺可桢很同情他。

范岱年：因为是胡耀邦的中央组织部决定改正错划的右派，所以就能回到北京。1986 年底他与方励之、刘宾雁搞反右运动讨论会，于光远让我跟李佩珊劝他们不要开，但是他不听，还要开。那时候确实找了不少人，像沙文汉和夫人陈修良、陈学昭、袁翰青等右派都联系上了，也同意参加，但是后来没开成，把方励之、刘宾雁开除党籍了，后来于光远说不用劝了，会也开不成了，胡耀邦也下台了。以后良英同志坚持搞了几次签名，1989 年搞了一次，影响很大。（**梁存秀插话：**我也签了，4 月 24 日。还找了严家其，他不敢签，他老婆高皋要代他签，来的人说你不够格，不让她签。）那时候我在美国所以没有签。看到这个东西，发现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师、同学。所以我就写了一篇介绍这 42 个人的文章。通过刘宾雁介绍，发表在纽约《世界日报》上，香港《九十年代》也转载了，后来北京军博的“动乱展览会”把这篇文章放上去了，说这是海外自由派言论。叶笃正访问美国时，告诉我妹妹，劝我暂时不要回国，所以 1991 年我才回来。良英同志在 1994 年又搞了一次 7 个人的签名，这次签名以后他就开始被软禁了，门口有人了。

1995 年那次签名我参加了。我从丹麦回来后，科学院党委把王[淦昌]先生回复杨振宁的那封信给我看，说王先生自称受愚弄了，要我表态。我听说微生物所所长薛禹谷说我们都是自愿签名的，我也说我是自愿签名的。后来许良英去看望王先生，向他解释，王先生说，我不是受你愚弄就是受杨振宁愚弄。1996 年春节，我一个人去给王先生拜年，过去都是同许良英一起去的。王先生还是很关怀许良英的。95 年春节，许良英没去看望王先生，我一个人去，王先生问，“我那位老朋友怎么样了，我们不要疏远了啊”。回来我赶紧跟许良英讲王先生这些话，许良英一想他还是应当去看王先生，所以后来就去看了，很快就恢复关系了。王先生第二次病比较重，在医院里。王先生特别跟许良英讲，“你的文章写得好，你以后多写写我”，他特别关照许良英。所以王先生还是很信任许良英的。后来有一次签名使江棋生受到影响，就停了下来，以后他就没有再搞签名了。

他跟王来棣写的书《民主的历史》这几天我又看了一遍，确实很深，很有意义，可惜没有写完，像法国大革命就没有写到，很可惜。我就先讲到这儿。

【范岱年】 1926 年 10 月 26 日生于浙江上虞。1948 年浙大物理系毕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主编、主编，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梁存秀：许良英同志二三事

许良英同志晚年写回忆录，有时候叫我到家里来，有时候给我打电话，核对哲学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部回忆录很重要，千万不可遗失，以备在适当时刻公之于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要编建所六十年的历史，搞一些原始材料，于光远同志写了一些东西，写得很好。如果你们家属同意，可以把写哲学所的那一段交给编者刘培育。



我和许良英同志几乎是同时到哲学所，又同时离开哲学所的：他是1956年6月到哲学所的，我是9月从北大毕业调到哲学所的；他是1958年5月4日离开哲学所，以后再没回来，我是5月5日上太行山劳改，以后又回到哲学所。今天我想讲几件事。

第一件事：1956年10月中旬，哲学所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副所长金岳霖入党申请，很顺利就通过了。然后讨论巴结领导的会计易晖廉的入党申请。两位正直的、敢讲话的老同志提出疑问，说她的家庭出身不对头，没有讲清楚。支部里大多数同志响应他们的提问，大家就没有进行表决。其中一位同志是李重农（后来调到北京工业大学），另一位就是许良英同志。过了几年，查账的时候发现，易晖廉不仅修改了家庭成分，而且还贪污了三千块人民币。

第二件事：从1956年9月从北大毕业调到哲学所，到1958年2月18号因划为右派开除出党，我参加了各次支部大会。在会上许良英他们是一派意见，党支部书记兼副所长张镛代表另一派。两派发生争执，没有一次会议不是这样的。争执的问题大体是两类。第一类问题是关于科学政策方面的，前一派的同志批评了苏共扼杀共振论、反对魏斯曼—摩尔根的做法；后一派的人虽然在百家争鸣方针面前不敢提出异议，但总是对这种错误做法表现出原谅态度。另一类争论是关于公民权利的问题，我们要不要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许良英他们强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对社会发展有什么好处，那边就说你是搞自由主义。“六八社论”以后，前一派同志的意见便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林京耀插话：中国科学院开了一个批判右派的大会。

梁存秀：那是8月份，在中山公园开了三天。最后一天会上发言的是杜润生，张劲夫副院长也去了，开会的人很多。最有分量的发言人就是徐崇温，他批判了我们的资产阶级新闻观。

第三件事：哲学所当时有140个人，划了14个右派。1958年的前四个月，一直到5月1日放假，我们这批右派分子被弄到图书馆去搞卫生，扛书架，搬书，拉板车，什么活都干。还要开个图书展览会。这中间许良英同志有一天感冒发烧了，请病假，人家根本不准，只好带病干。我比他小11岁，有的右派比我还小，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看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

第四件事：1974—1975年许良英同志来北京翻译《爱因斯坦文集》，后来安排在文联大楼（现在商务印书馆）前院的旧南平房里。我那时经常到商务印书馆，几乎每一次去都会看他，现在想起来心里很难过。他穿得破破烂烂，他不像我这个右派，每月还有工资，生活比他好。他在那种平房居住，夏天还可以，冬天是很冷的，生个炉子也不管用，他很艰苦。可是要说，商务印书馆还是有眼光，他这个人可信，把他救了。商务印书馆给他一个月发50块钱生活费，当时的哲学编译室主任是高崧，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的，对我们这拨人都采取同情态度。那时经常看到他专心致志，伏案从事翻译。他就是这样，与他的合作者一道，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完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最后一件事：1989年4月24日，许良英同志托人到我家，送一封由他组织、王淦昌带头签名的联名信，我也欣然签了名。这封呈交中央的信是呼吁实施宪政的，但送上去以后没有下文。我5月底到德国访问，看到《南德意志报》全文转载了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7月份我返回北京，去访问他时，进楼门受到盘查，出门时又受到盘查，我们好像又生活到解放前从事学生运动的时期。不过，许良英同志的革命精神依然坚强，并没有把受监视放到心里。他把这封信招来的一系列麻烦告诉了我，我把他讲的事实译成英文和德文，在国外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

今天进门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这号人在解放前参加学生运动，是在反对什么？现在我们又在反对什么？记得几年前参加李昌同志追思会时，我写过一个纸条：“年轻的时候反对老专制主义，年长的时候反对新专制主义”。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写照。今天在这里开会，我想高呼，我们要永远学习许良英同志那种坚持科学原则的立场，追求民主制度的行动和为人刚直不阿的风格。

【梁存秀】1931年出生于山西定襄。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员，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党员，极左路线时期的右派分子，改革开放时期的启蒙教师。1951~195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6年至今在科学院哲学所工作，1996年离休。1985~2002年主持费希特课题组，2006年开始主持黑格尔课题组工作。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荣誉学部委员，国际费希特研究协会理事。

林京耀：许良英对中国现代科学史的贡献

我认为许良英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独立的思想，这是最重要的，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很难得的。所以他在哲学所没有随风摆，没有跟风。哲学所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服从组织的安排，大部分都去了北大荒，只有老许不去，被发配回老家，结果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了。他是浙江人，回老家以后他并没有闲着，也不是光劳动，爱因斯坦的著作就是在老家翻译的，很艰苦。（范岱年插话：他还看《马恩全集》。）



许良英同志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翻译《爱因斯坦文集》，这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不可不提的重要一页，功不可没，而且是在他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做的工作，我知道后很感动。

许良英从家回北京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过年过节肯定是打电话的，有时候还会找机会见个面，有些重要的事我也告诉他。朱厚泽同志逝世和遗体告别的事我告诉他了，但是请他不要去，最后他还坐地铁、坐公共汽车去了。他九十岁生日，我跟李德齐同志商量好，先到他家聚一聚聊天，再到附近的饭馆吃饭。他说他儿子从国外回来正准备给他做生日，他说改个时间，后来一改就没有下文了。

朱厚泽同志也是一直想和许良英同志见面，我也跟老许说了，他说好啊，到我家来聊天我也很欢迎，结果没有实现。

许良英同志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一个贡献，就是把爱因斯坦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另外他自己还发表了有独到见解的文章。

【林京耀】 1935年生，广西横县人，1956年大学毕业，中央统战部研究员。

李德齐：由追思许良英、王来棣想到中国应如何走向未来

看了这个《纪念文集》感到很惭愧：里面没有我的文章。老梁老催我写回忆录，我将来写回忆录会专门有一章写许良英，弥补一下。

《纪念文集》里说他是反对反右派被划成右派。我更正一下，他比反对反右派严重多了，他有一系列的右派言论，和我是互相唱和。没有右派言论，只因反对反右被划成右派的也有，什么话都没说，就是说了一句话，“当初号召大家鸣放，帮党整风，现在又要说人家是右派？！”表示不可理解。这个人就是刘青华。



当时有一个骨干党员会，其实在这个会之前我就跟许良英认识了。他在浙大的时候我在北大，后来到了中科院哲学所认识了，但是在两个组。不过平常生活当中也会见到，说起话来很有共同语言。我们喜欢议论，特别议论共产党的专制。我说我们在会上发言肯定是要受处分的，他说那是当然。他讲了，即使受处分我们也要讲。所以他不是因为反对反右派而划成右派的，他是跟我一起发表右派言论，很典型的。而且我们不是给某一个领导人提意见，我们反对的是根本制度，你这个制度是专制制度，这个专制制度要改，要民主化。在党员骨干会上，参加的人不多，大概是十几个人。头一名是潘梓年，他是所长，是潘汉年的哥哥，他主持会，但几乎不说话。他对这个可能有意见，就是不说话。

李奇是延安来的，也不说话，可能有延安的经验了。还有一个新党员，大名鼎鼎的金岳霖，也不说话。我和许良英发言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了一下金岳霖的表情，发现他有时暗中不由自主地点头，但是他非常聪明，就是不说话，最后划右派就没有他。骨干党员里面还有赵中立，也不说话，不过他倒不是完全没有表态，他说“我老扯你们的衣服，就是要你少说，别说了！”他有点预感。可惜他走了，不然的话他今天肯定要来的。

梁存秀插话：许良英发言的时候他都揪衣服。

李德齐：开骨干党员会的时候基本就是两个人说话，一个是许良英，一个是我，每次都是我们说话，他们都是听众。李奇是延安来的，绝对不说话。

梁存秀插话：李奇是跟荣孟源一起去的延安，部队占他们中学的房子的时候他们反对，结果人家告到毛那儿，党支部书记荣孟源被开除出党，她作为教务主任也受到了处分。

李德齐：潘梓年这个老同志还是不错的，因为当时净搞运动，搞四清，像我这个右派分子是没资格参加的。参加四清的队伍到火车站坐火车，我们不能不送，我们也被迫到车站送行。到火车站的时候，潘梓年在那儿，别人都不理我，也不敢理，潘梓年走过来，对我说了一句话，“你也来了？”也许他误以为我也要参加四清，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认为这个很难得，因为谁也不理我。他态度还挺和蔼的，没有像有些人那么狠，见到我们都挺厉害的。

梁存秀插话：我给你补充一个材料。在哲学所利用权力主张多划右派的，是从济南市委书记任上调来的张镛。他因特务嫌疑的历史问题，1939年反特时受过委屈，但后来忘记了过去。他的夫人是水利部的。他从济南带来个姓张的小女秘书，经常与她住在一起。1959年把他弄下来了，最后问他，“你要党籍还是要小张？”他说“要小张”，结果被开除出党。四人帮倒了以后，她在社科院工作，曾经对我说，潘梓年当时经常给张镛写小纸条，让他查一些人的问题，想给他推卸责任。

林京耀插话：他说他当时没有按照规定划右派，还挺得意的。

梁存秀插话：规定是5%，他已经达到10%了。

李德齐：后来6月8日，突然要反右了，一下风云突变。张镛找我谈话，他是头儿啊，他得表态。他跟李光灿两个人找我谈话，张镛表示得很清楚，现在想起来很有味道。他说我们不是想把你划成右派，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恩怨，这是中央定的方针，我们不能不执行，说得很清楚，就是让我能理解、能谅解的意思。李光灿这个人比较滑头，一言不发。

范岱年插话：他曾经是王明的秘书。

梁存秀插话：是逃难来我们这儿的。

李德齐：王明是法制委员会主任，相当于部长级的，李光灿是办公厅主任。我当时为了解法制委员会一些民主人士的情况，特别找到了法制委员会，当时是李光灿接待我的。但是我到了哲学所以后，从来没有透露过这个秘密，他[李光灿]忘了。王明是主任，当时我对见王明还有点兴趣，但王明好像是挂名的，我没见到王明，只见到了李光灿。顺带提一句，王明字写得很好，共产党领导人里面陈独秀的字写得好，毛泽东的字另外一说，他有点书法天才，王明写的是很有功底的，这是题外话。

1957年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开了个批判大会，当时中科院没

有大礼堂，所以就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开了会。因为是中科院举行的，所以不光是哲学所，其他所也有人参加。主持会的是张劲夫，中科院是郭沫若当院长，开头是竺可桢等三、四个科学家做副院长，陈伯达也是副院长，最后真正主持工作的是张劲夫，搞行政的。张劲夫以副院长的身份，在北大礼堂主持会，但他一言不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做的主旨发言。刘导生的发言不太像话，现在看来他也是被迫的，总得有人说话。当时他说，过去我们说叛徒都是在战争年代，或者是地下党的年代，有人叛变革命了。他说“那还有可说也，现在和平时期还出了叛徒”。我当时听了以后就非常刺耳，白区的时候当叛徒是“有可说也”，那就是还可以啊，这是什么言论啊？不是叛徒哲学吗？当然我当时不好讲话，我是右派还说什么呀？

哲学所发言的是个女的，叫吴凤华，她也是被迫的。还有个数学所的叫秦元勋，当然我们也不怪他，他也是被迫，不得不说，他是从美国回来的，搞相对论还有点名气。他讲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讲了很多，这都是被迫不得不说的话。这次批判大会开的很形式化，大家都是这样。还有一点，我们没有受苦，在会上还是坐着听，让你检讨你就上去检讨，没有受身体上的处罚，比较文明。

那个会是很有准备的，还发了票，上面写着“批判右派分子许良英李德齐大会”。从哲学所到北大礼堂还有一段距离，用大班车拉过去的，车上还有别的所的人。他们拿着票议论，说李德齐、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叫李德全，她是很有名的民主人士，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我是“齐”，她是“全”，我觉得很有趣。他们也说不出来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我当然跟李德全没有关系了，不过1952年在和平饭店开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统战部把我派去做中国代表团的秘书，帮他们做点事。这里面就有李德全，当然我们也没说话，我这个人也不愿意拉关系，她就知道我是政治秘书。当时马寅初、罗隆基都是代表团成员，很知名的人士。会后吃饭，宴会摆了好几桌，有几十个人。很巧，我和李德全在一桌，她在我的右手，我在她的左手，但是我还是没有透露我的名字。

批判大会就是这么个情况，批判完了我们就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我就不说右派分子之苦了，那是说不完的。1979年落实政策以后，我们改正了，不是右派了，第一次见到赵中立。这个人很坦率，非常好，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当年不应该检讨”。我说“对的，你和许良英都不检讨，顶着，我非常佩服”。但是那个右派当起来实在是难受，他这个批判会是又臭又长，毫无道理，你还不得不参加，不得不听他们胡说八道，我难受极了。我说这样吧，你们让我检讨我就检讨，只要早点承认我的检讨，不再批判我了，我就好好过我的安生日子，就图这个日子早点到来。你不检讨他没完没了地找你，我就跟赵中立这么讲，他好像也理解了，没再说什么了。

刘明插话：后来给您划了几类？

李德齐：四类，要划成一类、二类就不得了了。许良英就很惨，就回老家种地了，我当时为了对付这个检讨，实在是烦透了。烦得我不在食堂吃饭，每天在食堂吃饭都要碰到这些人，心里就不痛快，我就坐公共汽车到外面吃饭。西苑有个小饭馆很便宜，吃个豆腐一毛多钱，跟食堂价钱差不多。后来他们就怀疑了，有人问我，你怎么老

不在食堂吃饭，到哪儿去了？我就说我到哪儿去了。他们吓了一跳，他们以为我要自杀，可能是自杀未遂又回来了。我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看见这些人就烦，躲开你们，你们把我看得低人十等。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右派难当了。“定于某年某月某日下午两点，开全所职工大会（右派分子不得参加）”。经常有这种事，你这个右派分子当起来是很难的。有个东北来的人，叫乌恩溥。哲学所的张春波跟他很熟，说乌差点被划成汉奸：他是抗战期间沈阳政治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如果参加工作就是汉奸，他还没参加工作抗战就胜利了，所以没被划成汉奸。乌恩溥反右特别积极，见到我就指桑骂槐，我很伤脑筋，右派分子当起来实在是难受，就不详说了。

后来去赞皇劳动。我们随便说什么话有人就给你加以曲解。有一次有人说李某人说要杀谁，我忘了我原话是怎么说的了。就是你右派分子说话很危险，随时给你上纲上线。

今天是怀念许良英、王来棣。我认识许良英后，发现这个人很有品德。为什么呢？忘了是他还是别人跟我讲的，反右之前，有一次在莫斯科要开一个国际会议，讨论物理学哲学问题。本来许良英可以去参加但没有去。他说“因为苏联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特别讨厌，所以到苏联开会我是不去的，我是不到反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国家去的”。我听了以后很佩服许良英：这个人真是有品德，那时候苏联是老大哥，大家都想去苏联看看，而且去苏联开会公费旅游，他居然拒绝了，非常了不得，这个人非常讲原则——原则上我讨厌谁，反对谁我就不去，所以许良英这个人是很有品德的。

我再举个例子，可能是右派改正之后，记不清楚是他本人还是谁跟我讲的，说自然辩证法组有个人叫柳树滋，写了一本书探讨物理学哲学的内容，他送了一本书给许良英，许良英当场就拒绝了，说你这个书我不要，因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听了以后我就有一个感觉，许良英性格直爽令人佩服，不过是不是太直爽了。人家送你一本书是善意的，你就接受了吧，你站在原则的立场上可以不接受他的观点，但是他居然就拒绝了。从这两点，拒绝柳的书和不去莫斯科开会，可以看出来许良英这个人很有品格。

我和许良英住的不远，但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是太多，当然原因有很多。我去看他，他从来不问我的电话或者住什么地方，我还有点误解，我说这人怎么这么骄傲啊。我来看他不止一次，他居然不问我住在哪儿，也不留电话，我觉得有点奇怪，也难以理解。当然这并不影响我跟他的友谊，但是我老是有这个问题，后来我慢慢也明白了。他是不问别人留地址留电话的，他怕连累别人。因为他本子上留下某个人的电话、地址，万一将来查他的时候，他怕暴露别人，他为了保护我。另外他毕竟是高龄了，比我还大四岁，那时候也七八十岁的人了，我老去找他，也是给他增加负担，所以我也不能太多的干扰他。因此我跟他虽然友谊很深，但是来往不是很多。

二零零几年我又去了，和我爱人一道去的，他很直率，见面就问怎么老不见到你写文章发表啊。我说，我不是没有意见，不是没有想法，也不是不想发表，问题是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我不喜欢弄电脑，家里没有电脑，很难发表东西，现在再写个大字报就太落后了。南开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人陈省身，南开大学送了一台电脑给他，他拒绝

了。人家想可能是送的电脑不够先进，不够好，后来又送了一个更新的电脑给他，他又拒绝了。我了解，老年人是不喜欢电脑的，有些人不理解，说电脑不是数学吗？电脑和数学是两码事。电脑是搞计算的，数学是搞证明的，不是一回事，所以他对计算不感兴趣，不奇怪。我没有电脑也不上网，许良英一问我，我也说不出话来了，我不能再贴大字报啊，他说这不是理由，你以后还是要发表文章。我承认他这个话是对的，但是我还是没有发表，任何报纸、刊物不会登我的东西，他们都犯忌。

例如我在校友会的会刊上都不能发表东西。孙鸿宾（原名孙树梓，北大地质系毕业）去世了，人家说别人了解得不大全面，你了解他，应该写一写，我说我知道这个人，我还差点要发展他入地下党呢，我就以我的名义写了点东西，附在另一人写的纪念文章后面。后来这本校友会通讯录出版了，那人写的纪念文章也刊出了，而我写的文章却如石沉大海。

许良英一生为了民主，为了人权，写了很多文章。我没有像他一样写那么多文章，写作也是一种天才，我这方面比较差。我这个人长于演说，我讲话大家听得都很有兴趣。我在北大给一个美国哲学家当翻译，翻译他的报告，他的夫人也参加了。会后那个美国人的夫人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当了多年的教师、翻译？我说哪里，我是第一次给外宾当翻译。她说你口才怎么这么好，她就觉得很奇怪，可见我这个人长于言辞短于写作。我没有机会自由讲话，如果北京像伦敦有个海德公园，我会经常到那里去讲话，批判独裁。《纪念文集》里没有我的文章，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不会写。

1986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联名发出了邀请信，邀请参加反右三十周年的研讨会。我也得到通知了，后来这个会没开成。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姓费，还有一个人姓钱，很有名。钱就把方励之大骂一顿，表明他立场的坚定，这个人后来节节高升。因为这个原因，这个会没法举行了，尤其是邓很怀疑这后面有背景，怀疑这个研讨会不只是这三个人发起的，后面可能还有别人，所以这个会就没开成。当时我准备好的发言稿没讲成，1989年六四的时候我把发言稿写成大字报贴在北大，标题是《论今日之国是》。北大当时大字报非常多，据说每张大字报只能贴24小时，24小时后就被覆盖了。我那个大字报没人撕，一直贴着，有一周之久。当年有几个同事、同学见了，都说他儿子跑到北大看大字报，回来说有一张大字报写得非常生动，后面签名是李德齐，他就跟他儿子说他认识这个人。

王丹也找过我，但他是秘密的，晚上他找我跟我聊天，就谈起了当年。他说我们很重视这个大字报，把它抄下来输入到电脑里了，我说现在这个电脑里还有吗？他说输进去不久，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就消失了。电脑就是有这个问题，你可以一夜之间把全世界的文章都弄进去，也可以在一秒钟全没有了。我见过《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了不得，乾隆的时候找名人书法家写下来的，我在沈阳看见过《四库全书》，用毛笔小楷写的，房子是用石头盖的，怕火灾。一个小电脑可以把《四库全书》放进去，但是一秒钟就可以消除，所以我对电脑不信任。我那张大字报没留底稿，因为传说要来抄家，就会被当做罪证，我就把底稿送给一个朋友，结果这个朋友没过几年去世了，这个底稿也找不着了。好在北大有个万耀球，把我这个大字报留下来了。

梁存秀插话：他抄下来的？

李德齐：对！我这个大字报之所以传下来，就是靠这个人，他是北大生物系的，也被划成了右派。

再补充一件事，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北大第一次邀请美国一个科学哲学家亨佩尔访问，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在那个时候被调到外国哲学研究所，洪谦当时是所长。他通过外交渠道，邀请了亨佩尔访问，这是最早来访问的一个美国学者。亨佩尔来访问的时候，我为这个美国学者做翻译。刚来的时候，洪谦就要请美国客人吃饭，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点奇怪。饭桌上就五个人，洪谦是主人，亨佩尔和他的夫人是客人，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给亨佩尔当翻译，另外一个陪客是许良英。洪谦请亨佩尔吃饭为什么请许良英呢？后来我一想，可能是这个原因：洪谦是不信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又不能公开说，在这个环境下不能公开反对，所以对一切不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他都是同情的，他对右派是同情的，我只能这么理解。再就是可能洪谦很欣赏许良英。许良英是搞物理的，洪谦在维也纳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物理学当中的因果性，他把这个作为一个题目进行探讨，也是和物理学中间的哲学有关系，许良英特别有兴趣。

再有要补充的就是，许良英对一切受专制迫害的人都同情。束星北是浙大的教授，这个人是不得了的天才，王淦昌对束星北也很看重，但是他一直受迫害，在国内一直没有好日子过。最后出版界出版了一个《束星北档案》，也出版了束星北写的相对论，里面就有许良英同情和支持束星北的文字。束星北是受尽了迫害，这么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许良英给他充分的同情和支持。

刚才提到了许良英找到方励之和刘宾雁，要发起反右3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事。由于那两位[费和钱]，这个事没办成。中央开始批方励之、刘宾雁的时候，我找到许良英，要他告诉我方励之和刘宾雁的地址，我们去慰问他们。许良英说你认识刘宾雁吗？我说我认识，他曾经调到社科院哲学所搞英文翻译，我给他校稿，跟他比较熟，但是不知道他的住址。许良英告诉我刘宾雁住在人民日报宿舍，很远。我说还有方励之呢，他说方励之你认识吗？我说不认识，见过，但是他不可能记得我了，只有很浅的关系。许良英就说，既然如此，你就不要去找方励之了。后来就去看刘宾雁了。

无线电、电视中宣布开除刘宾雁出党，给他重大处分的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张大平坐9路公共汽车，到了人民日报宿舍，找到刘宾雁。刘宾雁看到我们以后当然很高兴地接待我们，做了一些深入的谈话。大概是怕隔墙有耳，谈话的时候，他一边打开无线电放古典音乐，一边小声说话。当时谈了近两个小时，那段时间门卫给他送来好多封信，都是对他的慰问。刘宾雁虽然受到中央这么大的处分，但他是受到人民支持的，很多人给他写信支持他。

【李德齐】1924年10月9日生于山东济南。43年从成都华西协和高中毕业后，入成都燕京大学西语系，次年入昆明西南联大外国语文系，入党，46年转北大哲学系。48年8月为躲避国民党大逮捕，到华北解放区。被分配到中央城工部（河北平山，后改为中央统战部）。56年8月调中科院哲学所。“反右”时与许良英共同受到中科院全院大会批判。80年调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81年调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91年离休。

王德禄：许良英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一、我和许良英的交往：从反思冷战开始

1981年秋天，我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传》，导师戈革先生安排我去拜访许良英先生。从此我跟许良英一直交往，直到他去世，一共31年。如果说我比较幸运的话，这31年来，我几乎每个月都去看他，而且和他进行比较广泛的交流。

我记忆中第一次去看许良英是在1981年秋天。那年暑假，我在青岛家里看了卢梭的两本书：《忏悔录》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我去北京拜访许良英时，满脑子想的都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和他聊天时，他问我都关心什么，我说到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卢梭。当时我还年轻，情绪激动地提到中国需要一场启蒙运动。他很同意我的看法。2007年戈革先生去世后，戈疆在收拾戈革的遗物时，找到一封许良英1981年12月7日写给戈先生的信，信中提到了我，说“你的两位高足见到了。王德禄说他崇拜卢梭，看来思想比较解放”。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涿州。在涿州工作期间，我每个月都到北京，主要去三个地方：许良英先生家、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和中关村我表姐家。

记得我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论宽容》。文章写好后，我拿给许良英看，不料他让我把文章留下来。我第二次去拜访许良英时，他把文章还给我，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批改意见，还给我讲了怎么理解宽容。好像他的批语和他给我讲的关于宽容的道理，可以写成一万多字的论文。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我都很汗颜，觉得当时我的思想太幼稚了。

我记得许良英推荐我写《大百科全书·物理卷》美国科学家里奥·西拉德的词条。这个词条要求总共写800字即可，我花了半年时间到处搜集西拉德的文献资料，写成了一篇五万多字的西拉德传记，从中提取了800字做词条。对此事许良英非常高兴，多次表扬我。之后，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十卷总53期，1988年第1期）上，专门发表了一篇西拉德的传记——《核和平之父——里奥·西拉德》。

我在北京的学术与社会关系大多是许良英给我推荐的。1984年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要在厦门召开“科学社会史学术讨论会”，他推荐我参加这次学术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所以非常重视，日以继夜查找资料，准备发言材料。我向会务组提交了《原子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斗争》，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个会开得非常成功，我在会上也很活跃，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参会的人座谈，见到了很多至今还相识不忘的人。我认识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的樊洪业、金观涛、刘青峰、姚蜀平、陈益升、李昆峰等，还认识了清华大学的何成钧、南开大学的刘珺珺。这些人对我后来在北京的发展都有很大帮助。

80年代初，我和许良英的交往主要围绕着美国的科学和平运动。这场运动旨在反对冷战，推进社会开放，其精神领袖是爱因斯坦。我到许良英家里和他讨论的问题，大多围绕爱因斯坦进行。当时我的新思想大部分来自《爱因斯坦文集》。整个80年代，我都在不停地阅读《爱因斯坦文集》，尤其是第三卷。如果说我这一生很幸运，那就是我和许良英认识以后，我有了两个精神来源：一个是爱因斯坦，另一个是许良英。



二、我和许良英的深交：关注中国命运

我和许良英的交往更加关注中国问题研究是我到北京以后才开始的。记得 1986 年我到《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以后，杂志社召开了“双百方针”三十年座谈会，我是会议的组织者，许良英在会上做了《“双百”方针带来的喜悦和悲哀给我们的启示》的发言。我当时非常激动，跟他说我想研究“双百方针”，许良英鼓励我做这个专题研究。80 年代末，我花了几年时间做这个专题，发表了好几篇学术论文：《“双百方针”的历史回顾》（发表于《走向未来》杂志，1988 年第 01 期）、《双百方针历史大事记》（发表于《科学学研究》1988 年第 04 期）、《双百方针：政策分析与理论思考》（发表于《走向未来》杂志，1988 年第 4 期）。我还写了一个研究计划《现代中国科学史上的三次学术批判运动大纲》，专门编写了一本“双百”方针三十周年纪念文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许良英为这本书写了 3000 多字的序言。在这个期间，许良英与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我为这次会也做了很多辅助工作。由于“双百方针”的研究，我 80 年代后期就介入了很多中国现状问题的研究，比如知识分子问题、专家治国问题、人权问题、科学与政治关系问题、思想自由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的思想有了更大的独立性。

1989 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向何处去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共同话题。我的很多朋友选择了出国。当时我也很踌躇，应该往政治活动方向走？还是往当思想家方向走？抑或是下海创办公司？我后来下定了决心：到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创办咨询公司，参加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中，争取活得有尊严，探索一条中国知识分子的新道路。关于这个问题，我和许良英有默契，也有争论。许良英更重视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传统。我认为，这个传统之外应该加上市场经济。

三、许良英与我创办长城所的关系

1993 年，我成立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长城所现在是新经济领域专业咨询公司，也是中国最大的民间智库，有 300 多人。如果说许良英对我的影响很大，那么许良英跟我成立长城所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从表面上看，许良英开始反对我成立长城所，后来对我成立长城所比较理解。所以以前人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没有关系”。

记得在许良英去世前一年，他去看病，顺路来到长城所。看到长城所的发展规模，他当时表示很高兴。在许良英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经常问我：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研究所，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每次他这样问，我都说，实际上我成立长城所这件事，与他有过协商和沟通，但是他都忘了。

关于长城所和许良英的关系，是在他去世三年后，我才想清楚的。为了参加今天的追思会，我一直在酝酿在会上要说些什么。昨天晚上，我半夜醒来，终于想清楚了。许良英和我成立长城所不但有关系，而且关系很深。这个关系有两个方面：从价值观上，是普世价值；从方法论上，是独立思考。上面说了，我和他的交往就是对我独立思考能力一次次的锤炼。每次不管是发生政治、经济的任何事，他都有他的评论，他也要听我

的评论。他的口头语是：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我们30年来一直这样交流着。这些磨练使我对经济、社会、科技方面发生的事情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在这些疑问下，我对事情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而这些判断是我做咨询和做智库的根本能力。

如果用爱因斯坦的思想模型来描述的话，独立思考的模型应该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怀疑，二是逻辑，三是知行合一。如果说爱因斯坦和许良英有不一样的地方，许良英还有第四条，就是历史感。任何事情都有历史感，爱因斯坦更多的是科学的、物理的、逻辑学的。关于知行合一，他们的共同特点一定是针对现实的问题发表意见，不是空头说理论。爱因斯坦对二战以后的科学发展、经济形势、政治形势以及犹太人事务都发表了很多意见。许良英则对科学史、中国现代史、中国的政治发展和人权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

四、许良英的精神遗产

中关村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发源地。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人对民主、人权、科学、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思考。我认为，这些思考是中关村崛起的思想缘由，许良英的贡献就是把这种思考上升到普世价值。

如果中关村的崛起得益于中国80年代的思想解放，那么硅谷的崛起得益于7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7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是对工业文明的解构，它发生在美国西部，位于美国东部工业文明兴盛之地的边缘。美国的新经济发源地硅谷就是在这场对工业文明解构的运动催生下诞生的。全球第二大新经济的中心则诞生于中国80年代思想解放的源头——中关村。

许良英逝世的时候，记者来采访我，问我怎么看许良英。我说：许良英先生最大的价值是在全球化的意义下，追求普世价值。现在中国处于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化有三个层次：一、物质全球流动；二、人和资本，各种要素在全球流动；三、全球的普世价值。许良英做的是全球化中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努力。80年代以来，他在中国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大部分属于对普世价值的探索。在普世价值方面，他做出的贡献是最大的。

从方法论上说，许良英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独立思考。从表面上来看，许良英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追求民主。难道许良英的精神遗产只是对民主化的追求？我觉得不仅仅如此，他的更大遗产是促使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独立思考。许良英的独立思考使得他不盲从于任何流行观点，甚至人际关系。他的独立思考使得他得罪了很多人，而他却从来不为所动。我认为，独立思考能力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而且现在不管怎么样，中国人的思考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胡适曾经说过：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中国就有前途了。许良英追求的是让更多的中国人有独立思考。如果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国就崛起了。现在中国人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中国的未来也是靠中国人独立思考能力来决定。

总之，许良英留给我们的最大精神遗产就是普世价值和独立思考。

【王德禄】1956年生，青岛人，1982年大学毕业，现为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许成钢：许良英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的一生

因为时间缘故，我这里着重介绍我父亲最后 30 多年的工作。我先非常概要地把我对他的认识说一下。他一生受到了爱因斯坦巨大的影响。他一生讨论的是科学、民主，无论是他对科学的追求，还是对民主的追求，都受到爱因斯坦的巨大影响。

2008 年美国物理学会（APS）大会授予他“萨哈罗夫人权奖”。他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去领奖，只好由我代他去。下面我非常概要地把当时替他领奖的时候，向大会做的报告的幻灯片¹⁴⁴在这里给大家重放一遍。当年制作这组幻灯片和介绍词都是经他亲自审定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里只介绍其中最主要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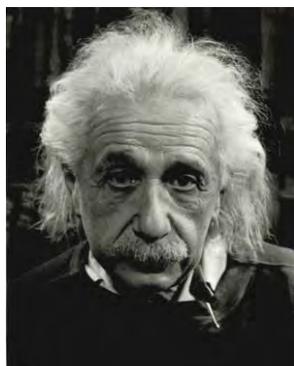


图 1 爱因斯坦



图 2 萨哈罗夫



图 3 许良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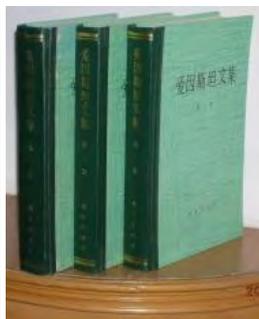


图 4 三卷本
《爱因斯坦文集》

幻灯的这段话¹⁴⁵是说，许良英是 40 年代入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但是他在 1990 年代早期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这是在他对社会认识的演变中的重大转变。在他对社会认识的整个过程中，最突出的就是他一生不放弃地、坚持地追求真理和追求社会正义。即便是受到误导，这些基本原则也没有改变过。这整个过程一直都是受到爱因斯坦思想的启发。在这个启发下，到了晚年，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推动中国民主的事业上。

之所以在介绍他的整个幻灯片的首页选了他与爱因斯坦和萨哈罗夫的照片（图 1~3），原因是，第一，他一生受到的影响，无论是从科学还是从民主，最主要的是爱因斯坦。第二，他这次获得的是萨哈罗夫奖，所以把萨哈罗夫的图象放在中间。从作为一个科学家追求人权和民主的角度讲，他与萨哈罗夫是有共同认识的。下面（请参看本书前面的照片，编者注）是当年他被打成右派，被迫在农村劳动改造期间穿的衣服。我

¹⁴⁴ 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选用了部分幻灯片的内容，其余幻灯片的内容可参见本文集前面的照片。编者注。

¹⁴⁵ “Xu Liangying, a veteran member of the CCP since the mid 1940s, has renounced his belief in Marxism in the early 1990s. From the sketch of Xu's life, one can tell the evolution of his social ideas over the decades. The evolution also indicates the path of his persistent search for truth and social justice, which has been, from time to time, inspired by Albert Einstein's ideas.”

赴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务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开放、改革为
基本国策的我国现代化事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
中间曾出现过一些曲折和失误，但总的发展方向还是顺
应民心和世界历史潮流的，这十年确实是建国以来最好的
时期。然而今天，改革在前进中遭到严重障碍：腐败成风，
“官倒”猖獗，物价飞涨，人心涣散，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面临严重危机。继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传统的中国知
识分子，不能不为此忧心忡忡。为了使现代化事业不致夭
折，我们这些长期战斗在科研、教育、文化第一线的老
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本着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以赤诚
的爱国心，恳切地向你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 在坚持开放、改革的前提下，尽力使政治体制
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因为
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现实告诉我们，政治民主化(包括法

图5 1989年公开信首页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钱临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淦昌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名誉院长)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施肇基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南京
地理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学部委员)

许良英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许崇清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褚圣麟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研究员)

叶圣陶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学部委员, 学部委员)

黄宗甄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

胡以华 (中国科学院软件所研究员,
学部委员)

朱光潜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图6 公开信签名首页

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

许良英

随着1989年东欧、苏联的巨变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东西
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冷战，从历史上消失了。虽然地区冲突、民族纠纷、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还会长期继续下去，但是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而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20世纪上半期。世界和平有了保障，向往和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是经历了纷争、战乱、最困难的20世纪在最后的十年为未来的新世纪所准备的献礼，是科学、民主和理性的伟大胜利。

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把现代文明归结为科学与人权；1919年他又把人权扩大为民主。1924年孙中山也说：“现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权时代”，“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并且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可是，进入30年代，欧亚几个大国出现了逆流，这就是德、意、日三国猖獗一时的法西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专制；以及50年代以后出现在中国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类自我折腾。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回到中世纪的一种“返祖现象”，是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的历史大倒退。历史终于克服了这种倒退，不过代价是无比高昂的，包括亿万人的生命。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们从现代迷信中清醒过来。于是有十年改革开放的局面。改革的目标，1981年曾确定为：建设一个“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人们为这个目标所吸引，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作祟，民主始终是寸步难行。特别是1989年6月4日那出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之后，民主自由被视为洪水猛兽，坚持主张民主的人被斥之为“敌对分子”。一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反右”和“文革”年代。棍子、帽子满天飞，稍有独立思考的言论、著作一概被禁，而骗子、流氓、娼妓的胡话、梦呓却使权贵们如获至宝，正义之士无不为之中华民族的厄运而唏嘘。

现在，从南到北骤然又吹起强劲的“改革”之风，人们为之雀跃，似乎又出现了希望。但是这次改革，谈的只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生产力，而回避政治改革，更是讳言民主。这种拐脚的改革能否成功，殊堪怀疑。

有人以所谓“四小龙”为范例，认为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可行的。殊不知“四小龙”本来就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经济起飞并无体制方面的阻力，而中国大陆首先碰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政权和官吏不受广大人民和独立舆论的监督，必然“官倒”猖獗，腐败成风，社会矛盾必然日益激化，以致不可收拾。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历史的铁律，谁也逃脱不了。不受人民监督的政权，必然腐败；而腐败和官倒人民是无法容忍的，它们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和催化剂。

如果人仅仅是经济动物，生产力的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那么值得称道的并不是亚洲“四小龙”，而是希特勒当政时的德国。1933年1月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到年底，德国失业率就减少了1/3(原为33%，800万人)，以后逐年下降，到1938年已不到1%。1933-1938年5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9%，(平均年增长率11%)，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尤为迅速，5年内将翻了番。根据这一“伟大功绩”，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何况他搞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简称Nazis“纳粹”，按德文原意该译为“民族社会主义”)。那些鼓吹不搞民主也能发展经济的说客们，竟没有一个敢于公开宣扬如此辉煌的纳粹经验，实属莫大遗憾。

图7 《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2

记得非常清楚，在我小学的时候他回北京两次，穿的就是这样子的衣服。《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就是当他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状态下进行的。图4是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在座的范岱年老师也参加了这个工作)。父亲决定，在获得萨哈罗夫奖时，作为回赠的礼物送给APS。后来，《文集》收藏于APS图书馆。

下面是与他获得萨哈罗夫奖直接相关的部分活动的照片。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86年11月14日同刘宾雁、方励之、李淑贤，在中关村812楼704号的照片。那天，他们讨论筹备纪念反右运动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这个筹备工作后来招致了著名的严重后果。图

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

8

近来，北京、上海等地发生了多起因思想言论问题遭到当局拘捕、拘留的事件，国际舆论哗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有志于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震惊，并深感不安和忧虑。

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现代文明发端于人的现代化，即人的觉醒，摆脱古代和世纪专制思想禁锢，认识到人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享有不可转让和侵犯的基本权利，首先是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这就是现代的人权意识。舍人权而侈谈现代化，无异于缘木求鱼。205年前法国的《人和公民权利的宣言》即已明白揭示：“对人权的无知、蔑视或践踏，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同样印证了这一千古不易的真理。随着20世纪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和维护人权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宣告：“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并且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理应率先恪守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各项公约，而不因国内的人权问题而成为国际舆论的谴责对象。

为此，我们呼吁当局勇敢地结束我国几千年来对思想、言论、文字钳制的历史，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我们认为，只有尊重人权，确保公民各项应有的权利，社会才会有真正的安定；否则，只会激化矛盾，诱发动乱，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许良英 王来敏 丁子霖 蒋培坤
邢贲群 刘辽 张抗抗

1994.3.9.

9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VOL. CXLIII . . . No. 49,632

Copyright © 1994 The New York Times

7 Chinese Intellectuals Appeal For End to Political Repression Beijing Urged to Free Dissidents and Stop Arrests

By PATRICK E. TYLER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BEIJING, March 10 —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s latest crackdown on dissidents, seven leading scientists and intellectuals appealed in writing today to President Jiang Zemin for an end to repression of free speech and for the release of all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statement, made available to Western journalists a day before Secretary of State Warren Christopher is to begin an official visit, i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petitio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human rights from a group of eminent intellectuals since the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s in 1989.

Arrests Are Protested

The group said it was protesting the arrests and intimidation of dissidents over the last week in advance of Mr. Christopher's visit and the opening 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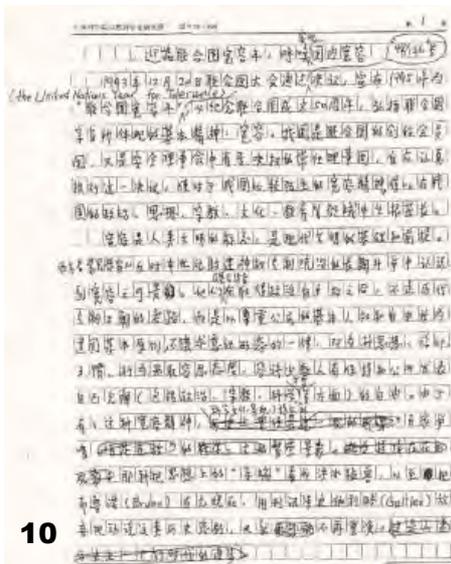
The tone and spirit of the statement recalled the popular movement that rose in the winter of 1989 and gathered momentum that spring, first among intellectuals, then among students and workers. Their protests in favor of democracy paralyzed Beijing and seiz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or weeks until the movement was crushed by tanks and machine-gun fire in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4, 1989.

Petition Mailed to Offici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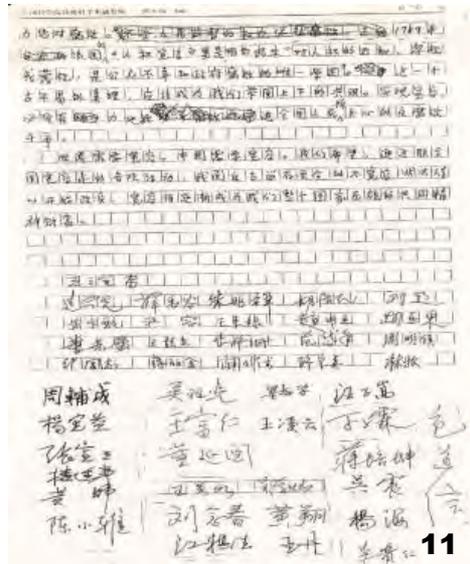
Mr. Xu said he mailed the petition today to President Jiang and to Qiao Shi,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r parliament. Official Chinese news organizations have not yet reported the appeal, but its existence is likely to become widely known here through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beamed to China.

图 8 许良英发起的改善我国人权状况的呼吁书。

图 9 1994年3月11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刊载了呼吁书全文。



10



11

图 10 1995年许良英发起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图 11 呼吁书的签名。

5是他起草的1989年写给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以及李鹏的一封公开

信的首页。图 6 是这封信的签名的首页，共 42 人签名。接着是 1989 年 2 月，天安门事件之前，同方励之、王丹等在一起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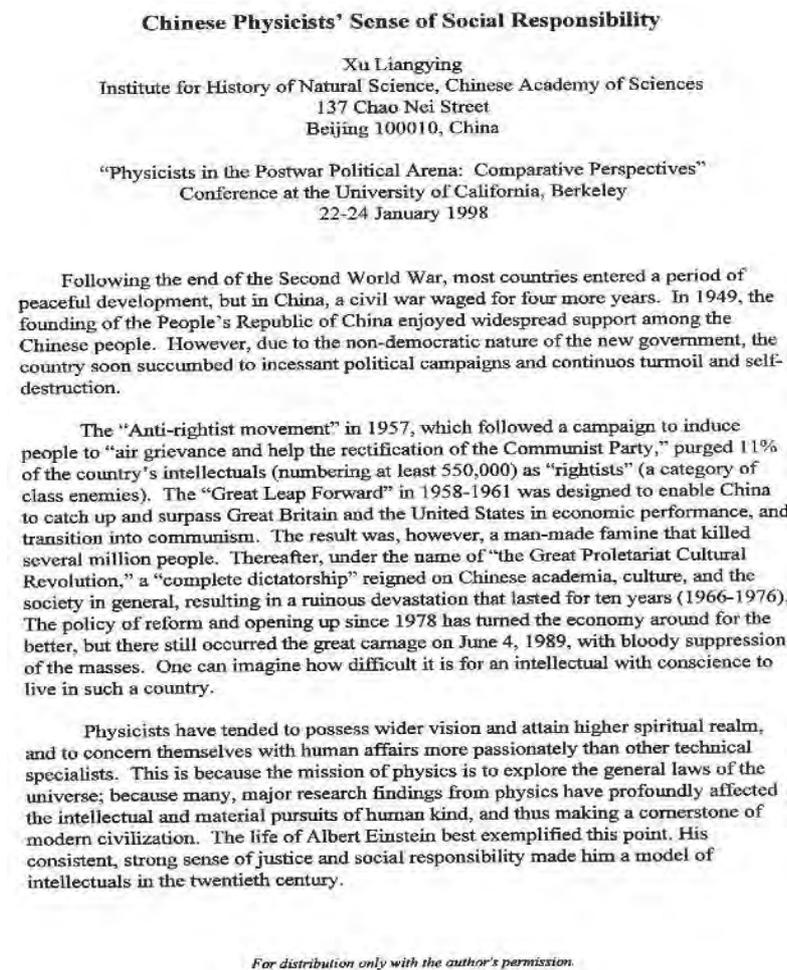


图 12 许良英的论文《中国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

发的呼吁书。这封呼吁书有 7 个人签名。

图 9 是《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发表的呼吁书的消息。1995 年他和丁子霖共同获得纽约科学院的“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以下是 2006 年丁子霖夫妇和我父母在中关村家里的合影。

图 10 是 1995 年针对人权问题的呼吁书。当年是联合国的宽容年，当时中国尚未签署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直到 1997 年才签署）。为了实际推动中国改善人权，他起草发起了这个呼吁书，要求对六四平反，要求释放全体政治犯。图 11 是呼吁书的签名，第一个人是王淦昌。“中国人权”组织把这个呼吁书发到了网上，征集全球科学家签名，后来得到了国际上一千多人的签名，包括十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以下照片是同他的大学同学胡济民、汪容一起在王淦昌先生家的合影。

图 7 是在 1992 年，许良英发表的一篇文章非常重要的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2 年，大家都在讲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带来了经济如何的增长，产生一种幻想，似乎可以在保持专制的制度下，单纯地通过经济改革就能推动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他发表了这篇文章，非常尖锐地指出，没有推动政治民主，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无论怎样去推动经济上的变化，最终一条腿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的。一定会导致经济改革失败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是最终不可抑制的腐败的蔓延。图 8 是 1994 年为了推动中国人权而

图 12 是他在 1998 年写的一篇论文，讨论中国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熟悉爱因斯坦工作的人 would 看到，这里处处可以看到爱因斯坦的影子，可以看到他基本的思想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

以下几张照片反映他在科学史方面的一些活动。这是 1987 年在科学史所。这是 1983 年他作为科学史所代表团成员去美国访问，在哈佛大学与霍尔顿（Gerald Holton）教授学术讨论的照片。霍尔顿教授是国际上研究爱因斯坦科学方法论最权威的学者。他们虽然见面很少，但保持了三十年之久的友谊。在许良英 2008 年获得萨哈罗夫奖的同一天，霍尔顿教授获得了物理学会的另外一个奖。作为老朋友，他们同时就在同一个大会上领奖。这是 2007 年许良英在胡绩伟先生家的留影。他很多次向我提起来，第一次见到胡绩伟先生，他们就已经如同老朋友一样，立即感到互相都非常亲近，因为他们感到内心里对于中国的社会、对于中国的未来、对于中国的过去都有非常相似的认识。这是我父母同李锐先生的合影。在他的最后十几年里，他有规律地同一些对中国制度持批判态度的老共产党员在一起聚会，主要内容就是批判专制制度的弊端，寻找改革的道路。

最后一张照片是许良英、王来棣夫妇 1995 年 6 月 10 日在京郊百花山所摄。我当时报告的内容是，我父亲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工作是与我母亲合作的探讨民主的理论和历史的著作。这就是今天发到大家手里的，最近刚出版的《民主的历史》一书。下面我简略地介绍一下这本书。图 13 是这本书的部分目录。其中，我特意将第六章“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展开。这部分内容是他多年以来研究的核心内容。他认识到，在中国关于民主的认识相当混乱，关于民主的文献，人们的认识相当肤浅。懂得现代民主，必须懂得洛克的思想。

这本遗著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二编，讨

图 13 《民主的历史》部分目录（已发表）

第一编 民主在西方的历程

- 第一章 希腊雅典民主制
- 第二章 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
- 第三章 人的觉醒——现代文明的开端
- 第四章 荷兰共和国和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
- 第五章 英国的两次民主革命和议会民主制的形成
- 第六章 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
 - （二）呼唤革命的《政府论》
 - （三）天赋权利和自然法
 - （四）政治社会（公民社会）的民主原则
 - （五）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
 - （六）自卫和反抗暴政的权利
- 第七、八章 美国民主制的创立；发展

第二编 民主在中国的传播

- 第一章 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传统
- 第二章 19 世纪 40~90 年代中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
- 第三章 戊戌变法与思想解放运动
- 第四章 孙中山的民主观
- 第五章 “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附录：走出伪民主误区

- （一）旧说误人
- （二）是法国大革命首先实践现代民主制吗？
- （三）现代民主理论创立者洛克
- （四）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发明人卢梭
- （五）卢梭与极权主义
- （六）卢梭与法国大革命

论关于中国的部分。其中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批判中国古代曾经有过民主传统的错误流行观念。再有就是分析到底中国近代以来，共和革命为什么失败，孙中山的民主观念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五四运动后来夭折了。非常可惜，父母过世的时候这本书没有写完，他们的思想尚未完全写出来，只到这里结束了。

父亲去世以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下面这篇附录《走出伪民主误区》，发在《炎黄春秋》。

不久前我在一个会上同《炎黄春秋》前主编吴思相遇，他当时是负责把这篇文章发在《炎黄春秋》的。这篇文章批判“伪民主”。所谓“伪民主”是源于卢梭的思想。为什么批评卢梭如此重要？简言之，其中的核心内容在于，卢梭的思想是产生红色恐怖以及后来产生极权主义思想和极权主义制度的基础。历史上，卢梭的思想首先从深处造成了法国大革命中以革命的名义从事极端暴力的组织、思想和行为，即所谓的红色恐怖。后来的极权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其中不断被用来愚弄人民的一些核心想法，根源尽在卢梭。国内很多人把卢梭的东西当做民主思想来传播，导致了极大的混乱。这篇文章是父母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他们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图 14 《民主的历史》部分目录（未完成）

第一编 民主在西方的历程

第九章 呼唤民主、科学、理性的启蒙运动

第十章 多变的法国民主革命

第三编 理论的探讨

图 14 是他们计划要做但没有完成的工作。

图 15 是最后几年里，我本人和我父亲反复讨论的一些话题。这些是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我完全同意。

图 15 最后几年反复讨论的话题：人权-民主

人权观念（普世价值）是基础，民主是对人权的制度保障

- 对人权、民主观念的启蒙运动是建立民主制度的条件
- 洛克是近现代人权观念和民主制度的创始人
- 如何理解洛克人权概念中的核心概念：property

儒学中民主概念（钱穆、陈寅恪、辜鸿铭等）

- 中国古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权观念相符
- 但皇帝、朝廷、官员总是将己所不欲的权利被侵犯施于人民
- 自古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没有制度保障，备受政府侵犯
- 一些新儒学者把古语中的“民主”“选举”词汇混同于近现代概念，造成概念混乱
- 一些新儒学者直接反对民主

第一个基本话题是关于人权和民主的基本理论。多年以来，他反反复复地强调，人权的观念作为普世价值是一切民主宪政制度的基础。也就是说，当人们不懂得人权的观念，没有人权的观念时，所有关于民主的讨论实际上是空话。因为民主是用来保障人权的制

度，当人们连自己有权利都不知道，当人们不知道保护所有人的人权的时候，这些人不会去争取民主。即便他们嘴里可能用民主这个词，他们并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他们会很容易被实际反对民主的各种各样的邪说愚弄。因此他反复强调，对于人权和民主这个观念的启蒙运动，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二、三十年里反复强调的最基本的一个内容。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有意的歪曲和混淆概念，对人权的错误认识

在国人里非常普遍，包括在广大知识分子之中。而这正是他反复强调这个最基本的动机所在。

洛克的基本思想是近现代人权观念和近现代民主制度的奠基思想。因此理解洛克的基本思想非常重要。多年里我们的讨论中，涉及到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洛克关于“Property”的概念。这个词中文翻译起来很困难，通常翻译成财产或者产权。到底洛克用“Property”这个词时，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对此有过很多讨论。他强调，洛克在论述天赋权利中的“Property”时，并不仅仅指狭义的“财产”，而是指广义的“所有物”和“所有权”。其中，首先是生命（life）和自由（liberty），然后才是财产权（estate）。洛克的核心思想是说，人生来就具有他的所有物或所有权（Property），而任何人的所有物是绝对不能被侵犯的。这是整个人权观念的核心部分。我完全同意父亲对洛克原意的解释。但是，作为经济学的学者，我强调，即便按照现代的通例，把 property 翻译成财产或以狭义方式解释产权，每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本身就是保护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人权概念的基础，是民主制度的基础。经济学家—哲学家哈耶克（von Hayek, 1944）应用洛克的概念对苏联和其他侵犯私有产权的制度作过这样的解释。最近大量的历史事实也验证了这点。他完全同意。但可惜，没来得及进一步阐述他的见解。

第二个基本话题是，到底儒学中有没有民主概念。简单的答案是否定的。与此相关，他大量讨论到钱穆、陈寅恪、辜鸿铭、杜维明等。集中讨论旧儒学和新儒学里面造成概念混乱的那部分内容，尤其是在新儒学里，这些新儒学的学者把古籍里的词搞出来，指出古籍里的“民主”和“选举”与近现代概念中作为外来语外来概念的“民主”和“选举”完全不相干。因此新儒派把中国古代的“民主”“选举”，和今天讨论的“民主”“选举”混为一谈的时候，进一步在国内制造出更多概念的混乱。当然，另一面还有相当多新儒学者直接反对民主。

需要强调，我父亲从没简单否定中国古代的思想。当他强调人权观念是普世价值（包括中国的价值观）时，总是指出，中国古代一直传下来的思想和人权的观点是相符的。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本中国文化里就有的内容，其实质就是人权观念的表达。但是这里我想要提到，虽然中国自古就有这种说法，甚至这个说法可以放在孔孟之道里，可以放在历代皇朝科举考试里。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中国的皇帝，中国的朝廷，中国的官员，自古以来永远是侵

图 16 最后几年多次讨论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革

经济改革与民主改革的关系

- 支持经济改革；经济改革不会自动导致民主
- 没有民主，经济改革不会成功（与 Hayek 相同）
- 对无视甚至反对政改的“改革派”的批评

新权威主义和太子党反对民主的危险（从 1990 初）

- 对新加坡模式的批判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

- 与李慎之、胡绩伟、谢涛等人的讨论

马克思反对人权、民主

- 与李锐、张宣三等人的讨论

对年轻人争取人权与民主永远充满信心

-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犯其他人权利的。即，他们总是把“己所不欲”的权利被侵犯施加给人民。因此，这里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中国，自古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没有制度保障，备受政府侵犯。所以人权的概念背后一定要有制度的保障。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同他的讨论的问题中，有一系列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的改革（图 16）。他一直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改革，所以每次我们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他非常支持中国经济改革，而且有很大的热情。他非常努力地推动我回到浙江去调查浙江经济改革的成就。从 90 年代初就如此。但是他同时又强调，经济的改革不可能自动导致民主，他最早就直接地对一些西方学者的这种说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有个流行说法，说中国经济改革会产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会有民主的愿望，因此由经济改革产生的中产阶级会自动催生出民主的愿望。他认为，只要没有启蒙运动，没有人权观念，这是不可能的。民主不会如此自动产生，民主不经过巨大的努力不会产生。

另一面，他强调，没有民主，经济改革不会成功，就像他发表的那篇文章一样。我作为经济学者还要强调一下，他并不很熟悉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哈耶克的工作，但是从完全独立的研究中，他得出的结论和哈耶克的想法完全一样：没有民主制度，经济改革不会成功。还有他从 90 年代初以来，对中国所谓的改革派里面，那些无视政治改革，甚至反对政治改革的那些所谓的改革派，一直持非常尖锐的批判态度。和这个问题紧密相关的，就是从 80 年代兴起的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和与新权威主义紧密合在一起的那一股潮流，以及“太子党”。他早在 90 年代初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新权威主义和“太子党”反对民主对中国的危险。他反反复复地从各个方面去分析，去批判。但是，现在非常不幸，当年他的预言都言中了，他没有搞错。

当时在中国兴起一种说法，说中国应该走新加坡模式。他从一开始就非常尖锐地批判新加坡模式。有若干朋友来家里讨论，他非常不留情面地批判了这几位很好的朋友，一直有些朋友以后再不敢来了。过十几年以后，这些朋友意识到，当年对他们的批判，对他们后来的认识有多么重要。

在晚年，他与许多对中国制度持批判态度的老共产党员们有很紧密的往来。他与李慎之先生、胡绩伟先生、谢涛先生、李锐先生、李普先生等探讨大量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等等。每次我回到北京，他都要同我讨论，告诉我其他的先生是如何讨论民主社会主义的，问我的看法是什么等等。他在 90 年代初对马克思主义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不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批判马克思主义里面对中国致命的错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关于反对人权，反对民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因此，九十年代他同一些朋友（如李锐、张宣三）曾发生过非常尖锐的争论。后来，他们都表示终于改变了看法，接受当年他的尖锐意见。

今天很多人看到中国非常不幸的过去和不幸的现在，非常多的人对中国感到失望和没有信心。虽然父亲对中国制度和政府的弊端批判很尖锐，但是他一直到晚年，到最后，都对中国的未来，对年轻人，充满信心。他反复讲的那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道理就是，绝大多数年轻人最终会认识到自己的人权的重要性。认识到捍卫自己

的人权，捍卫所有人的人权是必要的。那就是中国的未来所在。



图 17 左起：郭迪，希伯来大学前校长、爱因斯坦档案馆董事会主席 H. Gutfreund，许成钢，档案馆馆长 R. Grosz

最后我向大家交代一下，在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全家决定把他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遗稿全部捐给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馆。图 17 是我们去年到希伯来大学在爱因斯坦档案馆展示第一次送到的手稿的情景，中间这位是希伯来大学的前任校长、爱因斯坦档案馆的总负责人和学术主任翰纳荷·古德傅瑞德（Hanoch Gutfreund）教授。这一位大胡子先生是爱因斯坦档案馆馆长戈饶兹（Roni Grosz）博士。图 18-19 是希伯来大学不同学科的学者审视我们捐赠的父亲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遗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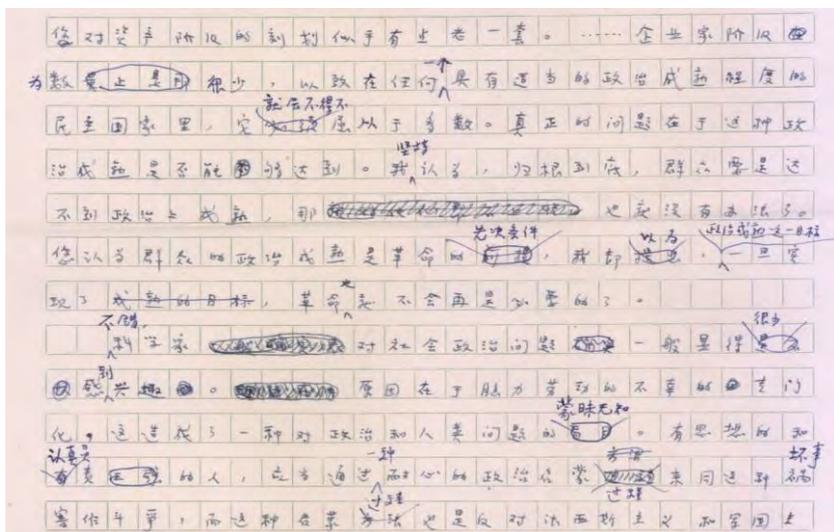


图 20 爱因斯坦给一个加拿大青年的信

前面讲到，许良英的一生，从科学到民主，从最基本的地方都是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图 20 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的一段译文手稿。这份手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许

良英的政治立场的转变。

这是爱因斯坦给一个加拿大青年的回信。这个加拿大青年误入歧途，以为共产党的做法有许多优点，在这封信里，爱因斯坦告诉他，共产党的做法没有前途，前途在于民主制度。

【许成钢】 许良英长子。1950年12月31日生于杭州。文革期间，1967年主动从清华附中去黑龙江绥滨农场（后改建为生产建设兵团），直至1976年。劳动之余，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毛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学文献，自学了大学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及计算机课程。1977-78年参加许良英组织的爱因斯坦研讨班。1979年以初二学历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研究生。1982年入刚组建的社科院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84年赴哈佛大学（先为访问学者，后为博士研究生）。1991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2008年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历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2008年起任香港大学教授。现任香港大学钟翰德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曾任亚洲法律经济学学会主席。

刘 明：怀念许良英、黄万里、刘辽三先生

我比许先生小24岁，许先生说我们是老猴子和大猴子，分属1920与1940年代的两代猴子。自从1980年代与他相识起，我就视许先生为学识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导师。与许先生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则来自彼此间的多重关联。第一，我1962—1968年学的是理论物理本科，且对物理学史向来有兴趣，与许先生是同好；第二，文革结束后，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我考到浙大，读的是自然辩证法，后来叫科学哲学，与许先生是同门；第三，1950年组建中央劳动部时，李立三当部长，施复亮当第一副部长，他把我父亲从湖南叫到北京，在劳动部任职，1957年倒了大霉，被打成右派，一类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去过茶淀农场，兴凯湖农场等处，吃了大苦头。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或者“黑五类子女”，时势之凶险，世态之炎凉，我们有22年的刻骨铭心的感受，与许先生算是半个同难。



此外，我曾在北京四中读高中，方励之是我的师兄；在北师大读物理，刘辽是我的授课老师。他们两位都是许先生的莫逆之交，这样我们之间又加了一层联系。

归纳上述多重关联，我们是确切的同道师生。

最近看到一个材料，报道中央领导在重庆讲话，强调重庆不能搞大开发，不能搞大工程，重庆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保护生态环境。近年来讨论三峡工程是非的材料很多，到底三峡地区的现状怎么样不清楚。上面这一报道让我明白了，三峡工程的负面影响相当大。大的经济社会项目再不宜开展。将来因为此工程导致长江上游真要泛滥的话，就是下游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受灾的问题。这说明当年黄万里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是对的，这个问题现在上层掌握了很多情况，但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我认为要树立中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模范典型，应该树许良英和黄万里。

实际上树立的典型正好是他们两个的对立面，许良英倡议举办反右运动 30 周年学术讨论会，钱伟长报告上去，换了个副委员长当。黄万里的对立面是张光斗。张光斗作为力主黄河三门峡工程和长江三峡工程上马的专家代表，成为上面树立的知识分子典型。钱伟长、张光斗对官方有功，对民族有罪。两位都是清华的，把清华的学风败坏了，把中国知识界的学风败坏了。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状况相当糟糕。因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都是狷介耿直之士受批判打压，见风使舵投机钻营的小人如鱼得水——官禄德路路通。

中国民间有很多人生哲学的俗语，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站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出头椽子先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缺乏终极关怀的中国文化当中，负面的但是影响很大世代传承的东西，在最近几十年的社会环境里戴着种种美丽的光环“发扬光大”了。钱张一许黄等正反两面的遭遇给信奉上述“聪明哲学”的识字人提供了范例。

中国要民主文明富强，知识阶层必须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为此首先要重振“良知”。许良英和黄万里则是拥有良知，大智若愚的真正知识人。二位先生的共同性很清楚，就是持不同意见者。但是两个人又不一样。我曾设想做一个理想实验，找一些没有泯灭良知的，书不一定看得很多的人，组成一个陪审团，对最近 30 多年来许良英先生赞成的东西，反对的东西，让陪审团来听一听意见，控辩双方先对许良英的作为进行充分的控告和辩护，再由陪审团作出判断。我想陪审团容易拿出意见来：许良英是正确的。所以他代表公共理性，维护一个公共的道德操守。黄万里做的事情恐怕陪审团就比较难拿主意，大型水利工程是很专业的东西，控辩双方的辩论陪审团也听不懂。所以说黄万里代表了专业理性，维护一个专业的道德操守。

公共事务要像许先生那样参加，这些东西说起来并不深奥。1986 年、1989 年、1990 年代……事情，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觉得许良英先生做的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上面一定要打压他。此类的人和事不胜枚举。其后果是，搞到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不断恶化。知识分子也还需要像黄万里这样的，就是掌握人类积累的尖端科学文化，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为经济社会建设出好主意。不要像张光斗那样墙头草，随风倒，这样的话我们的大学才有希望。今天的大学就像有些老先生讲的，即使一些顶级的大学，也变成了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基地，或者是集天下英才而毁之。如果把许先生和黄先生两个典型树起来，我觉得对端正当代学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联系到我们自己。我们和许先生比，差的就是智和勇两方面。学识智力的方面，大概是 5 分和 10 分的差距，许先生 10 分，我们 5 分；道德勇气的方面，是 3 分和 10 分的差距，许先生 10 分，我们 3 分。而当下的宣传教育，是要把呈正态分布的学生智力强行压缩为均值状态；让学生的正义勇气坠落为 2 分 1 分甚至负值。经年累月，大学校园在大师无出的同时丑闻迭出，即为此判断给出了注脚。

我是浙江大学的校友，1978—1981 年在那儿读研究生。此时的浙大与三四十年前

竺可桢治下的浙大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说句心里话，有些老师我都不便承认他是我老师。因为他们一个是学识差，这个不难理解，二十多年里只许搞阶级斗争不许搞专业，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第二个是做人，本来你手中握有权利甚至真理，面对权力，你到底是仰视还是平视？你向他妥协还是抗争？这些老师，有些以当官为荣，热衷于走官路，这就必须学会礼拜权力，权力是他的指挥棒，这样就和治学完全是另一条道路了；有些是要采取妥协的态度，而且他让你学生也去妥协，说起来还是“为你好”，其依据即是前面引用的那些世俗哲学，有时还真让人哭笑不得；还有一些被政治搞怕了，“惹不起，躲得起”，只顾自家事，对国事天下事取回避态度，充分享受当下“沉默的自由”。浙大如此，各个新老大学也基本如此，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高等教育的衰败系一世所公认却又不便言说的家国大事。有人会搬出三十年来大学生人数，大学高楼大厦、教授博士、科研论文和注册专利数量的成倍增长，……，“无可辩驳”的数据对上述观点加以痛斥。但是，历史上空前的“全民”出国潮——但凡有点条件的家庭，无论其所持的政治立场是左中右那派，其职业是党政官员还是企业高管高技还是教师演员……，都已经或准备不惜代价送子女及孙子女赴美欧日澳，读研读本甚至读中小学——难道不是在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证明本土发生了深重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危机吗？欲挽狂澜于既倒，必须认真反思历史的教训。

大学的学术生态和大学教师的心理状态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1957年那场腥风血雨的“阳谋”是整体性塌方的时间点。体现中国士气的正直知识分子，一部分被毁灭了，一部分变乖巧了，“顽冥不化”者在20多年后仍然是整肃对象。60年来用大棒或用胡萝卜或二者兼施在给一代代青年学子表演着奖惩大戏，只在1980年代看到阳光试图穿透浓重的乌云。许黄二先生在改正之后的抗争显得尤其难能可贵。我所敬佩的老一辈中，同样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还有许先生的好友刘辽，而刘先生显现为另一种类型。

解放前，刘先生是一个左翼学生。在重庆读中学时，就曾帮助四川地下党散发《挺进报》。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游行运动的积极分子。1957年，原本专心于业务的刘先生经领导亲自动员后，响应整风的号召，诚心诚意地提了些意见。整风向反右大转向，系党总支受上级压力，把当时还不到30岁的刘先生打成右派。这帽子一戴就是22年。

1962—1968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上学。入学后，耳边不时听到这个或者那个中老年教师有这样那样的政治或思想问题。以致六年时间里，同学们与二十多岁的青年助教来往比较多，与中老年教师交往非常有限，这些中老年教师似乎除去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自己也不大愿意和学生有更多交流。我因为出身右派家庭，不愿意打听内幕消息，更不敢跟这些疑似“问题老师”来往。

刘先生因为被打成右派，当时就在物理系以系资料员的身份给我们授课，教过我们原子物理和普朗克量子论，我感觉他课讲得简明清晰，不过除了会问一点课堂问题外，没有其它交流。倒是68年毕业离校后，我与刘先生有了更多学术和精神上的联系。

文革当中，刘先生被关进牛棚，比我低一届的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等几个同学因为写大字报批评林彪的顶峰论，被打成反动学生，也进了牛棚。就在这样的非人条件下，刘先生一面自己研究一面给几个大三学生讲授广义相对论。1980年代，这几个因祸得福的同学先后被聘为重点大学教授。刘先生则成为我国广义相对论和天体物理领域的一流学者，北师大物理系成为广义相对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基地。他参与筹建了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并先后出任理事、副理事长。1989年9月，又接替方励之担任理事长。1996年起，刘辽出任国际广义相对论和引力委员会委员。1994年退休直至2010年疾病困扰失去复杂思维能力，刘先生始终活跃在相对论研究前沿且关心着专业里青年学子的成长。

惨痛的右派经历未能扭曲刘先生刚直不阿的性格。恢复自由以后，他在推动相对论前沿研究的同时，也关注着时局，积极致力于思想政治领域的进步。刘先生撰写了不多但厚重的宇宙学哲学论文，以道家思想等阐发基于广义相对论模型，有当代科学观测成就支持的有限暴胀宇宙图景，有力冲击了哲学教科书上宣讲的，建立在僵化思辨和古典力学沙滩上的平直无限宇宙图景。我个人的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研究，他也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和支持。

1989年春和1990年代，刘辽先生多次参与了许先生发起的呼吁民主自由人权的学者公开信签名活动，是敢于挺身而出支持学生民主要求的北师大著名教授。正因如此，尽管他是相对论领域的国内外知名学者，上级行政部门还是多年强行剥夺他招收博士研究生的权利，他亦不为所动。

许黄刘三先生均不愧为科学家的人格典范。但是，许黄二先生的道路带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烙印和个性特征，可以敬仰却难以复制；刘先生的道路则更具有普适性，凡是心怀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在求索本学科真知的前提下，关注并介入公共事务，不畏权势，向全社会发出正义的呼声。身逢当下的大数据时代，电脑、手机和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手段。

许良英黄万里二先生已经驾鹤西去。米寿之年的刘辽先生因罹患帕金森晚期终日卧床失去意识，难以出现逆转的奇迹。为了告慰先人更为了启迪后人，仅以此文奉献给三颗不朽的英灵。

【刘明】籍贯湖南湘潭，1944年3月生于重庆。浙江行政学院教授，2007年3月退休。

伍晓鹰：诗人江婴：寄语民主，追思良英

大家下午好！我和这里在座的很多人都比较陌生。我是诗人江婴的长子。参加这个追思会是因为许良英和王来棣先生曾同我的父母有一段交往，而且是非常好的交往，主要是精神上的交往。我的父母，虽然经历了类似许良英先生的磨难，如今还健在。他们没有能够在许良英先生过世的时候亲自来灵前悼念他，但是当时父亲动情地写下了一首悼诗。因为和成钢最近在研究上的交往，我有幸参加这个追思会，更有幸将父亲提笔重新作的悼诗手迹带来。这篇短文的最后我要代替父亲解释一下这首诗。

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父亲和母亲的情况。父亲原名为伍先祯，现在笔名是江婴，长江之子的意思。父亲是 1947 年考入清华化工系的，我母亲曹葆珍当时在辅仁大学教育系就读。他们当时很快都被共产主义理想造就成为弃家弃学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知识分子。在经过人民大学前身华北抗日军政大学的短暂培训后，他们同时在 1949 年任职于当时的政务院文化委员会。我父亲比许良英先生要年轻 6 岁，但今年已经年近 90 岁了。虽然他和我的母亲经历了很多政治和生活磨难，但现在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



父亲特别欣赏许良英先生对爱因斯坦工作的研究和他关于民主和科学问题的深刻思考。据说是李锐还是李慎之先生介绍他们认识的，大致在 2000 年代初期，也许更早些。他们随后有了电话和书信的往来，可能更多是神交。母亲刚刚找到了一封王来棣先生的亲笔信，其中还夹了一张许良英夫妇 2004 年的照片。也许还有其他信件。父亲告诉我，良英先生曾经说父亲在民主问题上比他觉悟的早，但父亲认为良英先生对民主的认识更加深刻。

我父亲当时在政治上出事缘于他后来说的“理想破灭”。就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思想改造”、“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三反五反”、“干部审查”等的政治运动后，对曾经吸引他的“革命理想”产生了怀疑。他极其反感当时号召的“做党的驯服工具”。认为“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是对独立思考与自由批评的极大限制”，“共产党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批判使个人尊严时常受到扭曲和伤害”。于是，他受到了怀疑。情绪之下他坚决离开中南海，进了天津教育界。碰巧顶头上司是毛泽东的一位叫做王曼恬的表侄女。因不满此人专横跋扈，用人为亲，批评她“要奴才不要人才”，遂产生尖锐矛盾。不久，在以打击“胡风集团”开始进而扩大为全国范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父亲因此被打成“反党反领导分子”。他据理力争，后来得到平反。然而，一年之后，在毛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鼓励”下，父亲又在会上会下满腔真诚，直陈时弊。呼吁共产党要扩大民主，允许独立思考，禁止机关中以“小汇报”为核心的“思想警察”制度。他随即被打成右派，归类于极右，和在座的一些老先生一样，最后的处理也是一类处理。顺便提一下，那个王曼恬后来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一直做到天津主管文教的书记和国务院党组成员。“四人帮”垮台后被隔离审查，于一九七六年十月自杀于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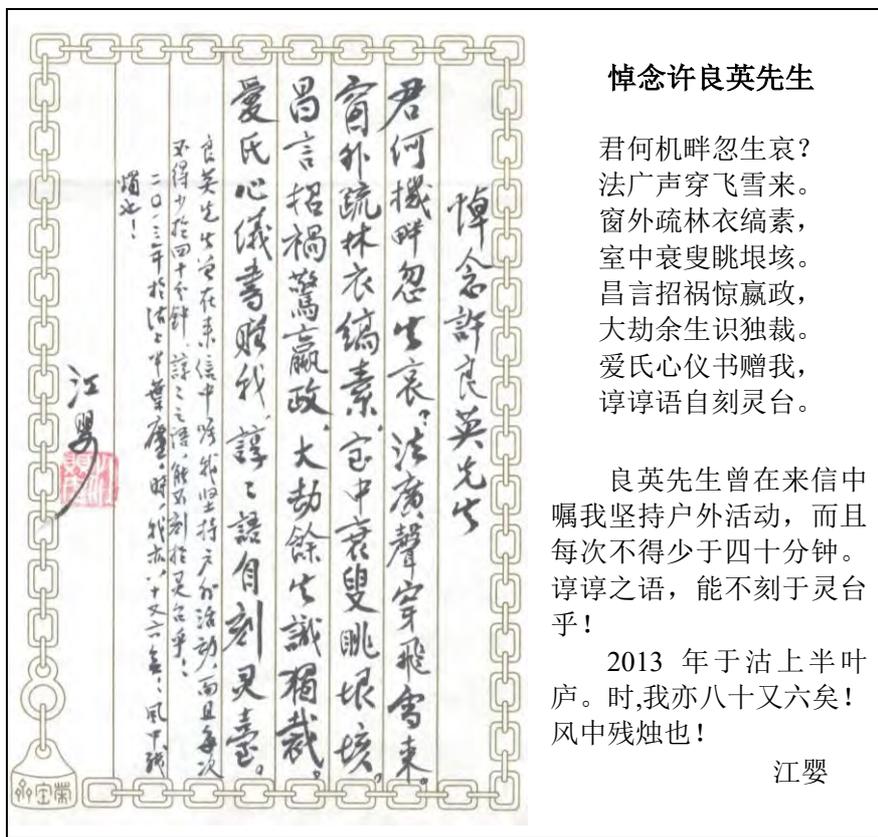
反右最后的一些场景我还记得。我们家当时住的是个日式小楼。我在楼上，清楚地听到下面一些人在吼叫，保姆拦着我不让我下去。吼叫的其实是党委的人，他们几个小时日夜轮班地做我母亲的“思想工作”。目的就是造成正怀着我最小的弟弟的母亲，在精神和身体的折磨下崩溃，从而给据理力争的父亲施加压力。母亲后来告诉我，她最后只好给我父亲跪下，说要不然就是两条人命，要不然就是你的硬骨头。她甚至无奈、无助地相信了：“党委说了，只要你承认是右派，不会严重处理的，只是做一个手续而已”。父亲不愿意牺牲两条人命，但是签字后立即被持枪便衣警察押着走了。

父亲如今还在写作，主要是古体诗作，多数是以古体诗的形式在抒发他的政治情怀，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一个好消息是，我们最近刚刚在台湾出版了父亲迄今全部作品的诗集(由我弟弟伍晓明编)，也就是我手上的这本诗集。我们之所以要在台湾出版这部诗集主要是因为其中一些诗无法在国内出版，特别是一些关于 1957 年反右的，1989 年“六四”的诗作。前面提到的悼念许良英先生的诗作，就收录在这部诗集的 571 页上。

这部诗集的名字是《乙丑风云悲歌》，寓意很清楚了。乙丑年就是 1949 年，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热血沸腾地投身共产党新政权的第一年。这个封面试图反映他和这代知识分子的遭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的封面设计。我喜欢画画，但是走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后多少年都没有画了。出版社征求我们对封面的意见，也提了一些建议，但都不恰当。当时我来了灵感，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封面：我希望用一棵很老的，看似在枯朽的梅树来表现父亲的精神——你看这棵老树还在挣扎，那是生命顽强的挣扎，还可以有力地喷出新枝，开出新花。再有，这个由红色演变至黑色的背景也是有寓意的：

这浓烈的红色表明了父亲年轻的生命开端，一个热血知识青年的，高度革命理想主义的生命开端——相信纯洁的革命政权，深信共产主义；这个红色背景也是那个政权所宣示的旗帜的颜色。但是最后，这背景就慢慢地演变成黑色了，那是一个黑色的结束，一个凝聚了过多鲜血的，黑色的结束。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父亲当时并没有存下那首献给许良英先生的悼诗手稿。一个多月前他知道了这个追思会后，表示一定要亲笔重题这首诗。他现在手比较抖，为此写了很多遍，用了很长时间。前两天我专门抽时间把这个亲笔题诗取来了，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手迹的原稿已经交给了成钢。今天上午我又和父亲通了电话，主要希望可以清楚地传



悼念许良英先生

君何机畔忽生哀？
法广声穿飞雪来。
窗外疏林衣缟素，
室中衰叟眺垠垓。
昌言招祸惊羸政，
大劫余生识独裁。
爱氏心仪书赠我，
谆谆语自刻灵台。

良英先生曾在来信中囑我坚持户外活动，而且每次不得少于四十分钟。谆谆之语，能不刻于灵台乎！

2013 年于沽上半叶廬。时，我亦八十又六矣！
风中残烛也！

江婴

多月前他知道了这个追思会后，表示一定要亲笔重题这首诗。他现在手比较抖，为此写了很多遍，用了很长时间。前两天我专门抽时间把这个亲笔题诗取来了，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手迹的原稿已经交给了成钢。今天上午我又和父亲通了电话，主要希望可以清楚地传

达他在悼诗中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愿我下面的解释基本不违他的原意。这是一首七言律诗，父亲特别追求音韵、平仄对仗等等。遗憾的是，我不是学文学的，要是我弟弟晓明在这里就好了。

这首诗一开始就说“君何机畔忽生哀”。其实父亲当时并没有直接收到许良英先生去世的消息，因为他不在良英先生直系或直接的圈子里。他是从收音机上听见的，他听的是法国的华语广播，所以是“法广声穿飞雪来”。这两句是说，为什么守着收音机的广播突然感到悲伤呢？那是因为传来了许先生过世的噩耗。当时天正在下着大雪，所以父亲说这个消息是跟着大雪一起飞来的。他起身站起来，看着窗外一片肃白，还有那白色的，哀悼装束的小树林：“窗外疏林衣缟素，室中衰叟眺垓垓”。这里的“室中”指父亲的家，“衰叟”指此时他自己这个看着广茫的土地，感到无限哀伤的老人。随后他在诗中提到了良英先生政治上的坎坷经历：“昌言招祸惊嬴政，大劫余生识独裁”。

这也是他们共同政治遭遇和民主理念的点睛之笔。最后是“爱氏心仪书赠我，谆谆语自刻灵台”。这里首先特别提到良英先生所赠与的关于爱因斯坦的书。同时，因为良英先生还在信中谆谆嘱咐家父注意身体，坚持锻炼。此时追忆起来父亲深为感动，所以说一定会把良英先生的关心铭记在心上。到这里，我希望已经尽可能地表达了父亲的意思，同时也寄托了我深深的哀思。

最后，我特别想提到凝聚了许良英和王来棣先生 20 年心血和心路历程的，这本刚刚问世的著作《民主的历史》。我月前从成钢那里得到了一本，还在阅读。今天收到的这本会带给我的父亲。我认为此书是我们今天推动民主启蒙的最好的教科书，适当精简后完全可以进入中学的政治和历史通识教材中。希望体制内知识界的主流在这里能够有个共识，以许良英先生的精神在中国推动新的民主启蒙运动。

【伍晓鹰】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专业，后在联合国发展基金项目资助下赴新西兰 Waikato 大学攻读人口与发展经济学，随后在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同时参加了 Angus Maddison 以荷兰 Groningen 大学增长与发展中心为基地的长期经济增长测算和国际比较工作。此后先后任职于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东亚分析中心和香港理工大学金融会计学院。现在任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顾问及中国中心研究部主任。

程 宏：许良英晚年对我的励志鞭策

大家好，我叫程宏。我是 2008 年普世价值大讨论时才频繁跟许良英先生接触的。那时我常跟王德禄一起去许先生家里拜访他，做一些访谈笔录之类的辅助工作。我早年从事自然科学工作，到长城所后才开始涉足社会科学领域。在许先生这位受人敬仰的民主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面前，巨大的学术落差，使我很拘谨，不敢贸然说话，以免漏傻气，再说也轮不到我说话的份儿，于是我总是观察欣赏许先生的行事风格，仔细聆听解读他那带有浓重浙江口音的谈话。多次



去许先生家后，许先生开始对我注意起来，还打听，“程宏为什么不说话，他是什么态度？”。显然许先生不把我当作一个普通访客，而是视我为一个学生和朋友，想了解我对他的学术意见的共鸣度。但我也在想“许先生您也从没有当面问我有什么看法意见呀？”后来我送给了许先生一本我正式出版的《横看竖看美利坚：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对美国社会文化的解读》，许先生算是对我的“态度”有所了解。

再后来王德禄常派我去许先生家，做一些取送资料和联络工作，尽管当今电信和邮递业务很发达，派我去的原因也很简单，绝不可麻烦许先生跑邮局寄材料，派我去还可以表达王德禄对许先生的关心问候，及时了解许先生的一些实时情况，带回来一些许先生的信息。特别是2011年以后，王德禄和武文生先生经常派我去许先生家，陪他去医院什么的，直至2013年1月28日许先生逝世。

自此我和许先生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渐渐跟许先生熟悉起来了。许先生说话常常不苟言笑，偶有发笑，也多为别人所引，绝少看到他主动开玩笑。有一次，他突然跟我开起了玩笑，“我看你怎么长得有点像普京呀？”。这个撞脸玩笑我已经多次，本不为怪，但出于许先生之口，还是感到与他人有别。我既吃惊又高兴，吃惊的是，我发现许先生这位学术大家在普通生活中的另一面，一种豪放平易、阳光热情的内心世界；高兴的是，许先生和我都是属猴的，他年长我36岁，“老猴戏小猴”的深层意义是许先生完全拿我当个忘年交来看，我觉得与许先生的距离拉近了。我随即向许先生交代血脉渊源：我父系祖籍是沧州，母系祖籍是胶东，父系家乡有很多回民，母亲家乡有很多跑关东跑俄罗斯的，家族中间混没混进俄罗斯血统我也没法考察了，当然这都是闲话了。

许先生晚年跟我说了一些正向励志的话，大致意思是说我还是有点能力的，要我多做一些研究工作，干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我当时听了以后感触很深：每个人一生中经历的各种励志事件可以说是无数，但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往往是负向励志，即受挫折、受打击、受迫害、受欺凌后所激活的生命能量，所唤醒的内在创造力和创造热情，包括不服和抗争，比如中华民族百年以来受外国列强欺辱后所唤醒激发出来的民主科学爱国精神。而对于正向励志——常常表现为师长辈在人生的平淡中对晚辈的循循善诱型的教诲，由于出于平淡，被励志者常常淡忘。

我至今能记得对我正向励志的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是我的父亲，他常对我说要做一点社会认可的事业；第二个是我中学的一个老师，他对我们说人一生要写一本值得后人读的书，做一点值得后人怀念的事情；第三个就是许先生，他晚年对我的鞭策励志的语境貌似平淡无奇，实则意味深长，这不是送我一碗什么心灵鸡汤，也不是灌输我带有什么衡量指标的“成功学”，我想不出用什么词汇描述比喻这个鞭策励志。我跟许先生交往的时间不很长，但是他对我的人生的鞭策励志的真挚之言将使我终生难忘。谢谢大家！

【程宏】1956年生，济南人，1982年大学毕业，现为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杜 光：为科学民主理性而奋斗的许良英

我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许良英先生的追思会，和许多朋友一起回忆许老的思想和精神。

我同许老接触不多，但他是我一直敬慕的思想家，早在反右运动期间，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 he 因反对把一些善意的批评建议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而被划为极右分子，就对他满怀敬意。1964 年到杭州第七中学工作，听有些老师谈起他过去在杭州的情况，对他更加钦佩。他在杭州一些知识分子口中还很受尊敬，我印象深刻。



后来我回到北京以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党校一位老师陈云奎把我带到中关村许老家，拜见许老和夫人王来棣，倾听他们对爱因斯坦和马克思的见解。后来在几次聚会上见到他，但都没有深谈。

许老是典型“两头真”的知识分子。他早年满怀激情，投身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革命，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的国家而奋斗不顾身。经过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晚年大彻大悟，投身于争取科学民主的民主主义运动，为现当代的知识分子作出了出色的榜样。

许老有一本文集，书名叫《科学、民主、理性》。我认为这三个命题是他晚年奋斗的集中表现。他宏扬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宣传“五四”的科学民主，呼唤人类理性，成为当代新启蒙运动的先驱者。

当代的中国社会，虽然在经济上跻身于世界前列，但在思想文化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却充满着蒙昧主义，亟需开展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许老倾注晚年精力不懈宣扬的科学、民主、理性，就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主题。他在 1980 年为钱三强起草的“科学技术讲座”的讲稿里指出：“两百年世界历史的实践证明，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的两大柱石，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在 1981 年发表的《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一文里，他又说：“科学能使物尽其利，民主能使人尽其能；一个能使物和人都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必然会有无穷的生命力。因此，可以说，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显然，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要实现现代化，科学和民主是根本，是关键。”

许老晚年致力于宣传民主思想，批判民主集中制、反自由化和民主缓行论等等反民主的思潮。1989 年他为纪念“五四”70 周年撰写的《“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里，把民主的要义归纳为四个基本内容，四点基本保证。四条基本内容是：确认人人生而平等；确认主权在民；政治统治须通过公民的自由赞同来建立；任何政府官吏和人民代表都是公仆，始终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四点保证是：公民有充分的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严格实行法治；实行权力制衡；严禁军队干预政治。他在这篇文章里总结说“开展民主思想启蒙，实质上就是唤醒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建立民权和法治观念。”这些有如黄钟大吕的言论，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启迪蒙昧，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

的实际意义。

“六四”以后的1993年，他在《未来与发展》双月刊上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指出“‘和平演变’与‘改革’实际上是同义词”；主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认真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文章激起当局的震怒和毛派的大批判，刊登文章的《未来与发展》遭到取缔。

除了发表文章，许老还多次联合知名人士上书，呼求民主，1989年初，他起草一份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实行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废除因思想定罪的做法、支持教育和科学事业等建议，组织42名自然科学界和思想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签名上送。1994年，他联合丁子霖、张抗抗等七人上书，“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1995年，他又起草呼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要求当局以宽容精神对待持不同意见者，重新评价“六四”，释放思想犯，还希望“通过联合国宽容年的各项活动，我国自古留存至今的不宽容状况得以开始改变，宽容将逐渐成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签名者45人，在国际社会产生强烈反映，在国内却受到残酷镇压，有些签名者被传讯、拘捕、监视。

我对于许良英先生，除了敬佩，还有一种亲切感，一则他是我的老乡，温岭、临海同属台州，我们都是台州人，同一个语言系统，所谓“台州佬，讲话硬 gao gao”。二，我们都是1957年那场“阳谋”的蒙难者，是难友，不过他受的处分比我重，遭受的磨难凌辱比我大。三，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中，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许老孜孜以求的科学、民主、理性，至今仍然如同镜花水月，没有实现的迹象。我们这些还生存在世的人，有责任承担这个沉重的历史任务，推进新启蒙运动，为完成许老毕生追求而尚未完成的事业而贡献我们的余生。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这个追思会的意义所在吧。

【杜光】原名林道茂，1928年生于浙江温岭。1947年进北大史学系，1948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政府通缉，遂去华北解放区。1953年调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4年到杭州第七中学工作，1978年回中央党校，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87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任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因支持1989年的学生运动，1990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退出工作岗位。

许从平：启蒙之花必将在中华大地上遍地绽放

我补充一句，杜老师是我的同乡，也是浙江的。老先生出来的文章都很激励大家，有很多书，他是中央党校的教授。

从孩提时代，我就非常崇敬我三叔。当我有记忆开始，祖母经常对我讲述三叔小时候的情况，希望我长大做一个像三叔那样的人，我时时牢记在心。

1958年6月，三叔从北京回故乡当农民，我就有更多的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受到他的言传身教。他教导我怎样做人，如何选择人生道路。他走过的路和一言一行是我最好的榜样，能与他生活在一起，亲聆他的教诲，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他对我的关爱胜似父亲。



三叔，是我思想的源泉，精神的支柱，我的全部心灵和生命都与他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三叔，他使我逐步摆脱了极权主义制度的思想桎梏，也使我改变了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思维模式，使我逐渐认清了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和人类普遍追求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1978年6月，三叔恢复工作回中科院后，他仍然关心着我，每当有文章发表或新书出版，以及有好的材料和书籍，都及时寄给我。这30多年，寄给我的材料和书籍足足可以装满三大箱。有时，刚写好的文章尚未发表，也寄来让我看。他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心却依然常挂着我。书信往来就成了我们最好的交流。在这30多年中，他寄给我的书信多达375封（平均每月一封，最后一封是2012年12月4日在他离世前一个月写的）。每次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他的来信是一种极好的精神享受，这些书信和文章都成了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像甘露一样滋润我成长、成熟。

如今，三叔以93岁高寿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心中。他的崇高精神，他的伟大理想，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前进！前进！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追思、缅怀，目的就是为了传承他的精神，传承他的思想。三叔在世时，念念不忘的是民主思想启蒙，他一再强调：“要实现中国民主化，必须开展民主思想启蒙运动”。他晚年著述《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一书，目的就是为自己启蒙，为知识分子启蒙，为所有的国人启蒙。正如李慎之2002年1月21日致许良英信中所说，“我十分钦佩你研究民主的学术著作，十年、二十年，必然成为‘国民必读’”。

2015年8月，当我得知三叔和三婶合著的《民主的历史》一书已由法律出版社作为“法治中国”丛书出版，我欣喜若狂，真想不到此书会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我当即向朋友、学生、熟人发短信：“启蒙读物，公民必读，许良英、王来棣著《民主的历史》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当当网有售。”不久又有许成钢在网上发的书评《民主在中国的常识与误解》，我又发短信给他们，反响强烈。

由于几千年国人受蒙昧主义的影响，至今大部分国人对民主仍然处于无知之中，唤醒他们的民主意识，是当今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一起担当起这个历史重任吧！

三叔许良英、三婶王来棣倾注了他们晚年心血，撰写的《民主的历史》，现在已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网上发行，这是一部高屋建瓴、全面系统阐述民主来源的实质的力作，是两位老人留给国人的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后将有更多的国人读到此书，受到民主思想启蒙，启蒙之花必将在中华大地上遍地绽放！

【许从平】1941年12月出生，浙江临海人。临海市回浦中学高级教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许良英的侄子。在许良英受迫害在家乡务农期间，与许良英在同一生产队当过10年农民。

董光壁：我与许良英先生

非常感谢许平君邀我参加许良英和王来棣两位先生的追思会，使我有机会表达我对二位先生的思念之情。

三年前的一月二十八日前后的几天，有关许先生病危和仙逝的噩耗以及悼文从四面八方传来，包括所里特意要我修改的讣告稿。我因在海口陪护家人养病而不得脱身，遂委托本所老干部处的李林君代送花圈。



我与许先生相识始于1976年。我从一位同事那里得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并得知它的编译者许良英先生的困境。我给许先生写了一封信，许先生也做了回复。来往信件的内容已经想不起来，只记得许先生问及“653”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发信地址写的是“北京大学653办公室”。我负责这个办公室的工作，它是北京大学汉中分校住北京的办事处。“653”是建设汉中分校工程的代号，意为六五年第三号工程。当时许先生还是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工”，我就想建议周培源校长把许先生请到北大工作。

《爱因斯坦文集》启发我走上了科学史研究的道路。1978年夏北大汉中分校撤销在即，恰逢许先生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我决定投其门下研习自然科学史。我去所里求职的那天许先生不在，这种不巧也许是机缘未到吧，结果我落脚到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直到五年后的1983年底才得以再次“改换门庭”，调到自然科学史所而得以同许先生一起工作。

在许先生的关照下我顺利地进入了物理学史研究的大家庭，作为特约编辑，我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物理学》卷“物理学史”分支的编撰工作，作为编委我承担了《爱因斯坦研究》第一辑的主要编辑工作，作为副主编我主持了《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物理学家》五册书的约稿。在无端非议扼杀正当研究时有发生的学术环境中，我的研究的诸多路障的排除也多得许先生相助。如我对EPR文章¹⁴⁶的评价，触犯了那位玻尔研究权威，招致其恶意的寻机施虐。为了阻止他小题大做的人身攻击，先生不惜与“老友”断交。

我们的研究领域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但我俩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有所不同。先生重点研究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二十世纪世界科学技术史，我侧重研究实验物理学家马赫和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但基本学术思想我是追随先生的，以致得到先生信任而有时代为回复一些青年的求教。

¹⁴⁶ 物理学史上的著名论文，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联署的1935年发表的论文《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备的吗？》。

对于先生的诸多呼吁联署活动，我既由衷地敬佩又为之忧心忡忡。为了分担一些先生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我曾在体制外为其七十岁生日举办一场专题学术讨论会。作为追随榜样我还参加了一次联署，应邀在《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上签名。为了中国的未来，先生致力于民主理论的正本清源，我也日益关注自由理论的发展。

先生的学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爱因斯坦文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和《民主的历史》，无疑推进了“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但先生的标志性贡献在于，他的坎坷一生所昭示的结论。其顺逆进退、荣辱休咎，皆系于中国共产党。从服膺到叛逆的历史性转变，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谬误。他以自己的方式提供的这种论证，对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董光璧】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北京大学完成理科学业，先后服务于北京大学、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旁及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研究。

陈恒六：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深切怀念许良英先生

今天我代表我本人以及我的另外两位同学王作跃和刘兵参加本次追思会，他们很想来，但由于各种原因今天无法到会。我们三个人都是许老师1982年的研究生，今天在座的范岱年范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当时的老师还包括方励之、赵中立、何成钧、汪容、刘辽等。



读研究生之前，平心而论，我们都没有接受很好的启蒙教育，其实并不能分辨同样都是“有学问的人”，做人差别还是很大的，不能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是以为知识分子就是有学问的人。跟着许老师读书的那几年，我的思想变化非常大，尤其那时候大家都住校，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和同学们反复讨论什么才是知识分子。

当时从朴素的感情来说，我们对所有有学问的人都非常尊重。但是在跟许老师读书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我们三个同学，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在自己的家庭中没有受到过这种启蒙教育，能有机会跟老师读书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单是读书都还念的不错，但做人的道理这方面还有很多地方都是不懂的。跟了许老师以后，我在这方面的提高很大，所以说不是简单的上了一个研究生。

现在很多人都缺这一课，就是很多人读了书，读了博士、硕士，工作了，觉得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也有一些专业知识了，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刚才听了几位老师讲话也是讲得很实在，你说钱伟长也好，张光斗也好，你能说他没学问吗？恐怕也不能这样讲。但是有学问跟有学问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那时候我读了三年研究生，之后又在科学院研究所里工作了不到两年时间，今天在座的董光璧老师、王肃端老师当时也在所里工作。那几年和许老师的接触，才让我真

正明白“民族脊梁”、“社会良心”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感触很复杂，觉得能做到非常难。

刚才听到李德齐先生说当年跟许老师一块儿受批判，当右派太难了，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我现在正好在杭州工作，经常能接触到许老师的侄子许从平大哥，今天许从平大哥也在，他是真正陪着许老师一起度过在农村 20 年的人，从 1958 年许老师回到农村老家，到 1978 年回到北京，这 20 年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说。我也当过知青，现在也经常跟年轻人说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能坚持读书，自学外语等，那只是一些朴素的信念，相信不可能永远不讲学问了。但是真正去许老师待过的地方去看，还真的挺让人心酸的，那真是孤军奋战，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知道他在那儿干什么，到底有什么用，他的处境和他的抱负差别太大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这一辈子活的还真是挺感谢许老师的，有机会让我见到真人。

现在随着自己年纪增长，也见了很多有学问的人，但是能像许老师这样的人不多。我那时候离开科学院，我说我不在这干了，我找个自己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就行了。如果按照我的性格，假如是在 1957 年的话我也可能被打成右派。1986 年反精神污染这是我真正经历过的运动，之前当知青，那种运动都没我们什么事，其实反精神污染时间很短，一个星期去一次所里就行了，我参加过不愉快的会也就是三四次，当时的感受真的是非常差，我和许老师说我想调走，不想在这儿干了。当时许老师很失望，说这算什么啊，还没怎么你呢，你就这样了。现在想想自己当时还挺差劲的，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能考进科学院，跟许老师、方老师一起工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自豪，觉得自己的追求实现了不少。但反精神污染运动对我打击很大。

当时我说，我要挣钱养活老婆孩子去了。现在想想自己还是挺对不起许老师的。许老师费了这么多心血，不是要培养一个普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的离开确实太让许老师失望了。许多年后我去看望许老师，许老师说现在你不用养老婆、孩子了，你可以回来干点有益社会的事了。许老师给我了一本杂志《科学与文化》，他说我看你当个校对还是可以的，你做事情很仔细，帮着翻译点东西都没有错别字，校对肯定没问题。

许老师这个人你不用跟他见面，你也知道他会怎么做。一件事发生，如果许老师在场，他的反映是怎样的你一定会知道。我曾经和许老师朝夕相处了六、七年，直到现在，我仍然能够想象得出来，发生一件事，许老师知道的话会怎样反应，有时我给大家说这事要是许老师知道的话他会怎么说，大家也都觉得我学许老师学得很像。许老师这一辈子活的挺值的，都几十年过去了，其实我们后来也没有和许老师接触太多，但是不管什么事，如果你去找许老师，他会对你说些什么，你都能想得到，所以许老师真的是活在我们这些人的心里。

作为一个老师，没有比许老师再成功的了，我作为他的学生，几十年之后遇到一个事，你还能想到许老师会怎么样，如果他现在活着他会怎么样，你还能猜出八九不离十，这个能够穿透时空的影响力实在是很大了。在所有的老师里面我最怕的就是许老师，离开科学院以后，我每次去看许老师都要拉着同学一块儿去，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去，因为我从心眼里怕许老师。按理说，我怕我可以躲，可以不去，但是我还是要去，

因为我不去我连自己心里这关都过不去，我不去我都知道许老师会说我什么，所以哪怕去了得到许老师的批评我还是要去，这是很刻骨铭心的。

王作跃是我们这几个学生中最聪明的，也是继承许老师思想最好的。我每次和王作跃见面都会跟他谈起许老师，也经常会和刘兵谈起许老师。许老师教我们的做人道理没有那么难，但是你要像许老师那样也能说出来就太难了，需要极大的勇气。我认识许老师的时候，许老师就是我现在这样的年龄，六十岁出头。发生一件事，我能想到如果许老师在，他会怎么说，但是要我自己说，我现在还做不到，因为说真话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所以许老师在我心里是非常了不起，非常高大的人。

许老师说的事情我也能听懂，但是要想做到许老师所说的事情，在任何一个公众场合，在任何一个会上，在任何一个朋友圈子里，在任何一个吃饭场合，我有时候感到很惭愧。我特别希望现在能有一个许老师，或者在场有一个许老师更嫡系的传人，一个年轻的许老师替我说出我也爱听的话。我刚才听到李德齐老师说了很多话，对我还是很有激励的，一个人确实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把自己思考的结果说出来。到今天，为什么还有人说不出来？其实还是做不到没有恐惧，说到底就是恐惧。现在也没做到罗斯福说的，免除人们恐惧的自由。

我曾和同学郝致京讨论过：为了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肯付出多大的代价？能不能像许老师那样付出巨大的牺牲？郝致京去世后，我经常去看望他的父母，替死去的朋友看望他的父母是一回事，自己为说真话甘愿去死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我也知道刘晓波，原来我在北师大，所以跟他也认识。看看他家里面，问问有没有事还是可以的，但为了说真话甘愿坐牢、去死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付出这样的代价。

我为什么一直怕许老师呢？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勇气的问题，肯不肯付出坐牢的代价、肯不肯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实像许老师这种真正无畏的人是很少的。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怕死而是不知死。像许老师那样明明白白知道所有后果，还能一往无前往前走的人非常少，这也是为什么许老师是我心里的偶像。我经常想到许老师，经常自己问自己能不能像许老师一样一往无前往前走。

老一辈先生们比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多很多，我希望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炼狱一样的事情能够记录下来。也感谢许平通知我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我们很多同学也都很怀念许老师。前两天去了科大又看了看方老师曾经用过的办公室，一转眼 30 年过去了，现在很多的学生都不知道方老师。所以启蒙的工作每个人承担的责任都不一样，每个人勇气也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再次感谢今天能有机会参加这样的会！

【陈恒六】1954 年出生于天津，1981 年认识许良英先生，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并考取许先生的物理学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5 年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 年调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局。1988 年后去企业工作。

王作跃：怀念许良英老师（书面发言，由陈恒六代为宣读）

我怀念我敬爱的许良英老师、王来棣师母，和他们的挚友方励之老师和赵中立老师。我现在遇到很多社会政治和学术问题都会想，要是许老师、方老师在世的话，他们会如何判断、发声？让我欣慰的是，这几年我帮助成钢和许平整理许老师文稿存放到了位于耶路撒冷大学的爱因斯坦档案馆，并参与编辑了两卷纪念方老师文集，《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于2014年出版，《方励之纪念文集·人文卷》将于2016年出版，里面有许老师和成钢的纪念文章。愿许老师和方老师对科学、民主和人权的倡导能带来更多的社会进步。

【王作跃】1963年出生于河南武陟，1982年毕业于新乡师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物理系，1982-1985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攻读物理学思想史硕士学位，在许良英教授指导下撰写关于量子力学史的硕士论文，1986年赴美留学，1994年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发表著作有《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2008年英文版、2011年中文版），与刘兵、陈恒六编辑出版《呼唤民主与人权：贺许良英先生九十寿辰》（2012年）。

李醒民：感恩许先生的思想和人格

许先生驾鹤西去已经三周年了，今天我们亲朋好友和学生聚集在此追思、缅怀他。该说的在先前撰写的回忆文章中都说过了，不想多重了。我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招收我们的是于光远先生。但他是高官忙人，给我们没有讲课，也没有做具体的学术指导。每个学期，他在友谊宾馆开会时，把我们十多个研究生叫去，吃一顿饭，在饭桌上聊一聊。所以，我戏称于老师带研究生像机械化养鸡。不过，他毕竟给予我们再学习的机会，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赵中立先生主要做的是组织管理工作，他给我们请外边的知名老师讲课。最后做论文，是许先生指导我的。我虽然不是许先生直接招来的研究生，却是他悉心指导的研究生。与现在招考到研究生，既不指也不导的老师比较，许先生是我名副其实的导师，我应该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在1999年撰写的《在思想解放的漩涡中——我的硕士论文的写作经过和多舛命运》（合肥：《学术界》，2003年第3期，第224-233页；李醒民：《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29-351页），详尽地回顾了我的硕士论文的六易其稿的写作过程，其中饱含许先生精心指导和悉心修改的心血。做出来的论文跟传统观点不一样，彻底推翻了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的教条。论文是建立在对科学史的扎实研究，对科学哲学问题的缜密分析的基础上的，因而底气十足，在当时学界以及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乃至轰动，并有助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论文批评

了列宁的观点，也捎带批评了学界流行的观点。这些人云亦云的材料很多，有的是内部出版的，有的是学习或讲解《唯批》的辅导材料。这些材料把列宁的教条奉为圭臬，并且漫无边际地引申和发挥，把以马赫、彭加勒为首的批判学派骂得狗血喷头，比列宁还不讲理。不少此类出版物用的是文革大批判语言，说他们跳到前台，进行丑恶的表演、虚伪的喧嚣，柳树滋的小册子《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讲的。我在参考文献里把这个小册子也列上了。许先生说，这个反面材料你不能正式列在参考文献里，在论文中加个脚注就可以了。许先生指导得很详细，我在回忆文章里描述得很清楚。当时虽然思想解放，虽然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但是时不时有倒春寒，在座的都知道，有好几次反复。因此，论文的发表很不顺利，可谓命运多舛。

另一篇回忆文章《铮铮铁骨惊千古，涓涓睿思醒万代——我眼中的许良英老师》，讲的是跟许老师的具体交往，我也写得很清楚。从1980年第一次找许先生，与许先生打了三十多年交道，许先生以及夫人王老师，二老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我有次拜访许先生，大楼门口摆了个桌子，有两个不知是公安局的还是居委会的干部守着，盘问来访者干什么，登记后才得以放行。那天科学史所党委书记也在许先生家。许先生想开门，要与在家门口站岗的小警察理论、抗争。书记劝阻说，小警察是执行人家命令来的，他吃的就是这一碗饭，与他嚷嚷也不顶用。许先生这才按下火气，逐渐平静下来，继续与我们谈话和交流思想。

许先生对我主要的影响包括思想和人格两个方面。我之所以能够写出反传统、反教条的论文，以及后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研究，跟许先生很有关系。另外就是人格，我后来奉行的“六不主义”（不当官浪虚名，不下海赚大钱，不开会耗时间，不结派费精力，不应景写文章，不出国混饭吃；详见李醒民：我的“六不主义”，《自由交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07~112页），“三不政策”（一是在无“资格”招收博士生的情况下不招收研究生，二是不申请课题，三是不申请评奖；详见李醒民：不把不合理的“规章”当回事，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22卷（2000），第3期，第7~8页），“四项基本原则”（绝不趋时应景发表论文，绝不轻易应约发表论文，绝不用金钱开路买发表权，绝不在他人论文上署名；详见李醒民：我为什么从来不……？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3卷（2011），第2期，第115~119页），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当回事，或者说不把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当回事，始终我行我素，在与“四唯主义”（唯论文主义、唯刊物主义、唯数量主义、唯课题主义）相反的小径上踽踽独行。这一切做法，是与许先生的做人原则相通的。而且，我们共同的老师就是爱因斯坦。不光许先生研究爱因斯坦，我也就爱因斯坦写了不少文章，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专著《爱因斯坦》，这本书先于1988年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据研究生院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的白老师讲，许先生有次在保福寺散步时碰见她，在交谈过程中对她说：“李醒民是真心做学问的。”能够得到许先生这一实事求是的首肯，是很难得的，对此我很满足。我的直接老师是许先生，我们间接的老师是爱因斯坦，许先生对我人格的影响将贯穿我的一生。

我在许先生去世后写了一首诗，它是上述回忆文章的结尾。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听

到许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北京被雾霾笼罩得严严实实；送走许先生后，又下了一场大雪，满眼银装素裹、琼楼玉宇。所以，这首诗便以自然场景开头，全诗是：

突闻噩耗阴霾重，送君一程素雪琼。
科学报国生前志，民主救世死后情。
铮铮铁骨震大地，涓涓睿思烁苍穹。
仁智静动一身备，高山景行代代宗。

【李醒民】 1945 年生于西安市户县，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1990 年被破格评聘为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退休教授。出版著作 21 种，译著 20 种，主编丛书 11 种。其学术成果在国内学术界赢得好评，也受到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的重视和引用。

周良霄：民族的脊梁——怀念许良英

我是社科院近代史所通史室的研究员，我和我的夫人顾菊英都是王来棣大姐的同事。我们在“文革”以后才调到近代史所。原来在所里就听同事们介绍过许良英、王来棣在反右中的遭遇，对他们深表同情和钦敬。六·四以后，通过来棣大姐，我们上门拜访了许先生，所以在今天在座的人中我是认识许先生最晚的一个。在以后多年的经常接触中，对许先生有了更多了解。他在对民主的认识、争取民主的方法等方面多有启蒙和引导，所以我视他为良师益友，敬仰他的为人，甘愿委身为他的私淑弟子，要学习他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高尚精神与铮铮铁骨。



为纪念六·四 20 周年，我们俩人编辑了一本《忘却的纪念——八九民运纪实》，我们请许先生将他在 2002 年为纪念 1989 年民主运动 10 周年写的《8·9 十年感言》一文作为代序，许先生说“出于相互信任和共鸣”，“我欣然同意并感谢他们的好意。”此书在 2009 年由香港新大陆出版公司出版，也是通过许先生的介绍，给丁子霖等六·四死难者家属赠送了一百本书以作纪念。

今天我带来了三本书，这三本书的内容是许先生在世的时候我们经常谈起的，现在我带来作一个纪念。头两本书是《皇帝与皇权》和《传统专制主义批判》，其中《皇帝与皇权》是写古代部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 1999 年 2006 年出了两版，2014 年又出了精装第三版。《传统专制主义批判》是批判现代的专制主义，没有哪个出版社敢于出版，后来还是由许先生介绍帮我们自费印刷了几百本。还有一本书，总名《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下分三种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书，其一是《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系年录》，其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其三是《十年文革大事记》。《十年文革大事记》在 2008 年由香港新大陆出版公司出版。其一、其二两种书都是文革期间社会上流传的传单小报以及报纸社论相关评论、编者按语等等，这些都是当局竭力要销毁隐瞒虚无掉的史料，两书共约 500 余万字，数量庞大，印刷困难，所以

制成光盘，随《十年文革大事记》一起发行，可供治文革史者们研究引用。

【周良霄】1931年12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通史室研究员。北大历史系毕业，“文革”后调到近代史所，王来棣的同事。

许平：许良英书信、日记一瞥

父亲去世以后我负责整理他的文稿、书信和日记，在此过程中，除了对父亲有了更多的了解与理解外，还发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由于时间限制，这里选出四个故事与大家分享。



一、立遗嘱

父亲去世前常说自己身体很好¹⁴⁷，可以工作到100岁，因此未留下遗嘱。实际上，他在1985年2月1日的日记中早已悄悄写下了遗嘱。

起因是，1984年8月，他去贵州湄潭参加“浙大在遵[义]湄[潭]时期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座谈会”。旧地重游，又见到很多老朋友，因兴奋、喝酒、感冒、疲劳引起前列腺肿大，小便不通，先后到遵义、贵阳、武汉治疗、导尿，非常痛苦。1985年1月23日，住进北京友谊医院，2月2日做前列腺切除手术。手术前一天的日记写到：

明天要动手术了，这是中等手术，一般没有危险。但也说不定万一出了问题，生命可能就此结束，我也不会后悔。在解放前8年从事地下斗争时期，没有想到自己会活着见到解放的。我的生命已比我原来估计的延长了不止一倍，已经很可满足。当然，要做的工作还非常多，我是有必要再工作20年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自己非活20年不可。只要有必要，随时可以死。这是青年时代（1940年）早已下定的决心。如果明天万一手术失败，我就结束了生命，作为遗嘱我想到两条：

①把我的遗体献给医院，供移植和研究用。因为我的内脏和各部分机体都是健康的，应该加以充分利用。无用部分火化后，骨灰该用来做肥料，把它埋在树根旁，为祖国的绿化起一点作用。不要为我做坟墓、立碑，也不要开追悼会。

②我很想写一本专门著作《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目的是要推动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新启蒙运动），并根据世界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这样的书，目前是不可能公开出版的，两年后该有可能。如果我完成不了这项任务，希望志同道合的青年同志来把它完成。

可见，父亲去世后，成钢决定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北大医学部是完全符合他的意愿的。至于写作《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父亲在1993年9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1985年以前我曾打算写一本《科学·民主·马克思主义》，1987年以后我不愿在马克思

¹⁴⁷ 如第三节所述，80-90年代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后经一位医生七年的精心调治，到2007年才基本控制住心脏病，但2012年又有恶化的趋势。

主义上花功夫了”，而是把精力完全放到《民主的历史》的写作上去了。

二、周培源先生说父亲是“中国研究爱因斯坦的权威”

1987年3月7日，父母去串门，我一人在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周培源先生来访，后面还跟了一个军人。周老来找父亲是为了一桩陈年旧案：1980年，他看到S.Weinberg（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爱因斯坦曾说过，引力论可以用平坦空时的概念来建立”，遂写信给父亲希望他查一查“爱因斯坦的哪篇文章讲到这番话”¹⁴⁸。周老这次来，则是告诉父亲，S.Weinberg那些话是在1979年纪念爱因斯坦100周年诞辰的学术报告中提到的，并再次请父亲查一查，“到底爱因斯坦讲过没有”，并郑重地对我说，所以要请他来查，是因为“你父亲是中国研究爱因斯坦的权威”。怕我说不清，周老还给父亲留了一封短信¹⁴⁹。父亲回来后告诉我，他早就查过，爱因斯坦没说过这番话。

三、1989年42人联名信

1989年1月11日，外电广播了方励之给邓小平的公开信。

12日，去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参加“民主与权威”座谈会。会上他第一个发言，讲了半个多小时。强调为纪念五四和法国大革命，要开展民主思想启蒙运动。指出目前对民主概念有清楚理解的恐怕不到一百人，……，而“精英民主”、“精英政治”、“新权威主义”、“开明专政”，甚至鼓吹侵略邻国的“新民族主义”却泛滥市场。他列举了十几个人的著作和文章，一一予以驳斥，并警告那些为反民主逆流张目者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有几个发言者把民主同秩序、安全、自由、公正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民主会产生痞子，令他“忍无可忍”。想要反驳，已无时间。当晚，听说宁波一些年轻人86年搞了14次理论性探讨的讲座，后有人被捕、判刑、抄家；浙江和上海也有多人被判长期徒刑。

17日，方励之说，他给邓小平的信在国外发表后，海外有不少人打电话给他，也要在这封信上签名。父亲由此想到发起另写一封信，施雅风立即表示愿意一道发起。27日写成联名信，1月28日开始找人签名，到2月26日共有42人签名，28日寄出，前后整整一个月。在这些签名者中，除两个发起人（父亲、施雅风）和母亲以外，有3个人是别人帮忙征得的，其余36人都是他亲自征得的。这36人中有4人是在一次会上征得的，另32人则要逐个登门拜访或请到家里来谈，经常要走很多的路、谈上一两个小时。由于签名人多，难免意见不一，信的内容多次更改，每次更改后都要再次拜访钱临照、王淦昌两位领衔长者，交换意见。因各种原因，有些被征求者不愿、不敢签名，或签了名又撤回，而遭遇过7次失败，因此他在日记中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心态感到“实在可悲”。他写道：“如果遇到的诸君都是这种‘可悲’状态，也就没有必要搞这个联名信了”。好在大多数被征集者还是很积极的，有的认真地对信的内容提出修改意见，有的认为能在信上签名很光荣，更多的人（包括因资历较浅而未在信上签名的人）对这一壮举给予口头的或实际的支持。2月16日听到文艺界和学术界33人上书党中央和人大常委会，要求释放政治犯，更给了他精神上的支持。

¹⁴⁸ 周培源给许良英的信，1980.12.27.

¹⁴⁹ 周培源给许良英的信，1987.3.7.

这一个月忙碌，对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来说不算什么，但父亲当时已是 69 岁的老人，更糟糕的是，从 1984 年开始，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先后得过前列腺肥大、视网膜脱落、颈椎骨质增生导致脑供血不足等病，动过两次手术，后来又一直被心脏病困扰。从 1988 年底开始，日记中就频频出现胸闷、早搏、心律失常等字样，并多次写到累得“没有力气说话了”。在这一过程中，母亲始终陪伴着他，每当他过于劳累不想说话时，就由母亲替他陈述写信的缘由。

3 月 17 日，听一位住在 812 楼的签名者说，3 月 7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联名信的内容无可非议，许良英是个硬骨头，他很钦佩。

3 月 18 日，阎明复约父亲、母亲、施雅风、吕东明、李晨到统战部就联名信之事谈话、征求意见。父亲首先发言，讲了一个小时，说：“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结局却是这样一个局面，党风如此腐败，而且是非颠倒，还因思想问题随意逮捕青年判以长期徒刑。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要是再不站出来说话，国家没有希望，我们也对不起青年和全国人民”。指出改革的关键在民主，痛斥官方示意的“新权威主义”，“提醒中央领导人，千万不可听从这类谋士的诱惑，重新把中国引向灾难。如果中国再出现专制统治，我们誓死反对，我愿意第一个杀头流血”。

四、拒绝躲避

1989 年 6 月 10 日的日记写到：

这些日子[指 6.4 以后]，却人人自危，人心惶惶。不时传来有人失踪，有人被捕，许多好心的亲友都劝我也避一避，我都婉言谢绝。理由是：①我并未卷入这次学潮，我因心脏不好，许多活动未参加，甚至游行也未参加过。②我一向主张学生以学习为主，运动不可旷日持久，应尽早复课，并反对绝食；我从未给学生火上加油，相反，经常是泼冷水。③我一再公开呼吁，要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千万不可让校外人插手，因为民主运动很复杂，什么人都会混进来，企图利用学生为他们火中取栗，利用青年人的生命和热血来实现他们的权利斗争目标和政治野心；鼓吹“新权威主义”和“强人政治”者哗众取宠的积极参与就是明证。④我始终认为，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根深蒂固，中国民主化是一个漫长、曲折、艰苦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认真考虑可行性，不可提过高的要求，不可要求达到不可能实现的短期目标。⑤应该用民主方式争取民主，不可采用暴力和强烈对抗的方式，运动要适可而止，不可孤注一掷。⑥民主运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民主思想启蒙，唤醒民主意识与公民意识，这是长期任务。至于一些短期目标能否实现，那是次要的，短期目标的实现，应该是妥协的结果，不可能是对抗的结果。根据上述事实，当局没有理由可以把我看作是这次学潮、“动乱”，甚至“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或煽动者。如果他们一定要把我宣扬民主的文章、纪念五四的讲话，以及同方励之的私交来给我定罪，我将泰然处之。因为我已做了三世人：①1949 年以前没有想到自己会活着见到解放；②1969 年 9 月为对抗[临海城西区]全区万人批斗大会曾死过 12 小时；③1979 年平反后十年来，已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虽论民主的书尚未写成，但主要论点已经发表。因此，对自己这一生已感到很满足，如果现在要为民主而死，当死而无悔！！

父亲的书信与日记是一座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宝库，我们将尽快将它整理出来，呈现给世人，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最后，献上两首“诗”，以表达对父亲的纪念。由于我从上大学起一直与数学、力学、编程、数字打交道，因此，这两首“诗”也以数字作为每一句的开头。

跌宕人生

一生无谎唯求真	二十炼狱傲骨存 ¹⁵⁰
三点三心三精神 ¹⁵¹	四幕人生演浮沉 ¹⁵²
五七舍生取义壮	六九宁折不弯贞 ¹⁵³
七四迷信惊醒猛	八三书信反思深 ¹⁵⁴
九二涅槃遗前传 ¹⁵⁵	十一未竟寄后人 ¹⁵⁶

杰出贡献

一子成钢继乃父 ¹⁵⁷	二奖有铭人权促 ¹⁵⁸
三卷爱集民智开	四位一体大厦矗 ¹⁵⁹
五四火炬重擎起 ¹⁶⁰	六五集腋成大著 ¹⁶¹
七君呼吁上书切 ¹⁶²	八九十年感言怒 ¹⁶³
九五联名迎宽容	十诺得主竞联署 ¹⁶⁴

¹⁵⁰ 指 20 年劳改。

¹⁵¹ 三点：王淦昌先生称家父治学有三个特点：诚实、理解力强、有创造力；三心：家父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充满信心，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三精神：家父在大学时提出“纯真的科学精神，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虔诚的宗教精神”为三位一体的革命“理性”。

¹⁵² 家父人生的四个阶段：一、从小学习法拉第、爱迪生、爱因斯坦，要做“当代物理学权威”；二、1940年在遵义看到民众疾苦党国无能民族危难，决心走出物理理论的世外桃源，做职业革命家；三、1974年从对毛泽东的迷信中猛醒，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但仍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四、1987年胡耀邦被罢黜，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仅存的一线希望破灭，88年提出“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走上民主启蒙的道路。而上一句的“三点三心三精神”正是第一、四、二阶段的写照。

¹⁵³ 1969年为反抗万人批斗大会可能遭到的人身侮辱，提前喝下两小瓶敌敌畏自杀，以示抗议。

¹⁵⁴ 《83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邓伍文编，2008.4，同心同理书屋出版。

¹⁵⁵ 92岁去世，留下前半生（1920~1958）的自传手稿《回顾与反思》。

¹⁵⁶ 与家母合写的《民主的历史》只差 1/10 未完成，功亏一篑，但他对中国的民主事业与青年抱有很大的希望与信心。

¹⁵⁷ 80年代初，成钢的一位同学说，许良英一生有两大贡献：编译《爱集》；培养成钢。

¹⁵⁸ 获两次人权奖：1995年纽约科学院“佩格尔斯”，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萨哈罗夫”。

¹⁵⁹ 家父提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四位一体构成民主政治的大厦”。

¹⁶⁰ 家父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只有回到五四，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

¹⁶¹ 65岁主编《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金克木先生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

¹⁶² 1994年3月，许良英、王来棣等七人发表《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

¹⁶³ 《“89”十年感言》，写于1999年3月30日。

¹⁶⁴ 1995.5.15发表《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联名信），共45人签名。全世界1120位科学家、学者，包括10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国内数十位院士联署。

【许平】许良英次子。1954年5月生于北京。7岁考景山学校，因父亲是右派而被拒，12岁因文革开始而辍学，15岁当童工，1978年以小学五年级学历考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船舶流体力学专业，1982年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先在机电所，后在结构材料所），2014年退休。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许 蒙：像爷爷一样乐观、积极，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是许良英的孙女许蒙。说到我爷爷，不只是陈恒六叔叔，我也很怕他。比如说我初中的时候，刚开始学物理，他问我牛顿定律是怎么回事，背一背概念是糊弄不了他的，他就会继续追问，最后追问到我羞愧得哭了。这时候他就笑着说，其实很多物理学家也不能很好地回答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除了科学知识，从小他也会跟我讲民主、“六四”，其实到我长大了以后才明白这背后的意义，对这个社会的重要性。爷爷去世前后这段时间，我读了很多关于他的文章和他写的文章，才算大体了解了这样一个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去追求真理的人，这样的人是多么难得。尤其在我们年轻一代人里太少了，可以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年轻人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利益至上，只关注自己本身的利益，或者自己家庭的利益，对于社会的关注太少了。



我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这里不像国内那样有很多禁锢，很多文章接触不到。但是我在国外留学的同学还会跟我争论，六四到底有没有死人，尽管在国外，可以接触到所有这些信息，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正所谓“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比如说香港前两年非常有名的“黄丝带运动（占领中环运动）”，当时几乎95%的大陆同学都会片面地谴责，说香港人太不知足了，要什么民主啊，大陆对你们这么好，这么多优惠政策，你们为什么还要闹。那时候有更多关于民主的误区、误解，或者很多人并不感兴趣，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

我觉得爷爷更宝贵的一点是，他永远都保持着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他永远会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占中的时候，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做交流生，那里的中国学生组织了一个文化沙龙，每周都有一个涉及不同领域的专题讲座。占中白热化时，那一期讲座的内容是解释香港的“黄丝带运动”。我很开心地发现，参加那一期讲座的人比往期都要多，大概五六十人，大家积极踊跃地讨论、提问，气氛很热烈。此外，网络社交平台上也有一些人会尽自己的力量，让大家了解真相，香港人为什么要争取真普选。

可见，正如爷爷所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还是应该像爷爷一样，保有乐观、积极的态度，对未来充满希望，否则的话什么事也做不成。我就说这么多。

【许蒙】许良英孙女，许平之女。200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系，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专业博士生。

王肃端：于细微处见精神——记许良英先生无私奉献的点点滴滴（书面发言）

许良英先生去世虽已三年，他那特有的微笑犹在眼前。回想与许先生一起工作的日子，他许多不同凡响的举动仍感人至深。在此，仅忆所知所见的几件看似小事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许先生大学刚毕业，不惜放弃留校任教的难得机会，毅然跑到桂林找党，又不顾个人安危投身地下党的工作，是他青年时就展现出的崇高志向和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

许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不是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一直在认真思考，深入研究，坚持找出症结所在，并且顶着压力和误解为民主启蒙呕心沥血，终其一生。这是他作为战士的一面，而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的却是他品格的另一面。



艰苦自己 救助别人

戴着右派帽子的 20 年农村生活，没有工资收入，从他的破衣烂衫，足见其生活的艰苦。但是他却用别人给他的钱去救助了八十多岁老人和贫困乡亲。

放弃增资机会 关爱年轻人

右派改正恢复工作后，没有补发工资，也不按职级套改，而是只恢复到 20 年前的工资标准，许多人为此不平，我却没听到他一声抱怨。当调整工资的消息传来，由于只有 40% 的调资比例，谁心里都没底。但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首先给许先生调整。不料，许先生却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说，“我向所领导反映，这次提高工资不要考虑我，把机会让给年轻人”。此举在研究室内乃至全所都引起震动，无不为其的无我举动深深感动。

包揽全室人员认购国库券的任务

七、八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职工工资很低，发放国库券是按工资标准摊派到个人的。当认购国库券的任务下达到研究室时，许先生提出由他和李佩珊（室主任、副所长）两人包揽全室人员的国库券。再次让大家见识了他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对年轻人的关爱。

乐于助人 拒不受礼

许良英先生乐于助人，尤为同情弱者，常想方设法给与帮助。他曾说服所人事部门为一位腿有残疾的小青年安排打字工作。

李政道先生第一次在国内招收十位研究生赴美深造时，有位外地青年来找许先生帮助推荐。他听完此人情况后，很是同情，表示愿意帮助。但当该人拿出一袋苹果送他时，他顿时生气，说“今天你把东西拿回去，下次如再拿礼物来，我就把它摔到墙上去，并不再管你的事”。此先生被惊住，旋即深为先生的一身正气所感动。

几十年来，受他资助的人难以计数，而他却始终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一身满是褶皱的化纤衣裤，一穿几十年，从不管是否与身份相称。

捐献遗体——最后的奉献

许先生不慕虚荣，不信鬼神，不入俗套，在纷纷修坟造墓的大潮中，他选择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最后地、彻底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许良英先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016年1月28日

【王肃端】女，1938年1月6日生于河北任丘，1953年入党、上中学，59年入北外留苏预备部，60年入中国科技大学，65年入中科院，在政治部秘书处、办公厅调研处工作，78年入自然科学史所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后任所秘书、党支部书记、所党办主任等。96年退休，后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副主任。

武文生：结束语

各位前辈，现在时间比较晚了，我们就不再继续发言了。

首先，今天大家聚在这里，一起追思许良英王来棣先生的生平、学术贡献，尤其是他们对民主启蒙和人权活动做出的很多贡献。三年了，我们终于能坐在一起，追思许先生和王先生，包括今天很多参加会议但没有来得及发言的同仁。

第二，我同意刚才很多先生说的，许先生和王先生的思想资源，包括很多书信、日记和未发表的文稿，是中国民主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富矿，也麻烦许平和其他朋友一起，把它们尽快挖掘出来。李慎之先生的公子李三达先生做了个很重要的工作，在座的许多人也读到过许先生和李慎之两位的通信——《83封书信》，那个小册子传播很广，使很多人受到很大的教益。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很深入，直指问题本源。希望他的书信、日记中的丰富思想资源能为世人所用。

第三，关于许先生的思想，很多积累，我们希望今后也有机会继续开展一些专题性的研讨，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今天下午的会就先到这里，有机会今后再探讨。

附录一：许良英部分编、著、译作目录（1942-2012）

这个目录是许良英生前亲自整理的。他去世后，又发现许多这里未列出的著作。序号后带“*”的，是与民主有关的著作。新发现的与民主有关的著作，见许成钢：《〈民主的历史〉出版说明》的附录。

1. 《试论感情与理智》，8000字，1942年4月，为地下革命活动“笔谈”写的论文，现存有抄件，未发表过。
2. 《β蜕变问题》，15000字，大学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王淦昌教授。1942年7月完成，现存有原稿。未发表过。
3. 《纪念我们的旗手——哥白尼逝世四百年》，4000字，写于1943年4月，发表于1943年5月出版的《科学知识》第2卷第2期（桂林），用笔名“林猷”¹⁶⁵。
4. 《评两本〈科学概论〉》，1943年《科学知识》，用笔名“林猷”。
5. 《中国科学发展史略》，6000字，写于1941年，发表于1946年重庆出版的《科学时代》第3-4期合刊。用笔名“林猷”。
6. 《我们对〈科学时代〉的希望》，1800字，写于1945年7月，发表于1946年3月重庆出版的《科学时代》第3期合刊。原文是作为《科学时代》的编辑方针。
7. 《三大发明的奇迹》1000字，写于1941年，发表于1946年6月月重庆出版的《科学时代》第6期。用笔名“林猷”。
8. 译《伽利略与近代世界》，R.Suter原著，译于1941年，发表于1946年12月上海出版社的《科学时代》第10期，2000字，用笔名“如因”。
9. 《数学何以不是科学？》，5000字，写于1943年，发表于1947年1月上海出版的《科学时代》第2卷第1期，用笔名“林因”。
10. 译《“追求真理”还是逃避现实？》，Aldous Huxley原著，译于1941年，发表于1947年1月《科学时代》第2卷第1期，1600字，用笔名“何施”。
11. 《科学底分类及其关联性》，5000字，写于1943年，发表于1947年4月10日上海《文汇报》副刊《新科学》第6期，用笔名“田由申”。
12. 《一种完全没有粘带性的液体，超流性——低温时的怪现象之一》，5000字，写于1947年，发表于1948年《科学时代》第3卷第7期，用笔名“林凌”。
13. 《回顾1947年三次可歌可泣的运动》，5400字，写于1947年12月，发表于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1948年1月1日出版的《浙大周刊》上，用笔名“扬海”。
14. 《怎样做一个Y.F.（“新民主青年社”）社员？》，2000字，写于1947年12月，发表于“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1948年1月编印的《青年手册》（油印本）。“新民主青年社”系1947年9月成立的地下党秘密外围组织。

¹⁶⁵ “林猷（yì）”既是“良英”的谐音，也是为了纪念历史上最早的科学团体林猷科学院（Academia de Lincei，今译林琴科学院，猊猊科学院，1603年建于罗马，伽利略是其成员之一）。编者注。

15. 《踏着血迹前进——于子三运动回顾》，5000字，写于1948年9月，系根据1947年11月中共浙大支部关于“于子三运动”总结的精神写的，发表于1948年10月29日出版的《踏着血迹前进——于子三运动纪念刊》，此刊系中共杭州工委负责出版，送香港由全国学联负责印刷，由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公开发行。
16. 《杭州市学生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并庆祝杭州解放大会告全市同学书》，1200字，1949年5月3日下午杭州解放，当晚中共杭州市青委决定在浙大召开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庆祝杭州解放全市学生大会，此宣告写于5月4日上午，当天晚上在大会上散发。
17. 《痛悼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加紧学习苏联先进科学》，2200字，《科学通报》社论，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1953年3月号。
18. 《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科学通报〉工作的决定》，2000字，1953年4月25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通过，发表于《科学通报》1953年6月号。
19. 《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成果》，5400字，1953年9月《科学通报》社论，此文概括地阐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主要收获，并指出学习苏联中存在的问题。
20. 《团结起来，为执行我们光荣的历史任务而奋斗》，4500字，1954年4月号《科学通报》社论，此文阐述政务院批准的《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的基本精神。
21. 《为苏联先进科学的历史性成就而欢呼》，4500字，1954年8月号《科学通报》社论，阐明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建成的历史意义。
22. 《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8000字，发表于1955年5月号《科学通报》，为悼念爱因斯坦逝世而作，用笔名“林因”。
23. 《庆祝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成立》，4500字，1955年6月号《科学通报》社论。
24. 《做好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工作》，3500字，1956年2月号《科学通报》社论。
25. 《自然科学方法论问题12年研究规划说明书》，7000字，写于1956年5月，发表于1956年10月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号。
26. 《介绍 J.T.Merz 著〈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的科学思想部分》，8000字，发表于1957年第2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系书评。
27. 译《理论物理学的基础》，爱因斯坦著，译于1942年，发表于1957年第3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7000字，用笔名“林因”。
28. 《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1万字，写于1956年5~8月（其中第4章由范岱年执笔），1957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于1982年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Science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John C.S.Hsu 译，纽约 M.E.Sharpe 出版社出版。
29. 译《物理学的基础》，R.B.Lindsay 和 H.Margenau 原著，初稿译于1946年，1957~58年重译，47万字，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13000字的《译后记》。
30. 摘译《微观物理学是决定论的还是非决定论的？》，R.D.Bradley 著，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1期，4000字。

31. 《爱因斯坦社会政治思想资料》，9万字，1963年编译整理，曾摘要发表在哲学研究所出版的《自然辩证法动态》上。
32. 编译《爱因斯坦文案》，三卷本，共选译了411篇，133万字，编译于1962~64年和1972~78年，商务印书馆1976~79年出版。参加编译工作的有赵中立、范岱年、李宝恒、张宣三。
33. 《爱因斯坦的世界观》，17万字，写于1965年，书稿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上海被“四人帮”强占，至今下落不明，手头存有9万字的草稿。
34. 《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25000字，写于1965年，是《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书稿提纲的一部分，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5年第4期。发表时与李宝恒联名，由于不准我用真名，改用笔名“林因”。
35. 译 P.Frank 《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32万字，译于1965年，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有1984年写的《译者前言》，7000字。
36. 译 P.Frank 的文集《现代科学及其哲学》，25万字，译于1966年，尚未出版。
37. W.Heisenberg 《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中译本前言。13000字，写于1973年，由该书译者范岱年稍作改动后发表于197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第一版，我未署名。
38. 《评丹皮尔（W.C.Dampier）〈科学史〉的基本观点和思想》，10000字，写于1974年，发表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4期（1982年）。
39. 译 V.Weisskopf 《量子、高山和星球》，译于1976年，发表于197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物理学参考资料》第2集。
40. 译 P.A.M.Dirac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译于1977年，发表于《现代物理学参考资料》第3集，12000字。
41. 《竺可桢传略》，30000字，与施雅风合作，写于1977~78年，发表于《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2辑。
42. 《爱因斯坦文集》序，6000字，初稿写于1977年，由周培源先生修改后，以他的名义发表。发表于1978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和1978年第二次印刷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43. 《爱因斯坦述评》，8000字，写于1978年4月，发表于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杜任之编）。
44. 《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几个问题》，28000字，写于1978年7月，作为“1978年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的讲稿，正式发表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1期（1982）。
4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12000字，写于1978年11月，发表于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
- 46*. 《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见解》，20000字，写于1978年12月，收在197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中。
47. 译 R.Millikan 《爱因斯坦70岁寿辰的贺词》，译于1978年12月，收在《纪念爱因

斯坦译文集》中，4000字。

48. 译 W.Pauli 《爱因斯坦对量子论的贡献》，译于 1978 年 12 月，收在《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中，8000 字。
49. 编《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与赵中立合作，完成于 1978 年 12 月，共 33.8 万字，1979 年 2 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50. 《纪念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10000 字，初稿写于 1979 年 1 月，作为周培源先生在 1979 年 2 月 20 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物理学会、天文学会联合举行的《纪念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主题报告的讲稿。曾摘要发表于 1979 年 2 月 21 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51. 《爱因斯坦小传》，3000 字，写于 1979 年 1 月，发表于 1979 年 2 月 10 日出版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讯》。
52. 《爱因斯坦的治学精神》，8000 字，与赵中立合作，写于 1979 年 3 月，发表于《杭州师范学报》1979 年第 2 期。
53. 《世界公民爱因斯坦》，14000 字，写于 1979 年 3 月，发表于《世界历史》1979 年第 3 期。刊出时标题被编者篡改为《争取社会正义和进步的爱因斯坦》。
54. 《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论的特点》，10000 字，写于 1979 年 5 月，发表于《哲学研究》1979 年第 7 期。
55.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哲学发展的影响》，1300 字，1979 年 10 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自然辩证法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提纲，发表于该讨论会《简报》第 40 期。
56. 《评〈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7000 字，与刘盛际、曹治英合作，写于 1979 年，发表于《读书》杂志 1980 年第 2 期，发表时仅由曹治英一人署名。
57. 《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英译本序，3000 字，写于 1980 年 2 月，发表于 1982 年纽约出版的“*Science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
58. 《关于方法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3000 字，1979 年 5 月在北京“科学方法论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发表于《哲学研究》1980 年第 6 期。
59. 《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14000 字，写于 1980 年 5 月，主要由我和李佩珊执笔，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讲稿，1980 年 7 月 24 日由钱三强主讲。讲稿曾在《红旗》和《光明日报》上发表并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60. 《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探讨》，10000 字，于 1980 年 10 月 9 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史学术会议大会上宣读，发表于上海《自然杂志》第 4 卷第 2 期（1981 年 2 月）。
- 61*. 《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6000 字，写于 1980 年 10 月，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 年第 1 期。
62. 《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哥白尼革命》，5000 字，写于 1980 年，收在 1982 年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代科学史研究室编）。

63. 《能量守恒原理的发现》，5000字，写于1980年，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书中。
64. 《十九世纪电磁学的辉煌成就》，5000字，写于1980年，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书中。
65. 《古典物理学的顶峰和随之而来的危机》，3000字，写于1980年，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书中。
66. 《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5500字，写于1980年，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书中。
67. 《微观物理学基本理论的建立》，6000字，写于1980年，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书中。
68. 《从科学史角度看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2500字，1981年9月7日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读书》杂志1981年第11期。
69. 《关于科学史分期问题》，13000字，此系1981年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和1982年3月在复旦大学的讲稿，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4期。
70. 《继承并发扬求是学风和爱国民主传统》，2500字，与王来棣合作，写于1982年3月，发表于1982年4月1日出版的《浙江大学校刊》85周年校庆专号。
71. 《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和他的思想》，16000字，此系1982年3月26日在复旦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讲座讲稿，收在198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物理学史研究》（王福山主编）。
72. 《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40000字，与屈敬诚（我指导的研究生）合作，完成于1983年5月，摘要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6期和1985年第1期，全文收在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爱因斯坦研究》（许良英、方励之主编）。
73. 《关于科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15000字，写于1982年，曾在1983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代表大会上宣读，发表于成都《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2期。
74. 《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13000字，写于1983年9月，11月29日在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讨论会”上宣读，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2期。
75. 《美国物理学史研究工作情况见闻》，13000字，写于1984年，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5期。
76. 《竺可桢——中国近代科学家和教育家的典范》，9000字，写于1984年5月，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77. 《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86万字，作者24人，由我和李佩珊、张钟静负责审订，修改、定稿，1983年10月完成，1985年6月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由我执笔的有：引言，结束语，第一、二、三章。1986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曾发表此书《结束语》中的一节。
78. 《A.爱因斯坦》，《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条目，12000字，写于1984年。收在

附录一：许良英部分编、著、译作目录（1942-2012）

- 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中，并曾发表于《百科知识》1985年第4期和第5期。
79. 《王淦昌》，《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条目，1900字，写于1984年。收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中。
80. 《A.爱因斯坦》，《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条目，1500字，写于1984年，收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
81. 《物理学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条目，2500字，写于1984年，收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
82. 《相对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条目，2500字，写于1984年，收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
83. 《纪念爱因斯坦，研究和学习爱因斯坦》，3200字，发表于《大学物理》1985年第3期。
84. 《于子三运动纪事》，7500字，发表于《杭州党史资料》1985年第2期。
85. 《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发展史观刍议——为祝贺钱临照先生八秩寿辰而作》，9000字，写于1986年2月，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3期。收在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史论集》（方励之主编）。
86.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三十年的风风雨雨》，6500字，写于1986年3月，原是为论文集《自然辩证法往何处去？》而写，该文集未能出版。
87. 《发展马克思主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000字，在1986年3月19日“加强交叉学科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座谈会上发言，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3期。
88. 《关于“双百”方针的回忆和思考》，1500字，写于1986年4月，发表于1986年6月19日《自然辩证法报》。
89. 《“双百”方针带来的喜悦和悲哀给我们的启示》，1986年5月13日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和同年5月29日在马列主义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六个学术团体的座谈会上的发言，4500字，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4期。
90. 《“相对论”蒙受“反动政治观点”之冤》，2800字，与屈敬诚合写，发表于《中国科技报》1986年8月13日。
91. 《关于贯彻学术上“百家争鸣”方针的几点意见》，1200字，1986年9月3日《中国文化报》。
- 92*. 《为“自由”正名》，2500字，1986年6月26日与《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谈话，发表于《新观察》1986年第20期。
93. 《两篇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写的旧稿和两点补充回忆》，21000字，写于1986年10月，收在198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于子三运动——于子三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文集》（李景先、田万钟、吴洵高编）。
- 94*. 《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1300字，1986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95. 《恩师王淦昌先生对我的启迪和爱护》，12000字，写于1986年8月，收在198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一书中。
96. 编《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24万字，与胡济民、汪容、范岱年合作，完成于1986年9月，书中周培源先生的《序》由我起草，《编后记》也由我执笔。书由科学出版社于1987年5月出版，以祝贺王淦昌先生80寿辰。
97. 《关于王淦昌先生和母校物理系的回忆片段》，13000字，发表于《浙江大学校刊》1987年4月20日~6月22日，内容基本上与95相同。
98. 《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在商务印书馆当临时工的难忘岁月》，12000字，写于1986年6月，原系应商务印书馆回忆文集之约而写，至今未见出书。
99. 《于光远同志在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几项重要贡献》，6500字，写于1986年11月，在1986年12月12日“庆祝于光远同志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原要出文集，受阻未成。
100. 《争论从何而来？分歧何在？》，7000字，《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10期。
101. 《一项宏伟的历史工程——喜读〈爱因斯坦全集〉第一卷》，12000字，《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1期。写于1987年11月。
- 102*. 自选文集《科学、民主、理性》序，1800字，写于2000年5月12日，这个文集选了1977年~99年间42篇文章，2001年12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103. 《对“许良英和他的〈爱因斯坦文集〉”一文的更正》，1200字，写于1988年6月19日，发表于1988年7月23日《台州日报》。此文系对1988年4月16日《台州日报》上一篇虚假的报道进行澄清。
- 104*. 《关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民主理论关系的理解》，6000字，写于1988年6月，发表于《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6期。
- 105*. 《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2500字，写于1988年7月，发表于《新观察》1988年第20期，刊出时被编者删改多处。
106. 《〈爱因斯坦文集〉中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2500字，写于1988年8月，发表于1988年8月28日《科技日报》。刊出时被编者删改不少，标题被改成“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
107. 《关于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11000字，写于1988年8月，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1期。
108. 《“双百”方针文献集》序，3500字，写于1988年8月，是为两位青年同志编的《“双百”方针文献集》而写的序，这个集子迄未能出版。
- 109*. 《驳民主缓行论》，2300字，写于1988年9月，发表于1989年1月9日《蛇口通讯报》。
110. 对钟叔河《还来得及》一文的意见，300字，写于1988年10月，发表于198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 111*. 《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民主、科学》，1400字，1988年10月24日在一个关于文

- 化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1988年11月9日《中国文化报》。
- 112*. 《弘扬民主，批驳反民主逆流》，4000字，1989年1月12日在《国情研究》编辑部邀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表于《国情研究》1989年第3期，刊出时被删改多处，题目改为“弄懂民主才能实现民主”，有意歪曲原意。
- 113*. 《弘扬民主批驳反民主逆流》，4000字，发表于《九十年代》1989年5月号，内容与上述《国情研究》座谈会的发言稿相同，刊出时无删改，但题目被改为“中国的反民主逆流”。
- 114*. 《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7000字，写于1989年3月，原系应《科技导报》约请而写，但他们不用，改送《明报月刊》发表，见该刊1989年5月号。
- 115*. 《“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2500字，写于1989年4月，发表于1989年5月8日《世界经济导报》终刊号。刊出时题目被改为“民主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保证”。
- 116*. 《新权威主义新在哪里？》，2500字，与王来棣合作，写于1989年4月，发表于1989年5月1日《百姓》半月刊。
117. 《我们的校长竺可桢》，20000字，写于1989年5月，未发表。
118. 《束星北先生传略》，6200字，写于1979年10月，收在1980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浙江大学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19. 《爱因斯坦研究》第一辑，由我和方励之共同主编，共收论文13篇，资料3篇，25.6万字，是1985年3月在杭州召开的“爱因斯坦研究讨论会”的产物，1989年7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120. 《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物理学家》第1卷，由我和钱临照共同主编，1990年8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121. G.Holton《科学思想史论集》，35万字，参加译校者6人，由我负责编订，翻译工作开始于1977年，199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122. 《回顾与反思——对真理、革命~科学、民主、理性的追求》，1958年6月以前的自传，22万字，写于1989-1993年8月26日。
123. 《许良英先生访谈录》，樊洪业、王德禄、尉红宇，9,000字，1990年10月18日，发表于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6期。
- 124*. 《关于科学意识和现代化建设的几个基本认识问题》，4,000字，1991年3月28日在“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二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8期。
125. 《悼念陈绍奏同志》，900字，写于1991年5月24日，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8期。
126. 《黎明前的战斗——忆杭州解放前夜与陈向明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6,000字，写于1991年8月20日，发表于1992年12月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纪念陈向明文集。

127. 《周老和〈爱因斯坦文集〉及其他》，12,000字，写于1991年11月30日，发表于祝贺周培源教授90寿辰文集《科学巨匠，师表流芳》，1992年。
- 128*. 《为科学正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辨析》，12,000字，写于1992年2月6日，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
- 129*. 《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3,200字，写于1992年5月9日，发表于《未来与发展》，1992年第5期。
130. 《忆子三》，2,000字，发表于1992年10月25日《浙江农大报》。
131. 《忆束星北先生》，4,500字，写于1992年10月26日，发表于《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江苏省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邗江文史资料》第6辑，1993年9月出版。
132. 《给江苏省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信》，1,000字，写于1992年12月20日，发表于江苏省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的《邗江文史资料》第6辑。
- 133*. 《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15,000字，写于1993年5月1日，发表于纽约《探索》杂志，1993年8月号（终刊号）。
134. 《反对组织所谓“物理学研究中的唯心论”的大批判》，3,500字，写于1993年7月1日，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6期。
135. 《周老与爱因斯坦》，发表于《人民日报》1993年12月3日。
136. 《包遵信的89民运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序》，6,600字，写于1993年7月1日，发表于《争鸣》，1994年1月号。
137. 《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700字，写于1994年5月9日，共7人签名。
138. 《中国官场的人权奇观》，1,800字，写于1994年3月20日。
139. 《一生坎坷的忠贞的革命者——悼念何少琦同志》，3,000字，写于1995年5月20日。
140. 《世纪末中国科学的危机》，1,500字，发表于香港《华侨日报》，1994年7月29日。
141. 《“排万难虽百死以求真知”——竺可桢的“求是”精神和浙江大学校训》，3,600字，写于1994年8月13日，发表于香港《华侨日报》，1994年8月24日。
142. 《为保障王丹人身安全自由的紧急呼吁》，200字，1994年12月8日。
- 143*. 《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4,000字，写于1994年10月26日，发表于美国科学协进会（AAAS）1995年2月年会。
- 144*. 《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1,300字，写于1995年4月，发表于1995年5月15日，共45人签名。
145. 《致江泽民、乔石信》，400字，写于1995年5月15日。
146. 《王淦昌先生是受杨振宁愚弄了》，7,000字，写于1995年7月20日，发表于《世界日报》1995年7月30日；《开放》杂志1995年9月号。
- 147*. 《接受纽约科学院科学家人权奖书面发言》，1,000字，写于1995年8月17日。

附录一：许良英部分编、著、译作目录（1942-2012）

148. 《我与黑白文艺社》，4,000字，写于1995年7月2日，发表于《校史一叶——纪念何友谅烈士暨浙大黑白文艺社文集》，1995年12月。
149. 《关于周邦立的片段回忆》，5,000字，写于1995年7月20日，发表于《校史一叶——纪念何友谅烈士暨浙大黑白文艺社文集》，1995年12月。
150. 《为王丹辩护》，4,500字，写于1996年11月10日。
- 151*.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安琪，1997年4月9日，发表于香港。
152. 《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段回忆和思考——纪念反右40周年》，10,000字，写于1997年5月10日。
153. 《回忆曾漱——一个被人民的疾苦净化了的灵魂》，4,500字，写于1997年10月10日，发表于《她捧着一颗心来——纪念庞曾漱文集》，1998年4月，海潮出版社。
154. 《中国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6,400字，写于1997年11月15日，发表于1998年1月22-25日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举行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物理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为主题的国际物理学史讨论会。
155. 《忆12.9运动——一个高工一年级生的印象》，5,000字，写于1997年12月5日，发表于《求实精神与浙江大学12.9运动》，1997年12月，北京出版。
156. 《悼胡济民》，7,000字，写于1998年10月8日，发表于《浙大校友》1998年下册。
157. 《“但种草园”和“风翻书楼”》，2,000字，写于1998年，发表于《张家渡》，何达兴主编，1999年11月海洋出版社出版。
158. 《关于〈回忆张家渡联络点〉一文的几点说明》，1,500字，写于1998年，发表于《张家渡》，何达兴主编，1999年11月海洋出版社出版。
159. 《痛悼恩师王淦昌先生》，11,000字，写于1999年3月2日。
160. 《“89”十年感言》，7,000字，写于1999年3月30日。
161. 《耀邦与知识分子心连心》，8,000字，写于2001年6月24日，发表于《怀念耀邦文集》第三集，香港亚大国际出版公司，2001年10月出版。
162. 《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12,000字，写于2002年10月4日，发表于《爱因斯坦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163. 《悼念田万钟》，3,000字，写于2003年5月24日。
164. 《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20,000字，写于2003年5月10日，发表于《怀念李慎之》和《83封书信》。
165. 《痛悼恩师陈立先生》，9,600字，写于2004年5月13日，发表于《陈立先生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166. 《爱因斯坦奇迹年探源》，19,000字，写于2005年2月24日，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2005年2期。
167. 《〈走近爱因斯坦〉引言》，2,000字，写于2005年4月7日，发表于《走近爱因斯坦》2005年6月，辽宁教育出版社。

168. 《关于立本小学回忆点滴》，2,200字，写于2005年3月18日，发表于《立本小学校志（1906-2005）》，2008年8月出版。
169. 《爱因斯坦的双重奇迹》，5,500字，发表于《物理通报》，2005年12期。
170. 《回忆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9,500字，写于2005年7月21日，发表于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
171. 《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兼答何凯文君》，2,000字，写于2005年7月1日，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5期。
172. 《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13,000字，写于2005年12月，发表于《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3日。
173. 《浙大地下党及其有关情况》，11,500字，写于2006年1月26日，发表于《黎明前的求是儿女》，2008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174. 《幻想·挫折·反思·探索——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35,000字，脱稿于2006年7月2日，发表于《红岩儿女》第三部“一生都在波涛中”。
175. 《悼志成》，3,300字，写于2006年7月23日。
176. 《〈黎明前的求是儿女〉序》，3,600字，写于2007年7月8日，发表于《黎明前的求是儿女》，2008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77. 《悼汪容》，3,000字，写于2007年3月7日。
178. 《〈爱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序》，2,000字，写于2007年4月29日，发表于许良英编译《爱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2007年6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179. 《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纪念反右50周年》，5,000字，写于2007年5月11日。
180. 《悼黄宗甄》，2,500字，写于2007年7月12日，发表于《求是》，39期。
181. 《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历程——〈爱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订后记》，10,000字，写于2007年10月6日，发表于《爱因斯坦文集》再版第三卷，2009年12月，商务印书馆。
- 182*. 《林昭，中国的布鲁诺永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2,500字，写于2008年2月11日，发表于傅国涌编《林昭之死》，香港开放出版社，2008年9月。
- 183*. 《接受美国物理学会2008年Sakharov人权奖答谢词》，4,000字，写于2008年2月14日。
- 184*. 《83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邓伍文编，2008年4月，同心同理书屋出版。
- 185*. 《可恶可悲的书报检查制度》，2,600字，写于2008年5月25日。
- 186*.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4,000字，写于2008年8月16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题目改为《也谈“普世价值”》。
187. 《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与席泽宗先生商榷》，9,000字，写于2008年10月5日，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第6期。

附录一：许良英部分编、著、译作目录（1942-2012）

- 188*. 《也谈阿克顿的名言》，2,000字，写于2008年11月22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7月号。
- 189*. 《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与吴江先生商榷》，4,000字，写于2009年9月16日。
- 190*. 《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与来棣合写，6,500字，写于2010年8月30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10年12月号。
- 191*. 《走出伪民主误区》，4,500字，写于2011年6月4日，发表于《炎黄春秋》，2011年10月号。
192. 《悼念朱厚泽同志》，1,800字，写于2011年6月19日。
193. 《痛悼方励之》，3,000字，写于2012年4月20日。
194. 《〈方励之选集〉序》，807字，写于2012年10月7日。

附录二：许良英大事记

许平 姜福祯

为压缩篇幅，大事记中采用以下缩写：

《20 世纪》	《20 世纪科学技术简史》
《爱选》	《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
《爱集》	《爱因斯坦文集》
《选集》	《爱因斯坦选集》
《建设》	《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世界观》	《爱因斯坦的世界观》
《通讯》	《自然辩证法通讯》
商务	商务印书馆

📖 1920 年

5 月 3 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市张家渡镇（2002 年改名括苍镇）张家渡村。父许振元（1870—1924），字则恭，号敬斋，母卢文香（1890—1973）。许振元夫妇育有四子一女：良其，若沫（女），良舜，良英，良容。

📖 1925 年 5 岁

2 月，就读于本村金剑青 1906 年创办的新式小学：**立本小学**。

📖 1927 年 7 岁

听到大哥良其讲述他给被捕的共产党员同学送饭的事，对“共产党”产生好感。

📖 1928 年 8 岁

开始喜欢读课外书，如《小朋友》杂志、《西游记》、《水浒传》、《精忠岳传》等。

📖 1930 年 10 岁

2 月，因旱灾，山民造反。为避乡乱，转到临海县**海门**（今台州市椒江区）**慈幼院小学**读书。喜读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方面的课外书。

📖 1931 年 11 岁

9.18 事变后，激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害怕做亡国奴，开始养成天天看报、关心国家命运的习惯。憎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中国的前途很悲观，厌恶政治。负责管理校图书室。

10 月，爱迪生去世，幻想“科学救国”，做像爱迪生、法拉第那样的发明家。

📖 1932 年 12 岁

7 月，全县小学毕业会考第 3 名。因经济困难，经恳求，母亲才勉强同意升学。

10 月，入**海门东山中学**读初中。

📖 1933 年 13 岁

自学大学化学教材，自己做实验，并开始**崇拜爱因斯坦**。轻信书上所说“爱因斯坦从不看文艺书”，放弃画画、唱歌、下围棋、看小说、读唐诗、宋词等爱好及作文学家的理想。

📖 1934年 14岁

自学 Millikan 的《实用物理学》。

📖 1935年 15岁

夏，海门东山中学初中毕业。报考杭州师范、宁波高工、浙大高工，均被录取。

9月，入**浙大高工**（全称“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学校设在浙大工学院内，教师多是浙大教师兼任。一年级学完普通高中三年的数理化，二三年级用英文的美国大学教材学专业课。

12月，响应北平的“12.9”学生运动，以最小年龄参加浙大学生游行、罢课。

📖 1936年 16岁

4-6月，参加军训，接受法西斯教育，感到憎恶。从国军班长处听到有关方志敏及其部队的事迹，受到革命启迪。

📖 1937年 17岁

5月，在浙大亲聆丹麦物理学家、诺奖得主玻尔关于原子核的演讲，只听懂一句。

11月，日军登陆杭州湾，高工迁建德，不久被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张家渡人）解散。

12月中旬，辍学**回到张家渡**。看一千多页的英文版《无线电通讯原理》，练习收发报，上街宣传抗日。

📖 1938年 18岁

2月，在自家的“风翻书楼”阅读《万有文库》中介绍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及**爱因斯坦《我的世界》**，对现代物理学发生狂热兴趣。此外还阅读了科学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以及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纲要》。

录了几条座右铭，其中决定一生的两条是：“**人不可有傲态，但不可无傲骨**”，及“想射天上飞雁的人，总会比只想射蕃篱之鸚的人射得更高”。

9月，在永康参加第一次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被浙大物理系录取。

📖 1939年 19岁

2月，由家乡辗转到**广西宜山浙大物理系**报到，填表时“将来志愿”栏填作“当代物理学权威”。

旁听四年级的“物理讨论乙”课，尤喜听王淦昌、束星北教授的争论。一次在防空洞里躲空袭时看英文物理书，受到王先生鼓励。在物理实验室（一座小破庙）门口写上“科学至上，物理第一”以抵制蒋介石的“国家至上，军事第一”，受到王先生赞赏。

夏，阅读《鲁迅全集》全部杂文，深受影响。浙大学生中1/3患过恶性疟疾，竺可桢校长决定再次迁校。

10月，陈建功教授在“高等微积分”中推理的严格性“在我的思想中生了根”；束星北教授讲的牛顿定律和次年讲的热力学，使许在物理概念和哲学上深受启发。

11月，南宁沦陷，12月20日停课，浙大开始第五次播迁。

📅 1940年 20岁

2月，到**遵义**后，目睹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决心“义无反顾地走出物理理论的世外桃源，把主要精力用于读革命的历史和理论书籍”，完成了**第一次思想转折**。浙大实行导师制，选王淦昌教授为导师。

4月，在进步学生社团“黑白文艺社”的秘密图书室读到大量革命书籍。希望参加“黑白社”，想到这可能面临被捕、杀头，经过一年多的学习（阅读历史上宗教家、科学家、革命家为追求真理而坚贞不屈的事迹）与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认为自己“已有充分的自信：在敌人的刑具、枪口面前，不会辱没革命的气节”——**解决了生死问题**。

8月，加入“黑白文艺社”，参加哲学组讨论、学习。以后又读了大量科学哲学、哲学史、社会发展史、中国历史（思想史、政治史、科学史）等著作，选修了“哲学概论”和“社会学”课。

秋，在一次物理系全体师生的联欢会上，与束星北先生争论科学哲学问题，一个多小时无第三者插嘴。

📅 1941年 21岁

1月，“皖南事变”后的白色恐怖，“黑白文艺社”基本停止活动。决心加入中共，做职业革命家。

4月，发起组织“质与能自然科学社”，负责编辑出版定期的壁报《质≡能》，筹划报告会和讨论会等。目的是团结理工科同学，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组织“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的讨论，结论是：不推翻封建统治，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科学。探讨哲学、革命、人生观问题，秘密传阅革命书刊。

暑假，写社会学课论文《基于社会发展史的中国科学史纲》¹⁶⁶。**浙大理学院迁至遵义东边75公里的湄潭**。

冬，发现自己从一个没有也不懂感情的人，变成一个有着强烈感情的人。

📅 1942年 22岁

1月，发起组织纪念伽利略逝世300周年纪念活动。开始注意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倒孔（祥熙）运动”中冷静应对，减少了损失。

3月，开始最后一个学期，“将来志愿”改为“**做一个人**”——做职业革命家¹⁶⁷。

4月，为秘密“笔谈”写了《**试论感情与理智**》，在进步同学中传阅。此文虽未发表，但“对我自己思想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其中提出的一些新论点，对许后来的爱因斯坦思想与民主理论的研究、提出“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史观，都有影响。

7月，王淦昌先生多次要许毕业后留校当助教，说许“诚实、理解力强、有创造性，

¹⁶⁶ 以后改成两篇文章，以笔名“**林猷**”发表：《中国科学发展史略》，刊于1946年重庆出版的《科学与生活》第3~4期合刊；《三大发明的奇迹》，刊于1946年6月重庆出版的《科学时代》第6期（以上见《自传》）。当时计划写一本书《中国科学为什么不发达》，共分三部分：①史实的考察；②科学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③中国科学之路。共计9章。此文是第一章的前半部分。

¹⁶⁷ 许做出这种选择，除了人生观的改变，还受到两篇文章的影响：①毛泽东1942年整风动员报告中对“半知识分子”的嘲笑；②英国文学家Aldous Huxley作品《针锋相对》中对智力活动及“追求真理”的神圣性的否定。许在《试论感情与理智》中批判了Huxley“否定虔诚地探索真理的神圣性”的论点。

研究物理很有希望”。月底，在王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 β 蜕变问题》¹⁶⁸。

8月，**大学毕业**，婉谢王淦昌教授的挽留，到**桂林**寻找党组织，未果。

📅 1942年9月至1944年9月

先后在桂林5个中学（青年中学、师范、师院附中、文山中学、德智中学）任数理化地教师。

📅 1943年 23岁

5月，写《纪念我们的旗手——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刊于当地进步通俗科学刊物《科学知识》月刊（当时大后方仅有的一个科学刊物），并开始参加该刊的编辑工作，后任编委。

秋，参加中国物理学会在桂林举行的年会。

冬，决定次年夏回浙大。为筹措路费，开始写一本介绍物理学基本概念发展的半通俗小册子《物理学——古典的和现代的》¹⁶⁹。因长期熬夜，膝盖、腰椎患了风湿性关节炎。

📅 1944年 24岁

6月，日军发动湘桂战役。

7月1日至8月12日，参加“桂（林）师（范）暑期抗日宣传队”，在桂北5县农村进行抗日宣传、社会调查，为建立抗日游击队做准备。

8月，应邀去重庆负责编辑《科学知识》（其编辑部已转到重庆），并受托护送瘫痪多年的细菌学家高士其去宜山，因挤不上火车而作罢。后决定一人步行经两江去重庆。

9月12日离开桂林，10月16日从桂林西南的百寿镇启程，流浪在**桂黔边境**山区。

10月31日至次年1月31日，3驻黔东南重镇**榕江**，曾去广西大学旁听“张量分析”与卢鹤绂教授的“量子力学”。

📅 1945年 25岁

1月中，王淦昌教授从卢鹤绂处知许在榕江，来信要许回浙大任助教（后获悉王曾为此在贵阳报纸上登寻人广告）。

2月1日启程回浙大，27日到**湄潭**，任物理系助教。

从1944年9月12日到1945年2月27日，长途跋涉2555里，其中步行2100里，历经磨难，胸口被国军逃兵打伤，因衣单被薄、长期受冻，腰椎关节炎更趋严重。

3月，王淦昌先生在回答许在“原子核物理”课上的提问时说，“这[指许在提问中表达的看法]是了不起的创见，如果早几年提出，重原子核的裂变就该是你发现的了。”

📅 1946年 26岁

1月10日，“停战令下”，以为不会打内战了。翻译林赛和马根脑的《物理学的基础》。从一系列事件看出“停战”只是缓兵之计，遂于3月停止已完成了4/5的翻译工作。

¹⁶⁸ 王先生原本给许出的论文题目是“ β 衰变与中微子存在问题”，因许当时已无心从事物理研究，只求早日毕业离校，以便寻找中共党组织到敌后打游击，所以最后只是对 β 衰变作了文献分析，并未顾及“中微子存在”这个王淦昌认为可能得诺贝尔奖的题目。

¹⁶⁹ 大部分书稿在战乱中丢失，剩余部分《科学底分类及其关联性》用笔名“田由申”发表在1947年4月10日上海《文汇报》副刊《新科学》上。

5月，浙大开始复员迁回杭州。

8月，绕道**重庆**，在《新华日报》馆写申请入党自传，由赖卫民办理了**入党**手续。9月底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见周恩来机要秘书、原浙大校友李晨，畅谈一天。

10月1日到**上海**，11日国军占领张家口，内战全面爆发，19日参加鲁迅去世10周年紀念会，听周恩来告别国统区人民的长篇讲话。26日回到**杭州**。

📅 1947年 27岁

1月5日在上海补行入党宣誓仪式。入党介绍人为赖卫民，批准入党时间是1946年9月。

2月，成立**浙大**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党员3人。

8月，任**浙大支部**书记。到10月中，发展了24个新党员，共有35个党员；创建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代号Y.F.）；筹备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普选。

10月2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3天后被杀害于省保安司令部狱中，引发了全国性的反迫害、争自由的学生运动——“**于子三运动**”。

12月中共**杭州市工作委员会**成立，任**工委组织委员兼中学区委书记**，负责浙大、之江以外全市各大中学校的开辟工作。在各校建立Y.F.及党支部。

📅 1948年 28岁

5-6月，主持编辑《踏着血迹前进——于子三运动纪念刊》，在香港印刷3000册，承担了1/4的经费，由浙大学生自治会在于子三殉难周年时公开发行。

7-11月，负责输送一批比较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七十多人）到解放区。

7月，调整工委分工，改为负责浙大支部（后为总支）工作。

9月，成立浙大总支，兼管浙大总支的组织工作。王来棣任总支委员。

📅 1949年 29岁

3月初，成立杭州市委，原工委改为青委，任**青委委员兼大专区委书记**。

5月3日，29岁生日，杭州**解放**。4日晨起草《杭州市学生纪念“五四”30周年并庆祝杭州解放大会告全市同学书》，在傍晚召开的全市大中专院校学生集会上散发。

5月中，任市**青委组织科**（后改名为**党工科**）**科长**（负责全市所有学校党务），兼青委机关支部书记。后兼任“青联总支”（领导全市各校支部和青委机关支部）组织委员（乔石为宣传委员）。

6月底至8月底，任市“青干校”校务委员兼组织科长。

📅 1950年 30岁

与浙大史地系毕业生、地下党战友王来棣**结婚**。

3月，任**青委学生部长**（乔石任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兼**杭州市“学校党委会”宣传委员**（乔石任组织委员）。市委副书记林枫在提名许为学生部长时说，“杭州地下党的工作主要是学生工作，而学生工作中许良英应居第一功。”

10-11月，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在审查由市军管会公安部学校保卫科科长提出的逮捕名单时，力保浙大教授束星北，得到学校党委会全体委员的同意。

12月31日，长子许成钢出生。

📅 1951年 31岁

8月，被省委书记谭震林选派赴苏留学，在志愿栏填“原子核物理学”和“低温物理学”，因错过报名截止日期而作罢。

📅 1952年 32岁

6月22日，由中组部调入**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当时全国唯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刊的出版机构），负责全院出版物的政治把关，领导《**科学通报**》（科学院机关刊物，全国唯一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编辑工作，兼任**编译局机关支部书记**。

奉院党组之命推荐一批浙江党员以加强科学院党的力量，包括周志成、王来棣、范岱年、吴洵高等十几个浙大地下党员；1953年又提名杭州市副市长张劲夫（后任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浙江省副省长顾德欢（后任电子所所长）。

10月，任**计划局、编译局支部书记**。负责新成立的《科学通报》编辑室，政治把关由吴洵高接替。

📅 1953年 33岁

4月，任新成立的《科学通报》编委会秘书（竺可桢为主任，曾昭伦、周培源等为委员），**列席**每周一次的**院务会议和院党组会议**，发现院内大事均先由党组（均为老干部）作出决定，再在院务会议上通过。

10月，任“科学通报室”副主任（无主任）。

📅 1954年 34岁

1月，科学院成立学术秘书处（钱三强为秘书长，秦力生、武衡、郁文为副秘书长），兼任**秘书处党支部书记**，并**负责全院对外宣传工作**，经常与媒体打交道。

春，科学院拟筹建4个学部。在列席筹建哲学所的院务会议上**建议**：在哲学所内设一“**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组**”，**组长**可请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兼任（于上任后改为“自然辩证法组”）。建议立即得到同意。

5月13日，次子许平出生。

10-11月，带秘书处工作组到东北检查六个研究所的工作。

📅 1955年 35岁

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在《科学通报》上以笔名“林因”发表悼念文章：《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春，响应中央“支部要对行政领导起监督作用”的指示，在支委会上对秘书处负责人，院副秘书长武衡提出批评，受到国家机关党委的支持。

5月，在**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因为在1950年曾介绍“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方然入党，武衡趁机报复，受到一个月的批判，被押到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厅参加国家机关反革命分子坦白大会。8月中武衡宣布许**停职反省**。这是一生受到的第一次政治打击。

6月1至10日，中国科学院召开学部成立大会，任秘书处宣传组组长。

📅 1956年 36岁

1-9月，受人民出版社委托，撰写《**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简称《建设》，其中第4章由范岱年执笔），提出“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57年4月出版，1982年美国出了英文版。

3-5月，参加“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有关**数学和自然科学中**

的哲学问题 12 年研究规划的制定工作（于光远负责），并起草了科学方法论研究规划说明书《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一般性的问题和物理科学方面的问题）》，发表于《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通讯》创刊号。

5 月中，停职审查结束，结论：历史全部清白，工作一贯积极。读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引起极大震惊和愤怒”。认识到“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会犯错误，对任何人都不可盲目崇拜”，但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5 月 26 日听陆定一报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阐述 4 月 28 日毛提出的双百方针。

5 月中，院部要许去负责新成立的宣传局，6 月中向院党组递交报告，坚辞党内外所有职务，要求去哲学所研究科学哲学。

6 月 28 日，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报道，创办《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通讯》。在创刊号中刊出了《12 年研究规划草案》及其 53 篇研究题目说明书。在规划草案原有 8 大类研究题目之外，加上“第九类题目：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

☞ 1957 年 37 岁

1 月，开始重译《物理学的基础》（不久因鸣放而终止），与科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

2 月 10 日，与原杭州市工委委员钟沛璋共同发起召开筹备于子三殉难 10 周年纪念活动的座谈会。

2—3 月，听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的传达，觉得自己在《建设》第五章“百家争鸣”中的思路与毛的讲话精神完全一致，对毛所说“‘要避免毒草’本身就是毒草”佩服得五体投地。

5 月初开始“鸣放”，每天看报 4 小时，五月底开始看大字报。31 日，在党员骨干座谈会上，有人说科学院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许认为这是“否定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

6 月 8 日，反右运动正式开始，此前无任何右派言论。在 13、14 日哲学所党员骨干会上首先发言，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认为《人民日报》突然变脸，既失信于民，也是不道德的，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并为受围攻的民主人士辩护。为搞清真相，四处打听消息：14 日从何成钧¹⁷⁰处听说反右是刘少奇、彭真搞的¹⁷¹。15—17 日拜访于光远、郁文、范文澜、潘梓年¹⁷²等，得知反右是毛的主张，相信反右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觉得自己错了，遂向受自己影响的人讲述思想转弯过程，以便“消毒”。

6 月 28 日到 7 月 11 日，受到各种会议的批判。主动向党支部交出日记本，并写了 1.5 万字的检查，其中涉及的一些人（自然辩证法组成员赵中立、范岱年、陈步等）以后均被划为右派。

¹⁷⁰ 何成钧，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自然辩证法组兼职研究人员。

¹⁷¹ 事后知道，这些话是从钱伟长处听来的。以后，在给所党组织的检查中写入这些内容，后者反诬这些话是许说的，称许造谣“中央分裂了”，并送到《人民日报》，于 7 月 29 日发表。这一“消息”被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80 年代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写入他的名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为毛刘不和的证据。1990 年许写信给麦氏，指出这是以讹传讹，麦氏不以为然。

¹⁷² 郁文，时任中科院党委书记；范文澜，时任近代史所所长、候补中央委员；潘梓年，时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所所长。

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

8月1日，**科学院**在北大礼堂召开一整天**全院大会**，**批判许良英与李德齐**¹⁷³。会上有人说2月10日的座谈会是“反党活动”，多数与会者因此被牵连。

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光明日报》以大半篇幅报道对许的批判。此前，科学院出版的专为反右服务的刊物《风讯台》第四期有几个整版的内容是批判许和李德齐的。

📅 1958年 38岁

1月被分配到所图书室干杂活。25日，《关于右派分子许良英的材料（第二类）》罗列许的罪名：“1.整风鸣放中到处搜集情况多方点火进行煽动”；“2.积极反党污蔑社会主义没有民主”；“3.污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并提出“处理意见”：“开除党籍，撤销公职送国营农场监督劳动。每月补助25元。”

2月下旬，被**开除党籍**。

3月1日，吴传启¹⁷⁴宣布许为“**极右分子**”，受**第二类处分：撤销一切职务**，监督劳动，送黑龙江密山农场劳改，每月29元生活费。许思想不通，并强调腰部有严重关节炎，受不了严寒，无法去东北劳改，要求回家考虑、商量，吴不允，遂被迫选择“**自谋生路**”。

3月3日，王来棣因悲伤过度导致**即将出生的女儿胎死腹中**。4月初，**王来棣**因“参加了以许良英为首的宗派小集团，背着党进行非组织活动”（指参加57年2月10日的座谈会）、“包庇右派，严重丧失立场，敌我不分”等罪名，受到**开除党籍、行政降级**的处分，并被剥夺研究建党历史的资格。

5月，完成《物理学的基础》的翻译和校订并写了1.3万字的《译后记》，6月初交科学出版社。因中央明令禁止出版右派的任何作品，两个月后，出版社将书稿退给王来棣，一年前出版的《建设》也从书店中消失。

6月8日，为不再连累家人，**回老家临海张家渡**接受劳动改造，并运回160kg书。

📅 1958年6月至1960年 38至40岁

积极参加体力劳动，认真改造思想。开始通读马恩列毛的著作。轻信《人民日报》关于亩产几万斤的报道，认为“党报还会说假话？”

📅 1961年 41岁

3月16日，在县右派分子会议上宣布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4月，回京一个月，看望妻儿，并向中科院党委书记郁文汇报改造情况，郁主动说要考虑许的工作问题。离京时，用扁担挑回一百多斤书，主要是马列毛著作。

📅 1962年 42岁

5月，与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恢复联系，后者赠许整套《马恩全集》，并应允，每有新出的《马恩全集》必及时寄来（63年用稿费还请书款）。

8月，自然辩证法组寄来《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提了27页修改意见，并接受该组委托负责编译《**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以下简称《**爱**

¹⁷³ 李德齐，哲学所逻辑组研究人员，后被划为右派。

¹⁷⁴ 吴传启，投机分子。时任哲学所秘书、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文革初期是“王关戚集团”干将，后因“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入狱多年。

选》)。该组将《物理学的基础》介绍给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该书于1964年出版），商务为许预支一笔稿费，使其可以购买“劳动工分”，养活自己和母亲。

9月，读完了所有能买到的毛泽东著作、39卷《马恩全集》、三十余卷《列宁全集》。从11月开始，被邀列席每届临海县政协及人大会，每次都提出许多提案。

📅 1963年 43岁

1—4月回北京，义务帮自然辩证法组工作¹⁷⁵，在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和科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将爱因斯坦著作和传记各十几种带回故乡。3月与商务签订《爱选》约稿合同（64年底交稿），4月开始商议与上海科委秘书李宝恒合作编译《爱选》。

与王来棣离婚。

📅 1964年 44岁

10月，应李宝恒之约去上海，讨论《爱选》定稿及怎样确定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基调”，并为上海的《西方科学哲学论文选》拟定选题计划。

11月底，经一年半，每天14小时，没有节假日的奋战，完成《爱选》的编译、校对，共选译了200多篇文章，约50万字（其中李宝恒完成了近1/8的翻译），包括①有重大哲学意义的科学论文（主要是几篇相对论的原始论文）；②一般有关哲学问题的论著；③社会政治言论。另有两个附录：爱因斯坦著作目录，爱因斯坦生平和历史背景。向商务交出书稿。

12月，写成9万字的《爱选》《编译后记》。

📅 1965年 45岁

秋，商务将《爱选》稿寄李宝恒审校定稿。

10月，将《编译后记》改写为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简称《世界观》）。

11月25日，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4期上，以笔名“林因”与李宝恒联名发表《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系《世界观》的第二部分压缩而成），受到陆定一好评，要《红旗》转载。因党刊不能发表右派文章，于光远要李宝恒将它压缩改写后以李一人名义发表。

11月~1966年春，受上海科委自然辩证法组委托，翻译弗兰克的《科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和论文集《现代科学及其哲学》。前者只用了两个多月，后者是在劳动之余进行的。

📅 1966年 46岁

1月，响应毛的号召“哲学工作者，打起背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滚他一身泥巴”，主动恢复体力劳动，并开始每天读毛著。

5月，文革开始。李宝恒改写的《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未及发表，却作为中宣部在上海的第一个“黑帮分子”受到冲击。

7月中，上海科委徐永德到张家渡调查许与李宝恒的关系，肯定了许的工作。

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公开支持张家渡大队的“井冈山兵团”，写大字报和检举材料

¹⁷⁵ 包括修改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的译稿，并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推荐此文。毛对此文评价甚高。后，《红旗》也刊载了此文，引发全国科技工作者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高潮。

（包括检举中宣部）。至 1970 年共接受外调任务 220 次（1/4 是函调），多与地下党有关。

📅 1968 年 48 岁

6 月 28 日，被杭州市革委会和浙大革委会押到**浙大审查**，成为一个专门审查地下党的庞大专案组的第一个审查对象。在被**监禁**的 **11 个月**内，写交代材料和证明材料等 23 万字、自传 10 万字。

📅 1969 年 49 岁

《爱选》和《世界观》手稿被上海市写作组从李宝恒处“借用”。

5 月 20 日，**审查结束**，结论：①除 57 年的错误外，个人历史全部清白；②整个系统的地下党属于毛主席路线。25 日返回张家渡。

8 月 30 日晨，临海城西区（辖 5 个公社）革命领导小组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批斗许，会前 4 小时**喝下两小瓶敌敌畏自杀**以示抗争，经 12 小时抢救脱险。

12 月 4 日，中科院“相对论批判小组”陈庆振到张家渡向许借《爱选》的全部译稿，称**陈伯达已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定为理论批判的重点**。因译稿在上海，遂将初稿和资料卡片借走。许说，**爱因斯坦在政治上、哲学上、科学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公开批判他，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 1970 年 50 岁

5 月，因 68-69 年在浙大写的自传不能带走，重写的**自传**（1920-1969 年）脱稿，16 万字。

📅 1971 年 51 岁

10 月，商务恢复业务，要许“立即寄去（《爱选》）成稿，以便决定”（可否出版）。从李宝恒处得知书稿被“借用”，通过李向写作组索要书稿，未果。

📅 1972 年 52 岁

2 月 28 日，致信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写作组组长朱永嘉，要他必须在 3 月下旬前归还两部手稿，“否则将诉诸法律”。

3 月 23 日，朱永嘉将《爱选》手稿还给李宝恒，但《世界观》手稿“下落不明”。

3 月 29 日携《爱选》手稿**抵京**。一周后商务决定尽速出版《爱选》，将其列入 1973 年出版计划，并表示愿意出版《世界观》。与李宝恒合作，开始补译新发现的文献、复核被上海涂改的译稿。

6 月 6 日，在秦力生的催促下，到**河南明港**，住学部招待所¹⁷⁶，试图解决恢复工作之事，未果。13-14 日，在回浙江的路上绕道**湖南韶山**，五次含着眼泪参观毛泽东故居。

9 月 18 日，看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爱因斯坦言论集》征订广告，内容和字数与《爱选》相同，编译者为复旦大学该书编译组。

10 月 3 日，为揭露、抗议这种强盗行径，写了《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寄给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12 日，只身**赴上海与朱永嘉们谈判**，未果。19-21 日，

¹⁷⁶ “学部”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8 年独立为社科院）的简称，哲学所属于此学部。1969 年学部在河南息县建“五七干校”，1971 年春干校解散，人员聚集到明港某军营，抓“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

给周总理写申诉信，请两位能见到毛、周的老同志转信，被退回。

11月1-2日，先后致信中科院秦力生副秘书长与竺可桢副院长，请郭沫若院长或竺转申诉信。25日，将复核好的《爱选》稿寄给商务。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以下简称《**选集**》）。

📅 1973年 53岁

3月，**两家出版社达成协议**：上海的书内部发行，商务按原计划公开出版。许决定将《选集》从一卷扩至三卷，并约范岱年、赵中立合作。

9月，上海的书出版了，书名改为《爱因斯坦论著选编》，编译者改为王福山、卢鹤绂等12位复旦大学教师。内容94%抄自《爱选》，科学与哲学部分几乎未动；政治言论方面，删去几篇正面的文章，加进29篇被许筛掉的（如所有略有反共反苏倾向的）文章，并据此在《年表》中对爱氏妄加批判。

12月11日，应商务之邀**抵京**，商务同意将《爱选》扩充为三卷本《选集》的计划。但有人反对称“选集”，遂按于光远的建议改为《**爱因斯坦文集**》（以下简称《**爱集**》）。

📅 1974年 54岁

1月，成为商务的临时工，领到半年的“编审生活费”（每月50元。先付2/5，以后逐月付）。4月1日，开始在第三编辑室工作。5月住进位于珠市口的商务招待所。

5-7月，周总理住院，江青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公开活动，大搞“批林批孔”，并对美国作家维特克说，自己在重大问题上是对毛施加影响的，延安时反对毛与她结婚的那些老党员在文革中一一受到清算。这些情况使许**从对毛的迷信中猛醒，完成了第二次思想转折**。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并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

9月，46万字的《**爱集**》**第一卷交稿**，一个星期后发排，这在当时的环境下绝对是个奇迹：①江青的得势；②上海写作组控制的《复旦学报》、《自然辩证法》抛出一系列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掀起全国性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

11月底，新上台的商务领导借口北京要开四届人大，控制流动人口，骗许回乡，并承诺按月寄生活费，同时悄悄将《爱集》改为内部发行。

📅 1975年 55岁

回乡后不到两个月商务停发生活费。一直在领导绝密的“两弹”研制任务的**王淦昌先生**得知后，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用“王京”的名义**每月给许寄30元生活费**。

5月，政局略有好转，在于光远的支持下，商务恢复了许的生活费。

8月，约许成钢到杭州见面（这是父子俩63年分别后首次见面），谈对毛泽东、四人帮及文革的认识及对中国前途的担忧。

9月，《爱集》第二卷完稿。

10月，于光远任职夏季成立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是争取回哲学所工作的机会，在朋友们催促下**抵京**。于光远帮助解决了到1976年底的生活费问题。约赵中立、张宣三合作编译《爱集》第三卷。一个月后，于光远又被打倒。

📅 1976年 56岁

4月，亲眼目睹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全过程，每天至少在广场停留2-3个小时，感受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10月9日，应约到颐和园与吕东明、赵中立等会面，听吕披露“四人帮”被捕的内部消息。当天淋雨、受寒后感冒、咳嗽，一直未去看病。

12月7日，上午X射线透视结果：右肺全部有阴影，并有一个直径2厘米的空洞，初步诊断为严重肺结核。下午咳了一口血，十分钟后看到《爱集》第一卷的样书；8日夜大口咳血，9日送结核病院。因是农民，无医疗关系，4天后被要求出院，后经李晨帮忙，住进危重病号的单人病房。朋友们以为他将不久于人世，纷纷前来探视，但奇迹般地很快康复。次年3月出院，未能确诊。2010年9月才得以确诊。

☞ 1977年 57岁

1月，《爱集》第一卷开始内部发行。

3月，《爱集》第二卷出版。下旬，计划与赵中立、范岱年、张宣三一道，对文革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进行考查和批判，因故放弃。向钱三强建议，79年开会纪念爱氏诞辰100周年。

4月，方励之因《爱集》翻译问题与许良英通信并相识，二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

4-10月，在商务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读书报告会，每周一次。经常参加的有方励之、赵中立、张宣三、许成钢。

7月，商务决定重印《爱集》第一卷，并要许写《前言》。初稿被说成是美化资产阶级，遂请周培源先生作序，周只将许压缩后的原稿略加修改与补充。

胡耀邦向共青团干部推荐《爱集》，说里面有些文章他读不懂，但读懂的对他都很有启发。翌年，胡在中组部干部会上要求大家学习《爱集》。

☞ 1978年 58岁

3月，有周培源序的《爱集》第一卷重印版公开发行。

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周培源的《爱集》序，新华社讯称：《爱集》由“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许良英主持”，许去信要求更正，指出自己“是一个农民”。

4月14日，国务院政工小组发文给中国科学院，称“你院要求录用浙江临海县张家渡公社许良英参加《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工作问题，已经方毅副总理批准。”

4月25日，接科学院政研室通知，要许去《通讯》编辑部报到，许坚持要去自然科学史所。5月14日获李昌同意。

5月27日，回张家渡办理户粮迁移，告别“农民”身份。

6月17日回京，在新成立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建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从事世界近现代科学史和科学思想史研究。

11月25日，搬到友谊宾馆北工字楼，参加讨论《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简称《20世纪》）写作提纲。

☞ 1979年 59岁

1月15日，由编辑提升为副研究员。

1月26日，在哲学所看到复查报告，称1957年划为右派是错划的，应予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13级的工资待遇。未觉兴奋。

2月，与赵中立共同编译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以庆祝爱氏诞辰 100 周年。

3 月 6 日与王来棣**复婚**。12 日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筹备会，负责物理学史（任分支副主编）和物理学家部分。

4 月，在许的倡议下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庆祝爱因斯坦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起草周培源、于光远做的主题报告**。

10 月，《**爱集**》**第三卷出版**。三卷共选译了 411 篇，133 万字，是当时世界上收录最全的爱因斯坦著作选集。参加编译工作的先后有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张宣三。

10 月 8 日，去成都开“全国自然辩证法理论讨论会”，在许的房间内酝酿成立爱因斯坦研究会，出刊《爱因斯坦研究通讯》。20 日到重庆，24 日到遵义，26 日到杭州，开纪念于子三座谈会、费巩烈士纪念会。11 月 3 日到上海，与复旦大学物理系商谈合带研究生事宜，5 日返京。

11 月 6-8 日，在中科院干校（北京怀柔）给 80 个处级干部讲 19-20 世纪物理学史。

📅 1980 年 60 岁

2 月，写《**建设**》**英译本序**，发表于 1982 年纽约出版的“*Science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译者徐楚生 John C.S.Hsu）¹⁷⁷。被国外学术界认为是了解中国科学工作状况与政策的重要文献。发表与施雅风合写的《**竺可桢传略**》，刊于《中国科技史料》1980 年第 2 辑。

3-4 月，于光远、钱临照等提名许为学部委员候选人。

4 月 24-26 日，为国家科委办的科技管理干部学习班（各省科委正副主任 60 人，中央各部 40 人）讲自然科学史第二、三讲。

7 月 24 日，胡耀邦邀科学家在中南海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宣讲的《科学技术讲座》开讲。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主要由许起草，钱三强主讲。讲稿中提出“**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的两大柱石，是现代国家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8 月，讲稿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10 月 9 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论文《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引起较强烈的反响。81 年 2 月，该文第一部分以《**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为题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简称《通讯》）81 年第 1 期。

📅 1981 年 61 岁

4 月 16 日，晋升为研究员。美国哲学家 C.G.Hempel 教授¹⁷⁸夫妇访华，18，21 日在国际俱乐部与北大听其报告，18 日在科学会堂与其就“科学的合理性”等问题展开辩论。

5 月，列席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提出将“管理科学学组”改为“科学和社会学组”等建议。会中去中南海参加书记处茶话会，胡耀邦发誓不再搞反右运动，表明：反自由化不是搞运动，不是整人。认为共产党有胡耀邦就有希望。

6 月 6 日，去房山参观王淦昌先生为所长的原子能研究所。

8 月 21 日，从东城区东厂胡同搬家到海淀区中关村。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4 日，参加**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被选为

¹⁷⁷ 3 月，人民出版社要将此书中文版加以增订，许因无暇顾及，未允。

¹⁷⁸ 著名数理逻辑学家、数学家、逻辑实证论的主要人物。他提出的两个模型声称可全面解释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许成钢注。

常务理事，于光远为理事长，周培源、卢嘉锡、钱三强、钱学森等为副理事长。何祚庥首先发言：“方励之说‘电子无限可分至今没有试验证实’是反马克思主义”。许发言指出何对方的批判不是马克思主义，只能算是“何祚庥主义”。发言后得到长时间热烈鼓掌。

📅 1982年 62岁

3月23日，去**上海**，在复旦大学讲授《爱因斯坦的贡献和思想》，《关于科学史分期问题》，三百人的教室挤了四百多人。拜访苏步青、卢鹤绂、谷超豪等。29日到**杭州**，**参加浙大85周年校庆**。为杭大王锦光中国古代物理学史研究之事找校长陈立提建议。主持浙大老校友座谈会，讨论组织校史和革命斗争史资料征求工作。在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解放后尤其是反右后，浙江在科学、文化、教育各方面大大落后。主持《于子三运动史》稿讨论会。参加原杭州市青委老同志座谈会。4月8日**回京**。

4月发表《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和他的思想》，收录在198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近代物理学史研究》（王福山主编）。

7月，台湾《中华杂志》刊文称“少数大陆学者的著作与译作已经在台湾市面上印行，例如华罗庚的《数论引论》与《数学分析导引》以及《爱因斯坦论集》等均是优良的作品”。

11月22-30日，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参加中国科技史学会1982年物理学史讨论会。22-23日为筹备组会议，以后为大会。被选为召集组副组长（王福山为组长）、学科委员会组长。

《建设》英文版在纽约出版。

📅 1983年 63岁

1月1日，哲学所要许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撰写条目，只答应写“爱因斯坦”、“相对论”2条和参加审稿会。

1月17-27日，参加《大百科全书》物理卷物理学史分支审稿会。

2月24-25日，商务要重印《爱集》1-3卷。认为原《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意见》的“编译者注”太左，做了大的改动。三卷做了15+3+27处勘误。

3月5日，参加科学与技术史学会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座谈会，发言讲了四个内容。11日，参加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举行的座谈会，演讲题目《马克思主义和一百年来科学、技术与社会》，时间20分钟。

6月4日，给周扬写信，因其发表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文章而受到批判，对他表示敬意与支持。

7月14日-8月16日，住体育学院外宾招待所，《20世纪》清稿、定稿。

7月22日，研究生屈徽诚论文《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¹⁷⁹（简称《考查》）答辩。因论文一直受到多方非议，特组成阵容强大的七人答辩委员会，包括3位学部委员兼大学校长（周培源、钱临照、方励之），6个教授。一致认为选题得当，对此项工作表示赞赏和支持。

9月7日，《20世纪》向科学出版社交稿。

¹⁷⁹ 摘要发表于《通讯》1984年第6期和1985年第1期，全文收在1989年7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爱因斯坦研究》（许良英、方励之主编）。因此文有较大政治风险，发表时署了两人的名，这是许唯一一次在研究生发表的论文中署名。

10月26-11月2日，去西安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读论文《关于科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屈傲诚宣读两人署名的《考查》，反应热烈。

11月23日至12月15日，访问了美国东部6个城市的21个单位，包括多所大学：**波士顿**的哈佛、MIT、波士顿、布朗代斯；**费城**的宾州；**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纽黑文**的耶鲁；**纽约**的洛克菲勒；**华盛顿**的马里兰。拜访了14位知名物理学史家，包括：哈佛的G.J.Holton, E.N.Hiebert, I.B.Cohen；波士顿的R.S.Cohen, J.J.Stachel；洛克菲勒的A.Pais；耶鲁的M.J.Klein。J.J.Stachel说，中文版三卷本《爱集》的出版，对他主编的《爱因斯坦全集》的工作起到促进作用。11月29日应邀在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中心”宣读论文《爱因斯坦的理性论思想和现代科学》（发表于《通讯》1984年第2期），引起该文两位评论人R.S.Cohen和J.J.Stachel及其他听众的热烈讨论。其间还拜访了袁家骝、吴健雄夫妇。

☞ 1984年 64岁

4月21-26日，去洛阳参加由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的“全国现代物理学的哲学问题座谈会”。

8月4-23日，经贵阳、黄果树、息烽、遵义，去湄潭参加“浙大在遵湄时期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史座谈会”。10日因兴奋、喝酒、感冒、疲劳引起前列腺肿大，送到遵义导尿。17日从贵阳乘火车回京，因小便不通，在武汉下车，导尿、治疗，23日乘飞机回京后又去医院导尿。

9月10日，《瞭望》周刊第37期刊登新华社记者胡国华的报告文学《绿色的文集》，讲述《爱集》的坎坷历程。此前许看过手稿，指出有不少失实之处，且编译者只提了许和李宝恒，但作者以“来不及”为由未作改正。

10月10日，在《通讯》第5期发表《美国物理学史研究工作情况见闻》。

10月19-31日，去杭州开“于子三运动专题座谈会”。在开幕式上尖锐地批评了浙江省委35年来所执行的左的路线。22日争论浙大何时成立总支，《大事记》称“1947年9月……，浙大党支部改为党总支，许良英任总支书记”，许等4人否认，洪德铭说“总支不能改”，许说“如果这样，我立即退出这个座谈会”。

12月16-20日，在香山饭店参加由社科院研究生院与中科院研究生院联合召开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讨论会。小组讨论、大会发言各3次，涉及**马克思的历史局限性**、还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科学面目，“**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社科院作为学术机构对中宣部不该惟命是从……。

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条目《A·爱因斯坦》、《王淦昌》；**哲学卷**条目《A·爱因斯坦》、《物理学革命》、《相对论》。1987年出版。

☞ 1985年 65岁

1月8-13日，在京西宾馆参加国务院召开的“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给《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科学技术体制的决定》草案写了修改意见，要点：重视基础科学；科学不仅是生产力；把社科院恢复为科学院的一个学部，领导关系由中宣部回归国务院；学术自由。

1月23日，住友谊医院准备做**前列腺切除术**。为防手术不测，术前**写遗嘱**：①遗体献给医院，供移植和研究用；不修坟、立碑、开追悼会；②想写一本专著《科学、民主

和马克思主义》，推动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新启蒙运动），希望青年同志来完成¹⁸⁰。
2月2日手术。

1月，菲利普·弗兰克著，许译《**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36.1万字。

3月，**接待**来访的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国际科学史学会主席 **Erwin Hiebert**，17日与4名研究生一起陪他拜访王淦昌先生。25—29日，在**浙大**与方励之共同主持为纪念爱因斯坦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而召开的“**爱因斯坦研究讨论会**”。27日推荐方励之给浙大学生演讲《改革漫谈》，受到热烈欢迎。28日原计划讲《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突患视网膜脱落，次日回京。

3月30日至6月下旬，在同仁医院住院准备做**视网膜手术**。因心律失常与颈椎骨质增生导致脑供血不足，一再推迟手术日期。5月22日手术。术后视力降为左眼0.01，右眼0.1。适逢哈佛大学教授 **G.Holton 夫妇访华**，到病房探望许后又到许家送花给王来棣。

6月，与李佩珊、张钟静负责审订的《**20世纪**》，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下半年开始与研究生、同事在许家召开小型 Seminar，讨论学术、时事、政治等问题，最初每两周一次，以后改为不定期，共开了55次，到1988年4月18日结束。

📅 1986年 66岁

5月，参加两个“纪念‘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座谈会”：13日在科学会堂由《通讯》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与29日在近代史所由马列毛研究会、作协等6单位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中宣部长朱厚泽等二百余人出席，于光远、陈荒煤、吴明瑜、于浩成等发言）。两次发言题目均为《“**双百方针**”带来的喜悦和悲哀给我们的启示》（《通讯》第4期）。在29日会上说：“若方励之公开受打击，我要联合50位教授联名上书党中央，以保卫方励之、保卫学术自由，并向新闻界发布”；点名批判了毛泽东、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要为“自由”正名，强调思想自由，而不仅是学术自由。

6月26日，接受《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的访谈，题《**为自由正名**》，载《新观察》第20期。

10月29日在许家召开小型讨论会，与会者包括科学史所数人、《人民日报》记者一人。许的发言以《**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为题刊于11月6日《人民日报》。

11月14日，方励之、李淑贤夫妇与刘宾雁来许家讨论纪念反右运动30周年之事，发起拟于1987年2月3-5日在北京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会议通知由方起草，联系地点设在许家。初步邀请39人。因钱伟长向中央告密、方与第一副总理万里的公开辩论、方在科大当选区人大代表、多地学生游行、各单位领导向会议受邀者施压，1987年元旦，发起人发出取消会议的通知。

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钱三强《推荐〈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与该书结束语中一节《**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

📅 1987年 67岁

1月，胡耀邦、方励之被撤职，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据说是赵紫阳在向邓小

¹⁸⁰ 1993.9.29.日记称：“1985年以前我曾打算写一本《科学·民主·马克思主义》，1987年以后我不愿在马克思主义上花功夫了”。

平汇报时，误把许良英说成王若望）被开除党籍，钱伟长开始受重用。2月，朱厚泽被调离中宣部。

4月下旬，开始与王来棣合写《民主论》（后改名《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民主的历史》）。

5月18日，所领导与许谈离休问题。26日，参加《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物理学科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与钱临照先生同任主编。

6月16日，香港《百姓》半月刊消息：8日，香港132人召开“反右运动30年历史学术讨论会”，并载陈棘荪（《百姓》社长陆铿的笔名）在美国采访许成钢后撰写的文章《“五不怕”的过来人——许良英》。

7月，与胡济民、汪容、范岱年合编的《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许1986年元旦为庆祝王先生80大寿而倡议的，周培源先生的序也是许起草的。

7月，写《争论从何而来？分歧何在？——答查汝强同志》，并对〈历史理性论〉作一点补充说明和两处文字更正》，发表于《通讯》1987年第10期。这是自然辩证法学科建立30多年来最大的一场争论。17日，收到John Stachel教授赠送的《爱因斯坦全集》第1卷。21日，参加《读书》冷餐会，结识、遇到不少新老朋友：吴祖光、罗孚、李洪林、夏衍、李锐、金克木、戈扬、王蒙等。

9月1日，拒绝参加纪念牛顿《原理》发表300周年大会，以抗议官方取消于光远、方励之的大会发言。晚出席欢迎洛克菲勒大学A.Pais教授夫妇的宴会，谈起反纳粹、访问萨哈罗夫的经历。5日，在科学史所主持A.Pais教授的演讲会。15-16日，参加在中央党校召开的“20世纪中国科技史学术讨论会”，首先发言，本拟讲7个问题，因时间限制只讲了2个（中国近代科学从何时算起，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以及史德问题。

10月，《于子三运动——于子三烈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由浙大出版社出版，参与全书的筹划、编辑，撰写《于子三运动史》一文（迫于政治形势，均未署名）。16日至11月11日，去杭州参加市委召开的“解放战争时期杭州党史座谈会”；在浙大主持“于子三运动历史座谈会”；讲课：《爱因斯坦研究》、《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史观》、《科学、民主和马克思主义》¹⁸¹（2小时）、《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1.5小时）、《科学的继承、积累、突破和科学革命》（3小时）。

📅 1988年 68岁

春，CCTV拟拍摄反映建国后科技情况的10集记录片《中国科技40年》，在建国40周年时播出。许认为，反映建国后知识分子情况必须提到反右，导演张海潮同意，并提出反右部分以许为典型。

4月18日，在许家举办的持续两年多的Seminar，因参加者陆续出国、调走等而结束。

5月，在《新观察》20期发表《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批评》。11日，在刘刚发起的第二期北大“草地沙龙”做了“民主

¹⁸¹ 内容与1985年3月28日要讲的内容一致，为避讳“民主”而改为《科学社会史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到会者三百多人。

概念的基本认识”的演讲。

6月16日，在家中宴请哈佛费正清中心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茉莉·古德曼**及其丈夫哈佛俄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马歇尔·古德曼**，方励之、李淑贤夫妇及范岱年作陪。

7月，发表《从一个译名反思民主意识》，发表于《新观察》1988年第20期。21日，拟出《**民主论**》**提纲**，计划写20-30万字，一年内完成。上篇，历史的回顾；下篇，理论的探讨，各10章。提出“**马克思、列宁的最大历史错误是否定民主，主张专政**”。

8月，为王德禄、李真真编的《“双百”方针文献集》写序，这个集子迄未能出版。

9月，发表《**驳民主缓行论**》。

10月19日，CCTV导演张海潮等到许家拍摄反右及文革时批爱因斯坦相关的镜头。由于6.4事件，播出时片名改为《共和国之恋》，反右、文革等内容被全部删除。

10月24日，参加“文化建设恳谈会”，驳斥“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批判“民主不能出口”的谬论，指出文化的目标是追求真善美，真—科学，善—政治—民主，美主要是永恒的主题，……。发表于11月9日《中国文化报》，题为《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民主、科学》。

11月10日，参加北京几家民间学术机构联合召开的“全国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指出**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并认为说“整个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导致了斯大林、毛泽东的暴政，也导致了五四启蒙运动仅一年就夭折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回到五四**。

12月15日，参加“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提出明年是“五四”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应联合其他学会，开展隆重的纪念活动，开展民主思想的启蒙，批判所谓“精英民主”、“新权威主义”这类反民主谬论，揭示没有政治民主，经济改革必然失败。29日，**心率失常**每分钟二三十次。此病自此**持续近20年**，直至2007年才基本治愈。

📅 1989年 69岁

1月12日，参加《国情研究》编辑部召开的“民主与权威”座谈会，强调要开展民主思想启蒙运动，列举了对民主有误解甚至曲解的十几个人的著作和文章，一一予以驳斥。

2月23日，去首钢研究开发公司“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参加“中国民主理论讨论会”，建议把新权威主义同筹安会对比，充分揭露批判。

1~2月，与施雅风共同发起**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终止因思想定罪的历史。钱临照、王淦昌领衔，**42人**（多为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签名**。此信1月17日酝酿，27日起草初稿开始征集签名，2月28日分别寄给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3月6日向媒体公布，此后十几家国外及港台媒体来访或电话采访。

3月，发表《**弘扬民主，批驳反民主逆流**》，刊于《国情研究》第3期。

3月18日，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在统战部约见许良英、王来棣、施雅风、吕东明、李晨，**就42人联名信之事听取意见**。许指出：现在党风腐败，是非颠倒，没有言论与学术自由，还因思想问题随意逮捕青年判以长期徒刑，痛斥官方示意的“新权威主义”，声明“如果中国再出现专制统治，我们誓死反对，我愿意第一个杀头流血”。着重谈了徐

水良的情况并交给阎一份 1977 年以来因言论被治罪的 16 人名单。

1~3 月，先后有 4 批共 110 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公开信。

4 月 15 日，**胡耀邦去世**，引发大规模学生游行。26 日，《人民日报》社论称学生运动是“阴谋”、“动乱”。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参加“青年沙龙”，讲《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¹⁸²。建议与会者劝学生冷静，不要硬顶撞。

4 月 28 日，上海市委撤销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职务，29 日，许与严家其发起**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声援钦本立。5 月 2 日，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托人向许解释事情经过。

4 月，公安部发 109 人黑名单：方励之、许良英、王若水、苏绍智、于浩成、李洪林……。

5 月，发表《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国家立国之本——纪念“五四”70 周年兼批判新权威主义》，见《明报月刊》5 月号。

5 月 1 日，在《百姓》半月刊与王来棣合作发表《新权威主义新在哪里？》。

5 月 18 日，去历史所参加知识界救援绝食学生的集会，指出，这次民主运动已取得空前的伟大胜利，为使政府认错而牺牲学生的生命，是不值得的，必须紧急呼吁学生停止绝食。大部分人同意，立即成立“**知识界救援团**”，劝说学生停止绝食。

6 月 1 日，乘公交车到天安门广场，以老校友身份访问“浙江大学声援团”，劝学生早日返校复课。

6 月 4 日凌晨，听说木樨地 22、24 楼有人中弹身亡，即打电话给住在 22 楼的王淦昌先生，知王家也中了弹。此后，许的熟人中有三十多人被通缉或被捕：方励之、李淑娴、王丹、刘刚、包遵信、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等。

6 月 10 日日记：许多亲友劝我避一避，我都婉言谢绝。理由是：因心脏不好，并未卷入学潮；一直给学生“泼冷水”，避免被坏人利用；始终认为中国民主化是漫长的过程，应用民主方式争取民主，不可过激；首要任务是思想启蒙。因此当局没有理由把我看成“动乱”的策划者或煽动者。若因宣传民主、与方励之的私交而定罪，将泰然处之。我已做了“三世人”¹⁸³，若为民主而死，当死而无悔！并已做好思想准备，一旦被捕，即绝食，以死抗议。

7 月，与方励之共同主编的《爱因斯坦研究》第一辑（共收论文 13 篇，资料 3 篇，25.6 万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 1985 年 3 月“爱因斯坦研究讨论会”的产物，因许生病、方受批判、“6.4”而延宕。

11 月，《人民公安》、《时事报告》载公安部副部长长文《从动乱到暴乱，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许作为“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被点名 4 次，仅次于方励之的 6 次。

《20 世纪》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¹⁸² 载于 5 月 8 日《世界经济导报》终刊号，题目被改为《民主是安定团结的唯一可靠保证》。提出民主主义八条，对八九学运影响很大。

¹⁸³ 1920~1949~1969~2015。许称，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抱定必死的决心，没想到能活到解放，因此，到 1949 算第一世；1969 年自杀被救，算第二世；此后是第三世。

📅 1990年 70岁

8月，与钱临照共同主编的《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物理学家》第1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出版第5卷）。

G·Holton 著，许编《科学思想史论集》，35万字，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 1991年 71岁

3月28日，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二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发言：《关于科学意识和现代化建设的几个基本认识问题》，批判钱学森与“何新现象”。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8期。

6月，台湾新竹的凡异出版社盗印出版了《爱集》第1,2卷。

📅 1992年 72岁

4月，发表《为科学正名：对所谓“唯科学主义”辨析》，载《通讯》，1992年第4期。

5月，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载《未来与发展》第5期，是一篇公开谴责“六四”屠杀的檄文，被当局认为是出版界最严重的政治事故，编辑部因此遭到整肃。

6月，发表樊洪业、王德禄、尉红宇的《许良英先生访谈录》，见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与研究》第6期。

8月3日写信时情绪激动，突然头痛欲裂，十分钟后逐渐缓解。

📅 1993年 73岁

1月，香港《前哨》1月号发表陆民声文章《反左老将许良英》。

4月2日，在北师大参加“黄药眠诞辰90周年纪念会”，谈到毛泽东反右时的“引蛇出洞”和一贯敌视“大知识分子”的心态。

5月11日，就刘刚在狱中受虐待事写信给江泽民，12日晚BBC播出刘刚的控诉书。14日BBC就致江泽民信和控诉书之事电话采访许，15日播出。

6月，发表《**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见香港出版的文集《中国的良心——民运百人的心路历程》。

8月，发表《**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见纽约《探索》杂志8月号（终刊号）。

8月26日，**写完1958年6月以前的自传**《回顾与反思——对真理、革命~科学、民主、理性的追求》，22万字。

12月5日，刘刚妹妹探监时被打伤，9日约路透社、安莎社记者在许家采访刘刚家人。

📅 1994年 74岁

1月，发表《包遵信的89民运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序》，载于《争鸣》1月号。

2-3月，各地大肆抓捕异议人士，王丹、魏京生再次入狱。起草《**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3月10日发出，7位知识分子签名。11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表呼吁书全文，另有几乎一整版相关报道，并在报头上用呼吁书中的一句话“舍人权而侈谈现代化，无异于缘木求鱼”作为该报当天的语录。

3月12日开始**被软禁**在家（不许下楼）。对奉命来访的院、所领导说，本不想主动见来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现因发表了改善人权的呼吁书，人权立即受到侵犯，我反而要主动去见克氏，除非撤掉包围的警察和对丁子霖的监视。若因此被捕，将以死抗议，**甘做谭嗣同**。当天，VOA、BBC、美国各大报特别是中文报纸都报道了许被软禁的消息。14日克氏离京，软禁放松（不许出小区），15日解除软禁，但长期被监视，尤其是有西方政要来京时。

4月16日，接受VOA和《南华早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1976年“天安门事件”到1989年历次民主运动都是自发的，不是任何人能领导起来的，镇压只能出现大爆发，民主运动不是造反，当局不应逼人造反。

5月25日至6月8日，“6.4”五周年之际，被迫与王来棣去桂林、阳朔旅游、怀旧、会见老友。

6月，被选为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12月8日，发出《**为保障王丹人身安全自由的紧急呼吁**》，22人签名。11日VOA报道。

☞ 1995年 75岁

2月，应邀在美国科学促进会¹⁸⁴（AAAS）2月年会上发表《**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4月28日，接受VOA记者采访，指出共产党一党专政，靠政府自己反腐败，必然半途而废。次日播出。

4月，起草《**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王淦昌等45位著名知识分子签名。5月15日发出，并致信江泽民、乔石。此后核工业部派人要王淦昌先生撤回签名，遭拒。多人被要求退出签名，遭拒。王丹等人被捕、被抄家、受传讯。再后，总部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在网上向世界科学界、知识界征集对宽容呼吁书的签名，有1120人签名，包括10位诺奖得主和国内数十位院士。

5月25日，与丁子霖同获美国纽约科学院及其科学家人权委员会授予的“**佩格尔斯科学家人权奖**”。9月21日举行颁奖会，由方励之代许、丁领奖。

7月30日，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王淦昌先生是受杨振宁愚弄了》。

9月，因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5-16日，许良英、王来棣、许成钢被迫到烟台、威海、蓬莱（明代在临海抗倭的戚继光的故乡）、牟平（于子三故乡）旅游。回京后得知于子三故乡已划归烟台。

12月9日，参加湖南科技出版社在京召开的《爱因斯坦全集》翻译工作会，与会者名单是许提出的。会议决定了1,2,3,5卷负责人，在许的建议下，成立翻译顾问委员会。

☞ 1996年 76岁

3月7日，以高票当选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10届大陆地区“杰出民主人士”，5月4日颁奖，由方励之代领。

10月3日，王丹被正式逮捕，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判刑11年。11月11日，发表《**为王丹辩护**》，反映强烈。

¹⁸⁴ 世界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团体，现有265个分支机构和1000万成员。顶尖期刊《科学》即为其会刊。

12月12日，接到参加“于光远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学术活动60周年座谈会”的通知，14日通知许不要参加此会，否则“有关方面”不让开这个会。

📅 1997年 77岁

4月9日，香港《前哨》月刊发表安琪的《**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11月18日，接受《华盛顿邮报》电话采访，指出江泽民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人权、民主问题也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是相对的”是错误的：相对论虽然认为空间、时间是相对的，但肯定自然定律是绝对的、普遍的。根据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人权问题也是绝对的。

📅 1998年 78岁

1月，发表《**中国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物理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国际物理学史讨论会专刊。

2月28日开始与李慎之通信，交流思想。

3月17日，李鹏被选为人大委员长。在接受法新社电话采访时指出，李对6.4镇压负有直接责任，民愤很大而且无能，他被选为委员长，可见人大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

5月21日，苏哈托辞职。在接受VOA电话采访时说，苏哈托搞了三十多年独裁统治后终于在强大学生运动的压力下下台了，使人联想起中国1989年的学生运动，**邓小平6.4的血腥镇压，葬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使东欧、苏联的共产党统治垮台**，江泽民应该从邓的阴影中走出来，学学蒋经国晚年时开放报禁，开放党禁。

12月4日，签署林牧起草的致江泽民、朱镕基的公开信，要求释放王有才；23日，签署林牧起草的就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判重刑，给联合国人权专员的公开信。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批评了王、徐、秦，称自己不同意所谓组党活动，但要保护他们的公民权利。

📅 1999年 79岁

3月30日写《**“89”十年感言**》。

5月18日，江棋生被抄家、被捕，19日发表了由许良英领衔，丁子霖、蒋培坤起草的公开信《**强烈抗议，紧急呼吁**》。

9月，《**20世纪第二版出版**》，对第一版做了大量增补、修订甚至重写。字数从80万增到126万。其中，引言、第1,2,3,32章、结束语为许撰写或与他人合写。开始与98岁老人陈立先生通信。

12月7日，与挚友李慎之见面。

📅 2000年 80岁

5月3日，80周岁，学生们筹备为许出纪念文集。

📅 2001年 81岁

10月，发表《**耀邦与知识分子心连心**》，刊于《怀念耀邦文集》第三集，香港亚大国际出版公司出版。

12月，自选文集《**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由香港明镜出版

社出版，共选了42篇文章。

📅 2002年 82岁

10月4日，写《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发表于许良英、刘明编《爱因斯坦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20世纪》获台湾第一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在大陆评奖时排名第一，在台湾评奖时被杨振宁拉下来，成为“佳作奖”。

📅 2003年 83岁

5月10日，写《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发表于《怀念李慎之》和《83封书信》（2008.4.）。

📅 2004年 84岁

6月29日，为江棋生《看守所杂记》写序。

📅 2005年 85岁

本年为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告本年为“国际物理年”，为此编写一本图文并茂的文集《走近爱因斯坦》。从2月开始发表《爱因斯坦奇迹年探源》、《爱因斯坦的双重奇迹》等多篇文章。

4月1日，参加由“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举办的科普讲座，主讲“漫谈爱因斯坦奇迹年”，听众80多人，气氛热烈。

7月14日，在《南方周末》发表《名家推荐大学生暑假阅读书目》推荐《爱集》等。

《走近爱因斯坦》获本年度台湾“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佳作奖”。

📅 2006年 86岁

3月10日、4月20日、5月8日参加李锐发起的小型讨论会，与会者都是思想比较解放的老党员。议题包括历史、马克思主义、党和中国往何处去。

6月，香港《开放》杂志6月号刊出李卫平的《许良英概评八九民运——访问中国著名学者许良英先生》。

8月22日，《纽约时报》发表《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的采访报道，并配有7幅照片，占了5/4版。24日，收到93岁的武汉大学美国史专家刘绪贻教授寄来的论文，开始与其通信。

📅 2007年 87岁

2月28日，对铁流、杜光、戴煌发起的纪念反右50周年的公开信（要求否定邓小平给反右运动定的结论；索赔；解禁反右历史）提出4条修改意见（①应说明，80年代对反右历史是开放的，6.4后倒退了；②应以“扩大化”的比例0.6:99.4来否定邓的结论；③应为经济困难者，特别是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被划为右派后又改划四类分子者呼吁索赔；④应从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要求“解禁”）并签名。

3月30日，参加“有关科学理念和科学规范的思考”学术讨论会，讨论科学院的《科学理性宣言》。指出，由官方（以科学院名义）来发表宣言，是荒唐的；最大的学术腐败是政治、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预。

5月11日，写《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纪念反右50周年》。6月底

附录二：许良英大事记

在美国加州举行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由王丹代为宣读。

6月19日，经中关村医院王印坤大夫7年（从2000年4月开始）的精心调治，终于将困扰多年的心律失常基本治愈。

7月24日，去中关村医院看验血结果，21项指标全部正常，大夫连说几个“棒”。

10月6日，写完《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历程——〈爱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订后记》，2009年12月发表于《爱集》再版第三卷。

为《爱集》再版审读全部译稿、选编说明和编译者注，彻底清除了意识形态的污染。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马恩晚年思想（是否放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马克思的历史评价、以及胡绩伟提出的“胡耀邦、赵紫阳十年新政”。

📅 2008年 88岁

4月，出版《83封书信——许良英、李慎之书信集》，邓伍文编，同心同理书屋。

4月13日，荣获美国物理学会（APS）颁发的“萨哈罗夫人权奖”（颁奖词称，许“一辈子倡导真理、民主和人权，尽管遭受监视软禁、骚扰威胁，甚至流放”），由许成钢代领，并向APS回赠《爱集》一套。

4月29日，在自然科学史所为20多位研究生讲课：科学史研究者的精神思想境界问题。

8月7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北京参加奥运会途经泰国曼谷时发表的演讲中说道：“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9月，发表《〈黎明前的求是儿女〉序》，刊于《黎明前的求是儿女》，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表《林昭，中国的布鲁诺永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载傅国涌编《林昭之死》，香港开放出版社。

9月，王来棣鼻孔内发现肿物，10月北京医院诊断为“未分化癌”，做了4周放疗无效。11月20日首都儿研所诊断为“神经内分泌癌”。12月8日转到301医院，22日做手术。

📅 2009年 89岁

4月，发表《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刊于《炎黄春秋》第4期，发表时题目改为《也谈“普世价值”》。

9月16日，写《民主是普世价值辨析——与吴江先生商榷》。同月，发现房颤，在中关村医院住院12天。后去安贞医院看专家门诊多次。

几次参加民间组织的普世价值研讨会，与朱厚泽、胡绩伟等人一起沟通交流，反击反普世价值的逆流。

📅 2010年 90岁

9月2日咳血，在301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住院9天，诊断为支气管扩张，1976年咳血也是此病。

11月，吴敬琏在一次会上对许成钢说，希望尽早出版民主书稿的简本，以应需要。

12月与王来棣合写的《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发表，载《炎黄春秋》12月号。

📅 2011年 91岁

6月15日，去力学所参加讨论会，主讲民主问题：批判杨振宁在香港发表的谬论（民主与科学无关，中国实行一党制最好），用古希腊文明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介绍近作《走出伪民主误区》。王来棣讲郭嵩焘的遭遇和孙中山后期的民主思想。

8月，郭迪在新浪网开了“许良英和王来棣先生的博客”。

10月发表《**走出伪民主误区**》，载《炎黄春秋》10月号。25日，腾讯“大师”栏目发表沈洪的《科学史家许良英》访谈视频。

📅 2012年 92岁

1月1日，因剧烈头晕送301医院急救，两周后发现心率过慢，13日安装心脏起搏器，21日出院。

3月8日，与磨铁图书公司**签订《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出版合同**。

4月6日，方励之去世。20日，写《**痛悼方励之**》，载《北京之春》4月号。

4月29日，在给刘绪贻的信中称“《**民主的历史**》（原名《民主的历史和理论》）已与一家出版公司订了合同，……”。

9月，王作跃等编的《**呼唤民主与人权：贺许良英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10月7日，**为《方励之自传》作序《自由知识分子的先行者》**。

10月中旬日记称，近似1月1日的头晕，被自我控制住了。

10月25日，在回家的路上**摔倒**，左额左臂出血，被送到中关村医院，额头缝了4针，做了CT，未见异常。

11月1日，三联书店编辑送来**1958年6月以前的自传《回顾与反思——对真理、革命～科学、民主、理性的追求》**的校样，表示**愿意出版**。开始看校样。

12月5日，发现走路能力很差，11日下肢近乎瘫痪，13日中关村医院神经内科诊断为因摔跤引起的**慢性硬膜下血肿**，送301医院手术被拒，14日晚在海淀医院**做（颅骨）钻孔引流术**，3天后肺部感染，高烧不退、昏迷不醒。

12月31日14:50'，**王来棣**于海淀医院**去世**，差两天87岁。1小时后，许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 2013年 93岁

1月28日13:25'，在海淀医院重症监护室**去世**。

1月30日下午3时，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遗体捐献中心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与王来棣一样，遵其遗愿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 2014年6月16日，许成钢、郭迪访问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采纳许成钢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犹太裔同事的建议，将许良英部分**手稿捐赠**给位于该校的**爱因斯坦档案馆**，包括《爱集》1-3卷、与《爱集》或爱因斯坦研究有关的译著作、论文等手稿，共计251件。

📅 2015年5月，《**民主的历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吴敬琏作序。

编后记

家父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去世后，留下大量已发表与未发表的手稿，包括书稿、文稿、书信、日记。我和夫人陈罕立对它们进行了搜集、分类、编号、登记、扫描、录入、校对。家父的学生王作跃、胡大年将所有文章的标题译成了英文。目前除了录入、校对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余工作均已告罄。

家父的手稿原件是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的珍贵文献，为了能使它们得以永久、妥善的保存，我们已将爱因斯坦有关（包括但不限于《爱因斯坦文集》）的手稿原件全部扫描留底，并由家兄嫂许成钢、郭迪于2014年6月送到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内的爱因斯坦档案馆，受到希伯来大学及档案馆的热烈欢迎（见追思会上许成钢的发言），其余手稿原件也将做类似处理。如果国内外的学者能充分地利用这些文献开展研究工作，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这也是对家父最好的纪念。

家父有许多给他人的信件没有保存、留底，恳请家父的朋友及其家人将自己保留的与家父的来往书信（最好是原件或扫描件，复印件也可，但不如扫描件清楚，且需要邮寄）寄给或发给我们，以便将来有选择地整理出版、归档。若寄来原件，我们定当回赠扫描件电子文档（pdf）。

许平 2016年6月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812楼704室，邮编100080

Email: cgxu2013@gmail.com

图书在版目数据

许良英纪念文集

良知英鉴书屋.一 北京: 2015.12

I. 许… II. 纪… III.①民主 ②自由 ③政治

书 名 许良英纪念文集
顾 问 许成钢 王德禄 郭 迪
主 编 许 平
副 主 编 武文生 刘志光 许从平
责任编辑 程 宏 姜福祯
封面设计 许 平
出版发行 良知英鉴书屋
版 次 2016年8月第三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毫米, 1/16
页 数 414页
印 张 25.9
字 数 461千字

A life time's advocacy of truth,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despite surveillance and house arrest, harassment and threats, even banishment.

一辈子倡导真理、民主和人权，尽管遭受监视软禁、骚扰威胁，甚至流放。

————The Sakharov Prize Committee

萨哈洛夫奖委员会

探真理，抗强权，一生波折，铸独立精神
秉正义，舍天伦，半世流离，树慨然正气

科学思想 传承爱氏大爱 人类赤子之心永存
民主启蒙 见证历史期盼 中国自由精神不朽

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私无畏
探科学争民主守理性有始有终

良师谆谆细描民主愿景
英气豪豪怒斩混世大蠹

良骥识途自奋蹄，推民主宪政，国人盛赞；
英才同道齐共鸣，举自由纛旗，华夏留芳！

良知铸英魂，科学探索垂风范；
英才寄良言，民主追求炳丹青。

讲科学，论民主，启蒙世人思想，倾心良苦，
研历史，倡人权，力行普世价值，尽致英鉴。